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5

明代卷

缪咏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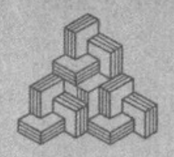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明代

5

缪咏禾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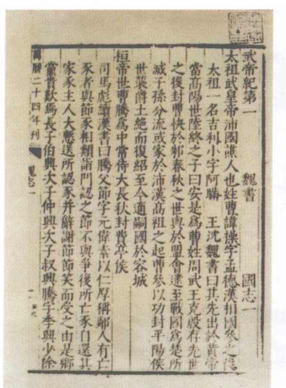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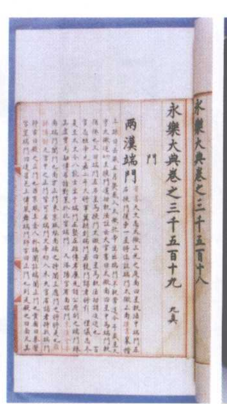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缪咏禾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8-17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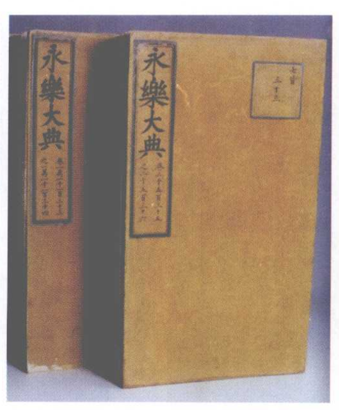
Ⅰ．中… Ⅱ．缪… Ⅲ．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明代 Ⅳ．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914 号

责任编辑／武　斌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9.25　彩页 4
字　　数／423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彩图1（左）
明初，南京国子监用宋元旧版印史书，此为万历年间新刻的《三国志注》。

彩图2（右）
《永乐大典》，解缙等辑。永乐五年（1407年）编撰完成。此为明嘉靖抄副《永乐大典》。图左为第3519卷“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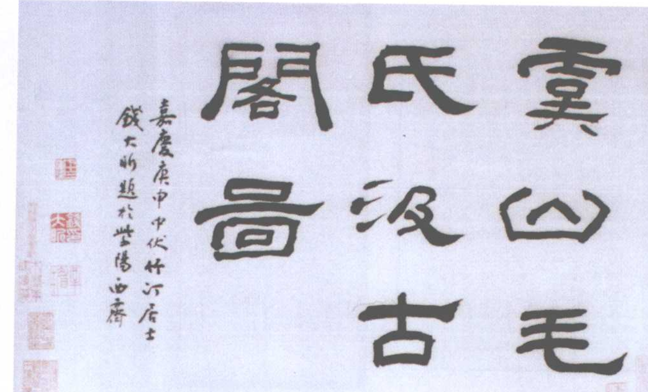


本紀卷第二十八　元史二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英宗二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安南占城各遣使來貢方物壬
申保定雄州饑賑之庚午廣太廟甲戌禁漢人執兵
器出獵及習武藝丁丑太陰犯昴親祀太廟始陳鹵
薄賜導駕耆老幣帛戊寅敕有司存恤孔氏子孫貧
乏者己卯山東保定河南汴梁歸德襄陽汝寧等郡
饑發米三十九萬五千石賑之庚辰太白犯建星公

彩图3（左）
《元史》210卷。宋濂等编撰，洪武三年（1370年）内府刻本。

彩图4（右）
藩王刻书，是明代刻书特色之一。这是秦王朱惟焯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







彩图5（左）
明崇祯间胡正言辑刊的彩色印本《十竹斋画谱》，采用的是餖版印刷术。

彩图6（右）
《虞山毛氏汲古阁图》，明崇祯王咸绘，上有钱大昕、段玉裁等36人题诗。

石門文字禪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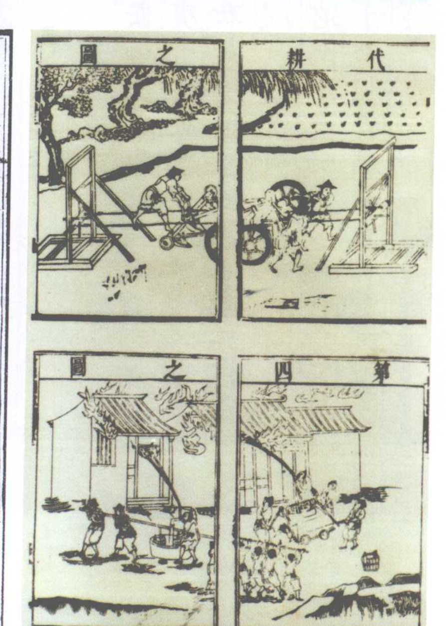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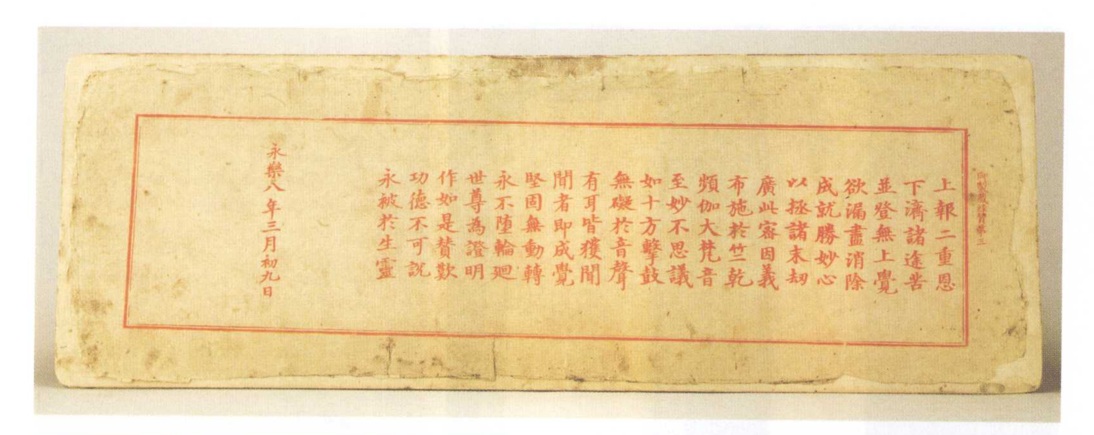
謁狄梁公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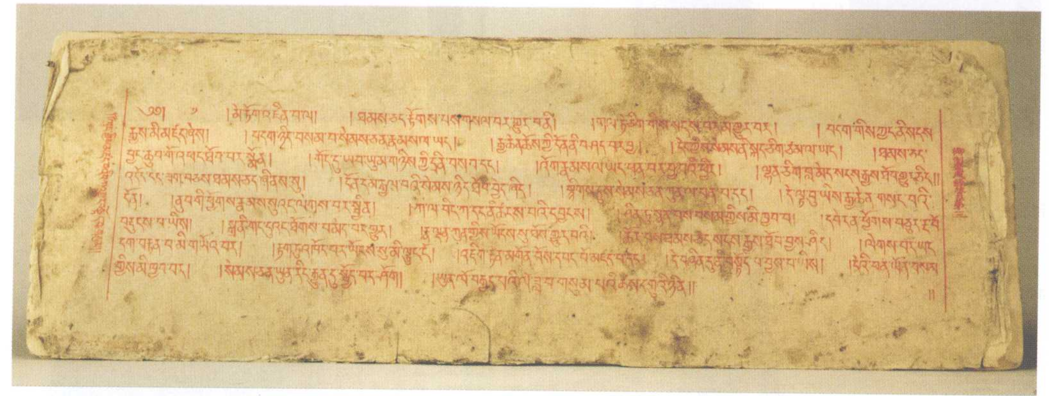
九江浪粘天氣勢必東下萬山勒回之到此竟傾瀉如公廷諍時一快那顧藉君看洗日光正色甚閒暇使唐不敢周誰復如公者古祠蒼煙根碧草上屋瓦我來春雨餘瞻歎香火罷一讀老范碑頓塵看奔馬斯文如貫珠字字光照夜整帆更遲留風正不忍掛



彩图7（左）
佛经大藏《径山藏》从万历七年(1579年)开雕，清康熙年间完成。这是《径山藏》中的《石门文字禅》。

彩图8（右）
明代出版了200余种翻译西方科技图书。此为《远西奇器图说》，瑞士教士邓玉函口述，王徵译，崇祯时刊行。






刻李卓吾批點三
國志全像百廿回
古今名人筆意披掛戰畸全備


方禹脩陳眉公兩先生鑒定
陳臥子先生評選
皇明經世
文編
雲間平露堂梓行
本衙藏板
翻刻千里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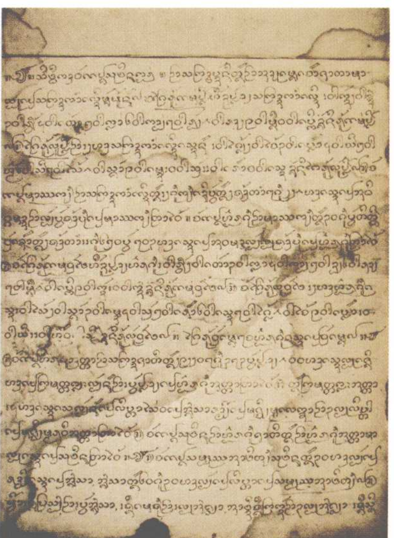
彩图9（上）
明代永乐版藏文大藏经（汉文）

彩图10（下）
明代永乐版藏文大藏经（藏文）

彩图11（左）
明代刻印的《三国演义》有数十种版本。此为万历年间建阳吴观明刻本《李卓吾批点三国志全像》。

彩图12（右）
明末东南士人编刻了一些经世致用之书。这是陈子龙等辑印的《皇明经世文编》，平露堂刻本。





彩图13（左）
羊皮作封面的彝文文献

彩图14（右）
傣文《苏定》



彩图15
彝文《超度经》

思無補報募請
欽賜銀兩命工
重刊上為祝報
洪恩下為保安
黎庶弟子鄭利
虔懇西僧鎖南
陸竹詳譯經旨
深奧無窮意難
盡徹畧表其尤
命是為序永遠
流傳以彰
聖善云耳
大明
萬曆丁未歲孟
春吉日刊

彩图16
明刊本藏文《药师佛经》

编辑委员会

出版工作委员会

导 语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事业鼎盛兴旺的时期。

史学家认为，在我国古代皇权的更替中，明代是“得国最正”的。朱元璋不用狐鸣篝火的狡诈伎俩，也不用篡位弑君的残忍手腕，靠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辗转征战，削平群雄，逐走元帝，最后统一全国，水到渠成地登上了皇位。

明朝的版图虽不及元、清两朝广袤，但在汉人政权的实际统治中，却是最广大的，一改南宋局处一隅的局面，江河南北，二京十三省，向心力凝聚得十分紧密，令出必行，四境帖服晏安。

明代靠武力统一全国后，执行偃武修文的国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经济政策比较得当，效果显著，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生活粗安。洪武、永乐两代，做了许多奠定基业的大事，特别重大的一是户口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普查全国人口，查得全国人口共有1 065万户，6 054万人。[1] 查过之后，每户发给“户帖”，登记成“黄册”，在后湖里建了“黄册库”。二是土地田亩普查。在洪武元年（1368年）、五年（1372年），多次派出太学生到全国丈量田亩，洪武二十六年完成，绘制了“鱼鳞册”。量得全国耕地共850万顷。[2] “黄册”和“鱼鳞册”这两份档案，

【1】《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同上。

被称为“经纬册”，可见其重要程度。这两项基本国力普查既是确定征兵、徭役、赋额的重要根据，又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根据。类似的国力普查工作，如全国水利状况调查等，还做过不少。

洪武、永乐时期又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工作。明建立前一年，就“诏求遗书”，建“国子之学”，洪武元年八月，采取了一项常为人们乐道的重要文化政策：下令“除书籍田器税”[1]，把书籍和农具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洪武时还编撰颁发了上百种“制书”，充分发挥图书巩固皇权的作用。永乐时调集三千多人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又编撰了意识形态的权威著作《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影响后世数百年，还两次颁发全国编纂地方志的“凡例”，在全国兴起了编写方志的盛举。

以上种种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都带有基本建设的性质，显示了明代开国之初泱泱大国的气魄。这段时间里的出版事业也显得生气勃勃，无论是机构设置、品种规模，还是经营方式、图书体制，都很有建树。

明建立后八十年，发生了皇帝被瓦剌人俘虏的土木堡事件，但这事带有偶然突发的性质，并没有动摇国本。接下来成化、弘治两朝，史称“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太平无事”。[2] 从正德开始，国势下滑，先是正德皇帝耽乐嬉游，盘游无度，把国事当做儿戏；接着是嘉靖皇帝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国家纷乱多故，将疲于外，贼讧于内，崇尚斋醮，事鬼而不事人，挥霍无度，府藏告匮。富庶治平之业，日见凌替。万历皇帝更不像样，在位四十多年，竟然二十多年不视朝、不临讲、不亲郊庙、不批奏章，从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三年间，六部大臣“拜疏挂印自去”者多人。[3] 重要的官员缺了不补。整个中央政府竟如瘫痪人的手脚一样，变成一个“痿痹顽钝世界”。[4] 到了天启、崇祯，败亡自是不可挽救之事了。

在这段时期里，中央一级的出版机构很少作为，嘉靖时为

【1】《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明史》卷十五《孝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崇祯长编》三年八月癸酉。

"议礼"而编撰《明伦大典》，天启时为"三案"而编撰《三朝要典》，虽然兴师动众，开馆设局，可是这些书对于国计民生、思想文化学术，都毫无益处。而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出版业，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出版不同步的现象，说明出版事业和政治之间，既有直接反映的制约关系，又各有其本身发展的规律。

明朝后期，商业繁盛，形成了许多新的城镇，产生了大量市民阶层，新思想奔涌，对图书提出了品种以及数量上的要求，出现了不少新的图书品种，再加上雕版印刷生产能力的成熟发达，以及出版家的努力，于是，便出现了出版事业空前繁荣的局面，向着近世化的大道迈进。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末期，外患内忧交织，国势日衰，一些有识之士编刊了一批经世致用之书，如《皇明经世文编》、《武备志》等，这些书和明前期大量的巩固皇权的"制书"前后辉映，充分显示了出版事业的社会功能。

第一章　明代出版事业概况

明初，经济好转，社会稳定，思想文化的统治比较宽容，图书出版事业得到正常发展。

明中期，国势由盛转衰。到了后期，虽然国力衰颓，但图书出版事业却沿着自身发展的规律迈进，向着近世化的方向发展。这个趋势，在明末更加显著。明代出版事业，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各个时期有明显的特点。

明代出版物的种数在多种书目中有记载，又有大量存世的图书可资参证。可以查知的图书出版物种数在三万种以上，现在尚存一万多种，这是研究明代出版史最重要的实证。

第一节　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元璋在1352年起兵，削平长江上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张士诚。1368年建国后，南北用兵。洪武元年北伐，元帝仓皇北走。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南，完成了统一大业。

洪武帝在明建立前一年，就设立了国子学，开国的第一年，就开科取士。元帝留在北京的图籍、典章，留在杭州的宋代书版，都保存得很好，被集中到南京存放。这些都说明朱元璋对于

文化建设早有关注。

洪武十五年结束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后，朱元璋致力于加强政治统治。思想文化工作也紧紧围绕着建立和巩固皇朝统治服务，修撰前朝历史，尊重儒家思想，完善科举制度。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出版了大量的“制书”，编修国家法典，告诫百官民众，公布大案事实。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巩固皇朝政权的色彩。

“靖难”之役后，朱棣夺到了皇位，他迁都北京，南京则保留为陪都。这个“两都制”维持了全国的统一和稳定，又有利于国防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在内外政策上，他基本上遵循其父所定的国策。在思想文化上，建树更多。他主持编定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又组织三千多文人，编纂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显示了皇朝文治之盛。武功和文治兼美，永乐帝死后因而得到了“文皇帝”的美谥。

朱棣死后，朱高炽继位（仁宗），在位只有10个月，但亦改革了一些弊政。此后，朱瞻基（宣宗）登位，做了10年皇帝，守成有方，史书上说:“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1] 称之“仁宣之治”。

【1】《明史》卷九《宣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朱祁镇登位（英宗，年号正统），年仅9岁，国事大权落到了司礼监太监王振手里，开宦官擅权之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大举入寇，英宗听了王振的怂恿，率领50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一战，皇帝被俘，王振被乱军砍杀。这便是历史所称的“土木堡之变”。一般历史书都把“土木之变”作为明代前后国势的重要转折点。

英宗被俘后，国家没有了皇帝，在于谦等大臣坚持下，朱祁钰登位（代宗，年号景泰）。一年后，瓦剌人送还了英宗，但是朱祁钰不肯让出皇位，英宗被软禁在南宫。7年后，代宗病重，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乘机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英宗恢复了帝位，史称“夺门”、“复辟”。英宗又做了8年皇帝，年号

天顺。

英宗死后，他的儿子朱见深登位（宪宗，年号成化）。以后，又传了8个皇帝，一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这几个皇帝在位时间比较长的有嘉靖（45年）和万历（48年）两帝，在位时间短的则有隆庆（6年）、泰昌（1个月）、天启（7年）三帝。总起来看，从成化元年（1465年）到明亡，共约180年，除了成化、弘治两位皇帝略有作为之外，总的态势是一溜下滑，直至灭亡。

明朝的后期，国家处于动乱和安定两种状态的交织之中。动乱的时间多，安定的时间少。

安定的因素主要是：个别皇帝在登位之初，想要有所作为，力图振兴，在有能力的阁臣主持下，收拾了一些权臣宦官的恶势力，朝政比较清明；或者有得力的武将，平乱靖边，国内粗安。因而在一段时间里社会相对安定，财政差可应付，显得有点中兴气象。

动乱的因素很多。一种因素是皇帝本人昏庸。明后期有几个皇帝，有的年幼不懂事，甚至有点弱智；有的盘游无度，佞佛溺道；有的无所作为，对国事不闻不问，寻求长生。后妃宠贬，皇子废立等事，不断发生，宦官弄权，朝臣水火，也都搞乱了朝政。差不多每个皇帝，都宠信过不同的宦官。藩王蠢蠢欲动，觊觎神器，或者在地方上为非作歹，鱼肉一方。动乱的第二个因素来自国境之内。或者发生严重的灾荒，据记载，从万历到崇祯期间，严重灾荒频发。因为灾荒和赋税苛重，产生了流民和响马。少数民族叛服不定，邪教不断，全国范围内各种暴动、起义层出不穷。第三种动乱因素来自边境或境外，那便是困扰着有明一代的"北虏南倭"。北方的蒙古族长期和明朝处于敌对状态，九边不宁。东北女真族的威胁则愈来愈严重。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明初洪武时就骚扰不休，一直到明代后期才为戚继光、俞大猷讨平。有些时候，几种动乱因素一时俱来，势不可挡，就会造成国事糜烂、不可收拾的局面。

明代不少士大夫重名节，好清议，英挺不卑，不以帝王的是非为是非，凡不合圣贤祖训之事，朝野立即奏议纷纷，据理力争，常爆发廷谏、廷争之事。为了劝阻正德帝南巡，先后146名朝官谏阻，嘉靖议礼时，226个朝官哭谏。皇帝用降斥、谪贬不够，又屡屡用廷杖、下狱立威。但这些都不能摧折他们的精神。论者认为，这是明祚较长的重要原因。明代的史书和文集中，常载录这些史事掌故。

在明后期动乱多变的局面下，社会的经济却得到了缓慢而曲折的增长，科学技术也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相对稳定的东南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14、15世纪，出现了不少手工业集中的城镇，东南地区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全国形成了数十个大城市，各种货物集散地逐渐兴起，行商遍及全国，水陆交通发达。在货币经济发展、商品流通频繁、远距离交易兴起的情况下，白银普遍使用，形成了成熟的银本位制。在人群结构中，出现了以手工业者、小商人、店员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史学界把这种种现象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后期，整个社会向近世化迈进，势头十分迅猛。这种进程，以社会主导思想的变化为先导。明初期中期，程朱之学一直处于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再加上科举考试的现实价值，使程朱理学深入到各界人士的头脑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中期，王阳明心学独树一帜，风靡天下，逐渐成为思想界的重心。在王学的启导下，明后期产生了新思想的萌芽，王艮的“良知现成自在”说，李贽的“本真自我”说，冯梦龙的“情教”说，对理学构成冲击。尽管这些学说都来源于传统的儒学，但是，从老根上萌发出来的新枝，却是如此的面貌迥异，令人吃惊不止。理学的薄弱外壳，已经掩盖不住躁动强劲的新思潮的涌动。

第二节 明代出版事业略述

一、明代出版事业概况

在元代，士人地位低下，科举制度久废，但出版事业仍有所发展。明代建立之初，比较重视文治，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活动余地很大，因此，出版事业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明代的出版机构有官刻、坊刻、私刻三种。官刻中最重要的是南北国子监和司礼监经厂，此外还有礼部、兵部、都察院、钦天监等中央各部门。地方机构则有各级官署和儒学、书院、军事机构卫所，经济机构如漕运司、盐运司等也刻书，在明代后期的修志高潮中，几乎每一个省、府、州、县都刻过书。分封在各地的“藩府”刻书，则是明代出版的特有现象。明代的坊刻集中在金陵、福建、苏州、杭州、徽州、湖州、北京等地。其中最突出的是福建、苏州和徽州。福建的建阳地区，刻书千百种，连续数百年。苏州府常熟县的汲古阁，重视质量，校勘精审，出版了许多重典精品，为明代的出版事业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建阳地区和汲古阁的刻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徽州地区的刻书，后来居上，工艺精湛，材料丰富，人才济济，有不少新的成绩。明代的私家刻书蔚然成风，他们刻的书大都是自己的或先人的著作，也有家藏、秘藏的善本，其中一部分家刻质量上乘。刻书机构中还有寺院等宗教团体，有的刻印了单本佛经，有的刻印了规模巨大的佛藏和道藏。西方教会在北京、山西、杭州等地设有刻书机构。少数民族也有少量刻书。

以上官刻、坊刻、私刻三种都有主持其事的人。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一书中著录这种“主持其事的人”共有五六千家。每家机构所出的书，少则一二种，多则数十百种。[1]

从图书的编辑角度来看，明代图书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它强烈的政治取向。这在明初的“制书”和明末的经世致用之书中表现

【1】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

得尤其明显。明初，大量出版“帝皇之书”，有制典立法的宪章，有教训皇室宗族的内训，有诰诫文武百官的官诫，有总括历代文献的《永乐大典》，有树立正统思想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类书中还有总结朝政大事公告世人的要案经过，如胡惟庸案的《昭示奸党录》、《清教录》，蓝玉案的《逆臣录》等。这种做法后来常被采用，嘉靖朝有总结议礼的《明伦大典》，天启朝有总结三案的《三朝要典》。为了编撰这类图书，皇室充分调动出版力量，任命重臣主持其事，开馆设局，克日完成，颁行天下，企图齐一人心。明朝末叶的经世致用之书，则是另一番景象，这类书的编纂出版几乎和官府无关，大都由有识的文人主持，他们看到国事日非，国运可危，企图吸取历史教训，有所振兴，便团结同道，广泛收集有关文献，厚今薄古，从现实需要分篇立章，汇聚成书。由于当时社会刻印能力已经十分发达，篇幅往往十分巨大，显示论据充分。作者呼叫喊号，忧国忧民，热血喷薄。一边收集编纂，一边已经开雕，速度极快，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这类书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等编纂的《皇明经世文编》。明初和明末的这两股出版思潮，是出版的政治功能充分发挥的表现。

此外，在子部图书中，科学图书的编撰也相当发达，尤以兵书和医书为多。《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被称为“四大科学巨著”，这四部书就体定例，重视实证，详尽精审，具有科学巨著的恢弘气派和不朽作用。明代的学者们还和西方学者一道，翻译了200多种科学书籍，内容涉及基础学科和各种应用科学，翻译的方式有严格的直译，也有编译、选译、译著、译述等。这些图书发挥了中国科学和世界科学接轨、互补的作用。子部和集部中特别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小说和戏剧的收集、整理和编纂，《三国》、《水浒》等长篇小说在明初被“写定”。“三言二拍”之类的小说总集，《元曲选》、《六十种曲》之类的戏剧选编，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各种各样的总集、别集、选集，林林总总，品类繁多。在大量编辑实践

中，编辑理论也有所发明，图书编纂之学得到了发展。

图书的品类和体式是逐步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我国的图书品类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积淀、丰富的过程。万历年间，焦竑编的《国史经籍志》中，在制书、经、史、子、集五大类之下，分成50个子目，子目下再分细目、小目，终端子目有342个之多。[1] 例如，史部下面有15个子目，在"地理"这项子目中，又分为10个细目。这种细密的多级目录，说明了明代图书品种繁多，形式多样，体例富有变化。明代图书品类和体式的丰富，还可以从类书、丛书、选本上看出来。明代出版了类书之最《永乐大典》，还有多种日用的"小类书"，各种类型的丛书也丰富多彩，嘉兴成为"丛书之乡"，各种角度的选本出版得很多。这些都反映了随着知识的极大丰富，产生了系统和选优的需要。明代还出现了期刊的萌芽、连环画的萌芽，十分值得重视。

【1】［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粤雅堂丛书本。

自宋初图书的刻印工艺已经基本定型以后，只有一些量的变化。明初图书的字体，大致由近似颜、柳、欧、赵的楷体，逐步定型为四角崭方、横细竖粗的"宋体"，醒目端正，这种"宋体字"后来成为我国图书字体的主流，一直使用到今天。书版的版式多样，用纸考究，装订方式则简化为方册线装，大大节省各种材料。这些定型，是雕版刻印的方式决定的，也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断进步的结果。

在明代，出版界的人士在印刷工艺上，曾尽了极大的努力，有所突破。突破的方向，一是活字印刷，企图提高生产力，节省材料。活字印刷的书，可以查知的有二百多种，这种尝试一直延续至清朝，但是始终没有成为印刷业的主流。突破方向之二是彩色印刷，有三色套印、五色套印，还有饾版和拱花等。这些富有创造性的、艰苦的探索和尝试，体现了值得歌颂的改革精神，在出版史上留下了珍贵的实迹。

明代图书的销售和经营，也有不少成就。全国大城市中，往往有专营图书的坐商们组成的"一条街"，如南京的三山街、苏州的阊门、杭州的涌金门等。大城市中还有所谓的"聚书地"，

兼营批发和零售，有些产书地还有定期举行的集市，和今天的“书市”相似；还有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车运船装，沿着一条习惯的路线，运销到全国各地。东南苏嘉水乡地区则出现了用船装着书到处销售的“书船”，湖州的织里村成为“书船之乡”，还有专门寻求奇书孤本的“访书家”。

图书的地区差价引发了大批量、远距离的图书流动。福建、苏州等南方所产的书，到了北京，可以增值二三倍。每逢科举考试之年，更是销售的大好机会。还有些书运销到了周边国家，这便是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在销售中，广告宣传被广泛运用，在书上印上牌记，或印上书目。版权意识也逐渐成熟，版权的买卖、转移时有发生，不少书印上书商传统的标志（商标），严词申明“翻刻千里必究”。明朝的图书除一部分赠送或分发外，绝大多数是有价销售的，刻书业有利可图，竞争相当激烈。竞争带来了许多良性的结果，有的以校勘精审取胜，有的以珍本奇书标榜，有的着眼于识字不多的人，印制小说、戏剧、唱本。同时，竞争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出现了不顾质量、低劣、作伪图书，淫秽图书也着实不少。马虎粗疏的学风也造成了一些低质量的书。

在明代，出现了不少经营图书业的集中地区，专营书版的如建阳地区、徽州地区印了不少家谱和别出心裁的商品广告。专营童蒙书和图片、年画的有河北的武强和河南的朱仙镇、福建的四堡，这些地区都有作坊百余家，从业人员百千人，有的专管招揽，有的主事绘画，有的负责刻印，家庭妇孺也参加其中，分工合作。经营的历史赓续数百年，形成十分庞大的出版行业。在城市里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小书坊。一幢房子，门面开店，后面做作坊，楼上则是编辑部，编、印、发一体，看到什么书好销，几天里就可以赶印出来，十分灵活。《桃花扇》中“逮社”一出，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小型出版经营者的面貌。专业工人的流动，行业的协作，也颇有规模。大型的集团、小型的坊肆、内部的协作流动，说明了出版业正向着近世化迈进。

在明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出版家，他们中有藏书家、编辑家、出版家、目录家、选家、画家、刻工等。其中最著名的有：收藏了大量图书，为出版事业提供资源的藏书家祁承爜、叶盛、高儒、范钦、唐顺之；能驾驭大局完成复杂工程的解缙、陈济；记录图书出版实迹的目录家周弘祖、黄虞稷；精编细校、务求精审、“十年校一书”的袁褧、王延喆、顾元庆；有强烈的责任感、出版了大量精品的毛晋；善于经营开拓、顺应大众需要、集编印发于一身的熊大木、余光斗；毕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收集和编纂的冯梦龙；编刊大型经世文集的陈子龙；广延文人参加增订佛藏的僧人紫柏真可；孜孜追求印刷新工艺，尝试活字和彩色印刷的华燧、安国、胡正言；精于绘制和镌刻插图的徽州黄氏家族……。真是群星灿烂，不胜枚举。

二、明代出版事业的历史位置和分期

出版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明代的出版事业，完成了从古代向近世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主要标志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图书的复制技术而言，雕版书远远压倒了缮写本，最初的图书是以传抄方式复制流通。明初永乐十九年（1421年）整理皇室藏书，共得二万余部、近百万卷。这些书以抄本为主，所谓“锓板十三，抄本十七”。[1] 到了明代的后期，刻本书占绝对多数，抄本只是不重要的补充而已。

第二，从刻书的机构而言，由官府扩展到了民间，私刻和坊刻远远超过了官刻机构。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刻机构仅占百分之十五左右，私刻和坊刻占百分之八十以上，[2] 刻书机构从官府一家独占成为鼎足而三。

第三，从刻书的地区分布而言，由中央扩展到地方，无远弗届。外地的刻书机构远远超过首都的刻书机构。古代刻书地区集中在首都，外地刻书较少。[3] 后来逐渐扩展，明代后期，全国各省府州县几乎都刻印过图书。

第四，从图书品种而言，世俗图书远远超过宗教图书，市民

【1】《文渊阁书目》序。

【2】详见本书第五章。

【3】12世纪中后期，[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首都以外刻书地点7处；[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8处；13世纪中期，[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30多处；[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60多处。

图书大量出现。雕版图书初期，佛教图书数量极多，有人认为，我国雕版事业是从佛教图书开始的，其后，世俗图书才超过宗教图书。明末，更出现了大量市民图书。

第五，从流通方式而言，以商品销售方式流通的图书，远远超过无价颁赠的方式。最初的图书，或由皇室文士专用，或由政府颁发到各级政府、学府，以商品买卖形式流通的仅是一部分。明代中后期，书籍的流通以商品销售的形式为主，出版成为一种产业。

以上五个方面综合起来，充分说明，明代的出版事业完成了近世化的进程。

明朝前后期出版事业面貌的迥异，当时人就有深切的感受。生活在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江阴人李诩曾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指隆庆、万历年间）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1] 李诩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他学举子业大概是二十岁左右即嘉靖初。这说明，明代出版事业的勃兴，是在嘉靖中叶之后。顾炎武也多次提到明末出版事业"大畅"的形势。

【1】[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时艺坊刻"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明代后期出版事业大发展，还可以用一些数据来说明。《明代版刻综录》共著录图书7 740种，其中洪武至弘治时期（1368—1505年）137年间的书共著录766种；正德、嘉靖、隆庆（1506—1572年）66年间的书，共著录2 237种；万历至崇祯（1573—1644年）71年间的书，著录4 720种。其比例是1:3:6。地方志一类书，明初只有数百种，嘉靖以后共出版1 688种。[2] 小说、戏曲类图书，明代初期、中期加起来只有百来种，明代后期出版的各种小说、戏曲，至少有一千多种；私人撰写的史书，明初和明中期加起来不到一百种，明后期撰写私史成风，有关出版物不止千种。

【2】见本书第二章第七节关于地方志编纂的叙述。

从以上分析可知，明代的出版事业，至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正德为界。现在看到的论著，则都分为三个时期：在前期和后期之间，析出一个第二期（中期），成为前期、中期、后期三段。这中间的一段，有人称为"过渡期"，有人称为"酝酿期"、"沉潜期"。中期的特点是：有许多新因素出现，逐渐

酝酿蓄积，但是还没有成气候。下面介绍两种“三分法”的分期意见：

周采泉先生认为：从洪武到弘治（1368—1505年），共137年，是第一阶段，特点是“浑穆淳朴，字体凝重，版心宽大，几可媲美北宋”。正德、嘉靖、隆庆（1506—1572年）是第二期，共66年，特点是“刻书最多，书品精美，字大宜老，亦不亚南宋之乾道、淳熙”。万历以后（1573—1644年）是第三段，特点是“国步凌迟，刻工纸张，远逊于前”。原文没有提到隆庆一朝（1567—1572年），可能是因为时间短忽略不计。[1]

李致忠先生认为，明初至正德是第一段（1368—1521年），共153年，刻书风格是“黑口赵字继元”；嘉靖至万历中期（1522—约1590年）是第二段，共68年，特点是“白口方字仿宋”；万历后期至崇祯（约1591—1644年）是第三段，共53年，特点是“白口长字有讳”。[2]

【1】《明代版刻综录》周采泉序，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

【2】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这两种分期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或把正德放在第一期，或放在第二期。他们都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入手，深入到图书的字体、版式、装帧等具体的领域。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前期约占整个明朝的一半左右，特点是基本上和前代相似。中期和后期，合起来占一半时间。中期是各种变化的生发时期，后期是各种变化的成熟时期，这种变化，在明代灭亡前达到极致。

第三节　明代出版物总数估计

一、从《千顷堂书目》到《明史·艺文志》

研究明代出版史，必须对明代出版物的总数有大概的了解，这就要借助著录明代出版图书的目录。符合这个要求的书目，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这本书目必须是在清初（至少也得明朝末叶）编成的，才能囊括明代出版的图书。二是这本书目必须是单收明代出版的书，如果兼收其他朝代的书，就要费一番分剔的工

夫。三是这本书目必须收罗相当齐全，而且必须可靠，不能挂一漏万，也不能耳食传闻。

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以及后来的《明史·艺文志》，基本符合这三个条件。

黄虞稷，福建泉州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的父亲黄居中，明季担任国子监丞，家富藏书，编了一本《千顷斋藏书目录》，6卷。黄虞稷从小受到父训，学问淹博，也喜欢藏书，他充实其父的书目，成为《千顷堂书目》。后来，黄虞稷入清廷的明史馆，负责编艺文志，他以《千顷堂书目》为基础，编成《明史艺文志稿》（已佚）。明史馆的总裁王鸿绪在这本书目的基础上，整理删削成《明史稿艺文志》（现存）。再后来，后任《明史》总裁张廷玉又一次整删，成为正式定稿《明史》的《艺文志》，即《明史》的卷96至卷99。这两本书目的渊源承继关系，十分清楚。

黄虞稷从事这项工作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以家学为基础，又有清廷中丰富的文献。特别是他工作的时代是在明亡以后三四十年，这时，前朝的资料已经收集齐全，还没有散失，而某些禁忌已经有所松动，正是整理前代史籍的最佳时机。

《千顷堂书目》收的以明一代的书为主。因为元代所修的“三史”都没有艺文志，所以也兼收前代宋、辽、金、元人的书，作为“补”附在后面。更前时期的书（唐朝及唐朝以前）则完全不收。以明代为主，所以称之曰“一代之书”。全书按传统的编法，以经史子集分类，共32卷，收书15 600种。除著录作者和书名之外，不少书还附有作者生平、成书经过的资料，加以简要的考证。因为它内容丰富，记载详实，所以对研究明史很有用，故有“明史之门”之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本书十分推崇，说道：“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略其舛驳，而取其赅赡可也。”

在《千顷堂书目》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明史·艺文志》，采纳了前书的优点。删削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选精，从15 600种

减为5 033种（108 974卷），大约选取了三分之一，选择颇为得当；二是删去了宋、辽、金、元的材料，对此颇遭人非议，认为是失去了黄氏的“原旨”。

可以说，《千顷堂书目》是一本明代出版物的“长编”，而《明史·艺文志》是其“精编”或“简编”。(图1)

二、明代出版物数量估计

上一小节简要介绍从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到正史《明史·艺文志》的发展经过。在这个发展系统之外，还有几本书目需要作为“旁系”，略作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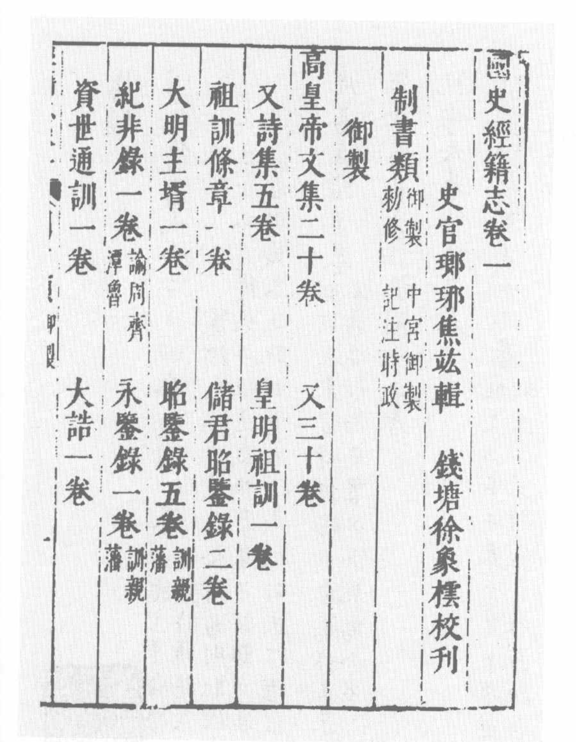
1.《国史·经籍志》 焦竑编。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皇帝开馆编当代《国史》。焦竑负责编《经籍志》，共6卷。全书体例完备，分类细密，共有终端子目342个。焦氏写了50篇分类跋语，很有价值。共收书16 279种，207 911卷。但焦氏在编目时，注意力放在如何分类上面，不考究是否存佚，所以目录上有些书，实际上并不存在，以致文献家不大敢引用。所收除明代出版物以外，兼收前代的书。（图2）

2.《明书·经籍志》 傅维鳞编。傅是明末举人，清初进士，曾入明史馆工作，接触明代史料颇多。便编成了一部《明书》，173卷，其中第75卷至第77卷是《经籍志》。这书是从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梅鷟的《南雍志·经籍考》、刘若愚的《酌中志》等书移集而成的，文献价值不高。

3.《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续文献通考》是王圻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编成的，上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下止万历初年。到了清代，文士们认为王

易類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義例一卷 永樂十三年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等纂修五經四書大全周易則取程傳及朱子本義博采二程遺書外書朱子語類文集及傳于易者與諸家之說羽翼之書成頒行天下學宮
周易直指十卷 仁宗在東宮時命楊士奇纂卦文朱氏本義要旨為是書以備觀賜今名
朱升周易旁註前圖十二卷
鮑恂大易鈎元三卷
梁寅周易參義十二卷 經文上下二卷十翼十卷寅以程朱二家釋經意殊乃融合二家合以為一

图1
《千顷堂书目》，清代无刻本，此为清抄本。


國史經籍志卷一

史官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橒校刊

制書類 御製 中宮御製 敕修 記注時政

御製

高皇帝文集二十卷　又三十卷

又詩集五卷　皇明祖訓一卷

祖訓條章一卷　儲君昭鑒錄二卷

大明主壻一卷　昭鑒錄五卷 訓親藩

紀非錄一卷 諭周齊潭魯　永鑒錄一卷 訓親藩

資世通訓一卷　大誥一卷

图2
明代史官编的当代国史书目《国史·经籍志》。

圻所编书“不管存佚，一切捃摭，泛滥无征”，编得不好，要纪昀等人重编一部，这便是《钦定续文献通考》，其中《经籍考》收明代著作4 523种。但该书几乎是照《四库全书总目》移来的，所以评价也不高。

4.《明史·艺文志》　5卷，清人尤侗编。尤侗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在明史馆修史，著了这部《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其“摭拾既多挂漏，又往往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评价不高，共收书7 141部。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这部书，存佚不详。

1959年，商务印书馆编刊“十史艺文经籍志”，其中有一部《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汇刊了多种明史艺文志、经籍志，所收内容共有6种：

1.《明史·艺文志》　清黄虞稷编，清王鸿绪、张廷玉删定。

2.《明书·经籍志》　清傅维鳞依据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等重编。

3.《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明王圻编。

4.《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清乾隆时官修。

5.《国史·经籍志》　明焦竑编。

6.《国史·经籍志补》　清宋定国、谢星缠编。

这6种书目的总数是“共著录书约有二万九千余种（重复者尚未计在内）”。（见该书的“出版说明”）

这“二万九千余种”，可以作为明代出版物总数来看待。但是它并没有收罗齐全，还可以补充不少。例如：

1.从《中国地方志综录》等书可知，明代地方志存佚的总数是2 892种。[1] 而《千顷堂书目》中只有1 877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只有672种。可补充的当有数百种。

[1] 黄苇等：《方志学》，第二章第五节《明代方志的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等书可知，明代出版通俗小说有217种，[1] 而《千顷堂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加起来只有101种，可补充116种。

3. 明代立国276年，应该有历书276本。但国内外现存书目里只有99年的历书，可以补充177本。

4.《医藏书目》中载医书544种，而《千顷堂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加起来只有医书388种，可补充156种。

5.《曲品》、《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载明代各种戏曲出版物至少有533种，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的只有300多种，《千顷堂书目》中没有戏曲书，可补充200多种。

6. 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等书所载，明代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著的科技书和宗教书，至少有250种至300种，[2] 而《千顷堂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不足30种，应补充200多种。

7. 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载，该馆有明版图书1 400多种，其中170种是任何书目都没有著录过的，是该馆独有的，这170种应补充进去。

8. 明代有大量童蒙书、应举书、劝善书、日用小类书、木版年画，这些书在一般书目中都不载，可补充的数字很可观。

这些补充工作十分艰苦，而且很容易出错，所以只能作一粗略的估计，略知大概而已。根据以上材料，如果我们把明代出版物的数字暂定为3.5万种，大概是不会太离谱的。

三、明代的其他图书目录

明代的图书书目，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不少。据《千顷堂书目》卷十簿录类著录，明代书目共有78种。因为下面几章中常会提到各种书目，所以在这里略作简单介绍。

(一) 官府藏书书目

1.《文渊阁书目》　杨士奇等编。文渊阁是明代皇室的藏书

【1】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

【2】〔法〕费赖之撰，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之所。英宗时，皇帝命令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清理编目，正统六年（1441年）完成。书目共20卷，著录图书7297号。所谓“号”，就是“种”。所收的书，有明代出版的，也有前代出版的。抄本居多，“锓板十三，抄本十七”。这是我国第一本国家藏书目录，代表明代初期国家藏书状况。

2.《内阁藏书目录》 孙能传、张萱等编。《文渊阁书目》编成后164年，藏书的情况有了增减。万历皇帝命大理寺左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等重新整理编目，书目共8卷，收入图书2 447种。代表明代中期国家藏书状况。

3.《南雍志·经籍考》 梅鷟等编。本书是《南雍志》中的两卷，嘉靖初成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官书”，记载南京国子监所藏图书47种；下篇“梓刻”，记载所藏版片302种，7 948卷，版片170 264块。有些版片记录了它的来历。

4.《明太学·经籍志》 郭磐编。本书是《皇明太学志》中的第二卷“典制下经籍门”，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记载北京太学中藏书79种，2 741册。还有藏版70种，其中23种可以再印，3 531块，47种已不能再印，5 554块。

5.《内板经书纪略》 刘若愚编。本书是《酌中志》的第十八卷。刘若愚是任司礼监的宦官，掌管内直房笔札。该书记载司礼监经厂藏版情况：一般书54种，1 491本，113 613叶，佛藏180 082叶，道藏122 589叶，番藏150 074叶。

6.《行人司重刻书目》 徐图编。行人司管理传旨册封等工作，经常被派往全国各地。司里规定，凡出差到外地的官员，返回时要带几本书，作为“公贽”，因而司里颇有些“罕秘不传之本”。徐图在任时，编了这本书目，共1 419种，7 577本。

7.《秘阁书目》 钱溥编。正统年间，钱溥在东阁任史官。东阁有书50厨。钱溥编成书目，收书5 917种。序文写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

（二）私家藏书书目

1.《百川书志》 高儒编，共著录图书2 100种。每本书下有

作者、篇目、掌故，《三国》、《水浒》最早见于此书目，还收录戏剧59种。

2.《晁氏宝文堂书目》 晁瑮（约1506—1576）编，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该书目收书6 864种，其中有小说笔记1 346种，戏曲343种，并记录了刻书的机构93家。

3.《赵定宇书目》 赵定宇（1535—1596）编，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这本书目著录书画283种、稗统（小说）967种。

4.《脉望馆书目》 赵用贤之子赵琦美（1563—1624）编，收录图书4 323种，其中有古今杂剧200多种、小说180多种、方志近800种。

5.《澹生堂藏书目》 祁承㸁（1563—1628）编，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他的收藏为“海内之首”。此书目著录图书9 081种，88 507卷。

6.《菉竹堂书目》 叶盛（1420—1474）编，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收录图书4 600多册，22 700卷。这本书目已失传，仅有伪本存世。

7.《天一阁书目》 范钦（1506—1585）编，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他自己编撰的书目已失传，此为清初抄辑本，收书5 000多种，有特色。

除了以上几种私家书目外，还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李如一编，收书188种，3 121卷，数字虽不多，但“多罕有之书”；《世善堂藏书目录》，陈第编，收书1 981种，32 433卷；《徐氏家藏书目》，徐𤊹编，著录图书5 425种，其中有笔记随笔679种；《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李廷相编，收书1 631种；《近古堂书目》，作者不明，收书3 858种，其中“伪书类”、“天主教类”、“宋版正史”等颇可注意；《玄赏斋书目》，董其昌编，收书4 703种；《万卷堂书目》，明宗室朱睦㮮编，收书3 768种，43 066卷。

私家所撰书目中还有三本值得重视：《古今书刻》，周弘祖

编，这本书目按地区编排，第一卷是刻书，2 300种，第二卷是刻石，900多种；《道藏书目》，白云霁编，收道教典籍1 686种，按道藏的分类法编次；《医藏书目》，殷仲春编，收医书544种，按医学体系分类编次。

（三）近人重要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藏书目录。一种图书如果有若干种不同版本，一律收录，所收书都是确实存在的。共收古籍56 790种，其中明版书23 042种。除去不同版本后约18 600种。

2.《明代版刻综录》　近人杜信孚编，1983年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这本书是从44种书目上辑集来的，这44种书目又都是实存书的书目。因此这本《明代版刻综录》上的书也都是实存的。共著录书7 876种，刻书者5 257家。

3.《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杜信孚、杜同书编，2001年线装书局出版。该书按省县及刊刻单位为序，每种书有作者、刻书经过等简略资料。共收刻者4 670家，书8 260种。

此外，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出版的书目中，也有重要的资料。例如，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收明版善本1 400种，其中170种是该馆独有的，在我国已不存。

第四节　明代出版管理和文字狱

一、明代的出版管理行为

明代没有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事务由相关的政府部门负责，史书上有一些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记载。

（一）命令各地编纂某种图书　洪武六年（1373年）令各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一年（1378年）下令各府州纂修志书；十六年（1383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

水陆道路、仓库图；十七年(1384年）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1]永乐十年（1412年）、十六年（1418年），两次正式颁布《修志凡例》，详细规定地方志的体例和完成时间。以后几朝，又多次颁布修志法令。

（二）颁布图书样本　为了防止重要图书在翻刻过程中发生错误。洪武时颁布过《大诰》的大字样本，命各地照样翻刻。嘉靖十一年（1532年）福建提刑按察使发出牒文，召集书坊主到衙门，颁发经书的“钦定官本”，要坊主照样翻刻，具结保证不得违反，在建本《礼记集说》、《春秋四传》序目后，全文印了这篇牒文。[2]

（三）关心出版灾祸　弘治十二年（1499年）曲阜孔府阙里失火，损失若干典籍；同年，福建麻沙书坊也失火，烧坏大量书版。给事中许天锡给皇帝报告，皇帝派人到阙里和麻沙去“厘正”，调查受灾状况，帮助恢复。[3]

（四）为中央出版机构调集人力物力　内府经厂刻书的工匠是各地的“班匠”充任的，或二年一轮，或一年一轮。印书所用的纸张向各地调集。据《大明会典》载，每年各省向内府贡纸的数量是：陕西十五万张，湖广十七万张，山西十万张，山东五万五千张，福建四万张，北京十万张，浙江二十五万张，江西二十万张，河南二万五千张，南直隶三十八万张，合计一百三十七万张。这些纸张一部分用于文书和生活，大部分用于印书。为了保证纸张供应，还派出内府官员到产地置官局造纸。

（五）监督图书质量　嘉靖十一年（1532年）皇帝派出官员到麻沙去监督图书的校对质量。这事在清人傅维鳞的《明书·经籍志》和清人梁章钜的《归田琐记》都有记载。记得比较详细的是清人施鸿保《闽杂记》一书，书中说：“福建巡按御史杨瑞、提督学校副使邵锐，请于建阳设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员监校麻沙书版，寻命侍读汪佃领其事，此盖载礼部奏稿者，是时麻沙书版且有官监校矣。”其中提到的汪佃，弋阳人，正德丁丑（1517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因讲经不称旨，被派到建宁校书，担任

[1] 以上俱见［明］郑晓：《今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官刻只准翻刻，不准另刻”，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3]《明会要》卷二十六“学校·书籍”，又见《明史》卷一八八《许天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通判。[1] 在嘉靖《建宁府志》中，有一篇汪佃写的序，提到自己“尝奉命校书是邦”，可惜文中没有提到他“校书”的具体情况。

下面介绍一个省级地方机构发出通知，要所属各地翻刻一本书的行政措施。通知中对刻书缘由、经费、样本呈验等规定甚详。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特例。该书的书名是《圣门人物志》12卷，内容是介绍孔门传人118人，郭子章撰，万历刻本。书的前面有一个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公移”，全文如下：

“为圣门从祀先贤先儒，诸生往往有不悉其姓氏，况于履历行实。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是将何以尚而友之？欲责令学官采辑成书，以为诵法者之助。今据按察司郭按察使送到，夙昔所辑《圣门人物志》，考据精详，删削简要。留心圣学如此，其于国宪民风，即举而措之耳。本院再四披阅，深所叹服，思宜颁布学宫，以广资问学。为此，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将发去《圣门人物志》一部，督令学官再加校阅考正，该府选择善书人役，誊写刊刻。应用纸价工食，于商税余课内动支。刷印肆拾部送院抚，属各府州县差人印刷，分给各学，仍将用过银数册报查考。须至牌者。”

这是山西一个省的做法，书的作者郭子章就是有名的郭青螺，官太子太保，曾任山西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

二、明代的文字狱

明代的文字狱并不严重，大都发生在重大政治事件的同时，下面略述几件常为人提到的事。

（一）所谓“表章之祸”　洪武后期，曾对文书表章中一些违碍字样实行过严厉处罚。例如，奏章中有“则”字，朱元璋怀疑是骂他“贼”；有“生”字，便怀疑是骂他做过“僧”；有“光”字，则怀疑是骂他“光头”。野史笔记中有不少记载，为此杀了一些人。这类事只在朱元璋晚年时发生过，大都是在表章中找岔子。史书上称为“表章之祸”，并没有形成制度。这类事只见于野史，颇多谬误失实，不可轻信，已有学者论及。[2]

【1】关于汪佃因讲经不称旨，被调到福建的事，见《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汪佃著有《东麓稿》，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别集存目三；又有《武夷山志》，见《千顷堂书目》卷八。

【2】陈学森：《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二）禁毁《剪灯新话》等小说　明代正式下令禁毁的小说只此一例。此事发生在正统七年（1442年），先是有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给皇帝奏章说："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1] 皇帝认为李时勉说得有理，命礼部议论，礼部也赞同，于是皇帝命令全国照办。这时，《剪灯新话》的作者已经去世三十年，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1】[明]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云出自《实录》。

连带遭殃的还有一本《剪灯余话》，内容和《剪灯新话》相似，作者李昌祺，江西人，曾参加编修《永乐大典》，官至广西左布政使。他本是一个著名文人，当时人讽刺他编这本书是"宫锦制裤"，官府没有对他治罪。后来，家乡修乡贤祠时，不让他入祠，算是一种舆论谴责。《剪灯新话》后来在中土失传，从日本反传回中国。

（三）禁毁异端邪说之书　最突出的例子是禁李贽著的《藏书》和《焚书》。这两部书由著名学者焦竑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刊行。起初没有引起大祸，后来李贽讲学，一境如狂。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向皇帝上疏弹劾，皇帝批曰："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2] 李贽被捕后在狱中自杀。他的书却并没有被销毁。天启元年（1621年），又有陈仁锡刊行，天启五年，皇帝又再次下令销毁。

【2】[清]王弘：《山志》初集卷四"李贽"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总的说来，明代对出版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不像宋朝那样前后数十次颁布禁令，也不像元朝那样有事先审查的制度，更没有禁止书籍流向外国的法规。到了明朝后期，《金瓶梅》那样的书竟至"悬诸国门"，私人撰写的当代国史也到处流传，出现了

我国出版史上的活跃时期。

明朝出版史上，还有一种平民向皇帝直接“献书”之事，在清傅维鳞的《明书·经籍志》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均有多处记载。所献的书大都是经书的注解，或对时事的议论。皇帝收到后，或亲自阅看，或发交有关官衙审议。其结果颇不相同，有的得到奖赏，有的则被斥责，甚至有的被杀了头。因为这些书大都不传，在此不再深论。

第二章　官府编撰的图书

明代的图书编撰者，有官府、私家和书坊三者。本卷的第二、三、四章，将分别叙述三者的编撰活动，以及他们的主要编撰成就。

中央政府里集中了全国的俊才英士，当然成为全国编撰的中心。文官们根据皇帝的旨意和国事的需要，制典修史，编撰种种图书。翰林院是最主要的常设专职机构。当国家有重要的编纂任务时，常随时开馆设局，延聘人才，编撰各种专门图书。终明之世，这种编纂之事没有停止过。朝廷中的各业务部门，也编撰过种种图书。皇室常设机构和特设机构所编的图书，较重要的有明初的大量制书、前朝和本朝的史书、经书的辑订、各种典章制度的制订，还有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等。

省、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没有专设的编撰机构，往往根据特定的需要，由地方行政长官领衔，广延宿儒，编撰各种图书。最主要的成就是各级地方志、乡邦文献等。各省编撰图书的成绩差别颇大，偏远省份虽然编撰典籍较少，但也不乏有价值的图书。

第一节　中央政府的编撰活动

一、中央常设机构的编撰活动

明代中央政府的常设编撰机构是翰林院。

朱元璋称帝之前，就已经设置了翰林院。永乐帝迁都北京，翰林院也随之迁到了北京，地址在东长安门外。南京虽仍保留翰林院，但只有学士一人，且不常设。

翰林院的官员设置和其品秩有过几次改变，洪武十八年（1385年）最后改定下来，再没有过变化。最后确定的编制是：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其下还有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孔目、史官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翰林们的官秩虽然不算高，但是他们"职代王言"，是"近侍清贵之官"。翰林院又是"储才之所"，不少大官都是从翰林院出身的。

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载，翰林院学士的职掌是"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侍读、侍讲的职掌是"讲读经史"。五经博士的职掌是"各掌专经讲义"。编撰之事主要由史官负责，他们的职掌是"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事，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此外，在经筵讲读时，史官们"充展卷官"，在乡试、会试、殿试时，史官们"充考试官"、"同考官"、"收卷官"，还负责"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事。

从明代史书可知，翰林院所做的编撰之事，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编修实录　包括日历（指按日记载的大事记）、宝训、玉牒等。如洪武年间完成《大明日历》，以后各朝，完成15朝皇帝的《实录》，共3 000余卷。

2. 修史　修前朝的史籍如《元史》、《宋元通鉴纲目》、《历代通鉴纂要》，万历年间编本朝国史（未完成）。

3. 修书　翰林院"纂述之事，迨无虚日"，所修书有些是皇帝下令编撰的，如《昭鉴录》、《稽制录》等，洪武朝可以查知的有30余种。这些书虽然署名皇帝"御制"，实际上是"令本院儒臣议而行之"。

4. 订辑经传文字　如《书传会选》、《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1]

以上各种编撰活动中，《实录》的编撰是最重要而且是经常性的工作。《实录》是编修国史的基础，而《实录》又以《起居注》为原始材料，所以《起居注》的撰写十分重要。明朝的前期和中期，记录《起居注》的工作不正常，或置或废三次。洪武以后几朝，有关大臣多次奏请恢复，皇帝都没有同意，一直至万历时才正式恢复。史官们随班记事记言，皇帝的行止记成"日历"，言论则记成"宝训"，所谓"书动以为《日历》，书言以为《宝训》"。每天记载的材料放在柜子里，每月一小柜，每年一大柜，存东阁左右房（东阁的正房放图书）。年底，由礼部、都察院、翰林院三方会同收入大柜中保存。终明一代，《万历起居注》保存比较完整，并刊印成书。[2]

皇帝去世后，便开始纂修《实录》。由于明代初期和中期没有完整的《起居注》，只能另外采取三个办法：1. 收集朝野有关图书；2. 规定政府各部门和外省进呈奏章时，向翰林院的史馆呈送副本；3. 派官员到各地收集资料，如修《神宗实录》时，曾派董其昌到南方去寻访资料。

宣德十年（1435年）修《宣宗实录》时，曾制定《实录纂修凡例》，共52条，成为后来纂修《实录》的依据。

《实录》修成后，抄录成正副两本，分藏在不同地方，底稿则会同司礼监在太液池焚毁。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实录的编纂过程常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太祖的实录，在建文时已经修成，靖难后，重修了两次。好几个皇帝的《实录》，都曾经重修。

【1】上引俱见［明］黄佐：《翰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万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实录》的内容包括诏敕令旨、奏疏章牍、邸报传记，保存了大量第一手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被称为“国史之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着“缺漏疏芜”的毛病（纪昀语）。有明一代修纂的《实录》，从太祖开始，到熹宗为止，共有15朝、13部，3 045卷。[1]

[1] 明代各朝《实录》的卷数，详见《千顷堂书目》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明实录》初以传抄本流传。存世的各种传抄本有十余部，20世纪40年代，曾影印出版苏州国学图书馆的传抄本，500册，错误较多。1962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据原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缩微影印，计正文133册、校勘记29册、附录21册，开本和字体都太小，流传也不广。2005年底，线装书局以吴廷燮本影印，2 909卷。吴本较为完整，字迹也清楚，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本子，该书所收计有：

1.《太祖高皇帝（洪武）实录》　257卷，董伦、王景等修，李景隆、解缙等重修，姚广孝、夏原吉、胡广等再修。

2.《太宗文皇帝（永乐）实录》　130卷，杨士奇、黄淮、杨荣等修。前面9卷是“奉天靖难”事迹，记建文朝事。

3.《仁宗昭皇帝（洪熙）实录》　10卷，蹇义等修。

4.《宣宗章皇帝（宣德）实录》　115卷，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修。

5.《英宗睿皇帝（正统、天顺）实录》　361卷，陈文、彭时等修。其中卷183至273是景泰皇帝的实录。

6.《宪宗纯皇帝（成化）实录》　293卷，刘吉、徐溥、刘健等修。

7.《孝宗敬皇帝（弘治）实录》　224卷，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修，焦芳等续修。

8.《武宗毅皇帝（正德）实录》　197卷，杨廷和、费宏、杨一清等修。

9.《世宗肃皇帝（嘉靖）实录》　566卷，徐阶、张居正等修。

10.《穆宗庄皇帝（隆庆）实录》　70卷，张居正、吕调阳等

修。

11.《神宗显皇帝（万历）实录》 594卷，顾秉谦、丁绍轼等修。

12.《光宗贞皇帝（泰昌）实录》 8卷，叶向高等修，文震孟等改修。

13.《熹宗哲皇帝（天启）实录》 84卷，温体仁、张至发等修。

附：《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皇明宝训》。

二、中央特设机构的编撰活动

中央政府遇有特别重大的编撰任务时，常采用“开局”或“开馆”的办法进行。洪武时编纂《大明日历》、《元史》、《书传会选》；永乐时编纂《永乐大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嘉靖时编纂《明伦大典》；万历时编纂本朝正史；天启时编纂《三朝要典》；崇祯时编纂《历书》，都曾采取这种做法。

“开局”、“开馆”时，首先要选定主要负责人，计有：

监修 这是总负责人，由皇帝任命重臣担任。如《元史》的监修是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

总裁 具体执行的负责人。一般也由皇帝任命。如《大明一统志》的总裁是吏部尚书兼大学士李贤。有些书不设总裁，只有纂修，《性理大全》就是如此。

纂修 具体执行人。国初编书时，常由“山林隐逸之士”担任。如《明英宗实录》的纂修由柯潜、万安担任。

催纂 相当于现在的编务主任。如《洪武日历》由侍讲学士乐韶凤担任。

此外尚有校正、稽考、参对、誊写、文籍收掌等，这些人员大都由翰林院本院选派承担。

一次开馆编书，大体要经过以下这些过程：

1. 确定任务后，皇帝指派重臣担任监修或总裁等主要负责人。

2. 配备工作人员，一部分在朝臣中遴选，一部分延请“四方宿学老儒”。编《永乐大典》时调集三千多人，徐光启编《历书》时，专调“心精手巧”、“心手精敏”之士二十五人。

3. 找一个离中枢不太远又比较清静的地方，正式开局。《元史》开局天界寺，《大明日历》开局西华门，《书传会选》开局翰林院，《永乐大典》开局文渊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开局东华门，《崇祯历书》开局宣武门内首善书院。馆局有警卫。编《大明日历》时，“其事甚严且秘”。

4. 拨给经费，一般由工部支付，比较优裕，“礼遇甚厚”，还“月给廪费”，经常“命光禄寺给酒馔”。

5. 总裁或副总裁制订编写大纲，“发凡起例”。《永乐大典》由解缙制订了周密的凡例二十一条，贯彻始终。

6. 进入编撰阶段，克日计程，进度往往很快。

7. 完稿后由主要负责人审定，制“进书表”进呈给皇帝。《崇祯历书》分五批进呈，这是特例。[1]

8. 在皇宫内举行进呈图书的仪式，皇帝接受新编成的图书。[2]

9. 将原稿交给礼部“颁行天下”，一般由司礼监经厂负责刊印。然后庆功，赏赐编撰有功人员。“各赐钞币有差”，皇帝特别满意时，则“御制诗命次韵和进”，吟诗作赋，以示庆贺。

这样，一次大型的编撰活动才算告成。有关机构撤消，有关人员各回原职，不少人会得到升迁。因为经筵往往在开讲时奖励，编书则在完成时能得到升迁，所以有“经筵头，修书尾”之说。[3]

明代开局编书，有“三局”、“六局”、“十馆”的说法，这些，都是指因编撰工作需要而设置的分支机构。“三局”是指“国初召儒臣载笔，以定有天下之制，分三局以总之；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旧官之练宪典者居焉；二曰礼局，以究礼仪，凡宿儒之通古制者居焉；三曰诰局，以撰诰命，凡俊才之优文辞者居焉。此开局之始也”。[4]

“六局”是修史时所设的下属编纂机构，依六部而设，由六

【1】《崇祯历书》分五批进呈的情况详见《千顷堂书目》。

【2】仪式的过程见[正德]《大明会典》卷七十四“进实录仪”和“进书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

【4】[明]黄佐：《翰林记》，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部派人编撰。“一曰吏，以究人材之进退；二曰户，以量地利之盈缩；三曰礼，以考礼仪之沿革；四曰兵，以载军政之臧否；五曰刑，以书刑罚之详滥；六曰工，以审力役之纠缓。皆本六官职掌为之。”[1]

“十馆”是指六局中有些局的内容较多，需要设两个馆来编写。“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以均六局之多寡。”[2] “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3]

[1]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

三、中央职能机构的编撰活动

明代中央各职能部门，常根据其业务上的需要，编撰各种图书。如：

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编撰了《都察院巡方总约》、《唐策》等。

六部中的礼部编《礼部志稿》、《历朝登科录》，兵部编《九边图说》、《大阅录》、《昭代武功编》，工部编《工部厂库须知》等。

钦天监每年编《大统历》，有王历、民历两种。每年冬至送礼部颁行。成化十五年（1479年）起，改为十月朔颁行。钦天监还编有《天文刻》一书。

太医院编有《医林集要》、《铜人针灸图》、《经验奇效良方》等书。

这些由职能部门编的书，有的由该部门自己刊行，有的由内府刊行。

第二节　各级地方政府的编撰活动

一、各级地方政府编撰图书概况

明代的行政建置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一千多个府、州、

县。明初，布政司和各府都有编撰图书的活动，州和县则大都没有编书活动。明后期，皇帝下令全国各级政府编纂方志，使编书活动在全国展开。编纂方志的做法，虽大同小异，但也有不同的创造。将在下面有关地方志的一节中介绍。

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长官，都有编纂图书的能力，幕僚属员中也不乏能手，甚至有的乐此不疲。这些人员所编的书，一般用政府的名义刊行，书版也藏在本衙，出版史研究者都将其作为官刻统计，如果是用个人的名义编刊的，则归属私刻之列。

各省、府、州、县编刊的图书，数量相差悬殊。出版事业发达的地方，历任长官在任期间，都要编刊若干种图书，以示不落人之后，这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相沿成习。例如最著名的“出版之乡”福建的建宁府，每个莅任的知府，都有编刊的实迹。正德十六年（1521年）知府张文麟刻真德秀的《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55卷；嘉靖十七年（1538年）汪佃刻李频《李建州诗》，汪佃原来在翰林院任职，后来被派到福建专门负责“校正图书”之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知府程秀民刻胡广的《性理大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又续刻两本史书《少微通鉴》和《宋元通鉴》；嘉靖末年，知府杨一鹗编刻《周易程朱传义》。可见知府们编刊之勤。

二、地方政府编刊图书的主要成就

地方政府编刊的图书，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各级地方志　地方志的编撰都由上级长官任监修，当地主要长官任总修，其他人员有协修、总纂、分纂、总校、分校、提调、采辑、监刊、绘图等，还聘请当地有识人士参加。实施时往往也采取“开局”的做法。编成后请上级审定，然后在本地开雕，或交由外地代办。编撰刊印的经费由地方经费支付，又往往由地方官捐俸襄助。编撰的体例由中央颁布，各地有创新，方志的篇幅大有区别，有的多达数十百万字，有的只有二三万、甚至几千字。[1] 明代方志质量不等，有的价值很高，有的迂阔，识陋

【1】[明]康海《武功县志》三卷，二万字。[明]韩邦靖《朝邑县志》，五千字。

见短，议论空泛。所以明代的地方志淘汰不传的很多。

（二）乡邦文献　为了标榜本地人文之美，地方官们往往致力于地方文献的编辑。武昌知府孙承荣编《黄鹤楼集》3卷，收集了有关黄鹤楼的诗赋文，江西布政司编刊了《滕王阁集》、《河汾诸老诗集》，九江府署编刊了《陶靖节集》，山东布政使编了《泰山志》、《阙里志》等书，福建按察使编了《晦庵先生朱文公集》100卷，云南省由布政司济用库出资，编刊了好几任守官的奏议，贵州编刊了《诸夷图》。

从《文选》一书的传承，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刊行乡邦文献的重要意义。襄阳、扬州、贵池三地，都有昭明太子延聘文人编纂《文选》的遗迹，如文选台、文选楼、文选阁等，贵池是其真传。昭明太子的封邑在贵池，城西有文选庙，庙前有文选阁，相传为选文之所。宋尤延之、元张伯颜都曾在贵池做地方官，他们大力校印《文选》，成著名的“尤本”和“伯颜本”。元末日本的“五山本”，明代的“唐藩本”、“汪谅本”、“袁本”，都以此为祖本。南朝著名诗人谢朓的《宣城集》久有缺失，只有5卷。宋元明历代地方官都千方百计搜寻补充，明末时编成了10卷本。嘉靖黎晨本《宣城集》的序言中说：“集以宣城名，其刻于宣城宜也。”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出版乡邦文献的贡献。

（三）前代或当代重要典籍　这类图书的选择编刊，都由当时地方长官决定，并无定规。山西布政使刊印了《史记》130卷，江西按察使司刊行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浙江按察司校刊了《资治通鉴》324卷。江西按察使司刊行了《唐诗品汇》100卷。有些地方政府由于地处雕版中心，刊行了特别重大的图书。最为人乐道的是福建建宁刊行的两部大书：《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这两部大书都是1 000卷，宋朝刊行后数百年都没有再印过。《册府元龟》的抄录、校订长达20年，参加校订的官员前后有90多人。

（四）有关当地国计民生之书　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浙江巡抚编刊了多种海防之书如《筹海图编》、《海防考》

以及几种操法、律令；苏州府刊刻了几种有关太湖水利之书，以苏州巡抚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最为著名；两浙运司编刊了几种关于盐运的书，如《两浙鹾志》、《两浙盐法条酌》、《盐法要览》、《行盐事宜》、《招商事宜》等。不少地方刊行了各种医书，江西布政使司首先刊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陕西和浙江的布政使司都刊印了《救荒活民补遗》。《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一书，有好几个地方政府刊行过。

第三节 “帝皇之书”的编刊

一、“帝皇之书”编刊的概况

焦竑编撰的《国史·经籍志》中，在经史子集之前，另加了一种“制书类”。在这类书的最后，有一小段跋，给制书作了些说明：

“古之圣哲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从之，如典谟训诰是已。然或谓皋、夔、旦、奭代为属笔，盖间有之。若梁武唐文，赡于辞学，至与寒畯之士竞为雕虫，何其小也。我圣祖投戈讲艺，间有撰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风动草偃，晓然如推赤心置于人腹中……虽然，迹其震越辉煌，魁奇硕大，虽以凌跨百代而轶驾三王，其何让之有。列圣代兴，著作相望，今备列首篇。”

《国史·经籍志》的“制书类”共著录图书238种，分为四个子类，即：

1. 御制 68种，如《高皇帝文集》、《昭鉴录》、《大诰》四种、《昭示奸党录》、《文华大训》等。

2. 中宫御制 5种，如《仁孝皇后劝善书》、《贞烈事实》等。

3. 敕修 63种，如列朝《实录》、列朝《宝训》、《大明日历》、《永乐大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大明会典》、《明伦大典》等。

4. 纪注时政 102种，如郑晓著《吾学篇》、孙宜著《国朝事

迹》、朱睦㮮著《逊国纪》、陆深著《玉堂漫笔》、韩邦奇著《大同纪事》等。

由此可知，所谓“制书”，实即“帝皇之书”，是直接体现皇帝意志的书。“御制类”是皇帝署名亲撰之书；“中宫御制”是皇后之书；“敕修类”是皇帝下令编撰之书；“纪注时政”是有关皇帝的重大事件之书。

明代其他书目上也大都把这类帝皇之书置于书首，或称“制书”，或称“圣制”，或称“本朝”。入清以后，就不再这样做了，有关图书，各归入到经史子集门类中。

在这些“帝皇之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巩固皇朝统治而编撰的，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有教育皇子皇孙要勤政爱民、善保帝业的，如《公子书》（训世臣子弟）、《储君昭鉴录》、《圣学心法》、《务本之训》、《文华宝鉴》、《帝训》（训东宫）、《鉴古韵语》（人君鉴戒诗60首）等。

教育藩王们要听命中央，善抚子民，安分守己。如《祖训条章》（命各藩王书于墙壁）、《昭鉴录》（辑录汉以来亲王中好坏事例）、《纪非录》、《永鉴录》（辑录历代宗室中之悖逆者）。

教育皇后恪守女则，外戚奉法守纪，如永乐时重编《列女传》、《内训》、《女则》、《女鉴》、《历代公主录》（介绍历代公主善恶事实）、《外戚事鉴》（辑历代外戚中善恶事实79人）。

教育功臣不要恃功凌法，如《稽制录》（辑历代功臣爵位、食邑、名号，供功臣比照）、《稽古定制》（规定可享礼制，戒僭越）、《相鉴》（辑萧何、文天祥等贤相82人事迹，不贤相田蚡、贾似道等26人事迹）、《世臣总录》（记周公以后大臣事迹）等。

教育臣民遵守法纪，如《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臣戒录》（历代逆臣212人事迹）、《逆臣录》（蓝玉案狱词）、《集犯谕》（开国初罪犯姓名及罪状）、《昭示奸党录》（胡惟庸案狱词）、《清教录》（胡惟庸案中之僧徒）、《省

躬录》（汉唐宋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醒贪录》（公布官员月薪有多少，相当于多少农人的劳作）、《志戒录》又名《历代奸臣备传》（晋至宋以来悖逆之臣百余事）、《彰善瘅恶录》等。

教育武臣，如《大诰武臣》（武臣中不守法事32件）、《敕谕武臣》、《武臣训戒录》、《武臣鉴戒》、《忠义录》等。(图3)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明朝的皇帝很知道运用出版物的力量，或亲自编写，或命令编写了大量图书。这类图书在开国几代比较多，到了最后几代，几乎就没有了，这也是明后期朝纲不振的一证。据《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著录，由朱元璋亲自编写或命令编写的制书有49种。

《七修类稿》中，记述了洪武一朝编刊的“制书”书名及其缘起：

“痛三纲沦而九法斁，无以新耳目而示劝惩，首作《大诰》三编。欲戒后代人君臣民之愚痴，作《资世通训》。以礼乐不协于中，成书曰《大明集礼》。仿《周礼》而为治天下之宏纲，作《诸司职掌》。曰《大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礼制》、曰《礼仪定式》，所以详世礼也。《清教录》，所以戒僧道也。《大明一统历》，所以钦天道也。定字义书曰《洪武正韵》，后以未当，命刘三吾重编，曰《韵会定正》。念农劳而命户部计田之数，以为文武俸数，作《省贪简要录》。见功臣器用逾制，命翰林院考汉唐宋封爵之数，编《稽制录》。编历代宗室诸王善恶者以类，曰《永鉴录》，后又有《昭鉴录》。编历代为臣善恶可以劝戒者，曰《世臣总录》。订正蔡氏书传，命曰《书传会选》。取大禹所叙、箕子所陈、有益治道者，作《洪范注》。纪天下道路者，书曰《寰宇通


歷代君鑑卷之四十四

齊後主諱緯[illegible]綱武成帝湛之長子也太寧二年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天統元年即皇帝位於晉陽宮○五年春二月齊主委任和士開初士開爲武成所親狎出入卧内遂得幸於胡太后至是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元文遥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會太后

图3

《历代君鉴》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帝）撰，景泰四年(1453年) 内府刻本。

衢》。载文武官属体统及签书案牍次第、军士月粮宿卫屯田者，曰《政要录》。自叙得之之艰难，曰《祖训录》。又欲贻孙谋以昭燕翼，成书曰《皇明祖训》。言丧服者，曰《孝慈录》。取五经四书敬天忠君孝亲而成者，曰《精诚录》。集历代祭祀祥异感应可为鉴戒者，名曰《存心录》。编汉唐宋灾异应于臣下者，名曰《省躬录》。以致《道德》有注，《论语》有解，诸经、《元史》有纂。至哉王心，无一事不加之意也，创业之君所以难欤。"[1]

[1]［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七"洪武书目"，明刻本。

编撰这类图书常采用大量正反面实例来说明，绝少抽象的理论阐述。例如，讲后妃之德便用历史上有懿行的列女故事百余个；告诫臣子的《臣戒录》举出200多个逆臣为例；君王自励并教育东宫的《帝鉴图说》则举出历史上的明君或昏君117事，还附上插图。这种列举大量实例的写法十分有力，不容置辩。这是制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

二、四编《大诰》的编刊

制书中影响最大的是洪武皇帝的四本《大诰》。在明代法制建设中意义重大。

"诰"是君主告戒臣民的文告。《尚书》注中对"大诰"的解释是"陈大道以诰天下"。朱元璋用这种郑重而权威的方式，在全国刊布文书，以表示其重要性。他发布的"大诰"共四种：

1.《御制大诰》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

2.《大诰续编》　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

3.《大诰三编》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癸巳。

4.《大诰武臣》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

上面所列的年月，都是原书序文中所列的，实际颁行时间略后一些。《大诰》实际行世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一月；《续编》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五月之后；《三编》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鉴于文武官员贪墨成风，地方豪强肆意压榨，社会很不安定，风气很坏，主张用威用猛，提出"吾治乱

世，刑不得不重”的主张。[1] 在《御制大诰》的序中，他说：“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杀一不能儆百，官民中犯罪现象十分严重。他提出：“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源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2] 他要用这部《大诰》的威慑力量，使贪墨的官吏知所警戒。《大诰》的初编发布后，效果并不明显，又因为初编的重点放在打击贪官污吏上，对民事有些疏漏，所以又增加了治民的条目，刊行了《续编》和《三编》。他又认为武官们是“赶不上禽兽的心”的“畜生”，[3] 所以紧接着又刊布了《大诰武臣》一书。

【1】《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御制大诰》序。

【3】《大诰武臣》中语。

《大诰》的内容是一个个案例。《御制大诰》收案例74个，《续编》87个，《三编》43个，《大诰武臣》32个，合计236个。每个案例的基本内容包括：1. 案件经过情况；2. 朱元璋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评论；3. 朱元璋提出应该如何定罪用刑。但并不是每一则都包括这三项内容，有的只讲了其中的两项。

在这236则实例中，充满了“律外用刑”的特点，往往不顾当时颁行的《大明律》，随意用重刑。儒家的传统是“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大德小刑”，以德为主，刑罚为辅。朱元璋在《大诰》中主张“明刑弼教”，把刑放在前面，还突出“以刑去刑”的作用。下面从四编中略举数例，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随意用重刑的做法。

《初编》第17：皂隶朱升一殴打钦差旗军，处极刑。按当时律杖一百、徒三年。

《初编》第60：金吾后卫知事靳谦沉匿案卷，处刑凌迟。按当时律只杖八十，有所规避者从重。

《续编》第16：有司滥设吏卒，处族诛。依当时律，滥设官吏应杖一百、徒三年。

《三编》第25：淞江王子信发配充军，私逃回家，又行结交官吏害民，处刑枭令，家财入官，人口流移。依当时律“徒流人逃”条，罪止杖一百，余罪以情节轻重科断。

《武臣》第31：镇南卫百户胡凤寄留信印于他人家三日。处刑充军金齿。依当时律止杖一百。

《御制大诰》的初版本由内府刊行，规定家家户户都要置备一本，《大诰》的最后一节说："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1]《续编》颁行时，又重申前令："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2] 在《大诰武臣》中，又要求军队中的官兵及家属也要"人各一册"。(《大诰武臣》序) 朱元璋规定此书是全国各学校的必读书，"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3] 还规定科举考试也要从中出题。

在这样种种规定下，这本"至宝之书"便很快在全国刊行，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刊刻，还发生了一些与之有关的事。如礼部郎中王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匿藏了他人的《大诰》，被处死刑。[4] 常熟县民陈寿六，带头手执《大诰》捉拿恶人，朱元璋把这件事榜谕全国城乡，陈寿六受到"免杂泛差役三年"优待和"倘有过失不许擅勾"的特恩，而那个捏词诬陷陈寿六的人则被族诛。[5] 这事无疑大大提高了《大诰》的权威。当时，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讲诵《大诰》的讲师，教师们率徒赴京，至礼部讲诵《大诰》，最多时达十九万人之多，朱元璋对这些人"并赐钞遣归"。[6]

有一些诗文记载了当年讲读背诵《大诰》的事。陶宗仪《南村诗集》卷四《给赏诗》云："讲明三诰阐王言，亿万师生沐湛恩。晓起内庭催给赏，谨持宝楮出端门。"另有谢应芳《龟巢稿》卷十七《贺辛彬甫》诗云："《大诰》三编建瓴水，春风两袖御炉香。赐金堪比燕台聘，抱玉仍归卞匮藏。"

《大诰》并没有成为终明一代的宝书，到了明代中叶时，《大诰》已很少为人知道，身经正统、成化、弘治三朝的陆容在

[1]《大诰初编》第七十四"颁行大诰"。

[2]《大诰续编》第八十七"颁行续诰"。

[3]《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4]《大诰三编》第二十九"王锡等奸弊"。

[5]《大诰续编》第十"如诰擒恶受赏"。

[6]《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又见[明]徐学聚编《国朝典汇》卷二十。《国朝典汇》中记，洪武三十年，到南京讲读《大诰》的为"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

《菽园杂记》中说，明朝有几样短命的东西，都是"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这几样短命的东西是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1]《大诰》消亡的主要原因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公布了《大明律》，朱元璋在《大明律》的序言中说，《大诰》中的有些条目已经"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四编《大诰》条目被附在《大明律》中的，只有36条，部分条目的量刑也有减轻。

【1】[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规定官民犯刑者，"司法一依《大明律》科断，无深文"。《大诰》便这样逐步置弃了。朱元璋为了乱世用重典而滥行诛戮，制订了十分随意的《大诰》，终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成为"面从于一时"的东西。这是社会政治的话题，也是出版史的话题。

第四节　订辑经传

一、订辑经传的先声

明朝永乐年间，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订辑经传的活动。

所谓"订辑经传"，是指对"五经、四书"的原文以及传文、注解、解释等著述进行整理、审辨，合则取之，不合则舍弃。经过一番取舍之后，成为一部能体现编者意图的新著。这种编纂活动，又称"正定"，黄佐在《翰林记》中称"订辑"，比较确切。这类书如果是皇帝"敕修"，命令"颁行天下"，又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从中出题，那么，这部书就具有无上权威，成为最显赫的官修经书。

明朝以前，儒家学者有许多注经解经的著作，形成了以程朱为主的理学系统，在思想、学术上占统治地位。明代尊崇程朱理学，订辑经传，目的就在确定理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一套权威的文本。这个工作，是洪武、永乐两朝完成的，但洪武朝只能算是

先行或准备，真正全面系统地订辑，是永乐朝的事。

朱元璋曾亲自注释过《书经》中的《洪范》，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夏禹和箕子讨论天道的精微，朱元璋把这篇注文书写在御座之右，君臣共勉。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洪范注》正式刊行。

洪武中，翰林学士刘三吾上奏，说《孟子》一书中有不少话"词气抑扬太过"，请求删除。朱元璋从其请，组织人力删节。诸如"民贵君轻"、"国人寇仇"、"反复易位"等条，共删去85条，存170余条，改书名为《孟子节文》2卷，颁之学宫，删去的内容，课试时不以命题。这种大量删去经籍原文的做法受到儒者强烈反对，此后就不再这样做了，仍"以全书行世"。[1]《孟子节文》并没有成为《孟子》的定本。

【1】[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二"孟子古本删本"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朱元璋花不少功夫订辑《尚书》。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四月丙戌，他任命翰林学士刘三吾，侍读杨荣、金幼孜三人为总监，又请来已经致仕的国子监博士钱宰参加，还从在朝和民间请来许观、景清等十多人，开局翰林院，要他们对《书经》全书作"正定"工作。《书经》一书，历来以蔡氏传为宗，朱元璋认为此书与天象不合，要他们重为正定，"合者存之，不合者则改之"。工作期间，礼遇甚厚，时常赏赐，朝参时班于侍卫之前，宴享时赐坐殿中。前后用了五个月时间，订辑工作完成，共改正66处。洪武二十七年九月，由刘三吾奏进。朱元璋很高兴，定名为《书传会选》，命礼部刊行天下。参与者得到赏赐，外地请来的则"驰驿而归"。

上面两次担任总纂的刘三吾，是茶陵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时由茹瑺推荐起用，当时他已73岁。朱元璋很器重他，任翰林学士。成为"明初三老"之一。曾编修过《省躬录》、《书传会选》、《寰宇通志》、《礼制集要》等书，任总监。后来主考会试，所取都是南人，失了皇帝欢心，建文初去世。

二、三部"大全"的订辑

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甲寅，永乐帝决定对五经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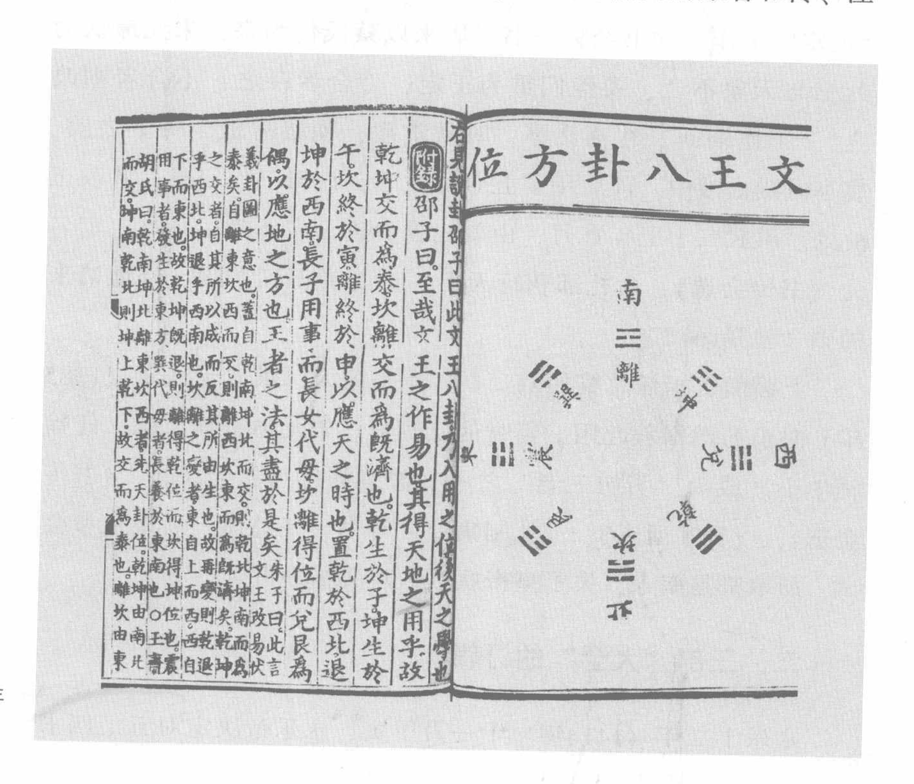
进行一次全面的订辑，以确立理学的统治地位。他任命翰林学士胡广，侍读杨荣、金幼孜三人为纂修，又从朝中和外地请来39人，共计42人，在东华门外开馆。工作开始时，皇帝指示说："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其聚类成编。三书务极精备，庶垂后世。"[1]

【1】［清］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

永乐帝所说的"三书"，指《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种。俗称"三大全"，如果把"五经"分开来，则成为"七大全"。（图4、图5、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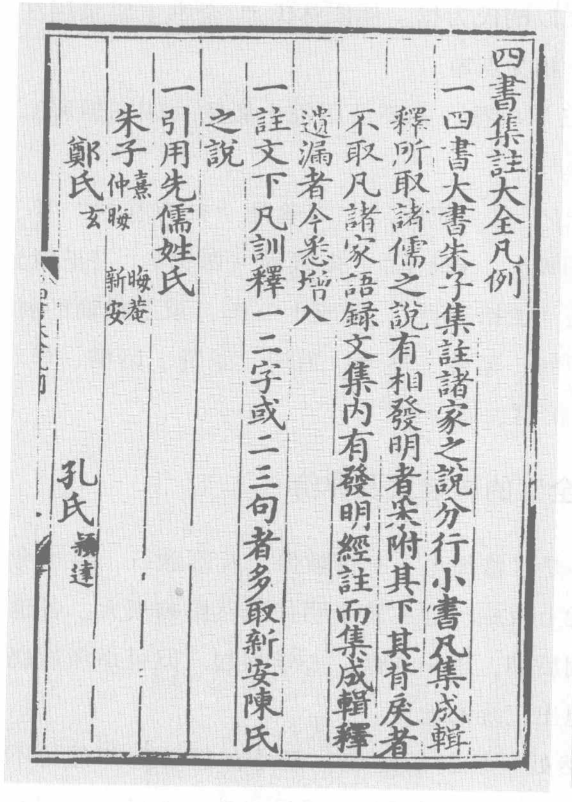
这七部书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九月完成。永乐帝亲自写了序文，命礼部刊行天下，颁六部及两京国子监，以及天下郡县学。对胡广等人各赐钞币，还在礼部赐宴，十分隆重。

这七部书的基本编纂方法相似。都是对前人的原著和传、注



右見說卦 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附錄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
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
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
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
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
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乾坤
之交者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
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胡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先天卦位乾坤由南北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爲泰也離坎由東

图4
《五经集注大全》永乐十三年（1415年）内府刻本。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 熹 仲晦 晦菴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達

御製性理大全書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

图5（左）
《四书集注大全》永乐十三年（1415年）内府刻本。

图6（右）
《性理大全》永乐十三年（1415年）内府刻本。

等进行订辑，以理学为取舍标准，合则采用，不合则删去。分别说明如下：

《周易大全》 二十四卷。主要录用的是“二董”：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二胡”：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采录时，原作者的姓名都删去。

《书传大全》 十卷。主要录用的是“二陈”：陈栎的《尚书集传纂疏》、陈师凯的《书蔡传旁通》。

《诗经大全》 二十卷。主要录用刘瑾的《诗传通释》，略加损益，删去数条，小变体例。

《礼记大全》 三十卷。主要录用陈澔的《礼记集说》，旁及42家。陈澔《集说》的特点是“略度数而推义理，疏于考证”。

《春秋大全》 七十卷。凡例称：“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

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全书主要录用汪克宽的《春秋纂疏》，稍为点窜。

《四书大全》　三十六卷。主要录用倪士毅的《四书辑释》。稍有点窜，小有增删。

《性理大全》　七十卷。前面二十六卷是“自为卷帙”者，录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张载的《西铭》、《正蒙》等。二十七卷以下是“摭拾群言”，分成十三类，录不成篇的材料。这十三类是：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诗、文。

三、三部“大全”的影响以及评价

这七部“大全”是官修经书，皇帝敕修，礼部颁行，科举考试以此命题，真是无上权威，它在整个明代当然影响极大。各地纷纷照样刊印。明朝后期，理学式微，心学兴起，但科举考试仍依此出题，并没有退出正统的地位。

七“大全”虽然处于显赫的地位，但是在经学上却评价不高，对它批评十分激烈。用词最严峻的是顾炎武、朱彝尊、纪昀等人。认为七部“大全”束缚了经学的发展。“明儒者之经学，其初之不敢放轶者由于此，其后之不免固陋者亦由于此。”“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认为在辑集前人经说时不过是“剽窃旧文”、“守匮抱残”、“剿剟成篇”，“攘窃成书”，“割裂襞积”。而且所选用的未必是好材料。如《礼记大全》几乎全录陈澔的《礼记集说》，而该书存在着“略度数而推义理，疏于考证，舛误相仍”的毛病。还说胡广等学士们白白吃了不少官饷，“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给可糜，赐予可邀，天下后世讵可欺乎？”[1]

纪昀等人的批评是从经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的，其实永乐皇帝和胡广等人，原意本不在创新立说，而是选取一种符合理学的前人之说，使经传定于一尊，如此而已。

【1】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卷二十一、卷三十六，中华书局影印本。

第五节　史书的编纂

一、前朝正史的编纂

新的王朝为前一代纂修史书，是我国编写历史书中最重要的工程，已经成为一种通例。明朝立国时，这种“正史”已经有17部。明嘉靖时校刻史书，增加了宋、辽、金、元四史，共21种，通称“二十一史”，清代修成《明史》后，成为“二十二史”。

纂修《元史》是明皇朝的历史任务。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北伐攻入元都，封存了府库的图籍，得到了元十三朝的实录。这些文献运到南京后，明太祖即命准备修史。次年二月丙寅，在天界寺开局修史，那里离城南聚宝门二里，“较少喧嚣”。朱元璋对廷臣说:“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1]　“设局分科，限绝内外，将以日视其成。”[2] 八月癸酉，《元史》修成，共计159卷，计：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列传63卷，由李善长领衔进呈。但是，占元朝三分之一时间还多的顺帝一朝，却因为没有实录，无法编撰。于是派欧阳佑到北平去搜集材料，洪武三年（1370年）还朝，再开史局，至七月又修成53卷，即：本纪10卷、志5卷、表2卷、列传36卷，二次修史经“厘分而附丽”，合计成210卷，[3] 另有目录2卷。

两次修史的人员，第一次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参与者有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徵、赵壎等16人。第二次仍以宋、王为总裁，参加的人是朱右、贝琼、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宜、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壎等13人。前后参加纂修共30人，这些人在《明史》上大都有传。

《元史》的刻印由司礼监经厂负责，时间很快，只用了三个多

【1】[明]傅维鳞:《明书》，卷七十五《经籍志》卷首，又见《千顷堂书目》中“元史”条。

【2】[明]宋濂:《文宪集》，卷三“宣斋后记”。

【3】《元史》的卷数，几种记载有出入，宋濂《后记》中说：“合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

月。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十三日完成，称“洪武本”，后来在嘉靖年间又重刻过“南监本”，万历年间又重刻过“北监本”。

两次修《元史》一共只用了331天时间，在正史的纂修中是最快的（清朝修《明史》先后用了一百年）。朱元璋这样亟亟于早日完成，是因为他要向国内外宣告明朝的统治已经巩固，元朝已经完结。明朝之初，元帝仅仅是被逐向北方，所谓“败而未亡”，这和清代修《明史》的情况很不一样。

《元史》的质量较差，主要毛病是详略不均和杂乱重复。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未有如《元史》者。”说得很中肯。

《元史》详略不均的例子如：《世祖本纪》14卷、《顺帝本纪》10卷，这两个皇帝占去了本纪的一半以上，而太宗、定宗只合成1卷，定宗死后3年，竟一字未记。又如震惊世界的三次西征，许多重要事情都失记；摧毁元政权的红巾军起义，书中只有零碎的记载；元朝的开国四杰只二人有传；开国四先锋只三人有传。为了赶时间，《元史》还故意略去了一些内容。例如全书没有“论”和“赞”，不合史例，《艺文志》则干脆阙如。

《元史》杂乱重复非常严重。如耶律楚材、张柔、董俊等人都是世祖或世祖以前的人，书中却列于顺帝时的余阙、福寿、月鲁不花等之后。由于《元史》是两次修成的，后一次纂修者不愿去改前次的文稿，只是简单地合二为一，以致颠倒错乱，全书重复立传18人，有的是因为译音不同误作二人，如既有速不台传，又有雪不台传，有了完者都传，又有完者都拔都传，其实，“拔都”是勇士的意思，是忽必烈给他的美称。还有父子二人误作一人的，祖孙二人误作一人的。《宰相表》中列左右相59人，有传的不到一半。最令人发笑的是，元代原始材料上称朱元璋为“贼”，《元史》竟照搬不误。《元史》还有一个大缺点，它记载的地区狭小。元代国土辽阔，《元史》却只限于明代疆域之内。此外，译名不统一，错、倒、脱、衍更是多得不可胜计，这是因为对元朝用语和名物不熟悉所致。在记载元朝历史掌故的书中，

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明初纂修过《大明集礼》的徐一夔曾拒绝参加《元史》的编纂，他说，元朝“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1] 两次修史，人员更动，工作不衔接，除了总裁宋濂和王袆以外，两次都参加的只有赵壎一人。再者，修史的几乎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对北方的人事、地名都不大熟悉。

[1]《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元史》虽然有不少错误，仍有重要价值。它所据的史料，大部分是可靠的，《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等志，取材于虞集所编《经世大典》；《天文》、《历》等志，取材于郭守敬的《授时历》；《地理志》取材于岳铉的《大一统志》；《河渠志》取材于欧阳玄的《河防记》。这些志原来编得较好，编入《元史》时，质量也就比较好。

《元史》成书不久就受到批评，《元史》的编者之一朱右写了本《元史补遗》。建文初，解缙在《与礼部侍郎董伦书》中提到：“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可知建文帝曾有重修的打算。建文失位，未能实现。后来，解缙写了本《元史正误》。可惜朱右和解缙的书今都不见。明清两代，陆续出版了一些补正《元史》的书。到了1921年，柯劭忞的《新元史》著成，1935年改定出版，共257卷。

二、本朝正史的编纂

明朝后期，曾经有纂修本朝史书的活动。先是在万历初年时，在首辅张居正的倡导下，完成了三部本朝正史的“备史”，那便是《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在此基础上，着手全面进行本朝正史的编纂准备，准备工作有：恢复起居注的记载，整理前朝的实录，健全修史机构等。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礼部尚书陈于陛正式上疏《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疏中力陈历史书的作用，正史的意义，取材的原则等，又认为资料已经具备，可以

动手进行。当时，朝中诸臣对修本朝正史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赞成，反对者也颇不少。反对者认为，祖宗先臣都“不曾论及”此等事，有点别出心裁。而且会造成祖宗的实录流散。皇帝便下礼部研究，礼部主事何乔远上了一个表示支持的疏。在此之前，焦竑也进呈过一份《修史条陈四事疏》，提出修史中有关本纪、列传、史官人选、书籍四个问题。

酝酿争论的结果是，万历帝同意修史，于是任命王锡爵为总裁，要他择日开馆，悉心考究，编出一部“一代不刊之典”。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正式开史馆，总裁王锡爵，陈于陛、沈一贯、刘虞夔（后被罢免）、冯琦四人为副总裁，余继登、萧良有等19人为纂修官，礼部正卿以至詹事、翰林等分款受事。后来，主持人曾多次增补调动。政府还正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资料。

修史之初，礼科给事中孙月侯条上《纂修正史议》，提出“议本纪，议列传，议职官，广书籍，释嫌恶，达幽隐”六个方面的问题。副总裁余继登上《修史疏》，要求各地方配合提供人物传记。修史的指导思想、步骤和方法不断完善明确，修史工作有序进行。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二月，乾清宫失火，烧毁部分《实录》，因为《实录》事关重大，于是先致力抄补《实录》，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六月十九日，皇极殿、文昭阁、武成阁又失火，又有部分资料被毁。这时，大学士张位上疏建议暂停修史，修史工作实际停顿。从此，“馆中无复有人论及者”。补抄《实录》的工作则继续进行，并大量流向宫外。二年后，《实录》补抄工作完成。

这次修本朝正史共历时三年，任务虽没有完成，但阶段性、局部性的收获却不小：1. 本纪完成了七朝，成《皇明七朝帝纪》40卷（今佚）；2. 预定有28个志（一说是22个志），都已“纲目犁然”，完成了8个志（河渠、经籍、典礼、兵制、四夷、乐律、职官、赋役），其中《国史·经籍志》成为研究明朝著述的重要文献；3. 列传预拟26类，完成了一部分。更使人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实录》的

抄录外传，实际上成为“解密”，引起了民间修史的兴趣，明末出现的私史有上千种之多。[1] 关于私史的撰著，将在下一章叙述。

【1】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第六节　佛藏、道藏的增辑

佛藏和道藏都在南朝时开始编修，唐朝时完成编目工作，以后各代又陆续增补。明朝实行三教合一的政策，儒家其实不是宗教，真正的宗教只有佛、道二家。明代的皇帝有的佞佛，有的溺道，有的先佛后道。佛道二教的势力时有消长。各个皇帝对佛教或道教态度不同，执行不同政策，沉迷的程度也不同。皇后和皇太后往往也参与其事。他们进行多种宗教活动，都以刊印《大藏经》为最高追求。在一次次重刊时，往往不断收入佛学新译本和新著，使佛藏的种数卷数有所增加。

一、佛藏的编纂和出版

佛藏的编定是在唐开元时，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中确定，佛藏的内容是1 076部、5 048卷，著译者176人。北宋初，当雕版图书刚进入批量生产时，便大规模编刊《大藏经》。宋代《大藏经》有6种版本，《开宝藏》在四川益州（今成都）编刊，称“蜀藏”，5 048卷，刻了13万块版子。辽、金、元也有编刊。

据有关记载，明代刻佛藏前后有6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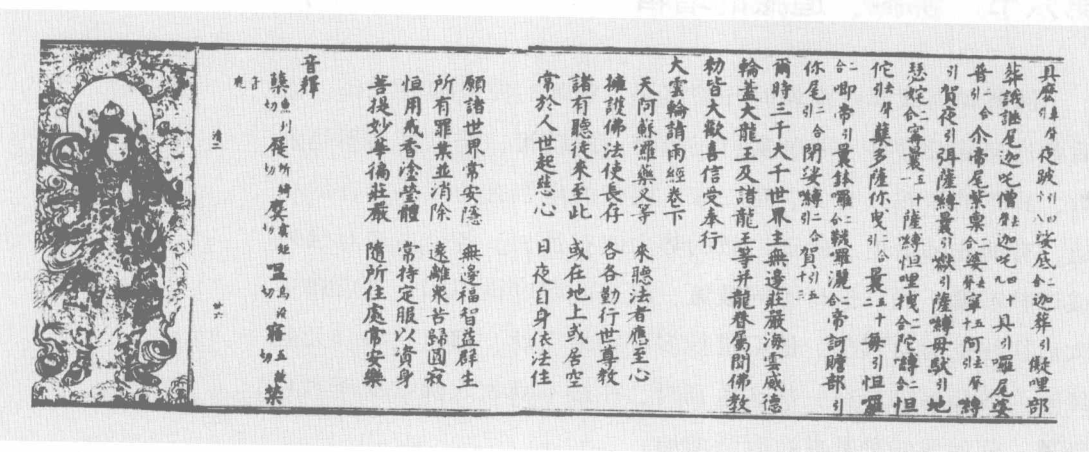
1.《洪武南藏》（官刻）　又称初刻南藏，洪武年间编刊于南京，共佛经1 600余部、7 000卷。1934年四川曾发现仅存的孤本。（图7）

2.《永乐南藏》（官刻）　通称南藏，永乐年间依洪武本重刻，编次略有不同，收佛典1 625部、6 331卷，存世较多。

图7
南藏：洪武五年（1372年）刻《阿毗达磨品类足论》。

阿毗達磨品類足論卷第七　渭七
尊者世友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攝等品第六之三
身業云何謂身表及無表語業云何謂語表
及無表意業云何謂思善業云何謂善身語
業及善思不善業云何謂不善身語業及不
善思無記業云何謂無記身語業及無記思
渭七
學業云何謂學身語業及學思無學業云何
謂無學身語業及無學思非學非無學業云
何謂有漏身語業及有漏思見所斷業云何

3.《永乐北藏》（官刻） 通称北藏，永乐到北京后刊刻。正统五年（1440年）完成，比南藏略有增加，共佛典1 657部、6 361卷。（图8）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主無邊莊嚴海雲威德輪蓋大龍王及諸龍王等并龍眷屬聞佛教勅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雲輪請雨經卷下

天阿蘇囉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日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群生
所有罪業並消除 遠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華徧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音釋

蘖 魚列切

图8
北藏：正统五年（1440年）刻《大云轮请雨经》。

4.《武林藏》（私刻） 永乐二十年（1422年）刻于杭州。这部佛经是1982年发现的，因为是残本，不知原来有几种、几卷。据考是根据《洪武南藏》或《碛砂藏》翻刻的。

5.《万历藏》（私刻） 万历年间刊刻，历史上无记载。1983年在山西宁武发现，是据《永乐南藏》复刻的。

6.《嘉兴藏》（私刻） 明末清初编刊。这部佛经十分重要，因为是私刻，放到下面一章再谈。

官刻佛藏大都是皇帝或皇太后发愿编刊的，由内府刊刻。印好后赏赐给天下名寺。例如正统五年完成北藏后，曾印若干部赠天下寺院，南京的灵谷寺、鸡鸣寺都得到一部。天下寺院都可以向藏版处“请经”。请经的事务工作交给某些大寺院经管，礼部的祠祭司订了一套详细的请经办法，共有十一道手续。寺院里有专司其事的“管经僧”。[1] 据葛寅亮统计，向南京报恩寺请《大藏经》的，每年约二十部，终明朝一代，南藏总共印了约千部之多。[2]

刘若愚的《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记载了内府经

【1】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六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

厂印制佛藏所费的材料：

“佛经一藏：计六百七十八函，十八万八十二叶，共用白连纸四万五千二十三张，蓝绢二百五十三匹七尺四寸，黄绢廿六匹二丈四尺一寸（原注：每匹长三丈二尺），黄毛边纸五百七十张，蓝毛边纸四千九百十二张，黄连四纸三百四十七张，白户油纸一万八千九十五张，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两，白面一千二百二十五斤，白矾四十五斤。”

明官府刻的佛藏还有少数民族的版本。当时称为“蕃藏”（一作“番藏”）。14世纪初，西藏嘉漾比丘曾刻了三藏中的“经藏”和“律藏”，藏语称“甘珠尔”，保存在西藏的奈塘寺。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遣使到西藏访求经典，取了“甘珠尔”全部翻刻。后来又翻刻了“论藏”（藏语“丹珠尔”）中的要典《般若》、《中道》等。这便是永乐版“蕃本”《大藏经》。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翻刻了永乐“蕃本”。刘若愚在《酌中志》中也有当时用料的记载：

“番经一藏：计一百四十七函，十五万七十四叶，共用腰子白鹿纸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张。”

二、道藏的编纂和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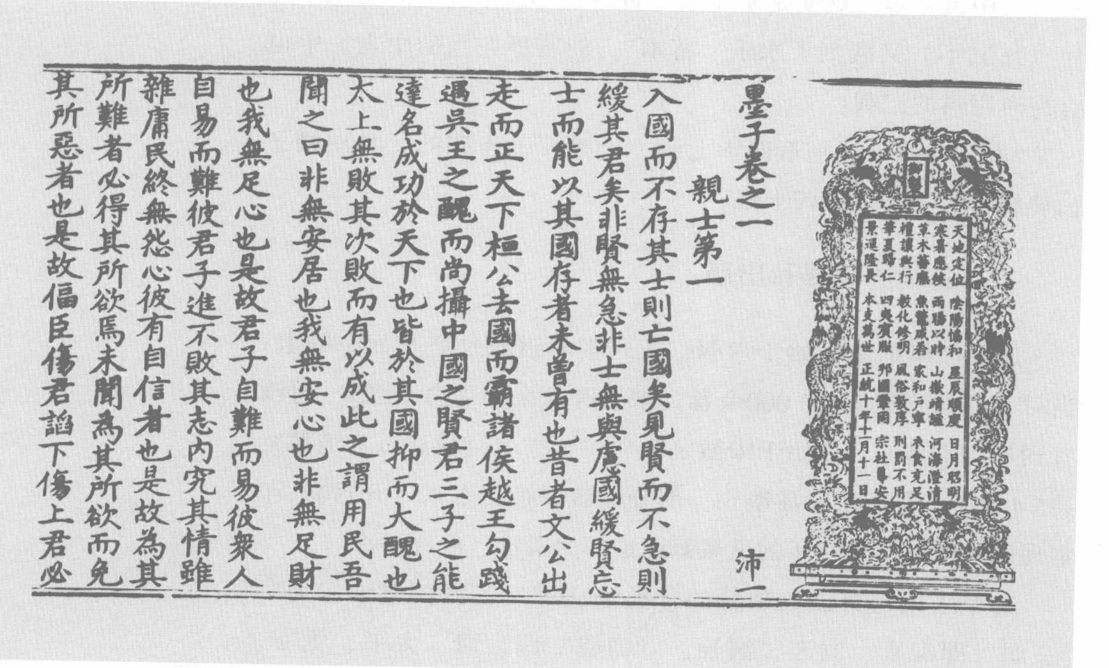
道教经籍的编汇始于六朝，正式纂辑道藏是唐开元中的事。当时有《三洞琼纲》3 000余卷。宋初有《大宋天宫宝藏》，但没有刊刻。道藏的刊刻始于宋徽宗政和时，书名《政和万寿道藏》，共5 481卷，在福建闽县镂刻，部分经版保存在东京（开封）。印本现已不存。金元时印的道藏都以这部为蓝本，今亦不存。

道藏采用它自己的独特的分类法，即“三洞四辅十二类”，“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即太清、太平、太玄、正一，十二类是本文类、神符类、玉诀类、灵图类、谱录类、戒律类、威仪类、方法类、众术类、记传类、赞颂类、表奏类。从现代图书分类的角度看，其内容大致为：1. 礼拜诵读或传习经典；2. 阐发教理教义；3. 医学养生；4. 外丹黄白；5. 炼养；6. 符

箓；7. 斋醮科仪；8. 教规教戒；9. 神仙道士传记；10. 宫观山寺。

明代道教十分兴盛，朱元璋制定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政策。还写过《释道论》、《三教论》，又曾为《道德经》作过注。明成祖在武当山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宫观，至今犹存。终明之世，道教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

明代刊刻道藏始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命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辑《道藏》。永乐八年（1410年），张宇初卒，其弟张宇清继领主纂。不久，成祖去世，这事便延搁下来。正统九年（1444年），又诏京师道教事邵以正督校，正统十年（1445年）全藏完成，称《正统道藏》，共收书1 426种、5 305卷，分装成480函。以《千字文》为目，始天终英。印行后，颁赐各地道观。（图9）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雍寧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墨子卷之一　　沛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

图9

《道藏》：正统十年（1445年）刻《墨子》，前有御制碑牌。

《正统道藏》收罗不全，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皇帝又命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刊《续道藏》，仍以《千字文》为序，始杜终缨，50种、180卷、32函，史称《万历续道藏》。

正续两藏合计512函，收书1 476种、5 485卷。这两种合起来简称《道藏》。版片藏在京师灵佑宫，入清后移到大光明殿，八国联军入北京时散佚。

道藏所收的书，在《道藏目录详注》中有记载。这本书目是明代道士白云霁撰的。白云霁是上元人（今南京），成书于天启六年（1626年）。名曰“详注”，其实比较简单，只是提要而已。

明代的《道藏》是内府经厂刊印的。《酌中志》中记录了刊印这部书的用料：

“道经一藏：计五百十二函，十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九叶，共用白连四纸三万八百九十七张，黄连四纸一百七十六张，蓝毛边纸三千十八张，黄毛边纸五百二张，蓝绢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六寸，黄绢二十四一丈六尺，白户油纸八千三百七张，黑墨一百六十斤八两，白面七百五十斤，明矾二十五斤。”

明代刊印的《道藏》，是唯一传本，十分珍贵，至今有一些被保存下来。1923年，商务印书馆用白云观本影印出版。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又联合出版了一次。

《道藏》所收的书门类较多，儒佛学者常诟病其“出格收书”，选择不严，《四库全书总目》也持此说，并且提出40多种书为例。例如，《韩非子》应入法家，《孙子》应入兵家等。这些批评都以儒家书目为标准。《道藏》之所以“出格收书”，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儒道释三教的最高理论有相通之处，自不免重复。“出格收书”的积极结果是保存了不少古佚书，成为后世的宝贵财富。例如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中，收了《道藏》中保存的《黄帝龙首经》；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曾利用《道藏》辑校了佚文遗书。

第七节　地方志的编纂

一、明代地方志的数量和类型

明代地方志编刊的数量很多。据巴兆祥的统计，共有2 892种，比宋元两代加起来还要多出4倍（北宋140种、南宋230种、元代205种）。现存1 017种。巴兆祥把明代地方志的编纂刊行分为四个阶段：

1. 起步阶段　洪武至天顺，1368—1464年，共96年，出版了257种。

2. 蓬勃发展阶段　成化至正德，1465—1521年，共56年，出版了460种。

3. 鼎盛阶段　嘉靖至万历，1522—1619年，共97年，出版了1 622种。

4. 渐趋沉寂阶段　泰昌至崇祯，1620—1644年，共24年，出版了66种。

这个数字说明，明代出版的近3 000种地方志，56%以上是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出版的。

明代地方志刊行的地区遍及全国各地。巴兆祥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方志丛书》、《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等书综合，全国各省分布如下（据现在分省市统计）：

北京54　上海32　天津10　河北219　山西162　辽宁8
陕西124　甘肃26　宁夏11　青海1　山东220　江苏223
浙江348　安徽185　江西148　福建152　湖北162
湖南125　河南271　广东168　四川64　贵州53
云南80　全国总志6[1]

明代各朝都很重视纂修地方志，发布过不少有关诏旨，举其大者如下：

洪武年间　三年：命儒臣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等修

【1】以上俱见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刊《文献》1988年第3期，书目文献出版社。

《大明志书》："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 六年：令府州县绘上"山川险易图"。 九年：诏天下州郡县纂修志书，旨令天下郡县纂修图志。 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 十七年：编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 二十七年：诏修《寰宇通衢》。

永乐年间　十年：颁布《修志凡例》十七条。 十六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

正统、景德、天顺年间　先后下诏各地修志。

弘治年间　元年：因修《宪宗实录》，"遣使者采摭四方事实，以备纂述"。[1]

正德年间　十五年：诏取天下志书。

嘉靖年间　"分遣进士往天下藩臬，采取民风节义，凡诸《一统志》所关者，莫不广求博载，以备武宗毅皇帝实录。"[2] 三年：诏修郡国志书，进史局。 十八年：更令修《承天大志》，顾璘主其事，24卷。

万历年间　"锐然国乘，大搜二百余年之业而新之。"[3]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明代帝王对编纂地方志是十分重视的。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各级布政使司不敢怠慢，着力督促下级认真编修。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丁明曾于嘉靖中颁发《修志凡例》，指示类目和纂修方法。河南汝宁府曾下令查取志书，急令尚未修好的州县立即动手。万历年间，浙江巡抚也曾命令所属府州县加紧编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督催下，明代出现了"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的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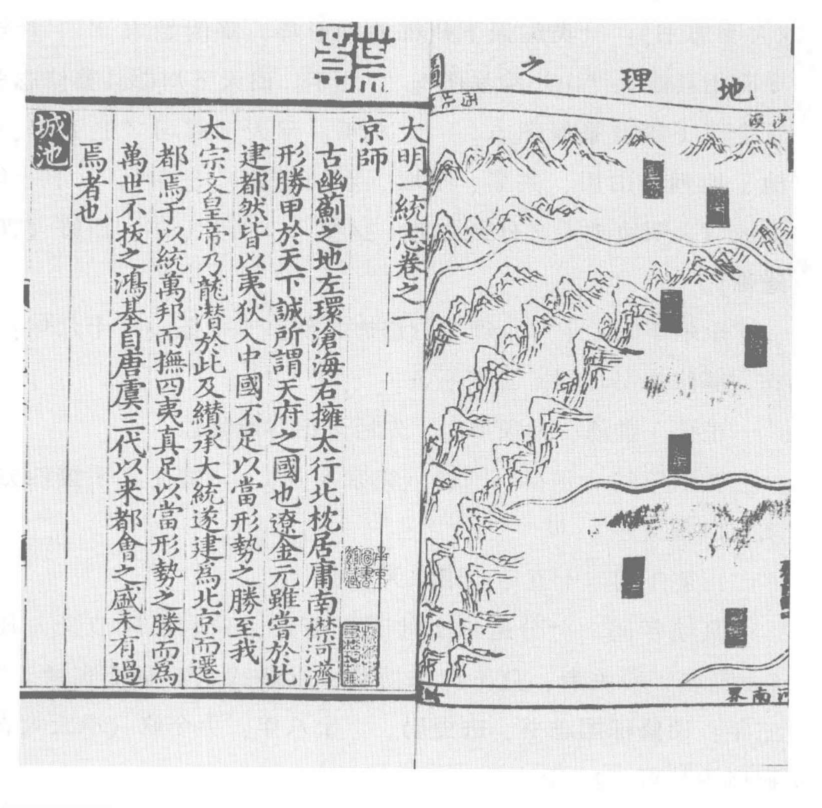
明代地方志有"通志"、"专志"、"杂志"等多种类型：

1. 全国总志　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大明一统志》等。顾炎武对《大明一统志》有不少批评，但这本书承先启后，前有《大元一统志》，后有《大清一统志》，连贯成系统，记载了一代掌故，还是有重要价值的。(图10)

【1】《易州志》序。

【2】[嘉靖]《淳安县志》序。

【3】[万历]《枣强县志》序。



大明一統志卷之一

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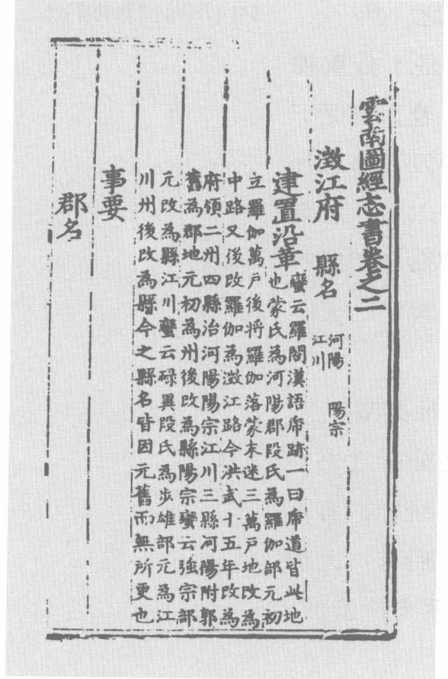
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遼金元雖嘗於此建都然皆以夷狄入中國不足以當形勢之勝至我

太宗文皇帝乃龍潛於此及纘承大統遂建為北京而遷

都焉于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形勢之勝而為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會之盛未有過焉者也

城池

图10
［明］李贤、万安等纂《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1461年）内府刻本。



雲南圖經志書卷之二

澂江府　縣名　河陽　江川　陽宗

建置沿革　蠻云羅閣漢語府蹤一曰府道皆此地也蒙氏為河陽郡段氏為羅伽部元初立羅伽萬戶後將羅伽落蒙未迷三萬戶地改為中路又後改羅伽為澂江路今洪武十五年改為府領二州四縣治河陽陽宗江川三縣河陽附郭舊為郡地元初為州後改為縣陽宗蠻云強宗部元改為縣江川蠻云碌異段氏為步雄部元為江川州後改為縣今之縣名皆因元舊而無所更也

事要

郡名

图11
《云南图经志书》，景泰六年（1455年）刻本。

2. 省级通志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进军云南，置布政使司，并命令儒臣编《云南志》，次年六月完成。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又重修。明代十三个布政使司和两个直隶，都有通志（或称总志）编成，而且各有特点，并多次修订。（图11）

3. 府、州、县志　这是地方志的主体。明初，全国有120府、108州、887县，明后期续有增加，这些府、州、县几乎全都编了志书。有的还修订多次，《萧山县志》修订过七次，《杭州府志》、《六合县志》都修订过六次。（图12）

4. 乡镇志　重要的乡镇编了“小志”，主要是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如《贞溪编》、《湖隐外史》、《乌青镇志》、《鄞西桃源志》。

5. 卫所志　卫所是明代的军事机构，几个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或所。永乐时全国有493个卫、359个所。有些卫所的长官编了志书。如《靖海卫志》、《大田所志》。

6. 边关志　边关指形势险要之地。北有九边，东有海防，西南有苗防。这方面的志书有记载九边的《辽东志》等。

7. 土司志　明代在云南、贵州、湖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少数民族领袖世袭行政长官。如《腾冲司志》、《平茶洞长官司志》等。

8. 杂志　专记一座山的有《献花岩志》（南京祖堂山）、《清凉山志》、《天台山志》，专记一个寺院的如《栖霞寺志》，专记一个书院的如《崇正书院志》，专记一个湖泊的如《石湖志》。还有专记一地名胜的如《金陵古迹图考》等。

江陰縣
星野
記履地者求合規天。昉保章氏禨祥測先矧江之陰
域應星躔。觀文察理。民用斯前。志星野。
星斗牛女野。斗分。　按前漢天文志斗江湖前漢地理志
吳地斗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
臨淮郡皆吳分也。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揚州。春秋元
命苞牽牛流為揚州。後漢天文志牽牛主吳越。淮南子
須女吳。晉天文志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次星紀丑位。　按後漢郡國志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一
江陰縣志卷一　星野一　一四　崇禎十三年

图12
[崇祯]《江阴县志》，崇祯十三年（1640年）刻本。

二、明代地方志的体例和理论建设

明代地方志的编纂体例，大都依照永乐年间颁布的《修志凡例》，设置“门目”或“纲目”，这是地方志最基本的体例。后来，有种种变通和创新：

1. 门目体　永乐十年（1412年）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中规定的门目是25个，永乐十六年（1418年）重颁的凡例中规定28个门目，明代的地方志，都参照这28个门目：建制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城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

2. 纲目体　效法《大明一统志》的体例。门目体只有一级标

题，纲目体则有二级标题，第一级是“纲”，总设地理、田赋、建置、秩官、祠祀、人物、艺文等。第二级再分成若干目。

3. 纪传体　模仿《史记》、《汉书》的体例，设纪、表、志、传四体，如正德时胡缵宗的《安庆府志》、嘉靖时冯继科的《建阳县志》都是如此。

4. 政书体　按吏、户、礼、兵、刑、工分类记事，如弘治年间周瑛纂《兴化府志》、正德年间周瑛纂《漳州府志》等。

5. 编年体　按年月时序记述一地之事，如王启《赤城会通记》、颜木《汉东编年志》等。

6. 三宝体　孟子曾说，诸侯有三宝，即土地、人民、政事。万历时唐枢纂《湖州府志》即据此定体。

不管什么体例，都必须设置纲目门类。明代各地所编方志，都能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或加以分合，或创立新门目。新的门目如：氏族、版册、文教、幽怪、兵氛、考异、乡保、镇集、村寨、村店、畦桑、稽古、英华、寿官、气候、平乱、海道、女德、乡约、利泽、漕河、碑目、渔税、狱囚、词讼、赦宥等，不一而足。

明代在纂修地方志的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编辑理论。永乐颁布的两个“凡例”既是操作的条例，又是编志的经验总结，对有明一代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这两个“凡例”对编志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分析。例如，如何处理纵横的分割联系，如何处理古今的详略问题，资料如何辨别取舍，人物褒贬如何做到得当，与邻近地区如何关照，信史与传说如何区别等。

在各级地方政府所编志书的序言、凡例等文字中，蕴含着不少修志理论。明代以前的方志很少有凡例，到了明代，不少方志都前缀凡例，其中有不少新见。

对于方志的属性，明人大都认为应该归属史类。基于这样的认识，明人所编地方志都模仿史书的体式，采取修史的方式，这对于保持志书的真实性具有重要作用。

明人对于方志的价值，认为它有“四思”的意义，“企先贤

而思齐，睹名宦而思政，慨风俗而思移易，观利病而思兴革”。[1]强调方志的资政和教化作用。认为它可以使“君子观之以通其变，小人观之以守其业，方司观之以省其风，庙堂观之以通民物”。[2]指出了方志对各阶层都有益。

在材料取舍、修纂要求上，明人提出了“七不书”的主张，“言非史册传记不书，文非名贤金石不书，非郡乘所载记不书，非耳目显者不书，非出山氓故老缙绅贤者公论不书，荒唐不书，疑似不书”。[3]对修纂人员的素质，提出要“学博、见精、心公”三者兼备的要求，[4]对于领导修志的地方长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学博、才优、见定”。[5]

大量的实践和丰富的理论，孕育了伟大的地方志理论家顾炎武（1613—1682），他“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凡阅志书一千余部”，[6]写成了《肇域志》以及《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两部巨著。

清朝的学者如章学诚、李兆洛、顾千里等辈，对明代地方志颇多疵议，认为有三个缺点：一是文人习气，二是昧于史法，三是繁简失当。这些批评是中肯的，但不能一概而论。明代的方志中颇多良志，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

【1】王道：[正德]《朝邑县志》跋。

【2】[嘉靖]《永丰县志》序。

【3】[嘉靖]《永丰县志》序。

【4】黄仲昭：[正德]《延平府志》序。

【5】何东：[弘治]《徽州府志》序。

【6】[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第八节　《永乐大典》的编纂

一、编纂经过

类书是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供查阅用的工具书，前朝已有编纂，明朝建国之初，没有来得及编大型类书。明太祖经常阅读的是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刘向的《说苑》。中书庶吉士解缙看到后向皇帝进言，说这两部书都有缺点，《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群玉》“钞辑秽芜，略无可采”。他建议“集一二志士儒英”另编一部，并自荐愿意“执笔随其后”。[7]太祖很赞成，但终其世没有行动。

【7】《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成祖登位后的第一年（1403年）七月，就命令解缙、胡广、杨士奇等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交代了编纂的宗旨："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记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

【1】《明会要》卷二十六"学校下编辑"，又见《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

解缙等人衔命从事，召集了147人，第二年十一月就编成了《文献大成》，献给明成祖，前后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时间。明成祖看后认为太简单，"所纂尚多未备"，不合他的意。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重新修纂，召集的人达2 169人之多。到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由领衔的姚广孝进呈给明成祖。全部工程共计五年。

明成祖编纂《永乐大典》的目的，历来有一些说法，或说是为了炫耀文治，笼络人心，消弭朝野不平；或说是因为建文帝藏匿在佛寺里，所以请出一个和尚姚广孝做主编。这些都是猜测之词，并无实据，还是应该看明成祖自己写的《永乐大典》序文中的两段话：

"……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五之传，总历代之典，世远祀绵，简编繁移，恒其难一。至於考一事之微，泛览莫周，求一物之实，穷力莫究，譬之淘金于沙，探珠于海，戛戛乎其不可易得也。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乃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

"……盖尝论之，未有圣人，道在天地；未有六经，道在圣人。六经作而圣人之道著。所谓道者弥纶乎天地，贯通乎古今。统之则为一理，散之则为万事。支流蔓衍，其绪纷纭。不有以统之，则无以一之。聚其散而兼总其条贯，于以见斯道之大，而无物不该也。"[2]

【2】明成祖《文皇帝御制〈永乐大典〉序》。

这两段话说明，编纂此书的目的是要宣扬"弥纶乎天地，贯

通乎古今”的道和理，达到“齐政治而同风俗”的目的，体现出“大混一之时”的“一统之制作”。其目的是要进行一项政治、思想、文化的基础工程。在应用上则要达到“网罗无遗，以存考索”、“开卷而无隐”的要求。

《永乐大典》的篇幅，在几本书上说法不同：

《永乐大典序》作“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其书凡一万一千九百十五册”。

《明史·艺文志》作“二万二千九百卷”。

《明实录》作“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

《四库全书总目》作“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清乾隆时修纂《四库全书》，因为要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已经亡失的典籍，曾经对《大典》嘉靖副本不论是现存还是亡佚的卷数，作过认真的清理和查检，《四库全书总目》所记《大典》的卷数，应当是准确可靠的。

二、组织机构和修纂人员

《永乐大典》的组织机构和主要负责人如下：

监修（最高负责人）3人

姚广孝　苏州人，十四岁出家为僧，僧名道衍。永乐称帝，姚广孝“论功以为第一”，授太子少师、赞善大夫。曾重修《太祖实录》。他是永乐朝第一号人物，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时已经70岁。

解缙　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进士，翰林学士、侍读，热衷于修纂类书。《永乐大典》的前身《文献大成》是他主修的。曾参与修纂《太祖实录》、《列女传》。《永乐大典》的凡例是他制订的。

郑赐　字彦嘉，建宁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

副监修　3人

刘季篪　名韶，余姚人。洪武中进士，曾出使朝鲜，擢陕

西参政，有政绩。建文时为刑部侍郎，后又任翰林院编纂、工部主事。

梁潜　字用之，泰和人。洪武末举乡试，授四川苍溪训导，修《太祖实录》，书成后擢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代郑赐总裁《永乐大典》。

李至刚　名钢，以字行，松江华亭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举明经，选侍懿文太子，授礼部郎中。成祖即位后任右通政，与修《太祖实录》，进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直东宫讲筵，与解缙先后进讲。

都总裁　1人

陈济　武进人，布衣。在总裁中，都总裁只有1人。陈济学识渊博，过目成诵，“尽通经史百家之言”。修《大典》之初，“太学儒生数千人，秘库书数百万卷，浩无端倪。济与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执笔者有所疑，辄就济质问，应口辨析无滞”。书编成后，皇帝把他留下来，“凡稽古纂集之事，悉以属济”。还要他教5个皇孙。

总裁、副总裁　若干人

副总裁，管一个方面的实务，有的管一个类目。如

书经类副总裁林环；

诗经类副总裁王彦文，著有《诗经旁通》；

三礼类副总裁高得旸，他“分掌三礼，编摩有方”；

医经类副总裁蒋用文、赵友同，他们都是太医院御医；

释教类副总裁释道联，是有名的高僧；

此外还有纂修、编写、催纂、缮录、圈点等人员。

当时，曾命在朝官员和地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荐人才，被推荐录用的有滕用亨，精六书；李昌祺，熟悉地方文学；裴仕杰，擅长阴阳之术；薛富，精通星历数学；沈永、江奚修，精通医术；释壁庵、惟寅，熟知释典。还征聘了一批画师绘插图。当时称“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据孙承泽的记载，全部工作人员有二千多人，“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十五人，纂

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百三十二人，看详五十七人，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十人，凡二千一百八十人”。[1]

编纂工作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纂修人员（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在自己分工范围内搜集资料；编写人员（相当于现在的助理编辑）按韵编排连缀；看详人员（相当于现在的校对）核实资料。最后由缮录誊抄，圈点生加上句读；催纂人员（相当于现在的编务人员）监视进度。然后送副总裁、总裁审定。

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成祖命令，编写人员可以翻阅皇家各种资料，“尽禁中之书”，住宿在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还发给“膏火之费”。为了让他们专心编写，还免去朝谒等事。[2]

【1】[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二“文渊阁”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2】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三、编纂体例和缮写

《永乐大典》的编纂凡例是解缙制订的，这是整个编撰工作的依据。凡例共21条，详细说明了《大典》的收录范围、编次体例、音韵训释、选用字体等方面的规定。

凡例的第一条提出了本书的基本体例，即“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用的韵是洪武韵，每一韵下有若干单字，每个单字先详注该字的音韵、训释、书体，再把和这个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等依次收载，所收入的内容，有的是一节，有的是一篇，有的是整本书都收进去。[3] 下面以一个“梧”字为例：

“梧”字在诗韵中属“六模”。在《永乐大典》中，“梧”字占8卷篇幅，即卷2 337至2 344。

书中先对“梧”作音、形、义的解释：首先注读音，再列出篆、真、草的写法。再下面有一段“总叙”，解释“梧”字的本义。以上都是小学方面的内容。

其次是列举含有“梧”字的词语，共16个：帝梧、槁梧、惠子据梧、成王剪梧、白掬杵梧、教邻伐梧、瓦罂置梧、鹊巢省

【3】《永乐大典》凡例全文见灵石杨氏刊《连筠簃丛书》“永乐大典目录”卷首。

梧、霜早凋梧、齐宫大梧、凤栖梧（词调）、由梧、董梧、疆梧、魁梧、枝梧。

再次是有关"梧"的诗文，共收入文1篇、诗11首。

再下面用大量篇幅录出《梧州府志》，从卷2 337至卷2 344都是这部分内容，共占7卷。再下面列举"梧"字的同音字29个，除牾、蜈等少数字外，大都是不常见的字，如娪、俉等。

以上是《永乐大典》中"梧"字部的全部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条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一部全文录载的《梧州府志》。

《永乐大典》的凡例中提出了一些收录归类的实例，有的是取前一个字，有的是取后一个字，有的是取中间的一个字，并无一定。大体说来，所取的一个字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关键字"，还是有迹可寻的。下面举一些归类的实例：

《大学》收在"学"中；

《法华经》收在"华"中；

《伤寒论》收在"寒"中；

《鹦鹉赋》收在"赋"中；

《上皇帝万言书》收在"书"中；

《毛颖传》收在"毛"中。

《永乐大典》在条目归类时，有一些失当之处。如《灌顶经》应归于"灌"字，却归到了"顶"字之下；《窃愤录》应归于"窃"字，却归到了"录"字之下，还有将原文割裂的毛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大典》"割裂庞杂，漫无条理"，[1]确实有这个毛病存在，但并不太严重。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永乐大典"条。

《永乐大典》在永乐五年（1407年）完成，永乐七年誊写完毕，保存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大典》的誊正本也运到北京，保存在皇宫的文楼，原稿可能仍在南京。经历130年后，到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失火，三殿被毁，庋藏《大典》的文楼就在三殿附近，嘉靖帝一夜下四道命令抢救，结果保全无损。由此，嘉靖帝产生了重抄一份的想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开始重抄。

重抄二万多卷书，三亿七千多万字，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嘉靖帝命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由礼部和吏部用糊名考试的方法，招聘了109人，还调配了砑光匠、纸匠。由顺天府供应笔墨砚台水罐，内监惜薪司供应木炭取暖，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支付月米，还配备了警卫人员。订立了严格的制度和定额，规定每人每天抄三页（每页30行、每行28字），即2 520字。从嘉靖四十一年开始，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完成，字体版式都依原样。抄写人姓名和职衔都记在书末。

这样，《永乐大典》共有三个本子：一是原稿本，一般认为仍留在南京；二是誊清正本，即永乐本，在北京；三是嘉靖重抄本，也在北京。据《四库全书总目》称，嘉靖重抄本有两部，但此说未能证实。

《永乐大典》编成后没有刊刻，万历年间国子监祭酒陆可敬曾上《刻书疏》，建议由各省分刻，合作完成，万历帝表示同意，但未能实行。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朔，发生日蚀，时刻和预测不合。这时，崇祯帝想起了《大典》中的“日食”卷，便命令抽印这一卷，这是《永乐大典》唯一的刊本。事见《崇祯遗事》崇祯二年己巳条。

四、应用、流传和散亡

编纂《永乐大典》的原意是供皇帝阅读和文臣制作文诰之用，据记载，弘治帝、嘉靖帝最喜欢读书，常翻阅《大典》。弘治帝曾把《大典》中的药方抄出，赐给太医院，嘉靖帝则把《大典》放在案头，订出了“日阅三卷”的计划。

《永乐大典》在清朝发挥了另一种作用。修《四库全书》时，安徽学政朱筠建议从《大典》中辑书，乾隆采纳这个建议，但规定辑什么书要皇帝决定，辑书的结果是：“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由于清代统治者修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专制统治，不少思想内容优异和学术价值高的著作，因为不符

合其统治需要而摒弃未辑，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后，继续辑出的书有嘉庆时徐松抄出《宋会要》300卷，近人缪荃孙辑出《顺天志》、《泸州志》、《镇江志》等。时至今日，不少学者仍从《大典》中辑出不少有价值的典籍，故《永乐大典》被称之为“辑佚之渊薮”。

《永乐大典》有几个本子呢？一般来说有三个。

第一个本子，即原稿，藏南京文渊阁，一直没有记载其下落的史料，估计明代已被毁。

第二个本子，即永乐正本，存北京文楼，明初几代皇帝翻看的就是这个本子。明末，熟悉皇室文献情况的司礼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贮于何处也？”清初寻找过几次，都没有发现下落。估计是李自成入京时被毁的。关于这个“正本”的下落，近年有种种猜测，或说藏在某处夹墙中，或说已做了嘉靖帝的殉葬品，被埋葬在永陵，但都是猜测而已。

第三个本子，即副本，也就是嘉靖重抄本，原存北京皇史宬。这个本子在书末有抄写人姓名和职衔，很好辨别。清康熙时，徐学乾、高士奇发现皇史宬藏此书，但有些残缺。雍正时，这部书搬到了翰林院。乾隆时，为了编《四库全书》要从中辑书，作了一次清点，发现少了一千多册（2 422卷），约缺失十分之一。修完《四库全书》后，修纂者认为《大典》“精华采尽，糟粕可捐”，便束之高阁，不加管理。有些官吏乘机偷窃，早晨进馆时带一件棉袍，打成包袱，晚上离开时穿上棉袍，包袱里包两本书带出去。据说仅光绪帝师文廷式偷去的就有一百多本。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清点时不到5 000册；次年只剩3 000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检点，只有800本，真是“黄台之瓜，一再而摘”。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永乐大典》的散失，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存放《大典》的敬一亭被毁，侵略者用《大典》代砖，支垫军用物，太史刘葆真在灰烬中还拾到几本。帝国主义者还

以十两银子一本的价格收购了一批，经营一代的《永乐大典》，就这样最后消亡了。

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保存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个图书馆、博物馆中，20世纪80年代末，共收集到近800卷，不到原书的3.4%。我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及日本，都出版过《永乐大典》的影印本。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收录797卷（正编730卷，续编67卷）。2003年8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又将海外新发现的《永乐大典》残本17卷影印出版。这样，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共影印出版超过800卷。[1]

[1]《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近年来，国家财政部和文化部联合，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利用现代出版印刷技术，合理地保护、开发和利用兼具文物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古籍善本，以繁荣学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永乐大典》即列入其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已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的《永乐大典》163册，仿照原书的版式规格影印出版，这是第一次将《大典》照原样出版，不仅可使广大读者便于阅看，亦可欣赏到《大典》的原样风采，是一件了不起的出版盛事。

第三章　私家的编撰

随着出版技术的成熟，出版事业的昌盛，明代私家的图书编撰活动十分活跃。

私家编撰的图书，有很大一部分是传承以前的做法，由于时代、社会、学风的变化，再加上作者们的世界观、治学取向、旨趣好尚的差异，使作者队伍的结构趋向多元，有形无形地形成了若干作者群体，同时，在图书的编纂方面，也出现了若干特色。在理学被怀疑、心学兴起的时候，一些作者突破理学的旧樊，编撰了种种儒学新著；忧世愤时之士则编撰了不少私史和经世致用之书；务实的学者们苦心撰写了有用的科技图书。至于别集和总集的编纂，更是热闹，各个文学流派，杰作纷陈，或编纂当代文人的作品，或辑集前人的选集，标榜自己的文学观点。

教徒的虔诚投入，文人的积极参与，扩大了佛道藏的入藏内容，改进了编纂方式，使佛道藏廓新了面貌。

明代的私撰中，还出现了山人们别出心裁的清闲之书，乱编胡凑的书帕本，使图书的编撰充斥俗陋之风，是图书编撰出版事业中泛起的一股浊流。

第一节　私家编撰图书概况

一、私家编撰的基本做法

文士们为官府编撰，为书肆编撰，都要受制于人，有功利的目的。只有在为实现自己的意愿而编撰时，才体现了他们本身的取向。

私刻[1] 图书编撰者人数众多，有尚未入仕的士人，有在职的官吏，有已经致仕的官员，他们是私家编撰的主体。此外，还有儒学、书院的教谕、山长，社会上的宿儒名流，以及医生僧道等人。

【1】"私刻"的概念在出版史上说法不一。如"私刻"、"家刻"、"家塾刻"、"私家塾刻"等。这几个概念的含义不同，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本书用"私刻"概念，以资统一。

私家的编撰活动绝大多数是个人行为，同时也有志趣相投者结合起来的群体活动，这在明末更为明显。这种群体是松散的，没有章程约束，也没有同人的会刊，但撰作的取向却互相投合，十分明朗。和另一批人相比，则面目迥异，互不相容，甚至形同水火。明末在儒学界的不同门户之间，在文学界和戏剧界，都有这种情况。五子、七子、十子，名称繁多，各领风骚，彼此抑扬，风格不同。

私家编撰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类。其中不少是传承前代的样式。例如在经部中，有不少文字音训、考误质疑、疏解名物的图书，史书中则颇多兼及文史掌故的笔记，集部中的别集、总集，其编撰方法也和前人无异。

明代私家编撰有不少新的情况。

私人撰写史书。明中期和后期，出现了不少私人撰写的史书。史书从来以皇家编纂为主，因为私人看不到核心史料《实录》，如果编当代史书，则更有种种禁忌。明代中后期，《实录》外传，种种禁忌又有了松动，于是各种体裁的私史就大量出现了。

经世致用之书。这类书在明末大量出现。明末一些有识之

士，看到国事日非，形势危殆，想要寻找解救之道，于是到历史中去寻找教训，或者到本朝的贤哲中去查考答案。这类史鉴之书往往广收博取，篇幅很大。

心学语录之书。明代中后期，理学式微，心学崛起，门户林立，纷纷采取讲学的形式。这种新的学说来不及细细推敲琢磨成书，于是种种学术随笔、语录、通信录等被编撰成书，广为传布。

科技图书。一批实干的科学家亲自实践、调查、记录，积累了很多第一手材料，他们自创体例，图文并茂，文字质朴，绝不引经据典。这类书中，医学、农学、水利、兵学等门类特别突出。

编撰活动促进了图书编辑学的发展和成熟。在一些图书的序跋、凡例中，蕴藏积累了丰富的编辑之学。

二、几种特殊的私家编撰

（一）党社成员的编撰

晚明时，社会上出现了众多党社，以东南地区为多，最著名的是东林党、应社、复社、几社。这些党社的性质兼有政治性和文学性，往往起初以文会友，文学色彩比较浓，甲申前后，时局剧变，党社活动的内容转向政治。党社人数很多，分支复杂。崇祯五年（1632年）复社在苏州虎丘开大会，参加者号称万人。吴应箕编《复社姓氏录》二卷，其孙编《续录》，记录有姓有名的会员2 025人。这些党社的流派一直活动到清康熙年间才被迫停止。

党社成员都是文人，主要人物则是宇内名流，如复社的张溥、文震孟、钱谦益、刘宗周、倪元璐、梅之焕、黄道周等，几社六子夏允彝、杜麐徵、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他们都活跃在出版事业发达的地区，和书坊有密切的关系，著作丰富。他们用个人名义编撰的图书，多不胜数，用“社”的名义编撰的图书，以制义为主。著名的有《国表》，复社编选，作者700余人，诗文2 500多篇。这部书影响很大，“名魁鼎甲，多出其

中”，销路极佳，“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1]

《几社会义初集》（崇祯五年出版），后来又编《二集》、《三集》，一直出到五集（据资料载，还有六集、七集，但其书不传），其中第四集，因为其中不少作者后来中试，书的声誉大噪，被誉为“天下第一书”。

他们编撰的时务书也很可注意，材料信实，出版及时，编纂手法灵活。例如魏忠贤倒台后二三月，就有人把当年暗藏的重要资料整理出来编成书发售，大受世人欢迎。

（二）山人编书

晚明时，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所谓“山人”，他们或者是没有考上功名的读书人，或者是官场角逐的失意人，或者是年老致仕的官吏，人数颇多，有“山人遍天下”之说，互相往来，唱酬消遣，似乎十分清高，却又喜欢结交权贵富绅，所谓“悠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编书刻书是他们的雅趣之一。代表人物有陈继儒（松江人）、屠隆（鄞县人）、周履靖（嘉兴人）、赵宧光（吴县人）、张应文（昆山人）、高濂（钱塘人）、陈鹤（山阴人）、项元汴(秀水人）等，不少是江浙一带的人。

山人们编书的能力很强，能够在很短时间里编出大量书来，因此著作很多。陈继儒著作51种、屠隆19种、周履靖35种、高濂32种。所编书以两种为多：一类是笔记杂录小品，如陈继儒编《文奇豹斑》，杂抄诸书，分成十类；《珍珠船》杂抄小说家言。这类书了无体例，资料缺略，无益考证，无补学术。还有一类是消闲玩赏之书，琴棋书画、瓶器茶酒、纸墨笔砚、花鸟虫鱼、鼎彝古玩，无所不有。他们标榜清言、清供、清秘、清玩之趣，甚至枕头、蟋蟀之类小事物，也可以编成洋洋数十卷书。把消遣玩乐之书，推到了极致。他们善于遣词造句，韵散结合，四六并用，雕句琢字，开后世格言小品的先河。

山人们虽然颇有学问，可是编书态度却很不认真，校对则焉乌不分，引文则羼以己意，为严谨的学者所诟病。《四库全书总目》说这类书“竞述眉公（陈继儒），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

【1】［清］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求其卓然蝉蜕于流俗者，十不二三”。[1]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子部四十二“续说郛”条。

（三）书帕本流行

明代后期，社会上流行一种把自编的图书送人的风气。一本书，再加上一块手帕，用来赠人、晋见、交换之用。这种书被称为“书帕本”。地方官晋见上级，新进士拜见师友，外官进京公干，都要用上。顾炎武《日知录》中说：“昔时入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谓之书帕。”“历官任满则必刻一书，以充馈遗，此亦甚雅，而卤莽就工，殊不堪读。”在《金瓶梅》等小说中，也提到社交活动中互赠“书帕本”之事。士绅巨商这样做，意在表示其风雅。但这类书上并不标明“书帕本”字样，因此比较难认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注明是“书帕本”的有4种，存目十多种。

这种“书帕本”的编纂十分马虎，或者找一本前人的集子翻刻一通，或者用几个本子拉杂凑合。例如衡州知府周诏编的《石鼓书院志》4卷，是将一本旧志稍加增损而成的。郭惟贤做湖广巡抚，因为屈原、岳飞、孔明都与湖广有关，就从这三人的文集中取一些材料，编成一部书，取名《三忠集》14卷。淮徐分巡道朱东光取《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四书合在一起，起名《中都四子集》64卷。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所做的编辑工作极少，只要抄抄摘摘、拼拼凑凑就可以了。陆深在《金台纪闻》中说：“有司刻书，只以供馈贶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今藏书家以书帕本为最下，盖由于此。”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说这种书只能喂老鼠：“精绫锦标，连窗委栋，朝夕以享群鼠，而异书秘本，百无二三。”这种书帕本名为私撰，又往往动用公帑，海瑞曾痛加斥责过。

第二节　私史和经世致用之书的编撰

一、民修史书

修史主要是中央政府史馆的事，而且由众多史官集体作业。个人修史书历来比较少，明代末期，个人修史纷纷，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因为核心史料的解密，这在前面曾经提到，万历时修本朝史，重抄《实录》，使《实录》流向民间。一套《实录》约4 000卷，当时的价格是“五万缗”。江南的巨室如钱谦益、谷应泰家中都备有一套。他们很乐于借给人用。第二，明前中期一些敏感的话题，如建文逊国、英宗夺门、嘉靖议礼等，到明后期已经逐渐淡化，恩怨渐消，有了比较一致的说法。第三，晚明政局紊乱，国步日艰，有识之士想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寻找出路。明亡之后，遗老们怀着“国可亡，史不可亡”的特殊心情，缅怀前朝，更加想用历史来有所挽救。如此种种，都刺激着晚明和清初的私人修史之风。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的著录，晚明私史有一千种之多。

据钱茂伟的研究，晚明成部的私修史书有二百种左右。主要是：

综合体8种：《昭代明良录》、《名山藏》、《皇明副书》、《史概》、《识大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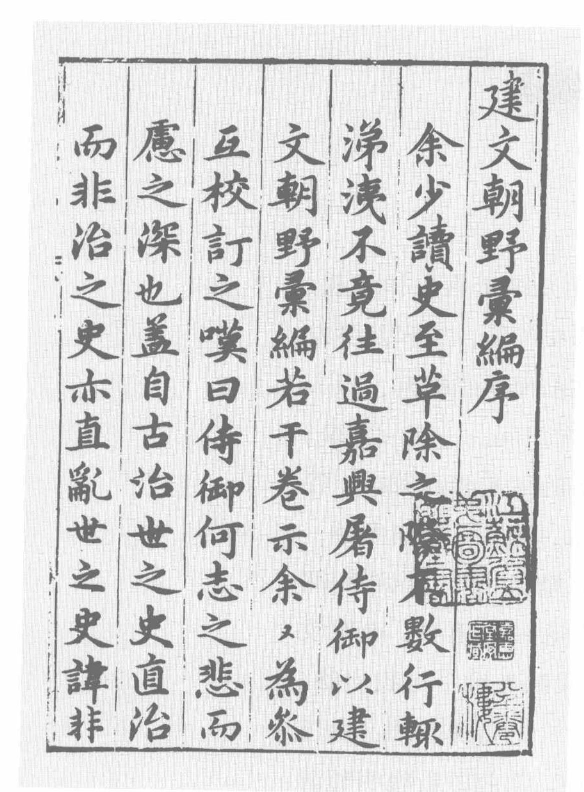
编年体15种：《皇明大政纂要》、《明政统宗》、《国史纪闻》、《宪章外史续编》、《国榷》等；

续订、重订《通纪》的编年史23种：《皇明资治通纪》、《皇明从信录》、《皇明通纪大全》、《通纪集要》等；

名臣录类书26种：《今献备遗》、《皇明名臣备考录》、《皇明名臣言行录新编》、《内阁名臣事略》等；

建文朝史13种：《建文朝野汇编》（图13）、《壬午书》等；

边疆域外史地著作53种：《万历武功录》、《东西洋考》、


建文朝野彙編序

余少讀史至革除[illegible]數行輒

涕洟不竟往過嘉興屠侍御以建

文朝野彙編若干卷示余又為參

互校訂之嘆曰侍御何志之悲而

慮之深也蓋自古治世之史直治

而非治之史亦直亂世之史諱非

图13

［明］屠叔方撰《建文朝野汇编》，万历刻本，记建文“革除”之事。

《皇明象胥录》、《咸宾录》等；

其他20多种：《国朝献征录》、《弇州史料》、《本朝京省人物考》、《国初群雄事略》、《启祯野乘》、《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嘉靖以来首辅传》、《昭代武功编》等。[1]

下面介绍几种著名的私史著作。

（一）童时明著《昭代明良录》

童时明，字泰征，号惺余，又号东里居士、越西逸民，浙江淳安人，约生于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1558—1562年），卒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几次考试不售，经人介绍入太学学习。任江苏常熟县丞。早年熟读史书，仿纪传体撰成《昭代明良录》一书，意为“致慨臣主相遇之其艰，而有明良之慕”（该书序中语），详记臣事，略举君事。全书20卷，臣事16卷，共记臣900多人。分成13类：计开国名臣23人、靖难名臣30人、翊运名臣25人、馆阁诸臣86人、卿贰名臣138人、理学名臣37人、直节名臣69人、循良名臣87人、忠义名臣334人、武胄名臣29人、外戚名臣2人、隐逸名臣37人、内监名臣11人。史料的来源主要是明代前期各种名臣录和私史。

（二）何乔远著《名山藏》

何乔远，字稚孝，号匪莪，福建晋江人。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卒于崇祯四年（1631年）。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博学多闻，善诗文，温陵五子之一，人称镜山先生。曾任刑部主事、礼部尚书，后弃官还家读书讲学。主要著作有《闽书》、《名山藏》。《闽书》是福建省通志，崇祯二年（1629年）刊行，人称“一代良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馆修本朝正史，何乔远曾上疏支持，参与其事。后来修史未成，他十分痛惜，回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乡讲学期间，独立完成了《名山藏》一书，先以抄本流传，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式刊行。全书109卷，不分纪传志表，全都称为“记”，共典谟记、坤则记、开圣记等37个记，史家称为“分类体”。全书记述简洁，重视民间历史的记载，但有好猎奇的缺点，人称其“嗜奇无识，引断失据”。

（三）朱国祯著《皇明史概》

朱国祯，字文宁，号平涵，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任史官，历南北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因阉党专政，辞职回家。著有《涌幢小品》等书，《皇明史概》为其史学专著。他曾入本朝国史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修史失败后，他立志独立完成明史的撰写，大约完成三分之一时，请叶向高预为作序。崇祯三年（1630年）开雕，去世时大约刻成十之五六，118卷，约158万字。这本书吸取纪事本末和宝训体的体例，全书分为“五纪”、“五传”。“五纪”是大政纪、大事纪、大训纪、大因纪、大志纪，前三纪已刊成；“五传”是开国臣传、逊国臣传、列朝臣传、类臣传、外臣传，前二传已刊成。朱氏详于考核，敢于直书，对朱元璋杀戮功臣、朱棣篡位、英宗好大喜功等都不循旧说。这部书没有刻成，遗稿为同镇人庄氏购去刊印，酿成了清初一场残酷的文字狱。

（四）谈迁著《国榷》

谈迁，初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卒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浙江海宁枣林人。明诸生，有志编撰明史，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六年后完成初稿，书名《国榷》，为编年体，因家贫未能刊行。顺治四年（1647年）时，原稿被窃，他发愤重写，顺治八年（1651年）完成，又不断增修，顺治十年（1653年）北上，居京二年半，遍访降臣、皇亲、宦官、公侯门客，搜求遗闻。前后共写了三十多年，共104卷，约400万字，是明代私史中篇幅最大的一种。取材主要根据《明实录》，旁及200多种著作。一般的编年体史书只写到月，而《国榷》具体到日。叙述史事时，间附评论或

考辨。文笔简洁，敢于直书，对明太祖杀功臣，成祖残害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都直言不讳。在整个清代未能刊行，以抄本流传，也因而未被窜改。直到1958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从完稿到出版，间隔300多年，这在出版史上是少有的。

二、经世致用之书的编撰

（一）经世致用之书的产生

明朝末叶，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大臣水火，北方的女真虎视眈眈，社会动荡不安，种种衰象十分明显。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文人中的有识之士，抛弃空疏之学，寻求实用之道，企图以图书为手段，唤起人心，达到振兴国运的目的，把国事和出版紧密结合起来。陈子龙等的《皇明经世文编》是其代表。

《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编纂者是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三人。

陈子龙，字卧子，擅长八股文，兼能诗词骈文，是编选应举书的著名选家。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选绍兴推官，升兵科给事中。曾接受张国维的委托，增删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他与夏允彝等组织几社。清兵南下时，在松江起兵失败被执，在苏州投水而死。

徐孚远，字闇公，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清兵破松江时，从鲁王漂泊海岛，后至台湾从郑成功，死于台湾。

宋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明亡后，和其弟徵舆一同降清。

他们三人都是松江人，几社社员。起初，他们三人都把精力放在选时文上，徐孚远尤其有名，他从崇祯五年至十四年（1632—1641年），选刊过《几社会义》五集，风靡东南。后来，严酷的时局促使他们转向，从选刊应举文转为选刊经世救亡之书。

参与其事者除了这三人外，还有李雯、彭宾、宋存标、何刚等人。在《皇明经世文编》上，每卷都署陈、徐、宋三人的名，

其余则有李、宋等人轮流署名。全书列名“选编”的有24人，都是松江人，列名“参阅”的有142人。可以说，这部书是东南地区士人的共同心声。

（二）《皇明经世文编》编刊经过及其内容

《皇明经世文编》共504卷、补遗4卷、总目1卷、姓氏爵里1卷、凡例1卷。

编集之初，几社的社员通过个人关系，向亲朋好友征求文集，遍及吴、越、闽、浙、齐、鲁、燕、赵等地，共收到文集千种以上，所收限于明代的作品。收到文集后，就分头选辑，从中选出有关国家经世致用的奏议、书信、杂文，不收诗词、戏曲。然后以人为纲，年代先后为序，编集成书。正编所收始于宋濂，终于陈组绶，425人；补编始于何起鸣，终于钱梗，5人。合计430人，共收文3 145篇。

从凡例中可以看到，选文的标准有三：

1. 明治乱　只要对国家社会的治乱有重大价值，便要收录。“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攸关，若乃其言足存，不以人废，分宜老奸，秩宗之文，采其数篇，特于卷首，直斥其名。若近者熊芝冈刚愎自用，已经伏法，然筹策东隅，多有英论，无讳之朝，可以昭揭。”

2. 存异同　主张并录不同意见。“异同辩难，特以彼我未通，遂成河汉，就其所陈，各成一说，如大礼之议，张、桂与新都并存；河套之役，襄愍与东涯各异；一哈密也，或主闭关，或主授爵；一倭奴也，或主封贡，或主征讨。又若军伍之虚实，边墙之修废，胶莱海运之通塞，得失虽殊，都有可采，不妨两存，以俟拣择。”

3. 详军事　“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如北摧劲虏则详于王威宁，南伐麓川则详于王靖远，两广寇乱则详于韩襄毅，剿灭土达、绥戢荆襄，则又详于项襄毅，处置宁藩则详于王文成，河套恢复则详于曾襄愍，倭奴抄掠则详于胡少保、戚总戎、唐荆川，

顺义封贡则详于王鉴川，平播则详于李襄毅，水蔺地界则详于郭青螺，西征则详于梅客生，东征则详于宋桐冈，若经略奴酋则详于熊芝冈，抚赏插部则详于王霁宇，水西本末则详于朱恒岳。”

全书包括的范围很广，涉及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礼仪、职官、国史、兵饷、马政、边防、边情、边墙、军务、海防、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河、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钞法、税课、役法、科举、宗室、谏诤等。

这部书的缺点是，编者虽以国事为重，却也有所顾忌。万历的三大案、东林党是非、明末的农民起义等内容，都没有收入。还有少许重复的文章，还存在着断限不严的毛病，也误收了一些元代的篇章。

这部书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出版。五年以后，明朝就灭亡了，没有能起到预期的作用。清代列为禁书，没有重印，直到1962年，才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吴晗先生曾指出这部书的历史意义："《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实用的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1]

这类经世实用之书，明末还编刊了一些，如茅元仪的《武备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谈农业；谈迁的《国榷》，从国家兴亡的角度谈皇族、皇室的建设。明末的私家史书，差不多都充满着这种忧患意识。

【1】吴晗：《明崇祯刻明经世文编·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第三节　儒学新著的编撰

一、明代儒学发展历程

明代的儒学，经历了理学式微、心学勃兴、异端崛起的历程。

明成祖敕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加强了理学的统治地位。在一段时间里，大儒如吴与弼、薛瑄、胡居仁等人所论没有超越理学的旧樊，一般俗儒更是只能依据三部"大全"编一些解经应举之书。理学到了无所发明的式微境地。到了中叶，陈献章和他的弟子湛若水等倡导"心学"，打破了这个局面，心学勃兴，至王阳明而达到极盛。

王阳明去世后，心学依然盛行，先后出现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派。浙中有王畿、钱德洪、徐爱，江右的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等人影响最大，而泰州王艮这一派则最可注意，因为王艮之子王襞和学生颜均、罗汝芳等都是有所创新的，而学生何心隐、李贽更走向了"异端"。这两位制造"异端邪说"，造成"一境如狂"，最后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明代后期，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清流派，如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黄道周等辈，呼号国是，气节慷慨，为世所尊重，但他们在经学上却并没有多少建树。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撰《明儒学案》一书，概述有明一代儒学历程，写下了一份明代思想史的总结。

明儒思想的发展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论是恪守理学教条的醇儒，还是持新说的"异端"，他们所读的都是五经和四书，思想资源相同，为什么最后结出来的果实是如此迥异呢？对于这个问题，前人早有答案，根本的原因是儒学的理论十分丰富，包容十分广大。从儒家的基本理论出发，既可以推导

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论调，也可以根据“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教条，推导出“民胞物与”这样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而“民胞物与”这样光辉的思想，却又是理学大师张载在他的《西蒙》中提出来的。这些都说明了儒学内容的博大精深。

明代儒学思想的发展，是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任务，这里不能详述。作为出版史所要关注的，是要研究这些思想的火花是怎样被捕捉起来，又是如何被编纂成书的。

二、儒学著作的编撰模式

明代大儒的思想学问，采用以下几种编纂的方式。

（一）语录

语录体的鼻祖是孔子的《论语》，儒者对此十分熟悉。儒、释不少专著，是用这种文体撰写的。语录的内容包括：弟子们的听讲记录、师生们的讨论辨析、同道或不同道者通信中的切磋驳诘等。这些材料的原始状态往往十分凌乱，弟子所记，各取所需，时间相乖，地点出入，遗漏重复，在在都是。所以，记载同一师长的话，会有不同，编次更是相异，有所谓“人各为书”的现象，这就要嫡传的弟子来做整理、分类、去取、核实、润饰的工作。下面以王阳明心学的著作来说明。

王阳明语录的最初编纂者是他的妹夫、弟子徐爱。他把自己所记和另两个弟子薛侃、陆澄所记合在一起，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刊行，这便是后来《传习录》的第一卷。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的学生南大吉续刻，加进了王阳明与顾东桥、周衡、陆原野等的通信8通，这便是后来《传习录》的第二卷。此后，钱德洪再刻此书，删去了第二卷中的一封信，并把第二卷改为问答体，又增加了陈九川、黄以方等5位门人的回忆记载，成为第三卷。这三卷合起来，便是《传习录》的全文。后来，这部《传习录》又被编到《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中，成为最前面的三卷。

类似的语录书还有吕柟门人辑的《泾野子内篇》、胡直门人辑的《胡子衡齐》、曹端门人辑的《月川语录》等，数量很多。

这类语录的内容如果数量较多，就要有一番分门别类的工作。如，胡居仁的弟子余佑编其师讲学时的语录《居业录》，共收1 199条，遂分为道体、为学、主敬等12类。

（二）摘要和阐注

对古代经籍摘出要点，并加以阐述，是一种治学方法。明人把这类书称为“钞释”。“钞”是指摘要，“释”即辑录者的阐述和理解。这类图书，看起来似乎是读书笔记，实则在去取之间，暗蕴着编者的见解，成为推戴某一种学派的手段。

钞释前人之学的如吕柟的《周子钞释》3卷，从《周子全书》中摘出；《张子钞释》6卷，从《张子全书》中摘出；《二程子钞释》10卷，从《二程全书》中摘出；《朱子钞释》2卷，从《朱子全书》中摘出。吕柟摘钞时，得其精要，简汰不苟。《朱子全书》篇幅浩大，黎靖德删除重复后，还有140卷之多。对《朱子全书》的摘要甚多。程曈的《闲辟录》摘出10卷，但门户之见太深；胡缵宗的《近取编》摘出2卷，只收切近日用的内容；丘濬的《朱子学的》也只取2卷。吕柟摘取的2卷本，颇受好评。

明朝当代儒者的著作，也有种种“钞释”本，抉其要旨，以便醒人耳目。王阳明的《传习录》，篇幅本不算多，也有人作节本。如无名氏的《传习录略》、戴经的《传习录节要》、刘宗周的《阳明传习录选》等。胡居仁的《居业录》，原文有1 199条，陈凤梧认为没有诠次，不便观览，便把它改为31类，编成31卷，以《居业录类编》为名出版。吕坤的《呻吟语》原来有6卷，到了晚年，他自己大加删削，存十之二三，改名《呻吟语摘》刊行。陈献章的学说散见在他的各类文章中，张诩从《白沙文集》中爬剔出来，分成十类，成《白沙遗言纂要》一书。影响极大的《性理大全》一书，也有多种节本，如杨道会辑成《性理钞》，钟仁杰辑成《性理会通》，詹淮、陈仁锡辑成《性理综要》、《性理标题汇要》等。

(三) 自撰随笔心得

儒者自己用随笔等形式记述其学说，并不多见。但也有些学者喜欢用这种直捷而可靠的方式。最有名的有薛瑄的《读书录》、《续录》两种共23卷，所记都是躬行心得之言。罗钦顺晚年先记下心得156条，后来又得113条，整理成《困知记》和《续记》4卷。王廷相博学好议论，他记自己的议论成《慎言》一书，13卷。在自序中说："仰观俯察，验幽核明，有会于心，即记于册，三十余年，言积数万，……类分为十三篇。"

三、总结明代学术的《明儒学案》

后人企图清理明代儒学的流派渊源，作了不少努力。明代周汝登著《圣学宗传》，清代孙奇逢著《理学宗传》。写得最好的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

黄宗羲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明亡时，他34岁。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是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浙江余姚人，父亲是东林名士黄尊素，被阉党害死。他受学于刘宗周，19岁入都讼冤，用铁锥击毙仇人，领导复社成员和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他募兵抗清，曾任鲁王政权左副都御史，明亡后隐居著述。他学问博洽，无所不精，思想锐敏，大胆尖锐。曾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下之乱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 他又提出改革土地和赋税制度，反对"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认为工商也应该是本。

【1】[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他所著的《明儒学案》出色地完成了明代学术总结的任务。全书共62卷，把明代学术归结为17个"学案"，即：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止修、泰州、甘泉、诸儒、东林、蕺山。共论述了200位学者。每人都先列小传，再载其语录，扼要记述其生平、著作、思想和师承关系。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学术史专著。书中以王学为中心，对明儒中"一偏之见"、"相

反之论”都很重视，加以评介，对朱程之学则“阴致微词”，但对“异端”也颇为歧视，李贽之学，不及一语。

《明儒学案》开创了撰写学术史的新体式。紧接着，黄宗羲又和其子黄百家一道，撰著《宋元学案》，没有完成，后来由全祖望继续，一直到黄宗羲玄孙稚圭手上才最后完稿，共100卷，列学案99个、学略3个，体例又有创新。《清儒学案》则是近人徐世昌完成的，208卷，共论述清儒1 169人。此后，“学案”成为记述思想学术史的一种重要体例。

第四节　科技图书的编纂

一、明代科技图书的成就

明代编撰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科技著作，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下面是有代表性的出版物。

（一）农学

元代农学著作有很大成就，明代承前朝余绪，也出版了一些，但数量并不太多。主要有：《便民图纂》16卷（图14），邝璠著，弘治十五年（1502年）初版，内容涉及农、畜、气象各方面。当时吏部右侍郎称赞此书说：“识本末轻重，言备而旨要。”近人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说：“这部书可以代表农书中通书这一支派。”[1]《元亨疗马集》4卷（图15），喻仁、喻杰兄弟编。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初刻，书中有马病72种、牛病56种、驼病48种。当时有40多种翻刻本，日本翻刻后改名《马经大全》。《致富全书》，陈继儒据多种资料整理而成。介绍作物10种、蔬菜38种、树木22种、果树30种。《群芳谱》30卷，4部14谱，王象晋著，论述植物与天地环境的关系、育种理论，自然科学与历史社会典故并收。清康熙帝在此书基础上命汪灏重编成《广群芳谱》100卷。黄省曾撰《农圃四书》，谈稻、蚕、鱼、菊四门。耿荫楼撰《国脉民天》，谈耕作技术。马一龙撰《农说》，谈水稻栽培技

【1】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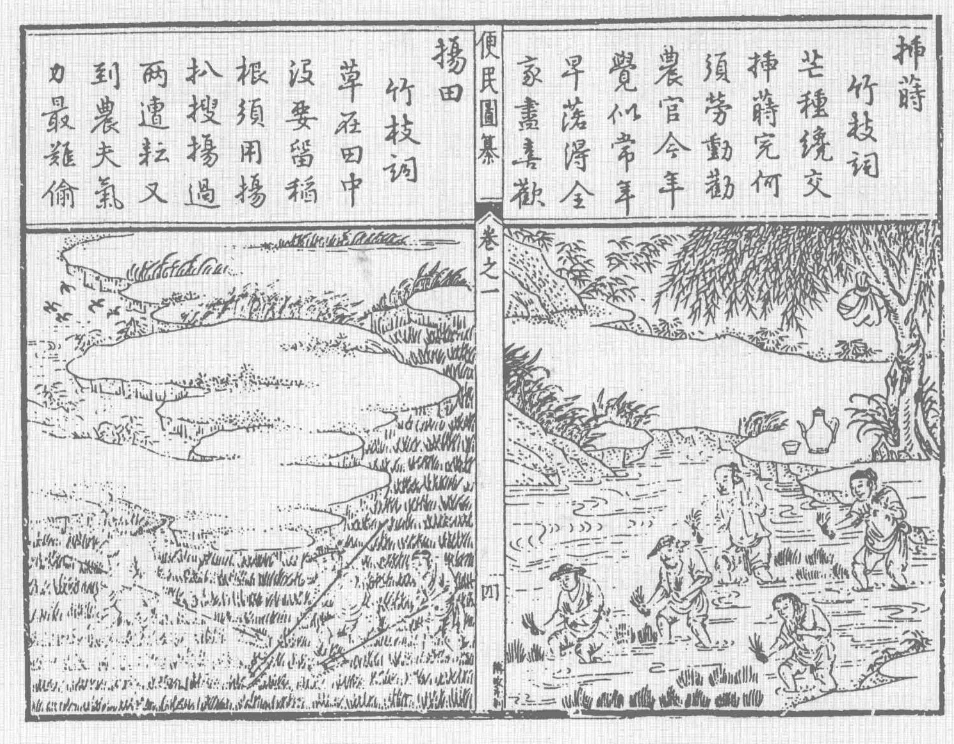




图14
[明] 邝璠《便民图纂》是一部有影响的农书，首二卷为图页。此为“农务”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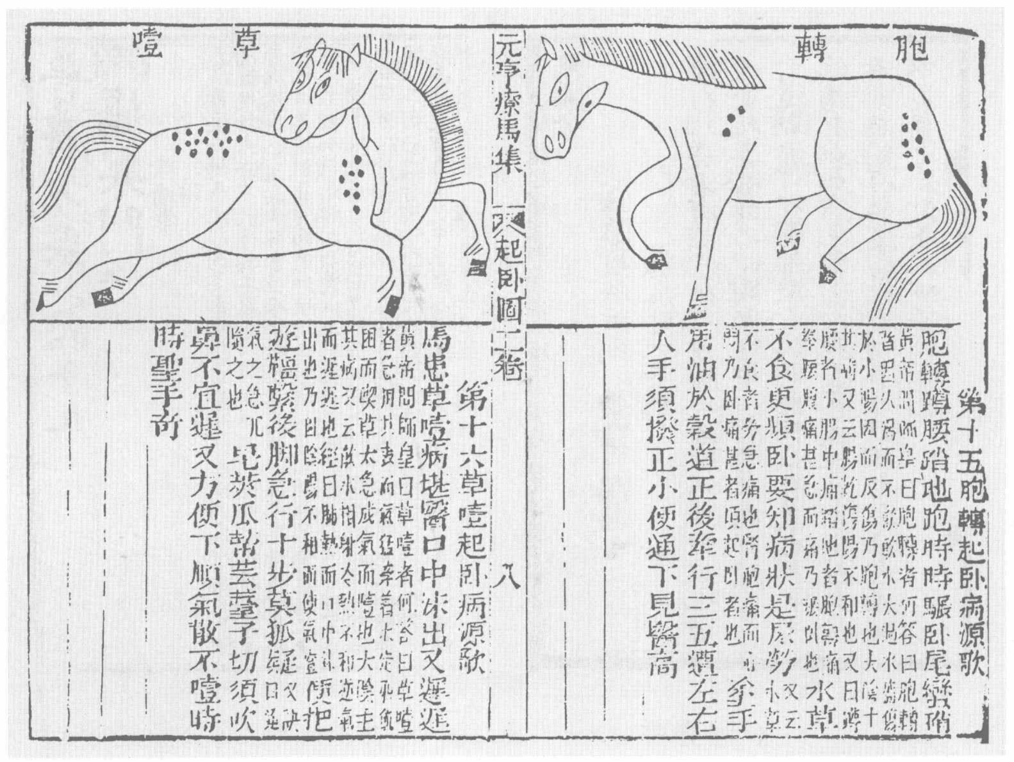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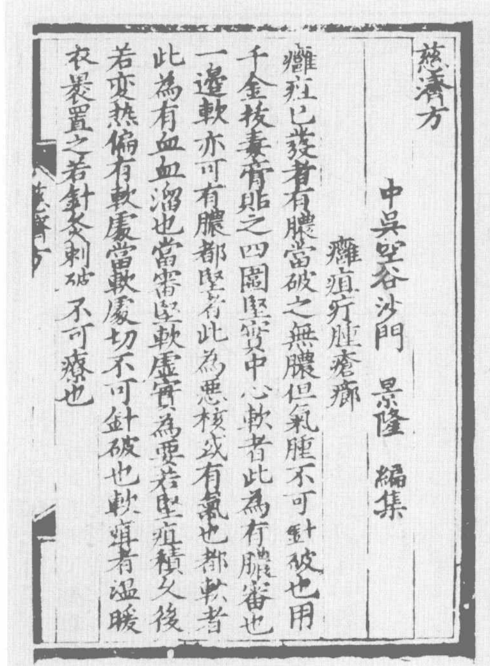


图15 万历刻本《元亨疗马集》。

术。涟川沈氏撰《沈氏农书》，谈逐月农事。

（二）医学

古代儒者有“降志为医”、“不能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说法。所以，医生中常有“儒医”著书之事。明代医书特多，原因就在此。编撰的医学经典阐述有马莳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9卷、《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12卷等。医学百科有张介宾《景岳全书》64卷。各种疾病的治疗有名医王肯堂的《六科证治准绳》120卷等。药物书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52卷。方剂有朱棣的《普济方》180卷（图16），收方达61 759种。临床各科已经有十三科之分，专著很多，如傅山的《傅青主女科》，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还有一些特殊的专科，如王伯学的《痔漏论》谈痔疮，薛己的《疠疡机要》谈麻风，陈司成的《黴疮秘录》谈性病。又有种种医论、医话、医史等专著。还出现了一批医学方面的丛书，如《薛氏医案二十四种》等。



慈濟方

中吳望谷沙門 景隆 編集

癰疽疔腫瘡癤

癰疽已發者有膿當破之無膿但氣腫不可針破也用千金拔毒膏貼之四圍堅實中心軟者此為有膿當也一邊軟亦可有膿都堅者此為惡核或有氣也都軟者此為有血血溜也當審堅軟虛實為要若堅疽積久後若變熱偏有軟處當軟處切不可針破也軟痛者溫暖衣裹置之若針灸刺破不可療也

普濟方卷之四十九

傷寒門 上

○陰陽毒

論

夫陰毒盛而陽暴絕則爲陰毒若陽毒盛而陰暴絕則爲陽毒大凡陰陽離絕非大汗不能復其正氣也六脉俱洪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陰證也陽毒其脉當弦而洪數陰毒其脉沉細而疾陽病則身熱而無汗陰病則身冷而有汗岐伯云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麄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陰勝則身寒汗出數慄而寒寒則厥厥證不可以常法治之金匱論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疼狀如被打咽喉痛死生與陽毒同○三因云病者頭重頸直皮肉強痺或蘊而結核起於喉頸之側布熱毒於皮膚分肉之中上散入髮際下貫顳顬隱隱而熱不相斷離病

图16
左：正统景隆刻本《慈济方》。
右：永乐周藩刻本《普济方》。

(三) 数学

明代是中国古典数学衰落的时期，科学界认为中国在明代失去了数学王国的地位，数学基础理论新创和阐述的图书很少。但也有两件影响深远的成就。一是在《永乐大典》中有36卷的篇幅汇聚了中国的古典数学（卷16 329—16 364），起了保存作用。二是在16世纪的后半叶，出现了多种以珠算为主的计算方法图书，如徐心鲁的《盘珠算法》，该书曾传入日本。还有柯尚迁《数学通轨》，是珠算的小结。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收595个应用题，多达179卷。黄龙吟的《算法指南》2卷，是一本切合实用的启蒙书，销路很好，有多种版本。

(四) 技术类

水利方面有治理黄河、运河、淮河的书。如：潘季驯《河防一览》14卷、万恭《治水筌蹄》2卷，这两本书提出“束水攻沙”的正确主张。刘天和的《问水集》6卷，对百余个水利问题作了阐述。王琼《漕河图志》8卷（图17），记明前期运河的面貌。专述太湖水利的书有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28卷、姚文灏的


漕河建置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四方貢賦由大江至洪武二十年
海運七十萬石于遼東以供軍餉
太宗文皇帝肇建北京江南糧餉一由江入海出直沽由
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至陽武縣陸
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
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
疏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十年宋
禮奏三年海運二次於徐州濟寧州置倉收粮造淺船
五百隻撥附近衛軍領駕從會通河儹運每年三次以
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三年户部會官議奏停罷海運悉
由裏河轉運裏河者以船不入海而入河故曰裏也夫
河自通州而至儀真瓜洲水源不一總謂之漕河又謂
之運河神山泉等水自西山來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
通州入白河開渠置閘而漕舟不行自通州而南至直
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
入海者衛河也自汶上縣分水河口分流而北至陽穀
縣絕黄河又至臨清州會衛河南至濟寧州會汶泗沂
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來南流至徐州會沁
河者汶泗沂三水也自徐州城西北來東南流至清河
縣入淮者沁水也北至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真瓜洲通
臨江中爲漕渠者諸湖瀰漫之水也
清河源委

图17
［明］王琼撰《漕河图志》，汇集运河资料。

《浙西水利书》3卷、归有光的《三吴水利录》3卷等。谈海塘修筑的书有仇俊卿的《海塘录》8卷。南北水运书有徐贞明的《潞水客谈》，水利工程有李熊的《木兰坡集》。

明代战事频仍，引发了军事书的编刊。最大的军事百科书有茅元仪的《武备志》240卷，介绍的兵器达2 000种。综合性兵书有唐顺之《荆川武备》12卷，王鸣鹤《登坛必究》40卷。论述古兵法的书有《兵录》14卷。总结战事的书有郑若曾的《筹海图编》13卷、《江南经略》2卷，何良臣的《阵纪》2卷。总结抗倭的书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18卷、《练兵实纪》9卷。专谈工事和要塞建设的书有孙承宗的《车营叩答合编》4卷，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10卷。焦玉的《火龙神器阵法》1卷则专讲火器。

建筑方面的书有午荣、章严、周言的《鲁班经》（图18），介绍南方民居及家具的制作。计成的《园冶》3卷，是园林建筑的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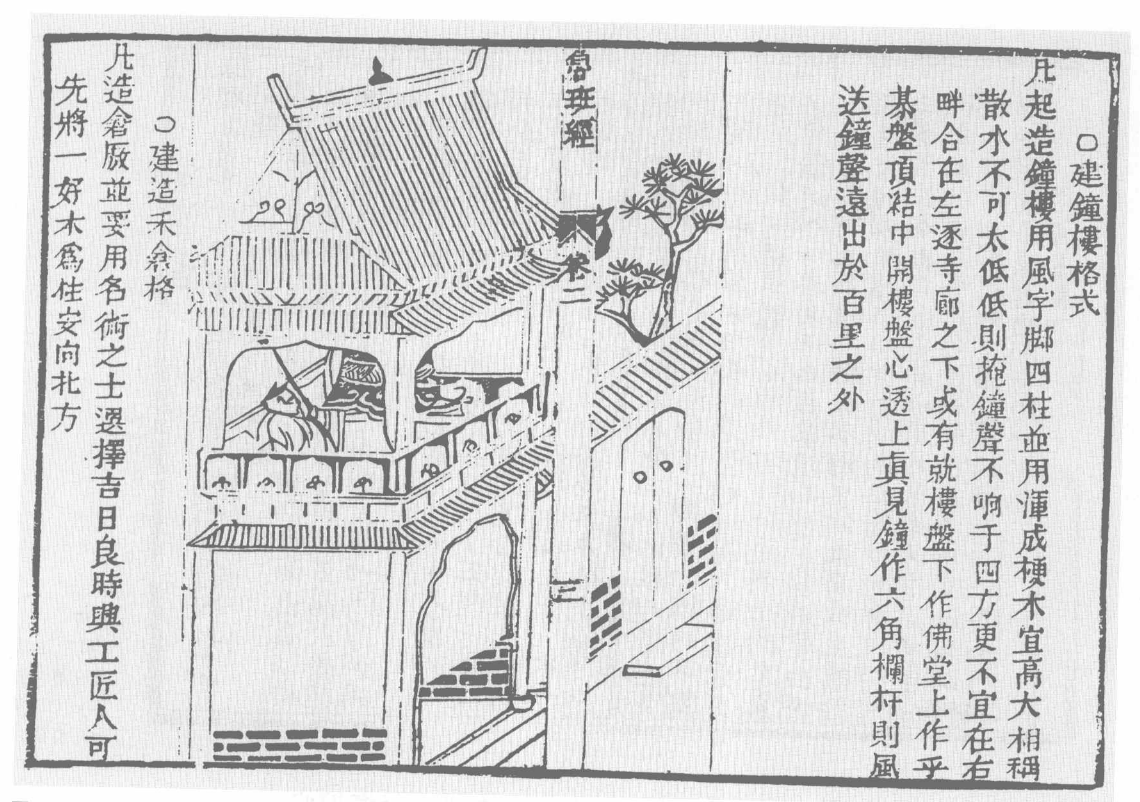


图18
明代手工业技术书《鲁班经》中的“建钟楼格式”。

造船的书有沈啓的《南船记》4卷，讲工艺和用料；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8卷，着重讲管理和技术。

地理方面的重要图书有罗洪先编的《广舆图》，收图112幅，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地图集，明代重版6次。[1] 郑和下西洋后，产生了一批介绍境外实况的书，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信《西洋蕃国志》等。明后期还有地图集《皇明职方地图》、《地图综要》等。

以上这些技术书大都有丰富的插图，图书的作者则大都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官员。[2]

【1】陈潮：《中国古代地图史略》，载《出版史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2】任继愈：《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二、《本草纲目》的编纂和出版

（一）编著经过

作者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

北蕲春）人。正德十三年（1518年）生，世代业医。14岁考取秀才。乡试落第后改业医，很有名声。后在武昌的楚王府工作，曾治好楚王长子的暴厥症，又曾用极简单的延胡末治好王妃久治不愈的胃痛。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楚王推荐李时珍到太医院工作，担任院判。但此说虽一再被人引用，却未能证实。一年后，李时珍托病还家，继续行医，同时编写图书。

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编写《本草纲目》。历时二十七年。万历六年（1578年）完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时珍病逝，年76岁，安葬在蕲州东门外雨湖南岸。他的著作传世的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还有《五脏图说》、《三焦客难》等书已失传。

“本草”是中药的总称，因为中药以草类为多。我国最早的本草书是《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氏撰，收药物365种。到了南朝，陶弘景编《神农本草经集注》，药物增至730种。《本草》历来是官修的，唐朝由大臣长孙无忌领衔，编成《新修本草》，收药844种，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药典。宋朝有《开宝本草》，收药增至983种，后来又修《嘉祐本草》，收药1 082种，又修《证类本草》，收药1 455种，附方3 000多个。

明朝弘治年间，由太医院使刘文泰负责修《本草品汇精要》，收药1 815种，附彩色插图，弘治十八年（1505年）完成，但没有刊行，书稿流落到了罗马。明代由私人修的《本草》还有好几种，李时珍的一种最为完善。

（二）内容和特色

李时珍编纂的《本草纲目》，共52卷，约190万字，共收药物1 892种，其中374种是李时珍新增的，书中共收古代及民间药方11 096个，附药物形态图1 160幅。

全书分为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每一部又分为若干类，全书共60类。每一种药物，先以“释名”定名称；再以“集解”叙述药物的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再以“辨疑”、“正误”考

订真伪，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再用"修治"说明炮制方法；用"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的性味和功用；最后是"附方"，收载经过选择的古今验方。

作者以实践为基础，对前代的本草进行了全面的证实、考订、补充。近1 900种药，一一考订，工作量惊人，光是考名称这一项就有不少困难。有些药物甲地叫这个名称，乙地叫另一个名称。还有些药物，其实是同一植株，但根部是一种药，叶子是另一种药，种子又是另一种药。有些药的异名有几十种之多，稍一不慎，就有误事的危险。他所根据的文献，计有"历代诸家本草"41种、"古今医家书目"277种、"古今经史百家书目"440种。经过考订，李时珍作了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例如历代本草都说常山可以治疟，三七可以止血，延胡可以止痛，都经证实无误。李时珍在"常山"条下选用了常山治疟验方20多个。又如古代认为水银可以炼药，服石可以长生。李时珍在书中，先引了若干文献，说这种说法古已有之，但他说："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表现出十分严谨的态度。

《本草纲目》的另一个特点是增加了374种新药，这些药大都是从外国传来的，或产于我国边地，以前不大注意。如葡萄、胡萝卜、南瓜、甘薯、豇豆、三七、茉莉、郁金香、香木鳖、樟脑、大枫子等。这些材料，为我国农业发展史记下了最详实的资料。

（三）《本草纲目》的出版

在李时珍生前，《本草纲目》以手抄的形式流传。万历十八年（1590年）出版商胡承龙表示愿意刊印，进展很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才完成。这时，李时珍已去世三年。胡承龙的本子称"金陵本"。同年，万历帝命各地献书，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把书献上，皇帝批了七个字："书留览。礼部知道。"算是对这部书的肯定。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江西巡抚夏良心倡议重刻此书，

得到不少人响应。这一次刻得很快，六个月就完成了，称“江西本”。(图19) 以后董其昌又重刻了一次，称“湖南本”。明代前后刻过多次。[1] 这部书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传至日本，日本学者林罗生得到一部后，献给德川幕府，于是在日本得到流传，从1637—1714年，日本有8种不同刻本，研究《本草纲目》的书有数十种。《本草纲目》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达尔文说这是一本“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李约瑟称赞这本书是“登峰造极的著作”。

图19
[明]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张鼎思刻本，即夏良心本、江西本。

三、《农政全书》的编著和出版

(一) 徐光启生平

《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祖父徐绪经商，父亲徐思诚曾参加抗倭武装。徐光启21岁时考取秀才，以后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从21岁到42岁（1582—1603年）先在家乡教书，多次乡试未中。34岁时，到韶州教书，次年又到浔州教书，结识了西方传教士郭居静，开始接触西方文化。36岁时乡试第一，声名大振，次年参加礼部会试不第，回到上海。39岁时因事去南京，会见利玛窦，进一步接受西方文化。这是第一阶段，还没有入仕。

从43岁到60岁（1604—1621年）。43岁时在北京参加会试，中进士第88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又迁赞善。在这17年中，他和利玛窦等一同翻译了一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等。撰写了一批政论，又训练新兵，并在天津、上海进行农垦，农垦面积达3 000多亩。这是他全面开展多方面社会实践的时期。

从61岁到72岁逝世（1622—1633年）。60岁时因训练新兵受掣，告老回上海。天启帝叫他“冠带闲住”，在家乡垦殖。崇祯

[1]《本草纲目》明代版本有：万历十八年金陵胡承龙本、万历三十一年江西布政夏良心本，此外还有万历三十四年福建杨道会本、崇祯十三年杭州钱蔚起本等。

帝接位，魏忠贤垮台，徐光启复出，再到北京，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要职。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修《崇祯历书》。

徐光启从小就在农村，深知农业的重要，青壮年和中年时长期从事垦殖，从国计民生的高度试种各种新品种，在北方种水稻、棉花，在南方种甘薯、芜青，在瘠地种救荒草，多方实践。他编撰《农政全书》是酝酿已久的。全书编次整理的时间可能是在60岁“冠带闲住”的时间。

（二）《农政全书》的内容

《农政全书》共60卷，约50万字。

全书分为12目。具体内容为：1.“农本”3卷，列举经史典故中重农的论述，其中第三卷是明人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2.“田制”2卷，其中一卷是徐光启著的《井田考》；3.“农事”6卷，介绍农耕、垦殖、农时方面的内容；4.“水利”9卷，介绍各地水利，还有他和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5.“农器”4卷，介绍农具的质料、形制、用途；6.“树艺”6卷，介绍谷类、瓜类、果类、蔬菜等种植经验；7.“蚕桑”4卷，介绍栽桑养蚕的经验，大都采自王桢《农书》；8.“蚕桑广类”2卷，介绍棉麻种植方法；9.“种植”4卷，介绍园圃、木材、药材的种植；10.“牧养”1卷，介绍禽、畜、蜂、鱼的养殖；11.“制造”1卷，介绍酿酒、建屋、衣服等；12.“荒政”18卷，引《救荒本草》14卷，还有徐光启的《备荒考》一文。

本书引征文献资料约八分之七，徐光启自己的著作约八分之一。征引的部分，有的全引，有的只取片段。他自己的见解，除了整篇的以外，都散见于引文编次之中，更多的是渗透在编纂体例中，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著述方法。清初刘献廷曾说：“其所述皆迥绝千古”，“人间或一引先生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

这本书包罗万象，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政治和经济、文献和口传、中国和外国、他人经验和自己体会，凡是农业方面的问题，无所不有。这本书之所以称为“农政”，而不称“农学”

或“农艺”，其原因就在于此。

（三）《农政全书》的出版

徐光启去世时，这部书还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关照孙子徐尔爵说：“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徐光启去世后，陈子龙从徐尔爵处借来原稿过录了一遍，送给十府巡抚张国维。张国维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治理太湖很有成绩，著有《吴中水利全书》，还刊刻过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达500余卷。他看到《农政全书》后，惊喜不已，就请陈子龙加工整理。陈子龙把60卷改为46卷，“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张国维便请他的好友松江知府方岳贡刊刻。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陈子龙的宅中平露堂付梓。这时，徐光启已去世六年了。《农政全书》正式出版后一再重印，17世纪传入日本，又传到朝鲜。其中的“蚕桑篇”被译成法、英、德、俄等国文字，“植棉”部分译成英文。李约瑟称赞这本书是“一部农业方面的卓越巨著”。

四、《天工开物》的编纂和出版

（一）宋应星简历

宋应星（1587—?），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和他哥哥应升同榜中举，宋应星名列第三。以后多次参加会试未中，便从事游历考察。

崇祯七年（1634年），宋应星出任江西分宜教谕，这是级别很低的“冷官”，月俸只有二石米，事情也不多。就在这段时间，他开始写《天工开物》，崇祯十年（1637年）完成。崇祯十一年（1638年），任福建汀州府推官，掌管刑狱审判。崇祯十四年（1641年）任亳州知州。明亡后，曾在南明任职。抗清失败后归宿无记，不知所终。

宋应星的著作传世的还有《野议》、《思怜诗》、《论气》、《谈天》四种。《野议》一书，收论文12篇，对明末时事有所评论。

（二）《天工开物》的内容

《天工开物》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记述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书籍。“天工”指自然规律，“开物”指人工，二者合起来共同作用，可以开创万物。全书3篇、18卷，约30万字，插图123幅，画面生动，细节精致。各卷的内容如下：

上编：卷一“乃粒”，讲谷物种植技术和灌溉机械；卷二“乃服”，讲养蚕缫丝和麻棉栽培；卷三“彰施”，讲染色技术，记24种颜色、7种染料；卷四“粹精”，讲谷物加工；卷五“作咸”，讲制盐；卷六“甘嗜”，讲制糖。

中编：卷七“陶埏”，讲制砖瓦、缸瓮、陶瓷；卷八“冶铸”，讲制钟、鼎、锅、炮、钱、镜、佛像；卷九“舟车”，讲车船的制造；卷十“锤锻”，讲冶铁、炼钢、冶铜；卷十一“燔石”，讲煤炭、石灰、硫磺的开采；卷十二“膏液”，讲油脂生产；卷十三“杀青”，讲造纸。

下编：卷十四“五金”，讲金银铜铁锡的开采和冶炼；卷十五“佳兵”，讲兵器制造；卷十六“丹青”，讲颜料生产；卷十七“曲蘖”，讲酿酒；卷十八“珠玉”，讲珍珠、玉石、玛瑙的开采。

全书重视实地考察，主张“穷究试验”。他提出了植物“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生态变异理论。还提出金属的不同比重、不同活泼程度，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特点来分离金属。书中有不少内容不见于其他记载。如蚕的人工杂交、用砒霜拌种杀虫、丹曲防腐、炼锌、大型铸件等。全书注重实用，记录了130多种技术经验数据，注明尺寸或分量。作者的眼光也很开放，介绍了朝鲜、日本、波斯、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有关技术。这本书的序言中正确指出“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现代著名科学家丁文江认为此书有五个特点：一是一反明儒重科举轻实用的陋习；二是以所见所闻作系统的记录，“通篇未尝引用一书”；三是着重数据和统计；四是根据事实说话，“破除迷信”；五是“多列事实，绝少议论，间有之，则精粹绝伦”。[1]

【1】引语见丁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卷跋》，刊《1911–1984年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三）《天工开物》的出版

《天工开物》是崇祯十年（1637年）写成的。宋应星有个同科考取举人的朋友涂伯聚，看到书稿后表示愿意刊刻，这是这本书的初刻本。稍后，书商杨素卿又重刻了一次，书首做了一段绝妙的广告："一见奇能。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这两种版本很快传到日本，但国内却很少流通。清朝修《古今图书集成》时，引该书十分之七，修《四库全书》时没有采用。民国初，国内学者找这本书，"遍索之厂肆无所得，询之藏书者均谢不知"（丁文江语）。但这时在日本却有一个"菅生堂本"流传。菅生堂本是根据明刻本翻刻的，印得不大好，插图都走了样。1926年，武进人陶湘据此重印，才返传回国。1952年，浙江宁波李氏墨海楼向国家献书，其中有该书的崇祯初刻本。1959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图20）

这本书在国际上有很高评价，19世纪在英、德、俄、意广泛流传。法国儒莲曾摘译成法文，书名为《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称赞它是"技术百科全书"。美国在1966年出版译本，书名是《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学》。

五、《徐霞客游记》的编著出版

（一）徐霞客简历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江苏江阴人。祖上是富裕之家，祖父徐衍芳时家道中落，父亲徐有勉时家道又复中兴。父亲是个古怪的人，绝意宦途，终身布衣，治圃自乐，常外出旅游。他的这种性格，对徐霞客有很大影响。

徐霞客从小在私塾读书，喜欢看舆地图经之类的书，对应举时文不感兴趣。19岁父亲去世。他的母亲王氏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徐霞客父丧期满后，王氏劝徐霞客外出游历。这时，徐霞客22岁，开始了游历生活。起初，游踪在近处，春出秋还。天启四年（1624年），徐母80岁，两人结伴到荆溪、勾曲去了一趟。次年，徐母去世。于是，徐霞客放志远行，东渡普陀，北历燕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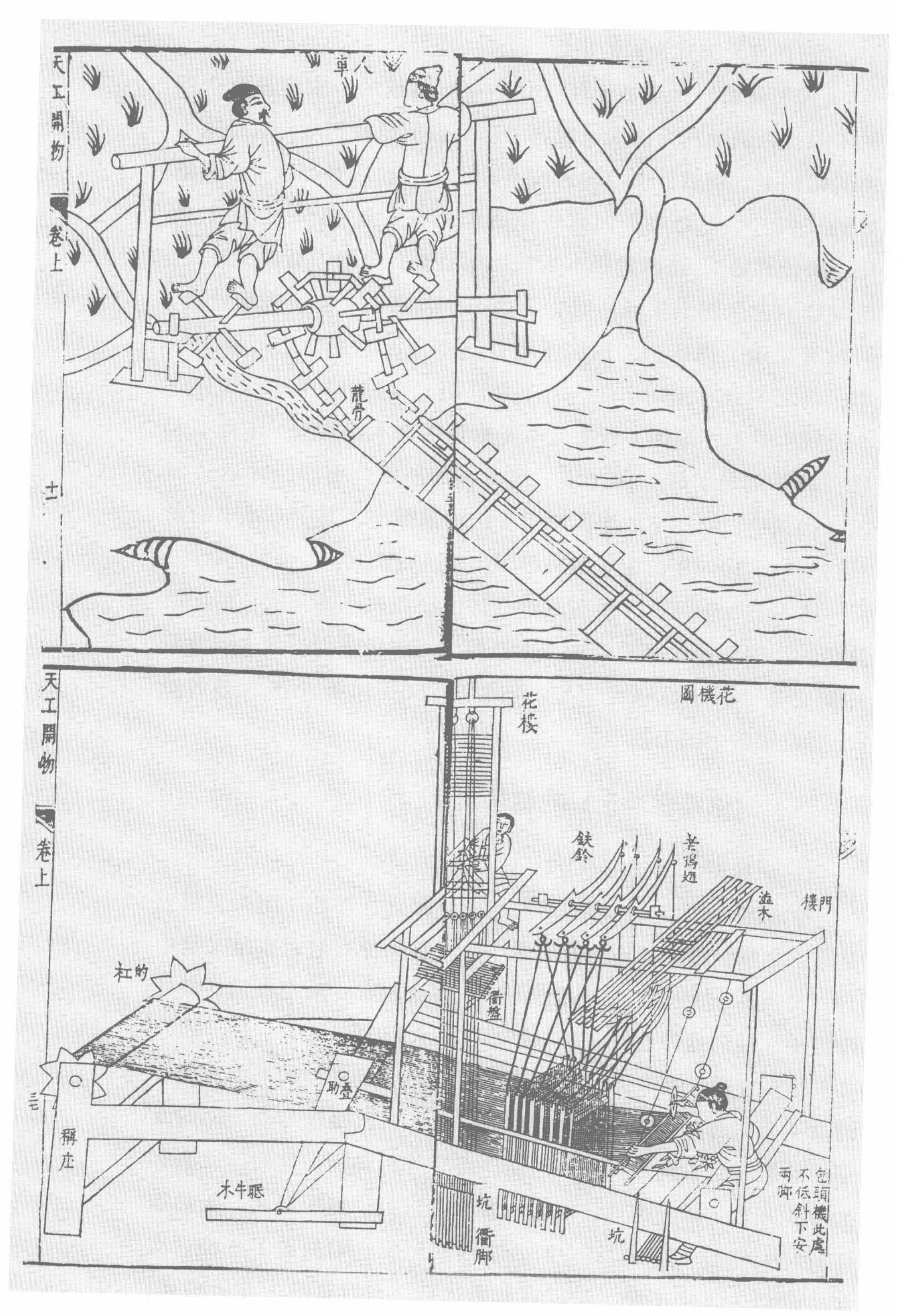


图20
[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人车”和“花机”。

南涉闽粤，西北攀太华之巅，西南至贵州边境。“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游行无碍”。他“持数尺铁作磴道，无险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饱，能与山魈野魅夜话，能襆被单夹耐寒暑”。[1] 一直到55岁，在云南患重病，纳西族木土司派人护送他还家乡，情谊感人。他还家时间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月，次年逝世。葬在江阴的马湾。

【1】[明]徐弘祖著、朱惠荣标注：《徐霞客游记标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二）《徐霞客游记》的内容

《徐霞客游记》的记载始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游天台山，终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十四日。前后共26年，约60万字。全书按日记载，大体蝉联，以游踪分成若干部分。

全书共4卷。“第一卷自天台、雁荡以及五台、恒、华，各为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记，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广一篇，次广西六篇，次贵州一篇，次云南十有六篇，所缺者一篇而已。”[2]

【2】《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史部地理类四。

各篇日记中间，夹有一些专文。它们是《盘江考》、《永昌志略》、《近腾诸彝说略》、《溯江纪源》（即《江源考》）、《鸡山志略》、《丽江纪略》、《法王缘起》等。日记的内容涉及山川、岩洞、峰峦、瀑布、温泉、动物、植物、矿产、农业、手工业、居民点、人口、交通、集市、民情、少数民族、边防等，几乎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一切方面。

（三）《徐霞客游记》的出版

徐霞客生前没有把日记整理成书。病中将日记托付给季梦良。徐霞客去世后，游记先由王忠纫手校，略为编次，接着由季梦良继续，崇祯十五年（1642年）完成。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被清兵攻破，日记遭到损失。季梦良再次整理时少了《滇游》的第一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徐霞客的庶子李寄（字介立，徐妾所生，徐去世后，妾改适李姓寄也改姓李）根据几种抄本整理，补进了《游太华日记》、《游颜洞记》、《盘江考》等文，这便是“李介立本”。乾隆年间，江阴人陈泓据当时多种抄本互校，撰写了《诸本异同考略》，留下了有关版本的珍

【1】见《徐霞客游记》徐镇序。

贵资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以抄本形式传布。“于时名人巨公，莫不乐购其遗编，当卧游胜具”。[1] 钱谦益曾致函汲古阁主人毛晋，说这是本“千古奇书”，要求刊行，后来未果。一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才由徐霞客的族孙徐镇正式刊印。这时，徐霞客去世已经134年。从原稿到抄本，再到正式出版，这个漫长过程是令人深思的。

《游记》的科学价值主要在四方面。一是对水道地理的考察。他对广西左右江，湘江支流潇、郴二水，云南南北两盘江以及长江江源的探索，都亲证目验，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写出了《江源考》等科学论著。特别是对长江江源的考察，纠正了长期以来的源于岷江的错误。二是对石灰岩岩溶地貌的考察，他一共考察了一百多个岩洞，踏勘了七星岩的15个洞口，详细记下了岩洞的有关数据。他厘定了溶洞、钟乳石、石笋等一系列名词，至今沿用。欧洲人对石灰岩的研究，是在以后一百多年。三是对地热现象的考察，寻访观察了西南地区的热泉、冒汽穴、硫磺塘等奇异现象。四是对气候南北差异的观察和论述，对植物生长和海拔、纬度的关系等物候学作了详细生动的描写，提出了“候同气异”的见解。

第五节　《径山藏》的编刊

一、编刊《径山藏》的缘起

《大藏经》篇幅巨大，《永乐北藏》收经籍1 657种、6 961卷，共要雕版180 082块，需要大量财力、人力和时间。历来刻藏，有皇室的“官板”，也有僧侣或信徒的“佛院板”。明代的《径山藏》，以佛教徒本身的力量为主，完成了《大藏经》的刊印，内容比《南藏》、《北藏》多出许多，在佛藏的刊印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径山藏》编刊过程可以概括如下：紫柏倡议，憨山支持，

紫柏的弟子密藏、法铠、法本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东南地区著名文人、官员在编辑校勘上积极帮助。经藏的刊刻以东南地区佛寺为主，早期曾在山西五台山刊刻了一部分，后来南迁，动员了东南地区不少地方的刊刻力量。花费了佛教徒们大量人力、财力，费时近百年，最后终于功德圆满。

编刊这部佛藏的主要佛教徒有以下几人：

紫柏真可（1543—1603） 法名真可，字达观，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十七岁在苏州出家，明末四大师之一。多次至北京、河南等地学习讲经。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南康太守吴宝秀拒绝执行政府的矿税令被捕，紫柏表示同情，被捕下狱。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在狱中圆寂。传世著作有《紫柏尊者全集》30卷，他的《长松茹退》有《四库全书总目》释家类存目著录。

憨山德清（1546—1623） 法名德清，号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十二岁时在南京报恩寺出家，明末四大师之一。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神宗不满太后为佛事耗费巨资，迁怒憨山，把他逮捕入狱，充军广东雷州，一路依然受到信徒欢迎，他穿着囚服登台说法，开启岭南佛教风气。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又因紫柏的事受牵连，后来被释。天启三年（1623年）圆寂。他儒释兼通，主张儒释道三教调和。著作二十余种，都被收入《径山藏》的"续藏"中。他是紫柏的积极支持者。

密藏 名道开，江西南昌人。先儒后佛。先在南海，因向往紫柏，主动归来，追随左右，致力于《径山藏》的刻印，劳瘁而终。《径山藏》因此有"密藏板"之称。

法铠 字忍之，号澹居，俗姓赵，江阴人。三十三岁时因倾慕紫柏而剃度。紫柏死后，他矢志实现紫柏的遗愿，募化化城作为刻经藏板处。法铠之后，又有法本（又名幻予）继续出力。

《径山藏》的编刊，得到东南地区官员和文人的鼎力相助，其中著名人物有：

冯梦祯 字开之，嘉兴人，南京国子监祭酒，藏书家，他曾多次资助，并参加校勘。

陆光祖　字与绳，平湖人，吏部尚书。

曾同亨　字于野，江西吉水人，工部尚书。

瞿汝稷　字元立，常熟人，太仆少卿，辰州知府。

吴用先　浙江布政使，他曾捐俸在径山造了二十多间藏书板的房子。

此外还有钱谦益、陈继儒、毛晋等人。

紫柏等人发愿刊刻增补佛藏的动因有三：一是鉴于南北藏日久板坏，请经很困难；二是鉴于有许多佛学的新著作、新译本，应该补充进去；三是想采用“方册装”来替代“梵夹装”，使佛藏减低成本，便于阅读。

二、《径山藏》的编刊

《径山藏》的编刊地点，经过了嘉兴、山西五台山、嘉兴周围地区的历程，前后过程很长。

第一段——径山。从万历七年至十三年（1579—1585年），约6年。这一段时间里，紫柏发起，憨山合作，冯梦桢也支持。刻书地点在余杭长乐境内径山。具体地点有寂照庵、兴圣万寿寺、径山寺、化城寺、化成院，刻成了一部分。

第二段——山西五台山。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1589—1592年），约三四年。紫柏的弟子密藏，为了刻经的事，到山东崂山会晤憨山，晤谈两旬。这件事被神宗的生母李氏知道，表示愿意相助。紫柏谢绝，说“宜令率土沾恩，师愿以一身任事”。于是撰文募化，立条规格，在山西五台山妙德庵开雕。后来，因那里天气寒冷，终年积雪，损坏板片，不便工作，远不如径山合适。于是把刻好的数百卷的板子以及一些器材南运，在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一年（1592—1593年）南迁到径山寂照庵。

第三段——径山。万历二十一年至明末（1593—1644年），约四五十年。这段时间里，紫柏的徒弟法铠和浙江巡抚吴用先共同主持。吴用先建屋二十间也是在这段时间。在这四五十年时间里，工作时断时续。刻书的地点也逐渐扩展到嘉兴周围。

第四段——径山。清顺治元年至康熙十五年（1644—1676年）约三十年。这段时间，由贵州赤水继庆和尚等继续工作。他鉴于“已刻者十之八九，未刻者十之一二耳，不期半载可完”，便继续编刊，在这段时间里，得到文人藏书家萧士瑀、萧士玮、杨仁愿、毛晋等的帮助。在金沙、苏州、金坛、松江、常熟等地刻的版子，也陆续向径山集中，终于完成了全部工作。

《径山藏》的刊刻步骤不是从“正藏”开始依次进行，而是从“续藏”开始（万历七年，1579年），过了好几年，才刻“正藏”（万历十八年，1590年）。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正藏”虽然流行不广，毕竟已经问世，而“续藏”则是新编的，所以要先印出来。

全部《径山藏》从万历七年（1579年）开始，中间时刻时停，一直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全部完成，共90多年，这在出版史上是少有的。《径山藏》的完成，经历了几代僧俗人士的努力，参加刻书的工人来自江浙闽等五个省，有署名的刻工387人、书写工84人、绘画工3人。有些工人毕生为《径山藏》工作，书写者徐普，写经37年，陈馥林、陈美璋父子二人都为经书刻版。

《径山藏》的全部内容是：

正藏：1 665种，7 829卷，装成211函。

续藏：252种，1 820卷，装成90函。

又续藏：217种，1 195卷，装成43函。

合计：2 134种，10 844卷，装成344函。[1]

收入“续藏”和“又续藏”的书大都是明代人的佛学专著：佛教史籍，如如惺的《大明高僧传》8卷、明河的《补续高僧传》26卷；佛教禅宗传灯录，如玄极的《续传灯录》36卷、屠龙的《佛法金汤录》、夏树芳的《名公法喜志》4卷；还有著名禅师的讲道语录等。

《径山藏》的发行也采取“请经”的办法，天下寺院凡有需要的要到嘉兴的楞严寺去接洽，举行郑重的请经仪式。因此之

【1】此为故宫藏本的统计数。另有云南图书馆藏本，种数和卷数与此均有出入。

故，这部经也称“嘉兴藏”。

《径山藏》的装订方式采用方册装，这在出版史上是一件大事，将在下面第八章第三节作专门介绍。

第六节　别集和总集的纂辑

一、别集的编纂

别集是收一人的作品为一书，通常以诗文为主，也收论说、奏议、书信、语录等文，至于个人所写的解经、历史、小说等类专著，一般不算作别集。明代私家编撰了大量别集。《千顷堂书目》共收15 600多种书，其中6 000多种是别集，《明史·艺文志》共收5 033种书，其中别集1 200种。别集的编纂者大都是作者的学生、子孙或好友、乡人，也有本人自编的，唐代的白居易就几次编过自己的诗文集。编纂时大都按年代或文体排次，编纂所花的功夫主要是搜集、核实、排序等。编纂的体例大都参照《昭明文选》，先诗后文，或先文后诗，按文体、按年代排列。有些别集因有特殊原因，编纂过程曲折艰辛。别集往往加上大量序文，说明编选原委，或加上一些推崇之词。

下面介绍几种明代的有代表性的别集的编纂经过，说明别集的编辑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得到一种完美的本子，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一) 从禁绝到重见天日：方孝孺《逊志斋集》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浙江海宁人，人称正学先生。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帝讨燕王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笔。燕王入京后，命他草接位诏，不从被杀，牵连致死847人。先是，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方氏任蜀藩教授时，曾自编过一本集子，未付印。靖难被杀后，他的文集当然不能出版，“藏孝孺文者罪至死”，幸而有门人王稌录了一部《侯城集》，手抄流传。天顺七年（1463年），临海教谕赵洪才搜集“遗文二百六十首”，捐

俸在成都刊印成书，称“蜀本”。成化十六年（1480年），黄岩人黄孔昭、谢铎又从缙绅家“遗藏得文千二首”，合为30卷、拾遗10卷，由海宁知县郭缙等重刻，称“邑本”。这本书的缺点是博而未精。正德十五年（1520年），台州知府顾璘删定为文20卷、诗2卷，刻置郡斋，称为“郡本”。嘉靖四十年（1561年），提学宪副范惟一和唐尧臣、王可大等重加校订刊行，“盖集至是，四易版矣”。万历四年（1576年），建文帝重新被写进历史，方孝孺获平反，奉祀于南京表忠寺，他的文集也又重修了一次，上面署名校对的有12人。在多次搜集整理过程中，既要寻找遗佚，又要辨别真伪，十分艰苦。这便是明朝一代出版方孝孺文集从禁绝到重见天日的全过程。从禁绝到整理成完本，经过170多年。

（二）从不完善到完善：归有光《震川先生集》

归有光是著名散文家，为文朴素简洁，善记事抒情。最初，归有光的门人王子敬在福建建宁县令任内，刻了一部文集，称“复古堂本”，只有上下两卷，文既不多，流传也不广。万历年间，归有光的嗣子子佑、子宁刻“昆山本”，32卷。又有归有光的族弟道传刻了“常熟本”，20卷。这两种本子都收文350篇左右，有无参差，各自流传。明末，钱牧斋认为这两种本子都不完善，疑有杂伪，且有遗漏，就重加编纂，得596篇，编为30卷、又外集10卷。到了清代，归有光的曾孙归庄等又重加整理，加上“凡例”。在康熙年间重刻，但不久就受到汪琬的批评，认为其中有改窜之处。此后，归有光的各种选本、注本杂出，有数十种之多。从最早的两卷本，到清朝嘉庆年间的《震川大全集》50卷，愈收愈齐全。现在通用的是归庄的本子。这是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

（三）从“各自为书”到定本：王阳明的文集

王阳明，字守仁，又字伯安，余姚人，平宸濠之叛，官至兵部尚书，谥文成。他的学说，对明代中后期和后世影响极大。他的门人听讲时作记录，各自保存了不同的记录稿和通信稿，“各自为书”，因此有多种文集。如：

1. 嘉靖十四年（1535年）闻人铨刻本《阳明先生文录》24

卷，包括《文录》5卷、《外集》9卷、《别录》10卷。

2.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范庆吴郡刻本《阳明先生文录》20卷，包括《文录》17卷、《语录》3卷。

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按浙，他认为王阳明著作各自为书，不利于王学的学习和传布，“惧夫四方之学者或弗克尽读”，便“汇而寿诸梓，名曰全书”，这便是后来的《王文成公全书》38卷。署名汇辑整理的有徐曰仁、钱洪甫等人。

同时，又有其他各种选本、注本。如《文成先生文要》2卷、《阳明先生文粹》11卷、《阳明先生文选》4卷本和8卷本、《阳明先生要书》8卷、《阳明先生集抄》16卷等。崇祯六年（1633年）金阊溪香馆刻陶珽刊本《王文成公文选》8卷。题“门人王畿编述、后学李贽删订、后学钟惺评点”，这是钟惺十八种评点本之一种。王阳明集的出版说明了从“各自为书”到勒成定本，又出版选注本的经过。

二、各种文体的总集的编纂

汇聚多人的一类或多类著作成为一书，便是总集。汇聚纂辑时，有一定的标准，最常见的是以同一文体或同一时代为标准。如偶桓编的《乾坤清气集》14卷，收元代的诗；李蓘编的《宋艺圃集》22卷、《元艺圃集》4卷，分别收宋代288人、元代109人的诗。有些总集以一个家族为收录标准，如《文氏五家诗》收文徵明家几代人的诗。有的以同一地区、同一流派为收录标准，如《广州四先生诗》4卷，收明初黄哲等四个粤东诗人的诗；《闽中十子诗》收明初林鸿等十位闽人的诗；云南木公收录明初流寓到云南的20人的300多首诗，成《沧海遗珠》一书。

有些总集不只是简单的以类相聚，而且渗透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加上弁言、小序、识语、品评、作者小传等材料，成为有价值的选本。明代总集中最为人注意的有：

（一）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

明初，已经有朱佑选编过《八先生文集》（书不传），归有

光也有《八大家文选》39卷。茅坤在这基础上重新编纂成书，164卷，杭州初刻。后来，又经茅坤的孙子茅著订正重刊。这部书对每一家都有“引”，每一文都有“评”。后人对此书虽很推崇，但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它“疏漏尤不可枚举”。清初黄宗羲曾列举其毛病，说它只能算是“小小结果”。但这本书还是深受后人欢迎，因为八家的文集内容浩繁，遍读为难。书肆中的选本又漏略太甚，而“坤所选录尚得繁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唐宋派的文学主张深蕴在文章的取舍和评语之中。这部文选“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1]“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茅坤别号鹿门）者”。[2]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总集类四。

【2】《明史》卷二八七《茅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二）高棅编《唐诗品汇》90卷、《拾遗》10卷。

收入682人、诗6 823首。诗的编排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以体裁来分，即按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来分；第二个层次以时代来分，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两层都是常见的分法，并没有什么新意；第三层是按“流变”来分，分为九格，即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这样，繁多的唐诗就可以各就其位，秩然有序。这本书还有完善周密的附录和注释，对一代诗的评论放在书首，对一个人的评论放在姓氏之后，对一首诗的评论放在本诗之前，对一句一字的评论放在该句该字之后，有条不紊。后来，高棅又编了一本精选本《唐诗正声》。这两部唐诗选“终明之世，馆阁宗之”。[3]（图21、图22）

【3】《明史》卷二八六《高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三）张溥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明初，张燮曾编汉魏作家的作品成《七十二家集》，在此基础上，张溥又从《古诗纪》、《历代文纪》中广收博采，得103家、118卷，收入汉魏六朝诗文集，“州分部居，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概”。[4]张溥在编集此书时，以“兴复古学”为手段，“乘时鼓运”，以挽救当时“文章日衰，而道亦以散”的现实社会，指出学习汉魏六朝的文学，是要吸收其“先质后文，吐华含实”的精华，抛弃“陈季之浮

【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总集类五。



唐詩品彙序

天地元氣之精英鍾乎人發而為詩至唐蘊六百家作者固難選者尤難爾唐歷三百餘年有始終淳漓之異故聲文亦隨而降有能襲群作辨衆體得於大全而無憾者斯愈愈其難矣譬閱英靈間氣極玄三體等集非無足觀法然得於此而或遺於彼繼是而選者落落也近世襄城楊士弘所編唐音其始終正變區別特異諸選然亦未免遺珠之歎信乎知言之難也龍門高廷禮氏性嗜詩取唐人為式凡唐之遺編斷什散落人間者搜摭悉盡初欲望洋罔知攸濟

引用諸書

正詩所集

唐諸家詩集　國秀集 天寶三載芮挺章編

弘秀集　篋中集 唐元結編

丹陽集 唐丹陽進士殷璠編　河岳英靈集 殷璠

中興間氣集 唐高仲武編　極玄集 唐姚合編選

又玄集 唐韋莊選

文苑英華 宋太宗詔李昉等纂文章千卷內詩二百卷

文粹 宋姚鉉選　文鑑 宋東萊呂祖謙伯恭選

觀瀾文選後集　文章正宗 宋真西山德秀編

图21
《唐诗品汇》

可眠東過當春渚樂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烟釣時如有待釣罷應忘筌生事在林壑悠悠經暮年于今七里灘遺跡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

唐詩正聲卷之一終

唐詩正聲卷之二

新寧高棅編選

五言古詩二

李白

古風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

图22
《唐诗正声》

薄，周隋之骈衍”。对百三家其人其文，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家家有题辞，人人有论述。分开来看是作家各论，合起来则成为一部汉魏六朝文学简史。

总集的编纂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追求齐全、完整、系统。冯惟讷的《诗纪》，上薄古初，下迄陈隋，全书156卷。后来，梅鼎祚为了和这部书配套，编成《文纪》一书，也是从上古到陈隋，250余卷。两部书，一诗一文，力图尽收上古至隋朝的全部诗文。这两部书虽然有“真伪错杂，抵忤舛漏”的毛病，但诗文家都十分看重。收得最丰富的还有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506卷；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则多达1 027卷，成为清代编《全唐诗》的基础。

与力求齐全相反，总集的编纂者又从另一角度着眼，追求少而精，特别有意义的是，有些编纂者先编纂了力求完备齐全的总集，接着又从中选出精编本，这种精编本格外受人欢迎。高棅在编了《唐诗品汇》之后，又从中精选140人的931首诗，成《唐诗正声》一书，两部书同时流行。黄宗羲从五六千部文集中，先编成《明文案》一书，217卷，后来又收到了三百多部文集，“汗数牛而归”，编成《明文海》，480卷，明代的文章从此有了全集，但数量太多，刻书者视为畏途，于是又从中精选了一本“家传简捷之本”，名《明文授读》，62卷。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精的过程。学者认为“尽收精择，各有攸当”。

第七节　戏曲的创作和改纂

一、明代剧本的编印

明代的戏剧有北方的杂剧和南方的传奇两种。北南两大剧种互相影响，北剧南流，南戏北行。不少剧作者既能作杂剧，也能作传奇。北南两大剧种主要是所唱的曲调不同，所演的故事则往往相通。一些流行的故事，大都既有杂剧，又有传奇。演戏所用

的剧本，起初主要记台词，说白和动作比较简单，只有一些提示，这类书被称为“当场之书”；脱离演出专供阅读用的剧本，称“案头之书”。

剧本的创作、编纂，都是爱好戏剧的文人完成的。明初剧本刊印很少，一些书目上也少有记载，直到明中后期书目上才见到，往往只是抄本而不是刻本，可见剧本是一种后起的出版物，到明代后期才兴盛起来。

明代剧本编纂和出版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剧本的专集，一个戏印成一本书，这是基本形式；第二种形式是剧本的总集，如《元曲选》收入元曲100种，毛晋编的《六十种曲》收传奇60种；第三种形式是折子戏的选集，黄文华的《词林一枝》收20个折子，胡文焕的《群英类选》收折子157种，清代的《缀白裘》收明清折子493个，是收得最多的。

除了以上剧本之外，明代还出版了不少戏剧理论书。唱法研究和格律研究有魏良辅的《南调引正》、沈宠绥的《度曲须知》，编剧理论和表演理论有徐复祚的《曲论》、孟称舜的《古今词统序》，品评理论有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还有种种剧本的评点。

明代剧本一共出版了多少，很难确指。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收明代戏文36个、杂剧362个、传奇740个，共1 138个，但所列是剧目数，而不是出版物数。因为有些戏只有剧目，却没有出版，没有成为图书。据庄氏的统计，在1 138个剧目中，刊印成书者为354种（不同版本533种），这说明在戏剧中，大多数只在舞台上演出，没有成书。

二、剧本创作出版的热点

所有文艺作品都追求“教化”和“娱乐”两种效果，明代戏剧也不例外。一千多种剧本的宗旨，都可以从这两方面找到答案。

不少作品追求传统的伦理道德。丘濬的《五伦全备记》宣传五伦，沈受先《龙泉记》标榜节义忠孝，郑若庸的《大节记》认

为仁孝义三者是为人的大节，方谕生的《忠孝节义》剧名就说明了旨意，历史上不少名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大都被编成戏剧。

歌颂真诚爱情的戏，明代也很多，卓文君的故事、芙蓉屏的故事、人面桃花的故事，都有好几个剧目。其中烟花女子的悲欢离合，更有大量作品。写陈妙常、潘必正的戏有十多种之多。

神仙戏数量也不少。如王子一的《刘晨阮肇误入天台》、谷子敬的《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朱权的《冲模子独步大罗天》等。刘君锡的《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宣传因果报应，这本戏后来被译成法文。

除了以上这些常见题材之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明代有不少反映时事的戏。丘濬的《双忠记》写靖难之役，无名氏的《王阳明平逆记》写王阳明平定朱宸濠的故事，许以忠的《三节记》写辽东战事，沈应召的《去思记》写抗倭故事。魏忠贤倒台后，剧坛上出现了大量戏剧。除了王应遴的《清凉扇》以外，还有三吴居士的《广爰书》、白凤词人的《秦宫镜》、穆成章的《请剑记》、高汝拭的《不丈夫》、陈开泰的《冰山记》、张岱的《冰山记》、清啸生的《喜逢春》、范世彦的《磨忠记》、盛於斯的《鸣冤记》、阳明子的《冤符记》等，从不同角度抨击魏忠贤。

不同版本的“中山狼”故事，是又一种取向。先是康海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据说这是讥刺李东阳的。正德初，李东阳上疏弹劾刘瑾入狱，刘瑾必欲杀之。李东阳写了张条子给康海“对山（康海的字）救我”。康海就去谒见刘瑾，刘瑾正以不能结交康海为憾，便上奏赦了李东阳。后刘瑾败，康海因牵连免官，李东阳却不能为康海作辩白。于是康海作了《中山狼传》。后来，又有王九思作《中山狼》、汪廷讷作《中山救狼》、陈与郊作《中山狼》。祁彪佳说，他们都是“借中山狼唾骂世人”。[1] 有趣的是，后来又有人作《报恩虎》一戏，演老虎知道报恩。祁彪佳说：“可作中山狼针砭，然此正言之，又不若《中山狼》反言之。”[2]

戏剧中翻案和反翻案往往闹得很凶，或者用写“续编”的办法寄托意愿。最著名的《西厢记》和《琵琶记》，就曾被多次翻案。周公鲁的《锦西厢》写红娘代莺莺嫁给郑恒，结果是“翻改

[1] ［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对各剧的附注。

[2] ［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对各剧的附注。

面目，锦簇花攒”。黄粹吾的《升仙记》更离奇，剧中写迦叶尊者点化张生、莺莺、红娘，结果三人都悟道。“王魁负心”的故事也有种种翻案文章，如《王魁不负心》、《风月囊集》等。

三、对剧本的种种修改

各种图书在重刻翻印时，都力求保存原来面目，不能由印行者随便改动，唯独剧本不同。一本戏在演出时常标榜“新编”，在情节上出新，以吸引观众。不同版本的戏剧，更被人改成各种面貌。这是戏剧图书出版的特有现象，十分值得重视。

修改的出发点有二：一是从伦理着眼，修改故事情节和人物忠奸，主题思想起了变化；二是从艺术着眼，使故事情节更合理，针线更细密，文词更优美，唱腔更适合演出。这种对剧本的修改，在戏剧史和出版史上，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伦理的修改

1. 对《西厢记》的修改

明代正式刊印的《西厢记》有六七十种之多：

1957年出版的傅惜华编著的《元代杂剧》中，收录《西厢》41种，清代又有38种，还收曲谱8种、日文译本5种。

1980年蒋星煜著《论徐士范本〈西厢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第1期），文中介绍明刊本《西厢记》38种。

1970年，日本人传田章《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中著录《西厢记》明代版本有66种，这是著录得最多的资料。

《西厢记》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金台岳家刊本，书名是《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五卷》。

在诸多的《西厢记》中，故事情节和人物面貌有了不少变化，有所谓“六幻”的说法，“幻”就是变化，意思是《西厢记》有过六次重大的变化。这是崇祯年间“闵遇五本”提出来的说法。这“六幻”指：唐元稹《莺莺传》的“幻因”，金董解元《西厢记搊弹词》的“搊幻”，元王实甫《西厢记》的“剧幻”，元关汉卿续《西厢记》第五本的“赓幻”，明李日华《南西厢记》

的“更幻”，明陆采《南西厢记》的“幻住”。

在各次变幻中，老夫人、张生、莺莺、红娘等人的性格，都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最后结局的情节、张生的态度等，变化极大。后来还有周坦纶的《竟西厢》、研雪子的《翻西厢》、无名氏的《翻西厢》、查继祖的《续西厢》等，不一而足。在各种文学史中，都有具体的分析。

2. 对《琵琶记》的修改

《琵琶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变化更大，不过这个变化在明朝以前已经完成，并且定型下来。《琵琶记》版本很多，流传较多，明刻本有十多种。最早的戏文是《赵贞女蔡二郎》。金院本中有《蔡伯喈》一种，记赵五娘咽糠、蔡伯喈负心的故事，结果是“马踹赵五娘，雷震蔡伯喈”。元末的高明把这个戏改为“有贞有烈赵五娘，全忠全孝蔡伯喈”，剧名改为《琵琶记》，替蔡伯喈翻了案。剧本的结局是一夫二妻，蔡伯喈娶牛氏、赵氏，化解矛盾，以维持风化。

朱元璋统一中国后，独独看中这部修改过的“全忠全孝”的《琵琶记》。他说：“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1]《琵琶记》因而在明朝获得长久而普遍的流传。

[1]［明］黄溥：《闲中今古录》。

在我国戏剧史上，像《琵琶记》这样的修改还有不少。关于宋代词人柳永的戏，也是如此。柳永戏本来是一个相当恶浊的戏，在明代把情节改定为风流才子，成人之美。

(二) 艺术性的修改

修改的另一种情况是对剧本作艺术性的改动。明末，南方戏剧界有临川派和吴江派两个派系。临江派以汤显祖为首，还有吴炳、孟称舜等人；吴江派以沈璟为首，还有吕天成、叶显祖、冯梦龙、袁于令等人。临川派主张作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受形式格律的束缚，强调作品的内容，所以又称“文采派”。吴江派主张创作要和演出相结合，讲究曲调的格式、音韵、平仄，强调作品的形式，所以又称“格律派”。

在争论中，吴江派的作家们不单按自己的主张创作传奇，还常常根据演出的需要，去改临川派的作品。汤显祖的《牡丹亭》，就被吴江派的沈璟、吕玉绳、吕天成、徐日曦、臧懋循、冯梦龙等人修改过。汤显祖为此十分恼火，说："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做的意趣大不同了。"[1] 吴江派指出汤显祖的原作不合韵律，不能唱。汤显祖却说："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1]［明］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

这场争论起初十分激烈，势如冰炭，"水火既分，相争几于怒詈"。后来，汤词沈律趋向融合，得出了"两者合则并美，离则两伤"的结论。[2]

[2]［明］茅瑛：《题牡丹亭记》。

因为这场争论，增加了不少剧名相同、作者不同、内容有差别的不同版本。《牡丹亭》一剧，就有沈璟的《窜本牡丹亭》(又称《同梦记》)、沈伯英的《合梦记》、冯梦龙的《三会亲风流梦》，此外还有吕玉绳、臧懋循的改本。到了清朝，《牡丹亭》演出时所用的剧本，都不是汤显祖的原本，而是冯、臧的改本。

冯梦龙编写的《墨憨斋定本传奇》，最可以说明这种修改情况。这套书共14种，其中《双雄记》、《万事足》两种是冯梦龙自己创作的，其余12种，都是改别人的作品。改动的12种具体情况如下：

1.《新灌园》张伯起著，龙子犹（冯梦龙）更定。

2.《酒家佣》陆无从、钦虹江著，龙子犹更定。

3.《女丈夫》（上）张伯起、刘普元著，龙子犹更定。

《女丈夫》（下）张伯起、凌初成著，龙子犹窜定。

4.《量江记》聿云氏著，龙子犹评定。

5.《精忠旗》李梅实著，龙子犹详定。

6.《梦磊记》史叔考著，龙子犹详定。

7.《洒雪堂》梅孝已著，龙子犹窜定。

8.《西楼楚江情》袁白宾著，龙子犹重定。

9.《三会亲风流梦》汤显祖著，龙子犹更定。

10.《邯郸记》汤若士著，龙子犹更定。

11.《人兽关》一笠庵著，龙子犹窜定。

12.《永团圆》一笠庵著，龙子犹窜定。

上列剧本原来都是他人创作，冯梦龙做的工作是“更定”、“窜定”、“重定”、“评定”、“详定”，意思无非都是修改。经过修改后重新刻印，剧本类的图书就大大增加了。

第八节　丛书的编纂

一、明代丛书概貌

丛书的编纂比类书要滞后得多。一般认为，第一部丛书是宋朝的《儒学警悟》。这部丛书分量较少，影响不大。具有真正意义的丛书是宋朝的《百川学海》和元朝的《说郛》。

《百川学海》，南宋左圭辑。收唐宋人杂著100种（间有少量唐以前作品），174卷，分为10集，每集10种，取扬雄“百川归海，而至于海”为名。所收100种书都是全书收入。陶湘说这部书“开从来汇刻之风，为后世丛书之祖”。

《说郛》，元末明初陶宗仪辑。他从千余种书中辑取成100卷，取扬子“天地万物郭也，五经众说郛也”之义，取名《说郛》。所收不是全书，或删节，或摘录。《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虽经窜乱，崖略终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编，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固亦考证之渊海也”。[1]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子部三十三杂家类七。

《百川学海》和《说郛》这两种丛书都是在一个总名下，集合多种书籍，其不同之处是一个录全书，一个有删节。以后的许多丛书，都不出这两种做法。

明代丛书事业有很大发展，原因是：1. 明代小本子书很多，客观上有汇聚起来的需要；2. 印刷力量发达，印刷丛书并不费事；3. 藏书家众多，资料相对集中。

《中国丛书综录》共著录明代丛书355种（汇编112种、类编243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明代出版的丛书现存214种

（复本不算）。这两种书目所载出入颇大，原因是对丛书的理解有宽狭义之分。有人认为，丛书必须包括经史子集四类中的二类以上；还有人认为丛书必须收录全书，如果有删节，便不能算是丛书。因为所见不同，统计数字当然大不一样了。《四库全书总目》对丛书的定义是"以数人之书为一编，而另题以总名者"，说得在理。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得更简明："统群书为一书"，也清楚明白。现在一般的理解是：在一个主题下，收集不同部类的书，便是丛书。收集一个部类的书，也可以叫丛书（如《四十家小说》、《六子书》），一个家族的书也可以叫丛书（即家集丛书），一个人的多种著作，也可以叫丛书（即自著丛书）。

明代出版的丛书，可以按嘉靖前后两段来讨论。嘉靖前出版的丛书，大都依《百川学海》和《说郛》的格局，所收主要是杂著小品，如《续百川学海》，吴永辑，113种、141卷，大都是汉魏六朝唐宋元作品；《古今说海》，陆楫辑，135种、142卷，以宋人笔记小品为主；《虞初志》，汤显祖辑；《顾氏文房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均顾元庆辑；《烟霞小说》，范钦辑。此外，在这段时间里的各部类丛书还有：朱升《小四书》、毕效卿《五雅》、袁褧《金声玉振集》、顾春《世德堂六子》、许宗鲁《六子书》、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张逊业《唐十二家诗》、范钦《范氏奇书》等。

嘉靖以后出版的丛书，综合性的有程荣《汉魏丛书》、何允中辑《广汉魏丛书》、李栻辑《历代小史》、王文禄辑《百陵学山》、吴琯辑《古今逸史》、胡维新辑《两京遗编》、周履靖辑《夷门广牍》、商濬辑《稗海》、胡文焕辑《格致丛书》、钟人杰、张遂辰辑《唐宋丛书》、赵标辑《三代遗书》、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笈》、毛晋辑《津逮秘书》等。

明代后期出现了许多专门的丛书，专辑一个时代的作品有高风鸣辑《今献汇言》收明人作品39种，沈节甫《记录汇编》收明人野史笔记121种；专收某一部类书的有周子仪辑《子汇》收唐以前子书24种；专收某一地方的丛书如樊维城《盐邑志林》收历朝浙江海

盐人作品40种；还有专收某种文体书的丛书，如臧懋循《元曲选》、赵琦美《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沈泰《盛明杂剧》等。

二、明代最著名的几种丛书

1.《金声玉振集》　袁褧辑，51种、6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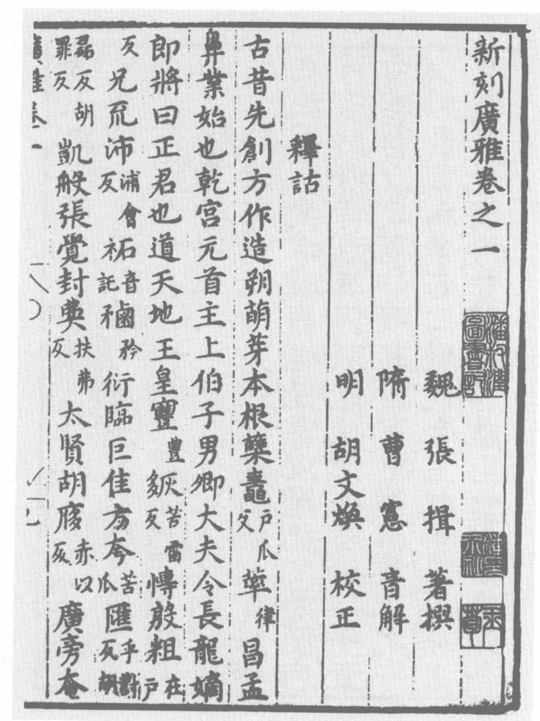
收明代史料，分为九类：皇览、征讨、纪乱、组绣、起变、考文、丛聚、水衡、撰述。前八项是史事，如，《国初事迹》、《平吴录》、《北平录》等，末一项是学术。嘉靖十九年（1540年）袁氏嘉趣堂自刻。(图23)

图23
［明］袁褧纂辑的丛书《金声玉振集》中的《帝王纪年纂要》。

2.《汉魏丛书》　程荣辑、何允中补，76种、454卷

最早为何镗辑，收汉魏南北朝罕见史料。原拟收百种，未果。后程荣选其中38种、251卷刊行，其后何允中又增至76种、454卷。明代有刻本。(图24)

图24
［明］程荣纂辑的丛书《汉魏丛书》序。


新刻廣雅卷之一

魏 張揖 著撰

隋 曹憲 音解

明 胡文煥 校正

釋詁

古昔先創方作造朔萌芽本根櫱鼃戶瓜反𦵔律昌孟

鼻業始也乾宮元首主上伯子男卿大夫令長龍嫡

郎將曰正君也道天地王皇豐豐䵾苦雷反㥈般粗在戶

反兄㐫沛浦會反祏音託䄙矜衍臨巨佳方夸苦瓜反匯手

磊反胡罪反凱艐張覺封奭扶弗反太賢胡膢赤以反廣旁奄

廣雅卷一

图25

[明] 胡文焕纂辑的丛书《格致丛书》中的《广雅》。

3.《百陵学山》　王文禄辑，100种、119卷

王文禄，浙江海盐人。《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为《丘陵学山》，隆庆刻本，收74种；《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明世学山》，收50种；万历十二年（1584年）刻本称《百陵学山》，收100种、119卷。内容有明代学术、农业、风俗等，也有王氏自著。

4.《纪录汇编》　沈节甫辑，121种、216卷

沈节甫，浙江乌程人。该书收明代野史杂记，1—9卷为“御制诸书”，10—30卷为“有关圣躬者”，31—66卷为“方舆勘定、郡国敉定”，67—96卷为“鸿猷录”，97—123卷为“名卿绩记”，124卷以下为“齐谐诸怪”。万历四十五（1617年）年刊行。

5.《格致丛书》　胡文焕辑，186种、449卷（图25）

胡文焕，浙江钱塘人，所刻丛书还有《百家名书》、《寿养丛书》、《胡氏粹编》等。《格致丛书》的分类和种数，各书所记不同。《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初编四十六种，二编三百三十四种”，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181种，《中国丛书综录》著录168种。所记不一的原因是当年刻书时随收随刻，没有定规。最早版本为万历三十一年，收186种、449卷。

6.《宝颜堂秘笈》　陈继儒辑，234种、475卷

陈继儒，南直隶华亭人。《宝颜堂秘笈》共6集。正集21种、49卷，续集50种、100卷，广集54种、104卷，普集54种、88卷，汇集42种、86卷，秘集17种、49卷。共234种、475卷。收书从六朝到明朝，大都是笔记杂著、野史逸文、艺术谱录。收入时有删节。

7.《津逮秘书》　毛晋辑，15集、141种

毛晋得沈士龙、胡震亨的《秘册汇函》残版，增加闵元衡及自

己藏书，汇编成《津逮秘书》15集、141种。第一集《诗经》，第二集《易经》，第三、四集通鉴、小学、农书等，第五集诗话，第六、七集书画，第十二、十三集题跋著述，其余为笔记杂著。不作删节。其中一部分是伪书。

8.《稗海》 商濬辑，70种

商濬，浙江绍兴人。《稗海》所收都是笔记杂著。共10函：1.《博物志》等10种；2.《杜阳杂编》等6种；3.《乐善录》等10种；4.《游宦纪闻》等8种；5.《嫩真子》等7种；6.《云麓漫钞》等7种；7.《酉阳杂俎》等4种；8.《儒林公议》等9种；9.《西溪丛语》等6种；10.《齐东野语》等3种。共70种。

9.《唐宋丛书》 钟人杰、张遂辰辑，103种、149卷

钟人杰，浙江杭州人。《唐宋丛书》收唐宋罕见书。但有少数唐以前或宋以后的书。分四部：经翼7种、别史14种、子余21种、载集61种。共103种。万历刊本。

10.《两京遗编》 胡维新辑，11种、57卷

胡维新，浙江余姚人。此书收汉代书，故称“两京”。包括《新语》、《贾子》、《盐铁论》、《白虎通》、《潜夫论》、《仲长统论》、《风俗通》、《中论》、《人物志》、《申鉴》、《文心雕龙》等书。但其中有些不是汉人的书。

三、明代丛书编纂经验

集众书为丛书，要有丰足的原始文献和新颖的选择角度。明人丛书所采取的原始文献，大都是罕见秘籍，篇幅往往只有一二卷，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价值很明显。选择的角度，是丛书的灵魂。明代市场经济介入图书业，别出心裁的选择角度，十分重要。但也有些丛书，选择的角度虽与众不同，却弄巧成拙，导致非议。如吴从先、何伟然所编的《快书》50种、50卷，标榜的是编书的速度。一个晚上，把几种书拼凑成一部丛书。周亮工说它是一部“鄙俚无用之书”。[1] 下面介绍几种丛书的创意角度。

【1】[清]周亮工:《书影》,卷七。

1.《欣赏编》10种、14卷。沈津辑。收可供玩赏的文房清玩。

2.《小十三经》16种。顾起经辑。收别有见解的阐述经义的书。

3.《畜德十书》10卷。李悬编。收各种箴言。

4.《历代小史》106种。李栻辑。收各种罕见史料。

5.《藏说小萃》11种、27卷。李如一辑。收各种罕见笔记。

6.《官常政要》29种、50卷。书坊本。做官的常用资料。

7.《三注钞》钟惺辑。收《三国》、《世说》、《水经》三书的注释。

8.《三先生逸事》4卷。收李贽、徐渭、袁宏道三人逸事的罕见书。

9.《闲情小品》27种、28卷。华淑辑。收各种可供消遣的书。

10.《天学初函》21种、55卷。李之藻辑。收天文历算方面的新著及译著。

11.《合刻宋刘须溪点校书》9种、101卷。收集著名评点家刘须溪评点的书。

12.《权谲秘书》4种、4卷。金堡编。收《越绝书》等四种权谋之书。

13.《山居小玩》10种、14卷。收琴棋书画、瓶砚虫蝶等书。

14.《八公游戏丛谈》8种、94卷。收各种游戏消遣之书。

15.《士商必要》3种、12卷。江湖散人辑。出门经商的各种知识。

16.《绿窗女史》14部、45目。秦淮寓客编。收有关妇女问题的书。

17.《合刻三志》81种。冰华居士编。各种志怪、志异、志奇的笔记。

明人刊行的丛书，有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封闭式是指选定一个角度，确定一个卷数，有计划地出齐。开放式指选定一个角度之后，先刻若干种，过一阵子再刻若干种。这两种都是事物本身规律的反映。封闭式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范围决定的。例如如果你要出"四季"诗，那么只可能有四本书。开放式是知识发展的无限性决定的。例如要出版"古佚丛书"，出了一辑后，又收集到一批书，当然可以继续不断地出下去。《格致丛书》便是如此。但《格致丛书》有一个缺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所列

诸书，亦无定数，随印数十种，即随刻一目录，意在变幻，以新耳目，冀其多售。故世间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全书凡几种。”胡文焕还喜欢随便改变原书的书名，使人迷惑。

第九节　笔记的撰著

明代私家编撰了许多笔记类图书。其内容一部分是综合性的，天文、地理、人事、诗文、鬼神，无所不包；另一类是专门性的，专谈诗文评骘、读书体会、朝野典故等，以史事为主的称“史料笔记”，以小说、小品为主的称“笔记小说”，还有“笔记小品”。这些图书大都记实事，或传闻佚事，有文献价值，而且文笔优美，颇具阅读价值。

传统的图书四部分类中没有“笔记”这一目，根据其内容的侧重，各归入某一部类中。如李清的《三垣笔记》入史部的“杂史”中；焦竑的《玉堂丛语》、陆容的《菽园杂记》都归入子部的“小说”中。谢国桢先生在《明清笔记谈丛》的“重版说明”中认为，明清笔记的兴起和源流，可分为七个时期，前面四个时期是发生在明代的，后三个时期是发生在清朝的。明代的四个时期是：

“第一期是元末明初，朱元璋篡夺了红巾农民军的果实，建立了朱明王朝的政权，统一了中国，当时的记载如林，这可以说是野史笔记写作的初期。

“第二期是弘治、宣德以后，时局较为稳定，记述不多，这是野史笔记缓和较少的时期。

“第三期，正德、嘉靖以来，社会经济比较繁荣，阶级斗争的形势颇为尖锐复杂，这是野史笔记极为兴盛的时期。

“第四期，明末清初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兴起，摧毁着明王朝的腐朽政权，另一方面，面临满清贵族的入侵，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复杂。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是许多文人学士情绪慷慨激昂，学术思想极为活跃，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在笔记的著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

【1】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重版说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谢国桢先生又认为，明代笔记的种类很多，究竟有多少，“还摸不着底”。这类书的内容，则可以概括为10类：

1. 记农业生产的。如徐光启《农政全书》、邝璠《便民图纂》、佚名《沈氏农书》等。记载外来新农种的有田艺蘅《留青日札》、姚旅《露书》、周亮工《闽小记》等。

2. 记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如张瀚《松窗梦语》、宋应星《天工开物》、杨明《髹饰录》；记社会风俗的有范濂《云间据目钞》、屈大均《广东新语》。

3. 记政治制度、朝章典故、社会经济、士风民俗的。如王世贞《弇州山人别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谢肇淛《五杂俎》、朱国祯《涌幢小品》。

4. 记明代农民起义的。有谢蕡《后鉴录》、李世熊《寇变记》、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

5. 记载少数民族情况的。有萧大亨《夷俗记》、杨慎《滇载记》、田汝成《炎徼纪闻》。

6. 记我国历史地理及自然地理的。有王士性《广志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徐宏祖《徐霞客游记》。记述世界地理的有艾儒略《职方外记》、张燮《东西洋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7. 记载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的。有叶权《贤博编》、王临亨《粤剑编》、王在晋《越镌》。

8. 通记历史文献和人物传记的。有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史部前后集》、焦竑《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李乐《见闻杂记》、何乔远《名山藏》等。记述甲申之际的不下千家。

9. 记述科学技术及工艺美术的。有高濂《遵生八笺》、屠隆《考槃余事》、王徵《奇器图说》、方以智《通雅》、《物理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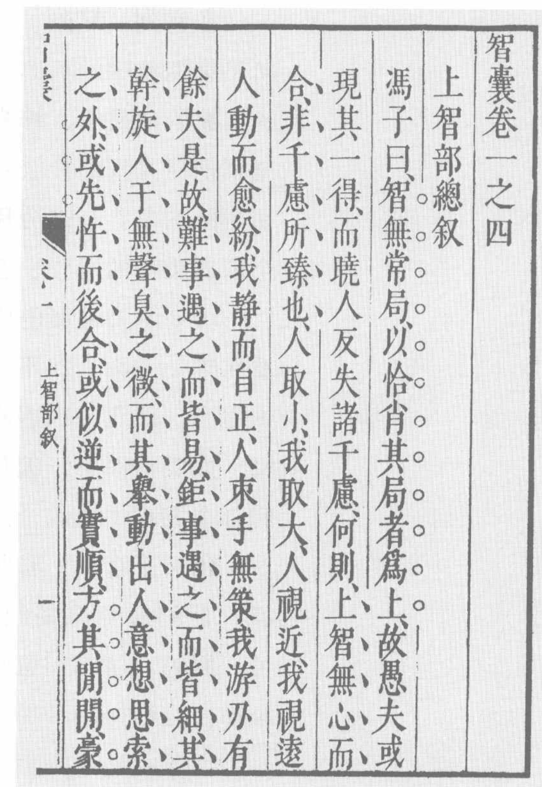
10. 记文史哲学家人物传记的。有黄宗羲《明儒学案》，记东林复社有黄宗羲《思旧录》、陆世仪《复社纪略》，记文学家传记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戏剧家有钟嗣成《录鬼簿》。[1]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谢国桢所谈及的包含较广，大

【1】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重版说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都属于“史料笔记”这一类。中华书局出版的《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共收录明人的史料笔记23种，这是最常用的几种。其他笔记小说、笔记小品等类的图书还有很多。

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有四种笔记故事书，至今常印不衰，而且在国外有多种译本。这四种书都杂取正史、野史、杂著和民间故事传说。从这四部笔记书的取向，可以看出明代笔记类图书的一斑。《智囊》，10部28类，摘取用智慧解决国家大事以至日常生活问题的故事；《情史》，24部，摘取情爱故事；《谈概》，36部，摘取可资谈助的故事，大都出于正史；《笑府》，13部，收辑流行于民间的笑话。（图26）


智囊卷一之四
上智部總叙
馮子曰智無常局以恰肖其局者爲上故愚夫或
現其一得而曉人反失諸千慮何則上智無心而
合非千慮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視近我視遠
人動而愈紛我靜而自正人束手無策我游刃有
餘夫是故難事遇之而皆易鉅事遇之而皆細其
斡旋人于無聲臭之微而其舉動出人意想思索
之外或先忤而後合或似逆而實順方其閒閒豪
上智部叙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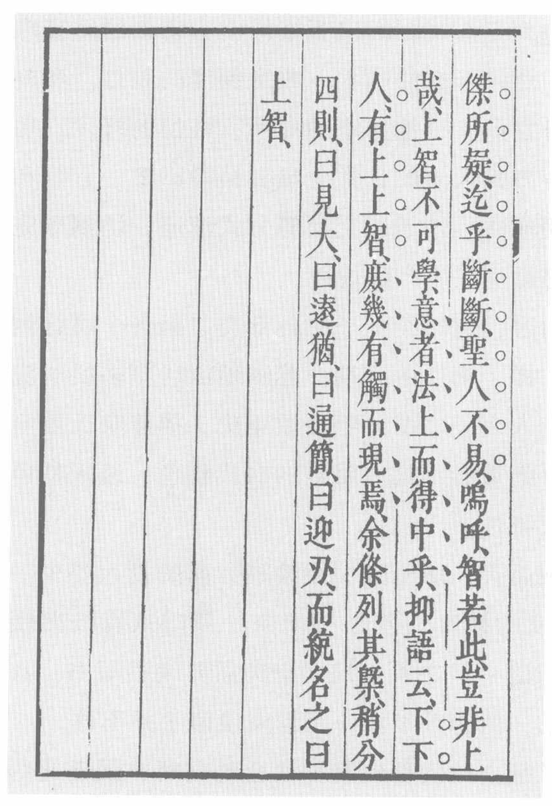

傑所疑迄乎斷斷聖人不易嗚呼智若此豈非上
哉上智不可學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語云下下
人有上上智庶幾有觸而現焉余條列其槩稍分
四則曰見大曰遠猶曰通簡曰迎刃而統名之曰
上智

图26
［明］冯梦龙编有4种笔记：《智囊》、《谈概》、《情史》、《笑府》。这是《智囊》的日本翻刻本。

第四章　书坊的编纂

在官刻、私刻、坊刻三驾并驱的出版格局中，官刻的编纂取向是皇朝秩序的巩固、意识形态的确立、典章制度的制订。私刻的编纂取向是个人修身立命、道德文章的传承、性情的抒发。坊刻则把目光投向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需要。官刻和私刻的图书，一部分用颁赐、赠予、交换等方式流通，坊刻则完全依靠市场的运作，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律。

坊刻图书编纂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部类。但各个坊肆侧重在哪一方面，却不一样。明代中后期，苏浙地区坊刻多科举应试之书，闽北地区多商人市民之书。毛晋重正史，福建余氏重演义，熊氏重医书。编纂的重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地区特色和各个书坊主人的个人特色。

相对于官刻、私刻而言，坊刻图书在编纂方面的投入要少一点。他们遵照皇朝颁发的样本刊刻经书律令，只需认真校勘便可。同时，坊主们也聘请一些文人，根据市场需要编书写书，甚至坊主自己也动手编书，但为数不多，而且质量似乎并不佳。

坊肆主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看到某种社会动向时，便迅速约请著名的文人赶编赶写，由此产生了许多新品种、新图书，这种书商与文人联手互动的编纂模式，具有现代出版的作风。

第一节　明代书坊编纂概况

一、书坊编纂的几种方式

完整的出版活动包括编纂、复制、发行三个方面，编纂是第一位的。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家中，书坊对于编纂这一环节的投入，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官家的编纂者有文官和社会名儒；私家的编纂者们自己是里手行家。坊肆的编纂者，除了一部分本身有学识的主持人可以自己动手以外，往往请社会人士参加。

规模较大的坊肆，聘请较多的、固定的、有学问的人担当编纂之事。最突出的是毛晋的汲古阁。在毛晋身边，有固定的、常年为他编书的著名文人，如诗人陈瑚，有三个分别专门编儒、释、道三教图书的"编辑楼"：汲古阁编儒家书，双莲阁编释家书，关王阁编道家书。还有一批亲戚好友编校各种专著：舅父戈汕编校《神农本草》，女婿冯武编校《十元人集》、《元四名家诗》，好友陆贻典编校《冯氏小集》，好友"江阴老儒"周荣起编校经史古籍，朋友释道源编校收入《径山藏》的释教书；他还曾计划过，十三经和二十一史，每一部都聘请一位专门学者主持其事。毛晋的编纂人员，是一个很完善的专业班子，有常年的，也有临时聘请的。

有些坊肆聘请到有本事的"能人"担任编纂工作。他们既能揣摩市场动向，设计选题，也能进行社会活动，物色作者，必要时，可以自己动手，赶写赶编，很快把书送到市场。这方面最有名的是福建余氏及麾下的邓志谟，他们设计并组织实施了一批又一批的系列书，如"粹言"系列、"白眉"系列、"争奇"系列、"四游记"系列、"历代演义"系列等，书名奇特，构思新颖。他们把创作、编纂、经营几个环节结合起来。余光斗和邓志谟二人的编纂活动，前后达50年之久（万历十六年至崇祯十年，

1588—1637年）。在东闽出版界可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坊肆主很能争取地方官员和名儒的帮助。福建慎独斋刘弘毅刊印图书，曾得到建宁、邵武官员的帮助。《史记》的牌记上记："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内蒙建宁知府张、邵武府同知邹同校正过，《史记大全》计改差讹二百四十五字，书户刘洪改刊。"《文献通考》的牌记上记："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内蒙建宁知府张、邵武府同知邹同校正过，计改差讹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一字，书户刘洪改刊。"这两个牌记说明有两个知府曾经帮慎独斋做过校订工作。

约请社会名人编纂图书，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三言"、"二拍"的编纂经过。明末，社会上流行着一些短篇小说，以单篇形式刊行。大约是在天启初年，苏州书坊天许斋主听说冯梦龙家中藏有许多单篇话本，便向他约稿，请他整理出来。《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绿天馆主人的序中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古今小说》出版后，受到欢迎，书商"怂恿其成"，接二连三地编纂出版了《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便是所谓的"三言"。"三言"获得畅销，引起了苏州金阊尚文堂书商的注意，便向乌程（今浙江湖州）的文人凌濛初建议，要他照样另编一套。凌濛初应约编撰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在《拍案惊奇》的序中，凌氏说："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这便是所谓"二拍"。

"三言"、"二拍"的出版过程前后约十年，涉及江浙二省近十家书林，由此促成了"话本"、"拟话本"两种脍炙人口的文学体式的出版和热销，这是明代书商和文人互动产生的最成功的典型。

二、坊肆编纂的图书类型

坊肆编纂的书，以市场需要为取向。但各时期、各地区、各

个店家的做法各有不同。下面以坊肆刻书最盛的苏州地区和闽东地区为例，作具体的分析。

根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1] 的著录，在现在江苏省境内，明代共有坊肆416家，刻书1 050余种。50种以上的品种有7类，依次如下 [2]：1. 类书218种；2. 戏剧158种；3. 医药110种；4. 各种史书92种；5. 别集80种；6. 经类63种；7. 总集60种。此外，子类中的儒释道加起来有53种。

根据《福建古代刻书》[3] 的著录，在现在福建省境内，明代共有余、熊、叶、郑等十几个姓氏的70多家书坊，有著录的出版物计图书612种。出书20种以上的有6类。依次如下：1. 类书99种；2. 医药62种；3. 史书60种；4. 经类57种；5. 别集47种；6. 传奇词曲24种。

从以上两个粗略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坊肆编刊图书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编刊的书，最多的是类书。读者对象都集中在中下层读者身上，都以科举考试、日常生活、经商开店、消闲解烦为需要，其分量则以中小型为主。不管什么品种的书，都向着这些方面倾斜。例如经书则以通俗经解为主，以考试需要为主；史书则以史钞、史摘、纂要和历史演义为主；类书则寻求日常生活、用典修饰、文书活套的方便以及消遣娱乐之用；集部则着重选脍炙人口的诗文以及近人的房卷。

从上面的统计也可以看出，各地区各坊肆所编纂的书往往有不同的侧重。苏州地区有较多的戏剧和别集，福建地区有很多史钞和医药书。这些不同之处，便成为地区的特色。

坊肆编纂刻书为什么以类书为大宗，这需要作一些探讨。

类书是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查之用的工具书。古代的类书，除了供皇帝阅读之外，主要是供文士制作文诰时采择典故、丰富词藻之用。明代坊肆主人根据社会中下层读者的需要，设计、编纂、刊印了大量类书，其中不乏创新之作。这些类书，大都分量不大，切合实用。一本书可以兼有几本书的作用，而且分门别类，使用方便，因而受到使用者的欢迎。

【1】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

【2】这1050种图书，绝大多数可以从书名推知所属部类，但也有少数书光看书名，不知内容，归属恐有错误，故下列数据，只能大体参考。

【3】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出版界把这类书称为“小类书”，以便和《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相区别，又有人称之为“日用类书”、“商人之书”等。

下面略举几种“小类书”的书名：

生活用类书　《万事不求人博考全书》20卷，《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35卷。

经商用类书　《士商类要》4卷，《万事皆备类纂》4卷，《天下路程》20卷。

考试用类书　《经史子集合纂类注》32卷，《举业古今摘萃玉圃珠渊》10卷，《百家举业奇珍》4卷，《二三场百段文锦》4卷，《四六明珠》8卷。

官吏用类书　《翰墨文宗》10卷，《仕途悬镜》8卷，《簪缨必用翰苑新书》30卷，《官常政要全书》51卷。

社交应酬类书　《国朝名公翰藻超奇》14卷，《万寿类函》5卷，《天下通行书柬活套》5卷，《翰简大成称呼》2卷，《新刻时尚华筵趣乐谈笑酒令》5卷，《绮筵雅乐令谜昭华》4卷。

消遣类书　《新刻京台公余胜览国色天香》10卷，《燕居笔记》10卷，《新镌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4卷，《万锦情林》6卷。

第二节　白话小说的编刊

最早的小说是用文言写作的短篇小说，撰写时虽然也吸收了民间文学的情节和语言，但基本上是文人的案头创作，写出来后又专供文人消遣。到了明代，小说从这个框框里解放出来，出现了许多供平民阅读的白话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这个新局面是由于说话艺人的世代增饰、文人参与整理以及书坊主人们的积极支持造成的。明末，小说的出版形成了“到处皆是”、“妇孺咸读”的局面。

明代小说编刊的成就有三：1. 白话长篇小说经过长期口头讲说后，成熟定型，成为连贯的文本，如《三国》、《水浒》；2. 文

人独自创作的长篇小说开始诞生，如《金瓶梅》；3. 白话短篇小说大量被整理出来，结集出版，如“三言”、“二拍”。

一、长篇白话小说的写定

很多长篇白话小说的故事往往先以说话、讲唱、演剧的形式流传，然后才由文人“写定”下来。写定也有一个过程，起初的写定本可能比较粗糙，后来才有大手笔写成定本。定本写成后，还有人继续参加进来，写“评”、“批”、“注”等东西，明末评注之风盛行，几种有名的小说往往有不同的批注本，使版本情况变得十分复杂。研究这些长篇白话小说的不同版本、不同评本，是文学史和出版史共同的课题。

（一）《三国演义》主要版本

《全相三国志评话》，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本，上中下三卷，作者不详。

《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改本，最早为嘉靖壬午（元年，1522年）刊本，24卷、240则。

《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20卷、240回，建安余氏有4种刊本，建阳其他书林有13种刊本。（图27）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120回，建阳吴观明刊本，实为万历天启年间无锡人叶昼所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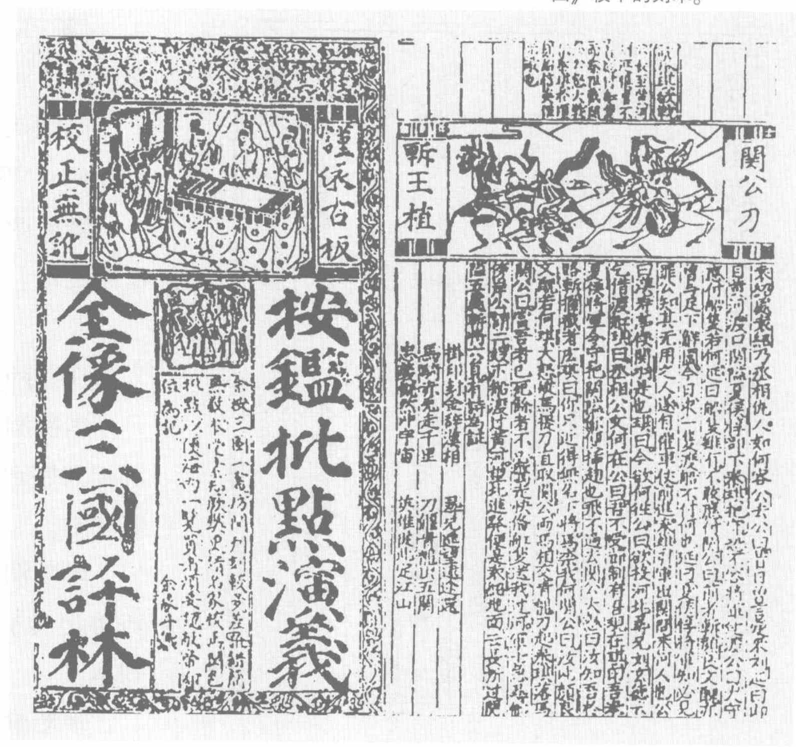


图27
万历双峰堂刻《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为《三国》较早的刻本。

《笠翁批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李渔评本。

《钟伯敬批本三国志传》，钟惺评本。

《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清毛纶、毛宗岗评本，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成为后世定本。

（二）《水浒传》主要版本

《水浒传》有繁简两个系统，繁本系统有：

《京本忠义传》20卷、100回，正德、嘉靖间书坊本。

《忠义水浒传》20卷、100回，嘉靖刊本，又有万历十七年（1589年）刊本。（图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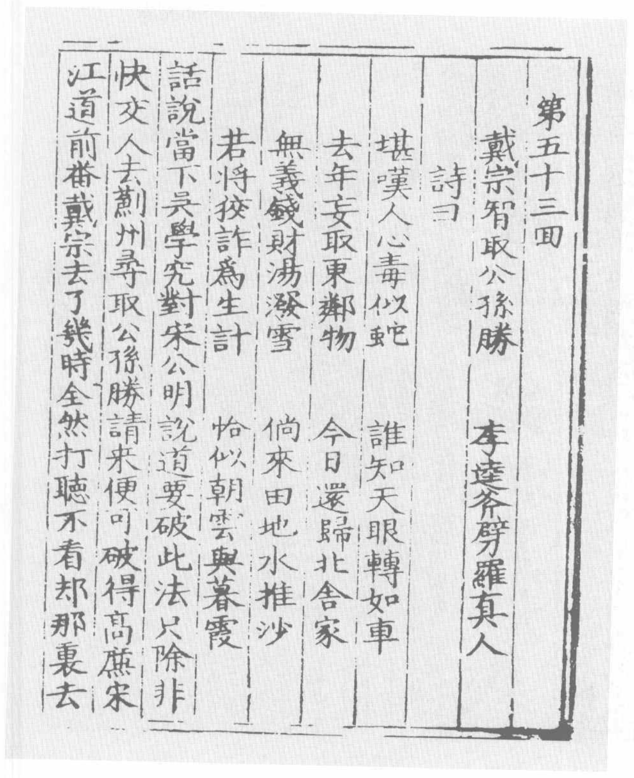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卷、100回，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容与堂刊本。

《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卷、100回。

《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120回，袁无涯刊。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70回，贯华堂金圣叹本。

图28
嘉靖刻本《忠义水浒传》，这是《水浒》传世最早的刻本。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
詩曰
堪嘆人心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鄰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狡詐為生計　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
快交人去薊州尋取公孫勝請來便可破得高廉宋
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着卻那裏去

简本系统有：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刊本。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明万历刊本。

繁简两种版本，孰先孰后，则没有定论。

（三）《西游记》主要版本

《西游记平话》，元刊本，不传。

华阳洞天主人校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金陵世德堂本，明刊本。

华阳洞天主人校本《新镌全像西游记传》，闽书林杨闽斋本，明刊本。

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唐僧西游

记》，明刊本。（图29）



图29
嘉、隆间书林刘莲台梓行的《鼎镌全相唐三藏西游传》，这是《西游记》的早期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100回，有注、评，回末有总评，泰昌、天启间刻本。

二、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

据有关书目著录，明代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约有100种左右，[1]不同版本未计在内。其内容集中在历史、明代时事、明代社会、神魔四个方面。至于公案小说，虽然也有长篇章回体的，其实是一个个短篇串联起来的，放到下一小节去叙述。

（一）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盘古至唐虞传》、《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春秋列国志传》、《新列国志》（图30）、《孙庞斗智演义》、《两汉演义》、《全汉志

[1] 有关书目较多，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



图30
历史演义《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余氏三台馆刻本。

传》、《两汉开国中兴志传》、《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炀帝艳史》、《隋唐两朝志传》、《隋唐演义》、《混唐后传》、《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等30余种。从上古到宋，可以连贯起来，具备了整理成“历代演义”、“通史演义”的条件。

（二）明代时事小说

《承运传》、《英烈传》、《续英烈传》、《真英烈传》（开国时战事）、《鱼服记》（惠帝遁荒事）、《于少保萃忠全传》（土木堡事及于谦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郑和下西洋事）、《征播奏捷通俗演义》（征杨应龙事）（图31）、《征西记》、《兵火传》、《忠国传》（以上三书见《征播奏捷通俗演义》的“引”，内容不详）、《神武传》（刘伯温事）、《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王守仁擒朱宸濠事）、《胡少保平倭记》（胡宗宪平倭事）、《青词宰相传》（严嵩事）、《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戚继光事）、《辽东传》（熊廷弼事）、《镇海春秋》（朝鲜事）、《辽海丹东录》（辽东事）、《近报丛谭平虏传》（袁崇焕事）、《梼杌闲评》、《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魏忠贤小说斥奸录》（四书均写魏忠贤事）、《剿闯通俗小说》（李自成事）等30余种。差不多明代重大的时事，都及时写成了长篇小说，可谓反应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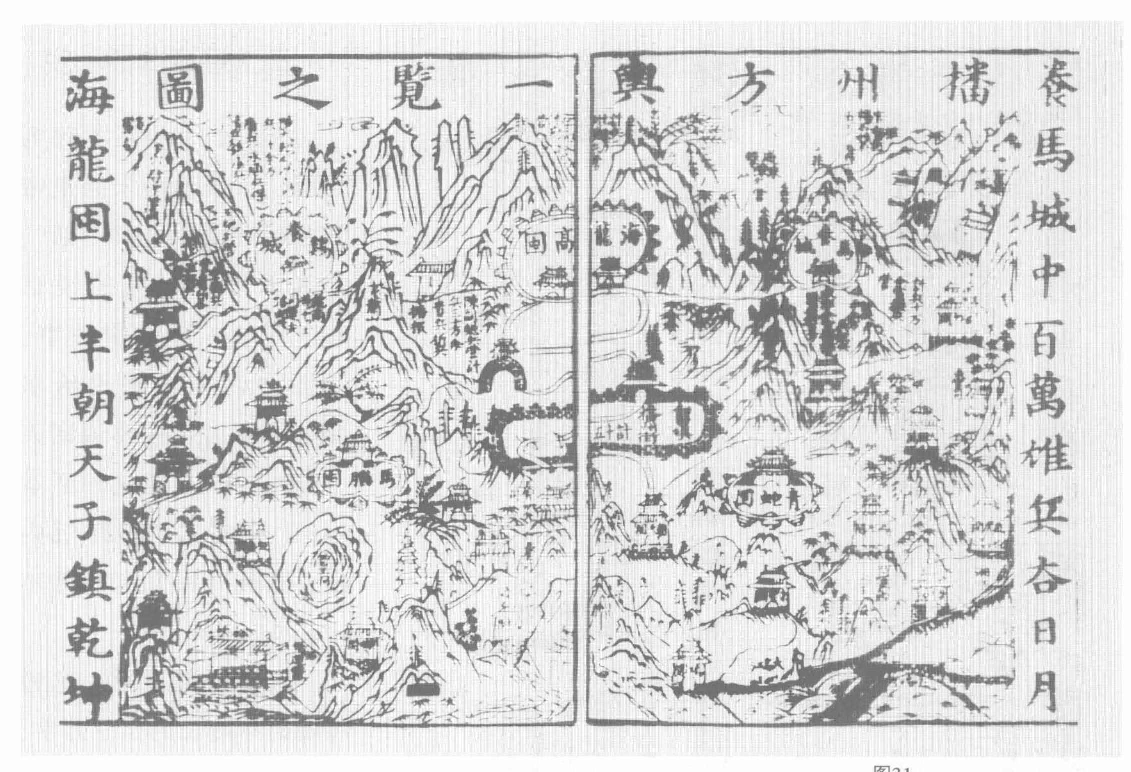


图31
时事小说《征播奏捷传》，不明撰人，演征杨应龙事，万历刻本。

（三）明代社会小说

《金瓶梅》、《玉娇丽》、《绣榻野史》、《闲情别传》、《浓情快史》、《玉妃媚史》、《昭阳趣史》、《肉蒲团》、《杜骗新书》、《僧尼孽海》、《放郑小史》、《大英雄传》等约20余种。

（四）神魔仙佛小说

明代有不少神仙得道、儒佛道争胜的小说。如《西游记》、《续西游记》、《西游补》、《关帝志传》、《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天妃济世出身传》、《封神演义》、《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达摩出身传灯录》、《韩湘子全传》、《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图32）、《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八仙出处东游记》、《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牛郎织女传》、《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五显灵官大帝华天王传》、《唐钟馗传》等20余种。



图32
神魔小说《罗汉传》，朱星祚编，万历刻本。

三、短篇白话小说

白话小说的底本称为"话本"，据说南宋的皇帝很喜欢听说话人讲"话"，供奉局里有专门的说话人，说话人不单讲故事，还把"话本"进呈给皇帝。宋高宗赵构要说话人"日进一帙"，但这种话本"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1]

从现有资料看，这种短篇话本最长的二三万字，最短的五六千字。如果一篇一本，刊行不方便，最好汇聚结集出版。这种短篇小说集最有名的有6种：

1.《六十家小说》，即《清平山堂话本》。嘉靖年间洪楩编，共6集。即：《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每集上下两卷，每卷五篇，共60篇。现存27篇。

2.《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冯梦龙编，出版时间约为天启元年（1621年），收短篇白话小说40篇。（图33左）

3.《警世通言》。冯梦龙编，天启四年（1624年）出版，收短篇白话小说40篇。

4.《醒世恒言》。冯梦龙编，天启七年（1627年）出版，收短篇白话小说40篇。

【1】［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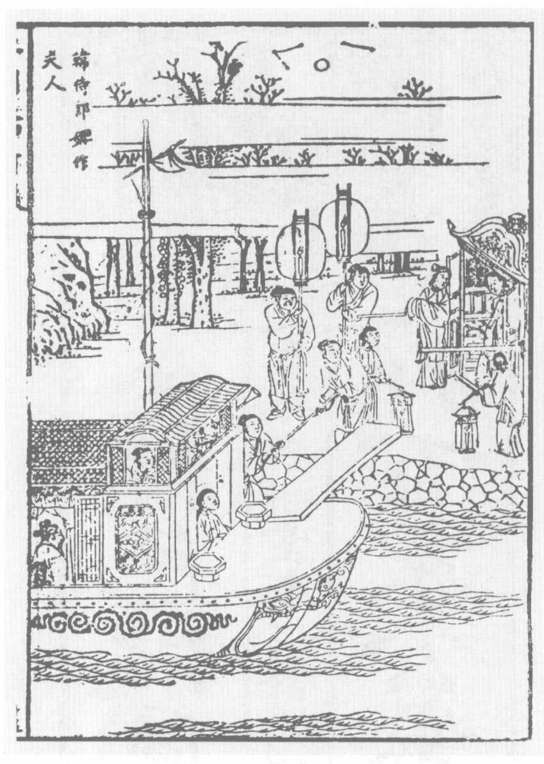


图33
左：《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卷一插图。右：《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插图。

5.《拍案惊奇》。凌濛初编，崇祯元年（1628年）出版，收短篇白话小说40篇。

6.《二刻拍案惊奇》。凌濛初编，崇祯五年（1632年）出版，收短篇白话小说40篇。（图33右）

《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所收的短篇小说，有一部分并不是流行社会的“话本”，而是编者凌濛初模仿“话本”的创作。鲁迅给这种作品起了个名字为“拟话本”。

明末清初，这种“话本”和“拟话本”颇为盛行。如《石点头》、《醉醒石》、《照世杯》、《幻影》、《豆棚闲话》、《连城璧》、《十二楼》、《西湖二集》、《五色石》、《美人书》，到清中叶就绝迹了。郑振铎先生作过考证，大约一共有四五十种。[1]

“三言”、“二拍”至今久印不衰，目前看到的新印本有十多种版本。“三言”、“二拍”200篇故事中，被改编成传奇、评弹、戏剧、电影、电视的有几十种。这些故事流传五六百年，具

【1】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载《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有长远的魅力，在出版史上，十分值得重视。



图34
公案小说《全补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万历年间与耕堂朱仁斋刻本。

短篇小说中还有公案小说的出版，也十分繁荣。这些小说类似今天的法制文学，它往往把许多案件的侦破都集中寄挂在某一个清官身上，全书由一个个案件串成。明代出版的此类小说有《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皇明诸司廉明公案》、《国朝宪台折狱苏冤神明公案》、《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名公案断法林灼见》、《明镜公案》等十余种。（图34）

小说类图书的出版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编撰小说的人不愿意署上真实姓名，更不愿意自己担任刊刻者。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以及其他一些小说，都不署真名。这些小说虽然销路极好，但都不作为私刻，而交由书坊刊印。这大概和当时小说的社会地位有关。

明代出版商往往把短篇小说集的残版随便凑合，东取几种，西取几种，再起一个“二编”、“续编”之类的名称，算是一种新编的小说集，这种做法弄得版本家颇伤脑筋。

第三节　科举应试之书的编刊

一、坊肆大量编刊科举应试之书

科举考试是读书人入仕做官的最主要的途径，“卿相皆由此出”。[1] 书坊的经营，也以此为重点。科举应试之书，有一些是基础性的，间接为考试服务的，如启蒙读物、四书五经之类。

【1】《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

直接为考试服务的则是“场屋之书”，即帮助考试的书。这里讨论的是后一种狭义的“科举书”，所以，下面先要介绍科举考试的科目。

明代规定，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分三天进行：

第一场——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

明初，对“四书”、“五经”都规定用何种传注本，永乐后，规定以胡广主编的《四书五经大全》为准，直到明代末年。

第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

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这三场考试都是写文章。文章的体裁有规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1]所谓“排偶”，也就是骈体文，四六句式，不能用散文。

根据考试的种种规定，坊肆编刊的应试书，必然是以下这些品种：解释经史的书，经书史书的摘要，历代历年考试的优秀答卷，撰写四六骈体文的方法，修饰文章的典故和辞藻等。这些图书的作者，有状元翰林，有前科举人进士，有没有考上功名的落泊士人，也有书坊主人，更有伪托的名人。这些作者中的能人，被人称为“选家”，他们的工作被称为“选政”。

据顾炎武《日知录》称，明代科举书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顾炎武抨击这类图书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昔丘文庄当天顺、成化之盛，去宋元未远，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学书偏旁者。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2]

这类书的编撰以苏、杭以及松江为多，而刊印以福建为多。俞正燮说：“科举之书，尽出建宁书坊。”[3]

【1】《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

【2】黄汝成等：《日知录集释》卷一六“十八房”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二、科举应试图书举隅

科举应试图书大致有以下几种门类，下面每类略举数例：

（一）经史要籍的通俗解释和提要

应举之书中，有很多是对经史要籍进行通俗的解释，或提精摘要，或阐明旨意，帮助考生理解和记忆。

图35
通俗经书，供士子应举制艺之用，此为张汝霖撰《荷珠录》，明刻本。

考试命题最多出自“四书”，“四书”篇幅不大，一般读书人都能背诵如流。这方面的图书有《提章提节士魁四书》6卷、《四书捷解》12卷、《四书脉讲意》6卷、《四书纂经图解》19卷、《四书醒人语》14卷、《四书最胜藏》10卷等。(图35)

根据“五经”出的题目，比“四书”要难一些。其中的《春秋经》内容浩博，传注众多，涉及治国伦理等各个方面，一字褒贬，微言大义，考试时命题机会较多。有关的书如：《春秋胡传纲目》30卷、《春秋评林选要》3卷、《春秋文俟》12卷、《春秋评苑》20卷、《春秋衡库》30卷、《麟经指月》12卷、《春秋三发》3卷等。

明初科举，“四书”、“五经”考试时，规定要用某人某人的传注，自从永乐命胡广编成《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以后，就以这几部“大全”为准，不得逾越。《性理大全》有70卷，篇幅较多，因此诸如《性理辑

要》、《性理书钞》、《性理精纂约义》、《性理纂要》等书，便被编纂出来，这些都是《性理大全》的提要之书。

历史方面的问题，如君臣关系、人物评价、国事得失、经济政事等，常出现在考题中，或评骘，或引用。因此，应举书中，史钞之书特多，如《十八史略》10卷、《史记狐白》3卷、《汉隽》10卷、《古事纂》8卷、《史纲要领》36卷等。这方面的书，以《资治通鉴》的摘要书为最多，单是苏、闽二地的书目中，就有二十几种，如《通鉴一勺史意》2卷、《便蒙通鉴》8卷、《通鉴策论摘题》20卷、《历史标题通鉴捷旨》6卷、《通鉴纪略》10卷、《通鉴节要》23卷，这些书都以比《通鉴》少得多的篇幅，从考试的角度进行提要揣摩猜测。

（二）前朝和本朝考试卷子的选评

这是应试类图书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选评前代文章如《古今名文珠玑》8卷、《类编古今文髓》6卷、《古今名文经国大业》7卷、《古文宗范》20卷、《名文走盘珠》4卷、《古文百段锦》5卷等。

古代的好文章毕竟离当时太远，近时的文章被选刊的更多。如《十六翰林科场急出题旨棘围丹篆》（不分卷）、《国朝名文英华》11卷、《文章规范百家批评》7卷等。

考试的二三场要做论、判、诏、时务策等文章，有特定的要求，因此便有专门切对二三场的选文，如《二场表学司南》4卷、《卯辰二三场司南蜚关》6卷、《皇明论程文选、表程文选、策程文选》50卷、《名儒三场百段锦》5卷、《午未注释二三场程论玉谷集》1卷、《二三场群书备考》4卷、《十翰林评选注释名家程墨策纂论纂》4卷。

（三）文体模式以及典故辞藻的书

考试时要写骈体文，全文要用骈四俪六的排偶句式，即所谓的“四六文”，不能写散文。当时，虽然前七子、后七子等著名文人都竭力倡导古文，但考试时依然必须用“四六文”，因此，写好骈文便成为必须掌握的一门技巧，有关图书品类繁多。苏闽

两地书肆刊印的有几十种，如《四六雕龙》8卷、《四六词坛》6卷、《四六争奇》8卷、《四六瑶函》6卷、《四六明珠》8卷、《四六霞肆》16卷、《四六天花》8卷、《古今四六合编》4卷，还有一本《四六审函》多达30卷。

提供典故修辞的书有各种"故事"，如《天梯故事》8卷、《书言故事》8卷、《五伦故事》10卷、《鱼仓故事》8卷、《故事白眉》10卷、《皇明新故事》6卷等。专门提供辞藻的书有《词府灵蛇》4卷、《百子粹言》6卷、《举业古今摘粹玉圃珠渊》10卷等书，这类书大都采用分类的编纂方法。(图36)



图36
提供各种典故的小类书，常以"日记故事"为名。此为《书言故事通考》，万历刻本，图与文插排。

第四节　日常用书和商人书

坊肆主人适应市民、商人、下级官吏的需要，设计编刊了多种供日常生活和经商业务使用的工具书。这类书在福建编得最多，一再重版，销行全国。书的体例也采用类书的形式，有的还附有插图。从读者对象来分，大部分适用于城乡普通人家，是通用本，其中一部分专供经商人或下级官吏应用。一般人家购买这种图书后，经常翻检，破烂后随手抛弃，随生随灭。收藏家对这类书也看不上眼。所以，这类书虽然在当时编刊了不少，流传下来的却不多。书中往往附有不少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始资料，因此，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学的学者颇加青睐。郑振铎先生收藏此类书一百余种，并写了好些题跋，还就这类书撰写过专文。

一、日常居家的"万宝全书"

日常居家之书满足市民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应酬社交、出门

造屋等方面的需要，分类辑录实用资料。这类书往往从大型类书上摘来，互相转抄。民间把这类书叫作“万宝全书”或“不求人”等，这名称沿用数百年不衰。（图37）现介绍最有代表性的两种：

（一）《万宝全书》　全称《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38卷，万历四十年（1612年）福建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刊本，再版过三次。全书38门，每门有一幅插图。38门的内容是：天文、地舆、人纪、诸夷、官品、历法、武备、八谱、琴学、棋谱、书法、画谱、文翰、启札、伉俪、丧祭、体式、诗对、涓吉、卜筮、星命、相法、茔宅、修真、养生、医学、全婴、训童、算法、农桑、劝谕、侑觞、笑谈、风月、玄教、卜员、法病、杂览。

这本书的序言、扉页、牌记上反复说明：此书受到各界欢迎，“大行天下”，多次印刷，以致“板朦”，不得不一再补充重刻，还用“葫芦为记”作为商标，要读者认清真伪。

（二）《万用正宗》　全称《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43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书林余文台梓。此书是明代有代表性的一种日用类书，共42门类，分上下两层。日本历史学者仁井田陞认为此书是“十六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日用百科全书之







图37
日用小类书。左、中：《万宝全书》。右：《积玉全书》。

一”。另有一本类似的书《类聚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刊本，35卷，刊行者也是余文台。

还有一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署“经厂刊本”，这部书从甲至癸共十集，内容有“为学”、“家法”、“仕宦”、“宅舍”、“染作”等等，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其中有“宝货辨疑”一门，郑振铎先生疑是教典当人员辨别珍宝之用的。这本书起初是官刻的经厂本，后来收入《格致丛书》中成为坊刻本。[1]

[1] 郑振铎：《漫步书林》，载《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类似《万宝全书》、《万用正宗》的书有不少，这些书往往书名小有不同，卷数不一样，内容相似，甚至书名、卷数完全相同，内容却不一样，现介绍几种如下：

图38
日用生活知识类书《高宝全书》，万历年间潭邑王泰源立正堂刻本，图文并列。



《鼎镌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35卷，龙阳子辑，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余文台刊。

《新镌音注释疑万物皆备类纂》4卷，黄龙吟辑，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刘龙田刊。

《新刻诸事备用万家纂要通达便览》20卷，王文洁辑，詹长卿就正斋刊本。

《鼎镌十二方家参订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6卷，博览子辑，万历年间萧少渠师俭堂刊本。

《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23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潭阳熊冲宇种德堂梓。

此外，还有《便览全书》(立正堂刊，该书版心亦为“万宝全书”四字)、《高宝全书》(万历潭邑立正堂刊)等书。(图38)

二、商人和小官吏之书

在日常应用工具书中，有一些是专门为商人或下级官吏用的。明朝以前，元代大德五年（1301年），就曾有此类书出版，有人把专供政府官员用的这种书称为“习吏书”。如徐元瑞编的《习吏幼学指南》。[1] 这类书的内容颇多实用常识，如：

1. 文书契约活套　所谓“活套”，就是规范的格式。有些书提供官司文书或商业契约的活套，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填写改动应用。这种书中关于买卖奴婢、典卖房屋的“活套”中，往往保留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受到史学家的重视。

2. 书信格式　这类书很多。其中最有匠心的是邓志谟编撰的《一札三奇》8卷，萃庆堂刊本。每种事情为一札，设计三种信件，三种复信，后面还附有解释。信札的内容有仕进、贺礼、祝寿、时令、馈赠、众器、果品、文史、荐引等。

3. 经商路程　《一统路程图记》由隆庆间休宁人黄汴编刊，他恐天下人“厄于歧路”，就和二京十三省及边方商人联系，请他们提供实际经历的资料，取得多种“路程图”，化了27年时间，编成此书，连印三次。

这书出于善于经商的歙县人之手，而且通过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自足珍贵。类似的书还有邓景南编的《一握乾坤》，天启刊本。

4. 计算方法　《盘珠算法士民利用》2卷，徐心鲁撰，万历间福建刊本。该书提供一百多个实际应用题，附图，附珠算口诀，受到商人欢迎。还传到日本，译成日文。（图39）

5. 官、商所需的社会资料　编得最好的一种是歙县人陆嘘云编的《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世事通考》，介绍各地风俗习惯，分类细致，有时令、人物、身体、病症、五谷、荤食、衣冠、首饰、丝帛、靴鞋、百工、杂货等门类。此外还有各地主要官员的

【1】这本元代习吏书的内容分类有：吏称、政事、五事、户计、礼仪、详恕、救灾、三宥、五戒、三典、三罪、五纠、五禁、八议、五科、八例、十恶、七杀、法例、条贯、狱讼、勾稽、诸纳、体量、禁制、诸箴、三尚、仁恕等，都用口诀表示。



图39

日常计算书。［明］徐心鲁撰《新刻订正家传秘诀盘珠算法士民利用》，福建熊台南刻本。此书曾传入日本。

名录《缙绅便览》。（图40）商业常识如《新镌士商要览》4卷，憺漪子辑，天启刊本；《士商类要》4卷，程春宇辑，天启金陵文林阁刊本。做官常识如《仕途悬镜》8卷，王世茂辑，天启间梅墅石渠阁刊本。

这些以商人、雇员为读者对象的图书，在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最初的出版物是少数上层人的专用品，识字不多靠体力糊口的下层人是与此无缘的。历来有“学在官府”的说法，出版物也完全一样。即使有下层人看得懂买得起的书，为数也极少。这类图书逐渐积累发展，大量产生，成为一定规模，要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为前提，在出版

史上有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

第五节　杂志雏形

一、杂志雏形的出现



图40
供社会各界查检用的社会资料《缙绅便览》，万历年间北京铁匠胡同叶铺刻本。

明末的出版物中，出现了一部分类似今天杂志一样的图书。它的性质，郑振铎先生有一段说明："他们不是居家必备一类的家庭日用百科全书，也不是《诸书法海》（即后来的"传家宝"的祖先）、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类的平民日用的万事须知、日用百科全书。他们是超出于应用的目的之外的。他们乃是纯文学的产物，一点也不具有实际上应用的需要的。"[1] 这种看法和明代当时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国色天香》的作序者谢友可指出："毋论江湖散逸需之笑谈，即缙绅家辄藉为悦耳目。"

【1】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这种书大致有两类。一类以传奇故事为主，如《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万锦云林》等；一类以戏曲唱词为主，如《天下时尚南北新调》、《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乐府名时曲万家锦》等。除了这两类主要内容以外，还大量刊载诗词、笑话、谜语、小曲、书信、对联等，作为"增饰"，招徕读者。胡士莹说："这些书，既是当时的启蒙读物，又是一般市民的日用便览，也可供商人书信摘录词藻之用，所以在当时传播很广。"[2] 戴不凡说得更形象，他认为这种书的兴起与当时东南贸易兴盛有关，"瓷商舶主于旅途无聊之际，正可手把一篇为乐，或资友朋谈助。若《国色天香》内容之纷然杂陈，适可以供此等江湖散逸之需。以其中所收小说言之，语多浅近

【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欠通之文言，又夹以俚肤风流之诗词，情节磨磨蹭蹭，故事拖泥带水，亦此辈于旅途中消磨公干长日。”[1]

【1】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这类通俗书的编辑工作颇有点杂乱无章。在《国色天香》的上层中，既收了《加徐达右丞相兼太子少傅诏》这样的历史文献，又收了淫秽的《风流乐趣》。在另一处，既收了时文《贺正德皇帝南巡回銮帐词》，又收了《金莲供状》和《赵氏谋杀亲夫供状》。在丛杂并收的要求下，也偶有可取之资。如《朱翼》一书中介绍了利玛窦的新学说，因为这在当时是颇为新鲜的事。这类书另一个缺点是互相抄袭，你抄我，我抄你，再托名冯梦龙、袁中道编辑，作风实在要不得。

杂志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内容多样，二是定期出版。用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明末出版的这些书，第一个条件是具备的，但第二个条件还没有成熟。以《燕居笔记》为例，这书有好几个版本，如“何（何大抡）本”、“林（林近阳）本”、“冯（冯梦龙）本”等。各种版本上，标明“重刻”、“新刻”、“增编”等字样，各种版本的作者、校阅者都不一样，上面所署“某某编”、“某某序”也不大可信。各本的内容被搞得很乱，很少出新。但始终没有人从更新内容、定期出版上动脑筋。向真正的杂志，始终没有跨出这关键的一步。

二、杂志雏形的两种类型

（一）以文言短篇小说、传奇故事为主的杂志雏形

1.《万锦情林》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余象斗刊印。书首封面有七个题目：一汇钟情丽集、一汇三妙全传、一汇刘生觅莲、一汇三奇传、一汇情义表节、一汇天缘奇遇、一汇传奇全集。这七个“汇”意指卷名。但其中第五汇“情义表节”正文中没有内容，有题无文。全书实际只有六卷。正文上下两层，有文有图。六卷和具体内容如下：

卷一下层　钟情丽集：辜辂、瑜娘爱情故事11段。

上层　“华阳奇遇”等爱情故事8则。

卷二下层　白生三妙传：白生和三妙的爱情故事15段。

上层　“裴航遇仙”等故事7则。

卷三下层　刘生觅莲：刘一春和茂华的爱情故事。

上层　“东坡三过”等故事7则、“辨本”3则、“疏类”5则、“书信”3则、“联类”30则、“判类”9则。

卷四下层　浙湖三奇：吴生和鸾姐爱情故事9段，启元和群娘爱情故事5段。

上层　“诗类”91则、“吟类”7则、“行类”3则。

(卷五原缺)

卷六下层　天缘奇遇：祁生和仙子爱情故事7段。

上层　“词类”21则、“歌类”13则、“赋类”4则、“曲类”3则、“题图类”8则、“文类”6则、“赞类”5则。

卷七下层　传奇雅集：幸生爱情故事9段。

上层　“箴类”6则、“铭类”7则、“状类”3则、“附杂类”35则（有妻贤致贵、妓出嫁、夫妇同棺、虎祸、病洁、官妓骂贼等）。

从以上目录可以看出，这本书以爱情故事为主，广收各体文章，内容多样。

2.《国色天香》

明万历刊本，题“抚金养纯子吴敬所编辑，大梁周文炜如山甫重梓”，10卷，又名《幽闲玩味夺趣群芳》。上下两层。

下层是传奇。各卷所载有：《龙会兰池录》（即“拜月亭”）、《刘生觅莲记》、《寻芳雅集》、《双卿笔记》、《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还有话本《相思记》（即“风月相思”）、《东郭记》（即“中山狼”）、《张于湖传》（即“玉簪记”）、《续东窗事犯传》、《古杭红梅记》。

上层是诗词赋、短篇小说、各种杂著。它们的名目是：珠渊玉圃、搜奇览胜、士民藻鉴、规范执中、名儒遗范、台阁金声、资谈异语、客夜琼谈、修真秘旨，这9个名目，和今天杂志的栏

目设计很相似。（图41）

（二）以戏曲歌词为主的杂志雏形

1.《玉谷调簧》

全称《鼎镌精选增补时兴滚调歌令玉谷调簧》，5卷，吉州景居士汇选。正文首题全名，下署“书林刘次泉绣梓”，内封署“书林刘廷礼绣樟”。

正文分三层，上下层都是戏曲的选段，其中颇多罕见的曲目。中间一层最狭小，载时调、妙曲、灯谜、酒令等。书中有插图。每卷的卷首为单面图，正文的图嵌在正文中，所占位置很小，图很精美。

2.《词林一枝》

全称《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3卷。古临玄明黄文华选辑，瀛宾郗绣甫同纂，书林同镌萧腾鸿、陈聘洲。万历年间建安书林叶志元版。


即盤塘鎮見一
水仙祠墻垣[illegible]
黃土中庭紫荊
紛然及登祠觀
之但見所設之
像與夜來女形
無異後[illegible]
有所禱神即[illegible]
之水無[illegible]學士而終
○詩咏漁翁
實以道富國[illegible]一日退居湖山有一
[illegible]排徊于其側問之曰汝何為[illegible]
成字也香。
復舉手整冠仰數梅花見古梅[illegible]短墻
東西間隔墻似有女聲者乃以折梅為
由履扁石窺之一女淺妝淡飾年可十
六七手執梅枝口中吟曰今日有梅[illegible]
新花已自生忽回頭見生遽掩身生
心贊曰氷肌玉質[illegible]陽笑出花間
語獨擅百花之魁不[illegible]塵埃中有此仙
品俄而師至與生遊于適然園至紅雨
亭亭中有桃花紙掛屏針刺小詩一絕
小園日涉已成趣引得東風到草堂惟有
芳桃解春意笑舒粉臉待劉郎
生玩之似有喜意師笑曰此吾甥女所

图41
杂志雏形（小说类）《国色天香》。

内封面上大字题“刻词林第一枝”六字，上面有小字横批“海内时尚滚调”六字，中间有小字识语三行：“千家摘锦，坊刻颇多，选者俱用古套，悉未见其妙耳，予特去故增新，得京传时兴新曲数折，载于篇首，知音律者幸鉴之。书林叶志元梓。”

书的正文分上中下三层，上下层是戏曲选段，中间一层收《新增楚歌罗江怨》等。书中有单面插图。（图42）

第六节　木板年画

明代，全国各地都有木板彩色年画的刻印，明末尤盛，成为一种专业的美术出版事业。这种年画保存下来的实物很少，文字

资料也不多。从一些零星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大概。

从出版事业的角度来说，木板彩色年画和书籍插图版画，是两种不同的系统。刻书籍插图的是书坊，刻的主体是图书，版画作为书籍的插图存在，书坊一般不印单张的年画。单张年画是木板年画社刻印的，他们不印书籍。书坊以读书人为服务对象，年画社则以城乡下层人家为服务对象。他们之间有雅俗文野之分。二者的销售渠道不同，刻印技艺也有差异。

在地方志等资料上查知，明末刻印彩色年画的地方颇多，如直隶武强地区、北楼地区、杨柳青地区，河南开封朱仙镇，南直隶扬州、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四川绵竹，湖广楚雄滩，福建漳州、泉州、四堡等。在有关的地方志上，这些年画社都自称从明代开始刻印年画，一直延续到清朝、民国。现在可见的存世的年画有弘治元年（1488年）的《九九消夏图》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寿星图》。



图42
杂志雏形（戏曲类）《词林一枝》。

直隶的武强和北楼有较多史料记载。武强在直隶的中部，年画作坊在明初就已经成立，起初绘刻神马和关公像，永乐年间开始制作其他年画，如《雄鹰图》、《卧美人》等。明末时，武强城里有出售年画的店铺140多家，从业人员500多人，在外地开设批发庄40多处。在武强城周围的42个村子里，有作坊100多处。《深州风土志》中说："武强地瘠人贫，物力稍绌，民往往画古今人物，刻板杂印五色纸，入市鬻售。"[1]

【1】转引自《河北省志》83卷《出版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直隶南部隆尧有一个北楼神马刻印作坊，明末时成立，起初只销售年画，后来自营刻印，从四五家发展到几十家，从事贩卖的有上百人。[2]

【2】同上。

河南朱仙镇（在今开封市），历史上是四大名镇之一。明末



图43
木板年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寿星图》。此为复制品。

【1】2000年12月22日南京《扬子晚报》C21版,《世界绝活面临失传危险》。

时，年画业盛行，作坊200余家，从业人员上千，年销达3 000万张。每年入冬，全国各地客商云集，车装船运。后来因黄河淤塞，运输不便，渐趋衰落。清末作坊减至40家，建国前还有22家，现已不存，只有少数人在整理研究。那里至今还保存板片有明代2张、清代8张、民国23张。[1]

苏州的桃花坞年画也在明末兴起，至今还在经营。20世纪50年代，日本美术家返赠给苏州桃花坞一幅他们珍藏的桃花坞年画的复制品，题《寿星图》，上面标明作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此图原件在日本。（图43）

木板年画的内容，各地大致相同，如历史故事、传统戏文、人情风俗、繁华百戏、节日时令、时事新闻、男耕女织、风景人物等。

过去，出版史中往往不谈年画这一类，把它放到美术史、木刻史中去研究。其实，年画是一种美术出版物，在出版史和美术史上，都应该有一定的地位。

第五章　明代的出版机构

明代出版机构和前代相似，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种基本类型。此外还有明代特有的藩刻以及书院和寺院的刻书。

据有关书目记载，明代出版机构的总数有六七千个之多，但是在这个数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些只刻印过一种书的私家或县级地方政府，很难说是一个“出版机构”。

出版机构中最多的是私刻，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商业性的书林坊刻，有名可查的约有近千所。各省县的分布很不均匀，刻书的数量也相差悬殊。官府的刻书情况，省一级政府都有刻书记载。特别是在编刊地方志的高潮中，几乎所有的州、县都有过出版活动。

明代刻书的集中地区有的是继承前代的，如福建、南京、苏州等，也有新兴的，如南直隶徽州、浙江等。各地的刻书还各有各自的地方特色。

第一节　明代出版机构概况

一、明代出版机构类别

出版史上，通常把主持刊刻的人或单位作为一个“出版机

构”来看待。刊刻者的姓氏、单位，一般在扉页、牌记上标明，由此可以判断其为官刻、还是私刻、或坊刻。

明初，官刻是主阵地。官刻单位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中央各部门有南北国子监和司礼监经厂，以及中央各部各院。各级地方政府包括省、州、府、县官署和各级儒学、书院，以及其他业务部门。军事机构卫所有的也刻过书。私刻的主持人是致仕的官员、文人，也有少数布衣、医生、僧人。坊刻的主持人是各种书林、书坊、书肆、书铺的业主。

和前代相比，明代的出版机构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 省、府、州、县出版机构大增，主要是在明代后期，全国各府州县全面编刊地方志，各级地方政府都成了出版机构；

2. 藩王府和远裔宗室从事出版活动，有些王府有一套完整的出版设备和人员；

3. 延续几百年的传统书坊继续出书，还出现了不少新的书坊；

4. 由于社会风气的原因，私刻数量大为增加；

5. 出现了几个新的出版集中地区。

出版机构的实际情况是丰富复杂的，能否构成出版者或出版机构，主要是看谁主持其事，谁出资金。出资者和主持者不一定是一个人，视具体情况而定。有几种情况需要提出来略作分析：

一是个别刻书单位不大好归属。最突出的是毛晋的汲古阁。汲古阁是坊刻，应无异议。因为它具有商品生产的一切要素，所刻的书在国内外长久销售。但有好几种出版史著作，却把汲古阁列为“私刻”，理由是：毛晋是读书人，刻书重品位和质量；也有人认为毛晋刻书的早期，用“绿君亭”名义出书时是私刻，后期用“汲古阁”名义时是坊刻。其他还有一些人，如闵齐伋、凌濛初等人的刻书也有类似情况。

二是有些书究竟是书坊所刻，还是私家所刻，不大好分辨。因为不论是书坊主还是私家，都喜欢用一个书卷气的名称，如堂、斋、轩、楼之类。因此，单从牌记中的名称来看，分不清究竟是商人的坊名，还是私刻者的斋名。一些版本家认为，这种用

堂、斋、轩、楼为名所刻的书，大多数已经查清楚它们究竟是私刻还是坊刻。其实还有一部分书至今没有分辨清楚。

至于藩刻的归属，大多数都将其作为“官刻”统计，因为它是“官刻的延伸”，寺院的刻书则归属私刻类统计。

以上几种出版机构的归属虽有问题，但并不影响研究工作的进行，只在数字统计时会产生一些麻烦。

官刻、私刻、坊刻三分法是研究古代出版史常用的方法。除了这种界分法以外，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出版机构”的类别。从出版的含义来讲，一个纯粹的、完整的出版机构，应该具有编纂、刻印、发行三项职能。常熟的汲古阁、福建的三台馆都是具有三项职能的完全的“出版机构”。但是，有相当多的出版机构并不如此“纯粹”。有些出版机构“大于”三项业务，像中央政府的国子监、地方政府的布政使司以及县衙等，他们的主业不是出版，刊行图书仅仅是他们的一项事务。另一些出版机构的业务“小于”三项职能，只从事其中的一项或二项业务。如有些书商只买卖图书，不管编书刻书；黄氏刻工集团只管刻书，编书和发行都不管；藏书家只管收藏，不管编纂和发行。

根据这种状况，对“出版机构”要有必要的界定。本章讨论的“出版机构”，是指至少刊刻过一种图书的主持者。

二、明代出版机构总数

在这一小节里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明代一共有多少出版机构；二是明代出版机构的构成情况如何，三种类型的出版机构大约各占多少。

著录明代出版机构的书有两部，作者都是近人杜信孚先生。一本是1983年出版的《明代版刻综录》，另一本是2002年出版的《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两书都以“刊者”为纲，前者共著录“刊者”5 200家，后者共著录“刊者”5 400家，相差不多。现以后一种为准，罗列其结构成分如下：

1. 国家级出版机构21家；

2. 省府州县级出版机构209家；

3. 藩王及宗室出版机构66家；

4. 寺庙出版机构及僧人刻书75家；

5. 书坊766家；

6. 私刻4 374家（含难于分辨的部分）。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刻书机构中最多的是私家，约占总数的80%，即使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坊刻，但数字不会太多；其次是书坊刻书，大约占15%；官刻约占4%。但杜信孚的这两部书都不收地方志，因此上千个府州县都没有计入，如果把这部分算进去，官刻机构的数量就要大大增加了。

杜信孚的分省刻书著录给我们两个突出的印象：1. 各个省的出版机构数相差悬殊，最多的如南直隶（包括今南京、江苏、安徽）约2 010家，浙江990家，福建575家，而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不足50家。2. 各省书坊刻书的悬殊情况更甚，南直隶有385家，福建251家，浙江101家。除了这三省有众多的书坊以外，其他省都不发达，江西、湖广、广东、四川四省都只有几家，其他如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广西、贵州、云南诸省都没有书坊刻书的记载。这些省份中是否完全没有一家书坊呢，也很值得注意。

下面再来看几个省的出版史资料中著录的情况：

1. 今江苏省：《江苏刻书》一书中统计今属江苏省境内的材料，共著录明代图书1 267种，刻书机构共657家，其中官刻72家（约占11%），私刻493家（约占75%），坊刻92家（约占14%）。私刻最多。[1]

【1】江澄波等：《江苏刻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江西省：《江西古今书目》一书刊载，江西人著作4 122种，包括江西人流寓在外的著作，以及外省人在江西刊的图书。另《江西历代刻书》载，明代江西刻书888种，刻书单位423个，其中官刻92家（约占22%），私刻324家（约占76%），坊刻7家（约占2%）。江西的坊刻特别少，原因待研究。[2]

【2】《江西古今书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江西历代刻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福建省：《福建古代刻书》和《福建出版史话》两书中提

到，明代福建省署和9个府、47个县都刻了书，坊刻单位不大好统计，因为有些书坊一再变换坊名，大致不会少于200家，私刻则有233家。[1]

【1】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瑞良：《福建出版史话》，厦门，鹭江出版社，1997年。

第二节　各级政府的出版机构

一、国子监

明代有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出版机构，一个是国子监，一个是司礼监经厂。前者略同于“国家”出版机构，后者则是“皇室”出版机构。

国子监又称国学、国子学，也称太学，是培养最高级人才的机构、最高学府，负责重要经典的勘定、颁布、解释、讲授等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

朱元璋攻克建康后，就成立了国子学，当时是龙凤丙午(1366年)，还没有建国。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称国子监。国子监集中了两方面的文献：一是大将军徐达平定大都时所获的图书、版籍、法服、祭器、仪象；二是集中了杭州西湖书院所藏的宋元旧版，又从南京集庆路儒学等处调去一些版片。在国子监里，集中了大量典籍、稿本、版片，具备了刊印图书的基本条件。永乐元年(1403年)，又设北京国子监。这样，就有了南北两个国子监。

南北两监都有专门的史志。南监有嘉靖年间出版的《南雍志》；北监有成化年间的《国子监通志》、弘治年间的《国子监续志》、嘉靖年间的《皇明太学志》。这些史志中都记载了国子监出版图书的情况。

国子监中有专人负责刊印图书之事。弘治《国子监续志》说“本监设典籍一员，以掌书籍，又设印刷匠四名，以给其役”。所记人数似很少，但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参证。

南北国子监都以出版正经正史和其他儒学重典为主要任务。

南监成立之初，集中了大量版片，总数有300种158 755叶。[2]

【2】据［明］梅鷟《南雍志·经籍考》统计，各种文献统计略有出入。

（图44）和原书相比，缺损不多。南监所获集庆路儒学21种书的版片，原数应该是26 052片，缺失1 386片，所缺不到百分之五。例如篇幅最多的《新唐书》应该有4 981片，实有4 796片，只缺

南廱志
經籍考
先民有言皋夔稷契何書可讀愚竊以爲非通論也后啟胥師徵於政典說命告君學於古訓而周官三皇五帝之書掌於外史何爲者邪孔門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學在於讀書亦可見矣刪述以來天之牖民騭書是賴其可廢邪然春秋絕筆而遷固諸史作日入於贅矣孟軻云亡而荀揚諸子作日入於駁矣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讃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韓歐不作而諸家之文日以支離矣至於類書以文韻書以字圖本石刻之屬何以紛紛也及太極西銘定性與夫通鑑之書出而朱子集其大成孔孟之道復明於世
皇明聖神繼作形諸堯言渾渾灝灝與典誥相表裏萬世之所誦法者皆於胄監乎頒焉奚可無紀邪夫漢不患無蘭臺而患無劉中壘唐不患無芸閣而患無顏祕書宋不患無石室金匱而患無宋集賢然則去取之當校讐之精亦存乎其人焉爾今依舊志以官書爲上篇梓刻爲下篇系之曰經籍考
上篇
官書本末

考上　一

明太學經籍志　皇明太學志卷二　典制下　經籍
圖書發天地之精方册布文武之政首德識學古乃以入官周公百篇孔子三絕古之聖哲曷嘗不載籍之求哉以道則考諸經以事則訂諸史以率典章則探當代之載以存隱賾則兼百氏之言士之致用鮮不由此
國家於太學設掌籍之官所貯之書或取之四方或頒於秘府
宸文御冊動費瓊林板刻修藏屢
詔命右文作士煥乎盛矣讀之者知踐修之實守之者謹散逸之防其庶乎不負
盛明之典哉
洪武六年秋八月甲申博士趙俶等朝於
奉天殿
上召至御前命之曰爾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縱橫之術詐故得行其術宜戒勿讀俶等頓首受命而退
十四年夏四月丙辰朔
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十五年冬十一月壬戌

學志　二

图44
上：南京国子监出版物的记载《南雍志·经籍考》。
下：北京国子监出版物的记载《明太学经籍志》。

少85片，稍事补刊，就可以再次印刷。理所当然，南监把工作重点放在补版重印上。据记载，南监曾大规模补版7次，最早一次在洪武年间，最后一次在天启年间。可以说，整个明代，南监都在忙这件事。[1] 这样，在我国的图书版本中，就产生了一种“宋元明三朝递修本”。（见书前彩图）一项出版工程持续三个朝代，几百年时间，不断地修补重印，是文化传承中罕有的事，可以看出雕版印刷术的巨大生命力。到了明代的后期，南监也刻了不少新版书。最重要的十七史，全部重刻了一遍。

【1】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第六章第二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南监补刻和新刻的书，据《古今书刻》的著录是273种，《南雍志》著录305种，《明代版刻综录》著录28种。三者去重后为360种。出书的结构是：制书19种、经书60种、史书52种、子书25种、文集23种、类书9种、韵书9种、杂书109种、其他4种。

北监出书以翻刻为主。《古今书刻》著录41种，《明太学经籍志》著录69种，《明代版刻综录》著录20种。去重后为100种。北监最重大的成就是依闽版刻《十三经》。还用了10年时间（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1596—1606年），依南监本的样式刻了《十七史》。北监刻的书，评价较差。看来，明代的政治中心虽然在北京，出版中心却在南京。

国子监刻书经费比较困难，据有关记载，有时是国子监据实呈报，由工部开销；有时是把赃官的罚款和不法寺院的罚款拨给国子监，还有官员的捐俸、本监师生的“干鱼银”、户部的“羡余银”等。据载，还曾实行过一种“以刻代罚”的制度，但是效果并不大。[2]

【2】关于南京国子监刻书经费来源资料，详见《南雍志·经籍考》下卷。

二、司礼监经厂

明代皇室有宦官掌管的内府二十四衙门，司礼监居二十四衙门之首，管理皇城之内一切礼仪、刑名、当差、听事诸役。后来，又专掌机密，批阅奏章，实权极大。经厂是司礼监的下属单位，负责刻印皇室所需图书和皇帝批准出版的各种图书。

国子监由学问渊博的儒臣负责，出版正经正史等学术价值高的图书。司礼监则由太监负责，出版以佛道经书为大宗，并出版

皇帝批准的政治、诰谕、内务等方面的“制书”，以及谱牒、御制诗文等书。皇朝的两大出版机构，分工是很清楚的。国子监也出版“制书”和政法类图书，但不出佛道宗教书；经厂则不出正经正史。司礼监所出的书，一般称“内府刻本”，中央其他机构所出的书，也通称为“内府刻本”。

经厂的规模很大，管理人员有掌司、提督、监工等。印刷工人很多，大都由“班匠”充任。所谓“班匠”，是一种徭役制度，也就是无偿到皇城当差。明初，内府有制字匠150名，两年一轮。明嘉靖十年（1531年）皇府整顿内府工匠，革去老弱残疾有名无实者15 167名，实留12 255名，其中司礼监为1 583名，其中一部分便是在经厂刻印书籍的人员。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出版机构。

经厂所出的书，《内板经书纪略》著录158种，共566 358叶(包括三部经藏)；《古今书刻》著录83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明代版刻综录》等著录的经厂本都只有数十种。几种统计数字去重后为192种。具体内容为：制书72种、经书39种、子书25种、史书21种、医农卜筮18种、诗文17种。一般说法，经厂出书200种。下面把经厂本中卷帙最大的书列出来，从中可以看出经厂把力量投放在哪里。

1.《佛藏》180 082叶　　2.《番藏》150 074叶
3.《道藏》122 589叶　　4.《文献通考》10 836叶
5.《历代名臣奏议》9 720叶　　6.《事文类聚》8 365叶
7.《大明会典》6 590叶　　8.《少微通鉴节要》4 428叶
9.《通鉴纲目》4 020叶　　10.《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4 982叶
11.《资治通鉴纲目》4 100叶　　12.《历代通鉴纂要》3 630叶
13.《大明一统志》3 150叶　　14.《性理大全》2 169叶
15.《雍熙乐府》1 793叶　　16.《增定华夷译语》1 708叶
17.《通鉴节要续编》1 683叶　　18.《四书大全》1 598叶
19.《大明集礼》1 472叶　　20.《重刻证类本草》1 345叶

以上20 种书，共计524 334叶，占经厂书版总数的93%。

经厂刊印的三部宗教大藏，共计452 745叶，在全部书版中占86%。刊刻之后，又大量印行，供天下寺院请经，可见经厂是一个规模极大、能刻能印的大型出版机构。

经厂刻书经费充足，人力物力富裕，所刻书讲究气派，用料考究，开本大，字体也大，很容易辨认。但经厂的主持者是宦官，校勘粗糙，内部管理也不好，版片散乱，厂内空地被占为圃，版片“湿损模糊，甚致劈毁以御寒”。司礼监官员刘若愚说得好：“内官发迹，本不由此，而贫富升沉又全不关乎贪廉勤惰，是以居官经营者多长于避事而鲜谙大体。”再加上经厂财大气粗，书的装帧过于奢华，因而受到儒臣们的蔑视，认为他们本不配管理刊印经典这样的大事。[1] （图45）

三、中央其他部门

都察院

都察院即前代的“御史台”，是检察、监察机构，“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2] 明代中

【1】经厂刻书资料主要见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中的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2】《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内板經書紀略　明 宦官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

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宦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柘黃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或占空地為圃以致板無晒處濕損模糊甚致劈毀以禦寒去字以改作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浥損鼠囓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板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

內板經書紀略　二　仁和吳氏雙照樓刊

萬曆初年較蓋已什減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核齊理又無簿籍數目可考以憑銷算蓋內官發跡本不由此而貧富升沉又全不關乎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營者多長於避事而鮮諳大體故無怪乎泥沙視之也然既屬內廷庫藏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條陳曾不思難得易失者世間書籍為最甚也昔周武滅商洪範訪自箕子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將有用圖書蕩擲無用之地豈我祖宗求遺書於天下垂典則於萬世之至意乎想在天之靈不知何如其惆然何如嘆息也今上天

图45
司礼监经厂的刻书记载《内板经书纪略》。

央机构中，都察院出书比较多。《古今书目》中著录33种，其中只有一种是和都察院业务有关的（《都察院巡方总约》），有不少是文史类图书，如《史记》、《文选》、《杜诗集注》等。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更是其他官方出版单位不出版的。有人认为，因为都察院是清水衙门，出版这类书是想赚点钱。但这仅是猜测之词而已。

钦天监

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数、占候、推步等工作。每年的冬至，钦天监编出次年的历书，先印出15部移礼部，再颁行给二京十三省作样本，二京十三省据此翻造。当时，朝鲜、安南、琉球、真腊、暹罗、爪哇等国也用大明正朔，这些地方的历书由北京印送。钦天监有印刷匠28名，裁历匠2名，表背匠1名。据多种书目汇总，明代276年中现在还保存着99年的历书，十分珍贵。钦天监除了刻印历书外，还刻印过《天文刻》一书，不知是什么内容；还刻印过《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分发给诸王，这本书是《大明一统志》的前身。（图46）

图46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此为清抄本。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凡例
欽天監原定十二分野分配州
異同今考于後
初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
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
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
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

礼部

礼部“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礼部所出的书有不少和科举有关，最重要的是登科录和会试录。明代科举三年举行一次，每次考过之后，立即印行《登科录》、《会试录》。（图47）《登科录》的内容包括全部进士名单，注明籍贯、字号、出生年月日、曾祖、祖父、父母、兄弟的姓名简历。书后附考试题目及前三名的答卷。《会试录》的内容则把全部赴京考试的举人的姓名录入。这种最高级的考试，明朝一共举行了80多次。

据《宛署杂记》卷十五载，北京在举行考试时，贡院内有专门的刊字匠房11间，工人48名，乡试后不几天，《顺天乡试录》就刻印完成，可见其效率之高。

礼部所刻的书见于著录的还有《大狩龙飞录》、《大礼集议》、《诸番诏敕》、《洪武礼制》、《明伦大典》、《皇明宝训》等，还出版过少量医书。

兵部

见于著录的兵部刻书有《大阅录》、《九边图说》、《历代武举录》、《军令》、《昭代武功编》等，都和军事有关。明代武举不经常举行，《武举录》的刊刻很少。

工部

刻书记载极少。见于著录的有《御制诗》和《工部厂库须知》等。还有一本《奉制纪乐赋》，是嘉靖看了《舆地图》之后和臣下的唱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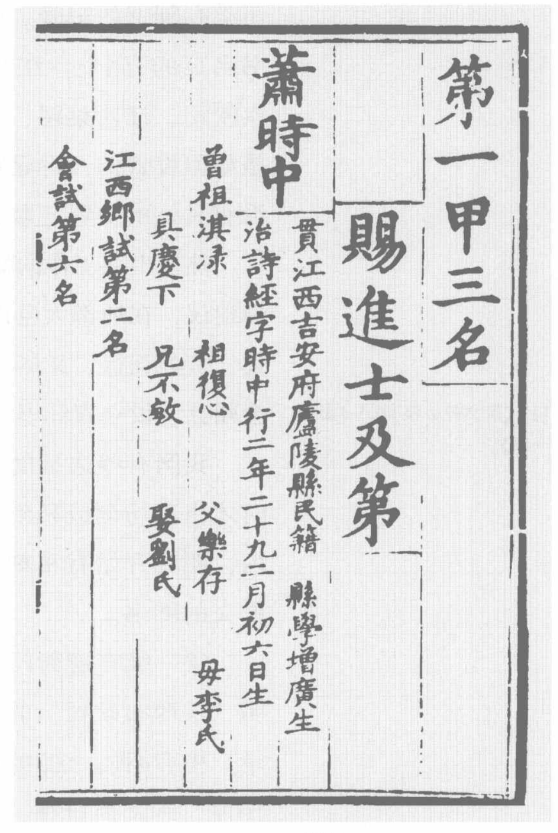

第一甲三名
賜進士及第
蕭時中
貫江西吉安府廬陵縣民籍 縣學增廣生
治詩經字時中行二年二十九二月初六日生
曾祖淇泳 祖復心 父樂存 母李氏
具慶下 兄不敏 娶劉氏
江西鄉試第二名
會試第六名

图47
礼部刻书：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

太医院

明代太医院刻印了一些与医药有关的书，如《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经验奇效良方》、《补要袖珍小儿方论》等，还有一本《大明律直引》。

四、各级地方政府的出版机构

（一）省级政府的刻书机构

明代有二京十三省。省的正式名称是布政使司，十三个布政使司都刻印图书，由于各省文化基础和经济条件不同，出版图书的数量相差悬殊。在省级机关中，布政使司出书最多，其次则为按察司、学署、书院等，还有一些专门机构如盐运司、督粮道等，卫所巡道等也偶有刻印图书的。如福建、两浙、两淮的盐运

司都有刻书的记录。以江西省为例，省一级刻书单位见于牌记或书名页的有6个：江西抚署、江西省署、江西布政使司、江西按察使司、江西臬司、江西学宫。在这些省级衙门中，刻书的机构是如何设置的，选题如何确定，校勘、刻印、销售如何运作，都没有具体的史料记载，只有一些行政负责人个人行为的记载。

热衷出版工作的翰林学士、《永乐大典》监修解缙曾经向朱元璋建议，在通都大邑设立出版机构，解缙说："宜令天下投进诗书著述，官为刊行。又尽行刊完国家所藏欠缺书籍，并于京城及水陆通会州县，设立官开书坊一所刊书。"[1] 结果如何，未见记载。

【1】《解文毅公集》卷一《太平十策》。

我国有些边远的省份，在宋元时没有出版图书的记载，明朝时才出现坊刻或私刻，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例如在今青海省境内，明朝开始有私刻；今云南省境内，明朝开始有坊刻，并且有彝文的图书。

省一级官府衙门刻印些什么书？以陕西为例，明版图书中标明"陕西布政司"的书，《古今书刻》中有35种，《明代版刻综录》中有4种。这39种书的内容是：经类3种、史类11种、医农类10种、诗文类11种、其他4种。在史类中，和陕西有关的志书有3种，即：《陕西通志》、《长安志》、《马政志》，其他是一般的史书，如《国语》、《史记》、《汉本纪》等。其他省出版的书，情况大体相似，如湖广出《湖广通志》、河南出《河南通志》、云南出《滇南志》、贵州出版《诸夷图》。除了这些有地方特点的书以外，其他则有很大的随意性，不限于一端。

（二）府、州、县政府的刻书机构

明代全国共有府和州百数十个，县一千一百多个，大多数府州县都有刻书活动。府、州、县刻书时，或从外地请几个工匠来，或委托邻县代办，书上虽然标明"某某县署刊"，其实没有刻书的实体。从现有的资料看，南直隶和文化发达行省，下属府州县刻书较多。如南直隶的应天、苏州、常州、扬州、淮安、松江、镇江诸府出版的书较多。

地方政府刻印了不少当地名贤等地方文献，给后人留下了不

少有价值的书。如建宁刻《西山真文忠公文集》（真德秀，建州浦城人），宁波刻《清容居士集》（袁桷，鄞县人），宁国刻《八代诗乘》（梅鼎祚，宣城人），宁德刻《石堂先生遗集》（陈普，宁德人），长兴刻《天目先生集》（徐中行，长兴人），太平书院刻《韦刺史诗集》（韦应物，曾在滁州为官），九江郡斋刻《陶靖节集》（陶渊明，九江人）。

各府州县还注意出版介绍本地风光的书，例如山东的泰安在嘉靖时刊《泰山搜玉》（袁稔撰）、万历时刊《岱史》（查志隆撰）、《泰山纪事》（宋焘撰）等。出版这些书的目的是标榜本地人文之美，让子民们见贤思齐。

各级地方政府刻的书，除了政府部门之外，还有儒学和书院也刻书。山西有河东书院、河津正学书院、解梁书院、河汾书院。南直隶有长水书院、礼宗书院、正谊书院、东林书院、敬业书院、维扬书院、苏州府学、吴江县学。江西有江西学宫、紫阳书院、白鹿书院、濂溪书院、崇正书院、白鹭洲书院等。藩府刻书和书坊刻书有些也用“书院”的名称。

第三节　藩王府刻书

一、历史上的特有现象

明代实行封王制度，皇帝的儿子，除了立为太子的以外，其他诸子，都封为亲王，又称藩王，授给他们金册金宝，每岁俸禄万石。为了加强边防，并防止他们在京城生事，骨肉相残，封地有的在边远地区。藩王府中设立官属和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至上万，但这些兵士仍属兵部统辖。诸王到一定年龄，一定要离开首都到封地去，称为“之国”、“就藩”。如不及时“就藩”，留在京城，就会有种种猜疑。到了封地后，不许随便回到首都去，即使皇帝死了，到京城奔丧，丧事完毕后便要立即回去。诸王之间，不许来往。这种做法，称为“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

民，食禄而不治事”。[1] 为了引导诸王把精力投向无害的方面去，皇帝刻印或缮抄了图书，都要送给诸王一部。据载，洪武年间，藩王之国时，都赐给词曲一千七百种。这个数字很可怀疑，因为明初似乎并没有一千种之多的词曲印品。

分封到各地去的藩王表现不一。有的好学能文，体恤下民；有的终日玩乐，甚至照样起兵造反，争夺皇位；或者在封国里横行跋扈，杀人抢地，结果被夺位除封。终明朝一代，皇子封王共有62人。藩王的后代们，则封为辅国、奉国、镇国将军或中尉等。据张瀚《松窗梦语》载，“二百年来，宗支繁衍”，嘉靖中宗室有“一万五千余”，到了隆庆初年，达到“丽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2]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气氛中，产生了一批读书修文的藩王，他们筑楼藏书，写作诗文，刊印图书，藩王府也就成了刻书机构。在明代之前或之后，都未曾如此繁盛过。

【1】《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八《宗藩纪》。

二、藩府刻书概况

藩刻的总数，各本书目记载不同。《古今书刻》载142种，《千顷堂书目》载244种。

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载，藩王宗室中善长写作的有名可考的有92人，著书359种，其中诗文集约112种。藩府所刻的书，一般都标明“某府”、“某藩”、“某国”字样，也有的采用堂、轩、书院等名称。有过刻书记载的藩府计43藩，他们是：

太祖子：秦、晋、周、楚、鲁、蜀、代、辽、庆、宁、岷、韩、沈、唐、伊

太祖侄孙：靖江

成祖子：汉、赵

仁宗子：郑、襄、淮

英宗子：德、崇、吉、徽

宪宗子：兴、益、衡、汝、荣

神宗子：福

郡王：南陵、博平、武冈、华阳、山阴、光泽、弋阳、新乐

其他：蒲、津

这些藩王府的分布地区涉及7个省，最多的是河南（10府），其次为湖广（7府）、山东（4府）、陕西（4府）、山西（3府）、四川（1府）、广西（1府）。

各藩王府刻书的数目多少不等，下面介绍一种统计数字：

刻书50种以上：弋阳府56种。

刻书20种以上：蜀府38种、楚府26种、周府23种、宁府22种、赵府20种。

刻书10种以上：辽府18种、庆府13种、益府12种、沈府11种。

刻书10种以下：唐府8种、秦府8种、德府8种、鲁府7种、晋府7种、吉府6种、徽府6种、代府5种、衡府5种、伊府4种、崇府3种、潞府3种、襄府3种、淮府2种、郑府2种、韩府2种、靖府2种、肃府2种、荆府1种、汝府1种、岷府1种、荣府1种。[1]

[1]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第六章第三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三、藩王府刻书的特色

藩王府刻书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因为他们并没有特定的出版要求，可以随自己的所长所好去选择。总的说来，刊刻正经正史较少。藩王刻书有所谓“四宝”之称，指宁藩的医书（如《病机气宜保命集》）、吉藩的子书（如《二十家子书》）、晋藩的文集（《汉文选》、《唐文粹》等系列）、益藩的茶书（《古今茶谱》等系列）。

藩府刻书有几个相对集中的热点：一是藩王们自己的诗文集，二是医药养生书，三是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书，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藩刻本质量不等，大都比较讲究，有些藩王养着一群文人，精心校勘，刊印了一些较好的本子。藩刻本中还有一些活字印本，如蜀府的《栾城集》84卷、益府的《辨惑篇》、《辨惑续篇》等。晋府几代人刻了《文选》、《文粹》、《文鉴》等文学总集。嘉靖皇帝曾称赞晋府“好学崇文”，赐给“养德书院”之称。

顾廷龙先生对藩刻本的情况有一段概括的评论，现摘录如下：

“明时藩邸王孙袭祖宗余荫，优游文史，雕椠之业，迈轶前朝，今可溯者殆十数家。蜀府最先，自洪武迄万历，传本不绝；宁藩自号臞仙，所刊多道家养性保命诸籍；他如唐藩之《文选》、吉府之《贾子》，于今传诵，余则代、崇、肃三府，各有垂典，并为世睹。此成化以前藩邸之概略也。嘉靖以下，晋府最著，淹雅奕世，戴美光启前业，其所署有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诸称，循名可觇其实，其所刊有《文选注》、《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初学记》诸书，浩瀚卷帙，为诸藩之冠；次则秦藩之《史记》、德藩之《汉书》、赵府之《诗辑》、益府之《玉篇》，并得擅美济武。而郑藩之通音律，所刊《乐律全书》尤为审音家所推重，不独以雕板著艺苑也。其他诸藩，曰周、曰徽、曰沈、曰伊、曰鲁、曰楚、曰辽、曰潞，一二精椠，更仆难数，河间、衡阳无与为盛。”[1]

【1】顾廷龙：《明代版刻图录初编》，卷四。

下面介绍藩府刻书中的著名人物以及他们的成绩：

朱橚：太祖第五子，初封吴王，改封周王，建藩开封。著有《元宫词》等书。他在开封种植可以充饥的野草400多种，一一绘图，成《救荒本草》一书；又和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编《普济方》168卷，书中列方剂2 175类，共61 739方，是现存历史方剂中规模最大的一种。

朱权：太祖第十七子，号臞仙、涵虚子、丹丘生等，初封大宁为宁王，永乐五年改封南昌为宁王。文武全才，著书50余种。如《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肘后神枢》、《太古遗音》、《异域志》、《采芝吟》等，“经子、九流、星历、医卜、黄冶诸术皆具，古今著述之富，无逾王者”。[2] 以《太和正音谱》为最著，有杂剧12种，今佚。

【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朱谋玮：字郁仪，朱权七世孙，封镇国中尉，著作有《诗故》、《古文奇字集解》、《藩献记》、《春秋戴记》、《枳园近稿》等112种。他的著作都“手自缮写，稿至数易，未尝假手小胥”。[3]

【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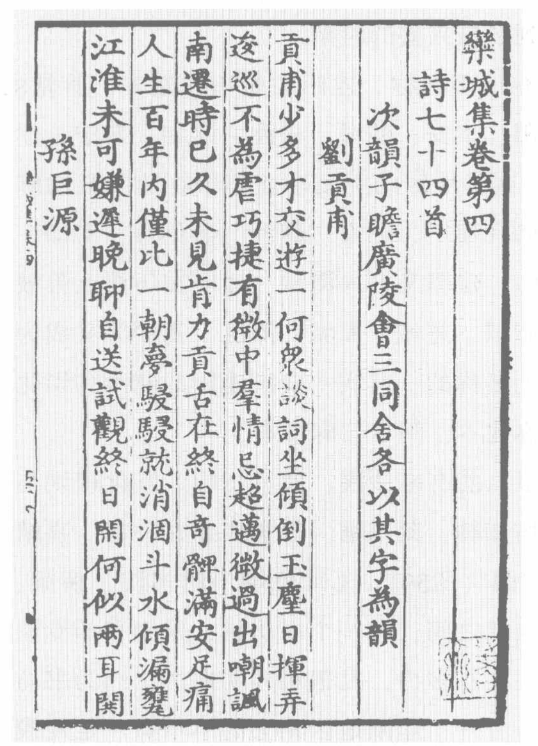
朱睦㮮：字灌甫，朱橚五世孙，封镇国中尉。家有藏书楼称“万卷堂”。有著作《五经稽疑》、《授经图》、《大明帝系世表》、

《陂上集》、《河南通志》、《中州人物志》等，还有家藏书目《万卷堂书目》等，共38种。

朱有燉：号诚斋，朱橚长子，袭封为周王，谥宪，世称周宪王。著有《诚斋杂剧》，共收杂剧31种，内容有道释、风月、节义等，以《曲江池》、《义勇辞金》等较胜，今俱存。又著有散曲集《诚斋乐府》。

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郑藩朱厚烷长子。著有《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嘉量算经》、《瑟谱》、《历学新说》等有关音乐、历算方面的书。

藩刻中的精品还有吉藩的《二十家子书》：关尹子、亢仓子、文子、尸子、子华子、鬻子、墨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列子、庄子、荀子、扬子、文中子、抱朴子、刘子、黄石公素书、玄真子、天隐子、无能子，益藩的《茶谱》12卷（21种），秦藩的《史记》130卷，赵藩的《资治通鉴纲目》59卷，德藩的《汉书》100卷，晋藩的《昭明文选》60卷，唐藩的《昭明文选》60卷等。（图48、图49）


欒城集卷第四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
劉貢甫
貢甫少多才交遊一何衆談詞坐傾倒玉麈日揮弄
逡巡不為詹巧捷有微中羣情忌超邁微過出嘲諷
南遷時已久未見肯力貢舌在終自奇髀滿安足痛
人生百年內僅比一朝夢駸駸就消涸斗水傾漏甕
江淮未可嫌遲晚聊自送試觀終日閑何似兩耳閧
孫巨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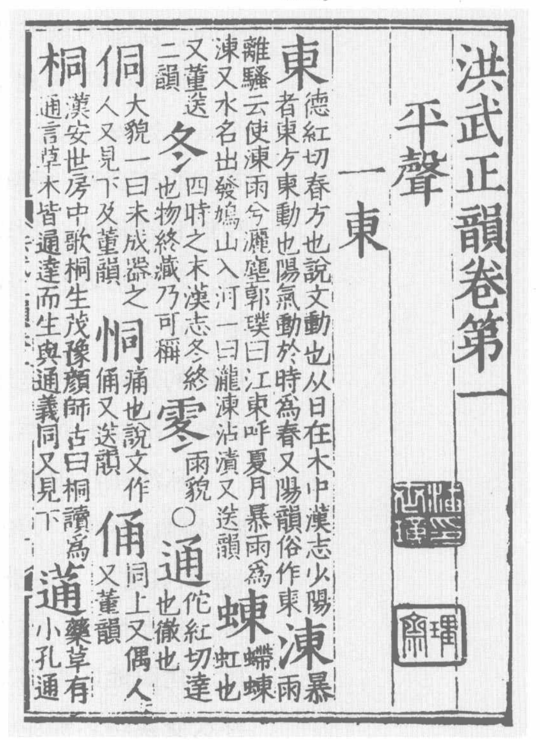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卷第一
平聲
一東
東 德紅切春方也說文動也从日在木中漢志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於時爲春又陽韻俗作東 涷 暴雨
離騷云使涷雨兮灑塵郭璞曰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又水名出發鳩山入河一曰瀧涷沾漬又送韻 蝀 螮蝀虹也
又董送二韻 冬 四時之末漢志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 零 雨貌 ○ 通 佗紅切達也徹也
侗 大貌一曰未成器之人又見下及董韻 恫 痛也說文作俑又送韻 俑 同上又偶人又董韻
桐 漢安世房中歌桐生茂豫顏師古曰桐讀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與通義同又見下 蓪 藥草有小孔通

图48（左）
藩刻本《栾城集》。嘉靖二十年（1541年）蜀藩朱让栩刻本。

图49（右）
藩刻本《洪武正韵》。隆庆元年（1567年）衡藩朱厚熵刻本。

第四节　坊肆刻书

一、福建坊刻

福建坊刻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北坊刻，一个是以四堡为中心的闽西坊刻。

闽北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宋代有所谓八大姓，即余、刘、魏、熊、蔡、陈、黄、王，可考的书林有55家，传世图书300多种，元代又增加郑、叶、吴、詹、张、朱、杨、高、傅诸姓，书林也有增加，传世图书169种。建阳书坊林立，居民大都从事刻书业，各家刻坊印书的墨水沿溪南流，汇聚在云海衢桥北河滩地，日久积成“积墨池”。元末，建阳书坊毁于兵火，但很快就恢复过来，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书坊又遭到一场大火，惊动了皇帝，专门派人“厘正”，几年后再次得到恢复。嘉靖、万历年间，建阳的刻书业达到了最兴盛的时期。

闽北建阳的刻书地有许多名称。建阳的府治在建安，管辖8个县：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寿宁。建安和瓯宁合称“建瓯”。这些地区的版刻事业集中在建阳县的麻沙街和崇化坊。所以，诸凡建宁、建安、麻沙、崇化等，实即一地。建宁附近有一座芝山，建阳又名大潭城，建安在历史上曾被王延政占有，称富沙。所以，芝城、潭城、潭邑、富沙等又成为那里的别称。凡是用以上名称的，其实主要指建阳的麻沙和崇化二地。那里的版本，泛称建本、闽本、麻沙本。

麻沙在建阳城西70里，前有麻沙溪，背有岱山。崇化镇则与麻沙隔山相望。两处书坊如林，刻书铺、售书店都在一起。嘉靖《建阳县志》有一张书坊图（图50），上面标明当时书院、桥梁、房舍分布情况。麻沙和崇化之间，有一个书坊村，是刻书的专业村。建阳地区刻书单位一共有多少，是很难弄明白的，因为书坊喜欢变换坊名和主人名。另外，建阳地区刻书的不单有一定规模



图50
［嘉靖］《建阳县志》卷四《建阳县书坊图》。

的大书坊，还有一二个人的只是偶一刻书的小作坊。到底多大规模才算是一个刻书单位，从来没有人界定过。

建阳地区的刻书单位，有不少资料可供参考。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列84家，《福建书店史》列185家（这是坊刻私刻合计数），《建阳刻书史略》列203家，[1]《明代版刻综录》载129家。下面以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为主，按书坊主的姓氏罗列于下，前有*号的是张秀民著作以外的资料中补充的。

余氏　余邵鱼（余象斗之叔），建阳书林文台余象斗双峰堂（又作余文台双峰堂、潭阳余氏三台馆），闽建邑书林余象年，余建泉余氏文台堂，闽书林文台余世腾，闽书林余良史怡庆堂（*余良进、*余完初），书林余君（一作“应”）诏（亦作潭阳三台馆），建阳余氏萃庆堂（余泗泉、余彰德），建阳余廷甫，潭邑书林余秀峰沧泉堂（又作庆余堂、怡庆堂），书林献可余应孔居仁堂，潭阳余元长，潭阳书林余应兴，闽建潭城书林余成章，闽

【1】《福建书店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建阳刻书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书林自新斋（余良木即余绍崖、余文杰、余明善、余泰垣、余允锡），闽建书林余仙源永庆堂，书林余氏双桂堂（又作双桂书堂），闽建书林余近泉克勤斋（又作克勤书堂余明台、余碧泉），*余应虬近圣居，*余昌祚直方堂，书林余季岳，建邑书林余熙宇勤德堂。

刘氏　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刘应康、*刘剡、*刘文寿，建邑书林刘氏安正堂（刘宗器、刘朝、刘莲台、*刘仕中），三建书林刘龙田乔山堂（又作建邑书林乔山堂、闽乔山堂，刘龙田、刘玉田、刘孔年、刘大易、刘少岗均称乔山堂），建宁书户刘辉，建阳书户刘洪慎独斋，龙田刘氏忠贤堂，潭阳书林刘钦恩（荣吾、黎光堂），潭阳书林刘太华（又作南闽潭邑艺林），潭阳书林刘志平归仁斋，富沙刘兴我，*建阳书林刘氏文明书堂，*日新堂（一作日新书堂），*闽山书堂，*明德书堂，*溥济药室，*刘宽，*刘克常，*刘成庆。

熊氏　建邑书林熊宗立熊氏种德堂（熊秉宸、熊成建、熊建山等均称种德堂），建邑书林熊冲宇（成治）种经堂（亦作种德堂、正德书堂），潭邑书林熊玉屏，熊氏忠正堂（熊大木、熊龙峰），建阳书林熊体忠*宏远堂，书林熊成初，书林熊云滨，书林熊氏中和堂（*熊鳌峰），熊清波诚德堂，*熊秉宇，*熊台南，*熊安本，*熊飞馆，*雨钱堂熊衮，*熊稔寰燕石居，*博雅堂，*熊氏一峰堂，*熊氏东轩。

郑氏　闽建书林郑少垣联辉堂（又作三垣馆），闽邑书林郑氏萃英堂，闽建书林云竹郑子杰（世豪）宗文书舍，郑氏建阳宗文堂（郑希善、郑世魁），*建阳书林郑氏四德堂，*郑以厚望云楼，*郑氏光裕堂，*郑尚玄人瑞堂。

叶氏　建阳书林叶氏作德堂（*叶仪廷、*叶念廷），闽建书林叶志元，闽邑书林叶见远(又作闽建书林)，闽建书林叶贵近山堂（在金陵设店），*叶氏广勤堂（叶景逵、叶景达、叶材），*叶翠轩。

杨氏　闽邑书林杨氏清江堂，建阳书林杨发吾守仁斋，杨氏

清白堂（*杨员寿归仁斋），建阳书林杨起元闽斋（又作清白堂杨闽斋），闽书林杨美生，建邑书林杨璧卿，*书林杨懋卿，*书林杨帝卿，书林杨素卿，书林杨肇。

陈氏　建邑书林陈贤积善堂，潭阳书林陈国旺积善堂（陈氏积善堂、又作陈奇泉），潭城书林陈孙安，*陈含初存仁堂，书林陈德宗。

詹氏　闽建书林詹彦洪，闽建古书林易斋詹亮长庚堂，潭邑书林詹霖宇，闽建书林詹长卿就正斋，福建书林詹林，福建书坊詹佛美，*进德书堂，*进贤书堂，*西清堂，*詹圣谟，*詹圣泽，*詹圣学，*詹谅（易斋），*詹张景（秀闽），*詹林所，*詹林我。

萧氏　*萧腾鸿师俭堂（设在金陵），*萧鸣盛，*萧少衢。

黄氏　闽邑书林黄灿宇，芝城潭邑黄正甫书坊，*书林兴仁堂，*秀宇堂。

张氏　*张闽岳新贤堂，建阳书林张好（刘成庆）。

江氏　建邑书林云明江子升，书林江氏宗德堂（又作江氏宗德书堂）。

其他　闽建书林金拱唐（魁绣），闽书林徐宪成，建阳周静吾四有堂，建阳书林守仁斋，闽建书林三垣馆，闽建书林德聚堂，建邑书林兴正堂，建宁书林虞氏务本堂，建安博文堂，*建阳书林魏氏仁实堂，王兴泉善敬堂，*朱桃源，*朱明吾紫阳馆，*朱氏与耕堂，*建安书堂，*源泰堂，*笈邮斋，*夏庆，*吴观明，*高阳生。

以上所列的，都是闽北的书坊。明代后期，在福建西南部，又兴起了一个四堡坊刻中心。四堡位于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的交界处，方圆百余里，村落数十个。成化年间四堡马屋村的马驯，官至二品，致仕后在家乡刊刻诗文、族谱。万历年间，四堡雾阁村人邹学贤辞官回里，带回制元宵灯和雕版印刷术，发展印书事业。到了明末，四堡地区刻书业大盛，从事印书业者1 200多人，书坊数十所。所刻书远销江西、浙江、湖广、两广、川滇，乃至越南北部，成为南方刻书中心。有一本叫做《年初

一》的书，又名《一年使用杂字》，是四堡的“招牌书”。[1]

二、苏州坊刻

苏州有大量坊刻图书。《中国印刷史》载37家，但该书没有把吴县和长洲统计进去。其实，苏州是府治，它和吴县、长洲是“同城而治”的，行政区划虽有明确区分，实际上街巷交叉，不能分开来。苏州的名称，诸如苏州、吴郡、吴县、古吴、吴门、姑苏、茂苑等，异名极多，文人随意变换使用，了无定规。因此，《中国印刷史》就失收很多，如“吴县书林天许斋”、“长洲书坊三乐斋”等都是在苏州城内的。经查《江苏刻书》[2]，可补充19家；又查《苏州市志》[3]，可补充11家。可以查知的共有67家，现罗列于下：[4]

1. 前面冠“金阊”或“阊门”字样的（阊门是苏州书坊集中地），共39家：金阊书林叶显吾，金阊叶敬溪，金阊叶瑶池天葆堂，金阊叶聚甫，金阊叶敬池书种堂，金阊叶昆池，金阊书林叶龙溪，金阊叶碧山，金阊书林叶启元玉夏斋，金阊书林舒载阳（文渊），金阊书林舒冲甫（疑即舒载阳），金阊五云居，金阊东观阁臣古斋，金阊世裕堂，金阊拥万堂，金阊黄玉堂，金阊五雅堂，金阊书业堂（一作吴郡书业堂），金阊十乘楼，金阊雅言堂，金阊书林唐廷杨，金阊映雪草堂，阊门徐氏书堂，金阊陈氏嘉会堂，阊门陈龙山酉酉堂，金阊童涌泉，金阊书林振业堂，金阊安少云尚友堂，阊门席鉴（玉照）扫叶山房，阊门常春堂，金门兼善堂，*金阊书林叶瞻泉，*金阊书林，*金阊书林贯华堂，*金阊书林绿荫堂，*金阊步月楼，*金阊同人堂，*金阊传万堂。

2. 前面冠“东吴”、“吴门”、“姑苏”、“吴郡”、“古吴”等字（这些都是苏州的别称）的14家：东吴书林，吴门文汇堂，吴门宝翰楼，吴门书林翁少麓，姑苏龚绍山（一作龚少山），姑苏经坊陆瑞芝，*吴郡书林大来堂，*吴郡书林嘉乐斋，*吴郡书林嘉乐堂，*古吴陈长卿存诚堂，*古吴赤绿山房，*古吴三多斋，*吴门五车楼，*古吴文盛堂。

【1】谢重光：《闽西客家》，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2】江澄波等：《江苏刻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陈晖主编：《苏州市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4】叶瑞宝《苏州书坊刻书考》(载《江苏出版史志》1992年第3期）列明代苏州书坊刻书106家，与本文出入颇大，其原因可能与对某些刻书单位的性质的判别不同有关。

3. 前面冠“吴县”、“长洲”（苏州的属县）的11家：*吴县书林大观堂，*吴县书林天许斋，*吴县书林叶清庵，*吴县书林叶华生，*吴县书林开美堂，*吴县书林陈长卿，*吴县书林奇赏斋，*吴县书林衍庆堂，*吴县书林李氏善庆堂，*吴县书林童涌泉，*长洲书坊三乐斋。

4. 其他两家：*张氏大雅堂，*映雪斋。

苏州坊刻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从现存图书来看，苏州坊刻本的年代，都是万历及万历以后的，嘉靖年代的绝少，嘉靖以前的未见。这说明苏州坊刻是在明代后期兴起的。

三、金陵坊刻

金陵坊刻十分兴旺，可考的有上百家之多，大都集中在今三山街一带，其中有不少是同姓的。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列出93家，从其他文献上还可以补充一些，例如《江苏刻书》中可以补充十余家。现综合如下：

唐氏　唐对溪（富春堂），唐秀谷（世德堂），唐锦池（文林阁），唐鲤跃（集贤堂），唐鲤飞，唐少村（兴贤堂），唐振吾（广庆堂），唐晟（亦称世德堂），唐文鉴，唐翀宇，唐廷仁，唐龙泉，唐廷瑞，唐建元，唐谦，*唐际云。

周氏　周希旦（大业堂），周曰校（万卷楼），周近泉（大有堂），周竹潭（周氏嘉宾堂），周昆冈，周宗孔，周宗颜，周四达，周廷槐，周如泉，周显，周前山，周用。

王氏　王氏勤有堂，王举直，王敬宇，王凤翔，王世茂（王氏车书楼），王慎吾，王尚乐，王洛川，王荆岑（光启堂）。

傅氏　傅春溟，傅梦龙，*傅昌辰（版筑居）。

吴氏　吴小山，吴少溪（锦绣堂），*吴谏，*吴发祥，*吴继宗。

李氏　李潮（即李少泉、聚奎楼），李洪宇，李澄源。

陈氏　陈大来（继志斋），陈尊山经房，陈龙山经房。

杨氏　*杨明峰，*杨君贶。

胡氏　胡东塘，胡贤，胡少山

郑氏　郑思鸣（奎壁堂），郑大经。

叶氏　叶贵（近山书舍、新科书林），叶应祖，叶如春。

徐氏　徐用和，徐小山，徐松野，徐自强（南京印经铺）。

其他姓　施家，萧腾鸿（师俭堂），戴氏，赵君耀，余尚勋，雷鸣，龚邦录，毛少池，蒋氏（石渠阁），刘氏（孝友堂），姜家（来宾楼），*汪廷讷（在南京和其他地方均有刻书）。

其他不用姓氏而用堂名者：一贯斋，*十竹斋，人瑞堂，九如堂，三山书坊，三美堂，三多斋，*大有堂，大盛堂，长春堂，文枢堂，文秀堂，文会堂，友石居，种文堂，积德堂，汇锦堂，光裕堂，两衡堂，宝圣楼，荣寿堂，荆山书林，亲仁堂，博古堂，槐荫堂，*聚锦堂。

金陵的书坊中，唐、周、王三姓特别多，可惜他们的世系不大清楚，对他们家族的经营情况也不清楚。

四、杭、嘉、湖及衢州坊刻

杭州的坊刻也很发达。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载，有24家，据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有36家，[1] 现罗列于下：

【1】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古杭勤德书堂，杭州六安桥杨家经铺，杭州众安桥北沈七郎经铺，钱塘洪楩清平山堂，杭郡曲入绳，杭城书林翁传山，翁文源书肆，杭城朝天门翁文溪，武林继锦堂，武林冯念祖卧龙山房，武林冯绍祖观妙斋，钱塘杨尔曾夷白堂，虎林双桂堂，武林舒载阳藏珠馆（苏州也有舒载阳书坊，恐是一家，待考），武林书坊赵世楷（一作钱塘书坊），杭州书肆读书坊，武林凝瑞堂，武林阳春堂，武林（又作虎林）容与堂，武林台卿氏泰和堂，武林张氏白雪斋，杭州横秋阁，蒋德盛武林书室，胡文焕文会堂，*武林书林徐象橒曼山馆，*杭州朝天门翁晓（文）溪，*藏书馆书肆，*钱塘钟氏书肆，*雷氏文会堂，*方清溪书坊，*武林启秀堂，*武林樵云书舍，*钱塘汪慎修书肆，*失名之一（刊《牡丹

亭还魂记》)，*失名之二（刊《彩笔情辞》)，*失名之三（刊《水浒叶子》)。

嘉兴书坊刻书有周履靖荆山书林，曾刻《夷门广牍》，收书106种。

湖州坊刻待查。闵齐伋、凌濛初二人是湖州著名刻书者，但一般把他们放在私刻中讨论。还有一位臧懋循，他惯于自选、自编、自刻、自销，兼备坊刻和私刻的特点，也常放在私刻中研究。

杭州西南的衢州，坊刻也很兴盛，有衢州童应奎书林，书林徐瑞鳌，书林大西堂，叶氏如山堂，书林徐应瑞思山堂，书林舒承溪，书林舒用中天香书局等，都有刻书的实迹。

五、徽州坊刻

徽州书坊，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列10家，徐学林《徽州出版史叙论》上略多出几家，[1] 综合如下：

歙西鲍氏耕读书堂，歙县吴勉学师古斋，新都吴继仕熙春堂(徐著收在私刻中)，新都吴氏树滋堂，休阳吴氏漱玉斋，书林新安余氏双荣精舍，歙岩镇汪济川主一斋，汪廷讷环翠堂（徐著收在私刻中)，新安黄诚，休邑屯溪高升铺，*吴琯西爽堂，*程荣，*程百二，*黄正位尊生馆，*汪应魁贻经堂，*黄一桂。

与徽州其他商业活动一样，徽州的书商们走出徽州地区，到外地开设书林。到金陵的有胡正言的十竹斋、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奎璧斋，到杭州的有胡文焕的文会堂、唐琳的快阁刻坊等。

六、北京坊刻

北京坊刻比较少，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载，北京有以下这些书坊：

北京永顺书堂，金台鲁氏，国子监前赵铺，刑部街陈氏，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金台岳家，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汪谅金台书铺，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崇文门里观音寺胡同党家，太平仓后崇国寺单牌楼张铺，京都高家经铺，

[1] 徐学林：《徽州出版史叙论》，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6年。

隆福寺（应属寺院），二酉堂，洪氏剞劂斋等。

1967年，上海嘉定县出土了一批明代印刷品，是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年）的一批唱本，用竹纸印刷，共11种，如《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包龙图断乌盆传》等。书上有“北京新刊”四字。文献家认为，可能是北京的永顺书堂所刻。这是今天可见的最早的明代唱本，当是刊印通俗唱本的书坊的产品。（图51）



图51
北京永顺书堂唱本《新刻全像石郎驸马》。

第五节　私家刻书

一、私刻概况

明代三种类型的刻书机构中，私刻的数量最多，有浩如烟海之称。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的5 400多个刊者中，其中私刻在4 000个以上，约占84%以上。这仅仅是从传世图书统计的。更多的私刻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湮没，没有流传下来。

明代私刻特别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促成的，而明代的社会风气，更是重要的原因。在明代的后期，刊印图书成了时尚。士人中试，官员晋升，官场干谒，朋友酬酢，往往要刻一种书相赠。这不能说是一种坏风气，但行之过分，不免会泛滥成灾。当时就有人讽刺这种现象，说此风如果滋长，将来南山的树木（版刻的原料）都会被砍光的。

私刻主持人的典型身份是那些考中了进士（至少也是举人）又做了官的人。他们的刻书活动或在中了进士后，或在做官的任上，或在致仕告老还乡以后。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中的记载，浙江私刻859家，具有进士出身后来又做官身份的528家，占

61%；湖广205个私刻中，具有上述身份的170家，占80%；河南176个私刻中，具有上述身份的146人，占80%。可见私刻的主持者主要是这一类人。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医生等布衣之辈。

在这些私刻主持者中，有些人在考试中名列前茅，后来又官至极品，学问淹博，财产盈万，家富藏书，如果他们对刻书事业情有独钟，便会产生极有价值的精品图书，这类的例子极多。

私刻的内容林林总总，经史子集，各类都有，而以集部为最多，或者刻自己的诗文奏议，或者刻父祖的著作、乡贤的传世名著、自己喜爱的某一部书，或家藏的一种奇书等。朱熹后人刻书的情况，颇有代表性。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孙朱洵刻《朱文公年谱》，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熹的十三世孙朱世泽刻《考亭志》、《潭阳文献》。建阳蔡有鹍编了9位姓蔡的名儒遗著，合称《蔡氏全书》。这些私刻的目的都在缅怀祖荫，以示家学渊源。岳珂的十六代孙岳元声把岳珂的稿本《玉楮诗稿》刻印成书，也是一个例子。

相当多的私刻主持者有极好的业务素质，有的关心国家大计，奔走呼吁，刊刻经世文集；有的广收版本，择善而从，改正差错，数十年成一书；有的荜路蓝缕，九死不悔，家产用尽，刻成极有价值的传世巨著；有的孜孜以求，追求新的工艺。没有众多的私刻，明代的出版物不会这样丰富多彩。

私刻图书的去路一是赠送给亲友等人，二是与同好交换。明代所刻图书上，不管是官刻、坊刻还是私刻，都不印定价，只有极少数书上用红色木戳钤上定价。

私刻的制作规模各不相同，视各人的投入而异。有的私刻主持者仅仅备一部原稿，拿出一些银子，委托某一印书铺刊印若干部，自己并没有刻印的设备和人员。有些私刻者家里延请了编、写、刻、印、钉诸种人员，既有场子，又有班子，自称"开局"，有一定规模。山东曲阜孔府是其中佼佼者。孔府设有多个刻书坊，先后用过的名称有：忠恕堂、红萼轩、安怀堂、诗礼堂、聚文斋、金丝堂、萃贤堂、微波榭、仪郑堂、玉虹楼等名称，据不完全统计，宋

时刻书27种，金元刻书6种，明代刻书49种，清代刻书103种。

无锡顾起经家刻《类笺唐王右丞诗集》19卷的做法最有典型意义。顾起经（1515—1569）无锡人，嘉靖国子监生，任广东盐课副提举，用“奇字斋”名义刻书，刻有《小十三经》、《国雅》等书，《类笺唐王右丞诗集》目录后有一页附录，全文如下：（图52）

無錫顧氏奇字齋開局氏里
寫勘 吳應龍 沈恒俱長洲人 陸廷相無錫人
雕梓 應鍾金華人 章亨 李煥 袁宸 顧廉俱蘇州人 陳節武進人 陳汶江陰人 何瑞 何朝忠 王誥 何應元 何應亨 何鈿 何鑰 張邦本 何鑑 何鎡 王惟寀 何鈐 何應貞 何大節 陸信 何昇 余汝霆俱無錫人
奇字齋 合局氏里 吳應龍書 何瑞刻
裝潢 劉觀蘇州人 趙經 楊金俱無錫人
程限 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鋟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
冠龍山外史謹記

图52
无锡顾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诗集》附页中关于私家刻书人员组织的记载。

无锡顾氏奇字斋开局氏里

写勘　吴应龙　沈恒俱长洲人　陆廷相无锡人

雕梓　应钟金华人　章亨　李焕　袁宸　顾廉俱苏州人
陈节武进人　陈汶江阴人　何瑞　何朝忠　王诰
何应元　何应亨　何钿　何钥　张邦本　何鉴
何镃　王惟宷　何钤　何应贞　何大节　陆信
何昇　余汝霆俱无锡人

装潢　刘观苏州人　赵经　杨金俱无锡人

程限　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锓，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

冠龙山外史谨记

据前言中载，除以上人员外，还特邀陈延鹤、黄姬水等19人任校阅，刻版之前，顾氏又亲自复校，补漏字59个。卷末还记载，卷一刻于待沐园，卷二刻于长康外圃，卷三刻于宛在亭，卷四刻于祇洹馆，卷五刻于封山开卷之阁，卷七刻于清华亭，卷八刻于木瓜亭，卷十刻于静思之堂。还有三卷文集刻于青藜阁等处。由此可见顾氏十分富有，顾氏的私刻有很大的规模，可以作为特例来看。

私刻中精品极多，下面有关章节中将作详细介绍。

二、私刻和坊刻、官刻的融通

私刻、坊刻之间，有转型、融通的现象。一种情况是由家刻转为坊刻。文人们家中刻书，往往贴钱赔本，但也有一部分私刻者后来成为坊刻家，最明显的是吴勉学和臧懋循二人。前者是因为获利而走向坊刻，后者是因为拮据而走向出售。这种转型的经营虽然并不多，但是代表着一种由儒而商的趋势，十分值得注意。读书人不肯轻易走这条路。至于由坊刻而转向私刻则是不会有的事。

吴勉学，歙县丰南人，生卒年不详，所刻书用“师古斋”名义，最初以刻医书驰名，所刻有《东垣十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痘诊大全》、《刘河间伤寒六书》等，属于私刻范围。出售获利后，又扩大范围，“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继续刻《史记》、《资治通鉴》、《性理大全》、《少室山房笔丛》等书。他所刻的书注重质量，校对精审，人称“不下宋本”。他的儿子继续经营，两代人共刻书300种。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出版商。

臧懋循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是浙江长兴人，万历进士，著名戏剧家，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著有《负苞堂集》等，刻有《古逸词》、《古诗所》、《唐诗所》、《玉茗堂四种》、《元曲选》等书。《元曲选》100卷，其中的《灰阑记》、《伍员吹箫》等5种，当时已经是孤本，靠《元曲选》得以流传。他开始刻印半年后，

经济困难，被迫中辍，于是便向亲友宣传推销这部书，在给黄贞父的信中说：“刻元剧本拟百种，而尚缺其半，搜辑殊不易，乃先以五十种行之，且空囊无以偿梓人，姑藉此少资缓急。兹遣奴子赍售都门，亦先以一部呈览。幸为不佞吹嘘交游间，便不减伯乐之顾，可作买纸计矣。”[1]《元曲选》最后终于得以完成。

【1】[明]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寄黄贞父书》，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明代有不少书，是某一地方官发起倡议的，同僚、同年、地方士绅都出资相助，然后委请一个刻印铺制作成书。这一类书，是官府和私家合作的产物，最后以发起其事的主持官员署名，不以官衙署名，但版子则往往保存在官衙。这种书一般作为官刻统计。这一类私刻、官刻之间相融通的做法可以用两部特大图书来说明。一部是《文苑英华》，文学总集，1 000卷，600万字；另一部是《册府元龟》，历史类书，1 000卷，900万字。两部书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宋代的官修书，元明间数百年没有重印过，后来都是福建的官员们捐俸刻印的。《文苑英华》主持者是福建巡抚胡维新和总兵戚继光，他们发动官员“捐廪奠费”，隆庆元年（1567年）出版。《册府元龟》主持者是建阳知县黄国琦，他发动官员们“合蠲薪廪”，崇祯十五年出版。由于福建刻工力量强大，两部书的刊刻都十分快。前者一年多，后者只用了八个月。两部书都不用官衙署名，而是用个人署名。前者称“胡维新、戚继光刻本”，后者称“黄国琦刻本”。这两本书常说成官刻，但不能说是纯粹的官刻。

明末私刻、坊刻之间，还有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些文人的著作，一部分交给书坊刊印，一部分用自己的名义刊刻。例如苏州作家冯梦龙、湖州作家凌濛初二人的作品，一部分用真实姓名自刻，而他们的小说都交给书坊刊行。他们这样做，可能因为小说虽然受到欢迎，但社会地位并不高，因此不愿把它作自己的私刻。

第六节　寺观和教堂刻书

一、寺观刻书

我国的雕版印刷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最早的雕版印品是人们还愿用的经咒。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印刷术的发明者是中国的佛教徒。[1] 唐代以来，各地寺观雕版十分普遍，或大量刻印世俗人士所需的经咒，或刻印单本佛经，或合作刻印规模巨大的经藏。

明朝的皇帝皇后大都佞佛，常施助寺院刻经，广施功德，造成了佛寺刻经的繁荣。《万历野获编》记云："逮至今上（指万历皇帝），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2] 皇帝敕建的寺院，大都刻制经书。

多个寺院合作刻印经藏，最突出的是紫柏真可在浙江刻印的《径山藏》，详见本书的有关章节。参与刊刻的有几个省的20个寺院，牌记上载明的有：径山寂照庵，五台山妙德庵、妙喜庵，径山兴圣万寿寺、径山寺，休宁大寺华严堂，金沙东禅青莲社，径山化城寺，金坛顾龙山，吴江接待寺，吴郡寒山化成庵，金坛紫柏庵，径山化成院，松江抱香庵宏法会，虞山华严阁，径山古梅庵，德藏寺藏经阁，嘉兴楞严寺般若堂等。

刻印单本佛经的寺院更多，著名的如北京的大隆福寺、大慈恩寺，南京的天界寺、清凉山，杭州的灵隐寺、昭庆寺经房、玛瑙寺、报国院，姑苏兜率园、承天寺，河南少林寺，山西长治宝云寺，五台山妙德庵，太原崇善寺，庐山法云寺，广西全州湘山寺等，这些寺院所刻的经书，都有实物流传至今。边远省份的佛寺刻经兴起较早，远远超过该省其他品种的图书。云南大理刊印的佛经，至今还珍藏在西藏。青海也有专印藏传佛教经书的寺院。据《青海省志·出版志》（1999年出版）载，明清时期，这种印经院有20多处，印了藏文经书上千种之多。例如玉树有结古寺印经

【1】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史论》，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盛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院，该寺创于洪武年间，有印经房24间。寺内还有小型印经院3处。青海还有尕藏寺印经院、相古寺印经院等。

佛教徒用个人名义刻书的也不少，天全刻《镡津集》22卷，成湛刻《指月录》32卷，明昱刻《佛祖统纪》54卷，福贤刻《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等。世俗的佛教信徒用个人名义刻的书最著名的有郑和陆续造成的大藏尊经十一藏。

还有一些社会上的"经房"，是商业性刻经单位，为世俗信徒们刻经还愿。如苏州的吴门经房、姑苏经房，杭州的众安桥杨家经坊、沈七郎经铺等。经房除了为个人刻经外，也接受寺院交办的刻印任务。例如明皇室曾把《南藏》经版颁赐给报恩寺，海内寺院可以向报恩寺请经，报恩寺里有"管经僧"主持其事，收取"板头银"若干，再把任务交给经铺去印刷装订。为此，礼部定出了详细的"请经条例"，规定一应手续和收费标准。《南藏》的刻版在司礼监经厂，印制和发行则在寺院。这是一种特殊的出版形式。[1]

【1】[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四十九。

寺院、经坊刻的书，并不限于佛教经典，也有相关门类的书。最多的是解读经书的文字音训书、名僧的语录、僧人的诗文集。如金台衍法寺刻印音韵书《五音集韵》15卷、佛经经籍的提要《大藏一览》等。

二、教堂刻书

明代后期，天主教传入中国，刻了不少天主教教义和科学书籍。这些书有的利用当地印刷机构的力量，有的是教堂聘请一批工人在教堂里刊印，由此形成了几个专刻天主教图书的机构，如北京的南堂、山西的绛州等。下面的两个资料，记载了有关情况。

一是费赖之著、冯承钧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书中罗列教士们著作的出版物，上面列出了各本书的刻书地点。提到的出版地点有：北京、广州、杭州、南昌、澳门、南京、肇庆、湖州、定州、韶州、绛州、福州、西安、上海、嘉定共15处地方，其中刊印最多的是北京、杭州、南昌、绛州4地。可惜没有记下牌记及刻印机构等资料。据陈垣《天主教著述目录》

的统计，北京的南堂（在今北京车公庄）刊刻过39种书。南京人周用入教后，曾用“南京教堂”名义，刊印了三本书：《交友论》、《畸人十篇》、《山海舆地全图》，三本书都刊于万历年间。

另一个材料记载明末福州一个天主教堂——钦一堂，曾刻书51种。材料来源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份书目《福建福州府钦一堂刊书板目》。[1] 这51种书是：

《圣人行实》、《天主实义》、《职方外纪》、《天释明辩》、《七克》、《性学牗述》、《涤罪正规》、《教要解略》、《灵言蠡勺》、《十慰》、《圣教蒙引》、《口铎日抄》、《庞子遗诠》、《畸人十篇》、《弥撒祭义》、《降生纪略》、《圣母行实》、《善终助功》、《代疑篇》、《几何要法》、《励修一监》、《天问略》、《圣教实录》、《实义续篇》、《西方答问》、《不得已辩》、《辩学遗牍》、《圣体要理》、《圣记百言》、《远镜说》、《悔罪要旨》、《辟妄》、《五十余言》、《圣梦歌》、《睡画二答》、《小涤罪正规》、《小弥撒祭义》、《圣母经解》、《景教碑诠》、《振心总牍》、《三山论学》、《万物真原》、《西学凡》、《圣若撒法行实》、《圣水纪言》、《圣经约言》、《交友论》、《圣像略说》、《圣教约言》、《西字奇迹》、《四字经文》。

这些书的篇幅都只有一二卷，而且大都是翻刻本，初刻本则是其他城市刊印的，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天启三年（1623年）杭州初刻；毕方济的《灵言蠡勺》，崇祯十四年（1641年）嘉定初刻。

在有关书目上得知，福建晋江县的景教堂也有刊刻图书的记载，所刻书有艾儒略所撰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

[1] 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360、36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七节　刻书集中地的形成和特色

一、明代的刻书集中地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原因，全国境内，出现了一

些刻书的集中地。这种集中地在各个时期常有变化，有新兴起的，也有衰落的。从明代留存下来的书，可以看出哪些是出书的集中地。今人杜信孚、杜同书所撰《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记载最详，从中可以看到出书的集中地和非集中地出书的数字，相差是十分悬殊的。例如南直隶、浙江省坊刻数百家，私刻数千家。而广西省只有私刻2家，据《广西通志·出版志》记载，广西省一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才开始有私刻。[1]

【1】据该书载，广西第一家私刻是全州进士赵孟豪与其侄赵良重合刻的《瑞芝轩诗集》。

明代当时人的观察和记载，更是重要的实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有一段话，扼要地记载了明代刻书集中地的情况：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最称善，近世甚稀。燕、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另有一段话也很重要：

“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今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

胡应麟的这份“排行榜”有三项标准，一是“精”（质量），二是“多”（数量），三是“直”（价值）。他的评论涉及10个地区，第一等级有5个地区，即吴（苏、常）、越（杭）、闽、湖（湖州）、歙（徽州），次一等级也有5个地区：蜀、燕、粤、秦、楚。这个排行又是动态的，有的衰落（蜀），有的新兴（湖、歙）。这两段文字画出了明代刻书业兴衰变化的大略面貌。

胡氏的分析是单从刻书一个方面而言的，从出版事业的总体来说，还有版画刻印的集中地、销售的集中地等分别。文中提到的10个地方可以说是“顶级”的集中地。此外，还有次一级的集中地，如江西的南昌、山西的平阳、河北的大名、广东的广州等。

出版集中地的形成与政治、经济有密切关系，但又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其他诸如物资供应、水陆交通、社会风气、文化氛

围、历史因素等，和出版业的兴衰也有密切关系。个人因素也十分重要，具有强烈事业精神的出版家往往造成一个地区出版事业的繁荣。常熟出版业的兴盛，和毛晋有关，无锡、常州成为当时活字印刷的中心，无疑是华燧和安国的功劳。湖、歙之所以能“骤兴”，则和闵、凌、黄氏的彩色套印、传奇插图有关。有时，负面的因素也会促使出版集中地的形成。例如交通不便的平阳，在元代之所以被确定为经籍所，就是因为它“不当要冲”，[1] 可以少受战乱影响。近代也有类似情况，抗战时桂林成为“文化城”，也是因为它“不当要冲”的缘故。由于这种种原因，政治、经济和出版不一定同步同趋，政治中心也不一定成为出版中心。

出版集中地的衰落更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四川出版中心的地位，是元代衰落下来的。杭州在明初失去出版重镇的地位，是因为明皇朝把西湖书院十多万块版片调了出去，釜底抽薪，失去了一大笔业务，无书可印。明末清初，全国最大的闽北出版集中地位的丧失，引起了出版史家的注意。清初，建阳地区刻书还不绝如缕，断断续续地出过几本书，到乾隆年间，就完全告终，一蹶不振。清初王士禛说：“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复过岭（指仙霞岭）。”[2] 他的看法被人们否定，因为金陵苏杭版刻盛行，是早已有之的事，何以早先不受影响呢。近代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闽版书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明末清初建阳地区兵灾特别严重，二十多年间，先后有福王称帝，鲁王监国，王祁占领，陈德容寇掠，耿精忠造反，闽北成为多事之地。拉锯式的战争，使建阳地区元气大伤，人口减了一半，版片流失，而且因为战乱的原因，商道断绝，更是重要因素。第二个原因是清初文化专制严酷，顺康之间，皇帝曾多次禁止淫词小说，建本书一向以戏剧小说这类“淫词小说”为主要财源，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财源枯窘，于是再也没有能恢复过来。到了道咸年间，地方官施鸿保到麻沙，他看到的是“今则市屋数百家，皆江西商贾贩鬻茶叶，余亦日用杂物，无一书坊也”。[3] 建阳出版业从此可以说是近乎绝灭了，代之而起的是四堡地区专营童蒙、年画

【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2】［清］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

【3】［清］施鸿保:《闽杂记》，卷八《麻沙书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等书，向着更新读者群和更新品种的新路发展。

二、刻书集中地的不同特色

刻书集中地在形成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种特色，是官刻、坊刻、私刻三方面力量汇合形成的。特色一旦形成，便成为定势，在图书选题结构、款式外观和经营方式上都表现出来。明代出版业特色最鲜明的是福建闽北特色、徽州特色和苏州特色。

（一）福建闽北特色

特色之一是年代久远，布局密集，刻书机构数量众多。在一个不太大的地区，集中了上百家刻书机构，俨然一个出版之城。百年老坊有七八家，李、郑二姓则赓续300多年。经营刻书以族姓为纽带。几个姓氏又结合成一个更大的集团。同姓人根据各自的力量参与，各得其所。小户妇孺们只要家中备几把刀，有一点技术，就可以去领几块版到家里雕刻，赚些零钱。书林大户则一副大业主气派，自称"一世之雄"，外地有什么大任务，他们就领回来完成，或者组织"匠班"到外地去，像今天的"打工"群体一样。崇祯元年，福建省署开雕福建省的大型通志《闽书》。这部书151卷、6 745页。由7套匠班共160名工人参加，各负责若干卷，其中建阳的匠班3个、工人49名（其他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地各1套匠班）。可见当时建阳地区刻印力量很强，能够派出若干个匠班去外地做工。[1]

【1】侯真平：《明末福建版刻书籍刻工零拾》，载《出版史料》第四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

特色之二是把出书重点放在下层各界人士的需要上，灵活地开拓各类品种，并相应地改进生产组织。建阳出书的结构，据《古今刻书》366种书的分析：四书13种、五经58种、制书13种、理学13种、史书35种、杂书63种、刑名9种、兵戎8种、诗文60种、医卜星相玄修95种，这是嘉靖时的情况，这时小说等类书还没有大流行。嘉靖之后，通俗书的比重增加。据《福建古代刻书》中的统计，嘉靖至明末357种图书，通俗书居首位，有280多种，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所出通俗书的品种有：科举应试

书、通俗文学书、日常家用常识书、商业计算书、医卜星相书等。现在可以查知建阳出版的小说有66种，《三国演义》有12种版本，《皇明诸司公案》有8种版本。[1] 为了能够迅速出版通俗小说，书坊主重金聘请快手到建阳坐地写书，编、刻、售一条龙的组织形式也相应产生。图书的版面也谋求新意，多二节版、三节版，图文并茂。

【1】徐晓望：《建阳书坊与明代小说出版业》，载《出版史研究》第四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

特色之三是大力进行低价销售，努力开拓市场。建阳地区发挥当地盛产纸张、版刻工价低廉的优势，采取低定价的办法竞争，建版书的定价只有苏版、京版的一半。他们编印书目广为散发，制定商标，保护版权。在本地举办书市，每十天两次，吸引全国各地书贩前来批售，又充分利用水陆商道，运到外地销售，在北京、南京都有他们的专卖店，结果是出现了“建版图书遍天下”的盛况。

（二）徽州地区特色

徽州属南直隶，领6个县：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刻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元。明朝后期，刻书业“骤精”，和“苏、常争价”。徽州刻书之所以能异军突起，自有其渊源和基础。徽州的刻书业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特色之一是从事刻书业的主持者往往亦儒亦官亦商。徽州是“文献之邦”，明代进士392人，有“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等盛事。徽州的商人中不少是有学问的人，他们获得巨富之后，很愿意在家乡“兴文重教”，办学刻书。据《徽学通讯》载，徽州在明清两代有作者1 852人，著作4 175种，明清两代，徽州的坊刻、私刻共有800家。[2]

【2】郑惠：《略谈徽州古代刻工》，载《徽学通讯》1988年第2期。

特色之二是徽州的出版人和其他商人一样，富有向外开拓精神，在金陵、杭州、苏州开设书林，使经营打破地域界限，使技术得到交流。徽州的版画风格，很快便成为风气。

特色之三是有一批世代敬业、技术精湛的绘工、刻工，为本地和外地的出版业服务。

特色之四是既刻印传统的经史子集精品，又开创了多种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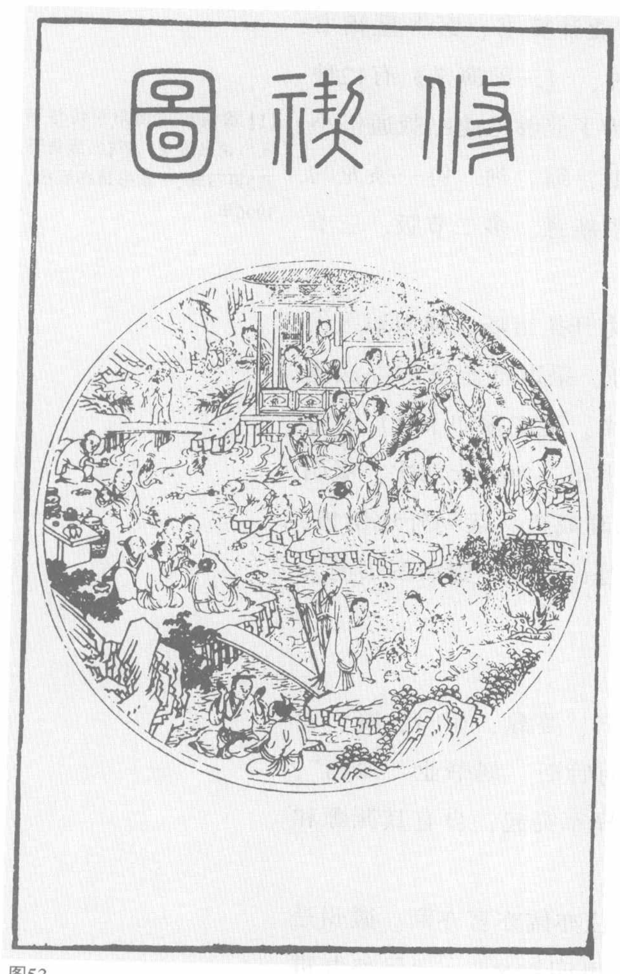


图53
徽州地区刻制的商品广告书《程氏墨苑》。

品种，如谱牒书、商业广告书、地图。（图53）

特色之五是追求新的印制技术，图书的插图丰富多彩，把插图版画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还和南京、湖州的出版人一道，研究创制了套印书和饾版、拱花技术。

徽州的这些特色，都十分鲜明，使明末的出版业放射出异彩。

（三）苏州地区特色

苏州的出版业和它的人文精神、地方风气是一致的。特色之一是儒学正宗的价值取向，不大肯去出版离开正宗思想的书籍，从毛晋汲古阁出书的总结构可以看得很清楚。从《江苏刻书》中看到，有明一代苏州有几百个刊行图书的官员和士人，他们以祖述经学、钩沉典籍为己任。经则正经，史则正史，文必韩柳，诗必李杜。至于河图洛书、推步星相、卜筮占宅之类的书，绝少染指。这种价值取向对于我国古代社会主体思想的维系，是十分重要的。

特色之二是注重质量的精审。苏州官方刻的书，以方志为多，其中很多成为名志。私刻书更是务求精良，文人们刻了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书。他们把刻书看作严肃的“万世之业”，购求善本，亲自校勘，不惜工本，如袁褧嘉趣堂翻雕宋蜀本《六家文选注》，“十载而完”，龚雷刻的《鲍注国策》，金李泽远堂刻的《国语》，都是仿宋翻刻，其他如震泽王延喆的《史记》、顾元庆的《梓吴》，徐焴的《重校唐文粹》都是刻本中的精品。保持宋本的原貌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特色之三是苏州出版家们敏锐卓越的时代识见。他们虽以儒学正宗为最高取向，但是，对于涌现的新事物，往往有灵犀独通的识见，努力提倡。这可以用冯梦龙的“三言”和《山歌》为证。他把明代的民歌（山歌）看得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宝贵，认为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小说、民歌、传奇、唱本等文学的新体式，靠这些卓识者的整理出版，得以流传至今。为了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刊刻出来，出版者和文人能密切合作，为出版事业留下了许多佳话。（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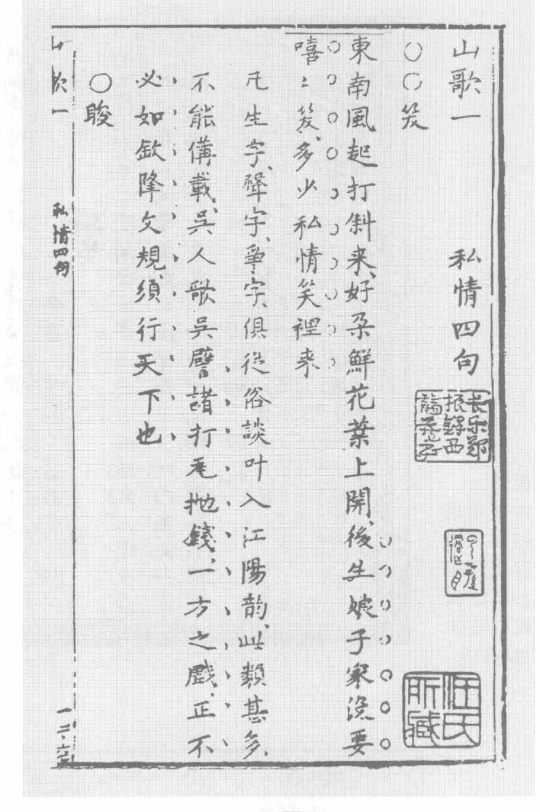

山歌一　　私情四句
○○笑
東南風起打斜来，好朶鮮花葉上開。後生娘子家沒要
嘻嘻笑，多少私情笑裡来。
凡生字、聲字、爭字，俱從俗談叶入江陽韻，此類甚多，
不能備載。吳人歌吳，譬諸打瓦拋錢，一方之戲，正不
必如欽降文規，須行天下也。
○睃

图54
苏州地区刻制的民间文学书《山歌》。

（四）其他地区特色

除了上述闽北、徽州、苏州三地外，其他出版集中地区也有各自的特色。

金陵地区刊刻了大量戏剧小说。郑振铎估计有300种，来新夏估计二三百种，[1]《江苏刻书》中著录现存130多种。这些戏剧小说都是坊刻本，没有官刻或私刻的。刻书最多的是富春堂、万卷楼、文林阁、师俭堂、环翠堂、继志斋等，有所谓“唐姓十二家”、“周姓八家”之称。这些戏剧、小说大都有精美的插图，其风格受徽派的影响，有的就是安徽刻工的作品。金陵后来有专门从事美术出版的十竹斋，刊刻美术图书二十多种。（图55）

杭州地区藏书家特多，在丰富的藏书支撑下，出现了大量聚零为整的丛书，著名的有《格致丛书》、《唐宋丛书》、《汉魏丛书》、《古杂剧》、《重订欣赏编》、《稗海》等。杭嘉湖一带因此被称为“丛书之乡”。（图56）容与堂出版的戏剧小说大都有精美插图，风格和徽派有明显不同。湖州的套印、嘉兴的佛藏，也是该地区的特色产品。

[1] 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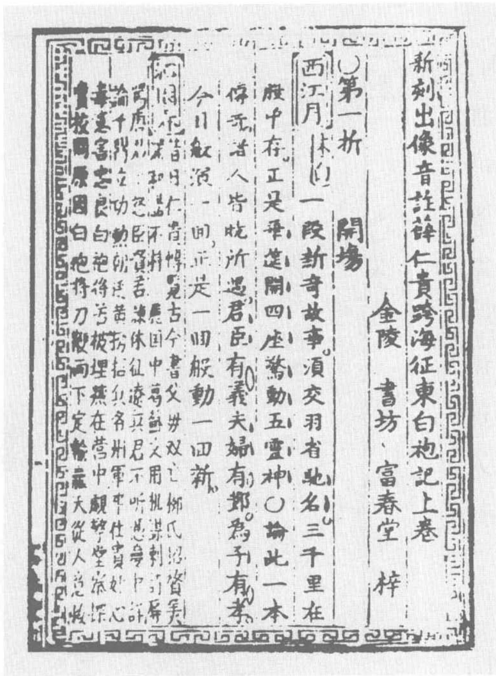

新刻出像音註薛仁貴跨海征東白袍記上卷
金陵 書坊 富春堂 梓
第一折 開場
西江月 末白 一段新奇故事。須交羽者知名。三千里在
腹中存。正是平遼開四座。驚動五靈神。論此一本
傳奇 書人皆能所遇。君臣有義。夫婦有節。為子有孝
今日叙演一回。正是一回般動一回新



图55
金陵地区刻制的富春堂传奇《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





图56
杭、嘉、湖地区刻制的传奇《古杂剧》。

第六章　明代著名出版家

明朝有许多杰出的出版家。最著名的当推明末常熟汲古阁的毛晋。毛氏出书，前期用绿君亭名义，后期用汲古阁名义。出书总数约六百多种，内容几乎包括当时主流文化的所有重要典籍，经史诗文，无所不包。校勘、印制，都比较精良。积累版片数十万块。印行的书销行全国各地和海外，传世很久，一直到清末民国初，国内书肆中还是插架皆是。

福建建安的熊氏和余氏，是另一种类型的出版家。这两家书坊经营出版业都有数百年悠久历史，以顺应广大读者的日常需要，及时出版各种通俗读物为其特点。熊氏出版的医书、余氏出版的小说和日用小类书，拥有大量读者。

明朝还有许多有特色的出版家。无锡的华氏、安氏以活字著称，吴兴的闵氏、凌氏以套印闻名，苏州的王延喆、袁褧等以校勘驰誉。此外，南京胡正言的饾版、安徽歙县黄氏的插图、宁波范氏的藏书等，各有建树，为中国古代出版史增加了异彩。

这些杰出的出版家有官员、士人，也有商人和布衣。他们把出版事业看作崇高神圣的事业，孜孜以求，捐资舍财，追求完美，追求创新，表现出十分令人钦佩的事业精神。

第一节　毛晋和汲古阁

一、毛晋生平

常熟汲古阁主人毛晋的出版活动，是明代出版史也是我国古代出版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盛事。汲古阁的出版物以品位高、校勘精、品种多著称。他的活动涉及藏书、选题、编校、刻印、发行等各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出色的建树。

在东南地区产生这样一位卓越的出版家，有历史、环境、家庭和本人修养等诸方面的原因。常熟具有深远的儒文化传统。毛家的家教也给他儒学薰染，父亲毛清以“孝弟力田起家”，为人正直，邑中办赈灾善事都要请他主办。毛晋的生母戈氏，常用“读尽经书”勉励毛晋。毛晋赴试南畿，考试不中，回乡读书，师事“文宗”钱谦益，深研经史。这些条件，都为毛晋的出版活动孕育了特定的取向，必然采取选择经典文史、务求质量精审的方向。

毛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正月初五日，初名凤苞，号潜在，字子九。成年后改名晋。世居常熟虞山迎春门外东湖的七星桥。毛晋青年时考取秀才，但是一直没有考上举人。据资料说，至少考过两次，一次是在天启丁卯七年（1627年），29岁；一次是在崇祯壬午十五年（1642年），44岁。考试不售后，就回家读书，从事出版事业。

毛晋共有五子四女。五个儿子名：襄、褒、衮、表、扆。其中襄、衮早卒。三个存活的儿子中，毛扆能继承父志，从事刻书事业。扆生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月二十六日，当时毛晋已经42岁。毛晋完成十三经、十七史时，毛扆年龄还小（18岁）。毛晋61岁去世（清顺治己亥，1659年），毛扆20岁。所以，毛晋的出版事业，大概得力于毛扆并不太多。

毛晋对毛扆寄予厚望，曾经对他讲解过古代版刻图书的历

史，家学渊源，耳提面命，有许多书便是毛扆校刊的。但到了毛晋的孙子一辈，情况就不同了。毛晋有孙男女11人，其中有一位孙子名叫绥万（字嘉年，号破崖），有点文名，但没有关于刻书的记载。还有一位孙子则很不像样，荥阳悔道人《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中说：“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这真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1]

汲古阁的破败大约在清乾隆年间，毛晋孙子的一代。原因是不善经营，不得不把书版卖了抵债。10万块书版都失散了。《汲古阁刻板存亡考》[2] 详细列举了各书版片的下落。

汲古阁的全部出版活动是毛晋、毛扆父子两代人的活动，大约从明代天启初年到清康熙中叶，前后数十年时间，是跨明清两朝的出版活动，一般都放在明代记述。

二、汲古阁出版的几种主要图书

据《汲古阁校刻书目》（图57）所载，汲古阁刻书总数为587种。[3] 出版时间集中在明崇祯初期。所刻的重要图书如《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都

【1】此说作为趣事流传很广，但颇为人怀疑，因为《四唐人集》后来有吴门寒松堂印记的版本，可见并未烧去，而是卖给了别人。

【2】《汲古阁刻板存亡考》，荥阳悔道人（郑德懋）撰。

【3】《汲古阁校刻书目》据说是毛晋所撰，顾湘据抄本刊行，其数为“六百种有零”。其后陶湘用30年时间搜求毛刻，共得“五百四十种零”，编成《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这两种书目总数相似，可参看。

汲古閣挍刻書目
隱湖 毛氏原本
同里後學顧湘挍
十三經註疏
周易九卷 四百三十二葉
尚書二十卷 六百九十五葉
毛詩二十卷 一千七百八葉
春秋左傳六十卷 二千四十葉
周禮四十二卷 一千三百七十九葉
儀禮十七卷 一千六十九葉
禮記六十三卷 一千九百五十二葉
汲古書目 一
公羊二十八卷 七百九十五葉
穀梁二十卷 四百七十七葉
論語二十卷 三百五葉
孟子十四卷 五百二十一葉
爾雅十一卷 三百三葉
孝經九卷 八十二葉
共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葉外總序九篇約八十餘葉
五經
易經四卷 一百六十八葉
書經六卷 二百九十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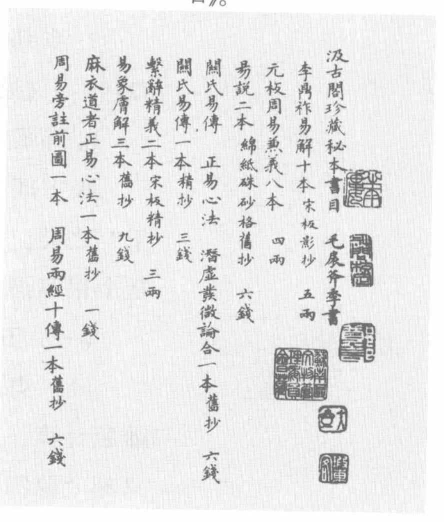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毛扆斧季書
李鼎祚易解十本 宋板影抄 五兩
元板周易兼義八本 四兩
易說二本 綿紙硃砂格舊抄 六錢
關氏易傳 正易心法 潛虛 發微論合一本舊抄 六錢
關氏易傳一本精抄 三錢
繫辭精義二本宋板精抄 三兩
易象膚解三本舊抄 九錢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本舊抄 一錢
周易旁註前圖一本 周易兩經十傳一本舊抄 六錢

图57
左：《汲古阁校刻书目》。
右：《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是崇祯年间刊印的。刻书的内容，可以用“系列化的精品”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

1.《十三经注疏》13种，11 926叶；《五经》5种，2 019叶；《说文解字》545叶。

2.《十七史》17种，22 319叶；《资治通鉴》（叶数不详）。

3.《津逮秘书》15集，145种，16 637叶。

4. 唐以前作品：《离骚》140叶；《李注文选》980叶；《郭茂倩乐府》1 338叶；《玉台新咏》243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103种，7 304叶。

5. 唐人作品：《盛唐二大家》2种，1 605叶；《三唐人文集》3种，313叶；《四唐人集》4种，206叶；《五唐人集》5种，434叶；《六唐人集》6种，508叶；《八唐人集》8种，547叶；《唐三高僧诗集》3种，784叶；《唐人选唐诗》8种，784叶；《唐诗类苑》6 306叶；《唐诗纪事》1 675叶等。

6. 唐以后作品：《诗词杂俎》16种，453叶；《苏门六君子集》6种，1 056叶；《元人十集》10种，1 880叶；《元四大家诗》4种，671叶；《词苑英华》9种，1 030叶；《列朝诗集》7种，3 087叶；《群芳谱》14种，1 676叶；《宋名家词》6集，61种，2 695叶；《六十种曲》60种，7 986叶；《山居小玩》10种，叶数不详。

7. 乡邦文献。有关苏州、常熟的地方史料，有《琴川志》321叶；《吴郡志》685叶；《吴郡图经续记》；《吴地记》等。

8. 佛藏、道藏。

汲古阁有没有出版过当时学童所用的启蒙书，如“三、百、千”之类，书目中未见记载。是没有刊印，还是未载入书目，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五经、十三经、十七史

经、史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典籍。合计36 264叶，以双面雕版计算，共计要木板18 132块，其中的十七史，历来私刻往往只刻“前四史”，很少有独立刻齐的。

为了刊刻这些经史典籍，毛晋父子首先访求最好的底本。魏禧《汲古阁主人标点五经记》记载了毛氏寻求好版本的经过："常熟毛君扆承其家学，好收辑古椠本，考订讨论，正世本之失。尝悼五经为万世文章之祖，古圣贤道统治统所寓，而字义之错，章句倒置，莫由考定，于是顿首告先圣，愿得五经古本训正世俗。未几，得元本《春秋胡传》于书贾丁氏，已从钱君颐得元板《诗集传》，从冯君班得元板《易传义》，从陆君廷保得元本《书传辑录纂注》，而《礼记》旧板求访百端，终不能得。久之，在震泽叶君树廉所，见架上有旧书，随手抽览，则元板《礼记集说》也，然止八卷，余悉逸去。扆乞以归，且喜且恨。……曾见陆君贻谟有《礼记》旧本……折柬索之，来则适合前书九卷以下，标志皆出一手，于是五经咸具。"这段话记载了毛扆觅求五经的经过。

关于十三经和十七史的刊印，毛晋有一篇《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记载了毛晋在天启丁卯（1627年）连续做了三个奇梦。梦见一条龙吐出双珠，化成十三经和十七史，红牌金字，"焕然一新，红光出户"。毛晋把这个梦告诉母亲，他的母亲说："这是神要你读尽经史。"劝他赶快到乡下去掩门谢客读书（当时毛晋住在城南市）。于是毛晋下决心回乡，进行经史的校勘工作。

毛晋给自己订了一个"每岁订正经史各一部"的计划。这件事迅速传了开去，"同人闻风而起，议联天下文社，列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每部经、每部史都聘请专人负责订正，这真是个好设想，但是并没有实施，只有毛晋在实干，"筑舍纷纷，卒无定局。余唯闭户自课已耳"。花费了十三年时间，十三经终于完成，"十三部板崭新插架"。明清易代的次年，清兵南下，扬州、江阴遭到屠城，常熟也罹战祸。《缘起》中说："岂料兵兴寇发，危如累卵，分贮板籍于湖边岩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鱼鼠，十伤二三，呼天号地，莫可谁何，犹幸数年以往，村居稍宁，扶病引雏，收其放失，补其遗亡。一十七部连床架屋，仍复旧观。"终于完成了十七史的

刊印工作。

这两部书的刊印耗尽了毛晋的家产和青春。印十三经时“弃负郭田三百亩”；印十七史时，“较之全经，其费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偿也”。他还记述了自己耗尽青春的情况：“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天启七年至顺治十三年（1627—1656年），卷帙从横，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屹屹不休者，惟惧吾母‘读尽’之一言也。而今而后，可无憾矣。”从以上二篇文，可以想见毛晋父子为十三经、十七史付出的心血。（图58、图59）

（二）《津逮秘书》的编纂

毛晋汲古阁所刻的丛书，最有价值的是《津逮秘书》、《宋六十家词》和《六十种曲》等。《津逮秘书》的基础是胡震亨的《秘册汇函》。胡震亨，浙江海盐人，家富藏书，他把家中所藏古籍汇编成《秘册汇函》，略印了几种，后来书版被烧毁，残版为毛氏所得，便在此基础上，增补自己所藏的书，编成《津逮秘书》。凡是胡氏的原版，书名都在鱼尾之下；毛氏增补的，书名在鱼尾之上，鱼尾之下则有“汲古阁”三字，很好识别。

图58
汲古阁的“毛抄本”《孝经今文音义》，据宋蜀大字本影抄。

孝經今文音義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 德明撰
開宗明義章
仲尼 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山又音夷 居 如字說文作尻音
堂也王肅云閑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 曾 則能反 子 男子美稱也曾子孔子弟子也名參字子與魯
人也或作參音同義別下皆同 侍 卑在尊者之側曰侍 子 孔子也古者稱師曰子 曰 語辭也從乙在匕上
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凡曰皆放此 先王 鄭玄云禹三王最先者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
於殷於殷配天故爲孝教之始王謂文王也 有至德 鄭云至德孝悌也王云孝爲之至也 要 因妙反注
同 道 鄭云要道禮樂也王云孝爲道之要 民用和睦 音目字林云亡六反 上下無怨
紆万反 女 音汝本或作汝凡本女字皆放此汝水名音同義別 知之乎曾子辟 音避注同本或

《津逮秘书》的内容偏重掌故琐记。在此以前的丛书如《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等书，每多不足之本。《津逮秘书》则大都补成全帙。全书共15集，145种，16 637叶。内容如下：

一集8种，《诗经》的序、跋、传、考。二集10种，《易

经》的集解、传、释文。三集6种，通鉴、小学、制度等。四集16种，术数、纬书、农书等。五集11种，诗话。六集4种，书论。七集10种，画论。八集12种，笔记。九集10种，笔记。十集12种，笔记。十一集6种，神异。十二集10种，题跋。十三集10种，题跋。十四集10种，乐府词曲。十五集10种，笔记。

（三）《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第一部有系统的创作。数百年间用抄写的办法流传，辗转传抄，以致错误遗脱，违失本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命徐铉等校定，付国子监雕版，世称大徐本，始得流传于世。元代至明代的早中期，没有重新校印过。毛晋时流行的是二徐本，即徐锴的景钞宋本、徐铉的宋椠本。其中主要是徐铉的本子，有大字小字两种，传世的是小字本。毛氏依据的底本是徐铉小字本，用大字雕刻。前后校改了五次，终于成书。第五次校改的根据是徐铉的《说文解字系传》，改得最多。清顺治十年（1653年）完成。

图59
汲古阁刻本《十三经注疏》之一种《周易兼义上经乾传》。

对于毛晋所刻的《说文》，后人颇有非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有一段说："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自序》略云：毛晋及其子扆，得宋小字本，以大字开雕，周锡瓒出初印本，有扆亲署云：顺治癸巳汲古阁校改第五次本，卷中旁书朱字，复以蓝笔圈之，凡其所圈，一一剜改。考毛氏所得小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则校改特多。往往取诸小徐《系传》，亦间用他书。今世所存小徐本，乃宋张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面目，而据次立剜改，又识见驽下，凡小徐佳处，少所采掇，而不必从者，乃

多从之。学者得之，以为拱璧，岂知其谬戾多端哉。略举黄、顾、陈段诸家所纠，则其刻书之功，非独不能掩过，而且流传谬种，贻误后人。”[1] 这段话对毛晋、毛扆的批评颇重，认为他没有采取小徐本的“佳处”，而采取了“不必从者”。

[1]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在三百年没有刊印《说文》的情况下，毛氏父子决心刊印，使《说文》得到续绪，而且校改五次，改正了不少错误，功不可没。到了清代，小学大兴，《说文》有了多种版本，后出转精，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不宜用后来的成就苛责前人。（图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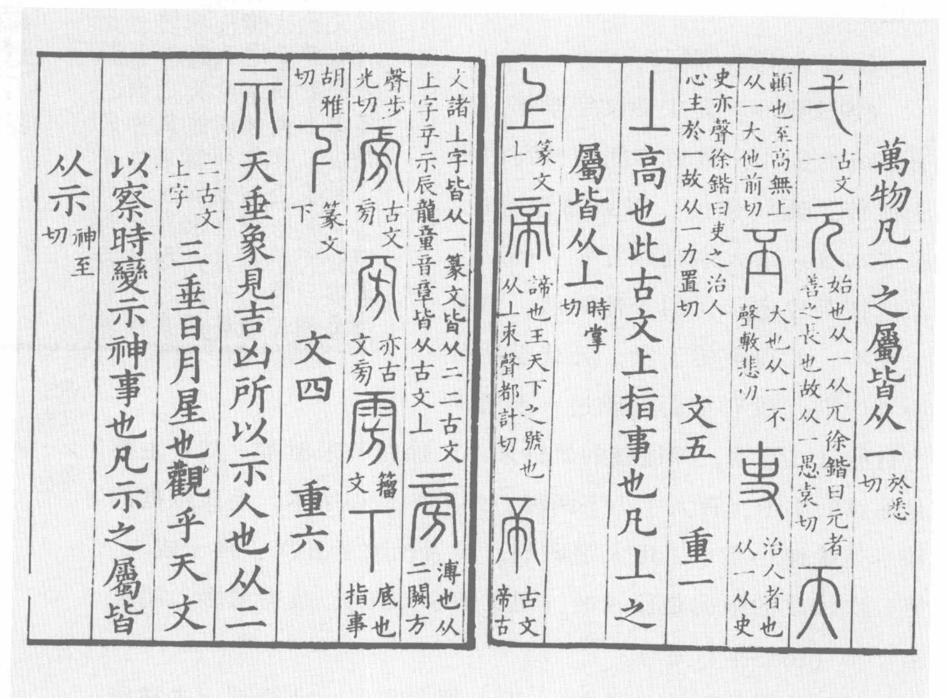

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 於悉切
弌 古文一 元 始也从一从兀徐鍇曰元者善之長也故从一 愚袁切
天 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 他前切 丕 大也从一不聲 敷悲切 吏 治人者也从一从史
史亦聲徐鍇曰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从一 力置切 文五 重一
丄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丄之
屬皆从丄 時掌切
上 篆文丄 帝 諦也王天下之號也从丄朿聲 都計切 帝 古文帝
古文諸丄字皆从一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䇂示辰龍童音章皆从古文上 旁 溥也从二闕方聲 步光切
旁 古文旁 旁 亦古文旁 旁 籀文 丅 底也指事 胡雅切
下 篆文下 文四 重六
示 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
二古文上字 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
从示 神至切

图60
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

（四）各种诗文集的纂辑

毛晋父子汇辑了历代名家诗文精品，以时代、文体、流派、作家编次，成为系列。综合起来看，蔚然成为一部以作家作品为主线的大文学史。汉代取乐府，有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汉魏六朝取辞赋，有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唐代取诗，有一系列的唐人诗选50余家；宋代取词，有《宋名家词》、《词苑英华》等90余家；元代取诗词，有《元人十集》、《元四大家诗》

等10余家；明代取传奇，有《六十种曲》等。

这些诗文集，有的是采用已有的本子，认真校勘后出版，有的则是毛氏父子的选本，并且还撰写了题跋，最能说明毛氏文学观和出版观的是《宋名家词》和《六十种曲》。

《宋名家词》共6集，收61家词。各人的作品全收或选收不一。如辛弃疾有205叶，苏轼有107叶，最少的姜夔词只有18叶，周必大词只有6叶。一些作品少的词人的作品，靠这部丛书得以流传。

《六十种曲》，其中除了《西厢记》是元杂剧外，其余都是传奇，有一些后来失传的传奇，靠这部《六十种曲》得以流传。《六十种曲》和臧懋循的《元曲选》齐名。

毛晋自己也有不少著作，据《汲古阁校刊书目补遗》载，有《明四秀集》、《明诗纪事》、《明方舆胜揽录》、《明词苑英华》、《海虞古文苑》、《海虞今文苑》、《虞乡杂记》、《昔友诗存》、《救荒四说》、《隐湖小识》、《隐湖唱和诗》、《宗谱先贤》、《隐湖遗稿》等，大都是“自著未刻”。毛晋是一位学者型的出版家。

三、汲古阁图书的刻印和发行

（一）收藏图书

毛晋收集图书的故事十分动人。悔道人在《汲古阁主人小传》中说，毛晋在他七星桥家宅的门上，贴出了告示：“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很快，毛晋积聚到84 000册书。于是便造了两座藏书楼——汲古阁和目耕楼（一说还有一处“双莲阁”）。这两座藏书楼连同南去唐市的杨彝凤基楼、东去白茆的某公红豆庄，成为常熟的胜景。海内名流到常熟，都要到那里去看看，“江干车马，时时不绝”。

汲古阁的房屋结构，曾有长洲人王咸在崇祯十五年（1642

年）画过一幅《汲古阁图》。图藏北京图书馆。（见本书前彩图）图中屋宇宛然，可以看出楼房、藏书楼等。图上有钱大昕、段玉裁等36人的题词。王咸的题词中说："次以甲乙，分以四库，非宋元绣梓不在列焉。牙签玉题，风至则琅琅有声也。"江熙《扫轨闲谈》提到汲古阁房屋结构及用途："中为阁，阁后有楼八间藏书板者。楼下及厢廊俱刻书所。阁四围有绿君、二如等亭，招延天下名士校书于中……。"可见汲古阁是一个集藏书、藏版、刻书、校书几种用途的综合楼。至于藏书的内容，李清的《汲古阁观书记》也提到："毛子晋汲古阁藏书十三经与十七史，皆不以藏以刊，所尤难者则购斯摹，摹斯梓，必宋本是准，其他野乘家集，未易枚举……毛子晋家藏诸秘，余目击十三经、十七史宋本，又《册府元龟》与《文选》诸宋本，森列邺架。……毛子晋又云金本尤工，亦购致数种。"可见他藏书之富。

陈瑚在《为毛潜在隐君乞言小传》一文中，提到人们登汲古阁看藏书时受到的精神震撼。他说："惟毛氏汲古阁，登其阁者，如入龙宫蛟肆，既怖急，又踊跃焉。"他把汲古阁比作龙王的水晶宫，使登阁的人既"怖急"，又"踊跃"，这种特殊的心情，只有渴求图书、视书如宝的人才会产生。

（二）选题、校勘、撰写题跋

古人刻印活动的价值，主要在于选定版本和校勘的功夫。毛晋力求以宋版为底本，不惜耗尽千金，上天入地。陈继儒说毛晋寻觅好版本"如缒海凿山以求宝藏"，释苍雪有一首诗说毛晋买书："千金万金置田屋，谁见挥金买书读？世皆贵金不贵书，书价安知倍不足。"（《赋赠毛子晋壬午赴试南闱》）

毛晋校勘图书，大都亲自动手，同时也延请名士帮助。帮他校过书的有"江阴老儒"周荣起，校经史古籍；释道源校佛经《径山藏》；毛的舅父戈汕校《神农本草经》；外甥冯武校《十元人集》、《元四名家诗》；学者陆贻典校《冯氏小集》；释明同校《牧潜集》；闵元衢校《癸辛杂识》；诗人陈瑚应聘于毛家，专门选书校书，犹如专业的编审。

江熙《扫轨闲谈》中引许吟亭的话说："毛氏本有三阁：汲古阁在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其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一失名，俗呼为关王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今俱废。"这段记载说毛晋在三个地方，分设堂阁，延请儒、佛、道三教人士校书。

关于毛晋校书的成就，可以《唐诗纪事》为例来说明。《唐诗纪事》81卷，1 675页，涉及几百个诗人、几百部诗集。当时有嘉靖乙巳（1545年）本和万历甲午（1594年）本，但错误较多。毛晋用"本集"、《御览》、《英华》、《文粹》、《弘秀》等200多种书参校，改正了以下7种错误：

1. 一人重见。如十三卷、十九卷王熊之类。
2. 一诗重见。如第四卷、第九卷《凌潮浮江旅思》之类。
3. 脱去本诗。如贺知章"江皋闻曙钟"、赵东曦"上月今朝减"之类。
4. 误入他诗。如虞世南"豫游欣胜地"、韦承庆"万里人南去"之类。
5. 几人混作一人。
6. 几题溷作一题。
7. 一人一诗反分析几首。

毛晋还举出了长期以来以讹传误的例子。如綦母潜"钟声扣白云"向误"和白云"；王摩诘"兴阑啼鸟换"，向误"啼鸟缓"，"种松皆老作龙鳞"向误"皆作老龙鳞"。[1] 不少与毛晋交游的文人都记载，毛晋每得到一个好本子，就立刻动手，连抄带校，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1】以上引文俱见《隐湖题跋》卷一中《跋唐诗纪事》。

毛晋汲古阁刊本的校刊工作，一般认为质量是好的，但是也有缺点。除了前面提到的对《说文解字》一书修改不当之处外，还有一些评论。如陈鲩在元大德本《后汉书》跋语中说到黄荛圃的评论："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底本极精，曾不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仅数种。"叶德辉《书林清话》在列举上述诸家的评论之后

说毛晋“流传谬种，贻误后人”。近人王欣夫对汲古阁图书有比较公允的评论。他认为，汲古阁所印图书之所以有一些错误，其原因可能是：1. 原书刊刻在先，善本收得在后，不能一一重刻，只能选几种来重刻（如陆游《南唐书》）。2. 毛氏另有所本，没有看到宋本，当然不能用宋本去要求了。如毛氏得《李群玉集》，便以文体分统前后，并为三卷，作了一番整理，倘若他看到宋本的《李群玉集》，当然不会多此一举了。王欣夫认为，必须从学术发展的历史去要求古人，不能苛责。对贤者责严，指出错误，也是必要的。[1]

【1】王欣夫：《古文献要略》，第三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毛晋在编刊图书时，为一部分书写了题跋，介绍版本源流，编纂经过，内容特色，学术评价，当时士人很喜欢看这些题跋，便怂恿毛晋把题跋集中起来编成一册。毛晋应请刊刻了《隐湖题跋》一书，共收题跋110则，后来又有续跋42则，共152则。有陈继儒、胡震亨等人作序或跋。

现录毛晋为《老学庵笔记》所作的跋，以见一斑：

“兹集向编《稗海》函中，人争谓其拾得小碎，如《五色线》、《酉阳杂俎》之类。读至仁宗飞白，哲宗宸翰，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都涕泣；王仲信守父书而不愿官，秦熺任元受视母病而不肯就魏公诸则，真足补史之遗而纠史之谬，宁仅仅杜宇为谢豹、不律为绿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耶？”

这段题跋正确地指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不是“拾得小碎”的作品，列举书中的若干记载，说明可以补史之遗、纠史之谬，阐发了这本书的价值。

（三）刻印装帧和发行

关于毛氏汲古阁刻书的工场、设备、工人等，有一些资料可供研究。

汲古阁刊本的写手是谁，已不可考。汲古阁本书写的字体基本上是当时已经定型的宋体，端正清楚，字距、行距都很得当，便于阅读，并没有追求字的变化。

刻书的工场就在汲古阁后楼楼下的厢廊间（据江熙《扫轨闲谈》），刻好的板子放在后楼楼上，最多时有板子10万块。刻书的工人大都来自陶洪、湖熟、方山、溧水等地，即所谓的“南京帮”。刻工的价格十分低廉，“三分银刻一百字”。

印书的作坊在何处，未见记载。印书工人的人数，据杨绍和《楹书隅录》影宋精抄本《五经文字》毛扆的跋语中说："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文中的“二十人”，我们不妨作为确数来看待，推算出汲古阁的全部工人数。

现今木刻雕版书的经营单位，全国仅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一家。他们认为，雕版印刷各道工序中工人人数的比例是一个常数。如果以刷印为1，每批生产200—500部，则所需人力大约为以下比例：

编校1人——缮写2人——雕版4人——刷印1人——装订4人

这就是说，20个刷印工人，大概要配备20个编校人员，40个缮写人员，80个雕版人员，80个装订人员，共230人。工人未必都是专职，印刷工人可以兼作装订。所以，全部工人，大约是200人左右。

毛晋的出版事业，基本上是家庭经营式的。陈瑚《为毛潜在隐君乞言小传》中说："家蓄奴婢二千指"（即200人），又有雷雨津赠毛晋的诗说："入门僮仆尽抄书"。雇工、连同僮仆等人，大约200人，这在坊刻中，是很大的规模。

印刷所用的纸张是到江西定购的毛边纸，较厚而白的一种叫“毛边纸”，较薄而黄的一种叫“毛太纸”。当时全国各处不少书是用这两种纸印制的，并不是专为汲古阁制造的专用纸。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内板经书纪略》中关于佛藏、道藏记录用的纸，就有黄毛边纸、蓝毛边纸，可见“毛边纸”之名，并不是毛氏用纸的特称。

汲古阁的书价格低，质量好，销行全国，据载，“天下之购善本者，必望走隐湖”。[1]“毛氏之书走天下”，[2]“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文中所说

【1】[清]言如泗：《常熟昭文合志》。

【2】[清]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一。

的"滇南官长"指云南丽江土司木增。陆世仪《赠毛子晋》诗中说:"名传海外鸡林识。"吴梅村《汲古阁诗》中也说:"鸡林巨贾争摹印。"他们两人诗中所说的"鸡林",泛指外邦,特指朝鲜。

汲古阁的书刻印得很多,因此,不仅当时能"走天下",遍及全国各地,而且流传的时间很久,以致二百多年后的清光绪初,京师、湖南等地的旧书铺还是"插架皆是"。[1]

[1]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第二节 余氏、熊氏和通俗读物

一、余 氏

余氏是福建建阳地区最重要的刻书世家,宋元时期就刻印了大量图书,明初略为沉寂,到了明中期,有余继安中兴祖业,出现了余氏刻书的黄金时代。余继安的两个孙子余彰德和余象斗又光大祖业,有了更大的发展。

余彰德大约生于嘉靖中期,刻书活动主要在万历年间。他的儿子余泗泉、余应虬和其父一起经营。父子用的堂号是"萃庆堂",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粗通文墨而已。他们聘请了一位江西人邓志谟做塾师,一面教书,一面让他写作书稿后刻印出版。用"萃庆堂"名义出版的书现在可考的有29种,大都是经史简释一类的科举参考书,其中邓志谟撰写的有8种。邓志谟本身并没有多少学问,却能编写神魔小说。他在萃庆堂出版的神魔小说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三种,还有一套"白眉"的系列书,所谓"白眉",就是"杰出"的意思。这套书有《艺林聚锦故事白眉》、《艺林唐故事白眉》、《精选故事白眉》。他还编了《旁训古事镜》、《事类捷录》,都是润饰文章用的。[2]

[2] 孙一修:《邓志谟论》、李本懋:《邓志谟道教小说的神话结构》,俱载《海峡两岸明清小说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

余象斗和余彰德是堂兄弟,在建阳刻书界里,他是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的生平,不见于明代的各种资料,从所刻书的题跋、牌记、识语中可以大略勾画出一个轮廓。他的书肆有三台

馆、双峰堂两个名称，他自己的名字变化多端，如余文台、余世腾、余象乌、三台馆山人等。还有余君召、余元素两个名字，也曾一度被认为是他的别名，后来才考查清楚，否定了这一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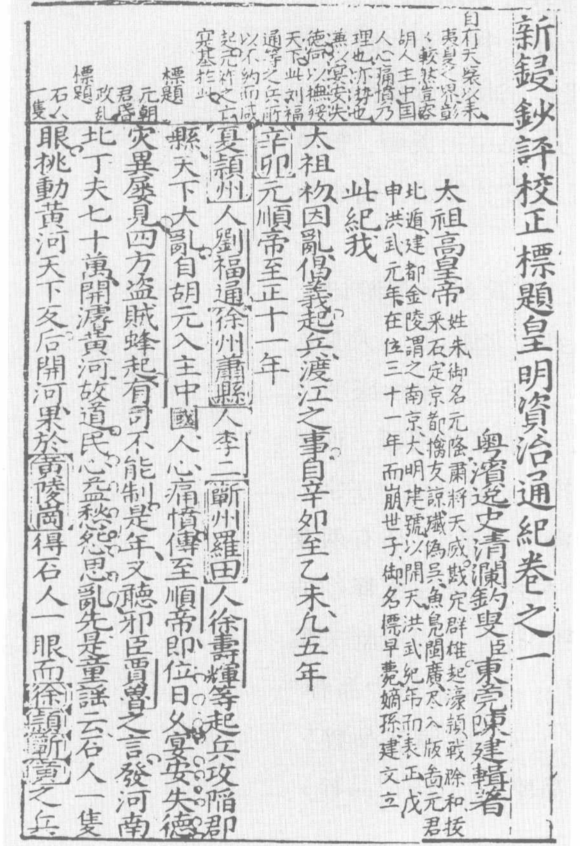
《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卷一余象斗的识语中，有一段记载余氏刻书创业经过的史料，翔实可靠，现录下："闽建阳县西，离城八十里地，名崇化，今之书坊是也。原书坊开创之始，止傅、柳、阮三姓。……至宋朝，我祖公余讳同祖者，系新安县人，为宋奉议大夫广西安抚使，致政，卜居于此。其时止同侄芝孙、舅氏范得偕来，初居于蒲萄栟下今之街头。彼时止五六姓、八九十家而已，亦星散而居。芝孙公善堪舆，闲游半载，知此地异日必为文献之所，教民于来龙落头总领，立一孔圣庙，甚得其所。又教人以梓书为业，春秋礼之，人皆依其教。时天下未有刻布，惟我书坊雕梓，颇见其利。其家饶者，则以梓书读书；其家贫者，则以刻板刷书，坊人乐业，千人之中，无一游手游食，皆风水之应，而蒙我芝孙公德也。自此，书坊人烟凑集，而民居广矣。宋朱夫子文，卜隐考亭，来书坊，见山川美丽，郁草茂林，重建孔圣庙，立同文书院，校刻五经四书集注，诸史百家，大行于世，京浙江右等处遂翻刻矣。"

余象斗本人头脑灵活，是编书能手，他看到《西游记》、《东游记》受人欢迎，便编写了《南游记》和《北游记》，大受欢迎。还编了一本《新刻皇明诸司公案传》（即《全像续廉明公案》），并把已经行世的历史演义润饰整理，从先秦到明朝，连贯了起来。他善于创新，设计了好多套系列书。一套叫做"正宗"，包括《诗林正宗》、《韵林正宗》、《遵韵海篇正宗》。还有两套书，书名上大出新样，一套叫做"讲说"系列，是通俗释经的书，包括《四书拙学素言》、《四书披云新说》、《四书梦关醒意》、《四书萃谈正发》、《四书兜要妙解》；另一套叫"品粹"系列，是科举作文的讲评：《诸文品粹》、《二续诸文品粹》、《历子品粹》、《广历子品粹》、《再广历子品粹》、《史记品粹》、《群英品粹》、《汉书评林品粹》。

余象斗在编刻销售过程中，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假借著名官绅学者的名字出书，《史记品粹》用“状元朱之蕃汇辑、会元汤宾伊校正、翰林黄同清同订”的名义，《历史大方纲鉴补》假托“袁了凡编”，还伪造一篇韩敬的序文，序文中吹捧余象斗“慷慨豪侠，行义好施”。他甚至把近在咫尺的熊大木著的小说换上自己的名字，重新刊印，此事颇受人非议。在《海篇正宗》卷首，有一页余象斗高坐三台馆中的像页，文婢捧砚，婉童烹茶，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遍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这段话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

余象斗刻的书最早为万历十六年（1588年）刻的《新刊万天官四世孙家传平学洞微宝镜》，最晚是崇祯十年（1637年）刻的《五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便览通书正宗》，前后赓续50年。所刻书可考的有40多种。郑振铎说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图61）

图61
万历四十年（1612年）余氏刻的《新镘钞评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


新鍥鈔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一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太祖高皇帝姓朱御名元隆肅將天威戡定群雄起濠潁戰除和挼采石定京都擒友諒殲偽吳魚皃閩廣盡入版圖元君北遁建都金陵謂之南京大明建號以開天洪武紀年和表正戊申洪武元年在位三十一年而崩世子御名標早薨嫡孫建文立
此紀我
太祖杦因亂倡義起兵渡江之事自辛卯至乙未凡五年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
夏潁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人李二蘄州羅田人徐壽輝等起兵攻陷郡縣天下大亂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日久宴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七十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后開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潁蘄黃之兵
標題 元朝君臣政亂
標題 石人一隻

二、熊　氏

熊氏的先世是官员，从江西迁闽。宋元时代刻书不多，属于私刻的范围。明正统至嘉靖间，用“种德堂”名义大量刊刻医书，万历年间，熊成治用“中和堂”名义刻书，内容不限于医学一种。熊氏刻书，走了一条从家刻到坊刻，从单科到多科的道路，这在明末出版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熊宗立字道宗，号道轩，又号勿听子，生于永乐七年（1409年），卒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73岁。他受业于刘剡（仁斋）之门，读《易》，悟阴阳克择之

道。他的祖先几代都精于医术，因此，熊宗立又继承了医术，刻书也大都是医书。他自编自刻的书有：《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6卷、《伤寒运气全书》10卷、《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10卷、《新编妇人良方补遗大全》24卷、《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类证陈氏小儿痘方论》2卷、《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6卷等。除了刻自己的著述外，还刊刻了其他的医书，可考的有：宋陈自明撰《外科精要》3卷、宋陈师文编《太平惠民和济局方》14卷、明刘纯撰《医经小学》6卷、元沙图穆苏撰《瑞竹堂经验方》15卷等10种。

熊成治是熊宗立的五代孙，生卒年不详，他也用“种德堂”名义刻书。用“种德堂”名义的还有熊成建、熊秉宸、熊成应等。刻书的年代大都是万历间，天启、崇祯年间的极少，可以考知的书有40多种。刻书的内容则不限于医学。（图62）



图62
万历元年（1573年）熊龙峰刻本《天妃娘妈传》。

谈熊氏出书还要提到熊大木，他的生平和世系都不清楚，据考，可能是熊宗立的孙子，大约生于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之间（1501—1506年），从事编书刻书的事业大约在嘉靖年间。他是一位写英雄传奇小说较早的作者，编撰了几种讲史小说，现存的有《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这几本书都是专门为书林杨氏清白堂编写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来衍化为《说岳全传》，《南北两宋志传》后来衍化为《杨家将演义》，这两部小说读者众多，久传不衰，在我国小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熊大木自刻的书，所知的只有《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大全》一种，嘉靖二十一年刊本，是一本日用小类书。[1]

[1] 余氏、熊氏的资料均见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三节　闵氏、凌氏和套印书

明代后期，“湖刻歙刻骤精，几与苏常争价”。所谓“湖刻”，主要指湖州的闵氏和凌氏，有些文献上将这两种书统称为“闵板”。[1]

【1】陶湘：《明吴兴闵板书目》，刊于《书目丛刊》(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一、闵　氏

闵氏的主要人物是闵齐伋，字遇（寓）五，乌程（今湖州）人，生于万历七年（1579年），秀才。其兄梦得，崇祯时为官。闵齐伋富有家财，著有《六书通》，这是一本专门从事书法篆刻者的工具书。[2]

【2】见[清]《乌程县志》。

闵齐伋所刻书可考者共46种，计经部18种、史部5种、子部4种、集部19种。其中35种是套印本，计朱墨两色套印31种，朱墨蓝三色套印4种，即《楚辞》、《批点杜工部七言律》、《春秋公羊传》、《东坡志林》。所刻书大都是集部，次为经部，再次为史部、子部。印书最早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最迟为崇祯十三年（1640年），集中于万历末至天启初，整个刻印活动大约是闵齐伋18–60岁左右。他终年82岁，最后刻印的是他自己所编撰的《六书通》。

还有一些姓闵的人，大概是闵齐伋的兄弟子侄辈。他们是闵齐华、闵一栻、闵于忱、闵元衢、闵迈德、闵振声、闵振业、闵光瑜、闵绳初等。他们所刻的书现存11种，其中朱墨二色套印10种（图63），另一种是五色套印本——闵绳初刻的《文心雕龙》2卷。

当时士人以闵版套印书为好尚。陈继儒在闵版套印本《史记钞》的序中说：“吴兴朱评书既，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但闵版书也有缺点，主要是喜欢删节旧注，任意变动，徒然纸墨精良，却不可靠。郑振铎曾将闵刻套印本《考工记》和原本核对，发现闵刻“不尽不实，大为惊诧”。

二、凌 氏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又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湖州）人，副贡生。他的父亲凌迪知，进士，兵部员外郎，编刊过多种类书：《国朝名公翰藻》52卷、《古今万姓统谱》146卷、《氏族博考》14卷、《皇明经世类苑》46卷等，他又把《左传》等五种书中的佳句摘出来，编成《文林绮绣》5种、59卷。凌濛初在崇祯初曾任上海县丞，官至徐州通判。李自成军兴，他作《剿寇十策》呈上，后来在徐州房村被李军包围，呕血而死，终年65岁。[1]

明末时，冯梦龙编辑出版了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受到社会各阶层欢迎，书林坊肆见利思动，便怂恿凌濛初照样编撰，凌濛初便动手编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二书，共80篇，开创了“拟话本”这种文体。他还编有《南音三籁》、《国门集》及《虬髯翁》、《红拂记》等传奇。他刻的套印书，与闵氏齐名。所刻书计26种：经部4种、史部1种、子部4种、集部17种，以集部为多。其中套印书可考者有23种，其中单色1种，朱墨套印21种，朱墨蓝三色1种。刻印的时间在万历、天启年间，以集部为多，传奇次之。

孫子參同卷四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

图63
闵于忱刻朱墨套印本《孙子参同》。

其他还有一些凌姓的人，如凌瀛初、凌云、凌汝亨、凌启康、凌稚隆、凌毓枬、凌弘宪、凌性德。他们所刻的书可考的有16种。其中二色的12种；三色的1种：凌弘宪《楞严经》10卷；五色的3种：凌瀛初的《世说新语注》3卷、凌云的《文心雕龙》2卷、凌启康的《苏长公集》8卷。

闵氏和凌氏所刻书的总数约一百三十四十种，大都是套印本，

【1】[清]《乌程县志》。

最早的是万历七年（1579年）凌稚隆所刻的《史记纂》，最后的一种刻于天启年间。明代套印书大概就盛行在这段时间里，前后约数十年。[1]

【1】陶湘《明吴兴闵板书目》序中说，闵板书共有"百三四十部"，陶氏用三十年时间，收集到"百十部，都百三十二种"。

闵齐伋和凌濛初二人同年生，同是乌程人，世代姻亲，又同住在乌程县东的晟舍，他们对套印书有共同的爱好，但两人的关系却不好，他们刊印套印书，有争强比胜的意味。

第四节　华燧、安国和活字印刷

一、华　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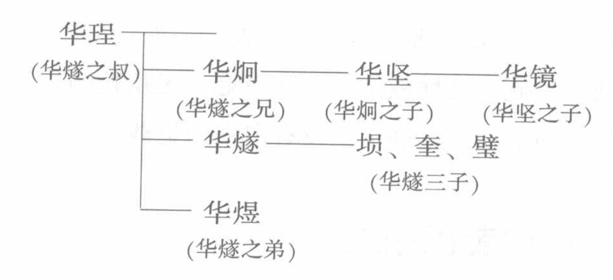
华燧（1439—1513），华氏活字印书的主要人物，无锡人，生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据明华渚在《勾吴华氏本书·华燧传》中说："会通公燧，字文辉，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异同，辄为辨证，手录成帙。……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难得者，悉订正以行。曰吾能会而通之矣，名其读书堂曰会通馆。"他制成了一副铜活字，弘治三年（1490年），华燧51岁时，印出了第一部活字书《宋诸臣奏议》150卷，印了50部，质量较差。这是我国第一部传世的活字印书。以后他继续努力，现在能看到的最后一种是《君臣政要》，正德元年（1506年）出版，当时华燧已经67岁。用铜活字印书很费钱，加上对家业管理得不好，以致家道中落，他也不后悔。"家世以本富，公以劬书，不复经纪为务，家故少落，公漠如也。"（出处同上）他死于正德八年（1513年），74岁。葬于无锡西寿山。他用铜活字印的书，可考的有20种，其中有他自己的著作《九经韵览》和《十七史节要》。

华氏家族中从事活字印书的还有族叔华珵，字汝德，号尚古，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无锡县志》上说他："善鉴别古奇器、法书、名画，筑尚古斋，实诸玩好其中，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他做过一任北京光禄寺署丞。所印的书也用"会通馆"之名，印书时间晚于华燧十

年，所印的书有《渭南文集》等。

华燧有个亲侄华坚，是华燧兄华炯的第三子，字允刚，也用铜活字印书，用“兰雪堂”为名，所印书比“会通馆”少。最早排印的有正德八年（1513年）的《白氏长庆集》71卷和《元氏长庆集》，最末一本书是正德十一年（1516年）的《春秋繁露》。共约10种，出书时间跨度不大。“兰雪堂”印书时间和“会通馆”大体衔接，所以人们猜测，两家所用的铜活字是同一副铜字。华坚的儿子华镜，在正德十年（1515年）出版的尾页上，写了一篇“后序”，他可能也参加了有关活动。

华燧还有一个弟弟，名华煜，为几种书写过序，可能也是活字印书的参与者。从以上介绍可知，华氏三代从事铜活字印书，他们的世系大致是：



二、安　国

差不多在华燧等人用铜活字印书的同时，在无锡还有一位用铜活字印书的安国（1481—1534），字民泰，生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常州府志》和《无锡县志》都有他的事迹记载，说他是当地三大巨富之一，人称“安百万”，“富几敌国”，当地有民谣说：“安国、邹望、华麟祥，日日金银用斗量。”他曾捐资抗倭，疏通白茆港海口，修常州府城，这三件都是要化大钱的事。他家中所居胶山西村，种了桂树，延袤二里，因自号“桂坡”。家里有一个二百亩大的池子，中间有模拟的金、焦二山，“曲桥飞楼，逶迤夭矫”，为“二百年来东南名区”。他又爱好彝鼎古玩和古书。用铜活字印书，大概也是他爱好的一种。当时，造铜字是有钱人的雅玩。明人唐锦在《梦余录》中说：“近时大家

都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安国在正德七年（1512年）左右造成了一套铜活字，吏部尚书廖纪听到后，便请他摆印一部《东光县志》，正德十六年（1521年）完工。这是我国第一部用活字印的地方志，可惜没有留存下来。安国第一部用活字印的书是嘉靖三年（1524年）印的《吴中水利通志》17卷。此后，又印了近10部书。但是，安国印的书，除了《吴中水利通志》外，都不署年代，无法排出一份年表，一般认为，都是嘉靖年间摆印的。

安氏所印的《石田诗选》（沈周撰），是华汝德选的。汝德即华理，华燧的族叔，人们由此猜测，华氏和安氏两家在印书这事上，可能是有联系的。

安氏所印书中还有一部分是活字版和雕版并行的，同一种书，既有雕版书，又有活字书，两种版本，如《初学记》、《颜鲁公集》便是如此。这样做出于什么考虑，无从猜测。

安国的子孙中不少是进士，没有印书的记载。

第五节　徽州黄氏刻工

一、黄氏刻工群体简况

雕版印刷术中最重要的技术工种是雕版。刻工们往往以地区同姓结合成族群。明代最著名的雕版族群是安徽歙县仇村的刻工，起初有黄、仇二姓，后来只剩下黄氏一姓，仇村改称虬村，又称虬川。

歙县是雕刻之乡，“以剞劂为业”，世代相传，子孙“皆能世其业”，雕刻的品种起初是作建筑装饰用的砖雕和木雕，后来分衍出书籍雕版一支。

黄氏的远祖中有做过大官的人物，唐朝末年，黄氏始祖迁入仇村，族谱上称为“一世祖”，他们聚族而居，到了明代，多以雕刻为业。明代有些书籍上，署了黄氏刻工的姓名，当时所以署

名，是计算工资用的。黄氏宗族修了本族的族谱，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安徽发现了几种《黄氏宗谱》。把书上的署名和族谱对照起来看，可以得知黄氏世系和刻书之间的情况。

明朝时黄氏家族从事刻书的大致是21世至28世，他们的辈份是21世：彦，22世：文，23世：永，24世：仕，25世：金，26世：应，27世：一，28世：中。[1]

【1】刘尚恒、李国庆：《明清徽州黄姓刻工及其刻书考录》，载《出版史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黄氏刻工除了在本地刻书外，到外地售艺的也不少。苏州、北京、杭州、杨州、金陵、湖州等重要出版城市，常不惜巨资延请聘用，在这些地方的出版物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吴兴闵氏、凌氏有些书的插图，也是聘请黄一彬等刻制的。郑振铎说："万历中叶以来，徽派画家起而主宰艺坛，睥睨一切，而黄氏诸父子昆仲，尤为白眉。时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黄氏。"[2]

【2】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序》，载《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黄氏刻工的人数，可考的在400名以上，技艺娴熟的上百名，其中30余人尤其高超，不单能刻字刻画，而且能绘制画稿，可以称为木刻版画艺术家。

黄氏刻工群在技艺上的成熟表现在三方面。1. 拥有一支庞大的有各种技艺特长的成员，能胜任各种复杂的刻印任务。2. 新手、老手人才辈出，技艺愈出愈精，形成梯队。3. 能够迅速组织起各种技艺搭配齐全的"匠班"，向外地辐射。4. 能不断创造出新技艺。

二、黄氏刻工的贡献

在雕版技术方面，黄氏刻工的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书版文字的雕刻，二是书版插图的雕刻。

黄氏刻工所刻的书，可考的有241种。[3] 最早的一种是明正统年间黄文显等补刻的《纂图互注荀子》，最后的一种是清道光黄华之刻的《黄山纪述》。其中明代所刻213种，清代所刻只有28种，前后赓续约400年，明清各200年，但入清后的作品很少。

【3】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刻工们受雇于人，刻什么书，刻工无法选择。从黄氏刻工所刻的书来看，上至国家最高级的出版机构，下至私人刊印诗文

集，都乐于延聘他们。例如受聘于南京国子监，刊刻《五代史》(万历四年，黄显等人)、《后汉书》(黄瑾等人)。受聘于府、州、县衙，为他们刻制地方志等书。如弘治十二年(1499年)，刻《新安文献志》，黄文汉等13人参加；弘治十五年(1602年)，刻《徽州府志》，黄文迪等十余人参加；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再次刻《徽州府志》，黄瑄等45人参加，以后万历、天启又多次重刻。嘉靖年间，黄氏到浙江淳安刻《淳安县志》，黄士珑等参加。黄氏刻工还到杭州为胡宗宪刻《筹海图编》等。黄氏刻工还曾为一些私家或书林刻了不少名著，如《玉台新咏》、《六臣注文选》、《文心雕龙》、《史记》、《春秋左传集解》、《孔子家语》、《论衡》等。黄氏刻工还刻了大量族谱。

在书版插图方面，黄氏刻工为东南地区书坊刻制了大量插图，当时一些小说和戏剧，都盛行插图，这些插图几乎都出于黄氏之手。如黄一楷为起凤馆刻《西厢记》和《南琵琶记》插图，黄一凤等为顾曲斋刻《牡丹亭》插图，黄一彬为凌濛初刻《西厢记五剧》插图，黄德修刻武林本《还魂记》插图，黄应光为容与堂刻李卓吾批评的《浣纱记》、《玉合记》、《红拂记》、《琵琶记》、《水浒传》插图。《金瓶梅词话》100回本的插图也是黄氏绘刻的。

有一些图书，必须附有插图，才能使读者看得明白，起图解作用。黄氏为这些书绘制插图，简直无所不能，不仅品类繁多，而且精致活脱。历史故事如黄秀野绘刻的《帝鉴图说》、黄德时绘刻的《书言故事》、黄应祖绘刻的《人镜阳秋》；地方志上的山川名胜，有黄惟敬绘刻的《齐云山志》；军事形势器械有黄瑚绘刻的《筹海图编》；地图有黄兆文绘刻的《地图综要》；器械制造有黄惟敬绘刻的《新制诸器图说》；博物古玩有黄德时绘刻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录》，黄钟绘刻的《欣赏编》；棋谱有黄应组绘刻的《坐隐先生精订棋谱》。书画等方面的书，对刻工有更高的要求，必须技艺上乘，才能神韵毕现，这方面的书有黄德宠绘刻的《图绘宗彝》，黄文敬绘刻的《草字千字文》，黄一梧绘刻

的《篆诀》，黄应乾绘刻的《古今印章》，黄于皋绘刻的《印范》。

黄氏刻工还能制作精致的商品广告，黄鏻绘刻《程氏墨苑》，黄德时绘刻《方氏墨谱》，黄德宠绘刻《方氏巾谱》。此外，还有娱乐纸牌《酣酣斋酒牌》，黄应绅刻；《水浒叶子》，黄君倩刻。

第六节　其他著名出版家简介

明代杰出的出版家，上面已经用专节介绍了数人，现再简要介绍一部分，以出生之年为序，不知出生年代的，以中试之年为序。两者都没法查到的，则以所刊图书最早版本的出版年代为序。

俞良甫

莆田人。元朝末年，日本僧侣来华聘请中国工人赴日本刻书，俞良甫是其中之一，寓居在京都附近的嵯峨。他参与刻的书有《西江和尚语录》3卷、《宗镜录》100卷、《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25卷、《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佛祖历代通载》21卷等。还出资刊刻《李善注文选》，历时4年完成。此后，又"凭自己财物置板"刊刻了《白云集》、《传法正宗记》、《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碧山堂集》等。

朱橚（1361—1425）

朱元璋第五子，初封吴王，后改封周王，封地在开封。好学能词赋，工书。因当地常饥荒，他收集当地能充饥的草400余种种植，逐一绘图，加以说明，成《救荒本草》4卷。共刻书30余种，有医方、杂剧、地理、类书等，如《普济方》168卷、《中州人物志》16卷、《王国典礼》8卷、《圣典》28卷等。

陈济（1364—1424）

字伯载，号思斋，武进人。聪明过人，过目成诵，人称"两脚书橱"。永乐初，以布衣应召担任《永乐大典》都总裁，负责制订全书体例等重要工作。执笔者有疑问时，他能"应口辨析无滞"。《大典》编成后，留京任右赞善，教育皇孙15年之久。著有《书传补注》、《元史举要》、《赞善文集》等，今皆不传。

朱权（1378—1448）

朱元璋第十七子，封大宁，称宁献王，后改封南昌。家中藏书丰富，刻书50余种。如奉敕辑《通鉴博论》2卷，还有《注素书》、《古今武史》、《汉唐秘史》2卷、《臞仙史略》2卷、《臞仙文谱》8卷、《太和正音谱》2卷、《璇玑回文诗词》3卷、《玉蟾先生文集》9卷，并刊杂剧15种。其孙编有《宁藩书目》，著录朱权所辑书137种。书目已失传。

叶盛（1420—1474）

字与中，号蜕庵，昆山人。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好藏书，每外出，常携带抄手，遇有好书，立即抄写。藏书楼称"菉竹堂"，有《菉竹堂书目》传世。刊刻问世的书有《水东日记》、《蜕庵集》、《两广奏草》等。

李元阳（1497—1580）

字仁甫，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官监察御史及福建、陕西巡抚等职。在福建任内，曾刊印图书十余种，最著名的有《十三经》335卷，史称"九行本"，北监和汲古阁刊刻十三经时都采用此版式。还刊刻《史记题评》130卷、《班马异同》35卷、《杜氏通典》200卷等。

顾元庆（1487—1565）

字大有，号大石山人，长洲人。收藏图书万余卷，以罕见笔记小说为著，藏书处称"夷白斋"。在正德十二年至嘉靖十一年间（1517—1532年）刻成《阳山顾氏文房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各40卷。刻书用"夷白斋"、"十友斋"、"阳山草堂之大石山房"名称。

黄鲁曾（1487—1561）

字德之，号中南山人，吴县人。其父是邑中巨富，他和其弟得家产后，悉数用来买书。正德十年（1515）中举，严嵩想收买他，不从，在家读书自娱。他把所藏图书精加校勘后刊行，如《两汉博闻》12卷、《汉晋唐四传》14卷（即《高士传》）、《方脉举要》3卷、《孔子家语》10卷等。

洪楩

字子美，钱塘人。曾官詹事府主簿，富藏书，精刻书，所居仁孝坊，俗称清平巷，因名其堂为清平山堂。他的父亲洪澄和祖父洪钟都喜欢藏书刻书。清平山堂刊刻的书最著名的有《清平山堂话本》60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白话小说总集。所刻书还有《新编分类夷坚志》50卷、《六臣注文选》60卷、《唐诗纪事》81卷等。

袁褧（1495—1573）

字尚之，号中皋子，又号谢湖居士、石湖漫士等，吴县人。累试不中，便在家治学，与文徵明等齐名。他家兄弟6人，人称“袁氏六俊”、“一门文献”。著有《田舍集》、《奉天刑赏录》等。袁氏刻印了大量文献精品，刻书用“嘉趣堂”名称，以高质量见重于世，最著名的是《六臣注文选》60卷，前后用了16年时间。此外还有《世说新语》、《楚辞集注》、《大戴礼记注》，以及丛书《金声玉振集》等。

谈恺（1503—1568）

字守敬，无锡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曾刊《太平广记》500卷、《广州五先生诗》5卷、《孙子集注》13卷等。

范钦（1506—1585）

字尧卿，号东明，鄞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在江西、广西、福建、云南等地做官，累官至兵部右侍郎。他酷爱图书，筑天一阁藏书，所藏书以地方志、登科录、会试录、政府文件、碑帖等著称。他从所藏的奇书中刊刻了一部分，世称“范氏奇书”。

归有光（1506—1571）

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人。举乡试后，累试不中，居嘉定安亭讲学。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中进士，授长兴令。著有《易经渊旨》、《三吴水利录》等。喜藏书，藏书楼称“世美堂”。他把所藏子书汇编成《诸子汇函》，计94种，是清代以前收录子书最多的丛书。

晁瑮（约1506—1576）

字石君，号春陵，开州（河南濮阳）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喜藏书，编有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收书7 829种，著录了不少元明话本、小说、戏剧、传奇。书下注明刻本情况，成为研究古代通俗文学的重要工具书。

顾起经（1515—1569）

字长济，又字玄纬，号罗浮外史，无锡人。嘉靖国子监生，任广东盐课副使。用“奇字斋”名义刻书。除刊印其自编的《小十三经》18卷、《国雅》26卷外，还刻有《类笺唐王右丞诗集》19卷、唐李翰《标题补注蒙求》3卷等。

茅坤（1512—1601）

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人（今湖州）。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任青阳、丹徒知县，累官至大名兵备副使，年90而卒。明代著名的古文学家，家中筑“白华楼”藏书，著有《茅鹿门先生文集》等，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盛行海内，书坊翻刻无数，有“乡里小儿无不知茅鹿门者”之评。

朱睦㮮（约1516—1585）

朱元璋六世孙，字灌夫（一作灌甫），号西亭，又号东陂居士，周王朱橚之后，封镇国中尉。自幼聪明好学，喜藏书，编有《万卷楼书目》，又称《聚乐堂艺文目》，著录4 311种、12 560卷。所刊书有《周易辑闻》6卷、《周易集解》17卷、《春秋集注》11卷、《翁东涯集》17卷、《冰川诗式》10卷等。自著书有《开封府志》、《河南通志》、《中州文献志》等。

周弘祖（约1529—1595）

湖广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授江西吉安推官，迁福建提学副使。因和大学士高拱不和，贬贵州安顺判官。他搜集古籍碑刻，编成《古今书刻》2卷，上编收各地刻书2 306种，下编收各地石刻920种。这本书的特点是按地区排列，对于了解各地刻书情况有参考价值。

沈节甫（1533—1601）

字以安，号锦宇，湖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

官工部左侍郎。喜藏书，编有《玩易楼藏书目录》。曾编大型丛书《纪录汇编》，收明人野史杂记121种，有陈于廷江西刻本。又有《由醇录》12种。

赵定宇（1535—1596）

名用贤，字汝师，常熟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职。喜藏书，编有《赵定宇书目》，收书3 300种。所收之书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如《稗统》一书著录笔记小说244种，原书已失传，靠这本书目提供的子目和附录留下了一些线索。所刊书有《五经》、《管子》、《韩子》等，还编刊过大型类书《玉海》。

焦竑（1541—1620）

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江宁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殿试第一，官翰林院修撰。编修《国史》时，被任命为领衔之一。皇长子出阁，他任讲官。后主顺天乡试，因录取的考生"文多险诞"，降为福宁同知。他撰写的书有《国朝献征录》、《澹园集》、《易筌》、《焦氏笔乘》、《玉堂丛话》等十余种。编纂的书有《国史·经籍志》、《类林》、《熙朝名人实录》等。刊刻的书有《两苏经解》7种60卷、《东坡集》16卷、《陶靖节先生集》8卷等。还刊刻过李贽的《藏书》。

屠隆（1542—1605）

字长卿、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任青浦知县、礼部郎中。著名剧作家，著有《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等传奇，另有《白榆集》、《由拳集》、《鸿苞集》等。还刻有《董西厢》、《汉魏丛书》等。

紫柏真可（1543—1604）

字达观，俗姓沈，吴江人，明末四大师之一。17岁在苏州出家，遍历名山，深研佛学。他鉴于《南藏》、《北藏》流布不广，立志用佛教徒自己的力量刻大藏，他谢绝万历母亲李太后的资助，经历几代的努力，终于完成。全藏共收经2 141种、12 600卷，比南、北藏多出不少，世称《径山藏》、《嘉兴藏》。

陈与郊（1544—1611）

字广野，号禺阳、玉阳仙史，或署高漫卿、任诞轩，浙江海宁人。曾任太常寺少卿。著有传奇《灵宝刀》、《麒麟罽》、《樱桃梦》、《鹦鹉洲》4种。杂剧作品有《昭君出塞》等5种。刻书有自撰的《檀弓考工记辑注》、《文选章句》、《隅园集》及“传奇四种”。所辑《古名家杂剧》，收杂剧65种。

冯梦祯（1548—1595）

字开之，秀水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南京国子监祭酒，家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因名其堂为“快雪堂”，所刻书称“绵眇阁”。刊有佛经《楞严经》以及《陶靖节集注》、《大唐新语》、《先秦诸子合编》等。曾参与著名的《嘉兴藏》的纂辑工作。

王肯堂（1549—1613）

字宇泰，号损庵、念西居士，金坛人。著名医生。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曾任南京行人司副、福建参政等职，后专门行医。编有《证治准绳》120卷，为世所重。他又集古代医书成《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这是一部医科丛书，收书44种。还刊刻明戴元礼《秘传证治要诀》12卷、明鲁伯嗣《婴童百问》10卷、唐孙思邈《千金翼方》。自著的书还有《论语义府》、《尚书要旨》、《郁冈斋笔麈》、《医论》、《医辨》等。

臧懋循（1550—1620）

字晋叔，号顾渚山人，浙江长兴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家藏杂剧秘书很多，又从别处抄来多种杂剧。在收集了大量古剧后，用“雕虫馆”名义编刻《元曲选》100卷。臧氏还刻有《玉茗堂四种曲》80卷、《古诗所》56卷、《唐诗所》47卷、《古逸词》24卷等，总字数约300万字。他自己编书，又自办刻印工场，并主持发行工作，成为集编、印、发于一身的戏剧专业出版者。

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改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人。万历四年（1576年）举人。少从其父宦游，遍历燕、吴、齐、赵、

鲁、卫诸地。所到之处辛勤搜书，历三十余年，收藏图书达42 384卷，编为《二酉山房书目》6卷。著有《少室山房笔丛》48卷，记下了大量明代的出版史料。还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等。

俞安期（1551—1627）

初名策，字公临，后改字羡长，吴江人。少年时笃学好古，淡泊功名。以编辑《唐类函》驰名于时。唐代有4种类书行世，但重复缺漏，不便于用。他把这四种书重编成200卷，分为45部、子目1 960项，用者称便。还编有《诗启隽类函》、《艺苑琼英》两部类书，以及《庄骚合刻》等书。

陈继儒（1558—1639）

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成年后中秀才，29岁时焚儒生衣冠，绝意功名。遍览群书，经史佛道，无不涉猎。曾获得颜真卿墨迹，因名其居为“宝颜堂”，藏书丰富。汇辑善本书为《宝颜堂秘笈》226种、457卷，分6集出版，收录了不少罕见之书。他编的书极多，如《秦汉文脍》5卷、《古文品外录》12卷、《古论大观》40卷、《文奇豹斑》12卷、《逸民史》22卷等，所编《建文史待》引书达126种之多。他所编的书有随便删改的毛病。书坊假冒他名字出版的书很多。

徐光启（1562—1633）

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父亲务农，自幼家贫。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顺天府试第一。但会试不售，便回乡教书，名声大振。39岁时，与利玛窦结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在42岁时接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致力于译介西方文化，如《几何原理》等书。编撰《农政全书》，晚年主持《崇祯历书》的修纂。

祁承㸁（1563—1628）

字尔光，号夷度，又号旷翁、密士老人，山阴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累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世代藏书，江东数第一，筑藏书楼“澹生堂”。编有《澹生堂藏书目》14卷，收书9 000种、10万余卷。著有《澹生堂藏书约》、《庚申整书小

记》、《庚申整书略例》等目录学专著，提出了图书分类的理论，因、益、通、互这些理论，绝大部分现在还适用。著有《澹生堂集》、《牧津》、《两浙著作考》等43种、229卷。还著有《国朝征信丛录》、《诸史艺文钞》等。

赵琦美（1563—1624）

原名开美，字仲朗，一字如白，号玄度，又署清常道人，常熟人。赵定宇之子。官刑部郎中，曾任都察院都事。筑脉望馆藏书，用20年时间觅齐了《营造法式》一书。他收齐了《洛阳伽蓝记》后，与几位藏书家的本子对勘，校正500余字后刊印。编有《脉望馆书目》，收书5 000余种、2万余册。所藏书中有较多通俗文学作品，手校古今杂剧242种、小说186种。

王延喆（生卒年不详）

字子贞，户部尚书王鏊的长子，震泽（今吴江）人。以父荫仕中书舍人大理寺右寺副，出任兖州府推官，后因病辞归，校勘图书，所刻人称精品。他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130卷最著名。还刻印过《本草单方》8卷。其父王鏊刻过《大唐六典注》30卷、《孙可之文集》19卷、《楚辞章句》17卷等。

高儒（约1540年左右在世）

字子醇，号百川子，涿州人。父亲高荣，曾官尚宝丞，后转任锦衣卫职。高儒在父师的影响下，崇文习武，收藏图书，藏书万册，编成《百川书志》书目，著录图书2 000余种，书名下有解题，介绍作者、篇目、掌故、内容等资料。在史部的外史、小史、野史中，收录了不少当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

郭云鹏（约1552年左右在世）

吴县人。所刻书堂号为“宝善堂”、“济美堂”，新刻大都是集部名著。曾辑欧阳修遗文。所刊书均在嘉靖年间，有《曹子建集》10卷、《分类补注李太白集》30卷、《欧阳先生文粹》30卷、《编选四家宫词》4卷、《河东先生集》51卷、《文章备览》2卷等。

闻人铨（一作“诠”）（？—1543）

字邦正，余姚人。嘉靖间进士，知宝应，迁御史，巡视山海

关。他鉴于读书人少实学，故校刻《五经》、《三礼注疏》、《旧唐书》，还参与《阳明先生文录》的校刊。此外，还刻有《甘泉文集》28卷、《艺文类聚》100卷。他从几个地方得到《旧唐书》后，和门人沈桐一起校订了4年，恢复了《旧唐书》的原貌，成为研究唐代历史不可缺少的书籍。

胡震亨（1569—1645）

字君誾，后改字孝辕，号遁叟，海盐人。累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藏书万卷，多秘册异书。人称他和他的同游为“读书种子”。著《海盐县图经》、《靖康资鉴录》、《读书杂录》等，所辑《唐音统签》多达1 033卷，收唐诗3万首，成为后来编《全唐诗》的基础。还刻有《秘册汇函》，专收各种罕见之书，刻了24种，遇火版毁，全书没有完成，残版为毛晋得到，用《津逮秘书》的名称出版。

徐𤊹（1570—1646）

字惟起，又字兴公，闽县人。乡试屡不中，便放弃科举，致力于诗歌创作，与曹学佺等同主闽中诗坛。家富藏书，编《红雨楼家藏书目》，收书3 000多种、7万余卷。藏书中有方志348种、小说559种、戏剧140种。集部书注明作者简历，用者称便。他用17年时间配齐《何氏语林》，并加校正刊行。他致力于编撰当地名胜志，如《雪峰志》5卷、《鼓山志》20卷、《榕城三山志》12卷、《武夷志》19卷等。

吴琯

字仲虚，号云中，福建漳浦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任婺源县令，客居歙县。刻书堂号“西爽堂”，刻书240种，达1 500卷，以大部头史籍著称，如《古今逸史》初刻只有22种，最后定为55种、223卷。又刻《合刻山海经水经注》58卷、《三国志》65卷、《薛氏医按》24种、107卷。他刻的书以精美著称。

曹学佺（1574—1647）

字能始，号石仓，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广西右参议。著《野史纪略》，与魏忠贤等炮

制的《三朝要典》针锋相对，被认为“私撰野史，淆乱国章”，削籍毁版。崇祯时平反，起用为广西副使，不就，著书石仓园中。明亡后任南明唐王政权的礼部尚书，清人入闽时自缢。著有《经通论》、《蜀中名胜记》、《舆地名胜志》207卷等。曾选辑上古至明代诗成《石仓历代诗选》1 263卷，历代佳作具备。

冯梦龙（1574—1646）

字犹龙，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人。多次考试未中，但在当地颇有文名，曾去湖北麻城讲《春秋》，50岁后，任丹徒训导，编有多种指导科举的书。他最大的成就是编辑的三本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四部笔记小说：《智囊》、《谈概》、《情史》、《笑府》。还有民歌集《山歌》、《挂枝儿》。56岁考取贡生，任福建寿宁知县。明亡后编了时事书《中兴伟略》和《甲申纪事》。他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收集和出版，和出版商有密切的联系。

陈仁锡（1581—1636）

字明卿，长洲人。天启二年（1622年）殿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著有《系辞十篇书》、《易经颂》、《四书考》、《重订古周礼》、《古文奇赏》等。所刻书堂号“阅帆堂”，曾刊陈淳、沈周的《陈沈两先生稿》，在同代中称上乘。他收集有关《资治通鉴》的书籍，编成《资治通鉴大全》341卷，是研究《资治通鉴》的必备书。还刊有《宋元通鉴》157卷、《潜确居类书》120卷、《大学衍义补》160卷等。

胡正言（1582—1672）

字曰从，号次公，原籍安徽休宁，后迁居南京。精篆刻，长于制墨、造纸、绘画。因所居门前种一丛竹子，名所居为“十竹斋”。他在出版上最大的贡献是印刷了《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创造了“饾版”和“拱花”两种新的印刷工艺。

木增（1587—1646）

先祖是纳西族土酋，洪武初赐姓木，世袭丽江土知府。木氏接受汉文化，能用汉文写作，用“解脱林”名义刊印木氏诗文集

《雪山始音》、《雪山庚子稿》、《万松吟卷》等书。木增荫土知府，崇祯时加升为左布政使，刻印过自著《芝山云过集》、《山中逸趣》、《空翠居》、《光碧楼诗抄》等书，还试用银粉印《普门经》。所印佛经有多种至今犹存西藏布达拉宫。木增的印书活动和常熟毛晋有联系。

茅元仪（1594—1640）

字止生，号石民，又署东海波臣，归安（今属浙江湖州）人。父国缙，南京兵部主事。祖父茅坤，著名文学家。茅元仪撰《武备志》240卷，人称“兵学百科全书”，入清后成为禁书，日本有翻刻本。他所著军事方面的书有60余种。

张国维（1594—1645）

字九一，号玉笥，东阳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主持繁昌及太湖地区水利工程，后任兵部尚书。曾自刊其所著《吴中水利全书》28卷，又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60卷、明周鉴著《将标》66卷，并支持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504卷，还捐俸出版了所谓“井中奇书”，即宋郑思肖《心史》7卷等。

祁彪佳（1602—1645）

字弘吉，号世培，山阴人，祁承㸁之子。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任兴化推官，明亡后自沉。有《祁忠敏公日记》、传奇《全节记》、《苏武故事》等。目录学著作有《远山堂曲品》，收戏曲466种，还有《远山堂剧品》收明人杂剧242种，并加评论。这两本剧目书是研究我国古代戏剧的重要资料。

陈子龙（1608—1647）

字人中，华亭（今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选惠州府推官，补绍兴府推官。南明弘光朝任兵科给事中。清兵占南京后，在松江起兵，事败被俘自沉。著有《白云草庐居稿》、《湘真阁稿》。他和一些人曾组织几社，编《皇明经世文编》504卷，企图寻求解救国家危机的办法，此书收420家文章共3 145篇，崇祯十一年（1638年）刊行。他还刊刻过徐光启的《农政全书》60卷。

王骥德（？—约1623）

字伯良，号方诸生，会稽人。所著《曲律》是重要的戏曲理论，与吕天成《曲品》齐名。著传奇《题红记》等5种，校注过元杂剧《西厢记》等。曾刊印《徐文长改本昆仑奴杂剧》及自著《曲律》，署“方诸馆”，另有“顾曲斋”可能也是他的斋名。他刻的《古杂剧》共收古剧20种。

胡文焕（约1596年前后在世）

字德甫，号全庵，徽州婺源人。通音律，多才艺。经商致富后在金陵、杭州开设“文会堂”。他刊印图书，兼事藏书、贩书，所刻书达400余种，他最大的成就是刊印了大型丛书《格致丛书》，初刻186种、449卷，所收都是秘册珍函。另外还有丛书《寿养丛书》、《儒门教珠》、《古今原始》、《全庵胡氏丛书》等。所编各种丛书子目共600余种、1 300卷。但编纂的体例不严密。

吴勉学（生卒年不详）

字肖愚，歙县丰南人。著名坊刻家，刻书堂号“师古斋”，以规模大、分工细著称。最初以刻印医书驰名，有《东垣十书》10种、32卷，《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06卷，《痘诊大全》8种、21卷等。获利起家后扩大出书范围，继续刻印了《史记》130卷、《资治通鉴》294卷、《性理大全》70卷，以及《宋元资治通鉴》、《两汉书》、《世说新语》、《花间集》等。所刻书注重质量，校对精审。

程百二（生卒年不详）

字幼舆，休宁布衣，与焦竑、胡应麟、利玛窦交往。他以明陆应阳的《广舆记》为参考，对照《一统志》编刻《方舆胜略》18卷，附《外夷》6卷，将利玛窦《世界舆地全图》中的地图全都收录进去，由安徽黄氏刻工上版，这本书集中了当时资料和工艺上的尖端，对普及地理知识有重要价值。

程君房（万历年间）

字幼博、大约，号筱野，别号君房，又号玄玄子，安徽休宁人，曾因事系狱六年。著名的制墨大师，开设两家墨店，他“经

商而不轻商”，著有《程幼博集》、《徽郡新刊名公尺牍》、《圜中草》等。他把经营的墨锭上的图画印成“墨谱”，供用户选用，称《程氏墨苑》14卷、447幅，这些画是请著名版画家丁云鹏绘刻的，用“滋兰堂”的名义刊行。

殷仲春（约1596年前后在世）

字方叔，号东皋子，晚年隐居浙江秀水（今嘉兴）。他医术精湛，一面行医，一面收藏医书，并抄录了不少过眼医书，编成《医藏书目》，收医书544种，全书分成20类，每类有小序，阐明源流和主旨。自著《栖老堂集》，收诗千余首。

周曰校（生卒年不详）

字应贤，号对峰，金陵人。开设书肆，所刻书称“万卷楼”，刻书众多，大都刻于万历年间。所刻书以带有插图的小说和戏剧著称，还有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小类书”以及指导科举的书。

汪云鹏（生卒年不详）

字光华，歙县人。在金陵开设书肆“玩虎轩”，以刊刻插图本小说、戏剧为主。著名刻本有《养正图解》、《祝发记》、《红拂记》、《会真记》、《琵琶记》等，《琵琶记》有插图38幅，精美富丽。并翻刻汪廷讷、黄琏的插图本小说多种。

汪廷讷（生卒年不详）

字昌朝，一字无如，自称坐隐先生，休宁人。寓居金陵，开设“环翠堂”书坊，刻书20余种，曾刻其自撰的《坐隐先生全集》4种、18卷，还刻有历史人物传记《人镜阳秋》22卷、《环翠堂乐府》15种，都有精美的插图。

黄虞稷（1627一说1629—1691）

字俞邰，又字楮园，南京人，祖籍福建晋江（今泉州）。父亲居中，是南京国子监监丞，藏书8万卷。黄虞稷16岁考中秀才，但以后科举不利，便埋头读书。入清后，在明史馆工作，负责编写艺文志。编有《千顷堂书目》32卷，所收都是明朝一代人的著作，宋元的著作则作为附录。人称这本书目是研究明代艺文志的钥匙。

第七章　明代与东西方国家的出版交流

明代出版事业和东西方的交流，呈现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明代之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向东南亚国家带去了一些图书。整个明朝期间，中国和东方周边国家有着频繁的出版交流。这些周边国家最初都使用汉字，被称为“汉字文化圈”。出版交流的方式和前代基本相似，即中国的书籍通过赠送和贸易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在汉字文化圈国家中，除了购买汉籍、翻刻汉籍外，还产生了诸如“翻案”等形式，深层次地吸纳、嫁接汉文化，互相渗透。印刷技术和印刷工人的交流，也十分频繁。

和西方国家的出版交流，主要是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一场有相当规模的翻译活动，代表人物是徐光启和利玛窦，参与的人共有数百个，出版的书有五六百种，宗教书和科技书大约各占一半。中外学者对这次译介活动评价很高，梁启超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译介活动（第一次是唐朝），其作用是使“中国的智识线和外国的智识线相接触”。英国人李约瑟则说“从此，中国的科学和全世界汇成一体了”。这次译介活动主要是中国摄取西方文化，虽然也有少量中国典籍被介绍到西方，但为数不多。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与出版传播

一、郑和下西洋中的文化内涵

明朝建国之初，和周边国家的友好来往十分频繁。朱元璋在位31年，先后遣使30次，对邻近的12个国家进行访问；同一时期，周边国家来中国访问的达135次。永乐年间，这种友好活动继续发扬，永乐在位22个年头中，有60个国家遣使来华，共245次，其中有8位国王。永乐时对外的活动，以郑和下西洋最为突出。

郑和下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宣德八年（1433年）终止，前后共七次，历时28年，行程10万余里，所到国家三四十个，主要是在东南亚地区，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肯尼亚等，涉及的地名有500多处。前面三次在较近的地方活动，从第四次起，就远访居“西海之极”，指向更远的国家，最远曾达非洲的东海岸。[1]

【1】以上两段中的数据均见中国史稿编写组著《中国史稿》第六册第八章，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这次下西洋活动规模巨大，时间持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文化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向所到的国家颁给历法、冠服，介绍科举制度；赠予图书、度量衡器；传授建筑、绘画、雕刻艺术；采集奇异动物植物品种，交流药物和处方等。这些交流活动的结果，一直到今天，还可以找出它的影响，在东南亚各国的社会面貌以及国际关系的格局上，都有所表现。

二、郑和下西洋赠给东南亚国家的书籍

郑和当时所到的东南亚国家，其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中国相比，有相当的差距。当时，中国已处于十分发达的封建社会的后期，而郑和所访的海外国家，大都还处于奴隶制或部落状态。以

所到的爪哇（今印尼爪哇岛）为例，当时居民的饮食习惯是“人吃食甚是秽恶，如蛇蚁及诸虫蚓之类，以火烧微熟便吃”。居住状况是“家畜之犬，与人同器而食，夜则共寝，略无忌惮”。社会风气强悍，“男子腰插不剌头（一种双刃短刀）一把，或买卖之际钱物不明，或酒醉颠狂，言语争竞，便拔此刀刺之”。“其国风土无日不杀人，甚可畏也”。法制还很不健全，“强者为胜，若戮死人，其人逃避三日而出，则不偿命，若当时捉住，随亦戮死”。[1] 暹逻国也是，“风俗劲悍，专尚豪强，侵掠邻境”。[2] 彭坑“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3] 苏门答剌国的国王“每岁杀十余人，取自然血浴之，谓能压邪，四时不生疾病”。[4] 这些都是当年郑和的随行者的记实或口述，虽不可尽信，但也可说明其不发达的状况。

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状况，决定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出版交流，只能是浅层次的。郑和向他们展示的中国文化，主要是靠舰队和军队的气势、冠服和礼仪的高尚、物资的丰富、丝绸和瓷器的精湛工艺等，这些属于形象直观的东西。图书的赠予，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只能限于初级的文化层面上。见于记载的赠予图书，有《历书》和《列女传》两种。

《历书》　中国的周边国家有不少都奉行中国的“大统历”。每年十月，中国的钦天监编成历书后，就印送给周边国家，印数达数十万册。到英宗接位时，为了“省诸冗费”，听从礼部尚书胡濙的建议，“钦天监历日五十万九千七百余本，省为十一万九千五百余本”。[5] 郑和出使时，“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6] 所谓颁中华正朔，就是把明朝的历书颁送给所到的国家。当时的东南亚国家，还“不解正朔，但看月生为初，月晦为尽，如此十次盈亏为一岁”。[7] 所以对明朝的历书都十分重视。

奉行相同的正朔，是思想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帜，意义重大。明政府编颁的历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王历，一种是民历。两种历书上都有繁多的“历注”，每天若干条，大至天文地理，小至日常起居，无所不包。《明会典》对此有详细记载。王历的历

【1】[明]马欢：《瀛涯胜览校注》，《爪哇国》，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2】[明]马欢：《瀛涯胜览校注》，《暹逻国》，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3】[明]费信：《星槎胜览校注》，卷二《彭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4】[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苏门答剌传》。

【5】[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6】[明]马欢：《瀛涯胜览校注》，卷首《纪行诗》，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7】[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占城传》。

注，有祭祀、封拜、进表、颁诏、冠笫、行幸、宴会、招贤、出师、遣使、入学、缮郭、畋猎等30事。民历的历注，有祭祀、嫁娶、冠带、会客、出行、安床、裁衣、沐浴、剃头、疗病、动工、破土、移徙、栽种等32事。每事都注明宜忌和做法等。这样的历书，无异是一本日用常识、生活习俗的小百科全书，可以起到“变其夷习”的作用。

《列女传》七卷　《列女传》是汉刘向编撰的，内容是后妃和大夫、庶人的妻子的懿言嘉行，为女子树立榜样，共105人。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个部分。历代都有增修，永乐接位不久也动手修订，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修成，次年九月，命礼部“装印万册，给赐诸番”。凡郑和所到之国，都赐给若干部，其中暹逻国就送了“百部”。永乐帝把这本书送给这些国家，是因为他认为，夫妇之道是“生民之始，万福之源”，这本书里提倡的女仪妇德是“天下之大本”、“经纶之道”。如果女德完善，就可达到“师氏知所以教，而闺门知所以学，庶修身者不致以家自累，而内外有以相成全”。[1]

【1】《列女传》永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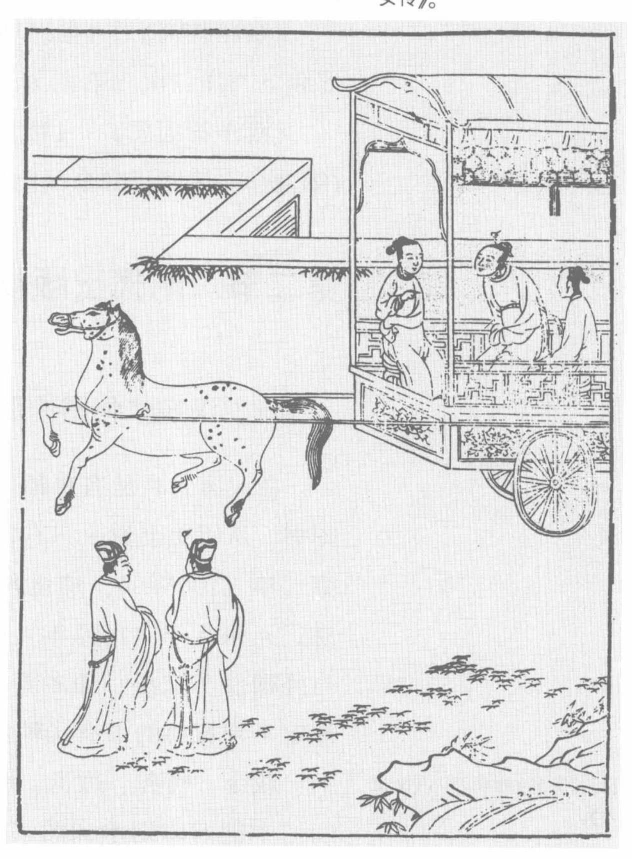


图64
郑和赠给东南亚国家的《列女传》。

《列女传》这本书，内容生动具体，一人一事，图文并茂，有较大的可读性，是改变民风陋俗、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伦理教材。（图64）

郑和下西洋时，把大统历历书和《列女传》赠给所到国家，适应了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而明政府和日本、朝鲜、越南（北部）等文化发达国家的出版交流，则是另一番景象，将在下一节详细介绍。

郑和下西洋后，产生了一批记

载海程的海图，以及记载这些国家风俗民情的异域志，为我国图书宝库增添了异彩。主要有：

《郑和航海图》　原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因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收录此书，得以流传至今。这份海图采取自右向左展开，上南下北，与现代的地图不同。起点为南京宝船厂，终点为非洲东岸慢八撒（今肯尼亚之蒙巴萨）。图上所注的地名，国内的100多处，国外的300多处。

《西洋朝贡典录》　3卷。吴县人黄省曾著，成书约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本书是据《星槎胜览》、《瀛涯胜览》、《针位》等书编撰的，作者并未亲自去西洋。书中涉及23个国家，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航路。《针位》一书，今已不传。

《星槎胜览》　前后集共4卷。费信撰，昆山人。曾随郑和下西洋四次（第3、4、5、7次），记载了40余国的情况。

《瀛涯胜览》　1卷。马欢撰，会稽人，回族，通番语。曾随郑和下西洋三次（第4、6、7次），记载了20余国的情况。

《西洋蕃国志》　1卷。巩珍著，南京人。随郑和下西洋一次（第7次），记载了20余国的情况。

第二节　明代出版物在汉字文化圈的流播

一、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和解体

在我国，自从有典籍以来，就和周边地区以及远方国家交流图书。从历史上看，只有宋朝曾经禁止书籍运向外国。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禁止九经书疏以外的一切书籍在北方边界贸易。元祐八年（1093年）更规定不准“熟铁、文字及其他禁物”与外国使节交易，违者要“罚刑二年”。大观初（1105年左右），规定不许贸易的书有10种：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其余的书则允许贸易。[1] 元朝期间，中国的印刷术和图书，“西传东渐南播”，直接间接地传到

[1]《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世界各地。

中国典籍向国外流播，以汉字文化圈国家为主。在明代，中国的西南是印度佛教文化圈，西面用阿拉伯文，西北用维吾尔文、蒙古文。而朝鲜、日本、越南这三个国家，属于汉字文化圈。大约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时候，汉字先后传入这三个国家。最初，这三国都使用汉字，诵读汉籍。后来，他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朝鲜用谚文，日本限制汉字，越南采纳罗马字。大约16世纪，汉字文化圈解体，但汉字依旧流通，汉籍依旧流播，在许多方面和汉文化认同。例如在伦理上信奉四书五经的教义，实行科举制度，在文学上写作五七言诗等。因此，汉籍在这三个国家，流播依旧很广。

韩国学者金胜一对汉字文化圈作如下定义："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以中国为核心形成的进贡体制范畴的东亚国家。这个地域的共同特点是，除汉字以外公有佛教、儒教、律令制等。这种地域共同体，大约是从2000多年以前开始形成的。" 金氏的定义和我们的理解大致相同。[1]

【1】〔韩〕金胜一：《汉字文化圈近现代翻译的作用与协作方案的考察》，载《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中国编辑学会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二、中国和朝鲜的出版交流

明朝时，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是朝鲜。朝鲜自古就采用汉文字，奉行中国正朔，经常派人员出使中国，一年几次，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在国内实行以四书五经为考题的科举制度。写作汉文汉诗，引进汉文图书，用雕版印刷术刻印图书。

15世纪初，朝鲜世宗在位（1418—1450年），他致力于建设民族文化，曾召集集贤殿文臣，研究创制了《训民正音》，对汉籍进行"谚解"。所谓"谚解"，就是用谚文翻译汉籍。这是朝鲜现行拼音文字的由来。

谚文虽然创行，但是在整个明朝期间，汉籍仍然很流行。汉籍输入朝鲜的渠道：一是政府赠予、使臣往来；二是贸易往来。据《明史》卷二〇八《外国传一》等书的记载，明朝皇帝赠给朝

鲜的书有：洪武二年（1369年），“赐之《六经》、《四书》、《通鉴》”，又赐《春秋会通》、《大学衍义》；成祖十年（1403年）又赠给儒学经典；宣德八年（1433年），“赐《五经》、《四书》、《性理》、《通鉴纲目》诸书”；景泰五年（1454年），赠给朝鲜久所企盼的《宋史》。朝鲜的使臣住在会同馆里，可以和中国商人自由贸易。其他国家在会同馆开市，都以三五天为限，朝鲜和琉球则不受限制。朝鲜使团的人员更喜欢自己上街购买。《万历野获编》卷三〇的《外国》一节中，记载了朝鲜使臣上街买书的情形：“其（指朝鲜）来朝贡陪臣多大僚，……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弇州四部稿》，书肆故靳之，增价至十倍。其笃好如此。”朝鲜使臣来中国时，往往怀带一份书目，逢人就问，务求必得，不惜重价。永乐十四年（1416年）四月，使者延嗣宗、李愉从中国得到了《农桑辑要》和《四时纂要》两本书，很高兴地带回国去。

朝鲜人来华不单购买经史之书，也喜欢购买小说。《朴通事谚解》卷下有一段对话：“甲：我两个前去买文书去来。乙：买什么文书去？甲：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乙：买时买《四书》、《五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要怎么寻一等平话？甲：《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1]

[1]〔朝鲜〕崔世珍：《朴通事谚解》卷下。

朝鲜人用汉文著作的史书和诗文集很多。如李朝成宗（1469—1494年）、中宗（1506—1544年）编选刊印过朝鲜人写的汉诗《东文选》，此书曾传入中国。明人吴明济编选过朝鲜诗人百余人的作品《朝鲜诗选》，这是中国人编的第一部朝鲜汉诗选。从1457年开始，朝鲜把中国使节在朝的作品汇编成集，称《皇华集》，李朝政府时共结集出版23集。中朝两国的使臣还互撰出使记。中国有倪谦《朝鲜纪事》、董越《朝鲜赋》；朝鲜有权近《奉使录》、崔溥《漂海录》、李睟光《朝天录》。这类唱酬出版活动，史书上称为“诗赋外交”。

在中朝的出版交流中，印刷技术和印刷器材的交流很值得一提。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时间很早，具体时间尚无定论。高丽朝时，就刊印过大量经史子集图书。11世纪时，曾二次

雕《大藏经》共十万多块版子。13世纪，蒙古入侵，版毁于火，1236—1251年，朝鲜又第三次刻版，共8 137块版子，一直保存到现在。朝鲜使用活字也很早，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以十余万大军侵朝，后来被朝中联军击退。在这次战乱中，日军把朝鲜的金属活字抢去，朝鲜很快又雕了一套木活字，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朝鲜生产的纸，很受中国欢迎，用来绘画、印书。

三、中国和越南的出版交流

明朝洪武至永乐初，中国和安南（安南自1803年起改称越南）的陈朝政府有良好的关系。后安南发生政变，黎氏登位。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派兵占领安南，设郡县，把安南纳入中国统治之下，遭到安南各阶层的反对。宣德二年（1427年）明朝撤军，安南恢复为独立国家。在明朝276年时间里，除了上述20年交战之外，其余时间基本上和平共处，明朝政府规定安南三年一贡，实际上往往一年三四贡。中国送给安南丝绸、瓷器、书籍，安南送给中国香料、大象等物。

安南使用汉字，奉行明朝正朔。常派人到中国学艺，遍买经传诸书，抄录礼仪官制、文武职掌、刑律制度，回国仿行。“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皇朝设立国子监，有祭酒、司业、博士、教导等官职。实行科举制，有乡试、会试的规定，考期、考题等和中国相似。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汉籍在安南的地位是可以想见的。

据记载，明洪武二年时，曾赐给《大统历》以及织金文绮纱罗等物。[1]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政府派监生唐义，向安南颁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而且一直颁送到府州县一级的儒学。事后，这些府州县还派人到中国向明政府表示谢意。[2]

万历年间，明人严从简所著的《殊域周咨录》一书中提到，他在安南看到的汉籍品种颇多：“有《少微史》、《资治通鉴

【1】《明史》卷三二一《外国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一《黎纪一》。又《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二。

史》、《东莱史》、《五经四书》、《胡氏左传》、《性理氏族》、《韵府》、《玉篇》、《翰墨类聚》、《韩柳集》、《诗学大成》、《唐书》、《汉书》、《古文四场》、《四道》、《源流》、《鼓吹》、《增韵》、《广韵》、《洪武正韵》、《三国志》、《武经》、《黄石公素书》、《武侯将苑百传》、《文选》、《文萃》、《文献》、《二史纲目》、《贞观政要》、《毕用清钱》、《中舟万选太公家教》、《明心宝鉴》、《剪灯新余话》、《算命克择》、卜筮算法、篆隶家、医药诸书，并禅林道录、《金刚玉枢》、诸佛经杂传并有之。”[1]中国和安南在边境互市时，书籍是重要的一宗。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越南人“嗜书，每重赀以购焉”。[2]

【1】[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

【2】[明]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不愿接受清朝的统治，于1645年、1651年两度侨居安南，和安南官员有往来，还受到安南国王的召见。他曾向一位安南官员询问家中藏书的情况:“四月初六日，不知是何官职，来问古文中义理，黎云：此公极好学，家有多书。余问云：尊府古书多否？答曰：少少足备观览。余问：《通鉴纲目》、《前后汉》、《廿一史》、《史记》、《文献通考》、《纪事本末》、《潜确类书》、《焚书》、《藏书》及《古文奇赏》、《鸿藻》等书。答云：俱有，唯《鸿藻》无有。”[3]一个官员家中有这许多汉籍，可见中国图书在安南流行之广。

【3】[明]朱舜水:《安南供役记事》,《朱舜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安南人用汉文写作的史书有《大越史记全书》（吴士连著）、《大南实录》（张登桂著）、《大南一统志》（高春育著）、《越史通鉴纲目》（潘清简著）等。这些书从史学思想到体例语言，都受中国的影响。

四、中国和日本的出版交流

明朝建立之初，中日两国没有立即建立正常的关系，一直到15世纪初，才互相派出国使，传递国书。永乐二年（1404年），两国订立勘合贸易条约，规定日本每十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三条船、船员三百人。于是两国的贸易往来得以恢复，书籍也是贸易品的一种。这种勘合贸易实际上远远超过规定的年限和船只

数，私贩们也参加到勘合船中进行贸易。在倭寇侵扰中国沿海期间，双方的商品贸易，包括图书交易，也没有完全停止。成化十一年（1475年），日本足利义政向明政府要求三样东西：铜钱（日本用永乐钱达二百年）、勘合符（通商凭证）、书物。可见日本人对中国书籍的重视。

引进书籍的途径很多，主要有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两种。

明朝的赠予是官方渠道之一。据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赐怀良（日本王）《大统历》”。永乐五年（1407年）日本使臣“请赐仁孝皇后所制《劝善》、《内训》二书，即命各给百本”。成化十三年（1477年），日本使臣“求《佛祖统纪》，诏以《法苑珠林》赐之”。

中日两国在官方的使臣往来时，常派遣有学问的僧人参加，或由高僧担任正使。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明代来华的日本僧人，共有110人之多，[1] 最著名的有如明（1376年来华）、惠明（1436年）、雪舟（1468年）、向明（1475年）、周良（1539年、1547年二次）等。中国派到日本的高僧有祖阐、无逸（1371年）、道成（1403年）、真圆、觉海、超然等。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使者天龙寺僧人东洋允澎来华，有船9艘、1 200人，带回的书有《劝忍百箴孝经》2册、《清江贝先生文集》3册、《诸史会要》、《翰墨全书》等。东洋允澎归途中在杭州去世，书由其他人携归，作为珍贵礼品赠人。这种由僧侣担任外交使节的活动，被称为“僧侣外交”。

[1]〔日〕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民间商贸图书交流更为可观。中国开设明州、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作为通商口岸，日本开设长崎为通商口岸。据朱国祯《涌幢小品》“倭官倭岛”条记载：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时，他到长崎，看到“明商不止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据他统计，从万历到崇祯（1610—1639年）年间，明朝民间商船每年去日本的约有30艘至60艘。载去的货物有丝织品、药材、砂糖、矿物、染料、皮革、纸张和书籍等。

日本派人来华采购的图书，其内容如下：1. 经论章节疏、僧

传僧史，如《法苑珠林》、《佛祖统纪》、《神僧传》等；2. 诗文笔记，如《石湖集》、《老学庵笔记》、《六臣注文选》等；3. 政书类书，如《文献通考》、《百川学海》、《类说》、《北堂书钞》等；4. 儒学典籍，如《周易注疏》、《大学衍义》、《性理大全》、《尚书正义》等；5. 医学书籍，如《本草》、《奇效良方》等。

关于日本人采购中国图书的热点，在赴日使者郑若曾《筹海图编》"倭国事略"的"倭好"条中，有很好的分析："五经则重《书》、《礼》，而忽《易》、《诗》、《春秋》；四书则重《论语》、《学》、《庸》，而恶《孟子》。重佛经，无道经。若古医书，每见必买，重医故也。"在大量收集中国典籍的基础上，形成了两大著名藏书机构：足利学校和金泽文库。

中国出版的图书，不要多久，就会传到日本，引起研究的兴趣。明朝制订的《大明律》，是有明一代法治的基础。处于南北分裂的日本，十分注意邻邦中国的情况。日本周防大内大夫多多良义隆从中国私商手中得到了《大明律》，"初见大明律令，诚信笃敬。告彼学校之徒，咸称正法而广录之"。就派僧人随贡船到中国，"愿识中国礼法，奉命到国施行"。以后，研究《大明律》持续不断。[1]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出版后，很快传到日本，引起重视。从日本宽文十二年（1672年）到宽政三年（1791年）有三种校正翻印本出版[2]。

中国的地方志在日本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日本政府常委托从中国各地启碇的船只收集该地的地方志，重金收购。明朝时出版的各地方志，在日本差不多收集齐全。并参考中国地方志的体例，编纂了日本各地的地方志。

中国运往日本的图书，在日本有多种书目，如《赍来书目》、《二酉洞》、《商舶载来书目》等。

日本人著作刊印的书，有各种情况：

（一）汉籍

直接用汉文写作刊印的书，称为"汉籍"。王宝平等在我国60多家图书馆作初步调查，这类刻本约在三四千种左右（未含台

[1]〔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三章《汉籍输入的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第六章第九节《医药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湾部分)，杭州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了他编的《中国馆藏日人汉文目录》，著录了我国68所藏书单位所藏的日本人写的汉籍。共有2 648种，涉及各类图书。现把超过100种的依次列后，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用汉字著作的是些什么书：文学441种、医学425种、佛教300种、日本史233种、传记148种、中国思想105种、日本思想105种、地理103种。德川光圀（中国唐朝用字，即“国”）编的《大日本史》、吉田意休著的《刺针家鉴》（针灸），都是用汉文著作的。

（二）和刻本

日本还出版了不少完全照中国书翻刻的图书。这种书称为“和刻本”。最著名的是“五山版”图书，由中国工人在日本刻印。汉文典籍的和刻本据说始于日本正中二年（1325年）复刻的宋本《寒山诗》，其后进一步在日本延文三年（1358年）出版《诗法源流》。明代的和刻本，经部有《古文尚书》、《毛诗郑笺》、《春秋经传集解》等；子部有《老子》、《庄子》的讲义；集部有韩柳文、李杜苏黄诗，还有《三体诗》、《联珠诗格》、《皇元风雅》、《古文真宝》、《诗人玉屑》、《翰林珠玉》等。通俗图书也被翻刻，如通俗历史书《人镜阳秋》，汪廷讷撰、汪耕图，一传一图，绘刻精工，日人翻刻，书名改为《劝惩故事》。

除了完全按照原样翻刻以外，在日本，还采用了一种加上简便标志的办法，以便不熟悉汉文的日本人阅读。所谓“简便标志”，是指“乎古止点”、反切、或墨笔的训点、旁注、白书假名。“乎古止点”是训点发明以前，古代日本人阅读古典汉文时所加的符号，通常由“返点”和“送假名”构成，通过用朱笔加注这些符号，使文章符合日语语法顺序。（图65）

中日图书的交流，产生了一些很特殊的文化交融现象：

1.“翻案”

按照日本辞书《广辞苑》的释义，“翻案”的意思是“换言、改写前人所作之趣意，特指借用本国古典、外国小说戏曲等的梗概内容，而在人情、风俗、地名、人名等方面加上己意的改


尚書正義序　……穎達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長春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等奉
勅重校刊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摠
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
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
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
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
萬曆十五年刊

图65
《尚书正义》20卷，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原刊。日本安永六年（1788年）平安书林翻刻。在原样上加了简便标志，以便利日本人阅读。简便标志如“—”“√”等，“√”是状语的记号。

作。”说简单点，就是采用外国作品的主旨、情节，换上本国的人名、地名、时代、名物。这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方式，是仿作、嫁接、移植，把外国作品来一番入乡随俗、移花接木的改造。这种做法来源颇早。例如《长恨歌传》被翻成《唐物语》，《开元天宝遗事》被翻成《杨贵妃物语》。日本不单是翻中国小说，也翻印度的《百喻经》、希腊的《伊索寓言》。但是最多的是对明代小说的翻案。

明初的文言短篇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是明代风靡一时的小说。明政府曾明令禁止。这两部小说在15世纪传到日本，被改编成《奇异怪谈集》（又名《奇异杂谈》），在日本流行。

明末，中国的“三言”出版后，很快传到日本，引起了极大兴趣。有两种流播的形式。一种是直译的形式，按照原文翻译，即“日本三言”系统：《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三部书，共14篇，分别在1743、1753、1758三年出版。译者是冈田白驹和泽田一斋师徒二人。另一种是“翻案”的形式，即“三谈”系统，由都贺庭钟为主，他在“三言”中选出30篇，分成三辑，从1736至1749的十三年间，出版了三本小说集：《古今奇谈—英草子》、《古今奇谈—繁野话》、《古今奇谈—莠名册》。

中国的《水浒传》，在日本被翻成数十种长篇小说，如《湘中八雄传》（北壶游著）、《本朝水浒传》（建部绫足著）、《坂东忠义传》（三木成为著）、《女水浒传》（伊丹椿园著）、《建久水浒传》（振鹭亭著）、《梁山一奇谈》（山东京传著）、《天明水浒传》（多岛散人著）、《天魔水浒传》（瓢瓢舍千成著）。[1]

[1] 严绍璗、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第三章，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是《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其情节和人物是大家熟知的。在日本的《繁野话》中，题目被改为《马场求马沉妻成樋口婿》，时代和人物被“翻案”为：

时代——改为“日本战国”。

莫稽——改为落魄浪人“马场求马”。

丐头——改为僧人“净应”。

金玉奴——改为“阿幸”。

许德厚——改为“诸侯若狭国武田家”。

救金玉奴的人——改为“武田家臣樋口三郎左卫门”。

《金瓶梅》在日本也有翻案本。西门庆换成西门启十郎，潘金莲换成阿莲，时代换成室町时代。这种“翻案”的图书，在朝鲜也颇盛行。

2.“返传”

中国书籍传到国外，被妥善保存着，年长日久之后，中国本土已佚失，而在国外却保存完好，重新返还到中国，这便是所谓“返传”，又称“逆向流播”。唐颜师古注的《汉书》，中国已没有，日本有二卷抄本。唐抄本《春秋经传集解》、《翰林学士诗集》、《翰苑》、《新撰类林抄》、《文馆词林》这几种书在中国都已不见，而日本京都藤井齐成会藏有。唐魏征纂的《群书治要》50卷，中国久已失传，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僧人的抄本。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德川家康用活字排印，重新传到中国。这些都是“返传”的实例。

明代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书，也是靠返传重新问世的。上面提到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两本明初的禁书，是清末时由董康返传回中国的。1930年，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只看到“三言”中的两种，《喻世明言》这一种未能看到，因此语焉不详。一直到1946年时，才由王古鲁从日本拍了照片，返传回中国。冯梦龙在福建寿宁做县官时写的别具一格的志书《寿宁待志》，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返传回国的。（图66）

在“返传”现象中，茅元仪的《武备志》一书最能说明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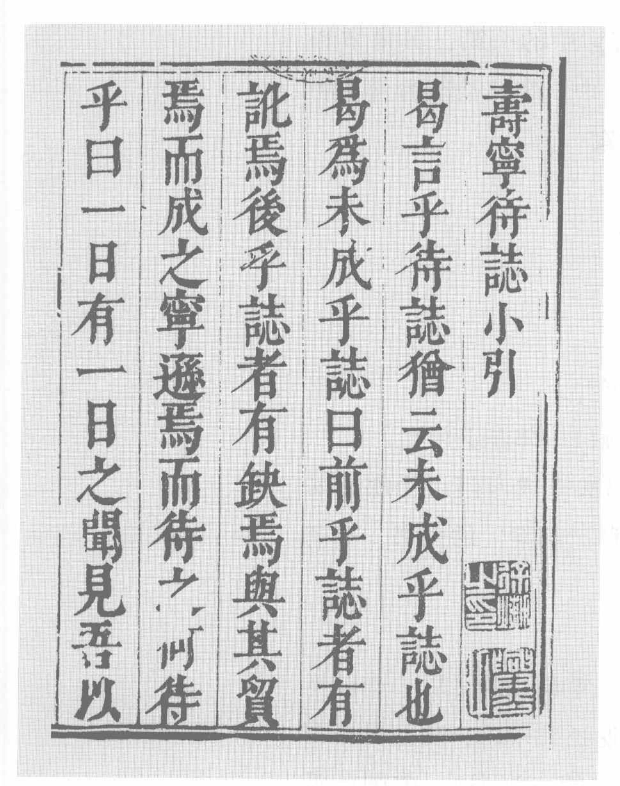

壽寧待誌小引
曷言乎待誌猶云未成乎誌也
曷爲未成乎誌曰前乎誌者有
訛焉後乎誌者有缺焉與其貿
焉而成之寧遜焉而待之何待
乎曰一日有一日之聞見吾以

图66
从日本返传回中国的福建《寿宁待志》，原件在日本东京图书馆。

题。茅氏从小爱读兵书，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攻明，明朝开始真正尝到女真人的威胁。茅元仪忿而著《武备志》一书，240卷，200万字，插图738幅，辑录了2 000种图书秘籍中的资料。这部书在天启元年（1621年）刊行，入清后被禁止。日本在宽文四年（1664年）复刻。后来，我国湖南省根据日本的复刻本重刊，这部“兵学百科全书”才在中国传开。中国和日本，都曾在这本书中辑出一部分，另成一书。中国辑出过《少林棍谱》、《二十一史战略考》，日本辑出过《蒙汉译语》。1974年，日本的古典研究会又根据各种版本出版了全译本。你来我往，或整或零，反映了对这本书的重视。

日本各级图书馆中，藏有中国的地方志达4 000种之多，其中40多种在中国本土已不存，靠“返传”使中国重新见到了这些书。

到了清朝，返传的书更多。如嘉庆年间有日本林述斋的《佚存丛书》，收书17种111卷；黎庶昌、杨守敬编的《日本访书志》书目，收书235种近2万卷，《古逸丛书》收书26种200卷；五四后由商务印书馆编的《续古逸丛书》，收书47种。

第三节　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

一、翻译活动经过

（一）利玛窦东来

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翻译活动。

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

二次都和宗教活动有直接联系，都有中外学者密切合作，都引进了大量外国图书，对我国和世界文化产生了融通作用。二者也有相异之处，明朝译介的图书中有很多自然科学著述，代表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明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以意大利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学者徐光启为代表。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马塞拉塔人，万历十年（1582年）奉派来中国，次年9月到肇庆，和中国地方官、文人交往，介绍天主教义和西方天文、算术、理化、地理知识，带来自鸣钟、地图、天象仪器、三棱镜等，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兴趣。利玛窦根据耶稣教门徒关于“在什么人中间成什么人”的教导，采用“适应”的办法，学中文，说华语，用中文写作，穿着华服，迅速华化。李贽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会晤利玛窦后的印象是“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1] 利玛窦用儒家经典解释天主教义，又用天主教义解释儒教经典，无不圆融贯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5月，到达北京，见到了皇帝，呈上天主教圣母像、十字架等宗教品，以及自鸣钟、地图、西洋琴等物，得到皇帝的赏识，批准他在北京宣武门东定居。他定居下来后，结识了一批中国学者官吏，一住十年。

当时，相信天主教的人日渐增多，官员、文人、宫廷内监，不乏其人，当时最有名的有天主教“三大柱石”，他们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利玛窦在中国前后共居住28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去世。(图67)

当时到中国来传教并从事著译活动的不止利玛窦一人，在他前后来华的传教士还有八九十人，如葡萄牙籍麦安东（1585年—指来华时间，下同）、孟三德（1585年）、费奇观（1604年）、罗儒望（1598年）、阳玛诺（1610年），意大利人石方西（1590年）、郭居静（1594年）、熊三拔（1606年）、龙华民（1597年）、艾儒

[1]［明］李贽：《续焚书》，“与友人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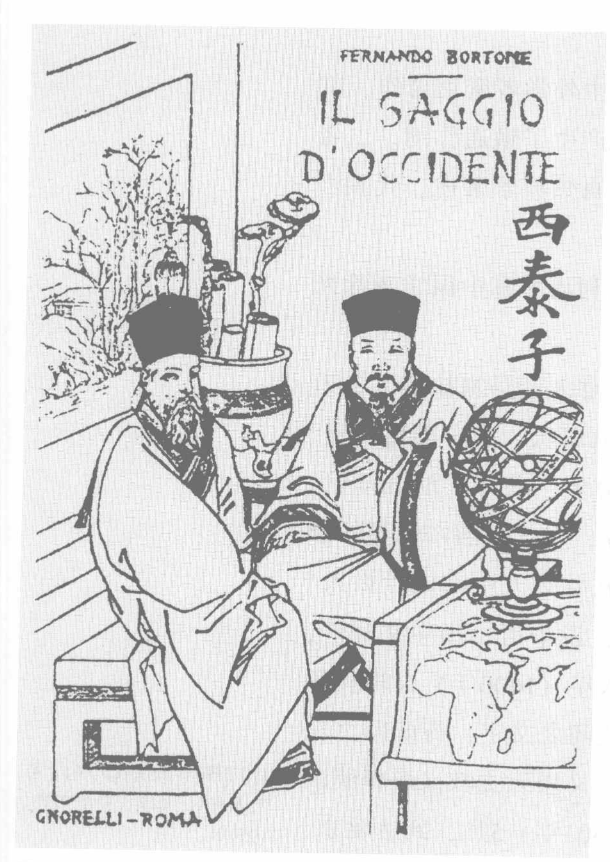


图67
徐光启和利玛窦。

略（1613年），西班牙人庞迪我（1599年），瑞士人邓玉函（1621年），德国人汤若望（1620年），法国人金尼阁（1610年）等。

与徐光启差不多同时入天主教并从事著述活动的有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王徵、韩霖、段衮、金声、瞿式耜等。

这个中西文化科学交流活动从万历初期（约1580年前后）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还没有停止，在明代计活动60年左右。清朝入关后，教士们大都继续从事传教等活动，清王朝也相当信用他们。例如德国教士汤若望，长期在明朝活动，活跃在皇宫中，清兵入关后，并没有废斥他，立即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衔，赐号“通玄教师”。

这个有相当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造成了两个显著的结果。

一个结果是天主教从此在中国传开。利玛窦进入中国时，中国还没有天主教徒，他在1583年到了肇庆，开始在中国收第一个教徒。利玛窦1610年去世时，天主教徒有2 500人，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建教堂传教。利玛窦去世后，天主教徒继续增加，1636年有3.8万人；入清后，1650年有15万人。

第二个显著的结果是出版了大量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宗教书和介绍科学技术的书。据1667年毕嘉（Gabani）神父在广州狱中写的报告称，从1561年到1664年（即明万历九年到清康熙三年），耶稣会士共印天主教书籍131种，算书100种，学术、伦理、物理书55种，另有中国教徒所刊教义书14种，合计300种。这个数字

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它包括入清后的20年，又限于耶稣会教士和教徒。[1] 还有一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法国费赖之著、冯承钧译，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共著录教士467人，其中在明代来华的教士90人（明代最后一个来华的教士是意大利人卫匡国）。这90人的重要著译有254种，其中宗教类127种，科学类127种，各占一半。还有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书中共统计译著216种，其中宗教译著167种（圣书66、圣教辩护66、神哲学16、教史19）约占77.3%，非宗教的书如数学、水利等约占22.7%，不足三分之一。从这些不同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各类图书所占的大体比例。这里，介绍彭斐章主编的《中外图书交流史》中的统计数字，这是从多种资料综合而成的，其总数比徐宗泽的数字较少，天主教66种、宗教哲学7种、政治伦理10种、教育4种、语言字典3种、文学艺术2种、心理1种、地理舆图4种、天文数学51种、水利物理2种、地质矿冶2种、生物医学2种、军事1种、汉学1种。[2]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记载，明代来华耶稣会士90人，有著作的31人。其中著作较多的有：汤若望35种、利类思32种、艾儒略30种、利玛窦24种、高一志（王丰肃）23种、罗雅谷22种、阳玛诺15种、龙华民11种、庞迪我11种、潘国光8种、邓玉函8种、孟三德7种、卫匡国7种、郭纳爵6种、何大化6种、熊三拔5种、孟儒望5种、安文思5种。

明代的图书目录记载这类图书很少，可能是对这类图书不大重视之故。例如《脉望馆书目》的“暑字号”中，专门有“大西人著述”一目，只记了9种书。这9种书是：《畸人论》、《泰西水法》、《畸人论心记法》、《天主教要》、《浑盖通宪图说》、《测量法义》、《几何原本》、《二十五言》、《天主实义》。这大概是影响最大的几种。

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中，法国教士金尼阁引进大批书籍，即所谓“西书七千部”之事，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

金尼阁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的，先在南京学汉

[1] 高龙盘:《江南传教史》，转引自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第八章第二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语，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返罗马，向教皇汇报，在西方的里昂、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等以出版业著称的地方进行募集，结果募集到了7 000多本图书，再度来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到达澳门。他的原意是想办一个教会图书馆，并把这7 000本书陆续翻译出来。可惜在此之前的1616年发生了“南京教案”，著名的传教士王丰肃、庞迪我等都被驱逐出境。这7 000本书也就没法整批运入内地，只能靠传教士们随身携带，“带进者未有什之一二”。李之藻、杨廷筠等人曾再三向皇帝呼吁，终无结果。到明清易代时，这批书就不知下落了。

关于这批书的内容，因为没有书目传世，所以无从知悉。但从一些片言只字的资料中，可以略知一鳞半爪：1. 其内容不止宗教一端，而包括“六科经籍”。所谓“六科”，据《西学凡》的解说，是指文科（相当修辞）、理科（相当哲学）、医科、法科、教科、道科（相当神学）。2. 这7 000本书，没有相同的复本，而是7 000本不同的书（见杨廷筠《代疑篇》中语“重复者不入”）；3. 这7 000本书没有单薄的书，都有一定的份量（同上“纤细者不入”）；4. 装潢精美。所以，这批图书最终未能运抵内地，实在是太可惋惜的事。

清兵进关的第一年，汤若望曾向清政府进言说，教堂里有3 000卷欧洲书籍，没有引起注意。300多年后的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清理库房，发现这3 000册书还存留数百册，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

【1】以上均摘自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载《民国丛书》，上海书店影印本，1992年。

金尼阁曾在杭州、开封一带传教，后来又到山西、陕西传教，把带来的书籍送给中国人，并择要译成中文。他还在绛州、西安开设印书厂，每年所印书籍甚多，其中有些是拉丁文本书籍。他带进来的书中有1611年科隆出版的拉丁文本《几何原本》，对后来罗雅谷译《测量全义》、邓玉函译《大测》都有重要作用。他带进的书中又有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由王徵译绘成《奇器图说》。

（二）“三大柱石”的贡献

天主教初行中国时，有三个影响最大的人，即所谓“三大柱石”：杨廷筠、李之藻和徐光启。他们是同时代人，又同是沪杭地方人，都做过不小的官，最后都受了天主教洗礼。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件十分引人注意的事。

杨廷筠（1557—1627）

浙江钱塘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从南畿督学任上解组归杭，仕途顺利。他重儒又信佛，还乡后在当地讲学，远近闻名。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杨廷筠的同乡人李之藻从南京卸任回杭州，教士郭居静、金尼阁和他同行。杨廷筠去访问李之藻，结识了郭、金二人，听到他们讲说天主教义，欣然心服，精神彻悟。他遵照教规，摒弃了小妾，又劝他母亲改信了天主教，把家中佛堂改为天主教礼拜堂。两个月后，就由郭居静替他施洗入教，圣名弥格尔（Michele）。入教以后的16年，他一直和教士密切共事。他施财刊印天学书籍，又亲自撰写了《代疑篇》等著作，以“发明天主之道”。他对天主教的信奉，完全出于道德本源的思索，以及对道、佛的否定。

李之藻（1565—1630）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工部侍郎。上面讲的杨廷筠，一接触天主教，就完全倾倒，只化了两个月时间，就受洗入教。李之藻却化了整整9年时间。他和利玛窦交往，是以一幅地图为媒介的。李之藻在少年时曾绘制过一幅天下总图，列全国15省，以为天下尽在于此。后来在利玛窦家中看到《山海舆地全图》，恍然大悟，知道天下原来真相。由此，二人相识相慕，在天文、历算、仪器等方面全面交流。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重刻本出版，李为之作序；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又为利玛窦所作《畸人十篇》作序，称赞他是“博闻有道术之人”。二人在知识的探索和道德的砥砺上，达到了如影随形的程度。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之藻患重病，利玛窦悉心调护。病愈后，李接受了洗礼，由利玛窦施洗，教名凉庵（Leone）。崇

祯初，李之藻的成就达到最高峰。崇祯元年（1628年），他刊行了著名的《天学初函》。这部书是传教士在华所传学术著作的丛书，以天学数学为主，计21种，其中有2种是李氏的著作。这书很快风靡全国，并传到了日本。一般认为，李氏之信奉天主教，是西方科学吸引的结果。

徐光启（1562—1633）

上海人，礼部尚书。1600年徐光启从上海入京，取道南京，初次见到利玛窦，接触天主教。1603年，徐光启到南京拜访罗如望，研读《天主教要》、《天主实义》稿本，彻夜阅读成诵，便主动要求罗氏为他施洗。罗如望同意，教名为保罗（Paolo）。1604年，徐光启到北京，再次和利玛窦接触。不久，徐光启考中进士，成为庶吉士，后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在此期间，一直和利玛窦密切交往，翻译了天文、数学等方面的重要书籍。30年间，徐光启用其智力、财力和政治地位支持天主教的工作。人们常探讨徐光启主动入教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利玛窦的知识和人格力量是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利氏一再提到的“补儒易佛”思想，用天主教来补儒学之不足，替代佛教的地位。[1]

[1] 徐光启等三人入天主教之经过情况，见〔美〕裴德生、朱鸿林等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天主教徒试释》，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三）译书概况

这一时期著译中最早出版的一本是罗明坚的《天主实录》，用中文写成，又名《圣教实录》，这是欧洲人最早用华语写成的传教书。由利玛窦和肇庆文人修订，万历十一年（1583年）完成，次年在肇庆印出1 000部送人。

这批图书中影响最大的是李之藻编印的丛书《天学初函》，崇祯元年（1628年）出版。这是一部天主教义和科学技术的综合性丛书，共52卷，教义8种，各科学术20种。这20种科学书是：《西学凡》（艾儒略撰）、《天主实义》（利玛窦撰）、《辩学遗牍》（利玛窦撰）、《畸人十篇》（利玛窦撰）、《交友论》（利玛窦撰）、《二十五言》（利玛窦撰）、《七克》（庞迪我撰）、《灵言蠡勺》（毕方济撰）、《职方外纪》（艾儒略撰）、《泰西

水法》（熊三拔撰）、《简平仪说》（熊三拔撰）、《浑盖通宪图说》（利玛窦撰）、《同文算指通篇》（利玛窦撰）、《几何原本》（利玛窦、徐光启译撰）、《圜容较义》（利玛窦撰）、《表度说》（熊三拔撰）、《测量法义》（利玛窦撰）、《天问略》（阳玛诺撰）、《勾股义》（利玛窦撰）、《测量异同》（徐光启撰）。这几种书，都是天学著述中选出来的精品。

影响最大的另一部书是崇祯二年（1629年）开始修纂的，由徐光启主其事的《崇祯历书》，一百余卷，这部书将在下面列专节介绍。

这些图书的编译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典型的一种方式是西人原著，外国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弄明白后斟酌成文。例如《几何原本》，题“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授”。有些是来华教士直接用中文写作的，如利玛窦的《交友论》，写的是他和明宗室临江府建安王朱多㸅的交往过程，利玛窦因此书而名声大振。还有如罗明坚用中文写的《天主实录》（又名《天主圣教实录》、《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署名“天竺国僧辑”。也有的是中国学者编译西人的著作，加进自己的领会、发挥、模仿、引伸，如王徵和孙元化、金尼阁、邓玉函一起编译了《新制诸器图论》，后来又加进他创造的24种“奇器”，成《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以后又增加24种，成《忠统日略》。还有一些著作则将中西方法进行比较，这是更加高层次的研究了。例如徐光启比较中西测量方法后，撰写了《测量异同》一书。从以上诸多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学术交融的深度。

西方来华教士们十分注意中国的印刷术，充分运用成熟的雕版技术印行书籍。利玛窦在他的日记中具体描写了当时中国的印刷术，和西方的印刷术进行了比较：

“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规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所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

字和符号数量极大的缘故。……

“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关于雕版的具体过程略）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

“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板，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我们利用这种设备印刷了有关宗教和科学题材的书籍。……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1]

[1]〔意〕利玛窦、〔意〕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在这些文字之后，利玛窦又以十分惊奇的口气详细介绍了中国拓印碑刻的方法，把它称为“奇怪的方法”。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山海舆地图》，便是用这种奇怪的方法刻成木板和石板后，在东方土地上广泛流传的，而且还出版了彩色版。

当时，在绛州、西安、北京、杭州等地，都有教士们开设的印刷厂，大量刻印有关的书籍。这些科技书连同天主教还从中国传到朝鲜等使用汉字的国家。

西方教士们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作了很大努力。介绍中国历史和儒家经典的书有：《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著）、《大中国志》（曾德昭著）、《中国年鉴》（金尼阁编）、《四书》（利玛窦译；又拉丁文本，曾德昭译）、《五经》（金尼阁译）、《中国之奇异》（利玛窦、范礼安著）、《中国文法》（利玛窦著）、《中意葡字典》（利玛窦编）、《字考》（葡中、中葡，曾德昭著）等。

二、《几何原本》的翻译和其他数学图书的译著

（一）《几何原本》的翻译

中西合作著译活动的代表作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译述的《几何原本》。

中国古代的数学有自己的科学体系和概念术语系统。明末，政府不重视科学，一些重要的数学著作已经失传，十分需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数学成果。

《几何原本》是一本最流行的数学经典，具有广泛的基础科学价值，还指示人们实证的科学方法。大哲学家罗素说《几何原本》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1]《几何原本》在欧洲通行了二千年之久。全书共15卷，前6卷是平面几何，7至10卷是数论，11至15卷是立体几何。利玛窦在1572至1577年在罗马神学院学习时，曾从名师克拉维斯学习过此书。早在肇庆时，利玛窦就向常熟人瞿太素讲过这本书的第一卷，瞿太素听过后，便放弃了他的炼金术，改学几何学。徐光启在向利玛窦学西方科学时，曾多次听到利玛窦介绍西方数学的理论及其用途，再三请求利玛窦把数学经典《几何原本》译成中文，得到同意，于是便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开始合作翻译。

翻译这本书很困难，因为它和中国传统数学截然不同，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先由利玛窦逐章、逐节、逐句口头讲述，徐光启弄明白之后再写下来，加以整理。当时徐光启在翰林院任庶吉士，他每天做完“馆课”之后，下午和晚上都扑在这项工作上。《几何原本》原来是希腊文，后译成阿拉伯文，再译成拉丁文。每次转译，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利玛窦和徐光启用的底本是克拉维斯作注释的拉丁文本。

翻译时，徐光启创造了一套名词术语，既切合原意，又便于中国人理解。学科的名称便是徐光启创意的。他在“原本”（原书名）前加上“几何”两字，后世便一直沿用“几何学”的名称。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是徐光启拟定的，如点、线、面、平面、曲线、钝角、锐角、三边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等。这些术语现在还在沿用，说明徐光启翻译时推敲的精审。

翻译经过了艰苦的过程，“凡三易稿”，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5月，终于译出了前六卷，1611年刊印问世。题“泰西利玛窦口译，吴淞徐光启笔受”。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几何学的作用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

[1]〔英〕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他又认为几何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徐光启又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指出《几何原本》对思辨能力、治学方法、办事能力的重要启迪作用，“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几何原本》影响深远，明清以来大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受到它的影响，还编写了不少简本、改编本。《几何原本》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过了数学本身，它所采取的实证方法在各学科中广泛应用。徐光启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利玛窦和徐光启译出的《几何原本》只是前面6卷。这6卷的内容是：卷一，三角形、垂直线、平行线、矩形面积、勾股定理；卷二，面积的变换、用几何法解代数问题；卷三，圆、弦、切线；卷四，多边形与圆、正多边形的作法；卷五，比例；卷六，相似形。后面9卷一直到鸦片战争后，也就是在240年之后，中国掀起了向西方寻找科学和真理的热潮时，才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中国大数学家李善兰合作，在清咸丰六年（1856年）译完了全书。6卷本的《几何原本》和15卷本的《几何原本》都曾多次重刻重印。

梁启超称赞这本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梁启超纂辑的《西学书目表》中，并列了《几何原本》的6卷本和15卷本，指出“初学宜先读前六卷”。利玛窦死后，万历帝在北京阜成门外赐地给他厚葬。当时有宦官出来反对，诉之于首辅叶向高，叶向高回答说：“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可见有识者对这本书的推崇。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反动与先驱”，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

（二）其他数学书的翻译

徐光启在晚年修历书时，深悟数学的基础学科性质。崇祯二

年（1629，徐光启68岁），曾向皇帝上了《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提出“度数旁通十事”，这里所说的“度数”就是数学，这“旁通”的十个方面是指“预知天象，测量水地，考正音律，制造兵家器械与建筑城池，理财，营建屋宇桥梁，制作机器，测绘地图，医病用药，制作时钟”。

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等译著的数学书还有：

1.《同文算指》　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欧洲笔算方法的书。该书首次介绍了“以减试加，以除试乘”的验算方法。李之藻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而成。1614年刻印于北京。题“西海利玛窦授，浙西李之藻演”，共10卷，前编2卷，论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通编8卷，论比例、比例分配、盈不足问题、级数、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

2.《圜容较义》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刊于北京，利玛窦著，李之藻笔述。专论圆的内接外接。

3.《测量法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跟从利玛窦译出。内容是应用几何。

4.《测量异同》　徐光启著。对中西测量方法的理论依据作比较，得出了中西基本相同的结论。

5.《乾坤体义》　徐光启编译。上卷论天体，下卷论数理。

6.《勾股义》　徐光启编译。对中国古代勾股算术作阐述，并作中西比较。

7.《几何体论》、《泰西算要》、《几何用法》　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在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传授下所著。这三种都是抄本，未见刊行。

8.《大测》、《割圆八线表》　邓玉函著。崇祯四年（1631年）编成，收入《崇祯历书》中。

9.《测量全义》　10卷，罗雅谷著。崇祯四年（1631年）编成。这是首先以纳白尔氏对数表输入中国的数学书。

三、《崇祯历书》的编制

我国自古都把日月星辰的运行看作天道的体现，如果发现历算误差，便要进行修订。古今改历，不下数十次。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由黄帝迄秦凡六改，由汉初迄汉末凡五改，由曹魏迄隋凡十三改，由唐迄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凡三改。"[1]

【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三《修明历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明代使用《大统历》，基本上就是元代郭守敬、王恂等所创制的《授时历》，精确度很高，前后使用364年。但因为使用已久，误差积少成多，到了明末，计算日月蚀的误差达一二刻之多。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蚀，钦天监和春官等的预测都不准。次年，礼部建议进行改革，未获准许。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李之藻又上《请译西洋历法疏》，要求将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传教士的天文著作译成中文，以便借鉴，在礼部下开馆设局，仍未能获准。

改创新历的想法一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才得到实现，这是因为这一年发生日蚀时，钦天监根据《大统历》推算不准，而徐光启根据西法计算的时刻，在北京、琼州、大宁都得到证实，厘毫不爽。这时，崇祯帝不得不下了决心。7月14日，任命由徐光启督领，李之藻、王应遴辅助，又聘请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筹设历局。十天以后，徐光启就上了《修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提出修历理论十条、用人三条、仪器十条。9月22日，正式开设历局。徐光启行动这样迅速，一方面是因为他早已胸有成竹，同时也因为他已经68岁，生怕迁延时日，不能完成。次年，邓玉函去世，又从开封调来罗雅谷，从西安调来汤若望，到北京工作。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病重，向皇帝呈上了《历法修正告成，书器缮治有待，请以李天经任历局疏》，力荐山东参政李天经继任，主持工作。

这是一次中西天文历算学家密切合作的科学盛举，成果累累。阶段性的成果不断用图书的形式向皇帝进呈，前后计5次，

共137卷。崇祯七年（1634年）12月编成。初名《崇祯历书》，后定名《西洋新法历书》，明末付梓，103卷（又有93卷本）。这部历法因明亡未能推行。入清后，顺治二年（1645年）有汤若望补刊本。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有南怀仁作序的补刊本，定名《康熙永年历法》，新历正式通用。（图68）

在几部书目中，《崇祯历书》的种数和卷数颇有出入。崇祯时付梓是103卷，又有93卷本；顺治二年汤若望补刊本为103卷；康熙十七年有南怀仁序的本子是97卷；《千顷堂书目》作120卷；《四库全书》记100卷。

崇祯七年（1634年）12月历书竣工时，李天经“进书表”上记载，前后五次进书，前面三次由徐光启奏进，后面二次由李天经奏进，共46种，137卷。

图68
根据西洋历法原理改订的《崇祯历书》。

进书表上的书，有的是早就著成的天文历算专著，因为和修订历法有关，所以作为历书的组成部分一起进呈。当时把这一方面的学问称为“天学”。《崇祯历书》实际上是一部天文历数的丛书。

五次进呈的内容，据《千顷堂书目》记载如下：

“凡作五次奏进：

“第一次崇祯四年正月：日躔历指一卷、历书总目一卷、测天约说一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表七卷、黄道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二卷。

“第二次四年八月：测量全义十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恒

表四卷、恒星总图一卷、恒星图像一卷、揆日解订误一卷、比例规解一卷。

"第三次五年四月：月（一作"日"）离历指四卷、月离历表六卷、交食历指四卷、交食历表二卷、南北高弧表十二卷、诸方半昼分表一卷、诸晨昏分表一卷。

"第四次七年七月：五纬总论一卷、日躔增一卷、五星图一卷、日躔表一卷、水木土二百恒年表并周岁时刻表三卷、交食历指三卷、交食诸表用法二卷、交食表四卷、黄平象限表七（一作"二"）卷、木土加减表二卷、交食简法表二卷、方根表二卷。

"第五次七年十二月：五纬历指八卷、五纬用法一卷、日躔考二卷、夜中测时一卷、交食蒙求一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恒星出没二卷、高弧表五卷、五纬诸表九卷、甲戌乙亥日躔细行二卷、罗雅谷筹算二（一作"一"）卷。"[1]

梁启超认为，明末输入欧洲历算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大事。他说："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2]

【1】[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反动与先驱"，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

四、其他科技译著

（一）火炮技术

为了对付女真人的威胁，明政府曾多次购买葡萄牙人的火炮，并随之译介了西洋火器图书。天启元年（1621年），皇帝命懂得中文的传教士阳玛诺、毕方济两人翻译兵书。崇祯九年（1636年）命汤若望在皇宫旁设铸炮厂。两年后，铸成大炮20门。当时，又有赵士桢从外国书籍中编译成《神器谱》一书，介绍外国火器。徐光启的门人孙元化编著了《西洋神机》一书；李之藻的门人张焘、孙学诗在泰昌元年（1620年）奉派到澳门购买火炮后，合著了《西洋火攻图说》一书。

内容最详细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口述的《火攻挈要》一书（又名《则克录》）。这本书题"汤若望授，宁国焦勖述"。出版时

间是明朝灭亡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书分上中下三卷，卷上讲制造火器的方法，有造铳、造弹、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罐、地雷等；卷中讲试放、装置、运铳；卷下讲火攻秘要、守城、海战、炮战原则。书前有附图40幅。我国传下来的最早火炮实物，便是这一时期铸造的。

（二）机械制造

天启七年（1627年），北京刊印了《远西奇器图说》一书，题“邓玉函口授，王徵笔述”，三卷。次年，南京出版了该书的另一刻本。在该书的基础上，王徵又和徐光启的门人孙元化、教士金尼阁、邓玉函等，加进了王徵自己的发明创造，编成《新制诸器图说》一书，1卷，有图11幅。其中王徵创制的“奇器”有：虹吸、鹤饮、轮激、风硙、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等9种。后来，王徵又著了《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一书，“额辣济亚”是拉丁语天主圣宠的意思。又增加新器24种，如天球自旋、日晷自移、水轮自汲、火船自行、云梯直上、气足发矢、气足传声、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妙轮奏乐、神威惊敌。《四库全书总目》说这本书中的“奇器”“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重，又谓之力艺。大旨谓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则即此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1] 此外，王徵还著有《忠统日录》、《两理略》，又增加奇器24种。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五子部二十五谱录类，中华书局影印本。

这些书的作者王徵，陕西泾阳人，天启进士，因为善于制作“奇器”，被称为“诸葛孔明复出”，传说他能造木偶（机器人），能驱使这些木偶“或舂者、簸者、汲者、炊者、操饼杖者、抽风箱者，机关转捩，宛然如生”。传说在收获季节，王徵制造的机器人会“捆载禾束，事半功倍”。在他的家里，还有“空屋传声”设备，“窍一壁以传语，每值冠昏丧祭，以一人语窍，则前后数十屋皆闻，名曰空屋传声”。

桐城人方以智（1611—1671）曾跟从教士毕方济学奇器历算。方以智的名著《物理小识》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出版，12卷。他提倡“寓通几于质测之中”，“通几”指贯通万几的

哲学观，“质测”就是实证科学。他立论的根据来源于传教士的《天学初函》。

（三）水利工程学

徐光启和利玛窦相处时，利玛窦向徐光启介绍了西方水利科学研究者熊三拔教士。徐光启多次向熊三拔求教，经过多次要求，熊三拔向徐光启传授了水利知识，这就是《泰西水法》一书的内容。共6卷，汇集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论述了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水库、寻泉、作井等方法。前五卷言水法，第六卷是图式。这本书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北京刊行。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北京以南的良乡地区种水稻时，按图制造了恒升车、玉衡车和龙尾车三种取水工具，效果很好。

徐光启所编《农政全书》的后6卷水利部分，全录熊三拔的《泰西水法》。《泰西水法》后来被编入《天学初函》和《四库全书》的“子部农家类”中。《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这本书："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四）地理学和地图

世界地图的传布，是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肇庆后，在他的寓所里挂着一幅世界地图，用西文标注，肇庆知府、岭西按察副使王泮看到了，请他把图注改成中文，刊刻发行，分送亲友，题名《山海舆地图》。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用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此后，利玛窦到南昌（1595年）、南京（1599年）、北京（1601年），多次绘制刊印世界地图。在南昌时绘印的是《舆地山海全图》，在南京时绘印的是《山海舆地全图》，在北京时绘印的是《坤舆万国全图》。(图69)

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对利氏地图感到新奇，采取摹绘、翻刻、简缩、转载等方式传播。先后有：王泮刻本、郭子章的《山海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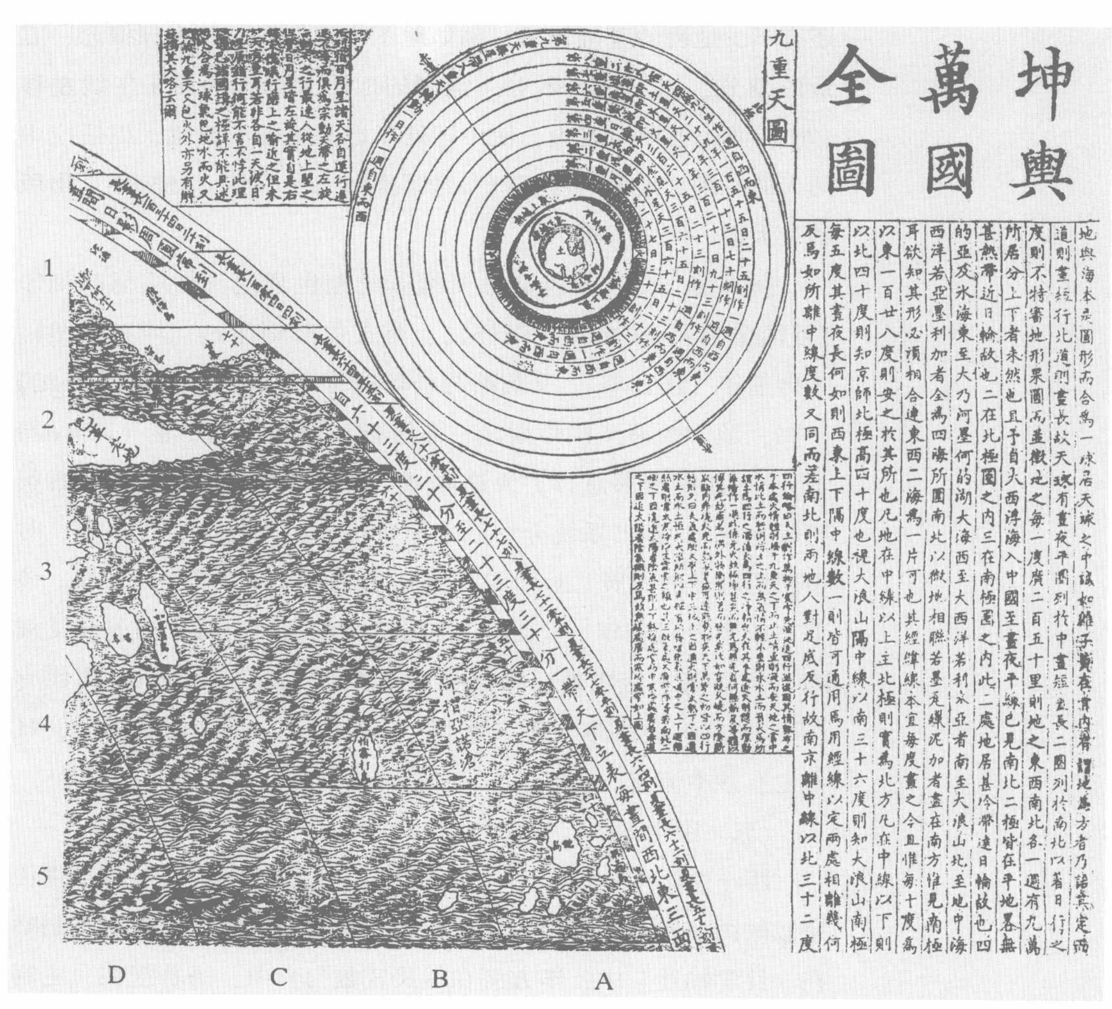


图69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参与。

地全图》缩印本、冯应京的《东西两半球图》、李之藻的《坤舆万国全图》、李应试的《两仪玄览图》等。另外，在《图书编》、《月令广义》、《三才图会》等类书上，也有转载。[1]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皇宫里的太监出于好奇，摹绘了彩色本。据洪业《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载，从万历十二年至三十六年，《万国舆图》各地共翻刻33次。[2] 地图高四尺六寸，阔一丈零六寸。[3]

这些地图的四周，大都印着船只、禽兽、五洲风物、天文地理知识、测绘仪器等，利玛窦地图上注出的地球半径是6 683公里，略大于近代测据6 378公里。还介绍了地心学说，改变了中国人的“天圆地方”说，认识到我们所居的是一个球体。地图上

【1】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禹贡》5卷3、4期。

【3】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第2册，3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

还有不少地理的基础知识，例如地图注记例释、五大洲概念、五带的划分、山川、国名等。绘制的地图大都把福岛子午线左移170°，两边各留一道边，使中国处于地图的中心地位，以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地名的注记则参考了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版的《大明一统志》等书。

利玛窦之后，耶稣会教士继续绘制世界地图，艾儒略刻印《万国全图》，华方济、南怀仁、蒋友仁都刻印过《坤舆全图》。天启三年（1623年），艾儒略与杨廷筠合作，刊印了《职方外纪》一书，题"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5卷（又有6卷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这本书"所记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该书系统介绍五大洲各国位置、物产、气候等，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对中国人形成世界地理观念有深远影响。该书写成于天启三年（1623年），同年秋在杭州印行，书前有艾儒略、杨廷筠、李之藻、瞿式谷、许胥臣、叶向高的序。明代有《天学初函》丛书本、闽刻本等，入清后收入更多的丛书中，日本也有抄本流传。

（五）医学

西洋医学传入中国，以理论为先导。这些理论大都是在宣传宗教的图书中附带提及，如龙华民在《灵魂道体说》中，艾儒略在《性学牿述》中，毕方济在《灵言蠡勺》中，汤若望在《主制群征》中，都提到医学原理和人体知识。

最早的一部医学专著是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题"邓玉函撰，毕拱辰译"，这是一部医用人体解剖图说。译者毕拱辰，山西掖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他在北京看到汤若望的《西洋人身图》，又见到邓玉函的这本《泰西人身说概》，并知道邓玉函在来华后曾解剖过一个日本神父的尸体，对人体有些研究，便下决心译述了这本专著。另外，罗雅谷也著有一本《人身图说》，2卷。

西洋制药方法的著作有熊三拔的《药露说》一卷，这本书附在上述《泰西人身说概》的后面，1935年才被发现。这是最早介

绍西药制造技术的书，介绍了用蒸馏法制药的方法。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也有记载。

（六）伦理学和教育

在利玛窦的著作中，有一本十分值得重视的伦理学专著《交友论》。这本书是1595年在南昌印行的，是利氏最早的三本著作之一（另二种是《天主实义》、《西国记法》）。这本书是利玛窦来华后结识了南昌府建安王朱多㸅后编写的。朱多㸅向利玛窦询问西方人士交友之道，利玛窦把西方名著中关于友谊的名言用中文格言的形式写下，共100则。1595年出版后，被一再传抄重刻，1599年在南京再版，又被编入各种文集和丛书，如明代李之藻《天学初函》、陈继儒《宝颜堂秘笈》、冯可宾《广百川学海》、屠本畯《山林经济集》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再版本的主持人是王肯堂。王肯堂和李时珍齐名，名医，做过"落耳再植"的手术。他认为该书的价值"胜枚生《七发》远矣"。冯应京读了《交友论》后，也写了一篇序，大加赞扬。

《交友论》的内容是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古圣贤有关友谊的语录。中国一向有"五伦"之说，朋友为其中之一，五伦之中的前四项，都有上下尊卑之别，所谓"君为臣纲"等，唯有朋友中，说不上哪一方是纲，而必须平等、互信、互尊，以理为准，这是和前四项完全不同的伦理体系。当时被视为"妖逆"的思想家何心隐，也主张朋友是最重要的，远比君臣父子等重要。这种交往原则具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对统治秩序是不利的。所以从汉朝开始，就有人想把这一"伦"从五伦中排除出去。利氏的《交友论》汇集中西哲人的言论，具有人文主义的思想，因此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

伦理学中还有一本书也很重要，书名《七克》，西班牙人庞迪我著。1604年初刻，1614年北京再印，明清间重印7次，1931年还在上海出版白话本。所谓"七克"，是指克服七种罪恶的诱惑：伏傲、解贪、防淫、熄贪、塞饕、平妒、策怠。原书指出，克服这七种罪恶必须皈依基督教精神。本书把天主教义和儒家道

德观结合起来，既是宗教宣传，又是伦理阐发。这本书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王徵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信奉天主教的。(图70)

还有一本《畸人十篇》，也可以说是谈伦理的书。1608年出版，1609年又在南京重印。这是利玛窦答复中国人提问的通信集，所论都是生死观和人生观问题。上卷六篇，讨论的是：1. 人寿既过犹误为有，2. 人于今世唯侨寓耳，3. 常念死后利行为祥，4. 常念死后备死后事，5. 君子希言而欲无言，6. 斋素正旨非为戒杀。下卷四篇：1. 自省自责无为为尤，2. 恶之报在身之后，3. 妄询未来自速身凶，4. 富而贪吝苦于贫窭。(图71)

关于教育方面的书有《西学凡》一书，艾儒略著，天启三年（1623年）出版，题"杨廷筠序，许胥臣引"。介绍西欧大学的各科教学大纲，包括六门学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作序的杨廷筠是"南畿学政"，即南京方面最高学府的长官，这本书对他定会有许多启发。

图70
〔西〕庞迪我著《七克》，明清间多次重版。

（七）语言文字学

适应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人际来往需要，产生了一批中外文

图71
[明] 李之藻手书《刻畸人十篇》。

词书。万历四年（1576年）到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奥斯汀、地理学家拉达，根据泉州方言（闽南话的一种），用西班牙文编著了《华语韵编》一书。郭居静和利玛窦合编了《西文拼音华语字典》，按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编排。万历十二年至十六年（1584—1588年）利玛窦又和罗明坚合编了《葡华字典》，中文题为《平常问答词意》，全书189页，附拉丁拼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利玛窦又在北京印行了他的《西字奇迹》一书，这是第一部刊印的拉丁拼音语文书。继利玛窦之后通晓中文的葡萄牙人曾德昭，编有《字考》一书，2卷，葡汉、汉葡各一卷。

影响最大的一本字典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在天启六年（1626年）编著的《西儒耳目资》。金尼阁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的，编写这本工具书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主要供西方传教士学习汉文之用。题“泰西金尼阁撰述，晋绛韩云诠订，秦泾王徵校梓”，该书于天启六年（1626年）在杭州由张问达出资刊印。共三册。上册“译引谱”，按音韵排华字；中册“音韵谱”；下册“旁正谱”，按字旁排列华字和拉丁拼音。“耳以听字之韵，目以视字之拼合”，故称“耳目资”。这本书解决了中西在语言文字上的阻隔，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钥匙。这位金尼阁又是第一个把《伊索寓言》译成中文的人，他从修辞“比况”的角度着眼，书名称为《况义》。

（八）逻辑学

天启七年（1627年）葡萄牙籍教士傅泛际诠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费时五年。题“傅泛际译义，李之藻达词”共两编，十卷，译笔简洁明白。上编五公论、十论理，下编讲三段论。崇祯四年（1631年）在杭州刊印。崇祯三年（1630年），李之藻去世，傅泛际想独立完成后面的20卷，但没有完成。到了清朝，由比利时教士南怀仁补译完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进呈给康熙皇帝，书名改为《穷理论》。

傅泛际和李之藻合译的还有亚里士多德的《论天》，四卷，题《寰有诠》，崇祯元年（1628年）在杭州刊印。

（九）绘画和音乐

西洋绘画最初传入中国的是宗教图。利玛窦呈给神宗皇帝的贡物中，有天主像和圣母像。利玛窦还曾赠给程大位（新安人，著《算法统宗》四卷）三幅宗教图，程大位把它刻印到《墨苑》中（卷六下）。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罗如望著《天主圣像图说》，其中图像是据比利时雕版画翻刻的。崇祯二年（1629年），毕方济著《画答》一卷本，以后又有《睡答画答》合订本，介绍西洋画法。崇祯十三年（1640年），汤若望向崇祯皇帝呈天主图像，又转赠葩槐国君玛西理赠给崇祯皇帝的圣像64张，图48幅。崇祯十年（1637年）艾儒略著《出像经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纪略》，有图57幅，北京刻印。书名的“出像”两字，显然是受了中国通俗小说“出像小说”流行的影响。

西洋画有透视、明暗，深受中国人欢迎。在介绍宗教画的同时，关于透视、明暗等西洋画理也传到了中国。明代国子监祭酒顾起元在他所著《客座赘言》卷六中，说到他曾看到西洋画有明暗凹凸感，作了详细的分析。这种画法迅速影响了中国的画师们，画家中出现了一种所谓“传神派”，采用西洋画的透视原理，代表人是莆田人曾鲸。

利玛窦曾呈给神宗一张西琴，并撰《西琴曲意》（一作《西琴八意》），阐述乐理。该书附在《畸人十篇》后面。

五、对这次译介活动的评论

从以上几节的介绍可以看出，这次翻译活动的内容，除了宗教宣传以外，几乎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门类，历时数十年，译介图书200种，是中西文化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在明代出版史上颇具异彩。

如何评价这次文化学术活动，从当时一直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看法的焦点是：1. 利玛窦等人与殖民主义的关系；2. 天主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3. 传入的科学在当时是否居于先进

水平。上个世纪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这些学术介绍是为宗教宣传服务的，更进一步说，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简言之，“科学是手段，宗教是目的，殖民是实质”。至于徐光启等人受洗礼皈依天主教，并致力于翻译工作，则认为“科学是目的，宗教是手段”，也就是说徐光启等人是为了要得到西方的科学，不得不信了教。这些观点，显然值得商酌。

现在，这次活动的文献已经公布了不少，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活动有他们自己写的札记——《利玛窦中国札记》，有关国家还出版了当事人的书信、汇报、日记，如多达34卷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巴黎出版）、《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日本东洋文库1970年出版）。徐光启等人的信教和译著活动，在他们的著作和有关序跋中，也有具体的说明。仔细分析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教士们宣传宗教和译介科学，两方面都是有诚意的，他们并不讳言科学宣传是为了“打动中国人的心”（利玛窦语），中国的学者们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并皈依天主教，也是有诚意的，都经过了郑重的思考，并无勉强。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从小淹通中国传统儒教的学者，他们是在看到了天主教和儒教相通之处，才领受洗礼的，并没有背弃儒教的信仰。宗教宣传是真，传播科学知识也是真，二者之间并没有不相容的矛盾。梁启超赞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极恳挚、极虚心、极忠实、不屈不挠”，[1] 是一种极伟大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从利玛窦的全部活动来看，并没有看到有直接或间接危害中国的记载。这批传教士在华活动是17世纪初，虽然也产生了一些“教案”，但还没带有“殖民主义”的性质。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

还有人认为，当时天主教士传到中国来的，并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知识，而是相对陈旧的东西。例如在世界本质上，还在宣传希腊的四元素说；在天体知识上，还信奉地心说。从前面介绍的具体学科知识来看，的确有这类陈旧的内容，但并不尽然，在数学、力学、地理学、机械、水利等领域，有不少是基础知识或应用技术，并不是陈腐无用之学。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技术界，有开启心智的作用。

当时，西学传入中国，曾经十分风行，“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1] 但除了天文、数学产生了积极后果外，有些学科并没有引起较大触动，初未大用，我国的学术还是沿着老的轨道走下去。例如《职方外纪》一书虽然向中国读者提供了外部世界的情况，但其后的二百年间，竟没有一个中国人走出国门，沿着《职方外纪》提供的海道，作一次世界性的航行。水利、机械等变化也不大。《几何原本》一书则在二百年后才译出全书。也许，这是深刻的社会原因、科举制度等强大的抗力造成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确指出，“在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了”。[2] 这是对这次译介活动的正确评价。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大西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六章十“明朝和清朝”，第31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

第八章　明代出版物的装帧设计和印制

明代的图书雕版工艺，达到了十分娴熟的程度，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两项工艺的定型化：一是图书的字体定型为宋体字，二是装订方式定型为方册装。

图书的字体在没有定型之前，原稿的书写或颜体、或赵体，虽不必著名的书法家来执笔，至少也要是一个出众的书手，基本上是个性化的产物，具有艺术的魅力，但是数量和速度大受影响。字体定型为宋体字后，横平竖直，四角崭方，虽然失去了艺术的个性，得到的则是可贵的规范品质，具备了大量生产的可能，大大提高了雕版书第一道工序的速度。

装订工艺定型为方册装，看起来简单，其实摸索了几百年，而且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色彩。方册装节省材料至少一半，便于整理庋放。

这两项成功的改革使雕版图书的工艺规范化、近世化。

雕版图书的主要材料是纸张、木板、黑墨三种，这三者都以木材为原料，由于当时生态环境良好，资源丰富，生产工艺不断改进，因此产量日增，足敷应用，未曾匮乏过。

第一节　字体和版式

一、“宋体字”成为图书字体的主流

我国古代雕版图书的字体，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大都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结构方正匀称，称为“宋体”。[1] 到了元朝，又多了一种体形圆润的赵孟頫字体，称为“元体”。明朝初期刻书的字体，基本上和前代相同，并无多大变化。现在略举几例有代表性的和在当时有导向性的如下：

1.《元史》　洪武三年（1370年）　赵体风格　刊于南京

2.《南藏·阿毗达摩品类足论》　洪武五年（1372年）　颜体风格　刊于蒋山（即南京钟山）

3.《宋学士文粹》　洪武十年（1377年）　欧体风格　刊于福建

4.《埤雅》　建文二年（1400年）　颜体，略瘦　刊于江西

5.《蜕庵诗》　明初刊本　颜体风格　刊于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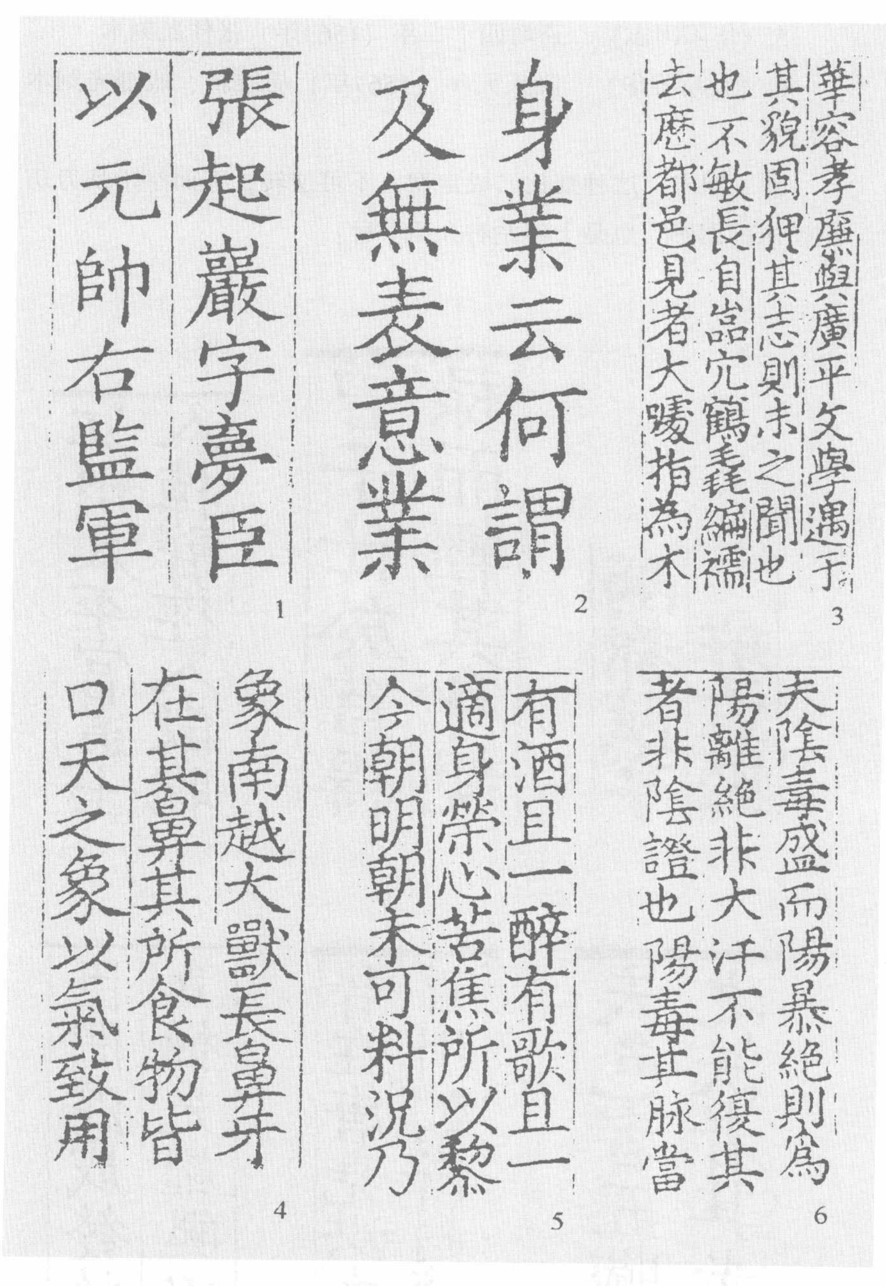
6.《普济方》　明永乐间周藩刊本　颜体风格　刊于开封（图72）

从所引的样张可以看出：1. 明初版刻的字体仍旧用颜、柳、欧、赵几种字体，它们都是“楷体”；2. 在几种字体中，颜体居多；3. 没有看到有现在所说横细直粗、四角崭方的“宋体”的字样。

明后期，在文学复古运动风气中，版刻字体也受到影响，追求宋代的风格，并在这个基础上，更前进一步，成为横细直粗、字形方正的“宋体字”。这个变化，在嘉靖时已经初步形成，不论是笔势还是间架、结体，都十分明显。到隆庆时，更显出了变化。下面从嘉靖出版的图书中，每十年举出一种，挨次排列，以见其变化：

1.《文选注》　嘉靖元年（1522年）汪谅刻本

【1】这里所称“宋体字”，指宋朝图书的字体，与现在所指四角崭方、横细直粗的“宋体字”含义不同。


1
張起巖字夢臣
以元帥右監軍

2
身業云何謂
及無表意業

3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
其貌固猥其志則未之聞也
也不敏長自喦宂鶴毳編襦
去歷都邑見者大嗳指為木

4
象南越大獸長鼻牙
在其鼻其所食物皆
口天之象以氣致用

5
有酒且一醉有歌且一
適身榮心苦焦所以黎
今朝明朝未可料況乃

6
夫陰毒盛而陽暴絶則為
陽離絶非大汗不能復其
者非陰證也陽毒其脉當

图72
明代初期图书字体。

2.《诗外传》　嘉靖十四年（1535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

3.《新编分类夷坚志》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洪楩清平山堂刻本

4.《方脉举要》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黄鲁曾刻本

5.《华阳国志》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张佳胤刻本

6.《文苑英华》　隆庆元年（1567年）胡维新、戚继光刻本（图73）

到了明末，这种变化已成定型，不可逆转。下面举出从万历到明末的图书，也是十年左右介绍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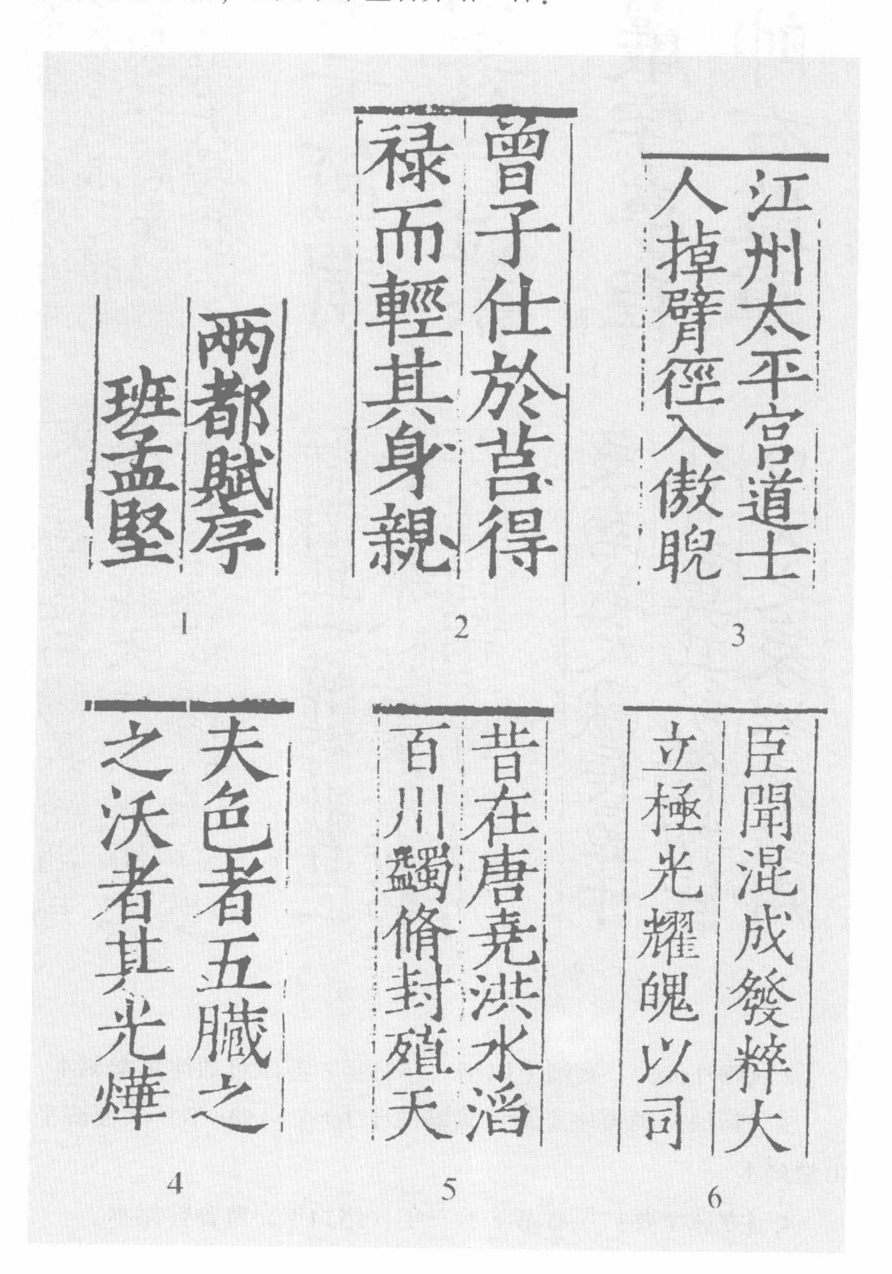


图73
明代嘉、隆年间图书字体。

1.《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　万历十二年（1584年）北京铁匠胡同叶铺刻本

2.《石门文字禅》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刻本

3.《南齐书》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北京国子监刻本

4.《孙子参同》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闵于忱松筠馆刻本

5.《镌长安客话》　万历天启间刻本

6.《洛阳伽蓝记》　明末毛氏绿君亭刻本　（图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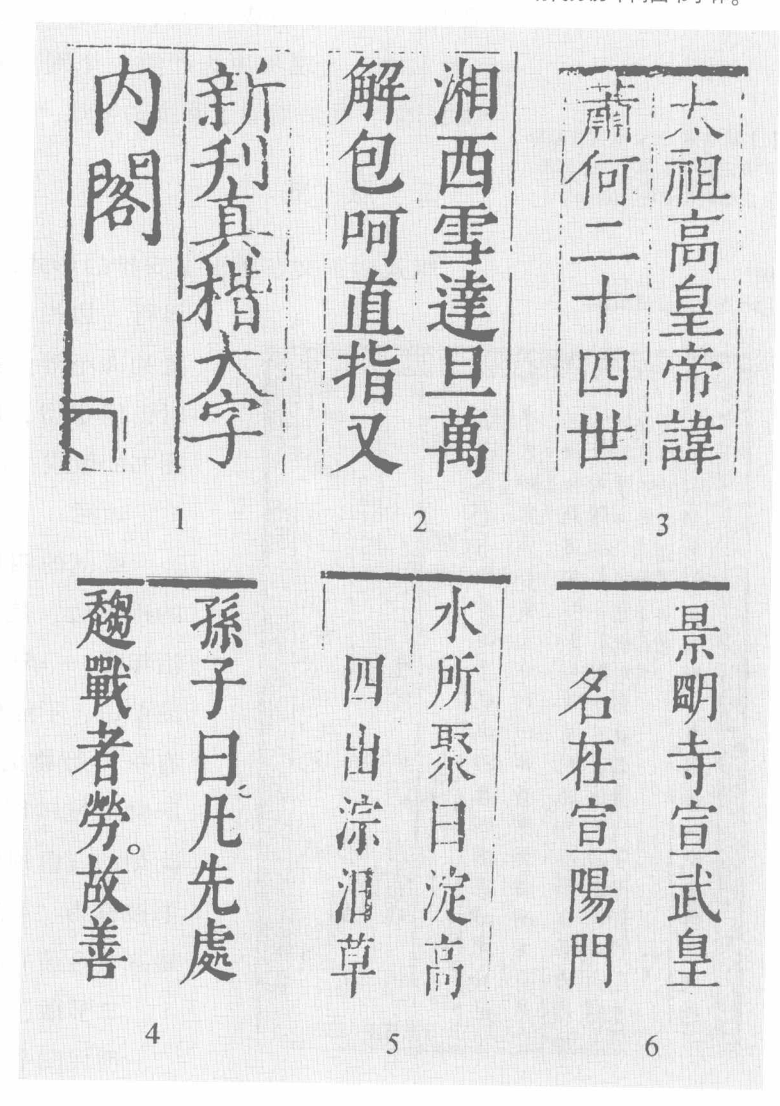


图74
明代万历年间图书字体。

从所引的样张可以看出：在明代末期，宋体字已经成为版刻的大宗；虽仍有一些版刻使用颜、柳、欧、赵字体，但已经不成为主流，反成为“例外”。有些仿宋、影宋的刻本，所用字体仍是原书的字体，不代表明代的风格。

“宋体字”的定型化，在出版事业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具有规范化的品质，便于学习，便于书写，便于运刀，使雕版书书写上版，不再需要精于书法的人，一般工匠都能胜任。后来铅活字的铸字，也成为可能。所以，从16世纪以来直到现在，一直成为我国印刷业不可替

代的主流。

关于“宋体字”的名称，版本家有些质疑。有人认为，在宋版图书中，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横细竖粗的字。张秀民先生查看了400多种宋版书后，没有看到有这种字体。所以他认为不应该叫“宋体字”，而应该叫“明体字”。在日本，也称这种字体为“明朝字”。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实际。但是这种字体的名称，已经约定俗成，可以不必深究。

明代有些版刻的字体好用异体字。例如，“闻”字写成“耷”，“惧”字写成“思”，“然”字写成“肰”，在一些手书上版的书中，这现象更为严重，个别书甚至全用篆文刊刻，称为“说文体”，徒然增加了阅读的困难。

【1】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第七章,北京,北京印刷工业社,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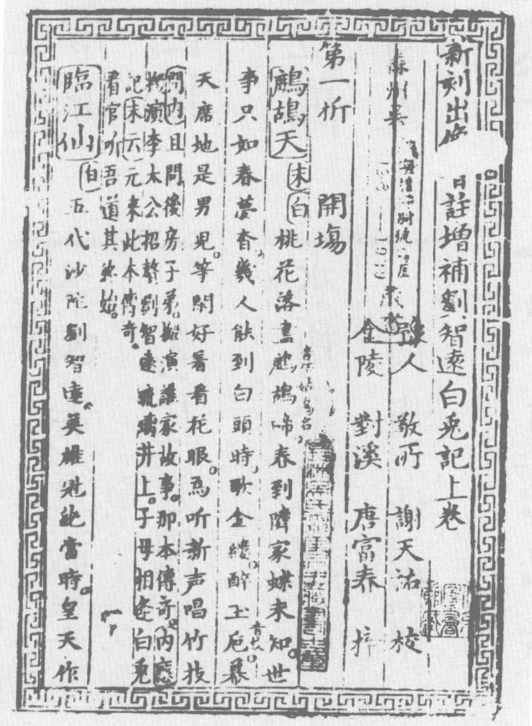
二、版　式

版式指正文在版面上安排的形式。包括字距和行距的安排、界行、边栏、书口、书名页、插图的位置和大小等。我国图书的版式，在两宋时已经定型，以后并无多大变化。明代图书的版式，略有变化的是以下几方面。

边栏

版框的四周边栏，有的用双边，有的用单边。魏隐儒等认为：“洪武至弘治年间，一般多是四周双边。”[1] 但双边或单边，不能作为鉴定年代的主要证据。有些出版物的四周边栏，刻上了竹节、回文等连续图案，如金陵富春堂在万历间刻的《白袍记》、《虎符记》等，这类书被称为“花边”，具有时代（明末）和地区（金陵）的特色。（图75）

图75
明代图书的边栏图案。


新刻出像音註增補劉智遠白兔記上卷
……人　敬所　謝天祐　校
金陵　對溪　唐富春　梓
第一折　開場
鷓鴣天　末白　桃花落盡鷓鴣啼。春到隣家蝶未知。世事只如春夢杳。幾人能到白頭時。歌金縷。醉玉卮。天席地是男兒。等閑好看看花眼。爲听新声唱竹枝。
問內且問後房子弟。搬演誰家故事。那本傳奇。內應　搬演李太公招贅劉智遠。瓶嬌井上。子母相逢白兔記。末云　元來此本傳奇。看官吩咐吾道其詳始。
臨江仙　白　五代沙陀劉智遠。英雄冠絕當時。皇天作

二节版、三节版

明代图书还有所谓“二节版”和“三

节版”。二节版是把版面横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刻图，下面刻文字，或相反。（图76）也有少数的上下都刻文字。个别书有很特别的做法，例如崇祯雄飞馆刊《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上半部刻《三国》，下半部刻《水浒》，因为《水浒》字多，被删掉了一些。上下栏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两种书印在一起，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这种做法未能推广。三节版是把版面横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三部分的内容有的是有机联系的，上面刻注释，中间刻图，下面刻正文。如建阳余氏刊的《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全像列国志传》都是这样安排的。有的三部分是不同的内容，例如《新调万曲长春》一书，上下栏是曲文，中栏是“汇选江湖方语”。（图77）

书名页

明代不少书有书名页，相当今天的封面。书名在正中，占一



王歸賦戍邊詩一篇云促織何喞
喞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惟聞
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
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
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
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
買駿馬西市買鞍韉音箋南市買轡
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孃去暮宿
黄河邊不聞耶孃聲喚女但聞黄



图76（左）
图书版式：二节版，万历年间山西刊《闺范》，上图下文。

图77（右）
图书版式：三节版，嘉靖年间余氏刊《荔镜记》，图在中栏。

行或二行。上下左右四周可能署有关文字。（图78）

插图

明代图书中的插图，在版面安排上趋于多样化，或整页，或半页，或双幅合页，或只是一小块图，四面包围文字。本书将在下面另作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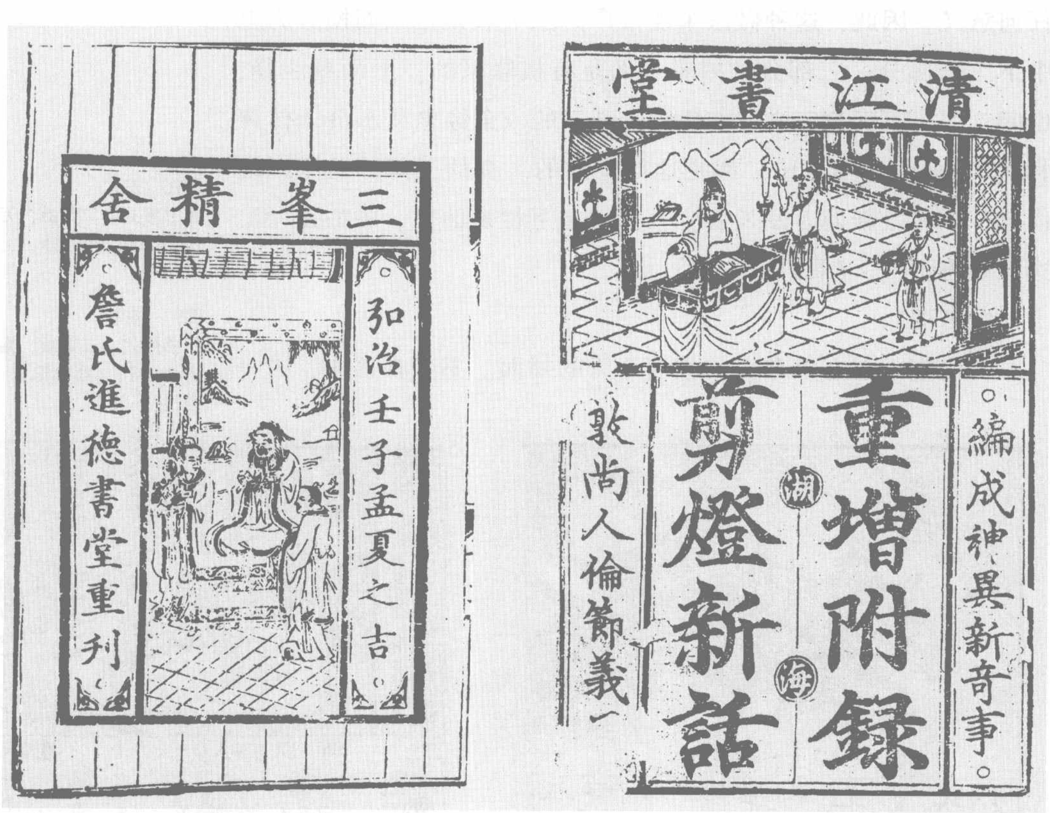


图78
书名页：左：弘治詹氏进德堂《大广益会玉篇》，上面没有书名；右：正德年间杨氏清白堂刻《剪灯新话》。

第二节　木板、纸、墨等印刷材料

一、板　料

明代刻书的木料主要是枣、梨、梓。这三种都是落叶乔木，全国各地都有生长。锯下树身后，纵剖成一指厚（约一二厘米不等）的板料，再剖成书版大小的版子，就成为刻书用的版片，刨

平后就可以使用。这种板料还要用石灰盐水蒸煮，以便长久保存，并便于奏刀。对版片的要求是不翘不裂，不论是横笔、直笔、还是弧线，都能奏刀自如。枣、梨、梓树完全符合这个要求。版片一般都是两面都用。

除了以上三种木料外，也有些地方就近用乌桕、黄杨、白杨、银杏、桦木等作为板料。乌桕和白杨“易就而不精”，黄杨则价格很贵，一般用来雕细货，用来刻书的不多。

有些书上说建版书有用榕木作版子的，取其细软容易奏刀，但经不起刷印，此说已被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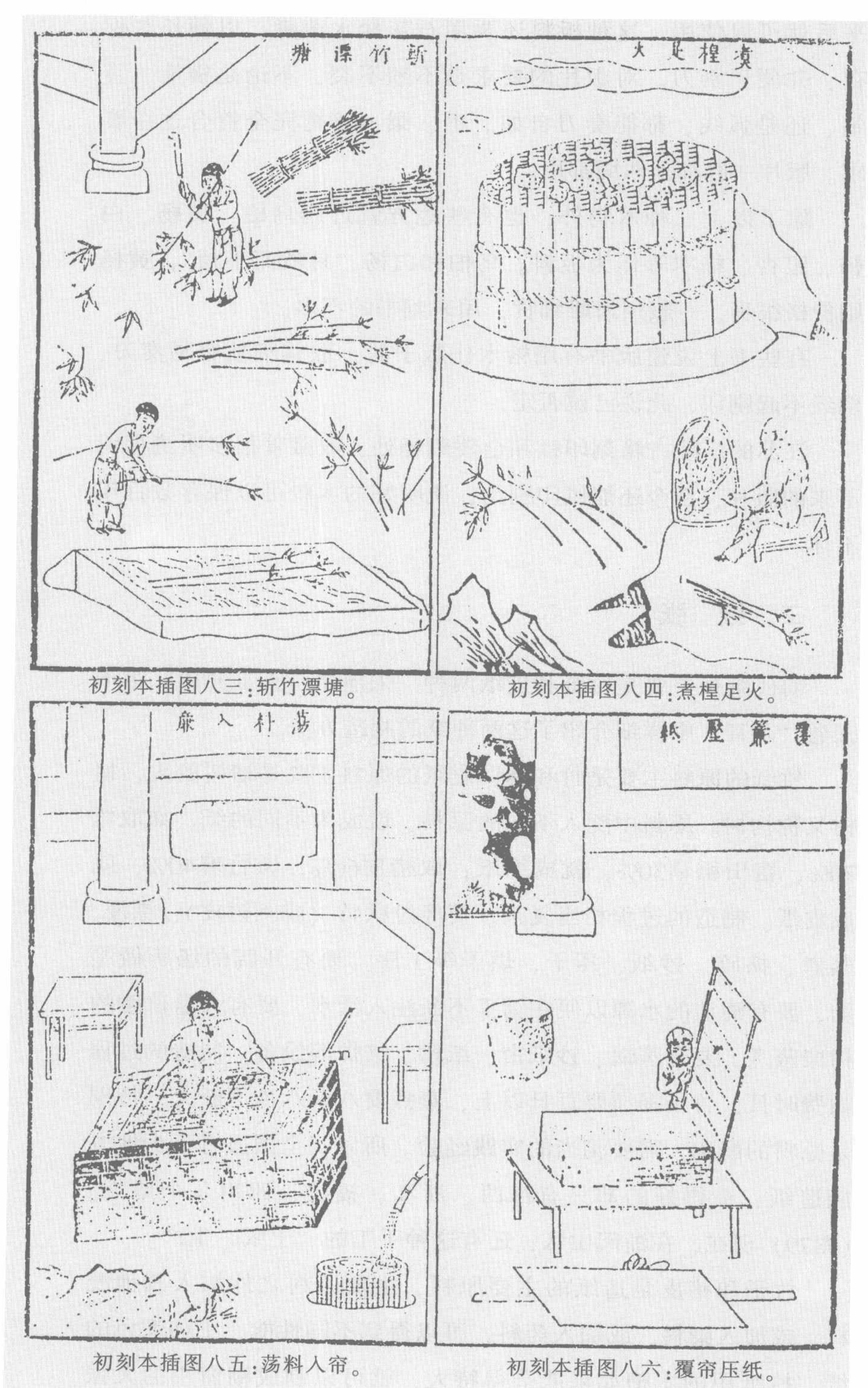
江苏的广陵古籍刻印社和金陵刻经处，收藏着很多明清存留下来的版片，至今还能供印刷用，说明好的木料可以保存数百年不坏。

二、纸　张

明代纸张主要是竹纸和皮纸两种。宋应星《天工开物》第十三卷“杀青”中详细介绍了这两种纸的制造方法。

竹纸的原料主要是竹和麻，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楮树的皮，楮树又称构树。原料中配入不同的原料，就成为不同的纸。如取竹70%，宿田稻草30%，就成绵纸；取楮皮60%，嫩竹麻40%，就成皮纸。制造的过程相当复杂。要经过砍竹（或剥树皮）、漂浸、蒸煮、捣碎、抄纸、压干、烘干等工序。要有开阔的场所做漂塘，要有清洁的水源以便在塘里不断注入活水，要有大量价廉的树柴蒸煮，要有蒸锅、抄纸帘、纸槽、焙炉等设备。制造的过程颇费时日，竹子浸漂要百日以上，蒸煮要八天八夜不断火。特别是原料的配比，需要相当的实践经验。所以，全国虽有不少地方能造纸，造得好的却只有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几个地方。(图79）现在，在浙闽山区，还有这种手工的“土纸”生产。

竹子和楮皮是造纸的主要原料，主要原料之外加入其他配料，或加入染料，或加入药料，可以得到不同性能、不同颜色的纸。抄纸用的木槽如果能造得特大，就可以制成糊窗用的大张



初刻本插图八三：斩竹漂塘。

初刻本插图八四：煮楻足火。

初刻本插图八五：荡料入帘。

初刻本插图八六：覆帘压纸。

图79
《天工开物》中介绍的明代制纸过程。

纸。在《天工开物》上，记下了20多种纸的名称。据记载，明代纸的品种，共有100余种。印书用得最多的是：竹纸、连四、毛边、白绵等几种。皇室的司礼监经厂在印《佛藏》时，用的纸有：白连纸、黄毛边纸、蓝毛边纸、黄连四纸、白户油纸5种，另有作护封用的蓝绢、黄绢。这大概是最高档的配料了。

关于明刻本的用纸，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有具体的记载，他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余他省各有产纸，……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纸，理粗庞、质拥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1] 有些书用高丽纸印成。

【1】[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

在明代，纸张还是一种很宝贵的材料，印过一面的纸，有时还用来再印，丢弃的纸张，被拾起来漂清了重新再制纸，特别是北方不产纸的地方往往这样做。《天工开物》中说："北方即寸条片角在地，随手拾起再造，名曰还魂纸。"有些用还魂纸印的书，还可以隐约看出以前印的是什么内容。

有些边远省份，明朝时开始有相当规模的造纸业。天启年间(1621—1627年)，云南丽江木氏土知府从江南请来造纸师傅李先常，对李氏夫妇优礼有加，安置在狮子山下玉水河畔定居。李氏造的纸称"申寺"（贡纸)，纸面光洁，纤纹细柔，色泽纯白，经揉耐撕，专门用来印写经文。

为了选用优质的纸张，明朝皇室在永乐年间，曾派出官员，到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供大内应用。[2]

【2】[明]项元汴：《蕉窗九录》卷一，四库全书本。

三、墨

墨也是出版业的重要生产资料。墨的主要产地是安徽，称"徽墨"。北方也产"京墨"，但数量和质量远远比不上徽墨。

制墨的主要原料是松树，制造的方法在《天工开物》上有详细的说明（图80），大致的过程是：在平地上用竹篾扎一条棚子，像船上的篷一样，一节节相连十余丈，篷的内部用纸和席子糊严实，中间开孔通气。然后燃烧松枝，也可燃桐油、清油，连烧几天，熄火后就可以刮扫松烟。靠尾部（出口处）一二节处扫出的烟粒子最细，是最优质的，称为“清烟”，制上等好墨。中段的粒子大一点，是中等质量的，称“混烟”，制普通用墨。近火源的头一二节处粒子最粗，称“粗烟”，要研细了才能用，供刷印书籍用。下脚料则供漆工和涂垩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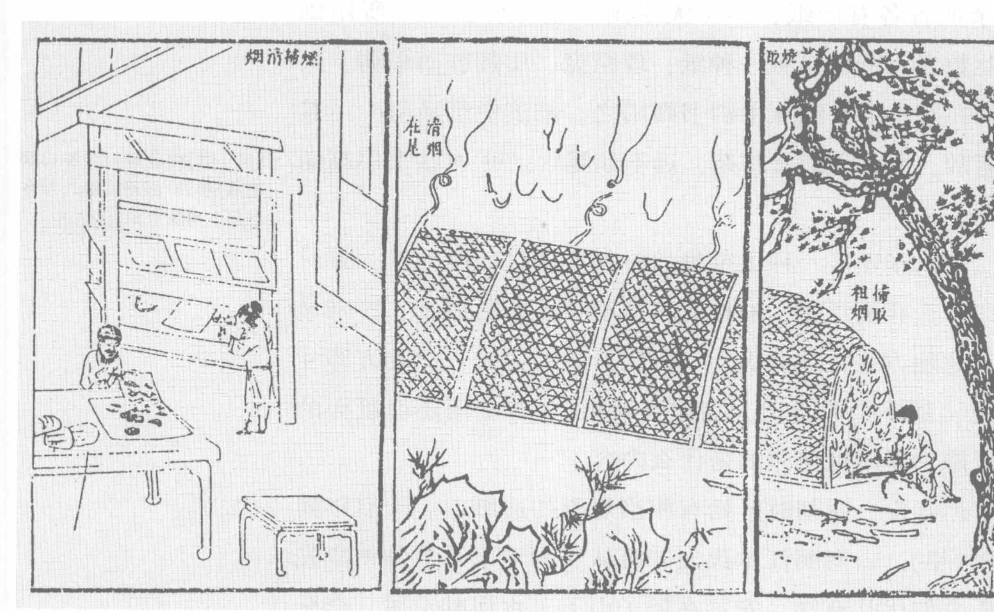




图80
《天工开物》中介绍的明代制墨过程。

安徽徽州制墨的作坊有百十家之多，最有名的是程君房和方于鲁两家，他们各有《墨谱》、《墨苑》行世，宣传自己的产品。特别讲究的墨有“百年如石，一点如漆”之誉，甚至不必要的加上熊胆，外面涂金嵌珠，被称为“墨妖”。印书用的墨，一般说是较差的墨料。印书用的墨料形态都是粉末（烟煤）状的，加水加胶化开来用。用好的墨料印成的书，颜色如漆，黑中透青紫，经久不变，入水不化，开卷有墨香。

有人认为明代印书用墨不好，甚至用烟煤加面粉使用，印出

来的书成为“大花脸本”。这种说法已被推翻。此说的来源是万历本《南京礼部编定印藏经号簿》中有一句话:“作料：烟煤五篓，银一两；面五百斤，银三两。”有些人未曾细察，认为礼部印书用的墨是用“烟煤”和“面粉”调制成的。其实这里所说的“烟煤”并非工业用煤炭，而是指制墨时出的烟子。《墨谱》中说：“桐油二十斤，可出煤一斤。”这里所说的“煤”，也是指制墨的“烟子”，而不是煤炭。刘若愚《酌中志》“内板经籍纪略”中记《佛藏》的用料中说:“……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两，白面一千二百二十五斤，白矾四十五斤。”情况和上相同，文中所说的“白面”，不是调墨用的，而是加进白矾，调成浆糊，防止虫蛀，是制作梵夹的函套用的。

第三节　雕版、印刷、装订

原稿经过校勘确定之后，便可以进入雕版印制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序是：1. 缮写上版，2. 雕版，3. 刷印，4. 装订。

一、缮写上版

明初印书用字是楷体，缮写人要有一定的书法水平，这类书写人称为“写工”，有些书的书口或书末把写工的名字刻了上去，以示重视，并作为计算工资的根据。

明代版刻书写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洪武十年（1377年）郑济刻的《宋学士文粹》一书。宋学士即宋濂，官位和文名都很显赫。《宋学士文粹》是刘伯温选定的，由宋濂的门人郑济、郑洧、刘刚、林静、楼琏、方孝孺等人缮写成书，字体朗秀挺劲。

明代中后期，印书以宋体字为主，但仍有一部分是由书法家或作者自己手书上版的。

有些人得到好的版本后，进行翻刻，一般是用薄纸印写后上版，称“影刻本”。为了保持原样，也有人把原书拆开直接上版。如《道园学古录》，50卷，刻书人郑逵在跋中说:“郑令既得印本

于淮云中，即以元（原）纸粘版刻之。”这样做可以省一道写工，但原书就没有了，而且未必不出错，刻好后也没法校对，所以采用者不多。

二、雕版

缮写好的书稿贴在木板上，便进入雕刻工序。工艺的好坏，与刻工的技术水平有很大关系。有些良工是世代相传的。各地开雕重要书籍时，往往重金礼聘他们参加，把他们的姓名刻在书上。能刻图画的则更受人重视。

刻刀是雕版最重要的工具。明代雕版用的刀已没有实物传世。但雕版刻书的工艺现在还有。我国现存唯一的雕版单位是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古籍刻印社。该社藏版片24万块、40万面。他们或利用旧版补刻，或开刻新版，每年出版木版书数十种，有十多位雕版工人。所用的工具和操作的工艺，和数百年前差不多。雕版用的工具主要是小钢刀，一副刀具约十一二件。该社博物馆潘复泰同志为这套工具绘图如下（图81），现把刀具编上号，逐一说明它们的用处。

1号：板凿——用时以肩窝顶柄端，刻板时用以铲平局部平面，修版时可用以凿去大面积破损之处。

2号：平头凿——刻版时用以凿槽及铲平槽底。

3号：小平头凿——作用与平头凿同，用于较小部位。

4号：小弯（读如婉，平声）凿——铲字与行线间的小空档，也用来刻圈点。

5号：弯凿——铲空行。

6号：刮刀——上样前用以刮平版面。

7号：双面平口凿——有大中小三种，修补工用以修凿弯角处，刻工用以铲小空档。

8号：斜口刀——用于局部修平，修版、刻版通用。

9号：刻刀——俗称“鲫鱼背”，因其刀尖处略厚，又因其刃形似鹰嘴，故又名“雕刀”。这是刻工用得最多的刀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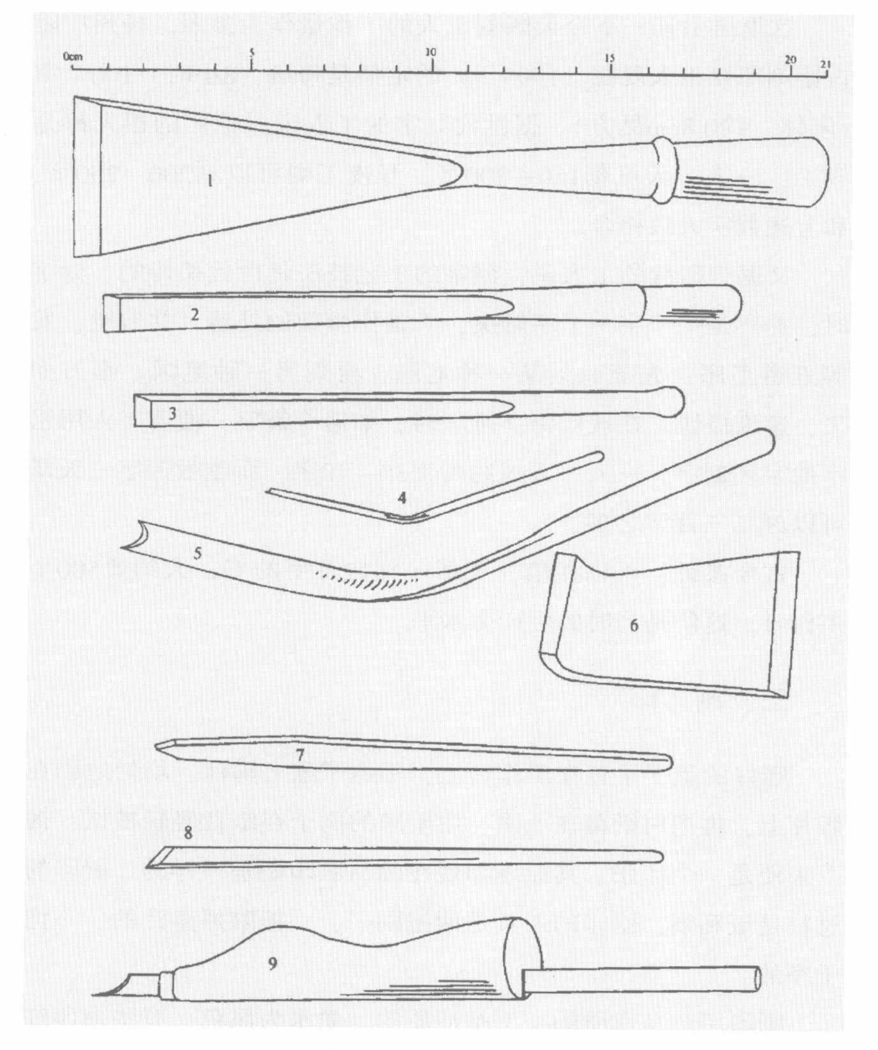


图81
刻书用刀具。

雕版工艺中有一个值得探讨的工效问题，即一个工人一天能刻多少字。这和了解明代刻书规模有密切关系。最确切的数据见上面提到的《宋学士文粹》一书，该书有一篇后记，是郑济在洪武十年（1377年）七月十日写的：

"……以字计之，一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锓梓以传，自今年（即洪武十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云……"

上面数字说明，一人一天的刻字数是235字（楷体、0.65cm见方）。

这里再引证一下今天雕刻工人的工作量作为参照。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工人现在（1999年）的定额是每班（8小时）100个字(宋体、约0.8cm见方)。据世代刻字的工人说，他们的祖先都是刻工，一人一天可刻150—200字，开夜工则可以刻200—250字，和上述数字大致相合。

又据刻印社的工人说，刻字的工艺技法是世代相传的。刻字时，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解决，而是作整版的处理，共有挑、发等五道工序，先统一刻某一种笔画，再刻另一种笔画。奏刀如飞，速度极快。在现代铅字排版时，如遇冷僻字，便要工人用铅字的字坯刻字，一人一天大约可刻30—40字。而雕版刻字一天却可以刻二三百字之多。

古今参证，可以相信，要雕一部12万字的书，大约要500个工作日。这便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三、刷　印

雕好的版子平置在工作台上，用刷子醮上墨汁，均匀地刷在版片上，再把白纸覆在上面，用干净的刷子在纸背轻轻拂拭，揭下来便是一个印张。其原理和现在的凸版印刷是一样的。刷印的材料是纸和墨，刷印的工具是两把刷子，一把醮黑墨汁的，一把干净的。

刷印用色是水质的，不是油质的。墨水为黑色，有些书印红色或蓝色。或在试印时用蓝色，特藏本也用蓝色。明末杭州等地还有五色版，则加上橙色、紫色、绿色。分版处理。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刷印的定额是一个工作日500张。如果版面较大、或者是图版，则不足此数。如果一人一天实际工作7小时，则每个小时可印60—70张。这是现在的数字，古代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利玛窦说，中国印刷工人一人一天可以印1 500张，这大概是版面较小的印件。

上墨的刷子是棕做的，每印一张，版面和棕毛直接摩擦，不免要损坏版面，并且木版长时间浸渍墨汁，笔画会发胖变粗。所

以，每印一二百张，便要让木版“休息”一下，称为“歇版”。古代印书大多以“百”为量，只印200—500部。据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工人说，一副版片如果印刷时及时“歇版”，保存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印一二千次是没有问题的。保存得好的版子，可以传代。一般说，印到二三千次后，笔画就会模糊不清，不堪再用了。据《太学经籍志》记载，太学藏版70种，其中47种已“不堪印”，就是这个原因。有些单张的经页印数达数万张（常以八万四千张为一个基数），则大概是有几副版子的。

四、装　订

装订的基本要求是：1. 牢固，不易散失；2. 操作简易；3. 装订后的书，翻阅方便。这三个基本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最佳方式的获得，竟费了数百年的追求。中西方的图书装订方式，经历了不同的探索过程后，殊途同归，都采用线和胶两种基本材料。中国是线装方式，西方是穿线方式。西式的书在翻阅时，可以把书完全摊平，中国的线装书则不能摊平，多出一个累赘的“书脑”。翻阅时，“书脑”常常碍事。明代末期，利玛窦到中国来，带来许多西方书籍，它的装订方式，使中国文人诧为惊异。但中国并没有采用这种西式装订方式。

自从纸张成为印书材料后，中国的图书装订方式依次经历了几个阶段：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明初时，主要是蝴蝶装和包背装两种，佛经则还保持梵夹装的方式。明初刻印的《元史》，装订的方式是蝴蝶装。蝴蝶装有两个明显的不合理处：一是因为书页有文字的一面对折，阅读翻页时，两面有文字，接着两面没有文字，不大方便；二是对折后在书脊部分用浆糊，着浆的部位不多，一旦失散，书页便会脱落。梵夹装也有类似毛病，古代笔记中，常有讲经时书夹散落、书页错乱的记载。改用线穿订后，书页无文字的一面向内对折，解决了第一个不合理问题。同时，叠起来的书页要用纸捻订固定，称为“草订”。加上封面后再用线穿订（即线装，又称“缝缋”），这实际

上是“二次固定”，即使外面的线断烂了，还有里面的纸捻订，根本上解决了散叶问题。这种书称为“线装方册”。

由于线装的优越性，所以，明后期的佛经《径山藏》舍弃了梵夹装的传统形式，不理睬“梵夹尊重，方册轻亵”之说，也采用了线装方册的装订。这在装订方式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线装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7 000卷的梵夹装，用线装只要1 200册，省料在一半以上。古人总结线装的优点说：“建者省资价，运者省任载，藏者省笥夹。”[1] 我国古籍的装订方式，终于最后固定了下来。从明代到清末，一直采用，这在我国古代印刷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进步。

线装的工序，简略地说，有折页、穿孔后用纸捻订牢（第一次固定，称为“草订”），加上封面，再用线订（第二次固定）。但细分则有一二十道手续。《中国印刷史》上说有21道工序。[2] 蒋元卿《中国书籍装订术的发展》上则归纳为12道工序：1. 折页，2. 分书（又称“排书”），3. 齐线，4. 添副页（即空白页），5. 草订（用纸捻，即第一次固定），6. 加书面，7. 截书（即切齐），8. 打磨，9. 包角，10. 钉眼，11. 穿线（即第二次固定），12. 贴签。

【1】[明]万历十四年徐琰《赠幻余、密藏二上人唱缘刻大藏叙》，又明释道开《募刻大藏文》。

【2】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一章中“明代”部分“装订”之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四节　劳动组织、刻印周期

一、劳动力的组织

出版单位中的人员组成，在一些出版物的序跋和笔记中有些记载。有的是编纂人员名单，如《元史》进书表中有修纂者的名单，《永乐大典》中也有纂修人名单，各地所编的地方志中都有一长串主修、协修的名单，诗文集往往在正文中列出纂、阅、读、校的人名。这里专门对刻印方面的劳动力组成作探讨。

雕版工场刻印的人员有以下各种人：1. 缮写、校对人员，2. 雕刻人员，3. 刷印人员，4. 装订人员（包括折页、草订、穿线、做函套等），5. 管理人员（版片保管、纸墨材料保管、采购、成品

管理、财务等)。下面举一些实例：

1. 皇室出版机构司礼监经厂。在嘉靖十年（1531年），经过精简后留下来的司礼监人员有1 583人。其中属于经厂方面的为：笺纸匠62名，表背匠293名，折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黑墨匠77名，笔匠48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1]

2. 常熟毛晋汲古阁有“聚印匠二十人”（见《五经文字》跋），“家畜奴婢二千指”（见《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按：“聚印匠”即刷印工人，“二千指”即二百人。

3. 无锡顾起经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类笺唐王右丞诗集》时的人员组成是：写勘3人，雕梓24人，装潢3人（见该书目录后）。

出版单位的生产能力，由两个标准来衡量。第一个标准是看他的雕版能力，雕版能力强，就可以不断有新书问世，可以在短期内雕好一部大书。雕版的人员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临时到外地去聘请。

衡量出版单位生产能力的另一个标准是刷印能力。前面说过，一人一天大约可以刷印500张。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认为，刷印工和装订工之间，人员配比是有一定比例的。一般说，一个刷印工人印出来的印张，大约要二三个装订工人跟在后面装订。如果装订讲究，例如包角、贴签、印书根、加函套，则要配备四五个装订工。

二、工　价

明代雕版图书的工价很低廉。先列几条资料：

1.《大乘楞伽经唯识论》，《径山藏》的正藏（113函），刻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牌记云：“共字九千六百十五个，写银三钱八分五厘，计刻银三两三钱六分五厘，共板十三块，计工价银六钱五分。”（按：写工和刻工的比例大约为1∶9。）

2.《佛说不空羂索咒经》，《径山藏》的正藏（46函），刻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牌记云：“共字五千二百六十四个，写

[1]《明会典》卷一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刻银三两七钱九分，板七块五钱六分，筌头纸煤八分。”（按：比上书贵得多。）

3. 徐康《前尘梦影录》中说：“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该书中还有一段话说；“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

4.《豫章罗先生文集》17卷，宋罗从彦撰，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沙县谢鸾刊。该书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序后有识语云：“刻板八十三片，上下两帙，壹百肆拾壹叶，绣梓工资贰十四两。”（按：这本书大概8万多字，则每百字约为3分银，与汲古阁“三分银刻一百字”价相似。）

5. 清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万历时，所刻支那本释藏，每卷后均记字数及刻资银若干。如《宋高僧传》卷一，计字七千三百九十五个，该银三两七钱，约计每百字五分，刻价之贱如此。”

6. 刘若愚《酌中志》中记载，因为“妖书”事件，把刻妖书的人徐承惠捉了起来，供词中说，他刻“妖书”刻工银一百字四分。因为要在僻静无人处刻，所以另加五厘银。他刻了妖书八百字，共拿到三钱四分银，即每百字四分银。

7.《宛署杂记》中有一条记载，潞王之国时，印了一本《之国供应事宜书册》，500本，板料、刻工、纸张、刷印共价四两二钱三厘一毫。[1]

我所看到的资料中，刻工最低廉的是《分韵四言对偶启蒙音律启蒙》一书。这本书是万历年间端州（广东高要）刻的，书名前有“明万历周从龙六委斋刻本”字样。周从龙是浙江人。这是一本教童蒙对偶、押韵的书。书中说：“对偶启蒙音律启蒙共书一百三十四篇，计字三万八千三百五十六个，每百工银二分算，共该银七两八钱五分八厘，用过梨板十一块，每块价银一分六厘，共银一钱七分六厘在内。”这段记载说每二分银子刻一百个字，工价很低廉。[2]

【1】[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2】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从以上几个资料可知，明代后期，刻字工价低的是每百字三分银，甚至还有略低一点的，高一点的是每百字五分银。查有关史料知道，明初时米价为一两银买白米三四石，明末时一石涨到五六钱、七八钱，动乱、灾荒时则涨至二三两甚至更高。如果一个刻工一天刻字200个，他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3石米。[1]

【1】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三、生产周期

生产周期指一部书从定稿付梓到印订成书所费的时间，以“天”为计量单位。现代出版业中，十分重视图书印制的生产周期。雕版印刷生产力虽然低下，但如果集中众多工人赶刻赶印，也可以在短时间内突击出大工程来。下面介绍一些实例。

1. 明代北京科举考试时，开榜之后，书坊立即刊刻《登科录》，三五天便刊印完成出售。这是说三五天可以赶印出一本书。[2]

【2】[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2.《元史》210卷，130万字，装订成120册。这部书在洪武三年（1370年）7月开始雕版，10月3日“缕板讫功”（以上日期俱见《元史》宋濂所撰后记）。合计编写时间331天，刻版时间90天。是正史中编写和刻印最快的一部。

3. 明顾起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诗集》10卷，目录后称：“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锓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刻工有24人。刻印用了五个半月。

4. 郑济主持的《宋学士文粹》10卷，122 000字，10个刻工，52天完成。

5. 吴郡顾凝远诗瘦阁刊《济北晁先生鸡肋集》70卷，牌记云:“吴郡顾氏于崇祯乙亥春照宋刻寿梓，至中秋工始竣。”

6. 胡承龙刊的《本草纲目》开始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前后历时七年。（但另一种江西布政使司刻的夏良心本《本草纲目》，只用了六个月时间。）

7. 俞良甫在日本刻的《文选》，60卷，《文选》是一部很难刻的书，字数多，难字多。跋文说:“自辛亥（1371年）四月起刀，至今苦难始成矣。甲寅（1374年）十月谨题。”用了三年半时间。

8. 福建的游氏、饶氏和无锡的周氏合作完成的大书《太平御览》，约500万字，铜活字版，从隆庆二年至五年（1568—1571年）断断续续，到万历二年（1574年）完成。前后六七年时间。

9. 时间最长的是《径山藏》2 137种，10 814卷。前后用了近百年时间，详见前述。

关于生产周期，有一个很特殊的记载，事见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卷22“谈异”：明大学士王鏊之子王延喆，性豪侈，喜蓄书。一天，有人拿了部宋版《史记》向他兜售，索价三百金。王延喆叫那人过一个月来取钱。一面马上组织人力刻版，一个月后，书已经刻印好了。当书商向他取钱时，他说：“不要买了，书还给你。”不一会儿，书商又回来，说：“书确是宋版，可是纸张不一样了。”王延喆大笑，向书商说明了真相。《池北偶谈》上说，“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本，即此本也。”著名的版本家叶昌炽和叶德辉都不相信，认为一个月刻印好《史记》，决非事实。

第五节　印书成本、书籍定价

一、印书成本

在有关记载和明版书的序跋牌记上，可以知道明版书刊印的成本，虽然只是点滴材料，但由此可以推知其他。

1. 梅鷟《南雍志·经籍考下》“梓刻本末”上记国子监刊印辽、金二史“共该用工价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两四钱二分，刷印等费不在数内”。（《辽史》116卷，《金史》135卷）

2.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四“经费宫禁上”详细记录了重修《大明会典》用纸和补版的费用“共一百四十四两八钱七分”。

3.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沙县谢鸾刊《豫章罗先生文集》17卷，“板八十三片”，“梓绣工二十四两”。

4. 崇祯十三年（1640年）江阴知县冯士仁集资刊刻《江阴县志》6卷，19人捐资“共出银二百九十八两”，其中冯士仁和乡绅

李鹏翀各出资一百两。

5. 明代刊刻的佛经的末页上，往往刻上施刻者的姓名、佛经的字数、费用等资料，记得最详尽的是崇祯七年（1634年）金坛于玉德等捐资刻的《摩诃僧祇律》一书，据该书资料推算，刻印一卷一二万字的佛经大约要四五两银子。

从上面几例，可大概知道明代印制一部小型图书（10卷以下）、中型图书（数十卷）、大型图书（百卷以上）所需的资金。

二、图书定价

明代出版的图书，一般都不印定价。出售时由书商加钤一个木戳，红色，标上定价，但也不多见。仅查得几条：

1.《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小说）12册，1 000多页，“每部纹银壹两”。

2.《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采精便览万宝全书》（日用常识）5册，400多页，“每部价银一钱”。[1]

3.《书言故事大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世德堂刊本，汪宗师题识云：“崇祯七年岁次甲戌十月汪宗师南宫县岁考买之，使皇钱七十文，共是四本。”

4.《新调万曲长春》（戏文唱词）藏日本尊经阁文库，该书首页上有木戳“每部价银壹钱贰分”。[2]

5.《月露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扉页牌记“静常斋藏板，不许翻刻”，“杭州丰乐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6.《广金石韵府》5卷，崇祯九年（1636年）莲庵刻朱墨套印本，扉页钤“绵纸硃文，定价壹两，本衙藏板，翻刻千里必究”。

7.《大明一统志》90卷，万历十六年（1588年）杨氏归仁斋刊本，扉页钤“每部实价纹银三两”。

8.《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7卷，万历余献可居仁堂刊本，扉页钤“每部纹银壹两”。

9.《宋文文山先生全集》21卷，崇祯二年（1629年）武林钟

【1】以上两书藏日本内阁文库，上述资料见日本大木康《冯梦龙与明代刻书》一文，1986年苏州冯梦龙学术讨论会论文。

【2】黄裳：《晚明的版画》，《榆下说书》，第1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越跃庵刊本，扉页钤“每部定价纹（银）壹两”。[1]

10.《新刻出像点板吕真人梦境记》2卷，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百岁堂黄备原刊，内封有三个木记：“清逸斋”、“每部价贰钱”、“黄备百岁堂梓”。

这里再介绍佛经的定价，多达636函的《南藏》，请经的“板头银”是纹银12两，如果只要其中的“四经”（即《大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则只要一两八钱。[2]

这几种书的价格，不知是否实价。而且加盖木钤的时间也不能确定。如果和当时物价比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书本的价钱还是不低的。明代实行银本位，明初时一两银子可买米三四石，明末时一两银子买米一二石。据此，则一部《列国志》要一二石白米的价钱，一部小曲唱词要四五斗白米的价钱，书价还是比较贵的。

明代出版的图书超过以前几个朝代的总和，其原因有三。一是明代政策重文轻武，出版各类图书的禁忌比较少，连本朝的史书，也可以由私人撰写；二是出版图书不要纳税，成本减轻；三是出版有利可图，品种和地区之间，获利的空间很大。图书的定价和银米之间，有一定比例，图书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普通商品，而不再限于颁赐和交换等形式。这样，出版业也就能在经济生活中存在，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

【1】以上四种书的定价资料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2】［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

第九章　印刷技术的改进和革新

明代在插图、彩印、活字三方面，有重大的进步。

插图是和雕版印刷同时产生的。到了明朝，插图艺术大盛。经史子集各类图书，都采用插图增饰。插图的篇幅从半文半图发展为全页、双幅合页、长卷连续、连环画等。插图除了作为文字的辅助以外，还有以图画为主的画册，如山水画册、诗意画谱、临摹用范本、商品图录等。插图的风格日趋多样，著名画家参与插图的起稿，还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版刻画家和刻刀手。

活字印书是雕版印刷的必然走向。我国活字印刷从宋朝开始，明朝有了较大发展。制作活字的材质有木料、金属、瓷土三种。金属活字和木活字印成的书，可考的传世的实物数百上千种，已经形成一定的生产力。活字印书遍及全国各地，还和朝鲜、日本有交流和沟通。

彩色印刷始于唐宋的经书和纸币，明代的彩印又有了新的发展。着彩的方法有敷彩、套印等多种。套印方法向精致的方向发展，成为饾版和拱花，有特殊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插图的广泛使用

一、图书插图的大量应用

图画的刻印是和文字的刻印同时产生的，并没有孰先孰后的有力佐证。前人就有“有书必有图”的说法。

现存最古的版刻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他的父母亲祈佛保佑而镌刻的《金刚般若经》，有文有图，卷首的扉页画名“祇树给孤独园”，上面有二十余人、兽两头。线条流畅，刀法熟练。一般认为，这便是我国古代图书插图的渊源。有人认为，佛经插图和书籍插图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并不是同一个源。

宋元的图书也有插图，和前代一脉相承。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宋代已经有专门的画册雕版出版。据《图画见闻志》称：“皇祐初元，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厘为十卷。名《三朝训戒图》，图成复令传模刻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宗室。”[1] 这段话记载多达百幅的《三朝训戒图》画册的出版过程甚详。

【1】[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到了明代，随着版刻事业的发展，图书的插图也大为盛行。特别是到了晚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版画艺术的黄金时代”(傅惜华语)。明代版画盛行，和皇帝的提倡也不无关系，由太子讲官焦竑编纂、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负责镌刻的《养正图解》一书，有图60幅。在这本书的序中，祝世禄说：“高皇帝尝命诸臣绘农业艰难图、古孝行图进太子、诸王。”[2]

【2】《养正图解》祝世禄序。

（一）各类图书广泛使用插图

宗教类　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金陵刻本。

经书子书类　如《纂图互注荀子》明初刻本，《三礼图》明通志堂刻本。

历史类　如《帝鉴图说》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金陵刻本。

地理类　如《新镌海内奇观》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杨氏夷白堂刻本。

科举类　如《状元图考》明刻本。

占候类　如《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陵刻本。

日用百科类书　如《三才图会》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图书编》明刻本，《人镜阳秋》明刻本。

技术类　如《新刻京板工师雕镌正式鲁班经匠家镜》明末刻本，《天工开物》明崇祯十年（1637年）刻本，《新制诸器图说》崇祯四年（1631年）刻本，《两浙盐场图咏》明刻本。

农业类　如《农政全书》明末刻本。

医药类　如《本草纲目》、《元亨疗马集》等。

文集类　如《新镌考正绘像注释古文大全》明万历元年（1573年）刘龙田刊本，《雪舟诗集》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刻本，《吴骚初二集》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

戏剧类　如《董西厢》明天启吴兴刻本，《昙花记》明刻本，《樱桃梦》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陈与郊刻本，《红拂记》明凌氏刻本，《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明万历十年（1582年）刻本。

小说类　如《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明崇祯八年（1635年）刻本，《新刻八仙出身东游记》明末书林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明末刻本，《三国水浒全传》（简称《英雄谱》）明崇祯刻本，《金瓶梅》明崇祯刻本。

武备类　如《武经总要》（前集）明弘治正德间刻本，《军器图说》明崇祯刻本，《利器解》明万历刻本，《神器图》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刻本。

欣赏、画谱类　如《欣赏编》明刻本，《茶书》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刻本，《梅史》明刻本，《唐诗画谱》（八种）

明刻本，《燕闲四适》明刻本，《乐律全书》明万历郑藩刻本，《高松画谱》明嘉靖刻本，《历代名公画谱》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刻本，《程氏墨苑》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刻本。

启蒙读物、通俗书类 如《鼎镌校增详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闽建书林郑世豪刻本，《新刻出像音释古今幼学联珠统宗故事》明万历金陵王氏刊本。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明代图书的插图是极为普遍的，成为各种图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明代图书的插图，数量十分可观。以金陵富春堂所刻的传奇来看，这家书坊共刻传奇10套，即100种，每种传奇上都有插图，多的三四十张，甚至上百张，最少的也有三四张。以平均每种10张计，合计有千幅。再看《古本戏曲丛刊》的1~3集，其中明刻本212种，共有插图3 800幅。一些图书的插图，动辄数十百幅：《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150幅，《农书》281幅，《人镜阳秋》、《闺范图说》都有数百幅，《三宝太监西洋记》100幅，《新镌海内奇观》130幅，《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200幅，茅元仪辑《武备志》图740幅，王鸣鹤撰《登坛必究》图560幅，郑若曾《筹海图编》地图114幅。

明代图书插图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所占篇幅在一面以内的：1. 插图只占极小的一块，包围在文字之中。2. 篇幅占三分之一。在三节版中占一节。3. 篇幅占二分之一。在二节版中，上图下文，或上文下图。也有的左右分，左图右文，或左文右图。4. 占整幅版面。图的四周仍保留框线和书口。（图82、图83）

另一种情况是所占篇幅超出一面的：1. 双幅合页。两面合成一幅图，使画面增加一倍。明代后期才看到有这种形式。2. 连续若干幅。有些山水画采取这种形式。（图84）实际上是把长卷分段，画面相衔接。（图85）3. 连环画。一幅幅图画情节相连，但画面不相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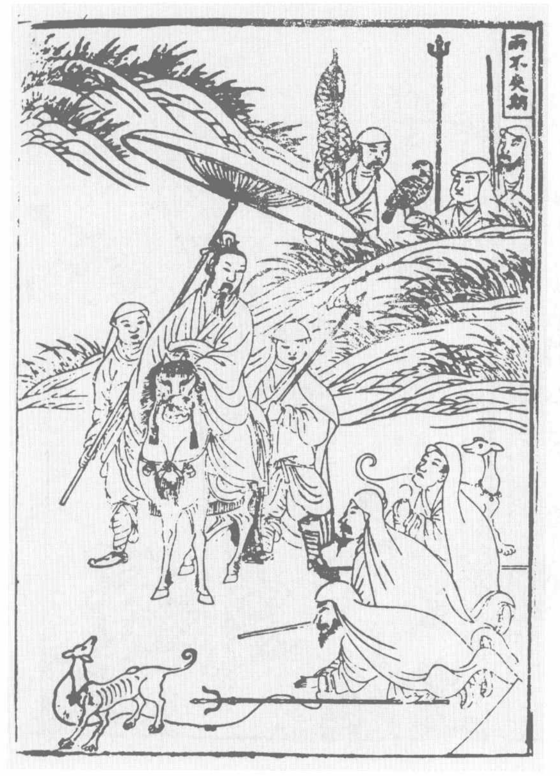




图82（左）
《养正图解》是一本教育皇子要善继帝业的书，书中辑录帝王兴废之事，每事有一幅插图。

图83（右）
插图只占版面中一小块，三面或四面为文字包围。

（二）明代插图的时代差别

明代图书的插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有它的特色，这些特色表现在插图的数量、图幅的大小、画工与刻工的分工、画面的风格等各个方面。

明代初期，整个版刻事业还没有大盛，规模、技巧、风格和宋元还没有明显的区别，配有插图的书不太多，图的篇幅还没有超过一面的。人物和背景都比较简单，线条粗犷古朴，有名的画家还没有参加到版刻事业中来。

明代中期，随着版刻事业的兴盛，有插图的图书大大增加。一些有名的的画家参加进来，专门从事绘画，画幅增大，出现了双面合页的形式。版画作风多样，工致细密的徽派版画大为风行，形成时代特色。

明代后期，图书插图的应用更广，在小说和戏剧方面更是无书不有。工细雅丽的作风进一步发展，其他作风的插图也有发




图84
双幅合页插图《彩笔情辞》中的一幅。




图85
长卷割分插图《坐隐先生精订捷径棋谱》中的插图，长卷割成6段，此为第3、4段。

展。由于徽派画工、刻工四出刻书，使插图的地区特点显得淡化了，工细成为共同的趋向。除了双幅合页以外，又出现了多页连续和连环画的形式。以图为主的画册大量问世。如图录、画传、

画谱、图像、诗配画等。

明代中后期，著名画家参加进来，使插图的质量大大提高。如唐寅画《西厢记》，仇英画《列女传》，陈洪绶画《离骚》、《水浒》，郑千里等画《名山图》，顾正谊画《百美图咏》，汪耕画《北西厢》，陈询画《小瀛洲社会图》，刘素明等画《玉簪记》，陆武清画《燕子笺》，程起龙画《孔圣家语》，丁云鹏画《观音变》、《墨苑》等。杭州刻的《玄雪谱》（曲选）有画家26人作画，著名的仇英、沈周、唐寅都在内。

（三）明代插图的地区差别

明代插图按地区分，有几大派别：金陵派、杭州派、苏州派、建阳派、新安派（即徽派）。由于刻工的“走穴”，风格逐渐趋同，而以徽派执牛耳。

金陵派以金陵为中心，包括镇江、常州等地。金陵最大的书商是唐姓，拥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等。富春堂刊印的《白兔记》一书的插图，是万历前期的代表作。构图单纯，线条挺劲。金陵另一家大书商是陈氏的继志斋，所刻的《玉簪记》是万历后期的代表作，作风细致工丽，人物与背景并重。金陵还有一家有名的书商，汪氏的环翠堂，代表作是《义烈记》。但汪氏本来是徽州迁来南京的，完全代表徽派的作风。

杭州派又称武林派。所刻图书的插图富丽多姿，兼有徽派和建安派的特点。人们评价说它比建安则古朴不足，秀丽有余；比金陵则豪放不足，纤巧有余。也有人说它是徽派的孪生兄弟。杭州派除了小说戏剧的插图外，还有不少地志、名胜、画谱等图册，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杭州附近的湖州，图书插图也有特色，凌濛初和闵齐伋二人，刻了许多图书。戏剧《虬髯翁》、《北红拂》、《会真记》、《邯郸记》、《六幻西厢》等书的插图，都很精美，而且尝试彩色的插图。有人把湖州的插图说成是质量优异，彗星一现。

苏州地区的图书插图，情况和杭州大致相似，有一些为戏剧小说刻制的精美插图。

福建建安地区的图书，很早就有插图。明初的通俗演义，以及启蒙读物、日用杂书都有插图，其风格特点是人物造型简略，丰满肥硕，线条粗实饱满。

各地区风格的差别，除了表现在构图上以外，也表现在所用的刀法上。当时各地刻工所用的不同刀法有：双刀平刻、单刀平刻、流云刀、欹刀、斜刀、整刀、敲刀、卧刀、添刀、旋刀、卷刀、尖刀、转刀、跪刀、逆刀等。

二、徽州地区的图书插图

版画界把徽州地区的插图称为“异军突起”，这是并不过分的。

徽州的图版雕刻，历史并不太久，比北方的佛经扉页画、金陵和福建的版画都滞后。现在看到的最早的徽州版画是三张“石守信报功图”巨幅版画，石守信是宋代的开国功臣，赵匡胤的结拜兄弟。木刻由25个系列故事组成，歌颂其战功。刻制的时代约为元末明初。每张篇幅都极大，高188公分，宽267公分，由几块版子拼合而成。这种报功图是族人祭祀祖先时供奉用的，不是图书的插图。

具有图书形式的版画先有图录，如天顺六年（1462年）的《黄山图经》，一卷，还有宋明递刻的《黄山图经考》，凡八刻，始宋景祐初（约1034年），终万历十年（1582年）。后来才有图书的插图，如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休宁流塘詹氏宗谱》，6卷；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欣赏编续》；天启四年（1624年）胡宗宪等著的《筹海图编》等。

徽州图书插图和制墨工艺以及石雕、砖雕、木雕有密切联系。徽州盛产写字用的墨锭，墨锭是一个六面体，制作时用木模，上刻阴文图画，木模空其一面，填充墨料。干后解开来，就成为有阳文图画的墨锭。这种木模在方寸之地，要刻出人物、舟楫、翎鸟花草、亭台楼阁，细若羽毛，以工细见长。墨锭上的图画有各种内容，由购买者自由选择。制墨商把这种图画刻印成

册，成为一本商品宣传目录，称为“墨谱”。当时刻印出来的“墨谱”有《方氏墨谱》6卷，万历十七年（1589年）刊；《程氏墨谱》14卷，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刊；《潘氏墨谱》2卷，万历四十年（1612年）刊；《方瑞生墨海》12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刊。徽州图书插图的另一渊源是石雕、砖雕和木雕(都是圆雕或深浮雕)，这几种都是建筑装饰品，现在东南地区古民居中还可以看到。以上几种雕刻的构图布局、人物形象，以及所用的刀具、刀法，都和插图版画相通，技艺的迁移十分容易。

版画界认为，徽刻中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是徽派版画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套插图（图86），该书万历十年（1582年）高石山房刊行，共有插图47幅，想象丰富，人物活泼，接近金陵版画的风格，但精细的程度较差。由这本插图开始，徽州的版画大量为小说、戏剧服务，而且遍及其他各种图书，数量日多，技

图86
万历十年（1582年）郑氏高石山房刻《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代表徽州插图风格从粗犷向精细的转变。



艺日精，一发而不可收。

晚明时期徽州版画的精品很多，最著名的戏剧方面有：汪光华玩虎轩的《北西厢》、《琵琶记》、《红拂记》，观化轩和青藜馆合刻的《玉簪记》，浣月轩的《蓝桥玉杵记》，黄应道刻的《梦境记》，黄伯符刻的《大雅堂杂剧》、《四声猿》，吴左千的《古本荆钗记》；科技方面有黟县鲍山刊的《野菜博录》，休宁程冲斗的《耕余剩技》，汪应斗刊的《新制诸器图说》；历史故事、释道方面有《养正图解》、《状元图考》、《闺范》、《列仙全传》、《观音三十二大悲心忏》、《性命双修万神圭旨》；还有不少民间酒牌。

徽州版画受到世人欢迎，东南地区一些书商在刻书时，往往重金礼聘徽州工人前去刻书。所到之处，有苏州、杭州、金陵、荆州、广德、池州、襄阳等地。例如杭州的刻书《筹海图编》、《海内奇观》、《历代名公画谱》、《吴骚合编》、《牡丹亭还魂记》、《吴越春秋乐府》，以及李卓吾批评本诸传奇等，苏州的刻书《生绡剪》、《清夜钟》、《女开科》、《金瓶梅》等，都是徽州刻工完成的。流寓在外的刻工，声誉很高。这样做的结果是，东南地区刻书插图的风格逐渐趋向一致，互相交流融通。

三、明代插图的美学取向

明代版画的种种区别和特色，最终离不开豪放和婉约这两种基本的美学取向。

木刻版画不同于诗词绘画那样可以不加雕琢，喷薄而出，纵情挥洒，它必须十分细致地、一刀一刀地小心奏刀，才能表达出一定的形象，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所谓“豪放”，只能是画稿上的豪放，刀法上谈不上什么“纵情挥洒”，永远只能是“小心翼翼”。画稿如果是豪放的，也须用细致的刀法去表现。版画的风格，主要是由画稿决定的。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再来看各种版画插图的风格。这里先介绍两幅金陵派的作品。一幅是明万历金陵富春堂《三元记》的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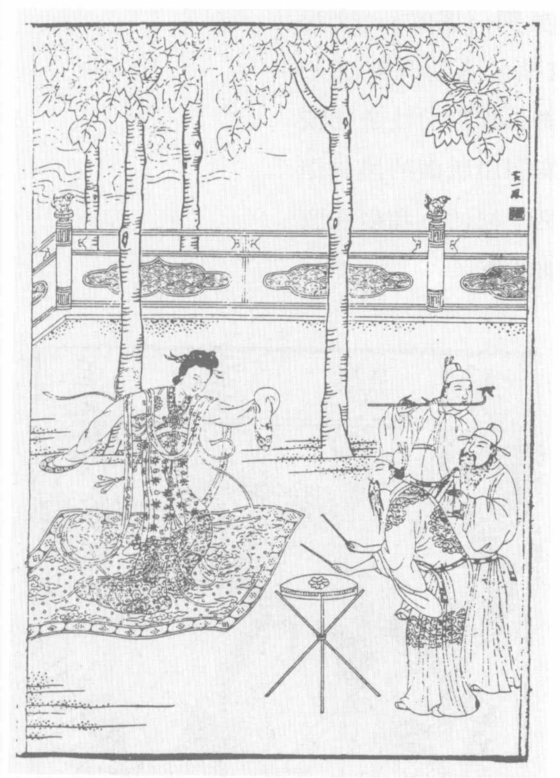
图，另一幅是明万历世德堂的《西厢记》的插图（图87）。这两幅作品的构图都比较单纯，背景简明，有省略。人物只有二三人，个头比较大，一般占半幅以上。勾画人物和背景的线条比较粗犷，圆转润滑的线条少，挺劲的线条多。能利用版面的黑块作阴刻。很少有图案装饰的做法。画面的视角是平视的，和坐在座位上看到戏台上的场面相一致。这是一种古拙的作风。





图87
早期插图大都简朴。左：金陵富春堂《三元记》；右：世德堂《西厢记》。

再来看两幅徽派的作品。一幅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另一幅是《望江亭中秋切鲙旦》（图88）。它们的构图比较复杂，背景和摆设齐全，纤悉毕具，不作省略。人物的个头比较小，一般不超过版高的一半。人数从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形象细致，大都用柔和的细线条来表现。细线勾勒成为全图的主流。阴版不再使用。大量使用图案装饰，地砖、门窗、栏杆、帐幔、衣服、衾席等，都布上划一的、工细的多方连续图案。画面的视角也是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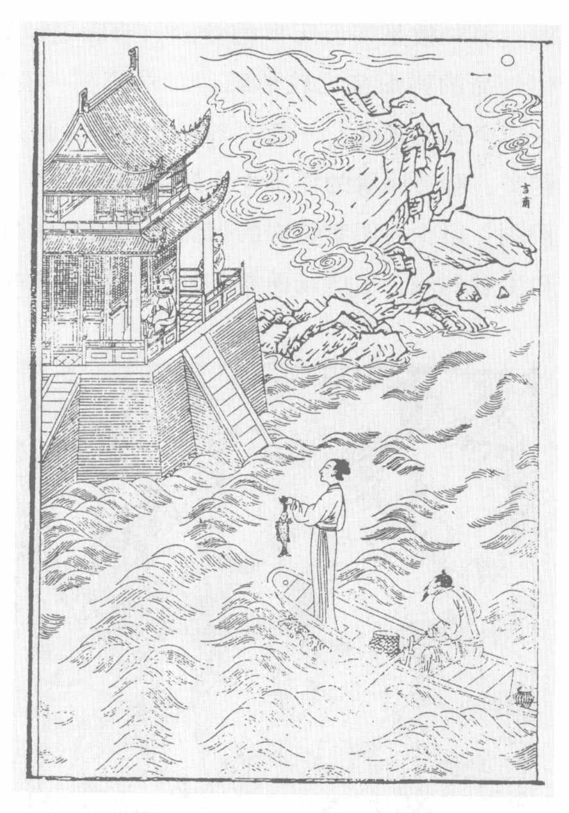


图88
晚期插图趋向精细。左：顾曲斋《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右：顾曲斋《望江亭中秋切鲙旦》

视正面，离不开八尺舞台。这些，构成了细致绵密的典丽风格。这种风格发展到过分时，画面上的每一块空间都被填满，完全没有空白，这和徽州的砖雕作风完全一致。极端的做法成为追求靡丽，堆砌繁缛，像词曲中的“八宝楼台”，被人称为“匠气”，但也有图案化、漫画化的趣味。

上面两种版画都以舞台所见为限，舞台即画框。没有近景、中景、远景之别，场面不大，视角不广，没有大块“留白”。画家们寻求突破，是必然的趋势。明代后期，苏杭一带的小说插图率先打破了这个窠臼。最有代表性的是容与堂的《忠义水浒传》，画面突破舞台，走向广阔的自然和社会。场景宽广，距离拉远。远山近水，烟云草树，尽入画面，线条刚柔相济，刀法多种多样。画面上往往有大片“留白”，给读者留下各种时空的想象余地。人物可多可少，近大远小，屋宇也近详远略，画面往往有近景、远景、中景多重层次，透视的原理被广泛体现。（图89）




图89

左：突破舞台范围，人物众多，空间广阔，场面复杂，此为《英雄谱》插图。右：早期金陵地区插图，往往以舞台所见为限。此为《重校千金记》。

终明一代，《西厢记》刻本有三四十种，全都有插图。最早一种是弘治十一年（1498年）京师金台岳家本，最后几种是崇祯末年张深之本、李卓吾本、魏仲雪本等。出书跨度140年，如果把这一百多年间三四十种插图排列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明代插图的历程。

徽州版画插图还有各种专门画册，如山水画册、花鸟画册、广告画册等。

从古拙到细致，再从细致中解放出来，这便是明代版画的美学历程。

第二节　活字印刷的进步

我国的活字印刷术从宋朝开始。当时的印刷品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的记录比较详细，足可作证，那便是布衣毕昇所发明的泥活字。元朝的活字印刷也有文献作证，王祯所著《农书》的附录《造活字印书法》中有详细记载，他所用的活字，有“烧熟瓦字”（泥活字）和木活字两种。他请工匠刻了木活字三万多个，印成《旌德县志》一书。王祯之后，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也曾“镂活字版至十万字”，至治二年（1322年），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到了明代，活字印刷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叶德辉说:“明以来，活字板盛行。”[1]

[1]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宋以来活字板”，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古籍中对活字的用语不一，如“泥活字板”、“泥斗板”、“澄泥板”、“磁板”、“木活字板”、“铜活字板”、“同板”、“仝板”、“铜摆板”、“铅活字板”、“锡活字板”等，所指不同。

经过许多专家的考证，明朝一代的活字图书，大约有200种左右。其中木活字约100多种，金属活字约六、七十种，泥活字有多少，尚无确证。

活字印刷集中在南直隶省的无锡、常州、苏州等地，并辐射影响到其他地方。远如广西的马平（今柳州）人计宗道，他曾在常熟做知县，卸任时带了一套铜活字回家，向乡人传授推广，可惜没有什么结果。[2]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出版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一、三种活字的制作和排版

明代活字有泥、木、金三种材质。用泥作材料的有泥活字、瓷活字，用木作材料的有枣、梨、黄杨等，用金属作材料的有铜活字、铅活字、锡活字。现分述于下。

（一）泥活字

《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发明的活字用材是“胶泥”，胶泥是什么东西，有人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混合物，由赤石脂、白矾、滑

石、胡粉、牡蛎、盐、卤、醋等合成，所谓“六一土”。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学史研究室曾做过一次模拟试验，认为并没有这样复杂。研究所用的就是附近淮南八公山上的普通粘土，共做出泥字坯6 000个，获得成功，还印了一页样张，说明泥活字所用的土就是普通的粘土。泥坯制成后，风干到适宜的程度时，就可以在上面刻字，太干或太湿都不行。

用泥坯制字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直接在泥坯上刻字，阳文反体。另一种方法是先在木坯上刻阳文反体，再印在半干半湿的泥块上，制成阴文正体的泥模。然后用这种泥模制出阳文反体的泥活字。两种方法都可以。据该研究室的试验，一人一小时可以制50多个字。

制出来的泥活字，先阴干，再“火烧令坚”（大约600摄氏度），烧出来的字便达到“坚如骨角”的程度。

据《梦溪笔谈》记载，这种泥字“薄如钱唇”，像钱的厚度一样，薄薄的一片。排印时，把一个个字摆放在一块铺着脂蜡和纸灰的铁板上，放在火上，使脂蜡稍微熔软，再用一块平板按在上面，使之固定，“字平如砥”，再刷墨印刷。印刷时，用水性的或油性的墨都可以。这个研究室用《梦溪笔谈》上的方法模拟印制出来的印品，效果很好。[1]

【1】张秉伦、刘云：《泥活字印刷的模拟实验》，载《活字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

（二）除了泥活字之外，还有陶活字和瓷活字。从化学的角度看，以粘土为原料，加热到600摄氏度是瓦器；以陶土为原料，加热到1 000摄氏度是陶器；以瓷土为原料，加热到1 300摄氏度是瓷器。三者的原料和温度不同。据记载，朝鲜有陶活字印的书。关于瓷活字，一说是用瓷土刻成字，再加热到1 300摄氏度烧成，一说是泥字上涂釉烧成。这问题至今没有研究清楚。明代没有陶、瓷活字印书的实物。清康熙年间，山东泰安徐志定用“磁板”印了《周易说略》4卷、《蒿庵闲话》2卷。有实物传世。但这两本书是用整块瓷版还是一个个瓷活字印成，尚有争论。

明代虽然没有泥活字（包括陶活字、瓷活字）的书传下来，但明代的前后都有有关的记载，所以略作叙述。

（三）木活字

明代的活字板图书中，以木活字为最多。

铜活字和泥活字的制作，可能采取先制模后浇制的方法，木活字则不可能，只有在木坯上雕刻一种方法，刻的是阳文反体，一个个字排摆起来，就可以印书。

元代王祯有一篇详细说明用木活字印书的记载，明代的木活字印书，大致也差不多。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1295年）担任安徽旌德县尹时，撰写了《农书》一书，22卷，约13万字。他想用活字来印这本书，便命人刻字，费了二年时间刻成3万多字。大德二年（1298年），先用来印《旌德县志》，获得成功。但该书没有传世。大德四年（1300年），他调任江西永丰县尹，没有来得及印《农书》，便把这副木活字带到了永丰。他撰写的《农书》后来另有人用雕版印行，并非活字。到了清代，又有人用木活字印《农书》，圆了王祯的梦。

在《农书》书末，王祯附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详细记载了木活字的制字、印刷过程大致如下：

1. 刻字　先请人写字，字距和行距要略为放宽，以便锯开，写好后反糊在整块木板上，请工人刻字。

2. 镀字　字刻好后，用细齿小锯把字一个个锯开。

3. 修字　用小刀把字修削整齐。事先要立好块规，作为准则。

4. 作盔嵌字　“盔”相当于“边框”。三面作框，右边暂空。然后在框内排字，用竹片夹住，用小木楔固定。

5. 造轮　“轮”相当于“字架”，原书有图可以参看。字架中的字分韵、编号。操作时人坐在中间，便于取字。“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

6. 取字　另编一本册子，与轮架上的分韵、编号一致。排版时，一人依韵按号“喝字”，另一人取字，一个个嵌于板盔内。摆满后，安上最后一侧的界栏，扎紧，便可以印刷。

木活字易于推行，因为木材容易得到，制作的工艺又接近雕版。一副木活字大约3万字就可以周转。以一人一小时刻10个字

估算，两个人刻150天就可以完成。以《农书》为例，原来要刻13万字，用活字只要刻3万个字，省工不少。因此，明代尝试木活字的人较多。例如南京监生胡昱制成一副木活字，印了《庄子鬳斋口义》；万历时，南京李登家有一套“合字”，用来印自著《冶城真寓存稿》8卷；嘉定徐兆稷向别人借来一套木活字，为其父徐学谟印了100部《世庙识余录》26卷。谱牒中相同的字极多，用木活字印谱牒最相宜，到了明末，还用木活字印政府的“邸报”。（图90）

图90
木活字书《世庙识余录》，嘉定徐兆稷摆印。

（四）金属活字

文献中提到的金属活字有锡活字、铅活字、铜活字三种。其中锡、铅两种推行不广，又没有实物传世，只有少量文献记载，这里先叙说一下。

锡活字　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中提到：“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

铅活字　陆深《金台纪闻》：“近日毗陵（即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1]

【1】［明］陆深：《俨山外集》，卷八《金台纪闻》下。

铜活字　金属活字中形成一定规模的是铜活字，明弘治至万历前后约80年，是铜活字的黄金时代，地区遍及无锡、常州、苏州、南京、杭州、建宁、广州，数量达七八十种，两千多卷。

关于铜活字的制作和印书，有两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铜活字是如何制作的？一种猜测是先制作铜坯，再在上面刻字（阳文反体），刻成的字就可以排版印书。另一种猜测是制模后浇铸。即先在木坯上刻字（阳文反体），再把这种木字

在泥模上翻阴（阴文正体），然后在泥模中浇铜液，制成一个个字（阳文反体）。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制造出铜活字，因为没有实物传下来，无从鉴别。多数认为是浇铸的。因为铜坯太坚硬，不容易奏刀，而浇铸技术并不困难。从文献来看，既有“范（模子）铜板锡字”（明华渚撰《华燧传》）的说法[1]，也有“镌（刻）活字铜板”（弘治末唐锦说）的说法。即使是清代的事，也同样搞不清楚。康雍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说是“刻铜字为活板”，而包世臣、吴长元、龚显曾却说是“铸成”。

[1]《说郛》卷十七《梦余录》中有唐锦语：“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转引自张秀民：《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载《活字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

另一个搞不清楚的问题是：会通馆的活字，究竟是铜质还是锡质？过去一般都认为是铜字。1980年，南京图书馆潘天桢认为，无锡会通馆活字本是锡活字。[2] 主要根据是在四篇有关华燧的传记上，都提到“铜板锡字”四个字：

[2] 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刊《江苏图书馆工作》198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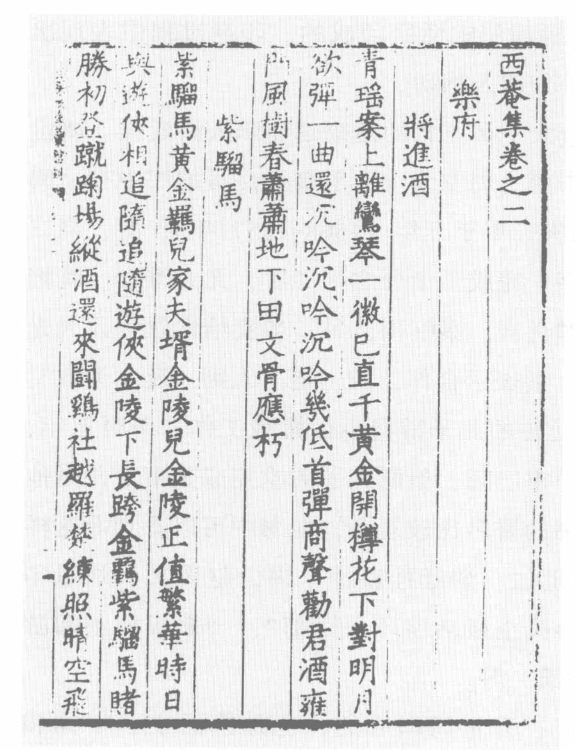
1. 明末清初华渚《勾吴华氏本书》说：“既乃范铜板锡字。”

2. 嘉靖十一年（1532年）华从智刻《华氏传芳集》卷十五中邵宝撰《会通华君传》说：“为铜板锡字。”

3. 上书同一卷中，还有一篇明乔宇撰的《会通华处士墓表》说：“范铜为板，镂锡为字。”

4. 清初刻本华允诚等修《华氏传芳集》卷四《会通府君宗谱传》说：“为铜板锡字，翻印以行。”

潘天桢认为，“铜板锡字”的意思是用铜作底板，上面摆锡质的活字。因为底板和字的材料往往不同。如《梦溪笔谈》中提到的毕昇的活字板是“铁板泥字”，清武英殿聚珍版是“楠木板枣木字”。潘天桢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既没有赞同的文章，也没有反对的文章。大概是缺少实证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所谓“铜板锡字”四字，是四篇有关华燧传记的文章中录出的，这四篇文章文字相似，显然同出一源。而传世的会通馆活字本书上的识语或牌记，却全都写作“铜板活字”，没有一种书上有“锡”字。所以，迄今为止，印刷史上还是把会通馆活字作铜字看待。（图91）



西菴集卷之二

樂府

將進酒

青瑤案上離鸞琴一徽已直千黃金開樽花下對明月

欲彈一曲還沉吟沉吟沉吟幾低首彈商聲勸君酒莫

門風樹春蕭蕭地下田文骨應朽

紫騮馬

紫騮馬黃金羈兒家夫壻金陵兒金陵正值繁華時日

與遊俠相追隨追隨遊俠金陵下長跨金羈紫騮馬睹

勝初登蹴踘場縱酒還來鬪鷄社越羅練照晴空飛

太平御覽卷第十一

天部十一

雨下

雨下　祈雨　霽

河圖帝道紀曰雨者天地之施也

遁甲開山圖曰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榮氏解曰雲師如蠶長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蠶長七八寸似蛭雲雨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

又有鄭有不毛山上有無爲之君分布雲雨於九州之内榮氏曰不毛山不生草木古無爲之君常處其上布慶雲甫九州之内平均之者

河圖秘徵真若急恚怒無雲而雨

黃帝素問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

图91（左）
早期铜活字书《西庵集》，弘治十六年（1503年）无锡金兰馆摆印。

图92（右）
明代规模最大的一部铜活字书《太平御览》1 000卷。万历二年（1574年）周堂、饶世仁、游廷桂等摆印100部。

二、几部特大型铜活字书

提到活字印刷，不能不介绍无锡的华氏和安氏。这二人的材料，详见本书第六章，不再赘述。下面介绍福建游氏、饶氏用铜活字印《太平御览》的情况，因为这部书篇幅巨大，摆印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且显示了古代出版人的感人精神。(图92)

宋代有四部诏令纂修的大书：《太平御览》1 000卷、《册府元龟》1 000卷、《文苑英华》1 000卷、《太平广记》500卷。这四部书篇幅太大，刻印次数都很少，中断了三四百年，到了明代，都由福建重新印了出来。《文苑英华》是福建巡按胡维新集中福州、泉州的力量完成的，名将戚继光也参与其事，前后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出版。《册府元龟》是福建巡按监察御史李嗣京组织力量，用8个月时间完成的，有数十人参与校勘，崇祯十五年（1642年）完成。《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两书则是福建用铜活字印成的。印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荜路蓝缕精神，十分使人感动。

发起用铜活字印《太平御览》的是福建建阳人游廷桂、饶世仁二人，他们大概是书商（周堂为《太平御览》写的序中有“闽贾饶世仁”之语）。隆庆二年至五年（1568—1571年），游、饶二人到无锡请人制作铜字。完成了十分之一二后，无力继续。就把一半铜字卖给当地人顾肖岩、秦虹川，另一半卖给常熟解元周光宙。周决心续印，顾、秦表示合作，游、饶二人则“反主为奴”，做“摆排”工作，游廷柱的儿子游榕也做排版工作。历时七年，终于完成。这时，周光宙已死，他的儿子周堂完成其事，并由他写了序。因此，这本书的署名比较复杂，在书中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写法：“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排，锡山赵秉义、刘冠印行”、“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部”、“宋板校正闽游氏”、“宋板校正闽饶氏”等。

《太平广记》是隆、万年间印成的，也是铜活字，字体和《太平御览》完全相同。还有《异物汇苑》18卷，牌记“建阳游榕活版印行”；《文体明辩》84卷，题“建阳游榕活版印行”。这两部书都是万历年间印的，字体也和《太平御览》相似，可能出于同一套铜字。

三、铜活字图书一览

明代活字图书中，铜活字书比较少，著录比较完全；木活字书数量较多，但著录不全。现将目前所知所有铜活字书全部列举于下。大体上按地区、人物、年代排列。

以下无锡华燧会通馆印书

1.《宋诸臣奏议》150卷　弘治三年（1490年）印50册，华燧序。印刷质量较差，书中错误也多，《书林清话》称其“缪误不可枚举”，“不思字句之不贯，不顾文义之隔绝”。[1] 这是第一部传世的铜活字书。

2.《锦绣万花谷》100卷　弘治五年（1492年）题“会通馆活

【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明锡山华氏活字板”，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字铜版印行”。

3.《锦绣万花谷》《前集》40卷、《后集》40卷、《续集》40卷　弘治七年（1494年）题“会通馆活字铜板印”。

4.《容斋五笔》74卷　弘治八年（1495年）题“会通馆活字铜版印”，有华燧序。

5.《文苑英华纂要》84卷　正德元年（1506年）会通馆铜活字印本，有华燧序。

6.《文苑英华辨证》10卷　正德元年（1506年）印。

7.《古今合璧事类》《前集》69卷、《后集》81卷、《续集》56卷、《别集》94卷、《外集》66卷　弘治八年（1495年）会通馆铜活字印本。

8.《百川学海》　弘治九年（1496年）会通馆铜活字印本。

9.《校正音释春秋》12卷　弘治十年（1497年）题“会通馆活字铜版印”。

10.《校正音释诗经》20卷　弘治十年（1497年）题“会通馆活字铜版印”。

11.《九经韵览》14卷　弘治十一年（1498年），华燧著，题“会通馆活字铜版印”。

12.《盐铁论》10卷　弘治十四年（1501年）题“会通馆活字铜版印”。

13.《校正音释书经》10卷　弘治十八年（1505年）题“会通馆活字铜版印”。

14.《十七史节要》　弘治十八年（1505年），华燧著。

15.《纪纂渊海》200卷　弘治间印。

16.《会通馆校正选诗》　见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

17.《校正音释易经》4卷。

18.《书经诗经白文》。

19.《君臣政要》　正德元年（1506年）印。

以下无锡华坚兰雪堂印书

20.《白氏长庆集》71卷　正德八年（1513年）题“兰雪堂华

坚活字铜版印”。

21.《元氏长庆集》60卷　正德九年（1514年）题“兰雪堂华坚活字铜版印”。

22.《玉台新咏》10卷　正德九年（1514年）无锡华坚兰雪堂印。

23.《蔡中郎集》10卷、《外传》1卷　正德十年（1515年）题“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版印”。

24.《艺文类聚》100卷　正德十年（1515年）题“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版印行”，尾页有华坚之子华镜所写后序。

25.《春秋繁露》17卷　正德十一年（1516年）题“正德丙子季夏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版校正印行”。

26.《意林》5卷　正德间印。

27.《史鉴》　弘治、正德间印，《宝文堂书目》著录，可能是铜活字。

28.《晏子春秋》　弘治、正德间印，《宝文堂书目》著录，可能是铜活字。

29.《广成集》12卷　正德十年（1515年）印。

以下无锡华理印书，亦用“会通馆”名义

30.《渭南文集》50卷　弘治十一年（1498年）无锡华理会通馆铜活字印本。

31.《剑南稿》8卷　弘治十五年（1502年）版式与《渭南文集》同。

以下无锡安国印书，用“松坡馆”名义

32.《东光县志》6卷　正德十六年（1521年）南京吏部尚书廖纪托安国用活字印，是我国第一部用活字印的地方志。

33.《吴中水利通志》17卷　嘉靖三年（1524年）题“嘉靖甲申锡山安国活字铜版刊印”。

34.《重校魏鹤山先生大全》110卷　嘉靖三年（1524年）题“锡山安氏馆”、“锡山安国重刻”。

35.《颜鲁公文集》15卷、《补遗》1卷、《附录》1卷、《年

谱》1卷　嘉靖二年（1523年）题“锡山安氏馆”，另有木刻本。

36.《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69卷、《后集》81卷　嘉靖间印，题“锡山安国校刊”、“锡山安氏馆”。

37.《初学记》30卷　嘉靖间印，《天禄琳琅》提及此书。

38.《春秋繁露》　有钱受之跋。

39.《五经说》7卷　嘉靖间印，题“安桂坡刊”。

40.《熊朋来集》。

41.《石田诗选》　正德间印，题“明沈周撰，华汝德选，明正德无锡安国重刻本”，华汝德即华珵。

其他地区所印书

42.《国朝文纂》50卷　隆庆六年（1572年），题“江右居无锡吴梦珠独排”。

43.《杜氏通典纂要》　《晁氏宝文堂书目》注“常州铜板”。

44.《艺文类聚》　《晁氏宝文堂书目》注“常州铜板”。

45.《石湖居士集》34卷　弘治十六年（1503年），苏州金兰馆铜活字本。字体秀劲，版式疏朗，印制精雅，被认为明活字的代表。

46.《西庵集》10卷　弘治十六年（1503年），苏州金兰馆铜活字本。

47.《玉台新咏》10卷　嘉靖间印，题“五云溪馆活字”。

48.《襄阳耆旧传》1卷　嘉靖间印，常熟五云溪馆铜活字本。

49.《唐五十家诗集》158卷　正德四年（1509年）东山大学士王鏊之婿徐缙辑，题“吴门崦西林舍活字本”。

50.《王岐公宫词》1卷　嘉靖间常熟杨仪印，题“五川精舍活字印行”。

51.《阴何诗》1卷　弘治十五年（1502年）印，都穆《阴何诗跋》称:“阴何诗一帙，里人孙凤用活字版印之。”

52.《曹子建集》10卷　正德五年（1510年）印，铜活字印本。

53.《开元天宝遗事》2卷　出版时间不详，题“建业张氏铜板印行”。

54.《墨子》15卷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版式堂皇，蓝印。题“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铜板活字”。芝城即福建建宁。

55.《通书类聚克择大全》　嘉靖三十年（1551年），与上书字体相同。题“嘉靖龙飞辛亥春正月穀旦芝城铜板活字”。

56.《太平御览》1 000卷　万历二年（1574年）题“宋版校正闽游氏仝版活字印一百部”，又题“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排，锡山赵秉义、刘冠印行”。

57.《文体明辩》84卷　万历元年（1573年），题“建阳游榕活版印行”，字体与上书同。游榕是游廷桂之子。

58.《太平广记》500卷　《目录》10卷　隆庆至万历间印，字体与《太平御览》同。

59.《异物汇苑》18卷　万历间印，字体与《太平御览》同。题“建阳游榕活版印行”。

60.《思玄集》16卷　万历三年（1575年），桑大协印。

61.《海叟集》4卷、《外集》1卷　明初人袁凯所著，隆庆四年（1570），松江人何玄之以铜活字印，第四卷第十八页第五行“冷”字横排，证为活字。

62.《松筹堂集》12卷　万历元年（1573年），杨循吉著，上海顾从德用活字印。

63.《世庙识余录》26卷　徐学谟著，徐兆稷用活字印。（又有木活字本）。

64.《庄子鬳斋口义》　正德十三年（1518年），南京国子监生胡旻印贾泳所藏古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为“铜活字印本”。

65.《诸葛孔明心书》1卷　正德十二年（1517年）题“浙江庆元学教谕琼台韩袭芳铜版印行”。

四、活字印刷的发展为何滞缓

我国的铸铜技术始于商代，到了明代，翻铸工艺十分精致，

制作铜活字不是难事。排版、校勘、取平、用墨等等一连串工艺，也都能解决。明代最早的一本铜活字书，是弘治三年（1490年）出版的《宋诸臣奏议》，制字和排印的质量都很差。十多年后，弘治十六年（1503年）苏州出版的《石湖居士集》进步很大，印制精雅，被作为“书林雅赏”。

明末，活字书在数量上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木活字书有100多种，铜活字书有数十种，两种合起来，占出版物总量的百分之一。到了清朝，大体上也是这个比例。活字印书，不但能印一二卷的小本子，而且可以印多达500卷、1 000卷的大书。活字印书的优越性，已经十分明显地显示出来。这两个情况说明，活字印书，特别是铜活字印书，最初可能是“好事者”炫奇的“雅玩”，后来却已经成为一种实在的生产力。

为了作历史的考察，我们再看一下清代的活字印书情况。因为资料不全，只有江苏一地的数据。据江澄波《江苏活字印书》一书的著录，整个清代，江苏地区活字书有885种，其中铜活字书只有2种，泥活字书3种，木活字书635种，还有245种是光绪年间的现代铅活字印的。[1] 这份统计材料说明，清代的活字书主要是木活字，铜活字书几近绝迹。

那么，在明代以及后来的清代，活字印的书为什么不能取代雕版而成为出版印刷的主流呢？不少学者都关注过这个问题，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

史学界认为，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限制是根本原因，而中国文字的众多和雕版技术的成熟，则是重要的因素。古代图书，有“一朝刻版，几代沿用”的特点。例如南宋雕刻的史书，明初还可以调集起来，略事补版后，仍用来印十七史。明代书林印书，也是小批量多次重印，都显示了雕版的长远保存价值。经过精心制作的书版，如果只印了一二百部就要拆版，以后无法再印，浪费实在太大。

再拿图书的质量保证来说，雕版比较有利于保证质量。雕版的质量关键是“书写”这个环节，写好后可以校正，再反贴在木

[1] 江澄波：《江苏活字印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板上开雕，不大会出错。活版印刷就大不一样，拣字难度很大，极容易出错。清朝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起初用6个人拣字，一人一天只能排2版（大字）或1版（小字），不得不增加到24人。雕版工艺单纯，工场的条件不高，管理简单，甚至可以家庭作业，不像活版那样要相当大的场子。

从经济方面看，活版的首次投入工量大，费用多，雕版则工量小，费用少。大量的私刻往往只印一二种书，每种印一二百部，赠送亲友，更不宜用活字来印。

还有一层不容忽视的因素，活字版一般只能用单一的字体(当时都是宋体)，如果想增加一种字体，就要另刻一套，工程浩大，而雕版则比较灵活，可以用名人“手书上板”，以示“书刻之妙”。传世的活字书，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宋体字，十分呆板。

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活字印刷的命运和中国大致相同。16世纪末，日本的丰臣秀吉率军队侵入朝鲜，夺取了一些版本和铜活字，尝试用这些铜活字印书，没有成功。此后，德川家康和后水尾天皇学习朝鲜铜活字技术，分别于1605年、1621年铸造铜活字，出版了几种铜活字书，但没有持续下去，仍回到了以雕版为主流的轨道上去。[1]

【1】〔日〕矢作胜美:《汉字文化圈中凸版印刷术的交流》，载《出版史料》，1999年第2期。

第三节　彩色印刷的进步

彩色印刷是人们长期的追求，印刷术发明之初，彩色印刷也随之萌芽。留下来的实物有唐代的佛经和宋代的纸币。20世纪40年代，发现了元朝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江陵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解》，这个印件红黑二色，经文黑色（一部分经文印红色，黑色印小字），卷首的灵芝和文中的图画印红色。这是最早的套印书。

到了明朝，特别是在明朝的后期，彩色印刷有了新的进步。下面从使用的工艺和印件品种两方面来分析。

一、明代彩色印刷工艺

在雕版印刷的工艺条件下，要想取得印刷品的彩色效果，只有“敷彩”和“套印”两种方法。

（一）敷彩　又称“涂彩”、“着色”，其方法是先雕制一块黑色的单线轮廓图，用黑色印出来，然后在印品上填敷不同的彩色。佛像和民间吉祥画常采用这种方法。这是最简单容易的办法，是印刷术和手工作业的结合。

（二）套印　又称“套版”。在同一版面上，要想取得几种颜色的效果，便分刻几块版子。印刷时，不同的版子分别一次次印不同的色彩。用色有两色、三色，多的有四、五、六、七色不等，七色以上未见到过。这种方法可以印文字，称“套印本”；也可以印图画，精致的图画品就是所谓“饾版”。

除了以上两种基本方法外，还有一种叫做“彩印”。其制作工艺是只用一块“主版”。印刷时，在主版上敷上不同的色彩，而且分出深浅。例如在花朵上敷上深深淡淡的红色，在叶子上敷上深深淡淡的绿色，乘颜色没有干的时候，用白纸覆上去拭印，可以得到特殊的色彩洇渲的效果。这种印品的操作者实际上是在版面上运笔着色，必须有一定的绘画功夫。这一类印品有万历时的《花史》一书，另外《程氏墨谱》中也有一部作品用这种方法（如《巨川舟楫》等幅）。这种印品的书不多，因此常被人忽视。郑振铎认为应该专门称之为“彩印”，以免和“套印”相混。

还有一种“分色印”的方法。即只有一块底版，上面既有文字又有图画，文字和图画界分清楚，有一定距离。印刷时，文字部分涂黑色，图画部分涂红色，再用白纸覆上去印，就成为有红黑两色的印件。常用于印佛经。

二、明代彩色印刷的品种

明代人把彩印工艺运用到不同的出版物上，出现了多种彩印品，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敷彩年画

明代的年画大都用敷彩的方法着色。先印出黑色的轮廓线，再用笔醮颜色涂敷，取得彩色效果。这种年画的印制后来也发展为用几块版子，向“套印”的方向发展。印好后往往还要在细部作补充描饰。据介绍，朱仙镇的年画有多至用八九块版子的。现在存世最古的一幅年画，苏州杨柳青在万历年间刻的一幅《百寿图》，也是分版套印的。所以，年画往往是“敷彩”和“套印”相结合的，即印刷和手工相结合。

（二）套印书

套印的工艺使用在文字图书上，印出的书称“套印本”。最善于刊印套印书的是吴兴（湖州）的闵、凌两姓。他们二人所刻书，“纸张洁白，采色斑斓，能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但一书而用数书之费，非有巨资不克成功。有时流入滥调，经传词曲，概以批尾之术施之，有伤品类”。[1]

【1】陶湘：《明吴兴闵板书目》序，载《书目丛刊》（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三）饾版和拱花笺谱

饾即饾饤，原意是用五色小饼作成花卉、宝物、禽鸟的形状，堆叠在盘盒中。“饾版”借用这个意思，意为用几块乃至几十块大小不等的版子，拼合印制成为一幅图画。

饾版的印制过程是先选定一幅画稿，再根据原稿的用色和深浅浓淡阴阳，分刻几块版子，版子刻好后按照画稿的位置固定在案上，再根据原作的色调，由淡到深，一版一版，一次一次地印刷，多至十余次或数十次，最后成为一张和原作相似的印刷品。

如果在刷印时不敷色，加上纸张后，加以砑压，印出来的东西只有凹凸感，没有颜色，像是钢印的效果，这便是“拱花”。也可以拱花和饾版相结合，在印出来的彩印品上，再加上一道拱花，则既有色彩，又有凹凸感。适宜用于羽毛、浮云、水波、花朵。往往用来印信纸、诗笺，作为文房雅玩。

三、饾版精品

(一)《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

饾版的创始人是胡正言，代表作是《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

胡正言（1584—1674），海阳（今安徽休宁）人，字曰从。善于制墨，精篆刻，以摹印驰名于世。著有《六书统要》、《篆法偏旁正伪歌》、《印存初集》、《印存玄览》等书。

《十竹斋书画谱》是天启七年（1627年）出版的。包括八类艺术作品：书法和彩绘、花卉、鸟类翎毛、梅、竹、兰花、果品及怪石等，共160幅，每幅都有名人题句。出版的原意是“供幽人韵士之癖好者”，同时也作为学画者的师法。

《十竹斋笺谱》是在《书画谱》出版后17年印行的，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当时社会上所用的信笺，上面往往印有套色的图画，称为“彩笺”、“诗笺”，大都粗制滥造。胡正言看了不满，思有所提高，便请画家绘制底稿，又请名匠镌刻、印制，成为雅致的艺术品。把这些信笺汇集起来，印成一本书，供欣赏之用，便是所谓的“笺谱”。《十竹斋笺谱》共4卷，284幅。在印制这本“笺谱”时，除了继续使用饾版的技术之外，又增加了拱花的新工艺。《十竹斋笺谱》是饾版和拱花两种工艺兼用制成的。

这两本画册的编者是胡正言，图画是请当时有名的画家绘制的，如吴彬、吴士冠、倪瑛、魏之克、高之璜、米万钟、文震亨、高阳、高友等人，刻工是胡正言从家乡徽州请来的，他和刻工、印工们“不以工匠相称”，“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这两部画谱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同时代人、著名画家杨文骢在序中说：“胡曰从氏巧心妙手，超越前代，以铁笔作颖生，以梨枣代绢素。而其中皴染之法，及著色之轻重浅深，远近离合，无不呈妍曲致，穷巧极工，即当行作手视之，定以为写生妙品，不敢作刻划观。”另一位写序的李克恭，指出了这种饾版制作时

的困难，他说："饾板有三难：画须大雅，又入时眸，为此中第一义；其次则镌忌剽轻，尤嫌痴钝，易失木稿之神；又次则印拘成法，不悟心裁，恐损天然之韵。去其三疵，备乎众美，而后大巧出焉。"他指出饾版需要画、刻、印三者配合，三者都达到上乘，才能得到好的作品。

当时有一批人，自己画图稿，雕版和刷印都自己动手，不失原意。人称他们"十指皆工具"。敷色刷印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手法。例如要印一张花瓣，先用淡红色印一次，趁木版还没有干的时候，再在木版上施一点深一些的红色，再印一次。印出来的效果有深淡晕染的效果。这种工艺称为"撢"。现在荣宝斋的水印木刻，就深得此中三昧。

（二）《萝轩变古笺谱》

胡正言首创饾版和拱花，这个说法，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但在1963年，上海博物馆收到一部《萝轩变古笺谱》2册，作者吴发祥，江宁人，住在南京城南牛首山，志趣高雅，学问该博，能诗画，富收藏。这本书也是用饾版和拱花两种工艺制成的。出版于天启六年（1626年），比《十竹斋书画谱》早1年，比《十竹斋笺谱》早18年。于是，在版画界引起了讨论，有人认为要"重写版画史的有关章节"，把饾版和拱花的发明者改为吴发祥。

关于这个争论，潘天桢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潘氏说，胡正言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91岁；吴发祥生于万历七年（1579年），卒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80岁。吴发祥早生5年。二人同时生活在南京的时间达50年；他们二人虽没有互相直接交往的史料，但有一些人是二人共同的书画朋友，如吴士冠、顾梦游等。他们所印的"彩笺"，已经流行好些年代，其技术无保密可言。所以，潘氏认为，二人都用了饾版，难分先后。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万历末年至天启之间，南京的画家、木刻家和印刷巧匠合作，在传统的版画、套印和彩印技术的基础上，发明创造了饾版、拱花彩色套印法，吴发祥、胡正言在南京首批运用这项新技术，印成了精美无比的彩

笺，在世界印刷史上增写了一页光彩夺目的新篇章。”[1] 这个论断，是令人信服的。

饾版和拱花是印刷工艺的精品，在当时这种生产条件下，技艺发挥到了极致，对我国有深远的影响，清代的《芥子园画传》一脉相承，近代鲁迅和郑振铎等又大力提倡，印了《北京笺谱》等书。北京的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继承发展了饾版工艺，印出了可以乱真的艺术品。饾版对日本的浮世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潘天祯:《明清之际南京的彩色套印版画集》,《江苏出版史志》第3期,1990年。

第十章 明代图书的经营、流通和收藏

古代图书的流通形式，一部分采取颁发的方法，一部分采取商品销售的方式。到了明朝，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商人、市民大量增加，图书的读者面扩大，图书流通中采取商品流通的部分大大增加，出版者和读者之间，渠道纵横密布，产生了聚书地、书市、坐商、异地设店等多种流通方式。陆地上有骡马车辆，水路有专事贩书的书船，还有一批特种书商，出入藏书家的门户，专事访求异书善本。

图书市场的形成和成熟引发了激烈的商业竞争。竞争的积极效应是推动作者和书坊编刊新的图书品类，改进印刷技术和发行方式；竞争的消极效应是出现了以牟利为务的书商，他们印制了作伪低劣的图书，泛滥书坛。版权意识在这时萌生成熟，“翻刻千里必究”成为书坊的行业习语。

出版事业中，藏书有特殊的作用。编书往往以丰富的藏书为前提，藏书是出版的准备和基础；而出版的图书又要靠藏书家来收藏保存。所以，藏书既是出版事业的开端，又是出版成果的归宿之所。明代有大量藏书家、藏书楼，成为出版繁荣发达的见证。

第一节　明代读者群和图书市场

一个时期出版事业的规模，除了文化本身的需要之外，同时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和图书市场的大小决定的。

首先来看，明朝有多少读书的人。这里研究的是读者数量最多的以及有特色的几类。还有一些常规的情况，如僧道和宗教书、医生和医药书、官吏和刑政法令书等，不再赘述。

一、蒙童和蒙学图书

出版事业中最大的读者群是蒙童，销售量最多的读物是蒙学读本。明代有多少学童，未见记载。可以从人口统计的基本数字进行推算：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有1 065.2870万户，6 054.5812万人；中叶弘治四年(1491年) 间有911.3446万户，5 328.1158万人；晚期万历六年(1578年) 有1 062.1436万户，6 069.2856万人。(另据清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嘉、隆年间有1 113.4万户，5 578.3万人。) 这些数字并不确切，王世贞曾批评明代的户口统计数字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1] 但是在没有其他可靠的数字时，也只能将就一用。

按照人口结构的常规，人口总数中一般有15%是学龄儿童，那么，明代的学龄儿童约是八九百万人。学龄儿童并不是人人都上学，明朝之初，曾规定35户要设一个"社学"，又曾规定15岁以前儿童必须上学，但这两点未必做到。在校的学生数有多少，很难有确切的估计。

在校学生要的是些什么书呢？各个年龄段的用书是不一样的。这就牵涉到明朝的教学大纲问题。

明朝的政府或民间，都没有拟订"教学大纲"。一般说，学习的第一步是识字，第二步是读"四书"，与一部分经书、习字、作对、作诗文，再进而读应举文字。一部分学生只读了第一步，

【1】《弇州史料后集》卷60。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六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略识之无，便不再进入第二步了。

元朝初年，有个叫程瑞礼的人，订了一份《读书分年日程》3卷。拟订了学童逐年读书的次序。元政府把这份“日程”颁行郡邑校官，作为模范，明代也将其奉为圭臬，清代的陆陇其竭力推崇这份“日程”，刊刻流传。元明清三代的初等教育，实际上和这个“日程”是一致的。这份“日程”规定的教学科目和用书计划是：

八岁以前：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目的是识字。或以《性理字训》代《千字文》，又以《童子须知》贴在壁上，每天记说一段。

八岁至十五岁：先读《小学》，次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刊误》。

十五岁以后：读《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或问》、《论语或问》、《孟子或问》，次读《易经》、《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经》（并“三传”）。读完“五经”后，每五天之内，用三日读史，二日温习“四书”、“五经”。读史的次序是先《通鉴》，参看《纲目》；次《史记》、《汉书》、《唐书》、《唐鉴》；再次读“韩文”和“楚辞”。

二十岁左右，温习上述书籍，并用二三年时间专门学做文章。

这份计划所学的内容，便是童蒙类图书销售的品种。[1]

明代刊印这种童蒙书的出版机构极多，其中印得最多的当是“三、百、千”之类，还有与此相辅的书，如《日记故事》（有郑世豪刊本、建安刘氏刊本等多种）、《五官训解故事》（西清堂刊本）、《类纂皇明新故事》（刘友田刊本）、《古今幼学联珠统宗故事》（金陵王氏刊本）等。

[1]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二、士人和科举图书

明朝的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中央在京师和南直均设立的有国子监即太学，是大学性质。学生最多时有数千人，永乐二十年（1422

年）达9 900多人，后来虽逐渐减少，也还有上千人。中央所设还有武学、医学、阴阳学，都是专科学校性质，还有一种宗学，专收宗室子弟，则是贵族学校性质。

地方设立的学校有府、州、县所设的府学、州学、县学，统称“儒学”。全国共有140个府、193个州、1 138个县，则地方学校约有1 500所。各个卫也设立学校，大都是二三个卫，或三四个卫合起来办一所学校。全国有493个卫，则卫所设的学校约有近二百所。据《明史·选举志》记载，“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明初，曾确定生员的数目“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教员加上弟子，这一大群人，是科举图书的重要购买者。

最基层的学校称“社学”。据《盐城市志》记载，今江苏盐城市境内，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有社学26所，有正学、建西、陆公三个学院。[1] 至于全国社学数和学生数，未见统计数字。

【1】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盐城市志》，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99年。

当时文教事业很兴旺，《明史·选举志》上说：“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

以上各类学校初年级所用的图书，和上面一小节所说是一样的，到了高年级，或专科学校中，则要增加不同的图书。例如国子监要学刘向的《说苑》和律令、书、数等；宗学要学《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武学要学《百将传》等。

明代实行科举制度，270多年时间一直是“三年大比”，科举考试科目规定的图书，当然成为有明一代常印不衰的、有很大市场的图书品种。科举中所作的文章，也就成为出版的畅销书。

至于考试录取的人数，洪熙时规定，乡试录取南京80人，北京50人，各省则10至50人不等。总数在500人左右。后来陆续增加，总数不超过2 000人。中央一级的会试，录取人数最少为一届32人，最多472人，每次都是临时决定。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确定以300人为常。三级考试录取的人虽不多，但是所有读书人都攒集在这少数名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人群。他

们是图书市场的重要读者，不少出版物都以他们为对象。

士人群所需的图书有以下各类：1. 各种考试规定科目的图书，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以及对这些五经四书的阐释。2. 各级考试的优秀答卷汇编，以及答卷的评点和揣摩猜测。这类图书出得很多很快。3. 每次考试过后，出版《登科录》和《会试录》等。

士子们应试，必须揣摩当时的风气，读些成名举子的八股文章，因而应时的制艺文章便成为书贾刻版的目标。编辑这类图书的著名人物有苏州松江一带的陈子龙、夏允彝以及复社、几社中的人物，江西的艾千子、陈际泰、罗万藻等。影响最大的“选本”如：

《几社六子会义》，由夏允彝、杜仁趾、徐孚远、陈卧子等6人选编。

《复社国表》，张天如、周介生编。该书收百余人的作品二千五百余首。此书印得很多，“金阊书贾由之致富”（见眉史氏《复社纪略》）。

《壬申文选》，作者11人，仿《昭明文选》体例。

《几社会义初集》，从社员的优秀文章中选出，徐孚远批评选辑。以后又陆续出了“二集”、“三集”，直至“五集”，这套书被称为“天下第一书”。

此外还有艾千子的《艾选》、陈正史的《五十大家》等。[1]

这些书都“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

【1】吉少甫：《明代苏松几社的选家》，《出版史料》，1992年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

三、市民和通俗读物

通常把住在城市中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各种杂役的人称为市民。自从有了城镇，就相应的有了市民。

最初的市民是些什么人呢。且看洪武四年（1371年）南直隶常熟县的统计：全县62 285户，247 104人；其中有匠户1 456户。这一千多户匠户中，“轮班赴部存留本府织造各色”857户，他们名义上是应该到南京部里去“轮班”服役的，实际上仍旧留在

本地“织造”。还有559户则从事各种非农业的职业，书中列举这些职业有41种，如僧户、土工、竹匠、石匠、染匠、裁缝、挑花匠、穿甲匠、造船匠等。[1] 从这41种职业来看，这时还处于农业自然经济的状态。到了明朝的后期，城镇的数量增加了不少，市民的数字激增，市民从事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

下面以吴江县为例：吴江在明弘治时有7个镇，正德时仍是7个，嘉靖时增加到14个。再看这些市镇的人口数。县城：元末不足千家，成化、弘治间“增至二千余家”；八斥：明初数十家，“嘉靖间二百余家”；黎里：元代才有聚落，成化、弘治间，“居民千百家”；檀邱：明成化时居民四五十家，“嘉靖时数倍于昔”；震泽：元代居民数十家，明成化时三四百家，“嘉靖时倍之又过”。[2]

其中最值得提出来的是盛泽镇。这个镇的资料常被研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引用。盛泽处于江苏、浙江交界处，“可吴可越”，春秋吴越争霸时屡有激烈战事，因此比较荒芜，三国时还称“青草滩”，人口稀少。南宋时，该地处于临安至苏州的中点，和苏、杭、湖、松这几个最富庶的城市相距都是百里左右，离南京也只有600余里，而且水陆都可以通行。由于地处枢纽地带，商业经济很快发展起来，［乾隆］《吴江县志》上说：明代的盛泽热闹非凡，“四方大贾远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辇金至者无虚日”。“舟楫塞港，街道肩摩”。镇上兴起了许多“会馆、旅邸、歌楼舞榭，繁阜喧盛，如一都会焉”。“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苏州）阊门埒”。这种新注入的贸易经济，便是治史者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

由于业务的需要，这一批市民中识字的人比较多，但文化程度又不太高，通常所说的“市民”，就指这一些人。他们希望从图书中认识世界和社会，寻求人生的真谛和伦理准则，解决思想、生活、职业上的种种问题，他们是出版业面临的新的读者群。为这批读者出版的图书，大致有以下这些。

1. 政府法令：如《昭代王章》(内有《大诰三编》等)、《仕民

【1】［万历］《常熟县私志》卷三“叙户”。

【2】［乾隆］《吴江县志》卷三。

悬镜》(政策法令和契约格式)。

2. 经商用书：如《士商必要》、《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宝货辨疑》、《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

3. 文史科技常识：如《史学提要》、《古今舆图指掌》、《鲁班经》。

4. 日常生活用书：如《万事不求人》、《万宝全书》。

5. 小说戏曲杂唱：如《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西湖二集》。

6. 卜筮、情色图书。

第二节　图书的流通渠道和聚书地

出版的图书到达读者手里，有两条主要渠道。一条是非商品的渠道，直接由主印者分发给读者。例如国子监印的经史典籍发给各级儒学，经厂印的佛藏、道藏发给寺院，内府印的政令、法典发给各级政府和藩王，钦天监印的历书发给地方政府和奉行明历的周边国家，邸报发给有关部门等。这些书没有定价，不经过图书市场，不具备商品的性质。另一类是作为商品流通的，经过图书市场，有定价，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到达购书者手中。本节讨论的是后一种情况。

一、书店、书市

图书流通最基本的形式是开设书店，当时称书坊、书林、书铺。起初，刻书和卖书是结合在一起的，刻印者兼营销售，刻书集中的地方，也就是书店集中的地方，店主即刻书者。例如福建建阳的麻沙、崇化两地既是刻书集中之地，又开设着数百家书店，明末福建长汀的四堡乡有书店一百家以上，直隶武强地区开设刻印兼销售的作坊140家，直隶北楼神马刻印作坊有数十家，贩卖者上百人。

在这种刻印和销售兼营的集中地，甚至有买卖图书的定期集

市贸易。福建建阳“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1] 这种书市沿袭数十百年不衰。康熙年间还有这样的记载：“是日，里人并诸商会聚，各以货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谓之墟，而惟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2]

【1】［明］冯继科：［嘉靖］《建阳县志》卷三。

【2】［清］柳正芳：［康熙］《建阳县志》卷三。

二、聚书地

除了上面所介绍的刻书地和销售地结合在一起的形式之外，还有互相分离的形式，那便是城市中出现的“聚书地”。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常有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如米粮集散地、木材集散地、药材集散地等。集散地并不一定是产地，以便于集中和分散为形成的条件。聚书地在明朝开始出现并趋向成熟，这是出版产业内部分工细致的标志。“聚书地”，即书籍的集散地，往往在大城市中。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中详细地记载了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四个地方的情形。

北京的情形是：“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凡徙，非徙其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架而书置焉，若綦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地可罗雀矣。”

杭州的情形是：“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于，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于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南京的情形是：“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

苏州的情形是：“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到，聚书地形成的条件大致有：1. 交通方便，“四达衢也”；2. 名胜地，“游人渐众也”；3. 靠近刻书地，“其地梓也”；4. 靠近文化中心，“贡院、太学、佛寺”。还可以看到，书商的经营是十分勤奋灵活的，可以归纳如下：

1. 大城市中有书店的集中地“聚书地”。有些城市的聚书地不止一处，如杭州就有镇海楼等四处。

2. 书店常采用流动设摊的办法出售图书，流动的办法因时令节日而定，或因地点对象而异。

3. 科举会试是图书销售的黄金时刻，书店不再用流动设摊的办法，而采用了租赁房子开设临时书店的方式售书，时间约一个月。

4. 小巷冷摊中可以买到“奇书秘简”，这是后来“访书”的滥觞。

三、小型书店

在传奇《桃花扇》“逮社”一出中，可以看到明末南京三山街一家书店的面貌。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不能用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中的人、事、地、物当作真人真事去坐实，这样做会闹出笑话来。但是有些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作品，往往既有艺术的真实，又有历史的真实，甚至细节的真实。《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去明未远。他从小就有写一本南明史事戏剧的志愿，结交冒辟疆等几个明代遗民，在《桃花扇》中，对南京市井的描写是真实可信的。《逮社》一出中，他写了南京三山街上的一家小书店。这家书店因为出版了复社的一本文选，被魏党的余孽逮捕，所以叫做“逮社”。开头是店主人蔡益所的说白：

“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

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

他贴出的“新选封面”是《复社文开》，左边一行小字是“壬午、癸未房墨合刊”，右边是“陈定生、吴次尾两先生新选”。

书中描写的时代是甲申后一年（乙酉，1645年），地点是南明首都南京的三山街，那里有许多书店。书客（店主）蔡益所开设的是比较大的一家，书店中陈列出售的书有十三经以至小说等，是一家综合性书店。除了开店门市外，还“兴南贩北”，兼事贩运。他善于揣测风气，得到新的信息，知道南明政府采纳钱谦益的建议，在当年（乙酉）乡试时，将“亟正文风”，便聘请当时著名选家陈定生和吴次尾二人编选一本最新的文选《复社文开》，所选范文是最近一次考试（壬午、癸未）的“房墨”。那陈、吴二人做编辑工作的地方就在书店的“里边”，大概是内屋安静的地方。店主蔡益所很会做宣传工作，书还在编纂中，广告已经贴在店堂里了。

这是一家集编辑、刻印、门市、贩运于一身的综合型书店。这种编、印、发兼营的书店，在清代还大量存在，而且是书店的最通常的形式。

四、远途贩运、异地设店

远途贩运图书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图书成本有地区差价；二是因为品种需要调剂。《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中略有记载。该书说：北京图书的价格最贵，北京买一本书，在苏州可以买到两本，这是运费贵的原因，“道远故也”。在北京开雕刊印一本书，在杭州可以刊印三本，“纸贵故也”。

关于品种的调剂，书中说，苏州、南京书籍品种最多，大部

头的书，大都是这两地刻印的。全国各地图书市场的书源，十分之七来自苏州、南京，十分之三来自福建，北京、杭州两地则排不上队。

当时图书贩运的工具和路线，可见的资料很少。据福建省《长汀县志》记载，长汀县的四堡乡以书籍为生，刻印发一条龙。该地以通俗启蒙图书为主，印好的书由当地经销，“城市有店，乡以肩担”。以售书为业的有“百家以上”，四堡销售图书“足迹几遍天下”，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几省，几乎是四堡包揽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书籍推销网，经营达数百年之久。他们向远地销售图书，有习惯的陆路路线和水路路线。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种很特殊的图书贩运方式——书船。书船流行于江浙一带水网地区，甚至到达北京和海外。书船上满载各种图书，沿水路到各地兑售，书船和藏书家有往来，熟知门道和行情。同治《苏州府志》和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中都有记载，说毛晋曾出高价收购善本，贴出了告示，“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从湖州乘船到常熟，只有一二天路程，十分方便。又乾隆时人张鉴《暝琴山馆藏书目序》云：“吾湖固多贾客，织里一乡，居者皆以佣书为业。出则扁舟孤棹，举凡平江远近数百里之间，简籍不胫而走。盖自元时至今，几四百载，上至都门，下逮海舶，苟得一善本蜘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1] 可见湖州的书船在元朝时就有了。文中提到的“织里”是湖州的一个乡，靠近太湖南岸。其销售范围从北京（都门）到海外（海舶）。特别是，那些贩书的“贾客”，熟悉善本书的来龙去脉、流传情况，某人家藏什么书，新近又买了些什么书，都有了解。有些刻书的书林，自己备有书船作运销用。苏州书林李氏善庆堂所刻的书《艺圃球琅》牌记云：“吴航书林李氏善庆堂梓”，其中所说的“吴航”就指苏州的书船。[2]

还有两条清代关于书船的记载，一并简介如下。据范韩《私史纪事》记载，清初湖州人庄廷鑨重价买下前明内阁大学士朱国祯所撰的《明史辑略》刊行，惹下大祸，受牵连者数百人，被杀

【1】[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6，《刘桐舜辉》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叶瑞宝：《苏州书坊刻书考》，《江苏出版史志》，1992年第3期。

七十多人，成为清初第一大案。庄氏刊印此书，就是“下路书船”的书贾们怂恿的结果。书贾们对庄氏说，刊印此书“其利无穷”，可以用来“与坊间水客兑换书籍”。于是庄氏“续成是书”，结果惹下大祸。再有一个资料也很有价值，清王先谦《东华续录》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有一道谕旨：“……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为咨询，详加物色，因而四处借钞，仍将原书迅速发还，谅无不踊跃从事。”这道谕旨是乾隆为编《四库全书》时要江南人献书而颁发的，希望“贾客书船”出力访书。以上资料说明，江浙的书船在图书销售传布中的作用。

在明代，一些大的刻印单位往往在外地设立销售处。这是徽州商人的拿手好戏。徽州书林在南京开设的有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奎璧斋、汪廷讷的环翠堂、胡正言的十竹斋等。在杭州刻书的胡文焕，用文会堂名义，在南京刻书则另取别的名称，在常州也开设销售处。福建建阳的慎独斋在北京也有营业处。

第三节　明代出版物的版本记录

一、出版物上的牌记

版本记录是出版管理中最基本的记载。现代出版物的版本记录集中在版权页上，记录的项目由国家规定。在古代，虽然政府对此没有什么规定，但出版者自己大都有所记载，记录的位置和内容则并无定规。从宋朝开始，采取“牌记”的方式。所谓牌记，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墨栏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1] 并说这种牌记中所记的内容有详略两类。大多数牌记用墨围成一个长方形。有些牌记还加上美化，如上覆莲叶，

【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之牌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下托莲花，或画上一个小孩，或三个老人等。有些书不用牌记，而把有关版本的记载放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全书的最末一行记载，在序跋中记载，在凡例中记载，在扉页的正面或背面记载，在书口上记载等。要知道一本书的版本记载，必须把这几方面的材料汇总起来作综合的考虑。

明代图书的版本记录，用得最多的形式是“牌记”，基本内容则是表述这本书的出版年月以及出版者的姓名。典型的方式如：

例1：《大明一统志》九十卷的牌记，在全书的末页，文曰：“大明嘉靖己未孟秋吉旦书林杨氏归仁斋重梓行”这个牌记说明了出版的时间是嘉靖己未，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7月1日(孟秋吉旦)，出版单位是杨氏的归仁斋（建阳书林，杨先春所办），“重梓行”则是说明该书是根据该书肆前一版重新刊刻的。

例2：《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　宋姚铉辑。序后有一行：“嘉靖甲申岁太学生姑苏徐焴刻于家塾”。这条牌记说明了刊刻时间（嘉靖三年，1524年）以及刻书者的姓名，并说明这是私家的家塾刻本。

简化的牌记如：

例1：《周易本义四卷图一卷》　书林周乐轩刻，最后一卷牌记上只有“周乐轩”三字。

例2：《脉经》十卷　晋王叔和撰，该书序文后记“福建布政使司督粮道刊”，只记了出版的官衔。(图93)

二、版本记录的内容

(一）一书有多处牌记

有些书中多处有牌记。如果内容完全相同，当是重复。如果内容不同，就得仔细研究其原因：

例1：《韵学集成十三卷直音篇七卷》明章黻撰。这部书由两部分组成。《韵学集成》的序后牌记中写道“万历丙午仲秋校刻练川明德书院”；《直音篇》后的牌记中写道“万历丙午仲秋校刻练川书院”，少了“明德”二字，这两处牌记的内容只



图93
图书上的牌记：左：《盘珠算法》牌记；中：《新刻图注伤寒活人指掌》牌记；右：《云仙杂记》牌记。

是小异。

例2：《石田稿》三卷　沈周撰。版心上方记“弘治癸亥集义重刊”，另一处版心上方记“弘治癸亥岁青浦黄氏刊”，吴宽序文后则有牌记云“弘治癸亥岁六月嘉定庠生黄淮刊”。这三处记载只是详略有点差别。

例3：《本草纲目》五十二卷　李时珍撰。万历十八年（1590年）金陵胡承龙印。后来版片归新安人程嘉祥所有，他把原序后面姓氏6行挖去，改为“程嘉祥摄元堂刊”。

（二）说明版本根据、版片来源

有些书的牌记说明此书是根据什么本子刻印的，版片藏在什么地方。

例1：《新刻全像音注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六卷一百回　栖真斋名衢逸狂撰。牌记是“万历癸卯秋佳丽书林谨按原本重镌”。说明此书有所本。

例2：《通鉴直解》二十五卷　明张居正撰。明崇祯四年（1631年）高兆麟刊，扉页题“南京工部藏板”。说明此书的书版藏在南京工部。

（三）记载工价、工期、刻工姓名等资料

有些牌记上记载了这方面的资料，但比较少见。

例1：《豫章罗先生文集》十七卷　宋罗从彦撰。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沙县谢鸾刊。序后面有识语：“刻板八十三片，上下二帙，一百四十一叶，绣梓工资二十四两。”

例2：《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二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建阳三衢里近峰夏相刊。目录后有牌记云：“嘉靖壬子春正月三衢近峰夏相据宋版摹刻至丙辰冬事竣。”这部大书共刊刻近五年。

例3：《天原发微》五卷、图一卷、篇目名义一卷、答问节要一卷　明鲍宁撰。天顺五年（1461年）歙西鲍宁耕读书堂刊。书后有一行记刻工姓名：“刊工黄文善、文观、文希、永富。”这几个刻工都是安徽歙县黄氏，其中前三人是第二十二世“文”字辈的人。

（四）记载版权转移

明代后期，常有版权转移的事情发生。简单的方式是甲方把版片卖给乙方。乙方买下来之后，便把原版上的牌记剜改成自己的堂斋名或坊肆名。例如《吴越春秋音注》一书，最初是冯念祖刊本，目录后有牌记云：“万历丙戌之秋武林冯念祖重梓于卧龙山房”，后来版片转给杨尔曾，杨将牌记剜改成“万历辛丑之秋杨尔曾重梓于卧龙山房”，继续发行。又如孙钟龄的《东郭记》，最早有明末“逵羽亭”本，后来易主“致和堂”，再易主于“映雪斋”，后两种版本的版心上仍有“逵羽亭”字样。

有些书版权转移的情况比较复杂。如《绣刻演剧》一书，唐鲤跃文林阁刊本，存52种，135卷。这部书中各个剧本的版式不同，版框的大小也不同。原来，这部书的原版来自世德堂、继志

斋、富春堂、文秀堂、文林阁等多处，唐氏得到这些原版后汇聚起来，前面加上一个统一的书衣“绣刻演剧第××套”，便成了一部书。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建阳人夏相刻《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续集、别集、外集共326卷。后来书版归秦氏所得，修补后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印，称“秦氏重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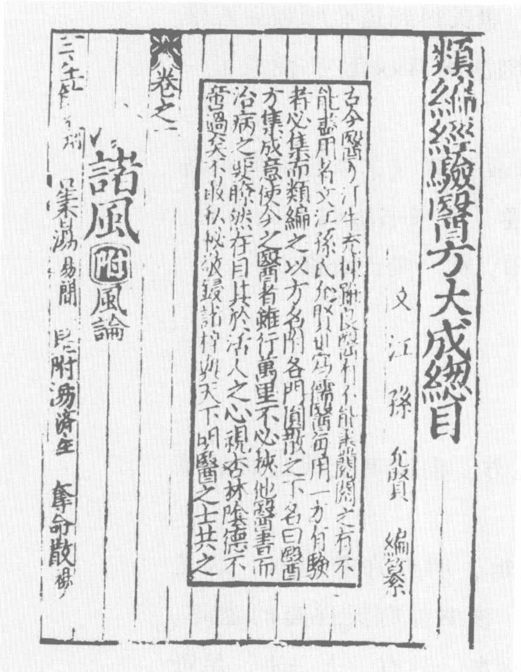
三、图书宣传及其他

（一）出版意图

有些出版商在牌记上或在其他地方，向读者交代出版的意图。

例1：《古今小说》 冯梦龙纂辑，明天许斋刊本。这是“三言”的第一种，即《喻世明言》。该书前有天许斋的题辞：“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天许斋藏版。”这个题辞说明了出版者天许斋主人对小说的评价和出版的打算。

例2：《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金台岳家刻本。这部书是《西厢记》中传世最早的一种。书中有一个上下覆庆云图案的牌记。文曰：“尝谓古人之歌诗，即今人之歌曲。歌曲虽所以吟咏人之性情，荡涤人之心志，亦关于世道不浅矣。世治歌曲之者犹多，若《西厢》，曲中之翘楚者也，况闾阎小巷，家传人诵，作戏搬演，切须字句真正，唱与图应然后可。今市井刊行，错综无伦，是虽登垄之意，殊不便人之观，反失古制。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命锓梓刊印，便于四方观云。弘治戊午季冬金台岳家重刊印行。”右侧还有一行字：“正阳门东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岳家□□诸书书坊便是。”这段文字说明了出版者对戏曲的社会作用的看法，以及出版的意图等。（图94右）


類編經驗醫方大成總目

文江孫允賢編纂

古今醫方汗牛充棟雖良醫有不能盡閱閱之有不能盡用者文江孫氏允賢世為儒醫每用一方有驗者必集而類編之以方名附各門圓散之下名曰醫方集成意使今之醫者雖行萬里不必挾他醫書而治病之要了然在目其於活人之心視杏林陰德不啻過矣不敢私秘敬鋟諸梓與天下明醫之士共之

卷之一

諸風 附風論


嘗謂古人之歌詩即今人之歌曲歌曲雖所以吟咏人之性情蕩滌人之心志亦關於世道不淺矣世治歌曲之者猶多若西廂曲中之翹楚者也況閭閻小巷家傳人誦作戲搬演切須字句真正唱與圖應然後可今市井刊行錯綜無倫是雖登壟之意殊不便人之觀反失古制本坊謹依經書重寫繪圖參訂編次大字魁本唱與圖合使寓於客邸行於舟中閒遊坐客得此一覽始終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命鋟梓刊印便於四方觀云

弘治戊午季冬金臺岳家重刊印行

图94

图书上的识语：左：《类编经验医方大成》上的识语。右：《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上的识语。

（二）宣传、广告

书林出版的图书，常在扉页上刻广告，举例如下：

例1：《新镌缪当时先生四书九鼎》13卷，缪昌期撰，明末长庚馆刻本。扉页上刊："四书九鼎，金鎞在手，开万古迷蒙，宝筏横川，济四来跋涉。一言定鼎，片字明心。□□重赀聘梓，以广流通，诚明宋之合璧也，惟智眼识之。"

例2：《类编经验医方大成》 孙允贤编纂，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书林刘氏溥济药室刻本。总目后面有一块牌记，文曰："古今医方汗牛充栋，虽良医有不能尽阅，阅之有不能尽用者。文江孙氏允贤，世为儒医，每用一方，有验者必集而类编之，以方名附各门圆散之下，名曰《医方集成》。意使今之医者。虽行万里，不必挟他医书，而治病之要了然在目，其于活人之心，视杏林阴德不啻过矣。不敢私秘，敬锓诸梓，与天下明医之士共之。" (图94左)

例3：《文选注》 嘉靖元年汪谅刻本。这本书的目录后面附有一份书目广告 (图95)：

金台书铺汪谅见居

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翻刻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一部

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

翻刻黄鹤解注杜诗一部全集

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

翻刻解注唐音一部

翻刻玉机微义一部，系医书

翻刻武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

俱宋元板

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

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

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

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

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

重刻诗对押韵一部

重刻孝经注疏一册

俱古板

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板校正新刊

图95
图书上的广告：嘉靖汪谅刻本《文选注》上的广告。

第四节　各种作伪和低劣图书

制造假冒伪劣图书有两种动机：一种是政治动机，把图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造出一本书攻击对方；另一种是经济动机，目的是赚钱。这里讨论的是后者。

明代的初期和中期，很少有假冒伪劣图书。这是因为在明初时，对重要图书的刻印有严格的管理，政府提供原式，鼓励依样翻刻。清人张芳在《徽刻唐宋秘本书论略》中指出：“有明之中

叶，功令严明，士习统一，坊肆雕本多出礼部颁行。惟王府宦邸时翻刻旧本大书。王府本不传人间，高参政叔嗣刻行宋郑伯谦《太平经国书》、马太守金刻行齐褚澄《石经》，自非大官校刻，坊贾率不敢妄有刊本。无谓时人之集与时文之选也。”明成化四年（1468），山西提学佥事胡濙“请颁《大明一统志》于天下，礼部乞于司礼监关领原本，付福建布政使司，书坊翻行”。

但是，到了明代后期，情况起了变化。封建统治基础动摇，政令松弛，出版的种种限制不再存在。同时，雕版印刷的生产力大为增长，图书品种骤增，图书商品市场十分发达，读者群增加了许多。据载，当时“《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1] “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2] 出版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一种行业。

当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明末有一批考试不利的士子，走上了出版舞台，寻找出路。他们熟悉文献典籍，知道图书行情；他们学识修养不够，难成一家之言，但也颇能舞文弄墨，惯会揣摩猜测。他们或者到达官贵人家去做清客，帮主人编书，或者到书坊那里，帮店主出谋画策，设计图书。邓志谟和周尚文就是其中的例子。当然，邓、周二人所编写的书，并不全是假冒伪劣的书，考试不中的士子，也并不全是没有真才实学的。

在这样的多种条件作用下，明代假冒伪劣图书的毒瘤就滋生起来了。

一、作伪和低劣图书的种种表现

（一）盗版仿刻

假冒伪劣中最方便的做法是“盗版”。做法之一是完全照原书刻印，但不署作者姓名，并把书名换掉，让读者误认为是另一本书。如璩昆玉的《古今类书纂要》，被更名为《新镌雅俗通用珠玑薮》；杨慎的《丹铅诸录》，被改名为《纬略类编》；《北堂书钞》被改为《大唐类要》、《古唐类苑》；《夷门广牍》被改为

【1】[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2】[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祗洹馆丛刻》；《竹支集》被改为《斜川集》、《如宜方》被改为《回生捷录》；甚至《容斋随笔》这样很通行的书，也被改为《搜采异闻录》。如果仔细比照前后的书名，便可以发现，更改的原则只有一个，那便是改得耸人听闻，引人注意。这种做法造成了我国古籍中大量的“同书异名”现象。

新出版的书，凡是销路较好的，盗版更多，令书商大伤脑筋。袁宏道《锦帆集》的《禁翻豫约》说：“往见牟利之夫，原板未行，翻刻踵布。”福建余象斗刻印的小说，往往一出版就被盗版，他在《东游记·八仙传引》中叹苦说：“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其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

（二）假托名人

姚可成编著的《食物本草》，托名“元东垣李杲编辑、明濒湖李时珍参订”；《物类相感志》一书假托“苏轼撰、赞宁编次”，赞宁是宋初人，苏轼是元祐时人，变成前人编后人的书集，手法拙劣之极。同例，明李天麟编《词致录》，书商改为“欧阳修编”，欧阳修是北宋人，而书中有一些是南宋人的作品，也露出了马脚。还有书商从当时通行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一书中抽出若干，托名“刘基类编”，书名也改为《多能鄙事》。此外，还有《蕉窗杂录》，托名辛弃疾著；《古今艺苑谈概》托名俞文豹；《樵谈》托名宋许棐。

还有些书托名当代的名人，假托最多的是李贽、袁宏道、钟惺、冯梦龙和陈继儒等。托名李贽的如《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七十二朝人物演义》。托名袁宏道的如《狂言》，杭人金生撰。宏道的弟弟袁中道曾忿忿地说：“不知是何伧父，刻画无盐，唐突西子，真可恨也。”托名钟惺的如《五经纂注》、《明诗归》、《名媛诗归》、《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等多种。托名陈继儒的书更多，郑振铎曾说，陈继儒的著作“大抵皆明季坊贾冒其名……以资速售耳”。他的女婿陈楚莲在《陈眉公先生全集》的跋中说：“先生有《晚香堂小品》、《十种藏书》，皆系坊赝本。”

还有些假托名人的书，把不相干的几个人拉在一起，出版了所谓“四进士本”、“三状元本”。如万历《续名文珠玑》，号称“四进士选”（黄凤翔、杨道宾、李廷机、史继），另一本《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号称焦竑、翁正春、朱之蕃“翰林三状元会选”。这些都是供举子用的文选，用进士、状元的名义，用意很明显。余象斗从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之间三次翻刻《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第一次托名李廷机，第二次托名吉澄，第三次托名袁黄，没有一次是用真名。湖州的闵齐伋出了不少朱墨套印的好书，但也惯于伪托名人。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补》说：“闵齐伋所刊朱墨本大概多伪托。”

（三）抄袭剽窃

明人作伪中最可恶的一种做法是抄袭剽窃，东抄几段，西抄几段，最后加上自己的名字。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大名鼎鼎的文人也这样做，有些人一面自己的名字被别人盗用，一面自己也不爱惜羽毛，剽窃抄袭。上一节提到的陈继儒、钟惺便是这种做法的老祖宗。陈继儒撰的《尧山堂外纪》，杂采小说家言，凑集成编，而不著所出。《四库全书总目》说“盖明人好剿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以后往往皆然，继儒尤著者也”。钟惺编的《周文归》一书，似乎是要把先秦的文章汇聚起来，实际却是把三礼、三传、国语、楚辞拼凑成书。《四库全书总目》说这书“敢于刊削圣经，亦可谓悍然不顾矣”。

凡是“欣赏”、“咀英”之类的书，有不少都是抄来的。那些作者认为，凡是我所喜欢的文章，抄在一起，就可以算作自己的作品了。胡效臣取诸子百家之文，成《百子咀华》一书，署了自己的名。王象晋摭拾明说部成《清寤斋欣赏编》，还有佚名的《欣赏编》一书，十之八九是从陶宗仪《说郛》中抄来的。有人从《世说新语》中抄袭21则，从陶潜、苏轼著作中抄袭18则，编成《卧游录》一书，没有敢用自己的名字，署名宋吕祖谦。万历进士蔡善继著《前定录》二卷，宣传万事皆由前定，这本书全部从《太平广记》中抄来。《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说：“《广记》为

习见之书，乃取其中十五卷，别列书名，据为己有，作伪之拙，于是极矣。”

以上这些做法，既是出版风气，同时也是一种文风和士风。

（四）任意删削

有些书篇幅较大，加以删削，成为“节本”，或者取其精华，成为“选本”。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编辑方法，但作假者的做法却是淮橘成枳，失其本意。例如《朱子集》原有300卷，明人所出版的只有40卷；李纲的《梁溪集》原有130卷，明人出版的只有40卷，书名改为《李忠定集》，而且前后混乱。福建刻的《水浒传》有一种“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1]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无非是为了减少篇幅，节省成本。郎瑛《七修类稿》中说：“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2] 甚至连《汉书》这样的书，也敢大段删去。

除了删削之外，窜改的情况也很严重。万历年间，《西厢记》大行，出现了数十种批、校、评、点、注的本子，内容各异，无一相同，而改笔未必都有道理，但各家都标榜自己所刻和别的本子如何不同。有些综合性丛书，如《稗海》、《说海》、《说郛》、《秘笈》之类，往往被随便删去几种，又加进几种。“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3] 甚至有人连《说文》这样的经典也不放过，加进了《五音韵谱》中的东西。

（五）拼凑旧版

木版印刷的版片，如果有丢失或泐蚀，就成为残版。正常的做法是补刻一部分版子。有些书商不走这条正路，而是把残片拼拼凑凑，另起一个书名，装充另一本书。例如书贾得陆楫的《古今说海》（原142卷）的残版22卷，便伪刻了序目，以《古今名贤说海》出现。黄尚文的《古今女苑》残版为刘氏所得，他改书名为《女范编》，作者则改为刘金煌、刘玉成二人，欺骗世人。

【1】［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

【2】［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事物类》“书册”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

【3】［清］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校书说”。

利用残片印书，本来未可厚非，但必须交代清楚，不能以残充全，欺骗读者。高鸣凤的《今献汇言》，应是28卷，书贾得到了8卷残版，便另刻了8卷的目录，冒充全本。《文府滑稽》原有12卷，书贾得11卷残版，便将原序中“积有十二卷”改为“十一卷”，似乎本来就是11卷。《未轩公文集》原12卷，书商得残版7卷，便把原版目录中7卷以后部分割去，加上一个“终”字，冒充全帙。周文采的《医方汇要》原有10卷，残存2卷，书贾改为“上、下”二卷，序文、书口都相应剜改。万历刻本《云间杂识》8卷，残版只有3卷，书贾将一二三卷改成上中下三卷，冒充全书。“澹云王路”曾刻有《烟花小史》，分左右二编，书贾得到其中的“右编”残版后，另取了一个书名《秦淮四媺诗》，使读者认为该书原来就是如此的，但这部书的版心有“右编”二字，书贾没有剜去，露出了马脚。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种各有40卷，十分整饬。后来版子散失，被书贾“衍庆堂”主人获得，他从天许斋的《古今小说》中理出21篇，从叶敬池的《醒世恒言》中理出2篇，从兼善堂的《警世通言》中理出1篇，凑成24篇，书名《别本喻世明言》，标榜“重加校订，刊误补遗”，搞乱了版本。

二、反对作伪和低劣图书的努力

明代出版界假冒伪劣图书的出现，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使人们产生了加强管理的要求和质量意识，萌生了版权观念，提出了职业道德的话题，并为此进行了种种努力。

明朝政府对出版的干预和管理，在前面第二章中已有介绍，大体上采用“钦颁官本”等做法。最引人注意的例子是，嘉靖年间福建省由刑按察使向书城建阳府发出牒文，并发给样书，还要书坊具结保证。在建本《礼记集说》和《春秋》四传的序目后，全文印了这篇牒文：

“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

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古之类，岂但有误初学，虽士子在场屋，亦讹写被黜，其为误亦已甚矣。该本司看得书传海内，板在闽中，若不精校另刊，以正书坊之谬，恐致益误后学，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雠，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诗、书、礼记、四书传说款识如旧，易经加刻程传，恐只穷本义，涉偏废也；春秋以胡传为主，而左、公、谷三传附焉，资参考也。刻成合发刊布，为此牒仰本府著落当该官吏，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刊，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划毁，决不轻贷。仍取匠户不致违谬结状同依准缴来。嘉靖拾壹年拾贰月□□日。故牒建宁府。”[1]

【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假冒伪劣图书也引起了出版行业自身的抵制，因为这种现象不单是危害了读书人，也祸及出版者的根本利益。出版业自我保护的做法是在出版物上印上标志、牌记、告白、印章之类的东西。

（一）标志　标志类似今天的商标，例如：

麒麟为记　万历北京铁匠胡同叶氏书坊所刻书。

葫芦为记　万历汪廷讷环翠堂《草堂余意》等书。

八卦为记　福建熊氏种德堂《历朝纪要纲鉴》等书。

汉佩为记　浙江萧山来氏宝印斋《宣和印史》等书。

（二）版权声明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新镌海内奇观》牌记：“武林杨衙夷白堂精刻，各坊不许翻刻。”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唐诗类苑》牌记:“陈衙藏板，翻刻必究。”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东西洋考》牌记:“本衙藏板，翻刻必究。”

天启郎奎金刻本《风俗通义》卷首有两个印章:“杭城花市溪香馆发行”、“本衙鸠工绣梓，翻刻千里必究。”

崇祯十年（1637年）杭州张氏白雪斋刻本《新镌出相乐府吴骚合编》，上盖朱印："虎林张府藏板，翻刻千里必究。"

崇祯《皇明世法录》，上盖白文印："如有翻刻，千里必究。"

（三）告白　贾三近万历十四年（1586）刊《皇明两朝疏钞》卷首告白："恳请郡中诸君子，幸相与坚持，勿令后之新贵人又复增入，致混原帙。"

崇祯刻本《道元一统》书前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云。"

天启苏州大来堂《骈枝别集》上有告白："凡我绅士之家，或才堪著述，或力足缮梓，雅能创起，绝不翻袭。倘有奸徒假冒煽惑，重究不贷。"

魏忠贤垮台后，出版了小说《禅真逸史》，万人争看，当时，杭州有爽阁刻本，扉页上告白说："倘有棍徒滥翻射利，虽远必治，断不假贷。"金陵翼圣斋也出了一本，告白内容相似："倘有无耻滥翻射利，虽远必究。"不知究竟是谁在滥翻射利。

这些情况说明，明朝末期时，版权保护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了。"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用语，一直使用了数百年。

（四）特殊做法　冯梦龙的《智囊》中，记载了一件版权保护的事，很有意义。全文如下："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板。俞羡章刻《唐类函》将成，先出讼牒，谬言新印书若干，载往某处，被盗劫去，乞官为捕之。因出赏格，募盗书贼。由是《类函》盛行，无敢翻者。"[1] 刊印者把防止盗版的工作做在前面，利用官府的力量和翻印者不愿涉嫌盗窃的心理，避免了书版被翻印，所用的方法实在巧妙。俞羡章即俞安期，吴江人，淡薄科举，久居南京，编了好几种类书，《唐类函》是编得很好的一种，全书有200卷。

【1】[明]冯梦龙：《智囊》，卷二十八。

第五节　图书的收藏

藏书家和出版事业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在出版事业中，藏

书起着“一头一尾”的作用。所谓“头”，是指图书的编著撰述，除了原创的如诗文之类以外，都要以藏书为基础，诸如注疏、校勘、汇编、辑佚等书，都要用到很多图书，而丛书的汇辑、类书的编纂、字书韵书撰著，也少不了以藏书为依托。所谓“尾”，是说一个时代的出版物要靠藏书家、藏书楼来汇总保存，成为一代文献。可以说，出版家必须有足够的藏书，没有藏书的出版者，只能是看到什么书好销就翻刻什么书，至多是一个以射利为目标的书商。

一、明代藏书家的贡献

据三部藏书家辞典（李玉安、陈传艺的《中国藏书家辞典》、梁战、郭群的《历代藏书家辞典》、王河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的统计，去其重复，共有藏书家4 437人。另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所载，中国历代藏书家共有4 715人，二者相差不多。范凤书文中统计，明代以前1 121人，明代869人，清代和近代2 725人，现代755人。[1]

藏书家集中在东南地区，最多的10个市县是：苏州268人、杭州198人、常熟146人、湖州94人、绍兴93人、宁波88人、福州77人、嘉兴75人、海宁67人、南京60人。所谓藏书家，以藏书多少为准，具体数目并无公认的标准。乾隆皇帝为了编《四库全书》，下谕臣民献书，称：“其一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藏书之家。”意思是一类书有百种以上，就可称为藏书家。胡应麟则认为藏书数量的极限大概是三四万种：“大率人间所藏卷轴，不过三万，若任昉四万极矣。”[2]

明代藏书家有800多人。据明末人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名贤著述”条的记述，明代最著名的藏书家有50多人。这许多藏书家，各有不同的特点，胡应麟认为藏书家有两种，一种是“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另一类是“枕席经史，沈湎青缃，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3] 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卷三中则把藏书家分为五种，

【1】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天一阁论丛》，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年。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

【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

即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利用所藏的书出版行世，是他们共同的旨趣之一。江阴李如一说:“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说出了他们的共同心愿。

藏书家对出版事业的贡献主要有：

（一）保存稿本，抄缮写本

原稿的价值是人所共知的。有些书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原稿保存，未能刊刻。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保存百年多才刊行，谈迁的《国榷》原稿保存300多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版。

抄书也是一种保存传播的手段。抄本保存了近于绝灭的出版资源，还可以纠正通行本的缺失。《书林清话》“明以来之抄本”一节中列出明代著名抄书家23人，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著录明代“抄书的藏书家”114人。姑苏的丛书堂吴氏和宁波的天一阁，在所藏的图书中，抄本和刊本大约各占一半。

在私家藏书家之间，存在着所谓的“传书网”。一种是纵向的传书，子承父业，有的三五代相传不衰，常熟的张海鹏家甚至传了21代之久。还有一种是师生、朋友、亲戚之间的横向传书，互相探讨、借抄，结成一个网络，有所谓的“藏书四友”等美称。这种传书网是古老的“网络组织”，其结果是使一些书改变了孤本单传的险境。

（二）编制书目、撰写校勘记和题跋

藏书家收藏既丰，便很自然会想到要编一份目录，或者写上品评的识语、题跋，这种书目和题跋，都是重要的文献资料。明代的藏书楼，除了浙江的天一阁以外，现在都已不存，靠这种书目题跋记载了一代文献。

题跋识语实际上是内容提要、图书简介之类的短评。明代重要的藏书题跋有毛晋的《隐湖题跋》、都穆的《南濠居士文跋》、徐𤊹的《红雨楼题跋》等。这些题跋是出版者刊刻图书的重要导引。

藏书家收藏的某一种图书如果有多种版本，便可以相互比

勘，发现问题，改正错漏，写出校记，出版新的校勘本。苏州黄氏三兄弟（黄省曾、黄鲁曾、黄贯曾）志趣相同，他们倾尽家产购买图书，又精心校勘，刊刻了《两汉博闻》、《高士传》、《山海经》、《水经注》等精品书。

（三）辑佚钩沉、聚零为整、汇编罕见图书

藏书家收集到奇书、孤本等难得之书，都亟亟地要汇刻问世。汇编的方式，有的是浅层次的聚合，只在汇编的书上加一个“某氏×种”之类的名称，如宁波天一阁范钦的《范氏奇书》就是如此。《范氏奇书》共21种，所收都是罕见之书。

有些汇聚起来的书有很强的专业性，成为某一学科很重要的书籍。归有光世美堂藏书辑集而成的《诸子汇函》，从周代鬻熊的《鬻子》开始，到明代宋濂的《龙门子》为止，共94家，成为子书收录最多的一种。汇收小说的书更多，钮石溪的《稗海》收74种，李如一的《藏说小萃》收11种。专收戏剧的臧懋循的《元曲选》，除了自己“家藏杂剧多秘本”之外，又从御戏监抄出内府本，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完全可以说，没有藏书家们的努力，我国的典籍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丰富多彩。

二、天一阁藏书楼

（一）建阁和藏书情况

在明代众多的藏书楼中，最有名的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

天一阁是范钦修建的。范钦，浙江鄞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初任湖广随州知州，升工部员外郎，文武兼能，亢直守正，性格刚毅，得罪过武定侯郭勋和严嵩，坐过牢。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官至兵部右侍郎。后去官归里，专事藏书、读书、刻书。大约在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1561—1566年），在家乡宁波建了藏书楼天一阁。

藏书楼为砖木结构，六间，二层，阁前凿池。乾隆皇帝曾派人去考察，参照天一阁的形制造了“四库七阁”，庋藏图书。天一阁在清代和民国期间曾多次修葺，基本形制没有变化。

天一阁藏书来源有四：1. 范钦在湖广、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省做过地方官20年，在各地收集了不少图书；2. 向藏书家借来抄录，与王世贞订了藏书互抄的契约，还曾从扬州借来《吹剑录外集》，抱病用四天时间抄毕；3. 购买丰氏万卷楼、袁忠彻静思斋故家散出的书；4. 朋友赠送，天一阁所藏《赵圉令碑》的背面，有“凤洲送”三字。在范钦去世时，天一阁藏书总数达7万卷 (图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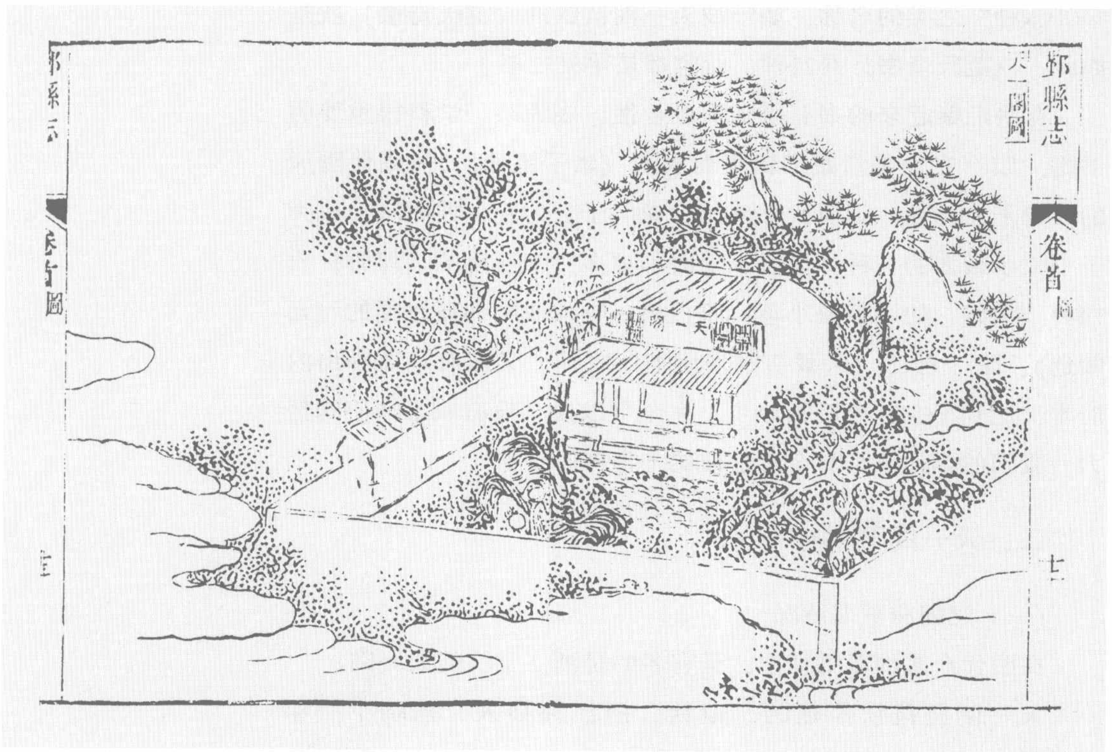


图96
清乾隆《鄞县志》卷首天一阁图。

（二）藏书的管理

我国古代的藏书大都毁于水、火、兵、虫之灾。只有天一阁能保存至现在。究其原因，是因为范钦有一套严密的管理体制。1. 以水制火，火不入阁。天一阁建在月湖附近，阁前凿了一个池塘，传说这个池塘通月湖，池水终年不涸。藏书楼的东西两侧都有高大的封火墙。严格规定禁止烟火入阁，阁内通道不准堆放杂物。2. 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范钦规定子孙分家析产时，不能分

书。他死后，大儿子大冲分到全部书，小儿子大潜分到万金。以后几代，都没有分书，由众子孙共有共管。又规定书不能出阁，采取全封闭管理办法。“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不少有名学者想去看书，结果都吃了闭门羹。3. 芸香辟蠹，曝书除湿。书柜下放芸香和英石二物，据说芸香可以驱书鱼，英石可以吸收潮气。同时，还合理通风、翻页、曝晒。所以，虽然宁波气候潮湿，书却保存得很好。

天一阁虽然有很好的管理，但7万多卷图书终究不能完全保存下来，建国之前，只剩下1万余卷，这几次灾难是：

1.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修《四库全书》，要天一阁进呈，范氏不敢违抗，进呈688种。用过后没有归还。范氏编了一本《天一阁进呈书目》。进呈后还剩下48 799卷。

2. 1840年鸦片战争，英军侵占宁波，掠走《一统志》及舆地书数十种。

3. 1861年太平军进驻宁波前后，歹徒拆毁后墙偷书，论斤售给奉化造纸作坊。

4. 1914年，窃贼挖楼潜入窃去一千多册，天一阁精华几乎损失一半。

天一阁的书每次有重大损失后，都要重编一次目录。最近一次目录是1979年编的。目录内容包括“天一阁遗存书目”1 537种、1 676部、8 472册、21 245卷；“天一阁访归书目”185部、710册、3 067卷。

（三）藏书特色

天一阁藏书共7万余卷，除了传统的图书外，特别重视明代当时的文献。著名目录学家赵万里说：“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部。”[1]

1. 地方志。明代地方志共出版了近三千种。在范钦去世时大约已出版了一千种左右。天一阁藏有435种，现存271种，其中164种是海内孤本。

2. 各种科举录。包括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武举

【1】见《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录自骆兆平编著《新编天一阁书目》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录、武乡试录，共389种，占现存明科举录的80%。隆庆四年（1570年）江西省的乡试录中，收有汤显祖的试文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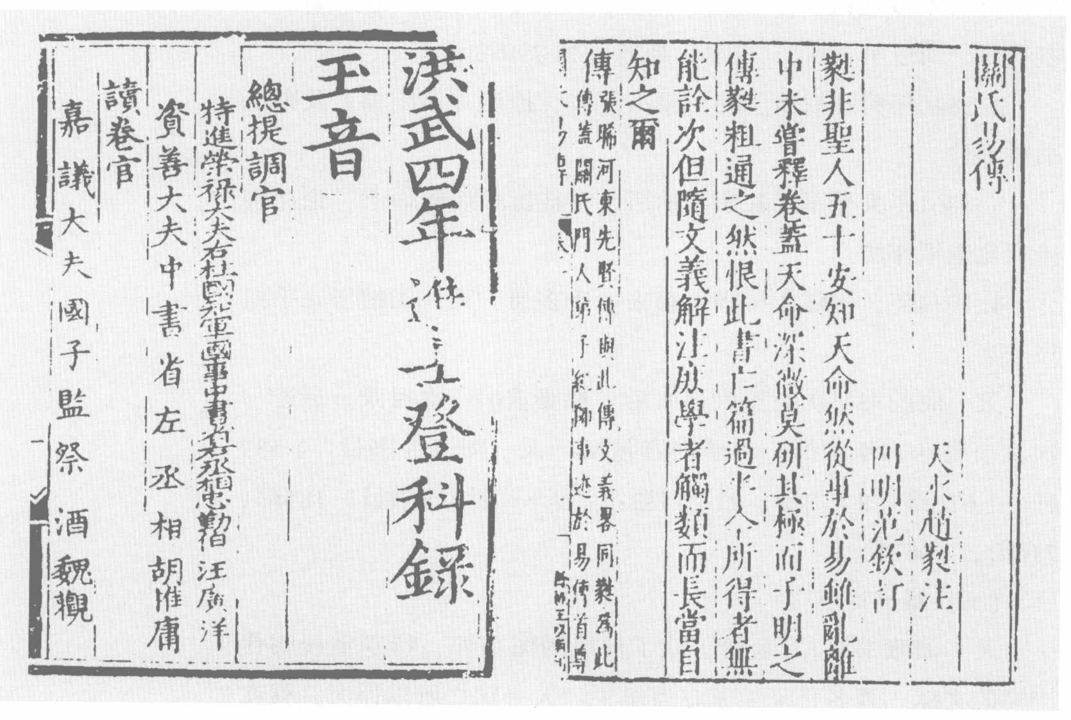
3. 碑刻。收拓片824种，包括周秦3种、汉49种、魏晋南北朝22种、隋5种、唐144种、五代5种、宋202种、金41种、元257种、其他96种。

4. 家谱。403种。[1]（图97）

（四）藏书的刊印

范钦收藏大量图书后，从中选出一部分刊行。在天一阁建阁前刊印过4种：《王彭衙诗》、《熊士选集》、《阮嗣宗集》、《海叟诗》。

【1】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
玉音
總提調官
資善大夫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
讀卷官
嘉議大夫國子監祭酒魏觀

關氏易傳
天水趙蕤注
四明范欽訂
蕤非聖人五十安知天命然從事於易雖亂離
中未嘗釋卷蓋天命深微莫研其極而子明之
傳蕤粗通之然恨此書亡篇過半今所得者無
能詮次但隨文義解注庶學者觸類而長當自
知之爾

图97
天一阁的藏书和刻书。左：藏书《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右：刻书《范氏奇书》之一《关氏易传》。

建天一阁后刊印的书大致有以下几类：

1. 经范钦亲自校订过的20种：《乾坤凿度》2卷、《周易乾凿度》2卷、《周易古占法》2卷、《周易略例》1卷、《周易举正》3卷、《宋氏易传》3卷、《关氏易传》1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1卷、《穆天子传》6卷、《孔子集语》2卷、《论语笔

解》2卷、《郭子翼庄》1卷、《广成子解》1卷、《三坟》1卷、《商子》5卷、《素履子》3卷、《竹书纪年》2卷、《潜虚》1卷、《虎钤经》20卷、《两同书》2卷、《新语》2卷。

2. 未经范钦校订过的7种：《司马温公稽古录》20卷、《孙子集注》13卷、《元包经传》5卷、《元包数总义》2卷、《说苑》20卷、《新序》10卷、《法帖释文》。

3. 范钦和其长子范大冲本人的著作4种：《奏议》4卷、《古今谚》1卷、《天一阁集》31卷（以上三种范钦著），《三史统类臆断》1卷（范大冲著）。

以上三类共31种。

关于《范氏奇书》的名称，在一些书目上名称不一，有《范氏丛书》、《范子杂汇》、《天一阁奇书》等名称。种数也不一样，有的19种，有的21种。查范氏最初所刻的书，都没有"奇书"、"丛书"等总名，书前也没有序言。所以，范氏初刻时，恐不是作为一套丛书来出版的。《范氏奇书》的名称，可能是后人所加。

第十一章 明代出版和明代社会

明代的社会和明代的出版事业，表现为热烈而积极的互动关系。

明代发生的政治事件，几乎都有相应的出版物。在事件之前或事件之中，发挥了呼风唤雨的作用。在事件刚一结束的时候，往往由皇帝下令，开馆设局，编纂有关图书，颁发全国，作为历史定论。然而事后翻案之事，却又时有发生，成为新一轮斗争的契机。

出版物十分敏捷地传播了思想新潮。瞬间的思想闪光被记录为语录。驳诘论辩常辑录在书信中，同道的切磋推戴则常常在序跋中反映。这些，都为明代思想的发展画下了清楚的轨迹。

明代末年，被称为末世陆沉、人欲横流的社会。贪官污吏、惯偷剧盗、奸商丹客、僧尼恶道、妓女虔婆、恶少劣绅，他们的恶行秽德，在明人的笔记、小说中，有淋漓尽致、绘声绘色的描写，成为形象生动的历史画卷，既反映了世俗社会，又影响了世俗社会。

第一节　政治漩涡的映照

一、出版和政治的密切关系

明代社会发生的大大小小政治事件，往往都形成为一定的出版物，显示了出版事业的政治功能。

开国之初，还在洪武朝的时候，曾经有过胡惟庸和蓝玉两个重大逆案，朱元璋大开杀戒之余，又敕令编了一批图书，胡惟庸案的书有《昭示奸党录》、《清教录》，蓝玉案的书有《逆臣录》，把他们的罪行用图书记载下来。

靖难之役的出版物起初未见，一切文件上，连建文的年号也不准用，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个皇帝。事过百年，对建文帝有了新的口径。于是有关建文帝的书出版了不少，如《建文事迹》、《建文逸史》、《建文野史》等。还有《从亡随笔》、《致身录》、《拊膝录》等野史笔记，层出不穷（图98）。

明朝其他政治大事，如高煦之变、宸濠之叛、沿海倭寇、东林党争、辽东军事等等，都有相应的出版物问世，其形式则有史书、奏议、笔记、野史、小说、戏剧等。

明朝的一些特别重大的政治事件，朝野震动，议论纷纷，奏章连篇。事情过去后，往往由皇帝下令将有关文献编纂成书，同时奖惩一批人，算是事情已经告终。其实在书出版的时候，事情远未了结，而编书的大权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而这类书往往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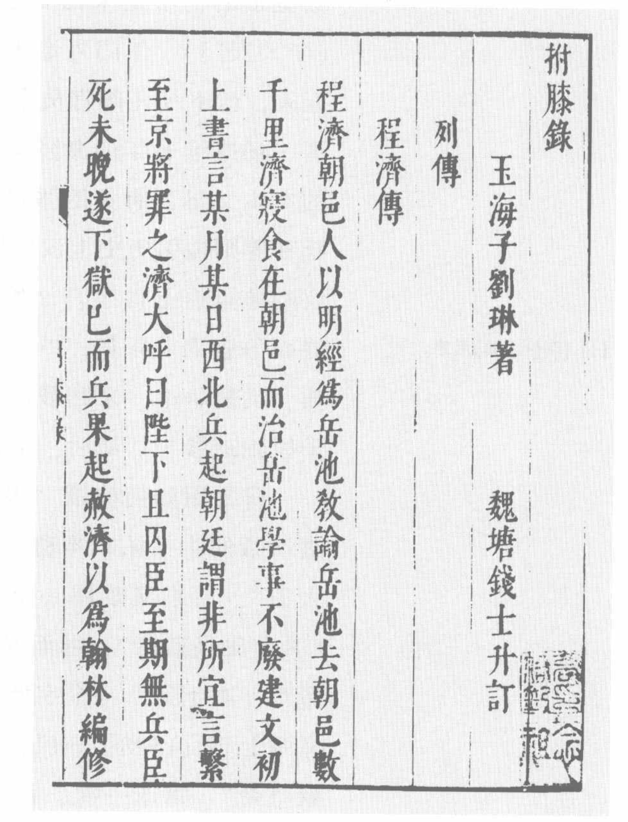

拊膝錄
玉海子劉琳著　魏塘錢士升訂
列傳
程濟傳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
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
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
至京將罪之濟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
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

图98
有关“靖难”的书《拊膝录》。

颠倒是非，不久又要推倒重来。这类书中最突出的是有关“议礼”和“三案”的两种书。

二、议大礼的《明伦大典》

（一）议大礼经过

武宗（正德）在位16年病死，无嗣，按兄终弟及的祖训，以及太后的懿旨，以亲叔伯兄弟朱厚熜继位。厚熜的父亲名祐杬，宪宗（成化）的第四子，建邸安陆（湖广省内），封兴王，已去世，谥献，史称兴献王。皇室派杨廷和等人到安陆去迎接朱厚熜到北京登位，这便是嘉靖帝（世宗）。

朱厚熜到北京郊外时，向杨廷和询问，用什么礼仪接待他，杨廷和答，用皇子之礼。要朱厚熜行皇太子接位礼，由东华门入文华殿，待百官劝进后即帝位。朱厚熜不听，声明自己是来继统做皇帝的，不是来做太子的，便自己决定，从大明门、承天门（今天安门）、午门入奉天殿（今太和殿），登皇帝位。接位后第五天，就下令礼部官员拿出崇祀其父亲的方案。从此开始，发生了一场连续七年的激烈争议，史称“大礼议”。嘉靖帝要尊崇他的本生父母，有大臣张璁（字孚敬）、桂萼等人支持，而首辅杨廷和等则援引历史上汉定陶王以及宋濮王的故事，竭力反对。争议的焦点有七件事：“始而争考、争帝、争皇，既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1] 每一个称谓，每一种礼仪，都要引经据典，反复争论，来回驳诘，用语严峻。边远地区的外地官员，也千里驰疏参与。最后，皇帝的意志得遂。

[1]《明伦大典》后序。

只要用如何称谓“兴献王”为例，就可以窥见争论之激烈。嘉靖帝的生父祐杬本称“兴献王”，议礼中先改称“皇叔父兴献大王”，后来又改用一个“帝”字，称“兴献帝”，后来又改为“本生父兴献帝”，继而又改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嘉靖皇帝对“本生父”三个字始终不满，下谕要去掉这几个字。一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议礼结束时，称谓定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每改一次，都伴随着争斗，都要诏告天下。嘉靖十七

年（1538年），又加称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祔太庙，位次武宗之上。他其实没有做过一天皇帝，却也修了《献皇帝实录》，并建世庙于太庙左，位于武宗之上。

最激烈的一次争议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嘉靖皇帝召集群臣于左顺门。拿出手敕，命去掉“本生”二字，吏部侍郎何孟春为首反对，跪伏力争，声言“不力争者，必共击之”。很快聚集了几百个廷臣。皇帝二次劝阻无效，大怒，命令把这些臣子的名字录下来，计有二百余人，朝臣们争着把自己名字报上去，皇帝更为恼火，逮为首的丰熙、张翀等8人系诏狱，于是杨慎等撼门大哭，声震阙廷，帝更怒，下令把参与的五品以下官员全部逮治，杖死王相等18人（一说17人），丰熙、杨慎等谪远地，责何孟春“倡众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后被削籍。

这一场争论，反映了传统礼法与人情之间的矛盾，其实质则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后人对这场争论有公允的评论。清代史官说嘉靖皇帝因为议大礼，闹得“舆论沸腾，倖臣假托，寻兴大狱”，而且，把自己的生父“升祔太庙，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1] 评论颇为中肯。《明史》的史赞说杨廷和一方“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求无得罪天下后世，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烈，失之愈深”。[2] 又说杨慎等辈“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3] 又认为张璁、桂萼一方议尊兴献帝是“人子至情”，“其初议未尝不准情理之中”，但后来得到皇帝满意，便“动引议礼自固，务快恩雠，于是知其建议之心，非有惓惓忠爱之实，欲引其君于当道也”。[4] 这些都说得颇允当。

（二）议礼形成的图书

在议礼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图书：

《大礼纂要》　嘉靖四年（1525年），大学士方献夫把议礼过程中的奏议、会议集中起来，编成《大礼纂要》一书，2卷。

《大礼集议》　嘉靖四年，张璁在《大礼纂要》的基础上，增加胡世宁的奏议和前人议论中有关典礼的文献，作为第三卷，

【1】《明史》卷十八世宗本纪《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明史》卷一九一《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明史》卷一九二《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明史》卷一九六《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再以特进世庙议为第四卷。接着，张璁又用《春秋》编年法，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四年（1525年）共五年时间，逐年逐日，有纲有目，附以己意，为上下二卷，再附遗议、古今考证等，共为6卷问世。

《明伦大典》　嘉靖六年（1527年）敕修，以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瑶、贾诉及礼部尚书席书为总裁，兵部右侍郎张璁、詹事桂萼为副。十一月，改命谢迁、翟銮，而以桂萼、方献夫为副。次年七月成书，惟杨一清、桂萼、方献夫列名，余皆去位，纂修官则有熊浃、霍韬等8人，书名《大礼全书》，后改名《明伦大典》24卷。算是对议礼一事的权威性总结。皇帝做了序，杨一清、张璁等5人作后序。很快印出来传布天下。在出版的同时，奖惩了一批人员。方献夫加太子太保，张璁加少傅，桂萼加少保；杨廷和则削职为民，蒋冕等夺职，何孟春、夏良胜等削职为民。

除了以上这些直接记述“议礼”的图书之外，还产生了一些有关的书。如张璁的《论录》3卷、《论对》24卷、《大礼要略》2卷、《蠹雪编》1卷、《钦明大狱录》2卷；何渊的《大礼辑略揭帖》、《大礼续奏议》等。

三、关于《三朝要典》的前前后后

《三朝要典》产生的背景是明朝后期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事情的经过很复杂，所谓“三朝”，指万历、泰昌、天启三个朝代，共56年时间。斗争持续的时间很长，牵连的人很多，导致朝政极端混乱。事情的起源是万历帝企图废长立爱。万历10岁做皇帝，16岁完婚，皇后王氏，没有儿女，万历对她很冷淡。最先为万历生下皇子的是李太后的宫女王氏，取名常洛。这是一次偶然的临幸怀上的。万历真正喜爱的是郑贵妃，以及郑氏生下的三皇子常洵（皇二子早夭）。按照礼制，应该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可是万历却迟迟不办，想立三子常洵为皇太子，于是引起了一场持久的斗争，朝野无不波及。

各类人物依其对立储的态度分为三派。一派是传统派，他们为皇长子常洛争合法地位，要求早日册立。这一派大都是恪守传统礼制的大臣，又称“正统派”、“忠派”。第二派相反，大都是郑贵妃的亲友或宦官，也有一些投机的官员，称为“不忠派”、“奸派”。第三派是依违两端的骑墙派，有些掌握实权的大臣也在这一类。

（一）前奏——《闺范图说》和《忧危竑议》的出版

《闺范图说》 此书是吕坤在当山西按察使时编撰的，内容是表彰前代贤女，是一本女教方面的书。郑贵妃认为此书很好，又加上12个人，还写了篇序，叫他的伯父郑承恩刻印。给事中戴士衡认为吕坤是为了结交郑贵妃而这样做的。这样，吕坤便被说成是郑贵妃一派的人，犯了“结纳宫闱”的罪。(图99)



图99
万历年间刻本《闺范图说》。

《忧危竑议》 此书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出现，篇幅不长，作为《闺范图说》的跋出现，作者和流传情况都不详。这一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10岁，按例应该册立，却迟迟未行，臣下都很焦急。给事中孟养浩上疏建议早日建储，万历大怒，杖于阙下，废长立爱的意思很明显。这本《忧危竑议》针对这个事端，把历代废长立爱而致乱的事集中起来，指出这是可忧可危的事。书中点了郑贵妃伯父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刑部侍郎吕坤等一批人。万历帝、郑贵妃

要查这书的作者以及后台，一大批官员被革职贬斥。事情过后，万历仍不册立太子，斗争仍时明时暗地继续着。

《续忧危竑议》　《忧危竑议》事件后，又经过了若干年，经过复杂的斗争，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年已20岁的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同时，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封为福王。按照礼制，福王应该尽快到封地开封去。但福王却迟迟不走，这又引起了人们的疑虑。就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十一月十二日，大学士朱赓在门外拾到了一本叫做《续忧危竑议》的书，内中说，万历帝立朱常洛为太子是不得已，将来还是要更换的。书中攻击了一批人。朱赓把此书呈给皇帝，皇帝下令“五城大索”，大肆逮捕。但查不到真正的撰稿人。嫌疑人中有一个皦生光的人，有过“妖书”前科，结果把他杀了算数。事后，万历帝在启祥宫召见太子、皇孙，进行慰谕，表示没有废立之意。朱常洛的位子，才算得到了巩固。

在这场斗争的后期，有三起发生在深宫的大案，都和立嗣问题有关，史称“三案”。

1.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黄昏，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执木棍，闯进皇子所住慈庆宫，见人就打，被内侍拿获。这事叫人联想到是郑贵妃所为，目的是想除掉太子，但审案反反覆覆，不断翻供，牵涉的人越来越多，终无确论，结果只好含糊过去。

2. 红丸案　万历去世后，朱常洛接位，是为光宗，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朱常洛接位时，身体已经极差，无法上朝。内侍崔文升给皇帝服药后，一夜泻了三四十次，鸿胪寺丞李可灼给皇帝服了几颗“红丸”，皇帝就去世了。首辅方从哲起草遗旨，其中不但没有处罚李可灼，反而给予赏赐，群臣大哗，分成两派。还是牵涉到以前关于立嗣的老根上。最后，李可灼充军，崔文升发往南京，方从哲未受处分。

3. 移宫案　光宗去世后，长子朱由校接位，即熹宗，年号天启，15岁。光宗在位时，宠爱李选侍。按照规定，皇帝住在乾清

宫。光宗病重时，李选侍也住进了乾清宫。皇帝死后，李选侍拖着不肯搬出去。大臣周嘉谟、左光斗、杨涟等认为李选侍是想学武则天，坚决要她在皇帝登位的前一天搬走。大臣们气势汹汹，李选侍不得不搬了出去。事情总算解决。但另一派人认为李选侍是皇帝的“遗爱”，皇帝尸骨未寒，定要她搬走，做得过分。幸亏新皇帝对李选侍并无好感，传出谕旨，平息了争论。这事还是和内宫、宦官、后党能否掌权有关。

这三件事牵涉到皇室、大臣、内宫、外戚、宦官的各个方面，事实的真相、是非、背景，说法悬殊，两派经常翻来覆去，不断在上面做文章，牵丝攀藤，无休无止。从当时的礼制来看，“正统派”、“忠派”显然是在理的，他们大都是东林党人。“奸党”则以宦官魏忠贤为首。

（二）《三朝要典》的出版

熹宗登位后，虽然信任正统派的东林党人，但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奸党却已经结集起来，伺机进攻。魏忠贤是一个市井无赖，目不识丁，自宫后进宫，时在万历17年。魏忠贤等人依仗的是内监、后党、外戚以及一部分趋炎附势的大臣，还有一个皇帝的奶娘客氏，这些人结成的政治集团，必然是极端腐朽的。正直的大臣们不断上疏参劾魏忠贤等人，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参魏忠贤二十四罪，立刻就有百余人跟着上书弹劾，奸党们惴惴惧祸，于是策划了一个奸计，企图用出版的力量作为一种武器，白纸黑字，流传长久，把堂皇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把奸人的恶名钉在杨涟等人的头上，这便是《三朝要典》出版的意图。

这个意图由给事中杨所修出面。天启五年（1625年）杨所修上疏请以《明伦大典》为例，将“三案”编次成书。皇帝同意。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编纂。第二年书成，皇帝命令刊布中外。《三朝要典》的内容是有关三案的谕示、奏疏、档册，再加上案语。熹宗表示，这本书“乃人心之公论，万世之大防”。还有一个国子监生阿谀说:“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礼宜并尊。”（图100）

裁副總裁及纂修等各
官俱朕愼簡自茲歲丙
寅春正月開館纂修迄
今編成爰定其名爲
三朝要典以其專爲
三朝慈孝作也斯編行且
頒天下矣朕復自序其
首曰嗟乎小人之禍人
國甚哉指宮闈爲攘功
之地則翼戴莫出其先

图100
有关明末党争的书《三朝要典》，顾秉谦等编纂，天启刻本。

在这本书里，是非都被颠倒了过来。“梃击”的罪魁被定为王之寀，因为他审问出真凶，目的是想“邀首功”。诬称“移宫”案的元凶是杨涟、左光斗等，因为他们是想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伴随着《三朝要典》的出版，缇骑四出，对那些被指为“奸人”的人，一个个抓起来处置，凶雾塞天。

（三）余波和尾声——《钦定逆案》及其他

天启在位7年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接位，这便是崇祯帝。崇祯帝不动声色，只用了几个月时间，便收拾了魏忠贤，处置了魏忠贤等一批奸党。于是，被颠倒的是非又颠倒了过来，又一本钦定的书《钦定逆案》被编纂出来。

《钦定逆案》处置了魏忠贤等奸党262人。分为7等：1. 首逆2人，即魏忠贤和客氏二人；2. 首逆同谋，崔呈秀等6人；3. 结交近侍，19人；4. 结交内侍次等，11人；5. 逆孽军犯，35人；6. 谄附拥戴，15人；7. 结交内侍末等，125人。

魏忠贤被定为逆案之后，歪曲事实的《三朝要典》也被毁了

版。在这场斗争中，还产生了一些书，很有必要同时提一下。

一类是魏忠贤气焰薰天时产生的攻讦东林党的书，通常称为“点将录”。品种不少，有《东林点将录》、《缙绅录》、《天鉴录》、《初终录》、《同志录》、《石碣录》、《伪鉴录》等。如魏广微的《缙绅录》，点了“邪人”六七十人，“密达起用”的“正人”56人。崔呈秀的《天鉴录》点叶向高等16人、东林党人6人，意思要逮治；又点了“真心为国，不附东林”17人，实际是魏氏的死党。《东林点将录》则按《水浒传》的办法，点东林党人“天罡”36人、“地煞”72人，企图一个个按图索骥逮治。

另一类是揭露魏忠贤罪恶的书。最有名的是曹学佺的《野史纪略》。这本书在魏忠贤得势的时候问世（天启六年，1626年），和《三朝要典》针锋相对，表现了非凡的勇气。结果曹学佺被削去陕西副使职，书则被毁版。在出版史上，这类事往往具有气节之士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光芒。魏忠贤垮台后，有关的书出版了很多，还出版了不少小说和戏剧。（图101）

再一类是皇室的《实录》。魏党在炮制《三朝要典》的同时，

图101
魏忠贤垮台后的书《魏珰逆党录》，辑录有关文献资料，清初抄本。

又篡改了《神宗实录》和《光宗实录》两书中的有关内容，以符合口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明朝覆亡之后，在南京建立了时间短促的小朝廷，阉党回光返照，得意一时，居然想重修《三朝要典》。后来清兵南下，摧枯拉朽，未能得逞。

第二节 思想新潮的鼓吹

明代的思想界，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1. 初期对程朱理学的继承；2. 中期王学的勃兴；3. 后期异端的出现。每个阶段，都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初大都采用语录、书信、序跋的形式，由弟子们记录、传看，后来才逐渐整理成系统的专著。这些图书，形成了明代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明初对宋元理学的继承

朱元璋建国后，要寻求一种可以“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理论。他询问宋濂：“帝王之学中，什么书最重要？”宋濂回答是《大学衍义》。太祖便把这书抄在宫殿两庑墙上，亲自带群臣请宋濂讲解。[1]《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条目，是理学家伦理、哲学、政治的基本纲领。《大学衍义》则是宋代真德秀的解释和阐述。朱元璋听从宋濂的话，推崇这本书，使理学处于思想统治的地位。明朝一代，《大学衍义》被尊为“帝王之书”，多次刊印。后来，在成化年间，邱濬又补成《大学衍义补》一书，共160卷，共有12目：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这些条目明显地具有致用和政治色彩。

洪武年间，朱元璋还诏命刘三吾编纂《书传会选》一书，把历代对《书经》的阐发汇聚起来，以宋元理学的阐述为主。又著作《资治通训》，讲述君臣之道，力图树立伦理规范，稳固王朝

[1]《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的统治。

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更加重视理学的建设，最重要的行动是辑订了三部经传：《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辑订的经过，在前面第二章中已有介绍。永乐之所以化大力气全面辑订经传，不单是为了要编出一部规范化的注本，更重要的在于思想意识的统一作用。胡广等人在进书表中说，编纂这三部"大全"的意义"非惟备览于经筵，实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正路，而学不惑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永乐皇帝亲自为三部"大全"撰写了序文，说有了这三"大全"，"圣贤之道，粲然复明"，天下之人可以穷理明道，立诚达本，"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全国上下，思想归于一致。

在这段时间里，程朱之学的著名学者有方孝孺、薛瑄、吴与弼等人。

方孝孺（1357—1402），宋濂弟子，他以圣贤自托，提倡道学，认为"入道之路莫切于公私义利之辨"，主张安贫乐道，以礼乐养心。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赞他是"有明正学之祖"。[1]他对儒学的见解颇多迂腐之处。纪昀说他不识"势移事变"的大势，不能"与时偕行"。

【1】［明］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薛瑄（1389—1464），山西河津人，永乐中进士，曾任翰林学士等职，晚年以著述为事，著有《读书录》行世。该书是他读《太极》、《西铭》的义疏。他认为"天下无性外之物"，"性即理"，"人能知性知天，则天下之理无不明"。他咀嚼朱熹教条，认为："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需躬行耳。"[2] 完全倾倒于朱学之中。

【2】［明］薛瑄：《读书录》卷二。

吴与弼（1391—1469），江西崇仁人。他学问广博，熟悉经书，工诗文，天文地志、律历医卜，都有较深造诣。又丢弃科举，谢绝人事，朝廷聘他，也不肯就职，一心读书讲学。他强调躬行实践，尤其重在已发念头上省察克治，刻苦自立。著有《康斋集》12卷，其中杂著、奏疏部分颇多思想见解。胡居仁、娄谅、陈献章都出其门下。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之功，

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之义，启余干之学。思想界很重视这种师承、渊源的关系。认为他的学说代表一个阶段、一个过程。

二、明中期的王学出版物

明代中期，思想界十分活跃。打破这个沉寂局面的是陈献章和王守仁，《明史·儒林传》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一）陈献章和《白沙先生集》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人，人称"白沙先生"，他曾就学于名儒吴与弼。因屡试不第，回家苦学。后游太学，名振京师，被认为是"真儒复出"，不少人拜他为师。成化十六年（1480年），皇帝下诏征聘，因未得重用，便托病回乡，隐居终身。

陈献章为学初宗朱熹，曾自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教我入德方。"[1] 27岁后受其师吴与弼影响，转向心学。他认为"一体乾坤是此心"，心是宇宙的本体，"心即理"，具有"无我，无人，无古今，塞乎天地之间"的作用，有"生生化化之妙"。他还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恢复本有的"善端"。在学习方法上，他反对死读书，主张"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这种方法接近禅学，人称"心学法门"。他曾自称读古人之书要"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2] 《明史》本传说他"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

【1】《白沙子全集》卷六。

【2】《白沙子全集》卷四《复赵提学佥宪》。

他的学术思想引起思想界的极大兴趣，信奉其学的人遍及全国。他没有专门讲学的著作，其思想散见于杂文、诗文中，由他的弟子容贯编成《白沙子集》9卷。该书共收诗1 970首、文464篇，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刊行。以后在嘉靖、万历朝续有刊本。（图102）

（二）王阳明和《传习录》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人称"阳明先生"。他一生的事功很丰富。

少年时开始学宋儒的“格物之学”，系统学习朱熹的著作。21岁中举人，继续作“格物穷理”的功夫。正德元年（1506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廷杖下狱，贬贵州龙场当驿丞。在这边远寂寞的地方，他日夜静坐，继续穷究格物之理。三年后，被聘到贵阳书院讲学，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哲学原理，声名大噪。后来刘瑾垮台，被起用任命为南赣、汀漳等地巡抚，平了江西、福建、广东等的叛乱。正德十四年（1519年），又活捉了反叛的宁王朱宸濠，为国家立了大功。这样，他在学术上、事业上，都取得了十分显赫的成就。他曾说他生平做了两件大事，那便是“平山中贼”和“平心中贼”。

王阳明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白沙先生至言序

甘泉子[illegible]言[illegible]之至者也輯白沙陳先生[illegible]之
至而為之以示人約者也曰言何以為至也言由中出者也本乎
其自然者也白沙先生之言曰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
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以至周孔其至矣下
此其顏孟大賢歟水也伏讀先生之書若文若詩無慮數萬言曰
博矣哉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獨懼夫學者讀其書
誦其詩而未必知約也乃命門人鍾周蒐輯其要約以便初學之
覽將以反說約也九十卷三十章古林何子見之曰宜題曰陳子
至言盖本諸先生之語也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图102
辑陈献章言论的《白沙先生至言》。

1.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就是天，“心之本体无所不该”，整个宇宙就在心中，心以外别无他物。心就是理，心外无理。批判了朱熹“析心与理而为二”的学说。

2. “致良知”。王阳明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是推极、恢复、行动的意思，“良知”指天理，也就是孟子所说“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的道德意识。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

3. “知行合一”。王阳明反对朱熹“知先行后”的学说，认为“一念发动就是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

【1】[明]王阳明：《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

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1]

【1】[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一。

王阳明良知说的出发点是要人们认识秩序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良知即是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而君臣、父子、夫妇、五行、百常都是“天秩天序”，不可侵犯，人人心中都有“良知”，具有“天理”，因而，一切道德教条也是人人心中所固有的。

王阳明注重事功，积极进取，敢于冲破旧思想的樊笼，启发了明末的进步思想。王阳明的主要著作有《大学问》、《传习录》。后人把他的著作编成《阳明全书》，亦称《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先生全书》，共38卷。前面3卷是《传习录》，这是他讲学的记录。末附《朱子晚年定论》，这是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理解和解释。其他还有文录、别录、外续编、年谱等内容。（图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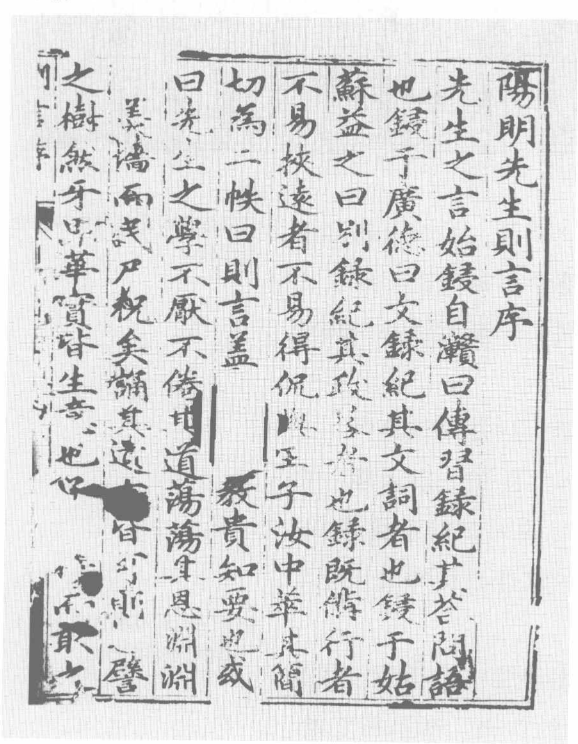
王学广泛流传后，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判。

右的批判来自传统的朱程理学。主要有：1. 崔铣（1478—1451），他厌恶谈“心”，以为对心的讨论语涉“高虚”，他斥责王阳明只讲良知，不讲良能，认为王阳明是个“霸儒”。2. 张邦奇（1484—1544），他是王阳明的好朋友，但学术相左，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是“糟粕六经”的“异论”。3. 陈建（1497—1567），他是攻击王阳明最厉害的一个。说王阳明“以知觉言心”，背离了儒家以仁义礼知言心的本旨，流于禅学。这些来自右的批判固守朱程本义，显得陈腐无力。

来自左的批判则认为王学虽有新意，但没有跳出朱程窠臼。主要有以下几家：

1. 黄绾的《明道编》　黄绾（1477—1551）早年信朱程之学，后来

图103
辑王阳明言论的《阳明先生则言》。


陽明先生則言序
先生之言始錢自灊曰傳習錄紀其答問語
也錢子廣德曰文錄紀其文詞者也錢子姑
蘇益之曰別錄紀其政事者也錄既備行者
不易挾遠者不易得侃與王子汝中華其簡
切為二帙曰則言蓋　亦貴知要也或
曰先生之學不厭不倦世道蕩蕩其思淵淵
美矣而我尸祝矣彌其遠[illegible]皆[illegible]譬
之樹敍乎此華實皆生意也[illegible]

转向王学，晚年背弃王学。他说“知其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他反对“无思”、“无为”，提倡经世之学，反对以“去欲”作为致良知的手段，认为自私之心是“天性人情之真”，人难忍受饥寒，因而任何学说都必须“义利并重”。他的学说和王学有很大区别。

2. 罗钦顺的《困知记》　罗钦顺（1465—1547），官至南京吏部尚书。青年时习程朱理学，30岁以后接受佛学，40岁以后研究儒学，后来排佛，批判陆王心学，说王阳明是以《楞伽经》曲解《孟子》，“以良知为天理，乃欲置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他认为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理学家要人们“去人欲”、“遏人欲”是偏见。著有《困知记》等。

3. 杨慎的《升庵集》　杨慎（1488—1559），官至翰林修撰，著作多达百余种，他批判道学，也批判心学。认为朱熹和王阳明是一回事，好比一个唱北西厢，一个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1] 他把理学家斥为“盗儒”，认为孟子的“欲存天理”和荀子的“欲人遏人欲”皆陷于一偏。提出了“得欲全生”的主张，这和理学的禁欲是对立的。(图104)

【1】《升庵集》卷75《蒋兆谭戏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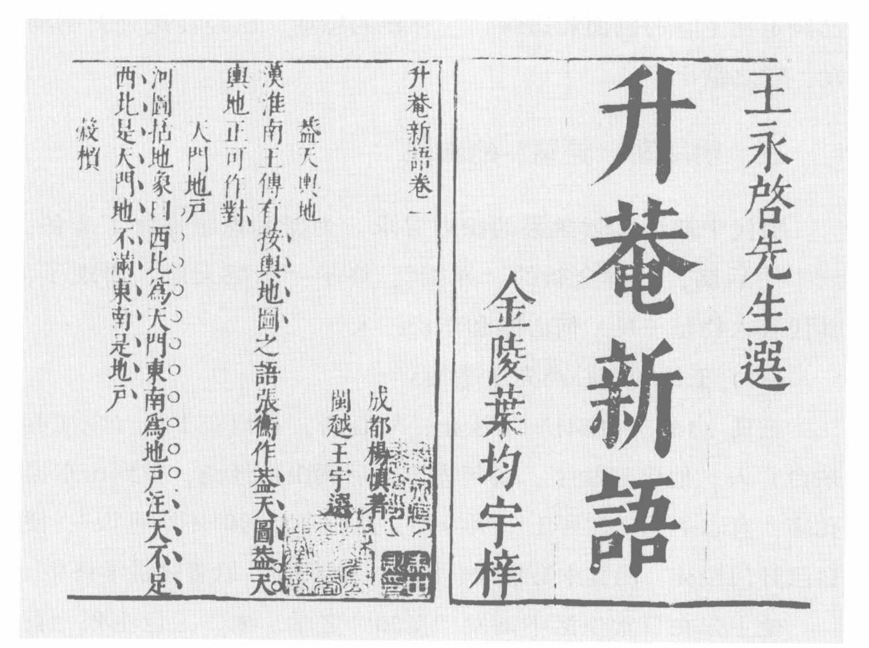

王永啓先生選
升菴新語
金陵葉均宇梓
升菴新語卷一
成都楊慎著
閩越王宇選
蓋天輿地
漢淮南王傳有按輿地圖之語張衡作蓋天圖蓋天
輿地正可作對
天門地戶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注天不足
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图104
［明］杨慎著《升庵新语》明叶均宇刻本。

4. 王廷相的《雅述》、《慎言》 王廷相（1474—1544），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前七子之一。他知识渊博，认为人的形和神都是从元气来的，有形才有神。在认识论上，他肯定目、耳、心的作用，否认有“不假外求”的良知存在。在知和行的关系上，主张“知行兼进”，“讲得一事即是行一事，行得一事即是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反对朱王二人的学说。

5. 吕坤的《呻吟语》 吕坤（1536—1618），官至刑部左右侍郎。中年以前，思想不出道学，后来融会百家，自称不属道，也不属仙释，“我只是我”。著有《呻吟语》，记录其“疾痛语”。向朱熹挑战，讥朱熹的《家礼》是“忠义之贼”，王阳明则是“自禅悟入”，认为“理”是“气之自然”，否定朱熹理在气先之说。他反对术士、命相、阳宅、葬法等迷信。主张学者应以天下为己任，提出“大无我之公”的要求。

综观这些进步的哲学家，他们几乎都是先从理学、心学中获取合理的成分，接着又提出新论。他们都主张理和心的一致，知和行的统一。在人性问题上，则都主张人性、人欲的存在和合理，反对禁欲。他们虽然和朱、王同属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但已经走到了它的侧面和边缘，一种新的思潮，已经在远处奔腾涌动，呼之欲出了。

三、明后期“异端”的出现

明代中期诸多哲学家的探索寻求，为新的思想作好了准备，到了明后期，一种全新的“异端”，终于“掀翻天地”出现了，其代表人物是王艮、何心隐和李贽三人。

（一）王艮的《心斋先生遗集》

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他出身盐丁，幼年失学，后到山西经商，曾到山东谒孔庙，有志圣学。初拜王阳明为师，但后来“时时不满师说”，便自己开门授徒，门徒中有樵夫、陶匠、农民等，以著述讲学终生。

他主张在日常生活中阐发“良知”之学。朱、王也主张“百

姓日用”之学十分重要，但他们所说的百姓日用，是指人伦之学，无视穿衣吃饭等基本要求，王艮则把理学家视为“人欲”的许多内容纳入百姓日用之道中，加以肯定。他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就是圣人条理处，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1]

[1]《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他对《大学》中的“格物”有独特的理解，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谓”，应该“以身为本”去格天地万物，强调“安身立本”，强调人的自尊自信。他对格物的这种解释，人称“淮南格物”。王艮一生未入仕，门生弟子众多。他开创的泰州学派广泛流传，影响很大。主要著作有《王心斋先生遗集》。

（二）何心隐的《爨桐集》

何心隐（1517—1579）字柱乾，号夫山，江西永丰人。30岁时江西省试第一，后从王艮的再传弟子颜钧学，毅然舍弃科举，从事讲学，与社会下层人员有广泛接触。

他继承王艮传统，认为心是万物的本源，肯定人类的物质欲望是人性的本然，应该得到满足，不能抹煞。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都有利害关系，“或交而比，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攘”，只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才是“交而尽”，是社会关系的极致。他解释君臣之道时说，君就是“均”、“群”，应该“均天下”、“群天下”，甚至提出了“无父无君非弑君”的骇人之语。他还曾想在家乡实行“合族”，过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他的这些主张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秩序，明政府把他视为“妖逆”，加上得罪了严嵩和张居正，结果被逮捕杖杀。他的著作有《原学原讲》等，收在《爨桐集》（4卷）中，后人把他的著作编成《何心隐集》。

（三）李贽的《藏书》、《焚书》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宏甫、百泉，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祖、父两辈都是伊斯兰教徒。26岁中举，官南北国子监博士、刑部员外郎等职。起初，学王阳明心学，后以王艮次子王襞为师。51岁，任云南姚安知府。54岁辞官居湖北黄

安，后居麻城芝佛院讲学，自称“异端”，剃发而留须鬓，斋居而吃酒肉，又招收女弟子。讲学时攻击孔孟，言辞激烈，听众“一境如狂”。

他认为世界是“二”，不是“一”。天下万物皆生于二，不生于一。又说：“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他思想的核心是“道”，他说：“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在认识问题上，认为人是生而有知的，人人可以作圣，人人可以成佛。又认为人的需要便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世界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界种种自然在其中”。[1]

他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人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2] 历来的大儒，都被他一一骂倒。他说孔子“亦庸众人类也”。孟子则是“舛谬不通，执一害道”。董仲舒仅仅是“特腐”的“章句之儒”。朱熹“无学”、“无术”。理学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3]

他的这些学说不容于世，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把他关入牢中。李贽不堪侮辱，便在牢中割喉自杀了。

他的著作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明灯道古录》、《九正易因》、《说书》等，还有不少通俗小说的评点。《藏书》68卷，论述了600多个历史人物，都有独特的看法。《续藏书》论述明代的历史人物。《焚书》、《续焚书》批判儒家的经典是假道学。明清时代，他的书都被列为禁书。

[1]《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王阳明先生书抄后》附《阳明先生年谱》。

[3]《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第三节　世风丕变中的通俗读物

明代末叶，世风丕变，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社会上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深入到道德标准、风气习俗、人际关系等深层次的领域。这些变化，在小说、戏剧、山歌等出版物上，都有生动而形象的反映。同时，这些出版物又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风气、道德和习俗，互为因果。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开始不满足于蛰居一方从事农业生产。《五杂俎》说："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1] 社会风气，崇尚奢华。康熙《徽州府志》说："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廓者，……今则……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以为其褦襶若此也。"对商品的要求，也有种种新的时尚。明初，南直隶的松江府，还没有鞋袜店，因为还没有穿鞋袜的习惯。隆万年间，就有鞋袜店百余家，社会风气有了巨大变化。于是出现了"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的趋利之风，飘洋过海，寻求厚利；尔虞我诈，弄虚作假成风。这些风气、习俗的变化，影响到出版工作的各个方面。社会上产生了许多可写的新题材，反映到各种出版物中，这在小说和戏剧上特别明显。重大的政治事件、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发人深省的伦理新事、通都大邑的新闻、穷荒绝徼的奇遇，这些事都是伴随资本主义萌芽俱来的，是人们迫切希望知道的。这些事引起了一批作家兴趣，禁不住要把它们写下来、传开去，使出版物的内容十分丰富。

【1】[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三"地部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

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产生了许多新的读者。他们感兴趣的是小说、戏剧、唱本，以及日用常识、通俗医学等读物，使出版物的内容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使出版业的物质力量得到很大提高。全国有好几处造纸中心。制墨、雕版、印刷、运销等出版业务，都出现了专业细分的趋势。刊印图书，已经不是一项太困难的事。图书的流通，也十分畅通。

一、反映明末社会面貌的《金瓶梅》

研究明代社会，不能不谈到《金瓶梅》。研究明代的出版，也不能不谈到《金瓶梅》。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有数十种不同的说法。创作的意图和故事的本事，也有多种说法。明朝当代传得最多的是王世贞报父仇之说，但此说也久已为人否定。

《金瓶梅》反映了明代嘉靖年间的糜烂社会。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的发迹暴亡为中心，描写了西门庆这个“衣冠禽兽”的一生。小说通过西门庆罪恶的生活和污秽家庭的描写，刻画了上自封建上层人物，下至市井无赖的鬼蜮世界。

本书的写作方式和描写的内容是一致的。细细叙述淫秽的细节，娓娓描绘种种罪恶。笔下没有憎恶，叙述无所臧否，美丑不分，善恶同词，没有激动，没有叹息，全书泛滥出一股沉沦、冷漠的气息。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1] 这条材料不大为人引用，却是很有价值的。它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主人是谁，老儒是谁，但很有见解地指出，该书是一个冷眼旁观者所见的家庭记实，而不是《红楼梦》那样是一个身在其中的主角的热情自叙。而且，这旁观者必须是阅历极深的“绍兴老儒”，才能对一切如此的无动于中。老儒阅历既深，阅人也多，就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好人。因此，《金瓶梅》中所写的，几乎全都是恶人。

【1】转引自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金瓶梅”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金瓶梅》的出版经历了从手抄到刊印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迅速，很值得重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记下了此书从传抄到刊印的来龙去脉。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之前，还没有看到《金瓶梅》，万历丙午年（即三十四年，1606年），他在北京向袁中道之兄宏道郎借这书看，袁宏道说，他只看到几卷，但知道麻城的刘涎白家有全本，是从他妻家徐文贞处抄来的。过了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袁中道进京考试，身边带有此书，沈德符便向他借来抄录。回到苏州后，被冯梦龙看到，大喜，怂恿书坊刊刻。沈德符怕这书印出来“坏人心术”，不敢答应。但是，“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如果所说的“未几时”是二三年的话，那么《金瓶梅》在苏州刊印时间大约是万历四十年左右。这和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一致的。[2]

【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我们现在所知《金瓶梅》的传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万历丁巳年（1617年），有“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系统，

就是上面一段文字所记的那一种；另一个系统是天启年间（1621—1627年）《原本金瓶梅》的系统。这两种的出入并不太大。其后，在崇祯年间，又有一种插图本，有101幅刻得很好的插图，书名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到了清代，又有张竹坡的评本。（图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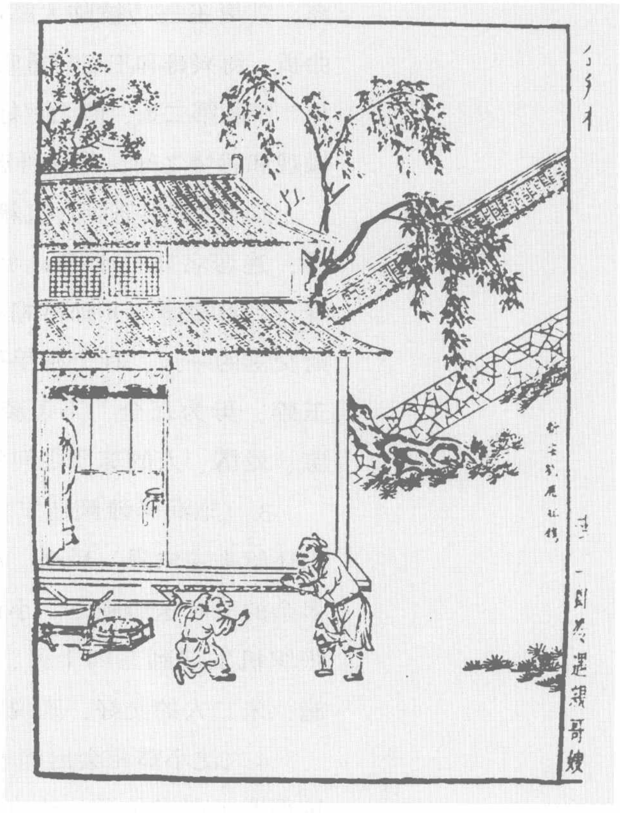


图105
《金瓶梅》崇祯刻本。

在《金瓶梅》之后，有续书《续金瓶梅》，明末清初人丁耀亢著，此后又有这部续书的删改本《隔帘花影》、《金屋梦》。开启了为著名作品写续书的风气，这是出版史上一件值得重视的事。《金瓶梅》之后，又有一些人“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仿作了若干种淫秽图书，如不题撰人的《绣榻野史》、嘉禾餐花主人编次的《浓情快史》等，这种坏风气，不能不归咎于《金瓶梅》。

二、寻求新的道德伦理的“三言”

文艺作品中鼓吹的伦理，离不开历史的继承和当代社会的倡导。“三言”、“二拍”各篇小说的主旨，都没法离开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范围。“三言”、“二拍”的作者不满足于一般的道德行为，极力追求非凡的表现、异乎寻常的作为。不单极大地丰富了固有道德的内涵，而且挣破了固有道德的樊篱，成为思想的升华和亮点。这种新思想的曙光，构成了这两部小说的历史地位。下面介绍“三言”中最有特色的几个故事，这些故事情节动人，反映了对新道德伦理的寻求，具有新时代的气息。

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1）　蒋兴哥外出经

商，其妻王三巧被陈大郎诱骗成奸，蒋兴哥休了三巧。经过不少曲折，蒋兴哥和王三巧重归于好。在封建道德中，三巧犯的是“七出”中的第二条，断无重好之理。而蒋兴哥热爱其妻，在世俗的贞操观和感情之间，蒋兴哥选择了后者，预示着新道德观的诞生。

2.《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32） 李布政之子李甲，迷恋名妓杜十娘。十娘认为李甲可以寄托终身，便设计赎身，后有轻薄头儿孙富煽动李甲，用千金把十娘买了下来。在人财交割的一天，杜十娘手持百宝箱，愤怒沉江。小说写十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不可凌辱，体现了人的尊严。小说提出了财宝、爱情、人的尊严之间的价值思考。

3.《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18） 施复拾金不昧，归还给失主朱恩。后来，施复养蚕缺桑，到滩阙去买桑，朱恩把多余的桑叶送给施复。小说提供了很重要的经济资料。施复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三四十张，反映了明末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而施、朱二人的交好，则说明了资本早期互相支援、调剂的必要。

4.《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喻世明言》40） 锦衣卫经历沈铉得罪了严嵩父子，被迫害至死。严嵩父子为了斩草除根，又加害沈铉之子沈小霞，幸亏沈的小妾闻氏聪明机智，巧为布置，才免于难。故事反映了忠奸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歌颂了忠臣义士的浩然正气，赞美了妇女闻氏的聪明机智。

5.《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33） 这就是著名的“十五贯”故事，但姓名和情节都不同。明代，这一类公案故事很多，反映了官场的腐败、盗贼的凶残、隶役的贪婪。这类故事的意义是说明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并不容易。公案中的清官，常被归结到包公、海瑞、况钟等人身上。

6.《吴保安弃家赎友》（《喻世明言》8） 故事写郭仲翔、吴保安两人间的生死友谊。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二人并不认识，从未见过面，却能够生死相托。其动力在于人类的生存，本质上说必须互相帮助。这种人类的正常关系被染上了神圣的光彩。

7.《灌园叟晚逢仙女》（《醒世恒言》4） 爱花种花的秋翁

受到宦家子弟的欺凌，在花神的帮助下，惩罚了恶人，秋翁则拔宅飞升，上帝封他为护花使者。这是一篇神话故事，作者刻画了宦家子、衙役等一组丑的形象，秋翁、乡人、仙女等一组善的形象。最后恶人掉到粪坑里淹死，作者的寓意十分明白。

8.《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喻世明言》19）　浙江人杨谦之到贵州蛮荒之地做县令，途中遇到种种怪异之事。到任后结交土官，利用当地风俗，得了不少钱财。这是一个蛮荒奇遇故事，没有什么道德说教。其作用在于拓宽人们的视听界限，把人们从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天地引向广阔世界，告诉人们远处别有一番风情，引导人们目极八荒。

9.《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警世通言》28）　本文即“白蛇传”故事。中国在很古的时候就有人和异类相爱的故事。异类中最多的是狐狸、田螺、花木等。白蛇的故事在唐朝时就有了，但白蛇是一可怕之物，后来不断变化，白蛇向善的方向衍变，降妖者则变成了一个“多余的讨厌人”。故事和主题也向追求真诚爱情的方向发展。

10.《杨八老越国奇逢》（《喻世明言》18）　西安人杨八老，在闽广经商，两头都娶妻生子。一次，杨八老被倭寇掠去，留在军中18年，在一次随寇入侵时被官兵捉到。审问他的人恰巧是他的儿子，父子团圆。这故事反映了我国东南地区遭倭寇入侵时的悲欢离合。把国难家仇用偶然性串联起来，成为一出悲喜剧。

三、反映社会风气败坏的出版物

明代末期，社会窳败，世风丕变。各个行业，各界人士，都有一些腐败现象。明代的出版物中，有一些书直接地、形象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留下了一幅幅末世陆沉的图景。这类图书对腐败现象的描写十分细致具体，以暴露为主，类似后来的“黑幕大观”。其中有一本《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可以作为代表。(图106)

《江湖历览杜骗新书》4卷，题“浙江夔衷张应俞著”，万历



图106
《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万历刻本。

间存仁堂陈怀轩刊本。另有一种张怀耿梓行本，署“万历丁巳年（1617年）春正月之吉三岭山人熊振骥撰”。两种版本都是4卷。作者把社会上骗术归纳为24类，举出了84则实例。下面列举这24类：

1. 脱剥骗8则，2. 丢包骗1则，3. 换银骗2则，4. 诈哄骗4则，5. 伪交骗4则，6. 牙行骗2则，7. 引赌骗3则，8. 露财骗2则，9. 谋财骗4则，10. 盗劫骗3则，11. 强抢骗3则，12. 在船骗6则，13. 诗词骗2则，14. 假银骗2则，15. 衙役骗3则，16. 婚娶骗4则，17. 奸情骗5则，18. 妇人骗6则，19. 拐带骗2则，20. 买学骗6则，21. 僧道骗5则，22. 炼丹骗3则，23. 法术骗3则，24. 引嫖骗1则。

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不少类似的书，例如：

《僧尼孽海》，托名唐伯虎选辑，天启刊本，共36则，从古代写起，揭露和尚、尼姑们的种种恶行。

《宜春香质》4集20回，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笔耕山房刊本。揭露当时泛滥于社会的一批“小官”们的“男风”秽行。

《鸳鸯针》（又名《觉世棒》）4卷16回。题“华阳散人编辑”，写刻本。揭露南明统治时期南方士人的科举弊端。

在短篇话本的总集中，也有些篇章揭露当时社会某一方面的坏风气。如“二拍”中有几篇揭露商贩、丹客、僧尼的恶行。

这类图书的原意是“教人拒恶”，但往往又产生“导人行恶”的副作用。这正是这类暴露性黑幕大观的“双刃效应”。今天看来，这些书提供了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形象记录，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十二章　明代少数民族文献的出版事业

推翻了蒙古族统治的元朝而建立起来的明朝，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元朝王室的后裔各部总称鞑靼或瓦剌退守长城以北，有时与明朝对抗，双方发生战争；有时归顺明朝，接受明朝册封，保持着友好往来。明朝在东北的女真族地区设奴儿干都司，在蒙古族地区设“兀良哈三卫”，在西部藏族地区设乌斯藏都司和朵干都司，在新疆、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设哈密等八卫，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确立并完善了土司制度。

明初攻下大都（今北京）后，于洪武元年（1468年）曾下诏：“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1]，延揽少数民族中的人才。但后来实行的《大明律》中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许本类自相嫁取，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2] 这实际上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的政策。

有明一代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民族文字书籍的编撰和出版继续加强，另一些民族由于民族的逐渐消亡，文字无人使用，其出版也随之终止。

【1】《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六，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第一节 四夷馆和《华夷译语》

一、四夷馆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明朝建立后，与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交往逐渐增多，许多国家和少数民族首领遣使前来朝贡，碍于语言不通，使这种交流受到严重影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明成祖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学习译书，规定这些学生遇到开科时仍可参加科举考试，这38人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四夷馆的学生，他们分成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和缅甸等8个馆，四夷馆地点在北京东安右门外。[1] 后来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加，又在正德六年（1511年）增设了八百馆，万历六年（1578年）增设了暹罗馆。

【1】《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四夷馆隶属翰林院，由太常寺少卿（正四品）主事。在明朝前期，也设太常寺正卿（正三品）管事，但不是常设，如正德年间和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有正卿，其他时间基本上不设，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后正式裁革。

四夷馆下设十馆中，教师优秀者称序班，经考核称职者可以分别加主簿、光禄寺署丞等职衔，另有火房、长班、皂隶等工役人员若干。

遇有某馆教师空缺，需要从国外或民族地区邀请补充者，由四夷馆向内阁申请，由礼部行文相关边防地区寻访合适的翻译人员送礼部考核，通过后授以相应的官职，送四夷馆任教，工部则分配住房，光禄寺拨一名厨役按一定的标准照管其生活。这些“外籍”教师如果未婚，因路途遥远也不准备回乡婚配者，经申请可允许其在京与相应的军民之家成婚。其亡故后，允许在宛平、大兴二县安葬，其子孙可根据情况进馆学习。增设暹罗馆时，由大学士张居正出面奏请批准，专门从暹罗国请了握闷辣等三名教师前来任教，由广东布政司接送至北京。工部在四夷馆西

侧连接回回馆处造两所屋子，以供教师教学、居住之用。

可能是因为从外部引进教师有困难，经若干年后，各馆教师大多是由资深的汉族专业人士来担任了。

四夷馆的学生最初是从国子监监生中挑选，条件是“年幼俊秀”。后来到天顺年间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认为这是一条进身之路，私自投托教师，学习“番文”，官方认为“番字文书多关边务，教习既滥，不免透漏彝情”，所以明令禁止。后来觉得番文十分难学，非是一朝一夕能学通晓，所以又按照太医院选收医生事例，允许四夷馆十馆教师的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亲世业子弟报考，经会考通过者分拨各馆学习，如果译字生缺人太多，也可请礼部组织考试选补。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规定，每六年收考一次，每次取二三十人，实际上非缺员甚至不准收考，如万历六年四夷馆只剩官、生50余人，因为增设暹罗馆，又续收了21人。此后一直没有收取学生。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只剩下教师18人，而学生则全无有，于是紧急上报，才于第二年收取了94名译字生。

二、四夷馆的日常事务

四夷馆是明代培养外国与国内少数民族语文翻译人才和翻译外国与民族地区朝贡文书的专门机构，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合格、优秀的翻译人才为皇家服务，它的日常工作也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进行。

四夷馆有明确的学制规定。学员通过考试，进入相应的专业馆后，要经过三年学习，由翰林院会同礼部进行考试，在午门内进行，这种叫“会考食粮”，通过后可以得到每月一石米的待遇，称为“食粮译字生”；再学习三年，再经过会考，名为“会考冠带”，优秀者给与冠带，称“译字官”，仍给米一石；再学三年，考试优秀者授以序班职号；如初试没有通过，可再读三年，再试不中者过六年再试，三试均不合格者淘汰为民。即是说一名学生要就读9年，经过三次大考，方能成才。如果进馆时最小年龄为

15岁，毕业时已是24岁的青年了。

早年，四夷馆学生每日进馆读书，后因馆小人多，改为逢三、六、九日及每月朔望到馆，即每月到馆11次。到馆后，各馆教师要对所教功课进行检查、考试，并令学生背讲诏敕、来文等书。遇到四夷馆堂官到馆，升堂后掣签测验，如学生对所学杂字课文不能背、写则予责罚。

每月十六日各馆要进行一次考试，由教师将译字生考试成绩分成等级。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季考。季考比较隆重，考前数日要由堂官出告示，考前三日学生将各自准备的统一试卷写上自己的姓名交出，由四夷馆弥封钤印编号，用浮签写上译字生姓名，临考时再发给本人。季考优秀者送内阁候用，二、三等者视为平常，四等者予以责罚，连续四等者取消会考资格。

四夷馆教师参加政府三年一次的统一考察，到了考察之年，各教师履历、考核结果要造册报翰林院转吏部考功司。各馆教师要到九年后第三次考察合格后方可加衔。序班升主簿职衔（从八品），主簿升光禄寺丞职衔（从七品）。

四夷馆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考勤制度和礼仪制度，以加强对译字生的管理。

四夷馆除教学工作外，另一重要任务便是翻译外国和民族地区的来文和皇帝给他们的敕谕及朝廷回函。这方面具体情况可资参考的文献不多，但从一些档案中略可看出一些端倪。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正月，徐阶在一份题奏中说："每年各夷进到番文及敕谕、夷使事务颇为繁剧，乃责成于一二教师使之辨译、书写未免苦难迟滞。"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五月，沈一贯奏道："见在止有教师等官一十八员散处十馆，并无一名译字生习学，各官又皆年深齿迈，景逼桑榆，每遇彝文堆积，辨验书写未免苦难濡滞。"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顾秉谦在奏文中写道："每馆见任教师止有二三员，而八百馆今已故绝，传习无人。每遇译写来文，回答敕谕，少则尚可苟定，多则动称堆积。"这三份不同时期的奏折表明两点，一是译写"番文"，回复"敕谕"，是四夷

馆的工作，二是明晚期原来六年一招译字生制度已经废弃，四夷馆官生奇缺，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彝务”。

四夷馆所属各馆事务繁简不同，鞑靼馆是事务最为繁忙的一馆。在明晚期，女真各部普遍使用蒙文书写进贡表文，因此女真馆业务由鞑靼馆兼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沈一贯在奏折中说：“查鞑靼馆除本馆职业外，又兼译女直来人进贡袭替来文并回赐敕书及译写顺义王表文，喜峰口验放来人，比之别馆繁剧数倍。”喜峰口是蒙古地区进入内地的重要关口，蒙古各部进贡多从此过。四夷馆派员一名，要求行为端正，办事谨慎，年长老成并谙晓蒙古语的官员前去当差，三年为期。这一官差一直由鞑靼馆承担，在荒凉的边关一住三年，是件苦差事，以致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有的人坚辞不去，只好派尚在读书的译字生前往，为了鼓励他，提前给他冠带并给予相应的生活补助。

四夷馆还有一些官差，如国家派重臣到国外，需派通晓该国语文的官员前往充当译员；翰林院内部的一些部门如文华殿书办、史馆纂修、诰敕房等处缺员，往往从四夷馆精通小楷者中选用。

四夷馆的官生在生活上有较为优厚的待遇，除官员有俸银，三年学历以上的学生有月粮外，每日在馆内的生活从粮、肉、酒、柴到冬日取暖的木炭以及每年消耗的纸张笔墨都有详尽的规定和充分保障。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宛平、大兴两县每年提供的纸笔银249两，另有房租收入50两等，全年共310余两。但到明代崇祯年间，宛平、大兴二县常有拖欠，经费上已是捉襟见肘了。

三、四夷馆编纂的《译语》

明代四夷馆通过翻译和教学实践，编撰了一套《译语》，以供各馆使用。这些《译语》，由十个馆分别编写，内容分两部分，一是“杂字”，二是“来文”，有外文或民族文字与汉文对照。

四夷馆编的译语原书在“译语”之前冠以所编撰馆的馆名，如《女真馆译语》、《鞑靼馆译语》、《高昌馆译语》等。在传抄过程中，有的明清抄本题名为《华夷译语》而不著馆名。后

人为了使之与洪武年间火源洁等人编纂的《华夷译语》（被称为甲种本）相区别，称为乙种《华夷译语》或永乐《华夷译语》。（图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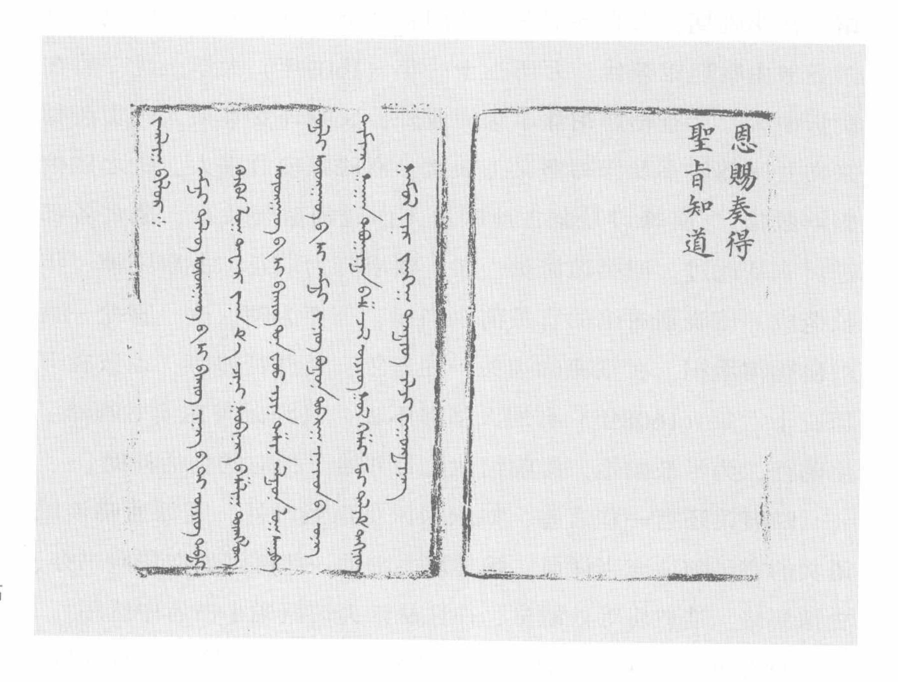


图107
[明] 回鹘文、汉文抄本《高昌馆来文》。

四夷馆所编的《译语》中的“来文”按常理推测，应该是各馆将辖管地区的朝贡文书选辑成册，加以汉文翻译而成，而“杂字”应是将朝贡文书中常用的词摘出以汉文对照而成。各馆的“杂字”都分类排列，分为17类的有四种，分成16类和18类的各二种，分为20类的一种。这种分类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元代编纂《至元译语》。这在当时是为了帮助汉人学习蒙古语的工具书，将与汉文词对照的蒙古语词用汉字写出注音，而不写蒙古文。全书分为天文、地理、人事、五谷等22个门类。明洪武年间编纂的《华夷译语》沿用了这种编辑格式，这部蒙汉分类词汇集将词汇分为18门，每个词先写蒙古文，再写汉文词义，最后加汉音注的蒙语语音。如“tengri，天，腾吉里”等。（图108）四夷馆编的十种“杂字”的编辑体例与此是一脉相承的。以《高昌馆杂字》

为例，全书分为17门类，即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人物、身体、宫室、器用，衣服、珍宝、饮馔、文史、方隅、声色、数目、人事兼通用，后附“续增”，共收794个词。每个词分三行竖写，自右至左为回鹘文、汉文词义，汉字回鹘语标音，如“altun lok、织金、俺吞禄”、“kax koor，玉带、哈失库儿”等。（图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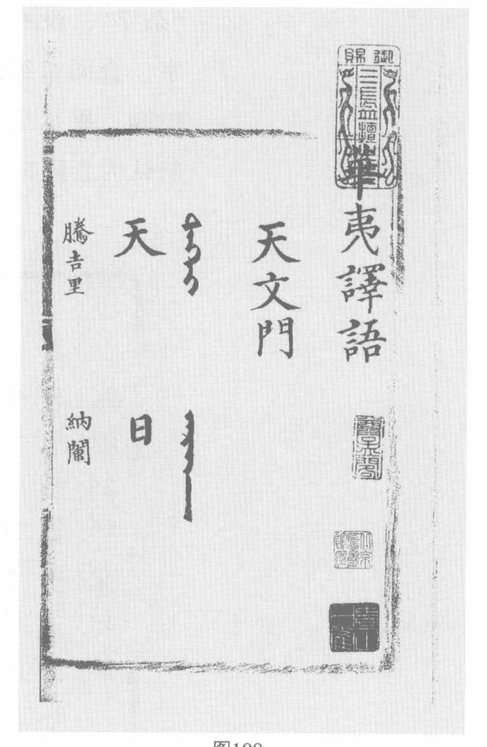


图108
[明]汉文、蒙古文抄本《华夷译语》。

各馆译语在传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有些本子已流到国外，如各馆的“来文”部分国内版本大都阙如。

明代的会同馆是接待外国和民族地区贡使和来访官员的机关，属礼部管辖，由礼部尚书兼领馆事，弘治后由主客司主事提举馆事。会同馆负责朝贡使团的接待、翻译、点视贡物和在馆互市等工作。会同馆也编有一套《华夷译语》，被称为丙种《华夷译语》。这种《华夷译语》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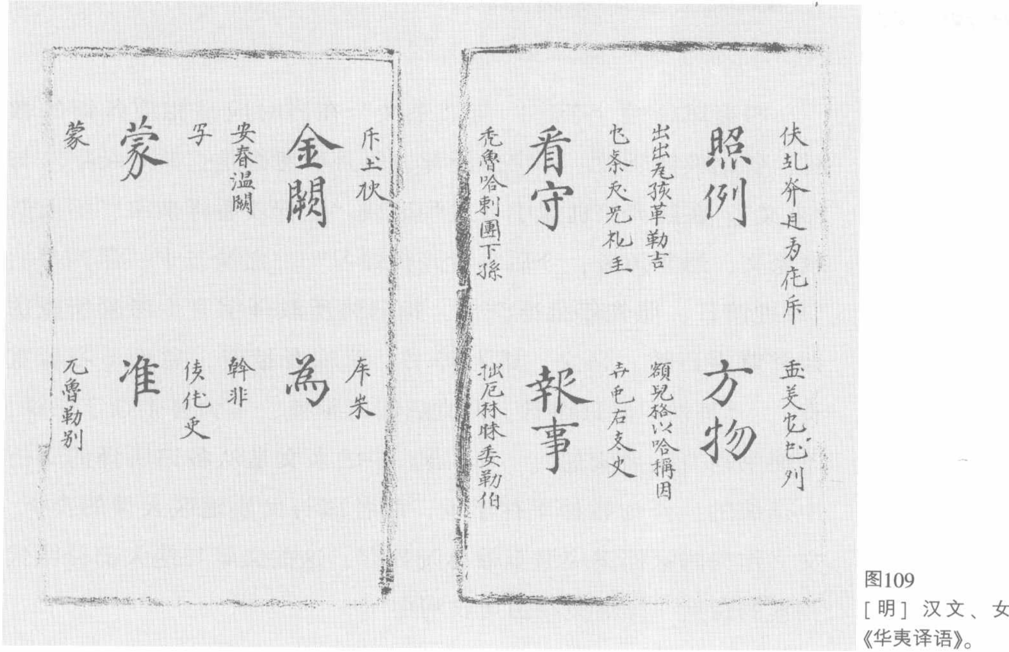


图109
[明] 汉文、女真文抄本《华夷译语》。

“杂字”，没有“来文”，“杂字”也仅有汉字注音，没有民族文字。会同馆编的译语有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直、百夷等十三馆。一般认为会同馆本译语要比四夷馆本晚。（图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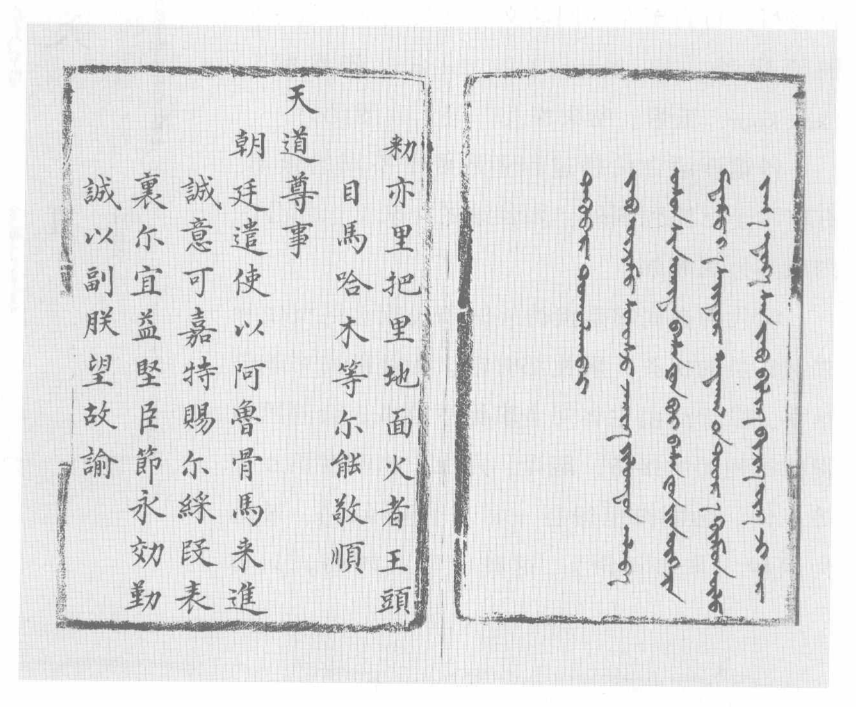

勑亦里把里地面火者王頭
目馬哈木等尔能敬順
天道尊事
朝廷遣使以阿魯骨馬来進
誠意可嘉特賜尔綵段表
裏尔宜益堅臣節永効勤
誠以副朕望故諭

图110
明抄本《高昌馆课》之蒙文、汉文对照来文。

四夷馆所编“杂字”与“来文”在当时应是相应各馆的教材，各馆教师所教、译字生所背、每月所考都是这些“杂字”与“来文”。在四夷馆训规中有这些记载：“往昔攻番译杂字，不及诰敕来文，恐非急务，今后二者并行肄习”（嘉靖二十一年四月）；“每进馆日，照先年批准教规，馆师将所教译字官生考验所授仿课并背讲诏敕、来文、馆考等书，荒疎者量责，怠惰不习者重责”。“每候本堂进馆日，升堂后问行掣签，考验各生杂字书课，不能书写背讲者责惩”。《译语》中的来文是从各馆所译的奏折中选编的，作为教材幸存于世，而各国与民族地区大量的奏折、文书作为国家档案应缴至翰林院收存，这些文献与绝大部分明代档案的命运一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

四夷馆《译语》中的“来文”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以高昌馆和女真馆为例，各篇来文汉文通顺，书写格式也符合当时的要求，但从所附的民族文字来看，都是按汉文逐字逐词直译而成，没有反映出畏兀儿人、女真人的语言情况，很难从中看到回鹘文和女真文的语法特点。这种用汉语语法连缀民族文字单词堆砌而成的来文，可以肯定决非出自少数民族文士之手，而是由汉人代撰的。即是说先写成汉文表文，再逐字逐词译成民族文字。这些民族文字，词语排列在相应的汉文词语旁边，当然与自身语言的语法要求谬之千里了。已知除高昌、女真两馆外，《回回馆译语》也有这样的现象，其他七馆的来文是否亦是如此，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不会仅这三馆如此。

尽管“来文”有此种问题，但四夷馆《译语》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首先它有重要的语文价值。这些主要产生于15世纪初的《译语》保存了一批当时的外国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为今天研究这些古代语言文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尤其是一些已经变成死文字的古代语言如女真文更有特殊的意义。面对大量女真文历史文献真不知道如何下手，而带有汉字注解的女真馆杂字正好为解读这种已消失的文明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其次，四夷馆《译语》还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译语》中的“来文”部分主要记载了外国和民族地区向明王朝的朝贡活动，反映了明政府与外国和边境地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有的可以补史籍记载的不足。

最后，四夷馆《译语》的编纂给清代提供了一个范本。清代的四译馆和乾隆时代的四译会同馆所编纂的译语遵照明四夷馆的既定格式。明四夷馆所编“杂字”的体例甚至还影响到清代官方和民间所编的许多辞书。可见明代四夷馆《译语》在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1]

【1】本节主要参考[明]吕维祺撰，[清]许三礼、霍维翰增辑《四译馆增定馆则》二十卷；[清]曹溶、钱綖辑《新增馆则》二卷。明崇祯刻本，清袁懋德重修本。本节直接引文除说明出处者外，均出于此书。

第二节　蒙古文文献的继续出版

一、明代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

元朝灭亡后，蒙古统治者退居和林，史称“北元”。北元与明朝进行过多次战争，至1399年最后一个元裔大汗被瓦剌部杀死，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北地区的蒙古族称“兀良哈三卫”，成为明王朝的藩属。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哈密和甘新设立羁縻卫，管理蒙古各部，称为哈密卫和关西七卫。另外在察合台汗国故地别失八里和土鲁番也生活着大批蒙古人，这些蒙古族后来接受了伊斯兰教，逐渐被畏兀儿人同化。

东西两部蒙古互相争斗，终明之世，未有断绝。西部蒙古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瓦剌势力强大，至明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继王位后，达到全盛时期，他表面上仍奉元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际上想利用脱脱不花号令全蒙古并准备取而代之。但他并非属于黄金家族，不能得到正统思想很浓的蒙古各部的拥护，为人专横残暴，结怨甚深，明景泰五年（1454年）在兵变中被杀。此时蒙古各部重新陷入混乱状态。至成化十六年（1480年）达延汗继大汗位，统一了东部蒙古，正德十二年（1517年）达延汗逝世后，在征讨兀良哈的战争中，土默特部万户俺答汗很快崛起，被明王朝封为“顺义王”。他在位期间，使蒙古土默特部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他与明朝保持友好关系，并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对蒙古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全蒙古地区称雄几十年，为蒙古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继位，在蒙古、后金、明朝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中苦苦坚持，直至崇祯七年（1634年）病故，其所率察哈尔部也于翌年被后金征服。

元朝灭亡后，整个明代蒙古地区基本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中。这一时期黄教的传入成为蒙古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藏传佛教

早在元代已是最为尊崇的宗教，但元亡后，萨满教重新成为东西蒙古最为盛行的宗教。俺答汗时期，迎请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到青海传教，俺答汗给索南嘉措上“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意为遍知一切金刚持、学识如大海的上师。从此黄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给蒙古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也自此出现在史册上。

明代蒙古族的教育在战乱中延续下来，许多贵族领主受过良好教育。当时有私塾教育、寺院教育和选派子弟出家到西藏学习佛经。自俺达汗朝贡后，中原的纸张不断输入蒙古族地区，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明朝政府也在一些蒙古卫所设立儒学。当时蒙古族译经、学经成为风气，撰写了多部有影响的史书。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各部在不同时期制订多种法典。口头文学作品在战乱中广泛传播，英雄史诗《江格尔》在西蒙古地区传唱。有民族特色的蒙古医学和历法也得到发展。

二、明代官方蒙文图书的出版

明代官修图书的机构主要是翰林院，执掌翰林院的官员为学士，下属诸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典籍、侍书等。编修亦属其中。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编修马沙亦黑奉敕将蒙文本《蒙古秘史》译成汉文，后收入《永乐大典》中。此译本蒙古文用汉字译音写出，每个词旁译注汉文词义，每节附有内容意译择要，被称为汉字标音本。全书分282段，记录了成吉思汗谱系、蒙古各部落源流、成吉思汗生平及窝阔台的事迹，是研究蒙古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蒙古文原本已佚，现此书有两个版本。一种是正文10卷，续文2卷；另一种是15卷本，清顾广圻收集整理的为12卷本，收在《四部丛刊》中。另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叶德辉观古堂刻本。清鲍廷博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本子是15卷，钱大昕为此辑本写了跋语，此本被称为“钱本”。《元朝秘史》十五卷本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另有抄本多种。

明王朝建立之初，与北元时战时和，后来局势较为稳定，双方来往更多。或蒙古派人进贡，或明朝遣使宣慰，都有语言文字的翻译问题。奉明太祖之命，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等人编纂了《华夷译语》，这是一部用汉文与蒙古文对照的词汇和公文汇集。全书分为“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共收844个字词，分为17类，每一蒙古语词头用汉字标音。“来文”收录12篇奏文，用汉蒙两种语言对照，蒙古语用汉字注音。《华夷译语》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刊印，作为蒙汉翻译的课本，提供给学习蒙古文的汉族学生使用。洪武本《华夷译语》给明清两代编撰同类图书提供了一个范例，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中央政府在万历年间对元大德年间刊印的蒙古文《甘珠尔》作了补译，增入刊印，崇祯初年还进行过一次校勘。

在明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所著的《酌中志》一书中记载了明内廷刻印的所谓“内版”书目，其中有“《华夷译语》一本，八十八叶”、“增定《华夷译语》十一本，一千七百八叶”。书中还记载有“达达字孝经一本，四十二叶”。[1] 前述《孝经》在元代已译为蒙古文，并以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刊印过，从刘若愚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明代也刊印过蒙古文《孝经》，但倒底是利用元版新印还是重新刻板则不得而知了。

【1】［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记略》。

三、明代蒙古地区蒙古文图书的出版

（一）世俗文献

1. 法律著作：为了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维持部落之间、统治者和民众上下之间的社会秩序，蒙古统治者颁布了许多法令、法规和法典，有的是各部自行规定，有的是在会盟时制定。这些早期的法律多已失传，现存最为著名的有《阿勒坦汗法典》、《白桦法典》和《卫拉特法典》等。

《阿勒坦汗法典》又称《俺答汗法典》，是16世纪俺答汗统治时期形成的一部法典。共分13章，首尾两章是前言和结语，具体法律条文共11章115条。法典确定了黄教和达赖喇嘛、俺答汗的

地位和《法典》的效力，并对命案、伤残案、偷盗案、叛逃案、夫妻关系、主奴关系等各方面作了相应的规定，对救济他人、抗灾保畜等方面作了奖惩规定。

法律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阿勒坦汗法典》当然也不例外，但这部法典对于安定社会秩序、保护百姓生命财产也有较好的作用，对于推动蒙古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

《白桦法典》是喀尔喀部蒙古在明代后期制定的法规，1970年在蒙古国肯特山一座佛塔中发现，因用蒙古古文写于白桦树皮上而得名。《白桦法典》是喀尔喀各部领主在不同时间会盟时陆续制定的。共18个法规，内容包括会盟、结盟、调整封建领主间关系、共同御敌、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藏传佛教以及刑事、民事案件的惩处等。

《卫拉特法典》正名《蒙古—卫拉特法典》，音译为《察津毕其格》，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喀尔喀部和卫拉特部首领会盟时制定的法典。当时喀尔喀部和卫拉特部东面受到后金的进攻，西面受到沙俄的威胁，内部的阶级矛盾也在加剧。为了消除内乱，共同抵御外部威胁、保护封建主和宗教的利益，喀、卫两部和处于伏尔加河的部分土尔扈特部首领制定了这部法典。比起《阿勒坦汗法典》，这部法典内容更为广泛、全面，对僧侣与宗教、卫拉特与喀尔喀关系、驿站与运输、财产与继承权、家庭婚姻、畜牧与狩猎、赋役、刑法与审判等都有规定，是研究17世纪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文献。这部法典原件已佚，只有蒙古文和托忒蒙古文抄本流传。

2. 历史著作：蒙古族一向有珍视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在明代蒙古族处于分裂、动荡的大环境里，仍然有不少重要的历史学著作问世。

《阿勒坦汗传》是现存用蒙古文撰写的明代蒙古历史的最早的著作。此书又名《俺答汗传》，成书于1607—1611年，作者佚名，据考证应是俺答汗贴身侍从官员，根据俺答汗义子达颜恰的记录和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写成此书，以编年体详述了俺答汗

的生平和黄教在蒙古传播的情况。书中所述事件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较准确，且可与汉文史籍相印证，还可补《明实录》等史籍的不足。是研究明代蒙古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此书于1958年发现，原藏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王府家庙内，为手抄本，原书题《名为宝汇集之书》，正文题《介绍转轮王阿勒坦汗生平的名为宝鉴之略传》、《天圣阿勒坦汗之善行传》，书末题为《转轮王阿勒坦汗传》。[1]

【1】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94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白史》，全名《崇高至上转轮圣王十善福白史》。此书是忽必烈时代颁布的法律制度总汇，其中列举宗教和行政职位，指出其所管职责；定出四个佛教节日及季节和畜牧业中的大事；规定了有关僧俗犯罪的惩治条例及立功受奖规定；还记载了忽必烈所定下的祭祀成吉思汗的规定，是一部政教并行制度的典章性著作，是用蒙古文撰写的最早历史文献之一。16世纪末为鄂尔多斯的呼图克图·绰克查松·吉鲁肯·岱青·彻辰·洪台吉于松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发现，洪台吉将此书与元代帝师必兰纳识里抄本进行了校勘、修订，并续修到明代，补充记录了明代蒙古的历史和黄教在蒙古的传播情况。此书一直以抄本流传，有多种版本。

《黄金史纲》，全称《诸可汗源流黄金史纲》，俗称《小黄金史》，以与罗卜藏丹津的《蒙古黄金史》相区别。此书作者佚名，成书时代有不同说法，大约在1604—1627年之间。此书不分卷，记述了古代蒙古直至林丹汗时代约270多年的历史，是《蒙古秘史》之后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蒙古编年史。书中关于成吉思汗家族的记载为《蒙古秘史》所缺或截然不同。对14—16世纪明代蒙古鞑靼、瓦剌两部的蒙古历史记载尤详，其写作体例对后来的史书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作者从宗教立场出发，将蒙古族源同印度、土蕃联结起来，有违历史真实。此书以手抄本流传。[2]

【2】朱风、贾敬颜译：《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黄史》全名《古代蒙古汗统大黄史》，作者与成书年代不详，有多种说法，但都认为成书于1662年前。此书叙述蒙古的历史，对蒙古各部首领的系谱记载尤详，特别是记载了有关喀尔喀

社会制度方面的资料，喀尔喀女贵族的系谱仅见此书。本书还利用了藏文文献，记载了成吉思汗及其后人与西藏的宗教关系，提供了一些早期蒙藏关系史料。书中一直写到17世纪末，有关清初部分为后人所补。此书主要有四个版本，三种藏于俄罗斯，一种藏于蒙古国乌兰巴托国立图书馆，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1]

《本义必用经》，作者锡埒图·固什·却日吉，别名文殊度席利·固什·却日吉瓦，呼和浩特人，16世纪末17世纪初蒙古翻译家和史学家。此书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早期传播史，保存了有关蒙古与西藏关系的大量史料。有多种手抄本流传至今。

明代的蒙古文史学著作，都形成于明代晚期，作者都是喇嘛，这些史学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观点都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但这些史书不但为后世保留了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其体例和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出现的历史著作。

3. 文学著作：明代的蒙古族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有的是口头文学作品，有的经过长期流传，最后形成为书面文学作品。有的史学著作也极富文学价值，如《阿勒坦汗传》等。这时期文学著作主要有：

《江格尔》，是流传于西部蒙古的传统英雄史诗，被称为中国三大长篇史诗之一，是研究蒙古族文学、历史、语言、民俗等方面的重要文献，有蒙古文、托忒蒙古文的手抄本传世。[2]

《格斯尔故事》，由藏族史诗《格萨尔》演变而来。《格萨尔》于16世纪由西藏经青海传入蒙古，与蒙古自己的史诗相融合，产生了蒙古文版的《格斯尔》。此书在明代只有手抄本流传，入清后方有刻本问世。

《乌巴什洪台吉》，是一部散文诗式的小说，约写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以东西蒙古之间的战乱为背景，描写了和硕特部一名幼小的牧童与封建领主乌巴什洪台吉的斗争，反映当年东西蒙古封建领主常年混战的历史。此书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

萨满教曾长期被广大蒙古人信奉，在蒙古民众中间流传着大量萨满教的歌词，都是用蒙古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体裁演唱，

【1】乌力吉图校注：《黄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

【2】仁钦道尔吉整理：《〈江格尔〉论》，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这些萨满教歌词有的已形成书面文学，以抄本形式流传。

蒙古一些封建领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创作的一些诗文也留传下来，如喀尔喀领主朝克图台吉写的的诗歌被刻上摩崖，还有一本《洪台吉的思念》以手抄本的形式留传至今。

（二）宗教文献

16世纪中叶，俺答汗提倡信奉黄教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大规模传入蒙古地区。蒙古各部的封建领主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纷纷修建寺庙。作为佛寺“三宝”之一的佛经需要量陡然增加，明王朝印制了汉文与蒙文藏经输往蒙古，更多的是藏文佛经被译成蒙古文。参与这项翻译工程的有蒙、藏、汉的学者，其中规模最为巨大的是将藏文《甘珠尔》108函译为蒙古文，包括经和律。此项影响深远的翻译工程分别由土默特部和察哈尔部组织进行。土默特部在万历年间在顺义王扯力克与三娘子的倡导下，由著名翻译家阿尤希、锡勒图固什绰尔吉等组织一批通晓蒙藏文的译者进行翻译，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全部译毕。察哈尔部图们汗在16世纪末开始此项工作，至崇祯初年（1628—1629年）林丹汗时期由贡噶敖德斯尔班弟达和昆登固始等翻译完毕。这两部最早的蒙古文《甘珠尔》都是手抄本，土默特部翻译的《甘珠尔》今已不存，林丹汗时代译成的《甘珠尔》现尚存残本13卷，系用泥金精工抄写而成，被称为《蒙文手抄金字甘珠尔》，现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大量佛经的翻译，特别是卷帙浩大的《甘珠尔》大规模有组织的翻译，使蒙古语的文字和语法得到规范，并吸收了大量印度、西藏的词语，大大丰富了蒙古语的语词。为了便于书写梵文和藏文经典，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蒙古喀喇沁帝的阿优希巴格什还创制了“阿利伽力字”，对后来的佛经翻译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观明代官方蒙古文图书的出版，都是出于保持与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的需要，如早期为了培养翻译人员编撰的工具书，晚期为了满足蒙古宗教需要刊印的蒙古文《大藏经》都是如此。这说明了明代十分重视对蒙古关系，也反映了汉蒙的文化交

流。明代蒙古地区虽有一些图书出版，但对于近300年的历史时空而言，这些图书数量显得相当稀少，这是当时蒙古地区长期处于动荡分裂的状态所致。所出版的图书大多在后期，或是在相对稳定一些的情况下方才问世。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出版物无论是文学、史学等作品都带有浓重的藏传佛教色彩，反映了蒙古文化在黄教传入后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整个明代，蒙古地区的图书至今尚未发现刊印本，都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总的是因为当时处于战乱之时，经济、文化受到严重摧残，直接原因是在草原游牧经济的状态下，难以掌握、发展印刷技术；纸张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蒙古地区的用纸都是靠与明“朝贡”贸易输入，自己并不生产纸，这对图书的流传起到了抑制作用。

第三节　察合台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15世纪后半叶，在与瓦剌部的争斗中，在自身无休止的内乱中，东察合台汗国四分五裂，逐渐灭亡。1514年9月，察合台国国王阿黑麻之子赛德汗在叶尔羌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史称叶尔羌汗朝或叶尔羌汗国。其疆域大约东到且末、若羌，南以喀喇昆仑山脉为界，与西藏相接，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抵达喷赤河和费尔干盆地，北以天山为界，接哈萨克领地，再往东接吐鲁番，吐鲁番一度为叶尔羌征服，但稍强时即分离。费尔干地区也有这种游离性。

叶尔羌汗国初期社会比较稳定，出现过一段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时期，大约维持了近百年的时间，后来便出现了内讧频仍的混乱局面，尽管有一段阿不都拉汗的“中兴”期，但最后在和卓势力扩张和准噶尔部的入侵中，叶尔羌汗国于1680年灭亡，前后共存166年。

察合台文在元代已经流行，前述东察合台汗国时期创作了《先知传》、《爱情篇》等重要著述，在其后又创作出大量文献典籍，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文学、医学等多方面。

《古丽和诺鲁兹》，作者鲁提菲（1366—1465），原名艾拜都拉，生于喀什噶尔，青年时代在撒马尔罕学习。他一生贫困，但著述甚丰，撰写了涉及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共20多部作品。但现在部分已经散佚，只有长篇叙事诗《古丽和诺鲁兹》和抒情诗集《鲁提菲集》存世。他作为中亚察合台文学的文坛高手，被称为“艺术大师”、“语言皇帝”。他的代表作为2 400行的叙事长诗《古丽与诺鲁孜》，表达了纯真爱情、勇敢精神与爱国主义热情，流传极广，在维吾尔文学的长河中掀起了又一个高峰。

鲁提菲用波斯文和察合台文进行创作。他的波斯文作品在当时属于最优秀的作品，但没有留存下来。他的维吾尔语抒情诗在突厥语民族中广为传唱，对维吾尔、乌孜别克、阿塞拜疆等民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诗集的手抄本分别收藏于塔什干、圣彼得堡和英国国家图书馆中。鲁提菲还将15世纪史学家歇里甫丁·艾里·叶兹迪的波斯文著作《凯旋记》译为察合台文，但没有流传下来。

《赛卡克诗集》由10部史诗组成，作者赛卡克生活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河中地区，长期担任乌鲁克伯克的顾问，对其详细情况所知甚少。长期的官宦生活使他的作品大多是歌颂帖木儿汗王朝，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文笔优美，被认为在“维吾尔语言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阿塔依诗集》的作者阿塔依出生于15世纪初，在中亚赫拉特城和贝利赫城生活，生平不详。他受过伊斯兰的经学教育，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他写的抒情诗语言隽永，节奏明快，艺术水平很高，与鲁提菲、赛卡克等人齐名。其作品只有一个手抄本收藏在俄国圣彼得堡。

《尕依达诗集》，尕依达（1403—1493）是著名的维吾尔抒情诗人，其生活创作都在赫拉特城。他的诗歌内容积极向上，在突厥语族群众中广为流传，有很高的声誉。

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艾里谢尔·纳瓦依（1441—1501）的作品是察合台文献中最光辉、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他的作品五百多年来对维吾尔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到广大维

吾尔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喜爱。纳瓦依从小就开始学习古典文学，到十八九岁他已经掌握了逻辑学、哲学和数学等方面知识，博学多才，引起了当时著名的诗人们的极大关注。1459年纳瓦依受当时暴君的迫害被流放，于1469年回到赫拉特城，1472年被任命为宰相。1477年纳瓦依不满宫臣们的造谣中伤，加之对创作事业的渴望，辞去了宰相职位。纳瓦依是15世纪中亚察合台文的重要作家，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

他创作的《四部抒情诗集》、《五部长诗集》、《书信录存》、《名人之谈》、《两种语言之争论》、《五种惊愕》、《心中独钟》等作品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他的诗集被称作“思想宝库”。他的作品大多以手抄本流传。（图111）

图111
察合台文抄本《纳瓦依诗集》。

在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时期，还有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哲学、医学、文学、伊斯兰神学等学术著作被翻译介绍过来，形成了一种文化繁荣兴旺的局面。

在叶尔羌汗国前期，察合台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众多的史学、文学作品纷纷问世，还出版了一些医书和农书，大量外国图书译为察合台文，一个新的察合台文化繁荣期开始了，这一时期较为主要的作家和作品有以下几种：

赛德汗诗歌。赛德汗是叶尔羌国的开国汗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他可以即席创作，所作诗歌雄劲有力，可惜没有结集流传下来，只在《拉失德史》中有若干记载。赛德汗精通维吾尔语和波斯语，但他很少用波斯文创作诗歌。

拉失德汗和王妃阿曼尼莎汗诗歌。拉失德为赛德汗之子，他和他的王妃阿曼尼莎汗都是著名的诗人和音乐家。拉失德汗著有《拉失德诗集》、《拉失德格则勒选》两个短篇诗集和《斯拉丁纳曼》、《麦许克纳曼》两部长诗，王妃著有《纳菲赛诗集》，《美的品德》、《心灵的协商》等作品，但都失传了，只有在史学著作《编年史》中收录了拉失德汗的一些诗歌片断。

卡迪尔汗诗歌。卡迪尔汗（？—1572）全名玉素甫·卡迪尔汗·叶尔坎地，叶尔羌人，任拉失德汗宫廷首席乐师，他最大的贡献是收集和整理了维吾尔古典音乐《木卡姆》，同时他又是一位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作约二千多首双行诗，还写过一些诗歌评论，自编了九卷本的作品集，但没有流传下来。

长篇叙事诗《世事记》（又译为《梦里大千》、《照世镜》），作者是阿亚兹·西凯斯泰。这部长诗为双行体，共64章，2 650行。讲述了王子斐鲁兹夏和仙女悲欢离合的故事，内容取材于民间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语言优美动人，是叶尔羌汗国时期察合台文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完成于1533年2月，但长期以来湮没无闻，直至1982年方在喀什民间发现。

叶尔羌汗国前期还有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问世，就是著名的《拉失德史》，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回历905年（1499—

1500）出身于一个贵族世家，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文学家和史学家。他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叶尔羌建国前后的许多重大事件，还担任太子拉失德的老师。1540年他攻占了克什米尔，并在那里统治了11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拉失德史》，于1547年2月定稿。此书分为两编，第一部分为《正史》，以编年体形式记述了从秃鲁黑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到拉失德时代近200年的历史，第二部分为《史迹概述》，记述作者本人的回忆录。《拉失德史》用波斯文写成，书成不久即有察合台文本传世。

《拉史德史》记述了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叶中亚和新疆的历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以后的一些史传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拉失德史》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富有文采的文学作品，书中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表达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在描写历史人物时常常用韵文来表现，历史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段达到了完美的统一。[2]

【1】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2】本节主要参考图书：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四节　藏文文献的大量出版

明朝建立后，参照元朝旧制，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设立都指挥使司或军民元帅府管理藏族地区。15世纪初对地方实力集团先后封阐化、赞善、护教、辅教、阐教五王，各有封地，准予世袭。封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领袖为法王，如噶举派的大宝法王，萨迦派的大乘法王，格鲁派的大慈法王，其名位虽高，但无实权。萨迦派兴盛于元代，明初已渐衰弱。15世纪初，宗喀巴在噶当派的基础上整顿、改革，创建了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成为影响最大的教派，形成藏传佛教的主流。明朝廷在支持噶举派、噶玛派的同时注重新兴的格鲁派，封其领袖人物为法王，邀请格鲁派领袖宗喀巴、锁南嘉措前来京师。这一时期藏族的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形式都受到藏传佛教的巨大影响。

当时整个藏族地区受命于朝廷，汉、藏各族之间团结友好。藏族地区封建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社会秩序安定。在佛教

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医学、历算、史学、文学、艺术等都有显著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藏文书籍的出版事业，藏文书籍的编辑、印刷、流通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从历史上形成的藏文文献以及存留于世的藏文文献来看，明代的藏文文献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藏文大藏经的继续编辑、雕印和出版

由于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内地也进行大规模印刷藏文佛经，主要是皇室、官府雕印的藏文大藏经。这些版本多为木刻本，也有铜版印刷。明代以后的藏文文献以中国国内的收藏量最大，种类最丰富，其中主要是佛教文献，也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

(一) 永乐版藏文《大藏经》

永乐版藏文《大藏经》是目前保存的最早的一部刻印的藏文《大藏经》，只有《甘珠尔》部分。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为了给他过世的皇后追荐冥福，便派使臣到西藏取藏经，太监侯显从西藏带回的藏文《大藏经》为精审的蔡巴《甘珠尔》。于是以蔡巴《甘珠尔》写本为底本，在南京付梓刻印，传为铜版印刷，十分珍贵。共108帙，每帙都有明成祖所撰《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封题为金字汉、藏文合璧。印刷后先送往五台山菩萨顶，后送藏区各地，分赠噶玛巴·得银协巴、宗喀巴、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人。现存两部，一部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赐予萨迦派大乘法王贡嘎扎西的，原藏萨迦寺，现存布达拉宫；另一部是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赐予宗喀巴的弟子大慈法王释迦也先的，现存拉萨色拉寺。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硃刷印，称为朱版，亦称赤字版。此永乐版《大藏经》的雕印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西藏地区印刷事业的发展，甚至使前藏、后藏、阿里、康区、甘肃、青海、蒙古等地的藏文刻印事业都兴旺起来，纷纷建立印书院。

(二) 万历版藏文《大藏经》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北京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

尔》，共有108函。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续刻了《丹珠尔》中的42函经论，称为万历版藏文《大藏经》。以上二版早已毁损不存，印本也极少流传。（图112）



图112
明万历版藏文《大藏经》。

（三）丽江版藏文《大藏经》

云南纳西族也信奉藏传佛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由云南丽江纳西族第十九代土司木增（1587—1646）赞助，与第六世噶玛巴活佛噶旺·曲吉旺秋（1584—1630）共同主持，据其家藏《甘珠尔》写本刻制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至天启元年（1621年），历经十四年而完成刻印工作。此版系朱印版，共有108函。这是继南京永乐版藏文《甘珠尔》和北京万历版藏文《甘珠尔》之后的又一种藏文刻印《甘珠尔》。竣工后木增捐赠各地，至今拉萨大昭寺内仍存有当时捐赠的丽江版《甘珠尔》。后来经版存于理塘，称理塘版藏文《大藏经》。版片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毁于兵火。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不少明代藏文刻本。如明永乐九年（1411年）北京刻印的汉藏对照的《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方形木刻本；用元代刻板、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重印的《七佛如来本愿经》印本。[1] （图113）

【1】东主才让：《几种藏文〈大藏经〉版本的比较》，《中国藏学》，2000年1期。

图113
明刊本藏文《药师佛经》。

二、个人著作大量编撰出版

(一) 史书

明代藏族历史著作的编著形成高潮，史学著作如雨后春笋，使人目不暇接。

索南坚赞著的《西藏王统记》(又名《王统世系明鉴》) 影响很大。索南坚赞是萨迦派的喇嘛，译言福幢，是萨迦四大拉章之一仁钦岗拉章的继承人，曾兼任萨迦大寺的座主，是第七世萨迦法王，政治、宗教地位均很高，被尊称为“喇嘛当巴”，意为贤德大师。他曾从大名鼎鼎的布敦大师学法，又做过宗喀巴的上师，因此名声显赫，著有因明、般若、中观、密宗和历史书籍多种。他于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 著成《西藏王统记》。全书原分十八章，叙述与宗教有关的就有五六章，其次是叙述吐蕃王统，重点仍在叙述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坚三位赞普的历史，即所谓宏扬佛教的法王祖孙三代。书中特别突出松赞干布，

讲他的事迹，竟长达六七章之多。作者的资料来源是当时已发现的古代历史传述，如《遗训首卷录》、《嘛呢全书》、《五部遗教》、《档案文书》、盟誓碑文和《亚隆觉阿王统记》等。因其部分历史资料根据民间传说，不免有失实之处。但把它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和19世纪末才被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来比较，大体上仍然相合。此书是在当时缺乏历史材料的情况下写成的，故受到国内外的特别重视。此书已译成多种外文本。[1]

【1】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译：《西藏王统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青史》也是当时编著的一部重要史书，由噶举派僧人管氏家族译师桂洛·熏奴贝（意桑则巴）（1392—1481）著，成书于明成化十二至十四年（1476—1478年）。此书引用了汉、藏、梵文等资料，涉及佛法来源，前后弘期，以及密宗、因明等，涉猎广泛，形式采用编年体，分15辑，纲目分明，取材丰富，被推崇为信史。[2]

【2】廓诺·熏奴贝著，郭和卿译：《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该书对很多历史事实都有简要记载，对萨迦派的历史、元朝对西藏的军事、赋税、驿站、法律、委派本钦等反映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史实更有详细记载，是反映西藏历史的重要史书。[3]

【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噶举派僧人桑杰坚赞（1452—1507）于弘治元年（1488年）编著纪传体史书《米拉日巴传》。桑杰坚赞自幼从噶举派大堪布贡噶桑吉受沙弥戒，后随萨迦派大师云登嘉措学习萨迦派法要，崇拜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并以其为楷模。后云游各地，著书多种，以《米拉日巴传》成就最高。该书采用问答形式记述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1040—1123）早年坎坷的境遇、奋发复仇的经历，最后皈依佛法、游历讲经、终成正果的一生，内容广泛，涉及藏族古代社会历史的许多方面，对研究11-12世纪西藏社会生活和宗教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4] 此书很快刻印流行。

【4】桑杰坚赞著、刘立千译：《米拉日巴传》，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班钦·索南查巴（福称）著《新红史》（又名《王统幻化之钥》）。索南查巴年幼时出家学法，取得大格西学位，后在很多著名寺庙讲经说法。他学识渊博，在佛教、历史方面都有很多著述。《新红史》是根据蔡巴·贡噶多杰

的《红史》进行修改、补充而成。此书叙事脉络清晰，语言简练，朴实无华，史实多而议论少。以抄本传世，是研究元、明时期藏、汉、蒙古等民族关系的重要古籍。[1]

[1]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贤者喜宴》是又一部藏文史学著作，巴卧·祖拉陈哇（1504—1566）著。作者原名顿珠，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支系的活佛，是著名的大学者。《贤者喜宴》是作者42岁时开始撰写，后再次修订，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4年），木刻本，共791页。由于木刻本出自山南洛扎宗拉垅寺，故又称《洛扎教法史》。该书以内容翔实、旁征博引、较为忠实于史实而著称。书中涵盖时间上至远古传说，下至元明两代；内容立足藏区，广及中原内地、突厥、苏毗、吐谷浑、于阗、南诏、西夏、蒙古、勃律等地，对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大食等亦有涉猎。全书共17函，以藏文字母排列，分别围绕西藏的政治、宗教、法律、历史、文化、医学、音乐、建筑、绘画等主题，对明代以前的西藏社会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弥补了传统著作中的某些缺陷，特别是其中的吐蕃王臣史、噶玛教派史更为翔实，很有特色。书中引用了吐蕃以来大量的碑铭、诏令、书函、律令等原始文献，大多数材料与敦煌本藏文写卷和汉文史料都能互为印证，是研究西藏地方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史籍。[2]

[2] 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崇祯二年（1629年）阿旺贡噶索南·扎巴坚赞著《萨迦世系史》，记载了萨迦款氏家族的数十个人物的事迹，其中多数是萨迦派的宗教首领，所以也可以看作是萨迦派高僧的一部合传。[3]

[3] 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二）文学、语言著作

受到雕印永乐版《大藏经》的积极影响，其他一些藏文著作也相继雕版印刷出版。在西藏帕竹王朝执政者第斯·扎巴坚赞的主持下，刊刻了《萨迦五祖全集》，该书15帙，其中包含了文学著作，如由萨迦教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著作的《萨迦格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乃东宗本南喀桑布刊刻了宗喀巴大师的全集19帙。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恰译师觉顿蒙珠·仁钦扎西著

《丁香帐》，全称《藏语新旧词辩异·丁香帐》。书中收有摘自藏文厘定前的文献新旧词语一千多条，其中古今语词对照的有800余条，是解读古藏文文献的一部较好的工具书。有多种刻本传世。[1]

（三）宗教著作

这一时期的宗教著作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宗喀巴·洛桑札巴（1357—1419）在热振寺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此书于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成书。宗喀巴是格鲁派的创始人。此书为整顿藏传佛教而作。整顿后的教轨称为善轨，教派名称“格鲁”即善轨之意。书中依上、中、下“三士道”修道进程排序，对修习藏传佛教具有指导作用，是格鲁教派的根本典籍，共24卷，称为《广论》，另还有略本称为《略论》。《广论》和《略论》都有汉译本。[2] 此外他还在永乐三年（1405年）于强巴林寺著《密宗道次第广论》。

（四）因明著作

藏族因明之学在明代有不少成就，也编著、出版了很多著作。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不仅是显密兼通的一代佛教大师，是藏传佛教寺院制度的改革家，还十分精通因明学。他未撰写过大部头的因明著作，只写了一部仅23页的《因明七论治学除谙论》，由“境品”、“有境品”和“了境品”三部分组成。他的因明思想主要通过讲学体现出来。

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是宗喀巴的弟子贾曹杰（1364—1432）。他是宗喀巴的第一位大弟子，甘丹寺第二任座主，著名因明学者。他精进好学，师从多位高僧学习佛法、戒律、因明，后拜宗喀巴为师。他不仅帮助宗喀巴整顿西藏僧戒，建立格鲁派教法系统，还不断著书立说。他的著述很多，刻板流行的有八函，其中因明方面的有《集量论详释》、《释量颂能无颠倒显示解脱道论》、《定量论大疏》等多种。最有代表性的是《释量颂能无颠倒显示解脱道论》。该书木刻版共436块，870面522行，内容依次为“自比量品”、“成量品”、“现量品”、“为他比量品”。主要

【1】觉顿蒙珠·仁钦扎西著：《丁香帐》，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

【2】宗喀巴著、华锐·罗桑加措译：《菩提道次第广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是宗喀巴对佛教诸师注释本的善说和宗喀巴所教导的如实修心之理则（即解脱道）。书中阐释义理精到细致，甚至用设问设答的方式加以阐述。在文风上发挥了当时流行细琐繁复的风气，也影响到后世。

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克珠杰（1385—1438），法名格雷贝桑，甘丹寺第三任座主，后被追认为班禅一世。幼年出家，从诸大师学习佛学五论：中观、因明、律学、俱舍、般若等，能融会贯通，以善辩著称，对格鲁派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一生著述甚多，因明学方面有《因明七论除暗庄严论》、《量论解脱道》、《量理海论》、《现量品注》等多种。这对宗喀巴因明思想的大力发挥，受到格鲁派的普遍重视，成为各大寺院因明的必读书。正文分为“所知境”、“能知境”、“以智对境”三部分，采用摄义辩论的行文格式，先破他宗，再立自宗，最后断诤。

此外宗喀巴的又一弟子根敦朱巴（1391—1474），创建扎什伦布寺，大力弘扬格鲁教派，后被追认为达赖一世。他在因明方面的著述传世的只有《释量论庄严论》，共174页。书成后多次讲授，培养了一批因明学者，使扎什伦布寺成为传习因明的重要基地。[1]

[1] 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

这一时期的因明著作的编撰和出版多是围绕宗喀巴的因明思想展开的，对因明学的深入乃至格鲁教派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但其繁复的论辩也使因明学显得更加古奥艰涩。

（五）医学著作

15世纪后，藏医形成南北两个学派。北方派主要总结了高原多风湿病的临床经验，为《四部医典》编辑了大量的注释本。南方派擅长使用清解药物治温热病，也出现了大批与《四部医典》有关的著作。两派都根据《四部医典》的内容，绘制了风格不同的医学挂图。发展到1573年产生了最早的刻版书籍《扎当居悉》（指流传在扎当地区的正式刻版的《四部医典》）。绛达南杰扎桑在后藏昂仁出生，他著有《八支集要如意珍宝论》、《医学本续论》、《医宗宝灯》、《体系派历算广论》、《推算日月食难点广

论》等，发展成为藏医药学的北方学派。舒卡哇·年美多吉生于前藏塔波地区的拉托舒卡地方，他著有《四部医典广注·水晶彩函》、《珍宝药物识别》、《药味论》等，发展成为藏医药学的南方学派。

第五节　彝文书籍的出版

彝族历史悠久，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现有人口800多万人。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彝族。彝族文化发达，至少在汉代就创造并使用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形成了大量的典籍，在书籍出版方面有鲜明的特点，丰富了中国出版史的内容。但是彝文书籍一般都没有写作或成书年代，也缺乏作者或整理者的年代，个别彝文书籍虽有传抄者的姓名和时代，也是很难对彝文文献作准确的断代。因保存至今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彝文古籍最早是明代，现把彝文出版从明代卷开始叙述，然而其中的内容已经上溯到彝文产生的久远时代。

一、彝族和彝文的使用

（一）彝族和毕摩文化

勤劳勇敢的彝族多居住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横断山脉峡谷区，以及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这些地区多是海拔在二千米左右的山区或半山区，属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山川壮丽，资源丰富。彝族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畜牧业在山区彝族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森林茂密，有丰富的经济林木和野生药材。绝大部分彝族人都是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

远古时代，彝族先民就已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两地区生息繁衍。后来羌人南下，与当地的土著部落不断融合。也有人认为彝族的祖先是古羌人。早在两千年前，彝族地区的居

民就泛称为“夷”。东汉时期，居住在黔西北地区的彝族先民在今贵州西部地区建立了慕俄格政权，即罗施鬼国，延续了近千年之久。彝族自称为诺苏泼、纳苏、尼苏等。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的“夷”，唐、宋时期的“乌蛮”，元、明时期的“罗罗”、“倮倮”等，都是当时对西南彝族的称呼。明朝根据彝族地区不同情况采取派设流官或封设土司的方法治理。贵州水西彝族土司首领曾三次入朝，密切了与中原的关系。14—17世纪，由于中原王朝派驻屯兵，大批汉人陆续进入彝族聚集区。除军人外，还有到这里做生意的商人。到16世纪下半叶，云南全省汉族已经占多数，原来的彝族聚集区逐渐变为彝汉共居区。一般平原区里的彝人已大多融合于汉人。居住在山区的彝族也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元明时期在彝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后又实行改土归流。

20世纪50年代以前，四川凉山彝族还盛行奴隶制，等级森严。在四川凉山彝族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家支。这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当地地域政权的功能，在总体上来分，家支可分为黑彝家支和白彝家支。解放前黑彝家支在彝族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黑彝家支统治着白彝家支，一个黑彝家支就是一个地方小王国。家支在彝族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每个家支一般有几个头人，他们是根据其活动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认可后自然产生的。

彝族信仰多神，相信占卜。“毕摩”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精通各种典籍和占卜术，通晓天文历法，谙熟民俗风情，在彝族社会中除主持各种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仪式外，在哲学、历史、天文、历法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著有许多宝贵的经典，影响着彝族的整体文化系统，形成了毕摩文化。毕摩文化以原始宗教信仰为意识核心，以巫术、祭仪为行为表征，涉及到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毕摩文化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毕摩文化以卷帙浩繁及广博丰厚的著述为物质

载体，因此它与彝族的古籍和出版有密切联系。

彝族是一个聪明智慧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了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成为祖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部份。彝族人朴素的伦理道德和多姿多彩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彝族有自己古老而有特点的科学历法。彝族能歌善舞，音乐富有特色，舞蹈多与歌唱相伴。彝族的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颇富民族特色。

（二）彝文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6种方言。彝文是流行于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彝族地区的音节文字，汉文史籍中称之为“爨文”、“韪书”、“倮倮文”等，记录的是彝语。彝文为本民族自创，属“自源文字”。关于彝文的起源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观点有所不同，影响较大的说法认为创始于汉代，有的认为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代，也有人主张彝文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关于彝文的创始人，民间传说为吉禄老人等多人，彝文典籍和汉文史志也都有记载，但也莫衷一是。文献记载彝族的阿呵与彝文的发展关系极大:“阿呵，唐时纳垢酋，居崖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1] 多数专家认为阿呵是彝文发展到唐代时对彝文进行整理和规范的学者，对彝文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大定县志》卷十三。

很多专家认为彝文是音节文字，有的则认为是表意文字，也有的专家认为，彝文是远古彝族先民自己创造的象形文字，经历了不可逾越的“实物文字”，写形写意的“图画文字”再到“象形文字”等阶段。象形文字又演变为既可表意，又可表音的音节文字。

各地彝文大体相同或相近，但因彝族居住分散，山川阻隔，彝文随着复杂的方言而形成读音不一致、用字不统一的情况。各地也有不小差异，甚至书写方式也有区别，如四川凉山彝文一般由右向左横行书写，云南、贵州一带则由左向右横行书写，年长

日久，便自成体系。彝文独体字多，合体字少，形式古朴，字数很多，各地有不同的统计，至少有1万个单字。至今彝族大部分地区仍使用本民族文字，但也有的地区已不通行文字。

彝文文献十分丰富。在历史上曾用彝文书写的古籍多达上万卷，千万字以上，保存了有关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语言、文字、医学、农技、工艺、礼俗、宗教等内容，记载了古代彝族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等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碑记。彝文一般由毕摩掌握。[1] 彝文文献反映彝语特点。在修辞上，大多采用排比、对偶、比喻、夸张等手法。

【1】马学良主编、罗国义审定:《增订爨文丛刻》,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1987年。

二、彝文书籍的编写和出版

彝文产生很早，彝文书籍的编写也有久远的历史。有些书籍从内容看可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编写完成后，在后来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增补，形成内容更丰富的书籍。有的则增加了新时代的事物，书中就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内容。因此很多彝文书籍难以断代，彝文书籍中史料的应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彝族书籍的产生与宗教有极密切的关系，书籍的使用范围主要在在宗教领域。早期的彝族书籍主要由主持宗教仪式的毕摩创编、掌握，毕摩对彝族书籍的形成起了重大而关键的作用。毕摩拥有绝大多数书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丰富，书籍突破了宗教的藩篱，向着更广阔的史学、文学方向发展，这时彝族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具有歌师性质的慕史。高级的慕史懂得彝文，熟悉毕摩经典和毕摩文化。慕史也撰写书籍，并将书籍按宗教、文学、历史、天文区分为若干类别。这样彝族的书籍更加丰富多彩，也出现了长篇巨著。以下着重介绍几类重要书籍。

（一）人类、万物起源的典籍

彝族先民善于观察和思考，写作出富有哲理、有朴素唯物观点的书籍，表明了对宇宙人文的基本看法。《宇宙人文论》是早期彝文著作。彝语名“妥鲁历咪署”。彝文典籍一般不署作者姓

名。成书年代无考，就书中内容与汉文记载比较，似为先秦作品，后展转传抄。全书以布慕笃仁和布慕鲁则兄弟对话的方式，详尽地论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人类起源以及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认识；对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人体部位和气血、经络及天文历算方面的认识。书中还记述了人们认识天地、万物，区分宇宙方位的过程。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情况，并且分析了日、月出没的方位，按不同月份观测到太阳、月亮所行轨道不停地转动时，地球上所受光热的时间、地点不同而轮回出现冬、春、夏、秋和二十四节气的情况，并用具体图形加以说明。与此同时，彝族先民观测到天体运行一周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根据这个原理，定出年界、月界，分出大月、小月，推算出闰年、闰月，其精确的程度令人惊讶。此外，书中还记述了霜、雪、云、雾、风、雨、雷、电等“天气”与“地气”的发展变化及相互影响的关系。形成一整套天文历算的理论学说。这是古代彝族先民对祖国文化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天文历法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

《宇宙人文论》是抄本，长23.4厘米，宽27厘米。全书67页，每页十数行，每行自上而下书写，大多五字一句，每句下以小圆圈为句读，每行约26字，全书共31 260字。抄本现存贵州省毕节地区翻译组。

该书中第10页有五生十成图，图中主要以白圈和黑点组成，白圈表示天数、阳数、奇数，黑点表示地数、阴数、偶数。白圈一、黑点六居北；白圈七、黑点二居南；白圈三、黑点八居东；白圈五、黑点十居西。此图与汉文古籍中的“河图”相对应，表示五与十、天数和地数、阳数和阴数、奇数和偶数相生相成，组成了天地间清、浊与阴、阳二气变化，即阳数一、三、五、七、九与阴数二、四、六、八、十相互变化而生成水、火、木、金、土。

又该书中第13页有清浊二气运行图，图中主要以一个虚线圆和八个实线圆组成，这些圆圆心不一但相近。虚线圆和八个实线

【1】罗国义、陈英翻译，马学良审订：《宇宙人文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

圆各相交一次，每一实线圆和其他实线圆各相交二次。虚线圆内为浊气，圆外为清气。图中表示了彝族先民凭直观推测和长期实践而创造出的清、浊二气运行产生四季八节的理论，表明天气与地气即清、阳之气与浊、阴之气的运行变化，分出冬、春、夏、秋四季和立春、春分、立夏、夏分（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分（冬至）八节。（图114）

又该书第18、19页有人体解剖图，分左右二图。左图为“清浊五行人体部位分解图”，以蛋形图解释人体。右为“人体部位图”，用文字标出人体各个部位。图中注明五行是形成人体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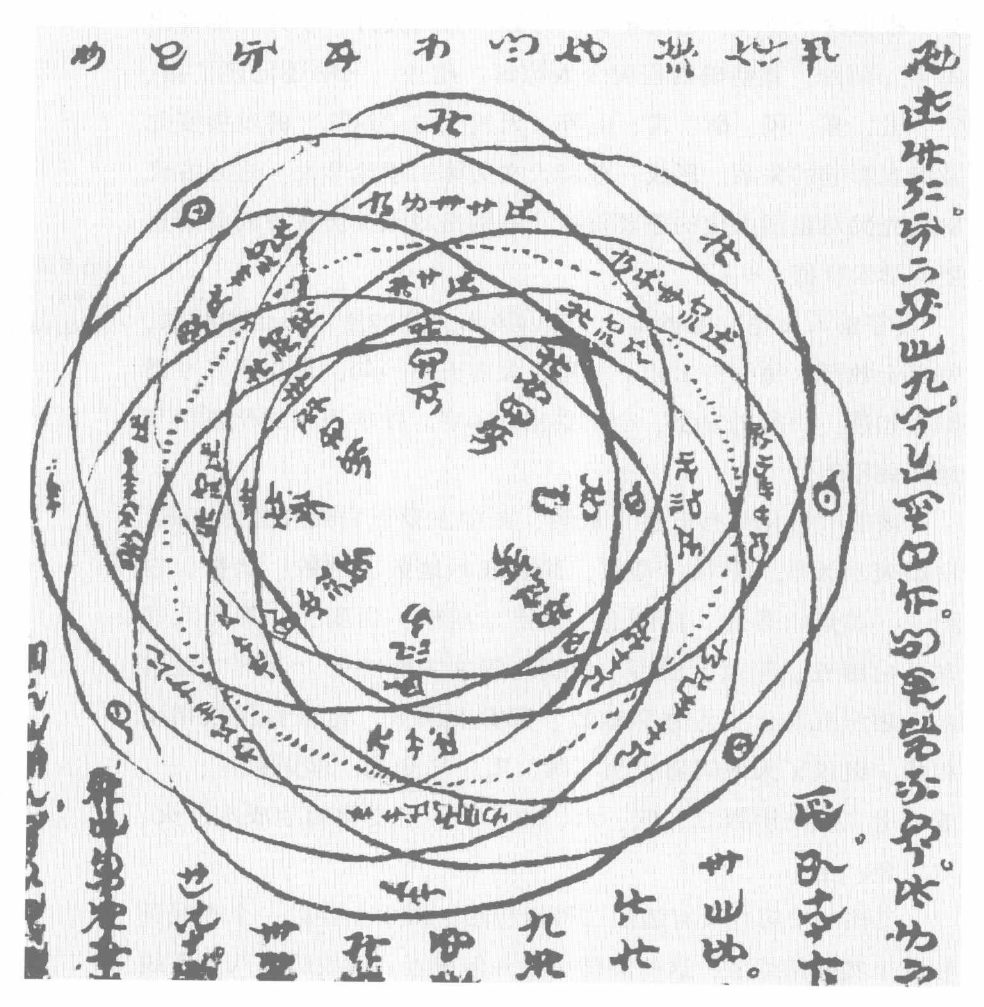


图114
彝文《宇宙人文论》中清浊二气运行图。

（二）历史著作

彝族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历史著作。有的著作反映民族发展历史，有的记录家支世袭、人物和事件，也有的记录人民起义。这些著述很有特点，是透视彝族历史的宝贵资料。彝族创世史诗作品有所谓“四大创世史诗”，即主要在大小凉山彝区流传的《勒俄特依》、云南彝区流传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和《梅葛》。此外还有云南彝族的《尼咪诗》、《尼苏夺节》、《阿赫希尼摩》、《门咪间扎节》、《俚泼古歌》、《洪水泛滥史》等；贵州彝区流传的《洪水纪》、《洪水与笃米》及《彝族创世志》等。

《勒俄特依》是流行于四川、云南、贵州广大彝族地区的彝文著作，可译为《史传书》，又分《母史传》、《公史传》、《子史传》，共分15篇，每篇自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篇与篇之间又互相联系。书中描述天地万物的形成、改天造地的经过及彝族先民迁徙状况和彝族两大支系——古侯、曲涅的谱系，是彝族史诗性著作。[1]

彝文文献中有《六祖史诗》，作者姓名无考，成书年代不详。据书中内容推测成书年代约在明末清初。内容包括《赊榷濮》（古代六祖）、《夷僰榷濮》（六祖魂辉）、《根因榷濮》（六祖源流）三部作品，记述彝族从慕折至笃慕的父系31世和继笃慕之后六祖以下的主要家支世系的核心人物及历史事件，其中反映出彝族古地名、山川、风土人情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前后皆残，该书为棉纸抄本，长29.4厘米，宽24.2厘米，折页线订，首有1残页，后有20整页，末又残页，面11—13行不等，行13—17字不等，字迹清晰。另有棉纸抄本，长30厘米，宽20厘米，共56页，每页约8行，每行18—21字不等，约6 000字。字迹清晰，但字列多有不直。（图115）

这一题材的著作除代表作《六祖史诗》外，还有《尼祖谱系》、《彝族源流》、《彝族氏族部落史》等。其它或成章或成篇的迁徙史诗则散存于《西南彝志·谱牒志》、《彝族创世志·谱牒

【1】巴胡母木（冯元蔚）、俄施觉哈、方赫、邹志诚整理、翻译：《勒俄特依》，载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0年。冯元蔚整理、翻译：《勒俄特依》（彝文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汉文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

志》等大部头经籍中。

有一部记录彝族著名家族阿侯家历代世系相传的书籍，名为《能素恒说》，据说原作者是恒布吐施楚、投布那乍英，是哎哺时期人，后经布独布举、妞口布则改编、整理成书。此书页面约为10开本，共10册，自左而右书写，直书，无标点，书口右开，第1—5册和第7册为羊皮封面，其余是构纸封面，书脊尚存装订用的竹板和麻绳。这是彝族的一部历史文献巨著。[1]

(三) 医药书

彝文著作中的医药专书，有很高的医学价值，是研究彝族医药史的重要资料。发现于云南的一部医药书用平棉纸书写，外包羊皮，宽24厘米，宽20厘米，共60页，上下单栏，每页约10—13行，行间有界格，界格超出上下栏而达于页面边缘。每行约13—15字，共约11 000余字。作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作者无考。书中共记载85种疾病的药物治疗方法，以及300多种动植物药物，此外还记录了简易的外科手术，特别是对难产、肿瘤等症的治疗方法，其法沿用至今。现存云南彝族楚雄自治州。

(四) 宗教类典籍

彝文书籍中属宗教类的最多。彝族宗教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回到祖先的原居地，因此要请毕摩给死者的灵魂念《指路经》，指引亡魂回归故乡之路。不同彝族地区的人们有不同的送魂路线，因为他们的迁徙路线不同，但各地《指路经》的终点都在同一地点——兹兹普乌（在今云南省昭通地区）。这是彝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彝文《指路经》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于一体，是研究彝族古代社会的重要典籍。

图115
彝文《六祖史诗》

【1】王子尧、山口八郎主编：《中国彝史文献通考》(1)，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

《指路经》有多种版本。[1] 有一种彝文《指路经》，线订写本，高23.5厘米，宽14厘米，每面行数不等，5—8行，每行字数不一。前28页纸张厚实，两面书写，后面为薄纸折叠单面书写。后有空白3页半，为先装订，后书写。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图116）

【1】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指路经》(第一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2】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图116
彝文《指路经》

还有彝文《超度经》，也是线订写本，高25.5厘米，宽39.5厘米，上下单栏，行间有红界格，版心高20厘米，共32页。最后有麻布封底，高29.5厘米，宽53厘米，比书页高出4厘米，长出13.5厘米。书用完后自书脊卷向封面，卷完后封底麻布超出经书，自然起到保护作用。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117）

（五）占卜书

彝族历史上有占卜的习俗，重要事件都进行占卜，因此在彝文文献中也有不少记录占卜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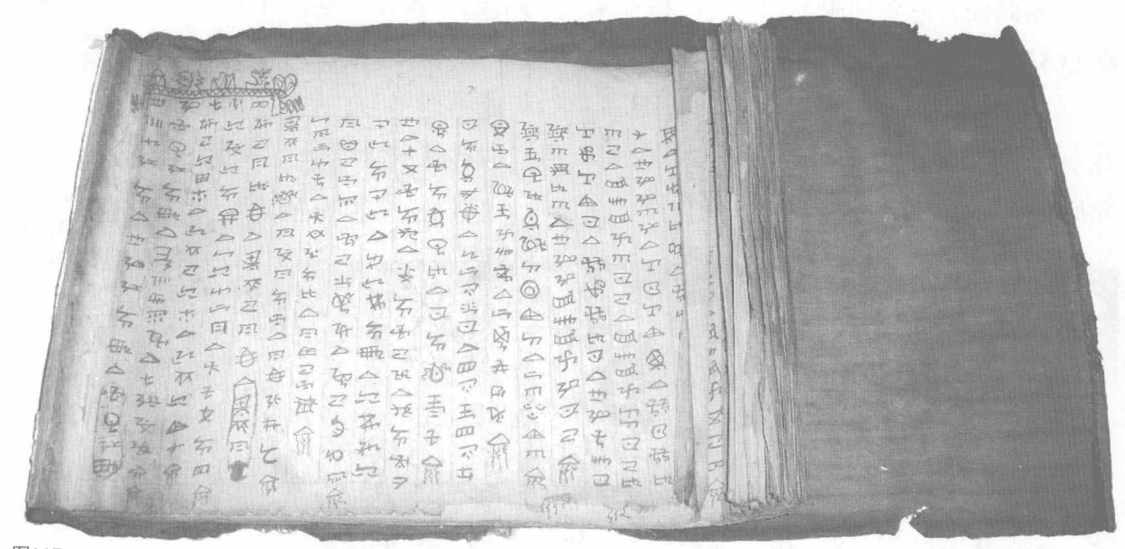


图117
彝文《超度经》

图118
彝文《通玄大书》

有一种《通玄大书》，彝语称为“署舍”（意为“金书”）。作者姓名无考，成书年代不详。据书中内容推测应是奴隶社会时期的作品。内容记述男女命相、婚姻匹配以及婚嫁吉日良辰等。书长38厘米，宽21厘米，共167页，共43 400余字，其中还有120余幅插图。现存贵州毕节地区。（图118）

《通玄大书》还有一种版本。作者姓名无考，成书于明代。构皮棉纸抄写，外包白土布，内容与上述《通玄大书》相近。书长36厘米，宽26厘米，共112页，共48 000余字，有56幅图，左文右图，以文释图。书的上端有白线，线系于图案上，占卜时，由来卜者抽书上端的线，按线系图占卜凶吉。现存云南玉溪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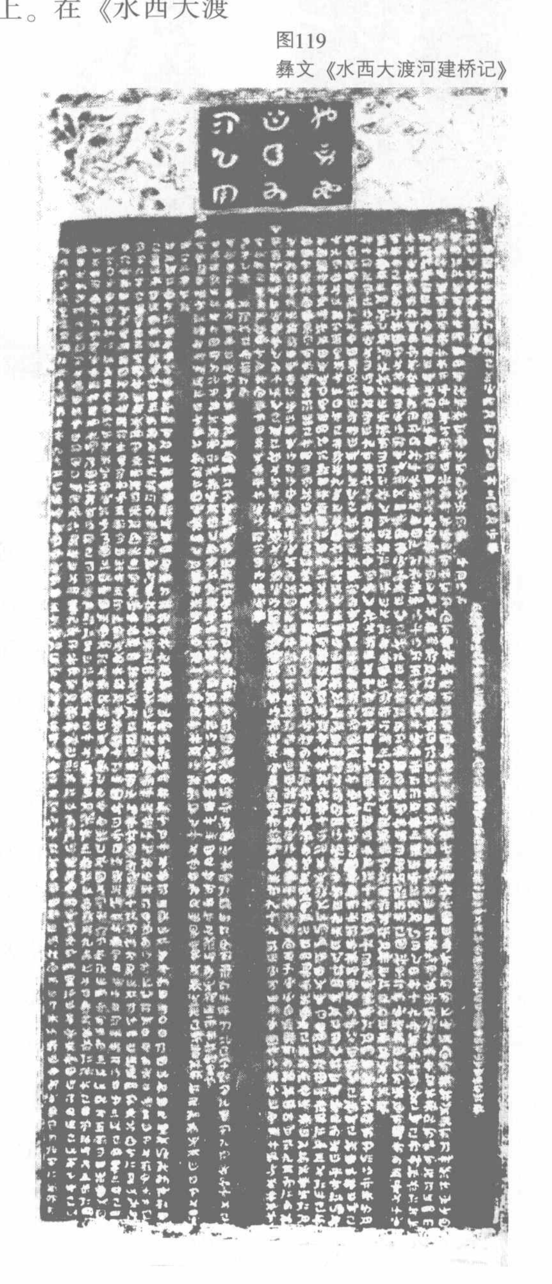
三、书籍的质料和装帧

古代的彝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狩猎、畜牧业发达，牛、羊等牲畜与他们形影不离，就连自己的文字也大多写在牛、羊皮

上，所以人们把这些写在牲畜皮上的彝文古籍称为“羊皮书”、“牛皮档”等。这种在皮子上书写彝文的传统，至今仍有保留，经师毕摩的某几种消灾书还要写在皮子上才有神力。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纸出现在彝族社会后，皮书多被纸书取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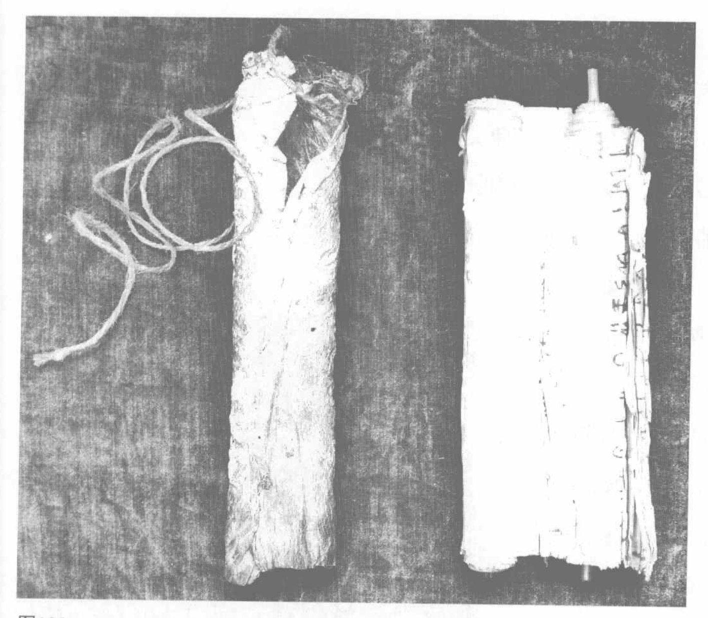
史籍记载，古代把彝文写刻在木牍、竹简上。在《水西大渡河建桥记》碑中记载:“木刻竹简，多如柴堆。”据《西南彝志》记载，古代“慕俄格一家，大握其权柄，木刻与竹简，积累如柴堆”。（图119）至现代祭祀时仍有将文字记写在木版上的现象。彝文《尼苏夺节》中有记载彝族古代：“三千金银花，变成三千字，写在竹片上，编成六本书，伙伴六兄弟，每人拿一本。来到注生寺，住在房屋中，白天写理书，夜晚读理书。铁板生了锈，竹片永不锈，千年不变色，万年字变黑。”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彝文竹简书籍，但发明文字很早的彝族，在竹子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使用竹片做书籍载体是完全可能的。另据说，解放后有人在云南乌蒙山彝族地区还见过彝文竹简。

图119
彝文《水西大渡河建桥记》



在丰富的彝文古籍中绝大多数是写本，写本是彝文文献的主要载体。彝文的古籍多用棉纸书写，书写时只在单面写字，内页一般要折叠起来，为防止墨迹浸透至下面，书写时往往在折页中间垫一层薄纸。页面中行间有的打界格，界格线有红线、黑线两种，有的没有界格。

彝文书籍制作时是先把纸装订成册再书写，写完一部可再写它书，因此有的书册内容不免庞杂。彝文书籍版面大小不一，甚至差别很大。一般都是线装书，在书的一边打眼，以


图120
以羊皮作封面的彝文文献。

棉纸捻穿订，有的以麻线或棉线装订。线装书又分平装书和卷书。卷书和内地的卷装书不同，它是把线装书卷起保存，其特点是卷书有特殊的“封面”。其实它不是封面，而是在书后加上大于书页的麻布、棉布或韧纸作封底，将书卷起后封底成了“封面”，起到保护书籍的作用。在书口处往往栓订铜钱等加以固定。有的以羊皮卷裹，成为更结实的封皮。（图120）

书写彝文的工具过去曾用过羽毛、松枝、竹管、毛发等材料制作的简陋的笔。后来汉族地区的毛笔传入彝区后，成为广泛应用的书写工具。书写用的染色材料，原来曾用动物血、紫矿石和胭脂等。自从汉族地区的墨传入后，便成了撰著、抄写书籍的主要颜料。现在的书籍都是墨书。

彝族的书籍也多由毕摩创作、传抄。彝族认为，“知识是粮食，知识是生命，知识是水”。所以把知识作为神灵来崇拜。毕摩借书抄写完后，要备猪、羊、鸡、鸭等牺牲，意在请知识之神和智慧之神来验收。届时要用五倍子树制成两个杈，插在地上，上面搭一棵五倍子横木，又在两个杈的周围插一些杈，每一个杈分别代表一个神灵或各派的一个大毕摩。还要用五倍木和黄连等去皮削成碎屑来烧或撒，象征用金、银敬它们。再点些酒和夹些菜于地，吟颂“献酒经”和“献茶经”，将书从横木下穿过，这样它便有了灵性。毕摩每次看书都要杀只白公鸡来敬知识、智慧二神，并用鸡血沾些毛贴在书上，过年时有的还要杀牛、羊等大牲畜。这些书平时大多存放在神龛上，如果书籍朽毁腐坏，毕摩年纪老了自己可以再抄写，旧的则烧掉，新书可传给儿子。这样

彝文的书籍内容很古老，但难以流传下古老的版本。

四、木刻本和金石

彝族有悠久的文化，但方言纷杂，有些方言之间难以通话。因方言的歧异，加之历史上没有统一的文字，彝族的刻印事业也不发达。在《水西大渡河建桥记》碑中记载："木刻竹简，多如柴堆。"这里所指是否雕刊木版印刷书籍还难以断定，但彝族至少在明代已经有木版印刷了。在所见到的文献中，刻本极少。在彝文的刻本中，《劝善经》可说是凤毛麟角。

彝文《劝善经》是木刻本，彝语称"尼木苏"。内容是将汉文《太上感应篇》翻译成彝文，并在每一章节之后都结合彝族的具体情况加以发挥，逐节逐条地讲解释义，是现存彝文古籍中最早的彝文木刻本。译者姓氏同其它彝文古籍一样无从查考。译书年代据马学良先生在彝文《劝善经》译注序中说："考彝文译述本《太上感应篇》产生的时代，似为明代水西罗甸王国时期。"[1] 成书大约在明正德年间。明代《贵州通志》中的《艺文志》中有《感应篇》，应即指此书。[2] 至今发现的彝文《劝善经》有两种，系同一刻板所印，只是一种印本有前言，另一种印本没有前言。

彝文《劝善经》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结合彝族的宗教礼俗、心理情态、社会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劝说人们要行善戒恶。书中还列举了很多行善事例和行恶事例来论证因果报应的观点，劝说人们只要行善都会得到好的结果："行之二年，万罪消灭；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孙贤明，荣登科第；行之十年，寿命延长；行之十五年，万事如意；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由于译者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和思想意识，书中有宣扬迷信因果能报应的观念，但其中也还有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如书中劝说人们不要信巫师的话，有病要吃药，得了传染病要隔离等，并谴责巫师以鬼神来欺骗病人的行为，反对放蛊，埋人头发、衣物，咒人病死等，还提倡保护牲畜，学习先

【1】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马学良先生在云南武定县茂连乡调查时发现了这本彝文《劝善经》译本，他与彝族张文天老先生共同通译此书，并写了一篇《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于1947年发表在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人文研究室编的《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上。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邀请云南武定县的彝族毕摩张兴和唐承宗两先生在北京参加北京彝族历史文献整理翻译工作。马学良和范慧娟同他们重译此书。见马学良、张兴等《彝文〈劝善经〉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

【2】《贵州通志·艺文志》，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本。

进民族，发展生产，敬老爱幼、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等，同时还指责那些有不义行为的人。《劝善经》里所提出的这些做人的准则对今天生活中仍具有现实意义。

彝文《劝善经》为棉纸线装本，高25.2厘米，宽17.6厘米，四周单栏，版心高22.2厘米，宽13.6厘米。版心白口，上下有黑鱼尾，上鱼尾下折线两侧有页码，左为彝文页码，右为汉文页码，有时两侧都是汉文页码。每面10行，每行自上而下书写，足行25字左右。共57页。其中第28页补添1页，成为两个28页。在第二个28页的版口折线两侧分别以彝、汉文写"后添"二字。全文共计22 900多字。此书不是采用彝文传统的五言体，而用浅显通俗的文体，文笔流畅，词句井然，以圆圈作句读。20世纪中叶发现于云南省禄劝、武定等县，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皆有收藏。[1]（图121）

【1】史金波：《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印刷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二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彝族文献除古籍外，还有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铜钟铭文、明代禄劝彝文摩崖石刻、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千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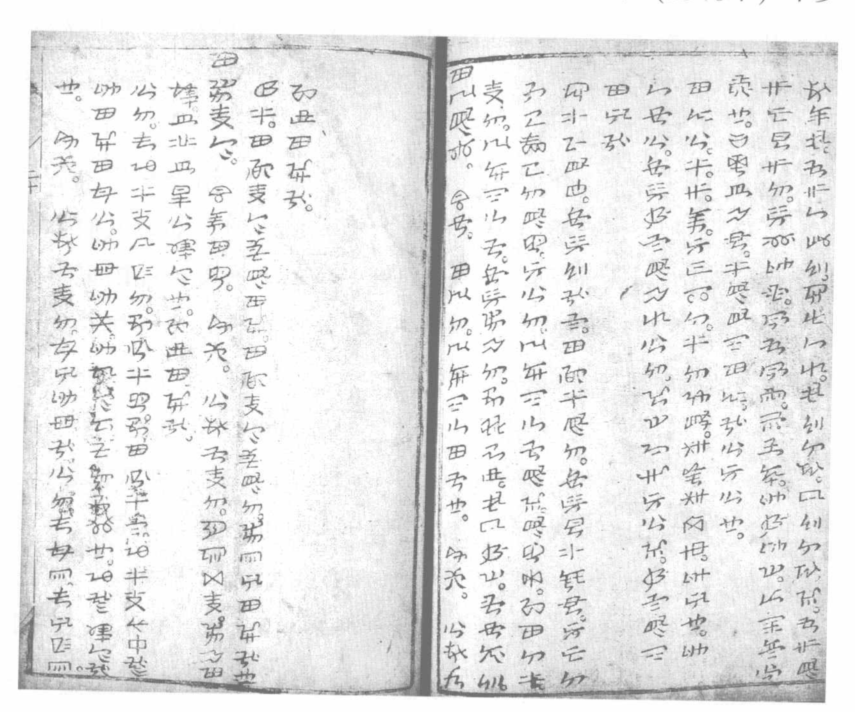


图121
明刊本彝文《劝善经》

衢碑记、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等金石铭刻，还有刻在牛、羊卜骨上的卜辞等。（图122）（图123）（图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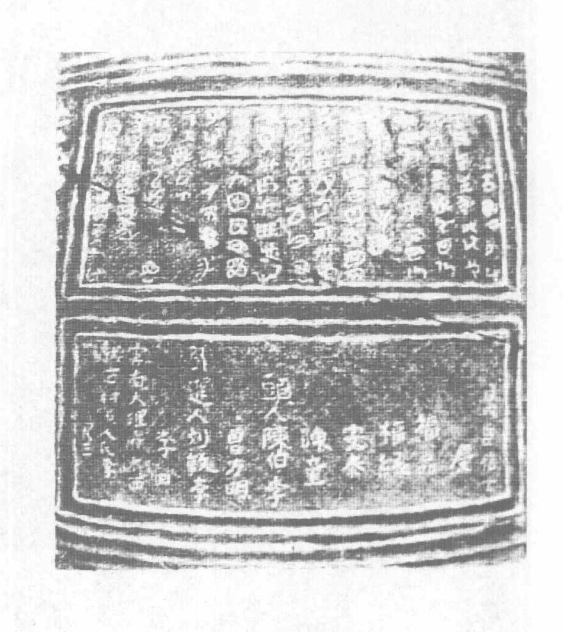


图122
明代彝文成化钟及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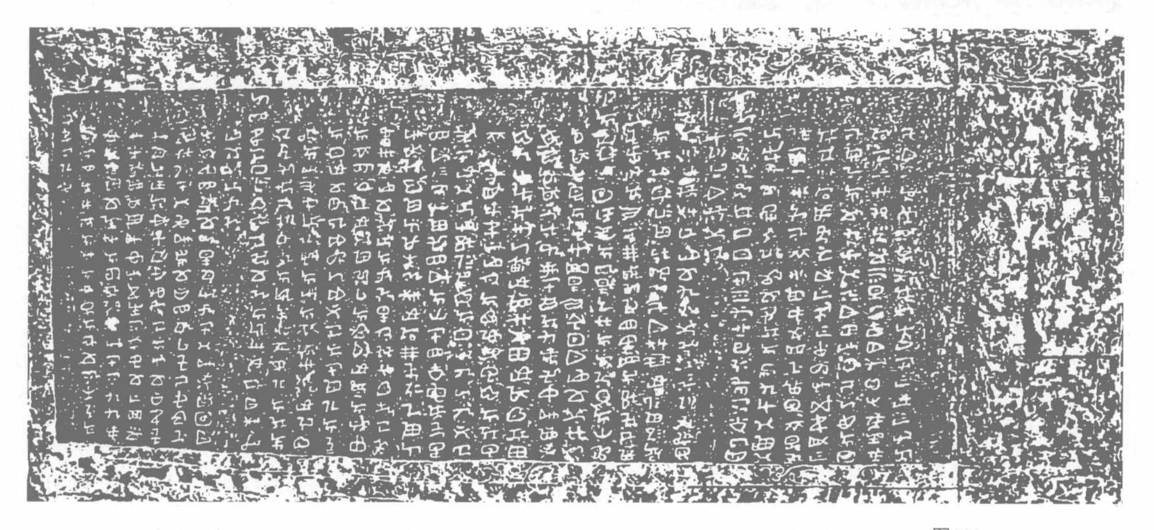


图123
云南禄劝彝文镌字崖。

五、彝文书籍传播的特殊地点和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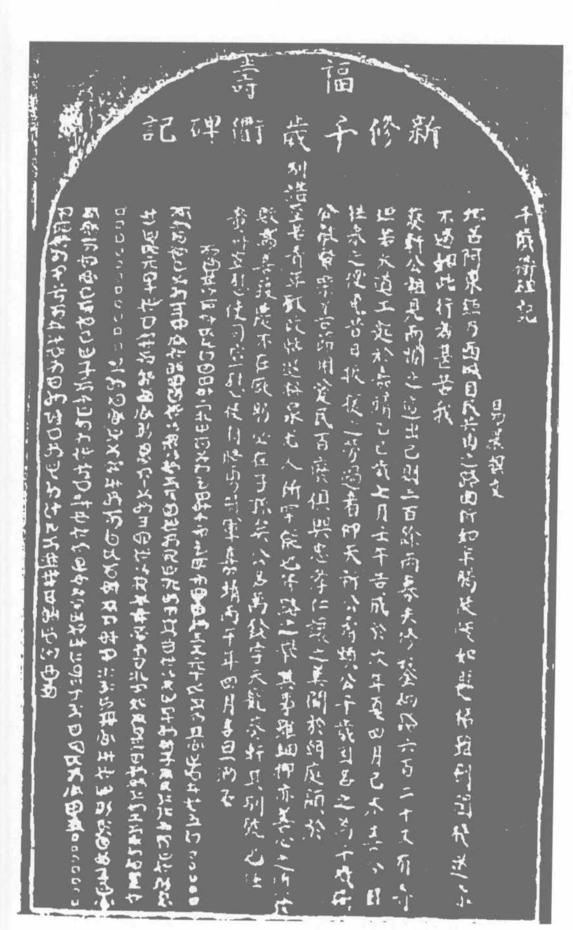


图124
贵州彝文千岁衢碑。

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彝文书籍多保存在毕摩手中。而毕摩是分散在民间各地，所以过去彝族的书籍多分散在民间。保存彝文书籍的人往往将书籍装入专门放书籍的袋子中。袋子的质料有皮、麻、毡制造的。也有个别的收藏在专用于装载彝文书籍的木箱中，木箱上面雕刻有彝文和相关图案。为防止潮湿和虫蛀，便将彝文书籍置于烟火可熏着的地方。有的将书籍用斑竹笋壳包好，再用皮纸密封，然后以鸡蛋清涂抹烘干，藏于香火顶上。每逢初一、十五日，都要焚香致礼，只有这时，才能打开查看。

彝文书籍刻印不发达，也没有专门的学校、教室，但也有其传播的特殊方式。写本的传抄和讲解是书籍传播的主要方式。毕摩以及一些懂彝文、藏有彝文书籍的人，都是利用闲暇时间，在火塘边教授、讲解给自己的儿子或弟子。毕摩职务讲求家传，其职务和经书一般都传给直系子孙，弟子的来源首先是毕摩的家人。无后嗣则传给本家族或家支的人。有的地区毕摩少，可由非毕摩氏族的子弟中推荐优秀者到毕摩处学习。也有的青年俊秀热爱彝族文化，有志于继承彝文典籍的传播和发展，自发地找到有文化的老师学习书籍。这时既学习文字，也学习经典。彝族人认为火塘附近是诸神灵和祖先灵魂居住往来之地，是人和神灵沟通的地方，是家庭的圣地。在这里学习文字、教授书籍、传播文化具有庄重的意味。火塘是书籍传播的特殊地点。一般是弟子白天给师傅服劳役，如耕种、放牧、砍柴、做饭等，晚上从师傅学艺。若学到能熟悉经

典，能独立做法事活动的程度一般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此外，在毕摩做宗教仪式的祭场也是传授书籍的特殊场所。当年轻的学习者在家中火塘边学得一些文字、背诵了部分经文后，便可跟随父亲或师傅参与祭场中的法事活动，一方面当助手，一方面进一步学习和实践。这实际上是火塘教学的延伸和深化。在法事道场中师傅对弟子有严格的要求，事先应熟背经文，在道场中诵读经文要准确无误，不能遗漏，不能颠倒。这种要求保证了经书传播过程中的准确。[1]

【1】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111-11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

明代由于各民族交往的频繁，统治者重视民族文字的翻译，在中央设立“四夷馆”，其中有专门人员将彝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互译。彝族地区的奴隶主和土司也主动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京城和省城学习彝文和汉文。一些文士也“选习彝字”，翻译彝文文献。当时一些汉文文献中已经在采用从彝文翻译的资料，如《明一统志》、《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明史·土司传》等。[2]

【2】陈大进:《试谈彝文古籍的时间下限》,载《贵州少数民族研究》(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第六节　其他民族文字的出版

一、女真文图书的出版

金朝灭亡后，在东北地区尚有200万女真人，有一部分融入汉、蒙古等民族，另有半数在元代仍保持着女真习惯，到明代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

建州女真原居黑龙江依兰县一带，元末明初南迁至绥芬河流域，因绥芬河下游双城子为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因此得名。后又向西迁至浑江上游和三统河一带。永乐元年（1403年）明政府设建州卫，永乐十年（1412年）设建州左卫，正统七年（1442年）增设建州右卫，历史上有名的“建州三卫”至此最后形成。

海西女真在明初是指居住在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因朝鲜人将依兰以西的松花江称为海西江，海西女真因此得名。至明

朝中期，海西女真也包括了黑龙江以北的女真人。至16世纪初形成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海西四部。

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是指建州、海西以外的女真人，主要居住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渔猎为生，社会发展落后，与明朝关系不甚密切，朝贡不常。

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立卫所进行管理。洪武年间在辽阳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年间在黑龙江下游与阿姆贡河交汇口的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都指挥司。这两个管理机构直属明政府管理，下各设数目不等的卫、所。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和其他少数民族都置于其管辖之下。

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与明政府关系密切，在政治上，凡建立卫、所的女真人，卫、所主要官员由明政府任命，并要定期向明朝纳贡，平时负责守边，听从明政府的调遣，违反法律明政府要对其治罪，内部纠纷由明政府调解等。在经济上，通过朝贡与回赏的形式进行女真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在纳贡的同时还可在北京进行3—5日的“开市”，有的还在沿途与汉人进行货物交换，此外在东北开原、广宁等地开设马市，这实际上是女真人与汉人的民间交易场所。

明初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还在使用女真文，因此这两部分女真朝贡使团给明王朝的奏折和朝贡文书都以女真文书写。为了翻译女真各部上报的奏折和处理其他有关事务，明中央政府在四夷馆中专设一个女直馆。女直馆是四夷馆中首批设立的译馆之一，时间在永乐五年（1407年）。它的职责除培养学习女真文的译字生外，主要是翻译女真各部给明王朝的奏折文书，同时将皇帝的敕谕译成女真文发给朝贡使团带回。当时女真文使用范围遍于整个东北地区，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于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的《永宁寺碑》上面用四种文字镌刻，其中就有女真文。但是女真文在明代东北地区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到正统九年（1444年）海西女真的40个卫中已“无识女直字者”。[1] 建州女真15世纪后期在给明朝的奏文中还用女真文，但到16世纪初也“汉字、女直字皆

【1】《明实录》卷一百一十三。

不知”而使用蒙古文了。[1] 海西女真的玄城卫指挥撒升哈在正统九年（1444年）向明政府奏请今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2] 达达字即蒙古文。从明四夷馆的建制看，女直馆从永乐五年初建时即设，终明之世，一直存在，但后来也是名存实亡。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沈一贯在申请招收四夷馆译字生的奏折中说：“查鞑靼馆除本馆职业外又兼译女直来人进贡袭替来文并回赐敕书及译写顺义王表文，喜峰口验收来人，比之别馆，繁剧数倍。”[3] 可见当时女真人已普遍使用蒙古文，四夷馆的女直馆已成虚设，其所司业务已由鞑靼馆一并兼做了。

[1]《李朝实录》卷四十三。

[2]《李朝实录》卷一百五十九。

[3] [明]吕维祺：《四译馆增定馆则》。

四夷馆的女直馆与其他各馆一样，编撰了《女真馆杂字》与《女真馆来文》。《杂字》是女真文与汉文对照的分类词汇集，《来文》则过录了东北地区女真各卫所用女真文写的进贡表文，有汉文对照。《女真馆杂字》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女真字的，每个词或字从左至右依次为汉字女真语译音、汉译、女真字，此种被称为“永乐本”。另一种由会同馆编，时间较晚，只有汉字注音与汉文词对照，没有民族文字。现存永乐本《杂字》共分19个门类，最多的本子收录917个词或字，《女真馆来文》共存79篇，最早的来文为永乐末年，最晚到嘉靖初年，时间跨度达百余年。女真馆来文与其他馆来文一样，尽管是女真字与汉字对照，但并不合乎女真语语法，只是按汉文的语法生硬地注上女真文而已。但是这些都是硕果仅存的珍贵的女真文文献。由于有汉文对照，成为解读女真文的钥匙，是研究女真文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明政府与女真各部关系的第一手材料。（图125）

《杂字》与《来文》合并名为《女真译语》，有五个本子传世，依次为德国柏林图书馆藏本、日本东洋文库藏本、静嘉堂藏本、阿波国文库藏本及内藤湖南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抄本《华夷译语》中亦录有女真文译字。此部《华夷译语》为白绵纸手抄本，收录有回鹘式蒙古文和回鹘文分别与汉文对照的词汇，共十册。在回鹘文词汇之后，录有15页女真文与汉文对照词汇，词汇之前有“新增”两汉字。每半叶录4个词或字，共收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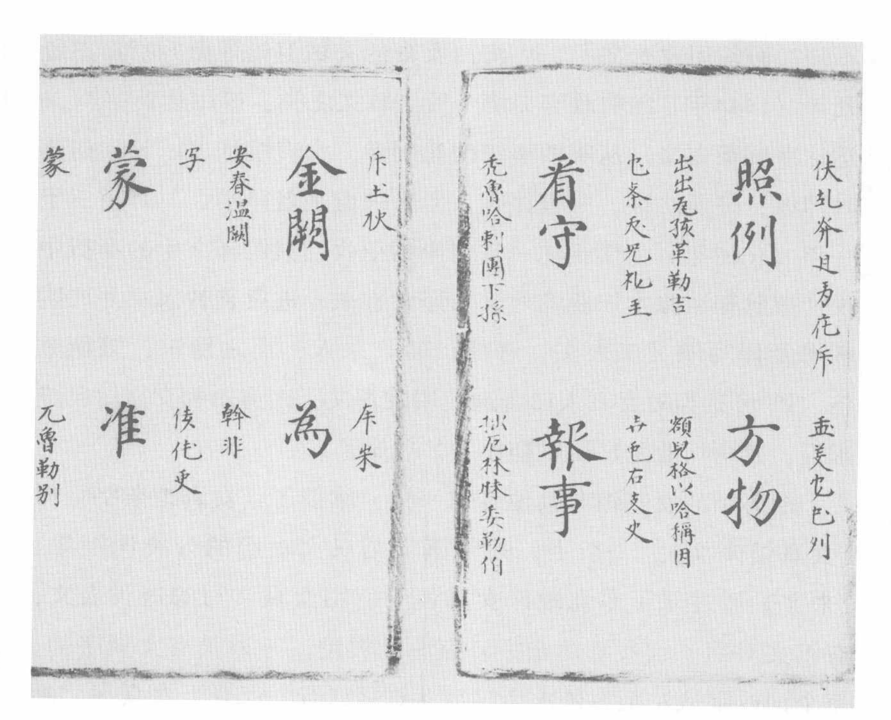


图125
明抄本《华夷译语·女真馆杂字》。

个词（字）。每个词或字分三行，中间为汉文词（字），其右为女真文，左为汉文拼写女真字音，如“圣旨”，左边的女真语音为“阿鲁卜鲁旨”，“皇后”为“皇阿木鲁该”，汉文词左右的女真文和汉字注音字体均较小。金启孮先生指出此件《新增女真杂字》（拟名）与东洋文库藏本相同，在以前的有关研究著作中未有提及，鲜为人知。

二、西夏文图书的出版

曾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在西夏于13世纪初灭亡后，历经元朝，在明代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的政策下，已经处于迅速消亡过程中，尽管在汉文文献中还可以找到一些西夏的后裔在地方做官的记载，但与元代党项人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方面起到显著作用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有明一代党项人的文献出版寥若晨星。

故宫博物院藏有木刻版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一卷。卷首附有版画，系序言所叙故事的分解图画，图后有序文29行，后为

经文，最后有西夏文发愿文34行，其中有刻经时间、人名等。内有“大明朝壬子”“五年正月发愿者……”，查明代壬子五年有二，一为洪武五年，一为弘治五年。序言又有“当今皇帝万岁俱来，皇子太子千秋当见”之语。洪武五年时太祖朱元璋已有太子，而弘治五年正月时孝宗朱祐樘无太子，知此序所指壬子五年当是洪武五年（1372年）。序言中19—31行多为“令刻者”人名，其中有些是党项人姓，如第一人姓移合讹，职务是都督，又有耶和、平尚等党项姓氏。证明当时党项人的一部分后裔仍保留着原来的姓氏。序言中明确指出“因闻此经多有感功，起实信心，施舍净物，请来书者，新写印染，付印千部，施诸族处”。这里的“族”是指以姓氏为准的“族”。印施千部西夏文佛经，可见当时还有一定数量的西夏后裔，他们互相之间有联系，其中还有人懂得西夏文，可以诵读西夏文佛经。此经卷长260厘米、高17厘米，上下双框，书写规范，字体流利，刻印清晰，说明当时西夏文的使用虽然已经不多，但仍然能达到熟练的程度。[1]（图126）

[1] 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1期。



图126
明代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

直至明代中期在保定仍居住着党项后裔。在保定西郊韩庄的寺庙遗址中出土了两座八面石幢，上刻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有弘治十五年（1502年）造幢的年款。幢上刻人名上百，其中不乏党项族姓，如平尚、移合讹、命屈、鲜卑、依罗、嵬名、敖移等，有的有职官称谓，如荣禄大夫、都指挥、指挥等。（图127）



图127
明代保定西夏文经幢

三、傣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明代傣族仍泛称“百夷”或“白夷”，实行领主农奴制。明朝在滇中南采取任用土官治理地方的“以夷治夷”方法，而在滇西由于麓川思氏土司政权多次军事叛乱，明朝曾三次征讨。大批汉族陆续迁入百夷地区。

此时佛教已成为傣族地区的普遍信仰，同时兼行传统的巫教和鸡卜。傣族历法借鉴汉族地区的历法参酌佛历，同时经过傣族自己的创造和改革，形成了很有特点的傣历。

傣文在明朝继续使用，形成了新的文献，并且仍保持着贝叶文化的特点。其文献多不记载成书时间，多数典籍年代无考。

傣族地区水利资源丰富，对水利的管理和分配十分重视。《景洪的水利分配》是当地有关水利分配的专书，距今四百多年。这些老傣文文献是少数有年代可考的著作，有重要史料价值，尤为珍贵。[1]

【1】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

傣族有为人称道的天文历法，具有很高的水平，西双版纳傣文古籍包含了这样的科学著作。《苏定》是一部天文历法专著，内容包括傣历年、月、日及节日的安排和计算方法，有九曜在黄道上的运转周期及运转位置的推算方法，反映了傣族古代天文学的基本情况。作者姓名和写作年代不详。根据其计算数据推断，其成书年代当在16世纪之前。有多种抄本，一种棉纸抄本，页面长35厘米，宽27厘米，每页19行，共4页62行。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128）

傣族文学繁荣，并有文学专论。《论傣族诗歌》原名《哇雷

麻约甘哈傣》，作者署名祜巴勐，是僧人等级称谓，并非真名。成书于傣历976年（1615年）。内容论述宇宙生成、人类起源、语言产生、诗歌发展以及傣族诗歌的分类和特点等。原书为棉纸手抄本，存西双版纳勐海县。[1]

图128
傣文《苏定》

【1】岩文扁：《论傣族诗歌》，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

第七节　明代少数民族图书出版特点

明代仍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继续使用，包括蒙古文、察哈台文、藏文、彝文、傣文、女真文、西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仍显示出繁荣的景象。

明初为了加强与民族地区的联系，专门开设四夷馆，从事国外和民族地区来文、奏折的翻译工作，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献。四夷馆对明清时期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和少数民族文献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初北元退至上都，与明王朝长期对峙。处理与蒙古的关系，对明王朝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明洪武年间翻译蒙古文《蒙古秘史》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

明代蒙古各部长期处于内乱分裂、纷争不断的动荡之中，被称为蒙古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长期战争给蒙古的经济、文化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尽管如此，明代的蒙古人还用蒙古文创作了许多文学、史学作品。16世纪中叶，黄教传入蒙古，从此给蒙古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6世纪末、17世纪初编译了蒙古文《甘珠尔》。

明代的西域，除哈密设卫由中央政府管辖外，其他地区处于割据状态。这一时期，在察合台汗国形成了一种官方书面语——察合台语。以阿拉伯字母和波斯文字母为基础的察合台文撰写、翻译了很多著作，都以抄本形式流传。

藏文文献的大规模雕版印刷在明代形成高潮，史学、文学著述不断问世，特别是中央和少数民族地区都雕印施放藏文《大藏经》，使藏文出版达到繁荣。

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编撰、出版呈现旺盛势头，其中彝文和傣文文献有多种问世，多以写本传播，但彝文《劝善经》的刊印开创了彝文的刻印事业。

明代有的文种走上了消亡的道路。在吐鲁番、哈密等地，回鹘文的使用至少到16世纪中后期，现存的明抄本《高昌馆课》等书籍就是这一时期的遗存。即使是这些地区接受伊斯兰教后，回鹘文还使用过一段时期。西夏文、女真文的出版到16世纪初已成为绝响了。

结束语

在前代的基础上，明代的出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明代出版事业的规模，比前代要大得多。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府州县，都有出版的实迹。一些边远的省份，也开始有了书坊。文人的私刻，更成为一种风气。全国范围内，新增了若干出版集中地，并不断有增减变动。

由于经济的发展，教育的进步，社会上识字的人增多，对出版物提出了新品种的要求，小说、戏剧、家庭日用、经商知识、医算以及消遣之类的书大量出版，图书的品种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走向民间。

出版事业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扩大、深入，互动作用十分明显。不论是宫廷党争的大事，还是国家政治军事的机要，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技术的创新，都可以看到出版物能动地活跃在其中。

出版事业本身的条件也得到了完善。造纸、制墨、印订、运销，出版事业机制灵活，经营有方，不少已形成规模生产。特别是，经过明朝一代的努力，雕版工艺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其标志是铜活字、木活字已经成为一定的生产力，在出版物中占有一定比例。精美的插图，绚丽的彩色印品，都为明代的出版增添了色彩。

一批批闪烁着知识光芒的图书被编纂刊印出来，它们跨越时空，饮誉国内外，一直畅销到今天。

一批批卓越的出版家先后诞生，出版事业的各个领域，不论是编纂、刊印，还是经营、收藏，都可以数出不少家珍，在他们身上，闪烁出卓越出版家的智慧和素质。出版学、编辑学方面的理论建设，也显见端倪。

这一切成绩，都说明了明代的出版事业，正在向近世化大踏步地前进。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改朝换代使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社会生活并不完全是割断重来，有继承传袭的内容，也有革故鼎新的创造，出版事业也是如此。入清以后，因政权的更迭，学术取向的变化，出版事业的布局、选题品种、经营流通等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我国的出版事业，翻到了新的一页。

附录一　明代出版大事记

龙凤二年（1356年）　朱元璋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

洪武元年（1368年）　下诏免除书籍、田器税。　徐达入元大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止士卒侵暴，后来，这些图籍后运去南京。

洪武二年（1369年）　举曾鲁、梁寅等人至京修礼书。至翌年书成，名《大明集礼》，详订升降仪节、制度名数。　赠朝鲜《六经》、《四书》、《通鉴》。

洪武三年（1370年）　设秘书监丞，典司经籍，是具有中央出版管理机构性质。后归翰林院典籍掌管。其后，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司经局，属詹事府，掌管图书刊辑之事。　《元史》刊成。先是，在洪武元年时，诏修《元史》，次年修成，共159卷。因内容有欠缺，便派人收集材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七月修成，增53卷，合计210卷。最后“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十卷”。洪武三年十月刊成。　命魏俊民等6人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胜及降附始末，编成《大明志书》，命秘书监刊行。

洪武四年（1371年）　赠日本王怀良《大统历》。

洪武五年（1372年）　刻印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

洪武五年（1372年）　朱元璋集众僧校刊《大藏》，至永乐元年（1403年）完成，称“洪武南藏”，6 331卷。

洪武六年（1373年） 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详定《大明律》30卷、606条。 诏禁四六文词，取韩愈《贺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为文式。 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摒《战国策》及阳阴谶卜诸书，不许列于学宫。 命各州府绘《山川险易图》进呈。 由陶凯、张筹初修，文原吉等续修的《昭鉴录》修成。该书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鉴戒之事。书成颁赐诸王。 朱元璋《御制道德经注》书成刊行。

洪武七年（1374年） 命詹同、宋濂等修《日历》，自临濠起兵至洪武六年（1373年），记国家大事，凡一百卷。又辑出40类、5卷，名《皇明宝训》。 福建莆田人俞良甫在元末到日本，参与刻书。他自己出资所刻《李善注文选》自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于是年完成。

洪武八年（1375年） 命令把收藏在杭州的宋元旧版20余万片运送至南京国子监。 朱元璋因旧韵以江左为准，命学士乐韶凤等用中原音校正，编成《洪武正韵》刊行。后又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修订刊行《韵会定正》。

洪武九年（1376年） 诏天下郡县纂修《志书》；后又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令修《图志》。

洪武十二年（1379年） 因官府文移案牍繁冗，朱元璋命廷臣减其繁文，著为定式，名《行移繁减体式》，颁行全国。

洪武十三年（1380年） 因胡惟庸案，朱元璋命儒臣纂辑历代诸王、大臣、宗戚、宦官之悖逆不道者，凡212人，名《臣戒录》颁行中外。 又命儒臣辑《相鉴》一书，列萧何、文天祥等贤相82人，16卷；田蚡、贾似道等不肖相26人，4卷。太祖作序。

洪武十四年（1381年） 国子学改建于南京鸡鸣寺南，次年，改称国子监。 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后又于洪武二十四（1391年）年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

洪武十五年（1382年） 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编修马沙亦黑奉敕将蒙文本《蒙古秘史》译成汉文。

洪武十五年（1382年） 刊印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等人编纂的

《华夷译语》，作为蒙汉翻译的课本。

洪武十五年（1382年） 从杭州及集庆路儒学等处运抵南京国子监的图书陆续集中，命儒臣考补，工部督匠修治，陆续出书。

洪武十六年（1383年） 命大学士吴沉等修《精诚录》书成。该书以类收录有关敬天、忠君、孝亲等论述。

洪武十七年（1384年） 编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该书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府县，又于郡县之下详载古今沿革之由。

洪武十八年（1385年） 颁发《御制大诰》；次年颁发《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又次年，颁发《大诰武臣》。

洪武十九年（1386年） 刘三吾等编《志戒录》2卷（一名《历代奸臣备传》），集唐李克用至宋刘正彦为臣悖逆者百余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 索南坚赞撰成著名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 命礼部遣使购求天下遗书，令书坊刻行，福建布政司进《南唐书》、《金史》、《苏辙古文》等书。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 朱元璋命人取文武官员岁给禄米之数，折算成农夫劳作之数，编成《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朱元璋命人编成《诸司职掌》，颁布中外。 是年，诛蓝玉后，籍家时见其器用僭越，因命辑考前代功臣封爵制度，编成《稽制录》，太祖作序，颁示功臣。是年，又命儒臣辑历代诸王宗室为恶及悖逆者，书名《永鉴录》，赐给诸王。 高棅编成唐诗总集《唐诗品汇》90卷，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补充10卷。共收作者681人、诗6 723首。

洪武二十七年（1394） 修《寰宇通衢》书成。东至辽东都司，东北至三万卫，西至四川松潘卫，西南至云南金齿，南至广东崖州，东南至福建漳州，北至北平大宁卫，西北至陕甘，计横11 750里，纵10 900里。此书于景泰中重修。 命刘三吾等汇集历代对《书经》的阐述，成《书传会选》6卷，作为应举依据，由礼部颁行天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 增删洪武六年（1373年）所订《大明律》，成《更定大明律》仍为30卷。 颁《皇明祖训》。先是，朱元璋命陶凯等编《祖训录》书写在右顺门西庑，随时损益。是年，裁定为《皇明祖训》，由礼部刊印，颁示内外诸司。

洪武年间 内府经厂有刊字匠150名、裱背匠312名、印刷匠58名。内府刻印了大量诰令、经藏、经史、历书。

建文三年（1401年） 洪武年间由王景常等纂的《云南志》刊行。其后，景泰年间有《云南图经志书》10卷，弘治年间有《云南总志》27卷，正德年间有《云南志》44卷，万历年间有《云南通志》17卷及《滇略》10卷等。

永乐元年（1403年） 永乐帝命解缙等编大型类书。次年书成，名《文献大成》。因内容不完善，命姚广孝等重编。

永乐二年（1404年） 印《列女传》1万册，分送各国。

永乐三年（1405年） 从是年开始，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赠给西洋各国《历书》、《列女传》等书。

永乐四年（1406年） 因文渊阁藏书不完备，尤少子集类书。命礼部遣使四出购求遗书。 命张宇初纂辑《道藏》。至正统十年（1445年）完成，共收书1 426种、5 305卷。称“正统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重刻，增50种、180卷。

永乐五年（1407年） 明成祖命礼部选国子监生38人学习译书，成第一批四夷馆的学生，包括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和缅甸8馆，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六年（1578年）增设暹罗馆。

永乐五年（1407年） 《永乐大典》编纂完成，共正文22 877卷、目60卷、订成11 095册、37 000万字。至永乐七年（1409年）誊写完毕，存南京文渊阁。清稿正本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时运北京。 是年，赠日本使臣《劝善书》、《内训》各百册。

永乐七年（1409年） 永乐帝手纂《圣学心法》一书赐太子，其纲为君道、臣道、父道、子道。

永乐十年（1412年） 颁降《修志凡例》17条、25目。命各地

依式修志。

永乐十一年（1413年） 明成祖敕令编纂藏文朱印本《大藏经》108帙刻印完成，称为永乐版藏文《大藏经》。

永乐十四年（1416年） 命黄淮等编辑《历代名臣奏议》书成，350卷。

永乐十五年（1417年） 永乐十二年时，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176卷、《性理大全》70卷，是年书成，颁行六部、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

永乐十六年（1418年） 《太祖高皇帝实录》三修成书。先是，建文元年（1399年）时，由董伦、王景等修《太祖实录》。永乐登位后，命李景隆等重修。永乐九年（1411年），又命姚广孝、胡广等重修。于是年书成，217卷。 是年，重颁《纂修志书凡例》，21条，与永乐十年（1412年）所颁门目略有分合。

永乐十七年（1419年） 遣侍讲陈敬宗到南京，搬取文渊阁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运往北京。 越南遣监生唐义来华。明政府赠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

永乐十八年（1420年） 太监郑和先后印多种佛经，分舍南北各寺。

永乐十九年（1421年） 在北京开雕佛藏。依“洪武南藏”略有增加，收佛典1 625部、6 331卷，称“永乐北藏”。正统五年（1440年）完成。万历五年（1577年），又增41卷。 朝鲜刻印汉籍《资治通鉴纲目》等书。朝鲜有刻印汉籍之专设机构，先后刊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楚辞》、《孝经》、《朱文公集》、韩柳文、李杜诗等书。

永乐年间 封于开封的周王刊《救荒本草》4卷。 佚名纂成《顺天府志》，20卷。

宣德元年（1426年） 制《外戚事鉴》5卷、《历代臣鉴》37卷，汇辑历代外戚及群臣之善恶凶吉事。颁赐群臣及外戚。

宣德二年（1427年） 赠朝鲜《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

理大全》、《通鉴纲目》等书。

宣德四年（1429年） 衍圣公孔彦缙请购福建麻沙版书籍，咨礼部尚书胡濙。礼部许其请，令有司依时值买纸雇工摹印。

宣德八年（1433年） 建广寒、清暑二殿庋藏图书。

宣德十年（1435年） 朝鲜使臣南智到北京，向明政府求五种书：《资治通鉴》、《源委》、《通鉴前编》、《历代笔记》、《宋史》。

正统二年（1437年） 建安熊宗立刻印《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在此前后，刻印医籍数十种。

正统六年（1441年） 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成，20卷，著录图书7 297种。

正统七年（1442年） 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奏章，请禁毁《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二书。礼部议论后准其议，令全国禁毁。

正统八年（1443年） 王祥、毕恭修［正统］《辽东志》，9卷。其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四十五年（1566年）又两次续修。

正统九年（1444年） 海西女真的玄城卫指挥撒升哈向明政府奏请敕文之类用蒙古字，不再用女真字。

正统十三年（1448年） 宣德帝命采集经传子史中嘉言善行，编成《五伦书》62卷。是年书成刊行。

景泰四年（1453年） 日本天龙寺僧东洋允澎来华，带去《劝忍百箴孝经》、《清江贝先生文集》、《元史》、《诸史会要》、《翰墨全书》等书。

景泰七年（1456年） 大学士陈循等修《寰宇通志》书成，119卷。

天顺二年（1458年） 命李贤等为总裁，合永乐中所修《天下郡县志》、景泰中所修《寰宇通志》，成《大明一统志》。书成，90卷。天顺五年（1461年）刊行。

成化四年（1468年） 山西提学佥事胡濙请颁《大明一统志》于天下。由礼部于司礼监关领原本，付福建布政使司，命书坊翻印。

成化十一年（1475年） 伍余福纂［成化］《陕西志》30卷。其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赵廷瑞等修［嘉靖］《陕西通志》刊行，40卷。 日本足利义政向明政府要求铜钱（永乐钱）、勘合符、书籍三物。

成化十二年（1476年） 觉顿蒙珠·仁钦扎西著藏文语文著作《丁香帐》（《藏语新旧词辩异·丁香帐》）。

成化十三年（1477年） 日本使臣来北京，要求《佛祖统纪》一书，赠予《法苑珠林》。

成化十二至十四年（1476–1478年） 噶举派僧人管氏家族译师桂洛·熏奴贝著成重要藏文史书《青史》。

成化十九年（1483年） 御制《文华大训》书成，28卷，教皇太子用。

成化二十年（1484年） 孙洪修等纂［成化］《河南总志》刊行，19卷。其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邹守愚等纂［嘉靖］《河南通志》刊行，45卷。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礼部侍郎丘濬撰《大学衍义补》，161卷，诏刊行其书，并将书中可行之事命内阁议行。

成化年间 李侃修［成化］《山西通志》刊行，17卷。其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杨宗气等修［嘉靖］《山西通志》，32卷；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李维桢修［万历］《山西通志》，30卷。

弘治元年（1488年） 噶举派僧人桑杰坚赞编著重要藏文史书《米拉日巴传》。

弘治二年（1489年） 安徽黄氏刻工黄文敬、黄文汉等刻《雪峰胡先生文集》。黄氏刻工于此前后逐步形成刻工群体，有姓名可考者百余人。

弘治三年（1490年） 无锡华燧会通馆用铜活字印《宋诸臣奏议》，150卷。此为我国传世第一本铜活字印书。华氏传世最后一本铜活字书是正德十一年（1516年）的《春秋繁露》，共出版活字书数十种。 陈道等修《八闽通志》87卷，于成化二十年（1485年）始修，弘治三年刊行。翌年，又有递修本。

弘治六年（1493年） 周孟中等纂［弘治］《广西通志》，8卷。其后，嘉靖十年（1531年）林富等纂［嘉靖］《广西通志》60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苏浚等纂［万历］《广西通志》42卷。

弘治十年（1497年） 命内阁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会典》，180卷，成为“一代之制”。弘治十五年（1504年）书成，未能颁行，以后正德、嘉靖间又续补。

弘治十一年（1498年） 金台岳家重刊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刊行，5卷。此为明代最早的一种“西厢”本子。

弘治十二年（1499年） 两淮巡盐御史史载德聘学官子弟编盐法专志《两淮运司志》。

15世纪 宗喀巴的弟子贾曹杰撰写因明方面的著作《释量颂能无颠倒显示解脱道论》等。

15世纪 诗人、思想家艾里谢尔·纳瓦依创作著名的《纳瓦依诗集》。

15世纪 鲁提菲完成察合台文2400行的叙事长诗《古丽与诺鲁孜》。

弘治十三年（1500年） 因阙里孔庙火，是年建安又火，书籍、书版成为灰烬。给事中许天锡向皇帝进言遣官临视。遂敕福建巡按御史往视，厘正麻沙书版。

弘治十四年（1501年） 王珣等修［弘治］《宁夏新志》刊行，8卷。其后，嘉靖十九年（1540年），杨守礼等修［嘉靖］《宁夏新志》，8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崔景荣等修［万历］《朔方新志》5卷。

弘治十六年（1503年） 苏州金兰馆铜活字本《石湖居士集》出版，34卷。此书被认为明代活字印字中的精品。

弘治十八年（1505年） 陈献章《白沙先生全集》刊行，收诗1 970首，文464篇。

弘治年间 沈庠等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刊行，17卷。其后，嘉靖年间谢东山修［嘉靖］《贵州通志》；万历年间，又有沈思充、郭子章等续修。

正德元年（1506年） 林世远等纂修《姑苏志》刊行，60卷。嘉靖时增修。

正德年间（1506—1521年） 撰成彝文《劝善经》。

正德七年（1512年）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 无锡安国以铜活字印书数十种。

正德十年（1515年） 南京礼部给事中徐文溥上疏禁毁八股选本书。

正德十五年（1520年） 诏取天下志书。

正德年间 由施耐庵写定的《水浒传》刊行。明代有《水浒传》的多种“繁本”、“简本”。

正德十二年至嘉靖十一年间（1517—1532年） 顾元庆刊行《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16年才完成。其后，又刊《顾氏明朝小说四十种》、《广四十家小说》等。

嘉靖元年（1522年） 罗贯中写定的《三国演义》刊行。上有修髯子的引言。这是今天所能见到有关《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 薛纲等纂［嘉靖］《湖广总志》刊行，22卷。其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徐学谟等纂［万历］《湖广总志》刊行，98卷。何景明、周宗化纂修《雍大记》（陕西总志）刊行，36卷。

嘉靖三年（1524年） 诏命各地修郡国志书，送呈史局。 无锡安国所印铜活字书《吴中水利通志》出版，17卷。

嘉靖四年（1525年） 林庭等修［嘉靖］《江西通志》刊行，37卷。 王延喆翻刻宋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

嘉靖五年（1526年） 因福建建阳刻书多讹，巡按御史杨瑞、提督学校副使邵铳请于建阳设置官署，派翰林春坊官监校麻沙书版。寻命汪佃领其事。

嘉靖七年（1528年） 自本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南京国子监大规模修补二十一史。其后，在万历二年（1574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有一次大补版，近于重刊。南监本二十一史大都有二刻。 记述“大礼议”过程的图书《明伦大典》（初名《大礼全书》）编成，刊布天下。 命儒臣重校续订《大明

会典》。书成后由张璁作序，刊布天下。其后，万历四年（1576年）又复修，228卷。

嘉靖十一年（1532年） 福建提刑按察使向建阳府发出牒文，召集书商，颁给样书。要书坊按样书刊印，并具结保证。

嘉靖十二年（1533年） 袁宗儒等修［嘉靖］《山东通志》刊行，40卷。

1533年 阿亚兹·西凯斯泰完成2650行的察合台文长篇叙事诗《世事记》。

嘉靖十三年（1534年） 闻人铨纂［嘉靖］《南畿志》刊行。其后，万历五年（1577年），有程嗣功修、王一化纂［万历］《应天府志》刊行，32卷。 黄省曾刻印《水经注》40卷。此外，尚有吴琯、严忍公等刻本。

嘉靖十四年（1535年） 戴璟等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刊行，40卷。嘉靖四十年（1561年）重修为《广东通志》刊行，70卷。其后，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棐等纂［万历］《广东通志》，72卷。

嘉靖十六年（1537年） 封于太原的晋王从嘉靖初至是年，先后刊印《文选注》60卷、《唐文粹》100卷、《宋文鉴》150卷、《元文类》70卷等。

嘉靖十七年（1538年） 闻人诠获两种《旧唐书》残本，合而为一，校勘4年，基本恢复原貌，于是年刊印。

嘉靖十七年（1538年） 班钦·索南查巴著重要藏文史书《新红史》。

嘉靖十八年（1539年） 令修《承天大志》，24卷，由顾璘主其事。

嘉靖二十年（1541年） 罗洪先据元朱思本的《舆地图》增绘成《增广舆地图》2卷，图42幅，又图副68幅。采用“计里画方”的比例及24种图例。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黄佐在吴节所纂的《南雍志》基础上撰成《南雍志》24卷，详载南京国子监事纪、列传及藏书刻书

情况。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陆楫等编《古今说海》135种、142卷。由俨山书院、云山书院刊行。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 刘大谟等修［嘉靖］《四川总志》刊行，16卷。

1547年 政治家、史学家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完成著名的藏文纪传体史书《拉失德史》，记述了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叶中亚和新疆的历史。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袁褧所刻《六家文选注》，经16年校勘，于是年完成。

嘉靖四十年（1561年） 诏重刊医书《卫生方》。 由胡宗宪等修纂的［嘉靖］《浙江通志》于是年刊行，72卷。

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间（1561—1566年） 宁波范钦在宁波建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 先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时，宫中失火，烧毁不少典籍。嘉靖帝担心《永乐大典》孤本失传，是年，命高拱等重抄一部。至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存北京皇史宬。 胡宗宪刊《筹海图编》刊行，13卷。以后又有隆庆、天启刊本。

嘉靖四十二年（1564年） 巴卧·祖拉陈哇著重要藏文史书《贤者喜宴》。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朝鲜使者从中国购回《吾学编》、《弇山堂别集》等书。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 谈恺刊印《太平广记》500卷。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 记载85种疾病治疗方法、300多种动植物药物的彝文医药书撰成。

嘉靖年间 吴承恩撰《西游记》。明代刊本有4种，其中《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为今通行本所据。 俞安期将4种唐代类书汇总编成《唐类函》200卷，分为45部，子目960个。 林富、黄佐等纂修《广西通志》刊行，60卷。

隆庆五年（1571年） 俞宪编《盛明百家诗》刊行，324卷。

隆庆年间 王阳明著作由御史谢廷杰汇编成《阳明全书》38卷刊行。

万历元年（1573年） 熊冲宇种德堂刊行《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刊行，2卷。

万历二年（1574年） 福建人游廷桂、饶世仁，常熟人周光宙，无锡人赵秉义、刘冠等合力印成铜活字本《太平御览》，1 000卷，印100部。

万历四年（1576年） 阁臣续修《大明会典》，增嘉靖以后事。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书成，228卷。

万历五年（1577年） 金陵富春堂刻《校梓注释图证蔡伯喈》，注释、图画、正文各占一部。

万历六年（1578年） 李时珍编《本草纲目》书成，52卷。该书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由书商胡承龙初刻成书，称“金陵本”；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由江西巡抚夏良心重刻，称“江西本”。

万历七年（1579年） 紫柏真可发起用民间力量刻佛藏。是年在山西五台山开雕，后迁至浙江嘉兴完成。收佛经2 141部，12 600卷。称“嘉兴藏”。该书奠定了线装方册的装订形式。茅一桂刊行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44卷。

万历十年（1582年） 高石山房刊行《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插图47幅，是版画风格具有转折意义的代表作。 天主教士利玛窦来中国，次年至肇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北京。

万历十一年（1583年） 天主教士意大利人罗明坚著《天主实录》（又名《圣教实录》）在肇庆刊行。此为欧人最早用中文写成的传教书。

万历十六年（1588年） 建安书林余象斗开始刊印图书，刻书活动持续50余年，刻书40余种。

万历十八年（1590年） 潘季驯刻《河防一览》14卷，详记治黄经过。

万历二十年（1592年） 程荣编刊《汉魏丛书》35种、208卷。其后有何允中编《广汉魏丛书》76种、439卷。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沈应文修、张元芳纂［万历］《顺天府志》刊行，6卷。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 开馆编本朝正史，王锡爵等为总裁，后因火事罢。焦竑编《国史·经籍志》，3年后完成，5卷，著录图书16 279种。此为明代官修书目中最完备的一种。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 在北京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共108函。万历三十三年（1605），又续刻了《丹珠尔》中的42函经论，称为万历版藏文大藏经。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 北京国子监据南监本二十一史陆续雕版，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完成，称"北监本"。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 湖州人闵齐伋开始刊印彩色套印书，共印行30余种。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沈一贯辑、王文俯校的明代地图集《大明一统舆地广略》出版，图35幅。 南京拔贡李登用木活字印其所著《冶城真寓存稿》8卷。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焦竑刊行李贽的《藏书》，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被拿问，书销毁。其后，天启元年（1621年）陈仁锡又刊行此书，天启五年（1625年），皇帝再次下诏销毁。 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增用银粉印《大乘观音菩萨普门经》。

16世纪 俺答汗统治蒙古时期编成蒙古文《阿勒坦汗法典》。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金陵书林傅昌辰版筑居刊行陆应祖所撰地理专著《广舆论》24卷。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徽州胡文焕《格致丛书》初刻刊行，收书186种、449卷。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 孙传能、张萱编《内阁藏书目录》书成，著录图书2 447种。此为继《文渊阁书目》后的明代国家书目。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沈氏尚白斋刊印《陈眉公秘笈》、《续秘笈》、《广秘笈》、《普秘笈》、《汇秘笈》等，共217种，426卷。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皇帝命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校刻《续道藏》，收书50种、180卷。正续《道藏》共收书1 476种、5 485卷。颁行全国名山宫观。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土默特部在顺义王扯力克与三娘子的倡导下，由著名翻译家阿尤希、锡勒图固什绰尔吉等将藏文《甘珠尔》译为蒙古文。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利玛窦传入中国的《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多次翻刻，至是年，翻刻达33次。并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刊刻多种地图集。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由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赞助，与第六世噶玛巴活佛噶旺·曲吉旺秋共同主持，刻印108函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至天启元年（1621年）完成。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在理塘刊《甘珠儿》大藏经，108卷，朱红色，称“理塘朱版”，赠拉萨大昭寺一部。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 由利玛窦、徐光启合作译出的《几何原本》前6卷刊行。

1607—1611年 撰成蒙古文《阿勒坦汗传》。

万历四十年（1612年） 熊三拔、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刊行。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 臧懋循纂辑的《元曲选》刊行，100卷。臧氏用“雕虫馆”名义，自编、自印、自发图书。 潘是仁自刻其所编《宋元诗》，208卷，该书于天启二年（1622年）重修时增至273卷。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天主教士法国人金尼阁募集西方图书7 000部，是年运抵澳门。因故未能运到内地。

万历四十年左右 大约在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年间写定的《新刻

金瓶梅词话》，先以抄本流行，约于是年刊行。稍后，有绣像本行世，图101幅。

万历年间 吴琯西爽堂刻了多种史书，如《古今逸史》、《合刻山海经水经》等，共刻书240种、1 500余卷。 徽州程君房刊行彩印图书《程氏墨谱》14卷、图447幅。 商濬编的《稗海》46种、285卷，《续稗海》24种、141卷，由商氏半野堂刊行。

万历年间 南京、苏州、杭州书林刊刻了大量小说、戏剧，大都有精美插图。

天启元年（1621年） 约在此年，冯梦龙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刊行。其后，在天启四年（1624年）《警世通言》刊行；天启七年（1627年）《醒世恒言》刊行。合称“三言”，共收小说120篇。 茅元仪辑《武备志》刊行，240卷，200万字，图738幅，收辑了2 000余种书上的资料，被称为“兵学百科全书”。

天启初 毛晋汲古阁开始刻书活动，传世最早的一种书刊于天启年间，用“绿君亭”名义。刻书活动一直继续到清代，前后刻书600多种。毛晋是明代最有成就的出版家。

天启三年（1623年） 樊维城刊行《盐邑志林》，40种、66卷。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写成的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职方外纪》，5卷，于是年刊行。

天启六年（1626年） 魏忠贤等炮制的《三朝要典》刊行。其后在崇祯二年（1629年），魏忠贤垮台，颁行《钦定逆案》，《三朝要典》被毁版。 吴发祥刊行饾版拱花彩色《萝轩变古笺谱》，在南京出版。 金尼阁撰中西语言工具书《西儒耳目资》出版。快堂刊行闵景贤编《快书》50种、50卷。 崇祯年间，又有何伟然编《广快书》50种、50卷。

天启七年（1627年） 胡正言编印的饾版画册《十竹斋书画谱》在南京出版，图160幅。

1604—1627年 编成蒙古文《黄金史纲》。

崇祯元年（1628年） 毛晋汲古阁开始刻《十三经》、《十七

史》，约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完成。 凌濛初编撰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拍案惊奇》出版；崇祯五年（1632年）《二刻拍案惊奇》出版。共短篇小说80篇，合称“二拍”。

崇祯初年（1628—1629年） 由贡噶敖德斯尔班弟达和昆登固始等将藏文《甘珠尔》108函译为蒙古文。

崇祯二年（1629年） 李之藻刊行《天学初函》，共收天文历数图书20种。黄虞稷生，入清后，黄氏撰《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出版的图书15 660种，是著录明代图书最多的一种书目。 何乔远修《闽书》154卷，始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至崇祯二年出成刊行。

崇祯二年（1629年） 阿旺贡噶索南扎巴坚赞著重要藏文史书《萨迦世系史》，记载了萨迦款氏家族的数十个人物的事迹。

崇祯三年（1630年） 曹学佺自刻《大明一统名胜志》，208卷。

崇祯五年（1632年） 南京都察院刊印《唐策》。

崇祯七年（1634年） 徐光启、李天经主纂的《崇祯历书》在是年编成，崇祯末付梓，清康熙间续成，共103卷。

崇祯九年（1636年） 张国维刊行《吴中水利全书》28卷。

崇祯十年（1637年） 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书成，18卷，插图123幅。由其友人南京工部主事涂伯聚刊行。

崇祯十一年（1638年） 陈子龙辑《皇明经世文编》刊行，504卷，收文章3 145篇。 是年大旱，苏州承天寺枯井中发现宋遗民郑思肖所撰《心史》，刊印后引起气节之士的极大震撼。

崇祯十二年（1639年） 徐光启纂辑的《农政全书》书成，60卷。由应天巡抚张国维委请陈子龙编定，于是年刊行。

崇祯十三年（1640年） 喀尔喀部和卫拉特部首领会盟时制定蒙古文《卫拉特法典》。

崇祯十五年（1642年） 《徐霞客游记》由其友人季梦良等整理完成，4卷，以抄本流行。清乾隆年间刊印。

崇祯十七年（1644年） 胡正言编绘的饾版拱花画册《十竹斋笺谱》在南京开雕，图84幅。至弘光元年（1645年）完成。

崇祯年间 毛晋辑刻《六十种曲》。 苏州三多斋刊《忠义水浒传》120回，刘君裕刻插图，为插图中有代表性的精品。

崇祯末 祁彪佳著《远山堂曲品》出版，收戏曲467种，《远山堂剧品》收杂剧242种。

附录二　参考文献

一、史料类

【1】[明]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顾湘小石山房校本。

【2】[明]吕维祺撰,[清]许三礼、霍维翰增辑:《四译馆增定馆则》,[清]曹溶、钱綎辑:《新增馆则》,明崇祯刻本,清袁懋德重修本。

【3】[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崇祯十年(1637年)刊本。

【4】[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崇祯十二年(1639年)平露堂刊本。

【5】[明]郭磐:《明太学经籍志》(载《皇明太学志》卷二)。

【6】[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粤雅堂丛书刊本。

【7】[明]毛晋:《隐湖题跋》,虞山丛刻本。

【8】[明]梅鷟:《南雍志经籍考》,光绪叶德辉刊本。

【9】[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4年。

【1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据姚氏扶荔山房刻本排印,1980年。

【11】[明]焦竑:《玉堂丛话》,中华书局据曼山馆刻本排印,1981年。

【12】[明]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据畿辅丛书本排印,1981年。

【13】[明]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据嘉业堂本排印,1982年。

【14】[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据常州先哲遗书本排印,1982年。

【15】[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据万历刻本排印,1983年。

【16】[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据金陵丛刻本排印,1984年。

【17】[明]王锜:《寓圃杂记》,中华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本排印,1984年。

【18】[明]于慎行:《榖山笔麈》,中华书局据万历本排印,1984年。

【19】[明]郑晓:《今言》,中华书局据纪录汇编本排印,1984年。
【20】[明]张瀚:《松窗梦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武林往哲遗著本排印,1986年。
【21】[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2】[明]王耒贤:《贵州通志》,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23】[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24】[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
【25】[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26】[明]陈洪谟:《治世余闻、治世纪闻》,中华书局据纪录汇编本排印,1997年。
【27】[明]陆粲:《庚巳编》,中华书局据纪录汇编本排印,1997年。
【28】[明]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据叶氏赐书楼本排印,1997年。
【29】[明]王弘:《山志》,中华书局据光绪本排印,1999年。
【30】[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据广雅书局重刻本排印,2001年。
【31】[明]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书店据耕烟草堂本等排印,2001年。
【32】[明]谢肇淛:《五杂组》,上海书店据明如韦馆刻本排印,2001年。
【33】[清]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
【34】[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古籍出版社,1957年。
【35】[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36】[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
【37】[明]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
【38】[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9】《明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补编·明史艺文志附编》,商务印书馆,1969年。
【40】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41】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2】《大定县志》,贵州省大定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5年。
【43】洪焕春:《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44】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45】《云南出版史志资料》(1-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1993年。
【46】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7】田涛:《日本国大木干一所藏中国法学古籍书目》,法律出版社,1991年。
【48】俞洪帆、穆纬铭:《江苏出版人物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王宝平:《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50】张德意、李洪等:《江西古今书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51】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96年。
【52】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
【53】《河北省志·出版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54】王宝平:《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55】《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56】《山东省志·出版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57】《江苏省志·出版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58】《贵州省志·出版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59】《广西通志·出版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60】《山西通志·新闻出版志》,中华书局,1999年。
【61】《青海省志·出版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62】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二、文集类

【63】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60年。
【64】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
【6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明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1986。
【6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第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1991年。
【67】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68】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69】冯惠民、李万健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70】叶再生:《出版史研究》(1–6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999年。
【71】虞浩旭:《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
【72】王春瑜:《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73】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指路经》(第一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三、著作类

【74】王欣夫:《古文献要略》,南京大学油印本。

【75】周弘祖:《古今书刻》,叶氏观古堂刊本。

【76】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2年。

【77】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

【78】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

【79】王伯敏:《中国版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

【80】张国淦:《中国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

【81】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8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

【83】刘叶秋:《类书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4】吴晗:《明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

【85】岩文扁译:《论傣族诗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

【86】冯元蔚整理、翻译:《勒俄特依》(彝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

【87】觉顿蒙珠·仁钦扎西著:《丁香帐》,民族出版社,1982年。

【88】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

【89】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90】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

【91】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92】乌力吉图校注:《黄史》,北京出版社,1983年。

【93】郑振铎:《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83年。

【94】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95】罗国义、陈英翻译,马学良审订:《宇宙人文论》,民族出版社,1984年。

【96】张舜徽:《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97】廓诺·熏奴贝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98】鲁迅:《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99】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译:《西藏王统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0】桑杰坚赞著、刘立千译:《米拉日巴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101】朱风、贾敬颜译:《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2】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

【103】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

【10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5】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6】马学良、张兴等:《彝文〈劝善经〉译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
【107】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中华书局,1986年。
【108】马学良、罗国义:《增订爨文丛刻》,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1987年。
【109】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明]),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1】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2】张元济:《校史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13】周芜:《中国版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114】刘尚恒:《古籍丛书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15】王永健:《明清传奇》,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116】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17】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8】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活字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
【119】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
【120】王勇:《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1】《中国古代插图精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122】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3】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4】江澄波、杜信孚等:《江苏刻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5】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
【126】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
【127】周芜:《金陵古版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
【128】杜信孚、漆身起:《江西历代刻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9】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民族出版社,1994年。
【130】卿希泰:《中国道教》,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131】任继愈:《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132】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3】赵国璋:《江苏艺文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4】齐苔等:《古代科学家传记》,中华书局,1996年。
【135】王勇、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6】徐学林:《徽州出版史叙论》,安徽美术出版社,1996年。

【137】张国标:《徽派版画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1996年。

【138】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

【139】江澄波:《江苏活字印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0】庞朴:《中国儒学》,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141】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2】张铠:《庞迪我与中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143】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

【144】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

【145】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46】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齐鲁书社,1998年。

【14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48】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149】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

【150】黄瑜:《双槐岁钞》,中华书局据岭南遗书本排印,1999年。

【151】仁钦道尔吉整理:《〈江格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2】周芜、周路、周亮:《日本藏中国古版画珍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

【153】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4】陶湘:《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5】王子尧、山口八郎主编:《中国彝史文献通考》(1),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

【156】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57】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8】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2年。

【159】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60】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

【16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62】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63】宗喀巴著、华锐·罗桑加措译:《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164】〔意〕利玛窦、〔法〕金尼阁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

【165】〔法〕费赖之撰，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
【166】〔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167】〔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四、论文类

【168】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1)。
【169】胡道静：《道藏的编辑与出版》，《出版史料》，1987(1)。
【170】顾廷龙、冀淑英：《套印和彩色印刷的发明与发展》，《出版史料》，1987(3)。
【171】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文献》，1988(3)。
【172】潘天桢：《明清之际南京的彩色套印版画集》，《江苏出版史志》，1990，总第3期。
【173】王三庆：《〈万锦情林〉初探》，载《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
【174】〔美〕裴德生、朱鸿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天主教徒试释》，载《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75】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载《民国丛书》40卷，上海书店影印本，1992年。
【176】张秀民：《中国活字印刷简史》，《中国印刷》，1992(23-27)。
【177】袁逸：《中国古代的出版权保护》，载《出版史料》，1992(1)，上海书店。
【178】吉少甫：《明代苏松几社的选家》，载《出版史料》，1992(1)，上海书店。
【179】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载《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80】袁逸：《明末私人出版业的伪盗之风》，载《出版史研究》第1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
【181】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说》，载《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
【182】郑振铎：《明清二代平话集》，载《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98年。
【183】东主才让：《几种藏文〈大藏经〉版本的比较》，《中国藏学》，2000(1)。
【184】陈大进：《试谈彝文古籍的时间下限》，载《州少数民族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185】史金波：《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印刷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二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后　记

研究明代的出版史，最重要的原始史料应该是明代的出版物。面对几百年前出版的图书，依稀的纸香，晶莹的墨色，会把人引入到当年枣梨纸墨的无尽遐想中。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感性体会。这种体会越多越好。不能设想，一个一本明版书也没有看过的人，能写出一部明代的出版史来。书上的序跋、凡例、题记、牌记，则往往记载着出版史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然而，有书名可查的明代图书有三四万种，保存在国内外图书馆中的明版书，也有一万多种，任何人都无法遍览。不得已求其次，古代的翻刻本、近世的影印本、现代的排印本等出版物上，也还多少保存着若干原貌，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出版史研究的原始材料。

明代图书的书目，也是一种“原始史料”。有些书目收罗齐全，断代分明，分类细密，编次有序，分门别类，为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准备资料。像《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等书目，著录的图书都在一万种以上，分别的子目达500多类，向来有“明史之门”的美誉。明代图书的各种书目，有明清人纂辑的，也有今人纂辑的，一共有七八十种。这些书目，自然是应该全部仔细阅读，认真排比的。

治出版史，最应该注意的，当然是各种文献上的直接记载。在正史、实录、典章制度等官方文献上，在地方史乘中，在野史

笔记里，更多的是明代出版物的序跋上，都可以找到这种直接记载。记载的内容或多或少，有详有简，或成篇累牍，或片言只语。你读完一本书，可能一无所获，也可能会惊喜地得到一条线索、半点消息。在《明史》“太祖本纪第二”的元年八月这一段下，在一大段纷繁的史事中，有这样六个字：“除书籍田器税。”说的是明皇朝洪武元年八月开始，免除了书籍的税收，把出版事业看得和农具一样重要。而明代其他文献中，都没有有关的记载。这六个字成了十分宝贵、十分确凿的出版史记载，差不多每一篇论述明代出版政策的论文，都要引用这六个字。从大量史料中发掘出点滴材料，治学的人把这种功夫形象地称为“爬剔”。前人已经做了许多“爬剔”工作，使今人可以利用这些成果。这种功夫是没有穷尽底止的，积少成多，收集的空间还很大，后人也应该继续做这工作，读一点书，下一番功夫，力争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明，再增添一点砖瓦。

对明代出版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专著专文，有研究一部书或一类书的，有记载一个出版家或一个出版群体的，有叙述一件出版大事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地区的，等等。这些成果，为全面编写明代出版史准备了条件。

明代的图书，明代的书目，明代出版史事的记载，明代出版史研究的已有成果，这四方面是编撰明代出版史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进行整理、排比、分析、研究，充实提炼，再加上一定的史纲、史观、史识来统驭，就有可能建构出一部比较全面完整的明代出版史来。

以上，是我写这部《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的方法和过程。由于学无止境，加上主观努力不够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做得都很有限，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和纰漏，敬请读者指正。

在成书过程中，先后有二三十位师友对本书提过意见。他们是高斯、江澄波、杜信孚、许辉、刘光裕、王建辉、方厚枢、肖东发、李致忠等先生。在诸多意见中，使我得益最多的是李致忠

先生所提的意见，他先后三次通读了全稿，大至章节的安排设置，小至一个人名的订正，一种版本的质疑，都不吝指教，累计罗列的意见有80多款。在这里，谨向各位赐教的师友致以最诚挚的谢忱。书稿送到中国书籍出版社后，又有好几位资深编辑进行了审读，可惜出版社没有把他们的大名告诉我，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致谢。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理应有足够的表述，但是历来的出版史研究，都很少涉及，本人对此更是知之极少。通史编委会有鉴于此，特请国内少数民族文献专家史金波、黄润华两位先生，为每一本分册撰写少数民族出版事业专章，本书中的第十二章，就是他们两位的撰著。在这里，谨向他们深致敬意和谢忱。

缪咏禾

2008年 南京


ISBN 978-7-5068-1787-5
9 787506 817875 >
定价：59.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出版通史　5　明代卷
作者=缪咏禾著
页数=455
SS号=12212021
出版日期=2008.12